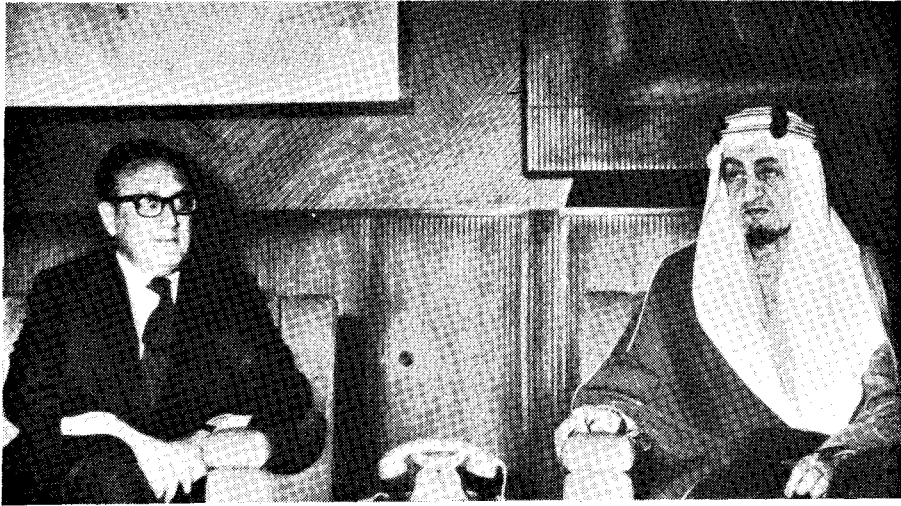


动乱年代

——基辛格回忆录





一九七五年二月在利雅得拜会费萨尔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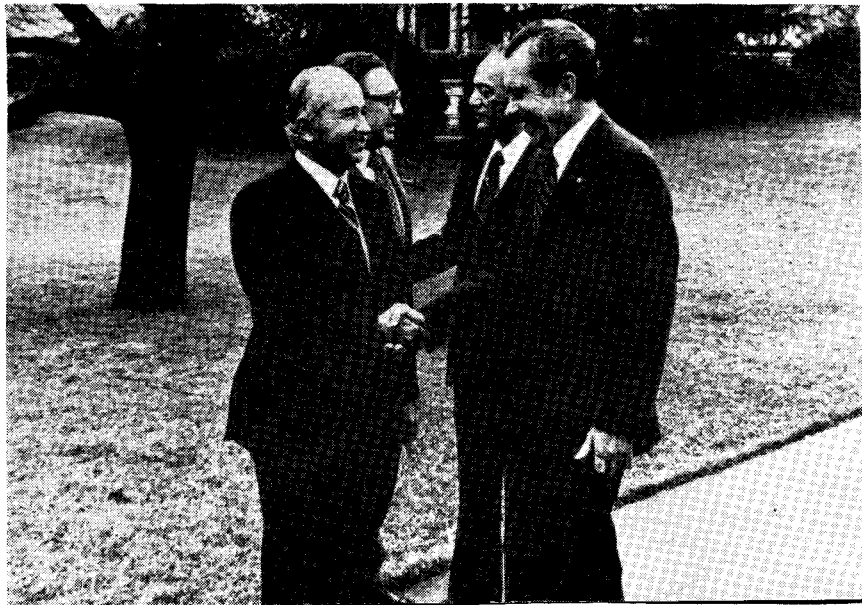


在吉萨游廊上“抢镜头”。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八日
在安曼与侯赛因国王会晤。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九日
法赫米和萨卡夫访问白宫后告别。



目 录

第十一章	中东战争·····	1
第十二章	莫斯科，停火，戒备·····	132
第十三章	第一次中东突破·····	220
第十四章	波斯湾插曲·····	299
第十五章	阴影笼罩着周恩来；同毛泽东再次会谈·····	314
第十六章	盟国的纠纷·····	341
第十七章	日内瓦会议·····	401
第十八章	第一次穿梭外交：埃及—以色列脱离接触·····	474

第十一章

中东战争

我们大家都如梦方醒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星期六，早晨六时十五分，我正在纽约市沃尔多夫饭店我的套间里酣睡。这是我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时下榻的总部。突然间，精力充沛的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J·西斯科闯进了我的卧室。我正在竭力使自己清醒过来的时候，就听见西斯科用粗哑的声音几乎是喊着对我说，以色列同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阿拉伯国家马上就要交战了。但是他确信，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每一方都确实把对方的意图领会错了。如果我能迅速果断地使双方消除误会，就可以抢在他们交火之前使局势得到控制。西斯科对我的能力是过誉了。遗憾的是，尔后的事实证明他对我的能力的估计过高。

促使西斯科来把我唤醒的原因是我们驻以色列的大使、前参议员肯尼思·基廷发回来的一份急电。两小时以前，果尔达·梅厄总理把基廷召到她在耶路撒冷的办公室。以色列领导人在那天还照常办公是极不寻常的，因为那天是犹太教的赎罪日，对犹太人来说是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这是进行斋戒、祈祷和反省的日子。它提醒人们，和上帝相比，自己是渺小的。这是犹太新年放假季节的高潮，按照传统的说法，上帝每年在这一季节里决定所有凡人来年的命运。

梅厄总理带给我们的令人惊愕的信息是：以色列同命运的遭

遇战已然开始。“我们可能遇到麻烦了。”她对基廷说。美国和以色列都曾认为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的调动只不过是军事演习，可是突然之间这种调动变得带有威胁性了。基廷提醒她说，不到十二个小时以前，以色列国防部的官员们还向他保证，形势并无任何危险。梅厄夫人回答说，这种说法已经不准确了，以色列人现在确信，埃及和叙利亚将于当日下午稍晚的时候发动协同进攻。她认为，既然阿拉伯人肯定会被打败，那末这场危机一定是由于他们误解了以色列人的意图而引起的。美国是否可以紧急转告苏联和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以色列无意进攻埃及，也无意进攻叙利亚？以色列正在征召“若干”名后备队，但是为证明其和平诚意，决定不进行总动员。基廷问以色列是否计划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果尔达断然重申，以色列希望避免流血，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不会首先挑起敌对行动。

当西斯科把我唤醒的时候，中东的和平局势只剩下九十分钟了。埃及和叙利亚把他们的备战活动隐蔽得十分巧妙，以致于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以色列人估计进攻到来的时间还是比实际预定的时间迟四个小时。我很清楚，阿拉伯的进攻若是事先策划好的，那么任何外交努力都无济于事。但是，我的看法仍然摆脱不了以色列例行报告的影响，而这些报告又都是为我们自己的文电所证实了的，这就是认为这样一场进攻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便投身于一段狂热而紧张的外交活动之中，为的是阻止一场冲突。对于埃及和叙利亚的行动是出于对以色列的意图产生了误解一说，我几乎信以为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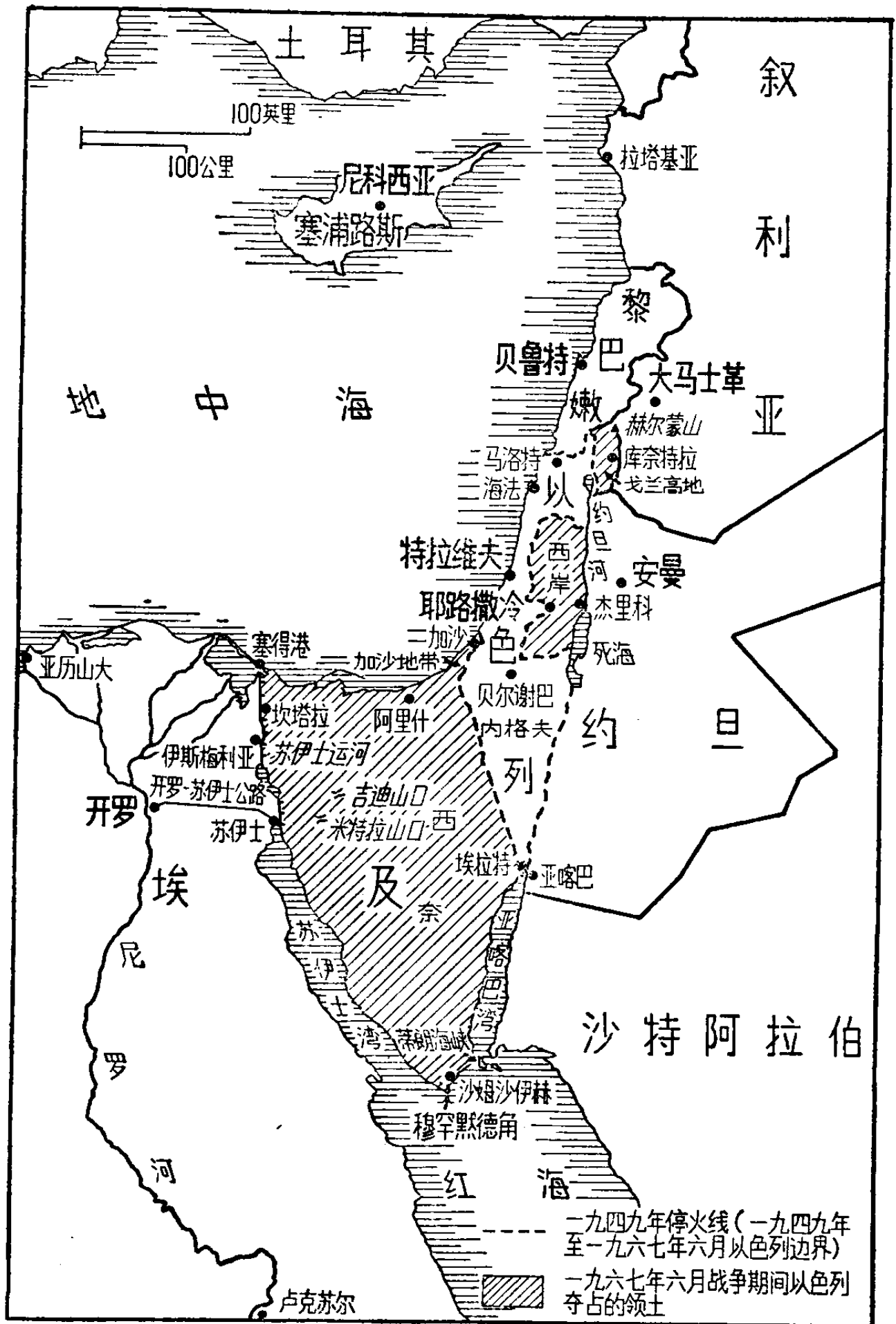
在决定政策的人眼里，一场危机并不总象是一连串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通常表现为由许多琐碎的日常工作组成的极其繁重的议事日程表，既需要对之专心致志，又得颇具耐心。有时要被迫在极短的时间内对一鳞半爪的情报做出反应。有时由于渴望取得

全面了解，还必须在一派无知的混沌之中开出一条路子来。一场危机在其具体展开的过程中又分解为许多细节，必须十分仔细地对待。这种细节之一，就是必须确保有关各方进行工作时所依据的是同样的一批情报。在赎罪节的那天早晨，当战争潜入中东的时候，情形就是如此。

早晨六时四十分，我打电话到华盛顿苏联大使馆找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他被从床上喊醒后，声调困倦，而且有点糊涂（也许是装糊涂）。我要他紧急地向莫斯科以及开罗和大马士革说明，以色列已通告我们它并不是在计划任何进攻性的行动。

起初，多勃雷宁声称这整个事件必定是以色列玩弄的一种手法，目的是要证明它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是有理由的。我告诉他，我给他打电话的目的正是要担保以色列不会这样做。接着，他又玩弄迂腐的外交手腕，要问明究竟是谁向谁传递口信——是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做出保证呢，还是美国对苏联做出保证？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如果再象这样扯下去，那末在你还没有弄明白我的话以前，战争就要爆发了。”多勃雷宁又找出另一个借口来拖延时间。他说他怀疑他的通讯工具是否能很快地报到莫斯科，使之得以及时采取行动。于是，我主动提出他可以使我们这一头的“热线”终端。他又暗示说“热线”在苏联的那一端离外交部太远。（此时我不禁发生了怀疑：一旦发生大国之间的危机，“热线”到底能起多大作用。）于是，我就把白宫的电话交换台交由多勃雷宁使用。他装做十分感激的样子接受了。

其实，这些话全是瞎扯。多勃雷宁有着超等的通讯手段。他可以在几分钟之内从莫斯科得到答复（后来在这场危机中他证实了这一点）。我现在认为，当时他预料到他同莫斯科的通话会被我们偷听，所以他想使用美国的公开通讯系统，从而取得一项旁证，以对付有关苏联同其阿拉伯友邦进行勾结的指控。



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前的以色列及其邻国

早晨六时五十五分，我打电话给以色列大使馆代办莫德查依·沙列夫。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既热情洋溢又文静庄重的老资格的外交家。（当时，西姆查·迪尼茨大使因父丧回以色列去了。）我告诉沙列夫，梅厄夫人关于不发动先发制人进攻的保证已经向苏联人转达了。我认为他应该把这一点，连同我本人关于应避免鲁莽行动的请求，一并向耶路撒冷报告。

早晨七时正，我打电话给当时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埃及外交部长麦哈麦德·扎耶特。为了节省时间和避免进行解释，我逐字逐句地向他宣读了以色列的信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一天以前，扎耶特还在和我讨论如何就中东和平问题开始谈判。美国打算在以色列定于十月三十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之后立即进行谈判。我确信扎耶特并非佯装不知情。萨达特并没有把他的计划告诉很多人。

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外交这种工具显得很失调。人们凭直觉都想要加快速度，而为了做到精确，却必须耗费时间再三重复。扎耶特同多勃雷宁一样，让我重读一遍以色列的信件。就扎耶特来说，我有理由确信他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困惑不解。虽然他表示他非常担心这是以色列方面的一个借口，但是他说要把这封信立即转发。我告诉他我们是会支持以色列实现其保证的。

下一步，我试图同当时也在纽约的叙利亚副外长莫哈迈德·扎卡利亚·伊斯梅尔取得联系，但是没有联系上。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团根本没有接电话。

到了早晨七时十五分时，沙列夫已向我重申了果尔达·梅厄的保证——以色列决不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七时二十五分，我打电话给苏联大使馆，碰巧多勃雷宁正在通过白宫和莫斯科通话。我让他的助手奥列格·叶达诺夫务必请多勃雷宁在结束通话之前把以色列重申的保证转告莫斯科。

早晨七时三十五分，我再次给扎耶特挂了电话，把以色列重申的保证和我们对这项保证的担保告诉他。七时四十七分，我向多勃雷宁查询时，他说我们的口信已经转达给莫斯科了。我把同扎耶特谈话的内容告诉了他，并要求他帮助我同叙利亚人取得联系。我说：我们“不会耍什么花招”。莫斯科会得到我们同各方面联系情况的通报。

与此同时，我指示我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上将，上午九时，在我不能出席的情况下，由他召开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以征求政府其余人员的看法。

上午八时十五分，扎耶特打电话告诉我开罗的答复。他声称以色列进行了“挑衅”；以色列海军部队在空军支援下，向苏伊士湾埃及的阵地发起了进攻；以军正在被击退之中；为此已发表了公报。这一说法真是荒诞无稽。以色列竟会背弃一项仅仅几个小时后才向美国作出的保证，这是不可能的；它竟然会在赎罪日发动一场战争，这是不可思议的；发动进攻而又不在于事前进行动员，这也是不符合以色列特有做法的；而且在离以色列边界最远的地方，利用海军来挑起敌对行动，这对以色列来说则是愚蠢的。我对扎耶特冷冷地说，我希望埃及能把它的军事“反应”限制在“攻击”发生的出事地点，而我将立即同以色列接触以求澄清事实真相。我把白宫的通讯设备交由扎耶特使用，让他和开罗通话。幸亏我们白宫的那些英雄的接线生们对我都已经很熟悉了，否则，在线路中出现大量的外国口音可能会把他们吓坏了。

上午八时二十五分，我和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通了电话，他那时也在纽约。我把扎耶特关于以色列在苏伊士湾发动了进攻的指控告诉了他。埃班和我都认为在以色列最神圣的节日里采取这种行动是根本不可能设想的，但他答应立即向耶路撒冷查询。^①

上午八时二十九分，沙列夫从华盛顿来电话告诉我，来自以色

列的报告称，埃及和叙利亚的飞机在各条战线上展开袭击已经长达半个小时之久。*是否进行了地面作战，他还没有得到消息；对于所谓以色列进行了“海上攻击”，他则一无所闻。

上午八时三十分，我向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两国国王发去加急电，敦促他们施加影响以避免敌对行动。（这种加急电报享受最为优先的处理，可在几分钟之内送达目的地。）但我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如果这一进攻是事先策划好的，这两个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是无法加以制止的；如果它真是由误解造成的，他们也无法消除这种误解。当天深夜他们的回电表明，他们是局外人。侯赛因表达了他对爆发了敌对行动感到的关切；费萨尔则强调阿拉伯团结。此后，他们二人始终都置身于军事冲突之外。

上午八时三十五分，我接通了总统的参谋长黑格的电话，他当时正在佛罗里达州的比斯坎岛同总统在一起。我通过黑格报告总统，战争看来已经开始了。黑格和我对苏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作了一番猜测，但未得出什么结论。我想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他们向埃及人建议说，需要挑起一些小小的事端，才能推动外交活动的开展，结果“那些狂人一下子把事情干得过头了。”我提议佛罗里达州的白宫发言人、副新闻秘书杰拉尔德·L·沃伦对外不必多说，只提总统正在按期不断地得到有关事态发展的报告，对情况十分明了。

上午八时四十分，我给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挂了电话，把我所了解的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他不可能对实质性的讨论施加什么影响，但他态度友好，能够在程序问题上提供帮助。他可以推迟或提早召开安理会或者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他还

* 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进攻是在中东时间大约下午二时，也就是华盛顿时间上午八时开始的。下面可以看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官僚们才一致相信战争的确已经爆发了，或者说，我们的官僚们才相信阿拉伯人已经发动了战争。

是一个爱传小道消息的人。如果你有话不愿直说，比如隐晦的威胁，或是过于微妙不便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的妥协方案，那末你可以放心，他一定会替你把手话传出去。此时此刻，我特别需要他的合作，以便减轻任何对于以色列先发制人的惧怕心理。我促请他运用自己的影响使叙利亚人（我们一直与之没有直接接触）和埃及人保持克制。瓦尔德海姆多少有点悲哀地说，一天前他曾同叙利亚外长坐在一起进午餐，但是后者对此却只字未提。对此，我颇表同情，因为在我和扎耶特之间曾经发生过同样的事情，虽说指望叙利亚或埃及会告诉我们即将发生突然袭击未免是奢望。

上午八时五十分，埃班打电话来转达了同沙列夫一样的保证，即：以色列不会先发制人。显然，使用重复的渠道来传递信息并非美国人所独有。埃班对所传苏伊士湾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海上交火一无所知。

我的下一项任务就是指示斯考克罗夫特有关召开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事宜。如果当真爆发了一场全面的战争（当时我们还不敢肯定如此），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两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和该怎么讲。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我预期以色列会迅速取得胜利。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历次中东战争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都变成了一场国际危机。阿拉伯人的挫败会引出苏联人的威胁。当时还存在着西欧同我们分裂的危险。对于美国支持以色列，欧洲从来没有感到舒服过；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指出的，欧洲的一些领导人当时正在寻找借口，借以建立即便不是反对美国也是脱离美国的欧洲自治。而且所有的人都已经看出尼克松的声誉因水门事件而受到了损害。我们有必要表明我们决心防止苏联干预，但我们又必须有节制地进行这件事，既表示出我们的信心，又不显得软弱可欺。

我从纽约告诉斯考克罗夫特，要求他在中午时分首先使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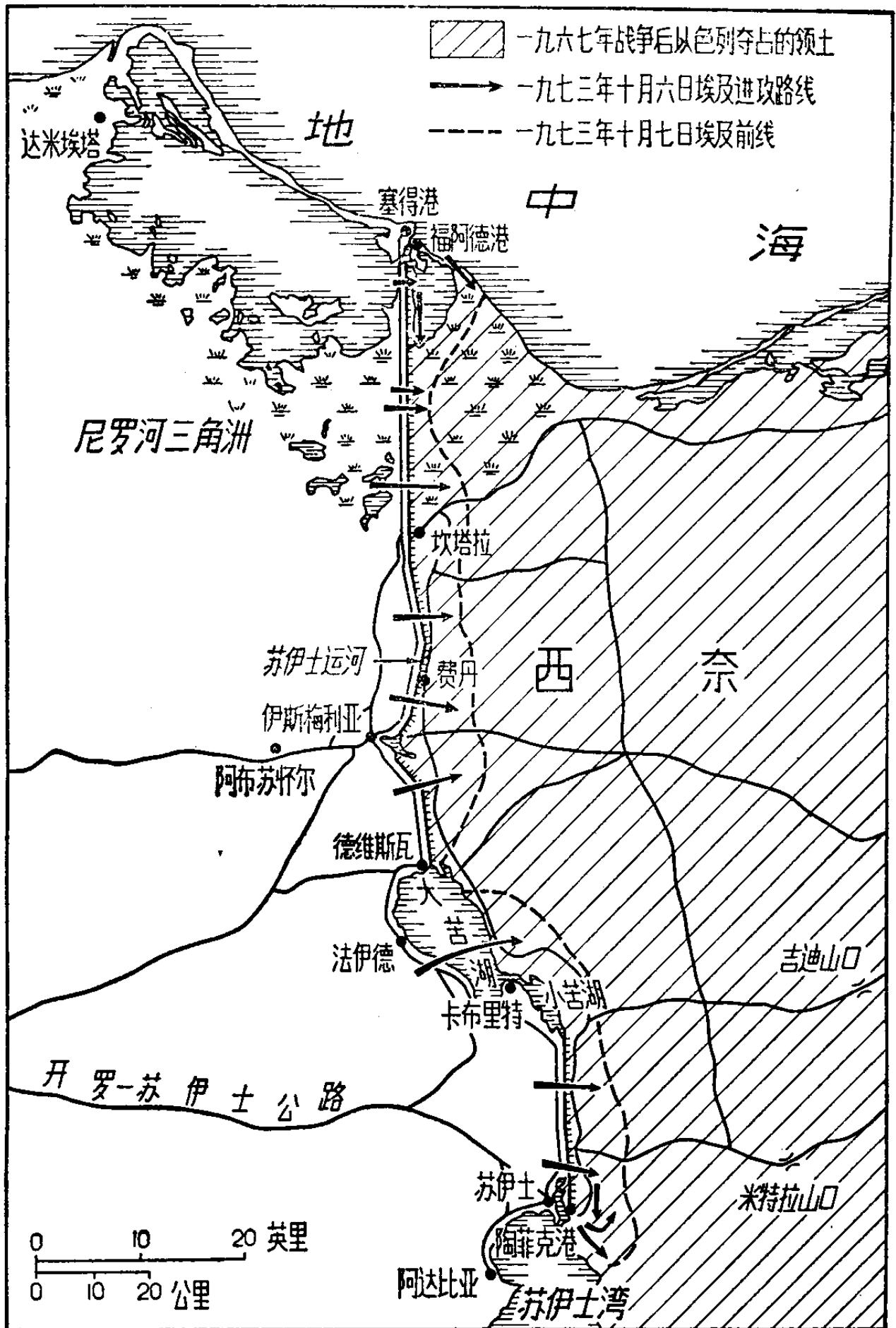
通过一项把当时分散停靠在西班牙和希腊港口内的美国第六舰队调到东地中海的计划。其次，还要通过在必要时增援我们在地中海的海军部队的计划。部队调动还不宜进行，但我们的部队必须加强战备。各单位都不得自行对外发布消息。到了该表态时，黑格或者我本人会表态的。至于是由白宫还是由别的机构负责吹风，则应由总统或黑格决定。

随后，上午九时，沙列夫紧急通知我，埃及部队正在试图越过苏伊士运河。一场海战的说法只不过是埃及方面的“障眼术”。九时零七分，以色列的第二条通讯渠道突然又活跃起来。埃班来电话告诉我同样的消息。尽管埃班的消息来得晚了一些，但他那雄辩的口才弥补了这一不足。他说：“总理要我告诉你，关于我们在苏伊士湾发动海上攻击的说法纯属虚构。她的希伯来语汇非常丰富，她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话。”他还说以色列正在做出防御性的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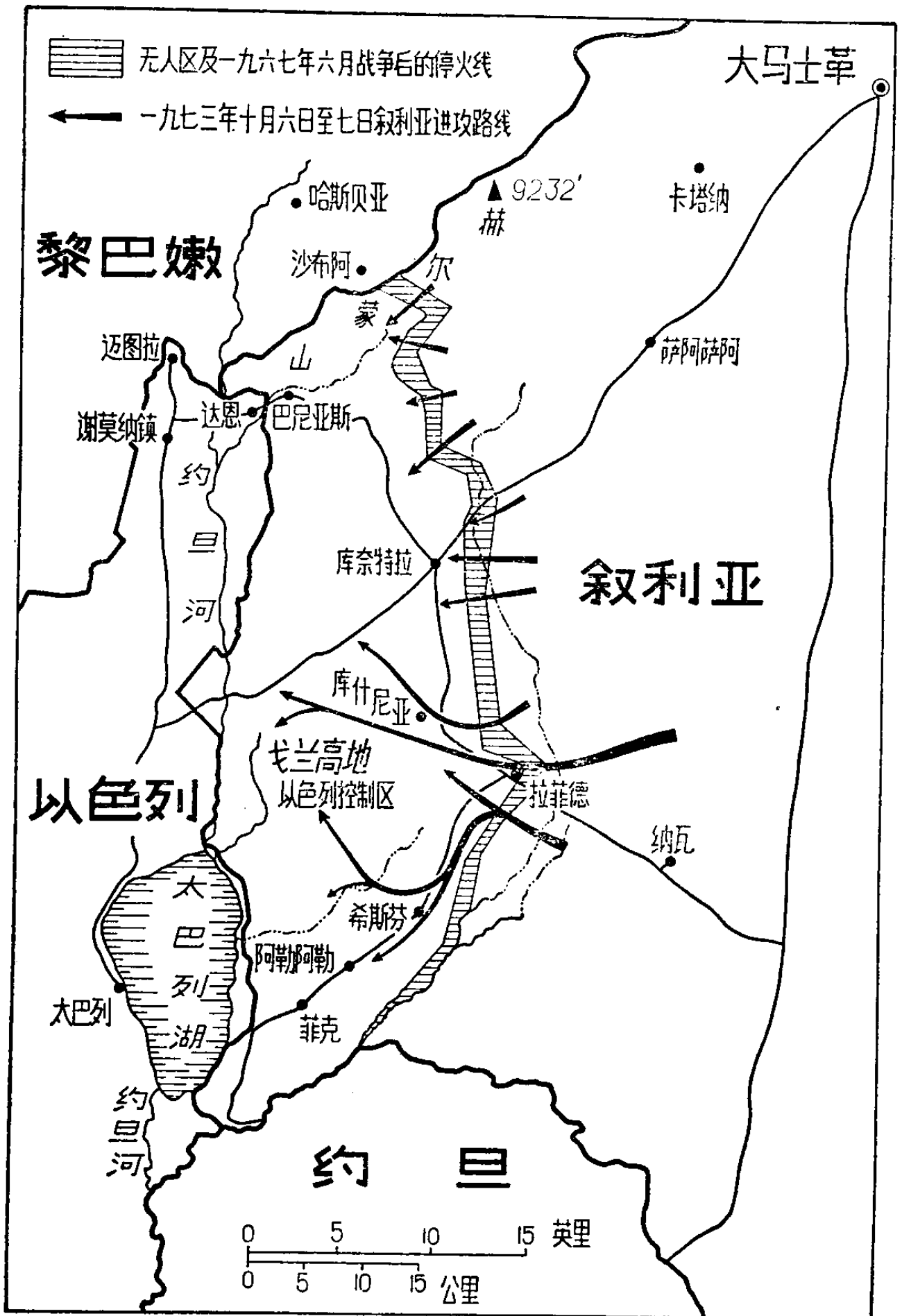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会议于上午九时在华盛顿白宫的情况室里召开。我们得到的情报落后于我在纽约所了解到的情况。尽管军事行动显然已经发生了，大家一致的估计却仍然重复着整个一周以来的看法，即：发生一场蓄意发动的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情报部门）找不到确凿的证据表明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跨越运河和进占戈兰高地的埃及—叙利亚协同进攻。毋宁说，更多的证据表明存在着一种行动—反行动的局面，即每一方都对它所看到的威胁做出系列的反应，结果就使得对抗的潜在危险日益增加。目前的敌对行动显然就是这样一种局面产生的结果，虽然我们不能澄清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很可能，埃及人或是叙利亚人，特别是后者，一直在准备发动一场袭击或别的小规模的行动。

会议对此并无反对意见。至于叙利亚和埃及如何被“行动—反



西奈前线：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埃及进攻路线图



戈兰前线：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至七日叙利亚进攻路线图

行动”这一循环所触发，在相隔两百多公里的两条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则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报告说，据大马士革电台报导，是以色列发动了这次攻击。对此科尔比没有提出异议。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评论说，虽然叙利亚讲真话的信誉并不高，但若是有一场中东战争不是由以色列发动的，那也是二十年来前所未有过的第一遭。他说：“我就是看不出埃及和叙利亚方面发动战争的动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海军上将认为，以色列发动这场进攻可能是为了抢先阻止埃及和叙利亚引进更为尖端的防空设备。只有西斯科的副手阿尔弗雷德·L·（罗伊）艾瑟顿对上述一致看法提出异议。他说：“如果以色列人想搞点什么名堂的话，他们怎么也不会在一年中选择这一天动手。而且也没有发现以色列人事先进行准备的迹象。”

上午九时二十分，在纽约，由于我没有什么先入之见需要为之进行辩解的，所以我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疑团早已解决了。我对多勃雷宁说，埃及和叙利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当多勃雷宁对此提出异议说扎耶特所说与此相反时，我厉声回答说：

你我都知道这是骗人的鬼话。如果他们（以色列人）要进攻的话，他们是不会在苏伊士湾发动攻击的……如果真的是以色列海军首先发动进攻，那么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怎么能够在同一时刻在全线发起攻势呢？

我警告多勃雷宁说，如果中东失去控制，那么东西方关系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有丧失的危险。这是一场持久的决斗的开始，在这场决斗中，华盛顿和莫斯科尽管都公开声明自己是致力于合作的，但却都在不冒公开对抗风险的情况下力图削弱对方的实力。

我们为什么感到意外

自从有战争以来，在美国特别是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以

来，突然袭击就是军事著作和军事分析的主题。罗伯特·沃尔斯泰特对珍珠港事件情报工作中的差错所作的首创性研究，就把偷袭归结为可能遭到袭击的一方缺少从琐碎小事中辨认重要情报的能力。表明进攻迫在眉睫的证据，往往被干扰“杂音”——一大堆含混不清、互不相干或彼此矛盾的其他情报——所盖过。^② 沃尔斯泰特对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对俄国发动进攻所作的颇具洞察力的学术性研究，使他的分析又深入了一步：进攻者有可能泄露其活动，但对活动的目的却总会加以隐瞒。^③ 因此，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并未试图隐瞒德国在苏联边界上集结军事力量的情况；事实上，德国的军事集结规模之大使其无法隐藏。但是，希特勒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而斯大林也相信）：德国总会发出某种最后通牒，从而导致谈判，而不是战争。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中国的军事分析家孙子就曾写道：“兵不厌诈。”^④

埃及—叙利亚的进攻是一次典型的战略和战术上的突然袭击。但是，十月战争的偷袭既不是干扰“杂音”，也不是诈术所能完全解释的。它是错误理解事实的结果，而这些事实是人人都能看见的，并没有被互相矛盾的情报弄得模糊不清。萨达特总统很有勇气，差一点讲出了他准备要干的事情，而我们并没相信他的话。他向我们提供大量情报，使我们应接不暇，得出错误的结论。十月六日的突然袭击是由于其受害一方的政治分析出了差错所致。

一九七三年十月以前，以色列（和美国）所作的每一项分析都一致认为，埃及和叙利亚缺乏用武力夺回其领土的军事力量，因此不会发动战争。阿拉伯军队必定会失败，因此他们也就不会进攻。这些前提是正确的，而结论则是错误的。十月战争以后，以色列人从俘虏口中了解到，埃及当时对是否能打到距苏伊士运河仅二十到三十英里的西奈半岛各个要隘也并没有当真地抱什么希望。埃及部队曾经训练多年，以求完善地掌握横渡苏伊士运河的技能；抵

达彼岸之后，他们除坚守以外并没有其他作战计划。事实上，埃及军队也从未到达西奈半岛的各个要隘。叙利亚和埃及军队都遭受了严重的挫败。然而萨达特却达到了他的基本目标——动摇了那种认为以色列是不可战胜的、而阿拉伯是软弱无能的信念，从而改变了谈判僵局的心理基础。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事先能了解到萨达特的想法：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领土，而是在于造成一场危机，通过危机来改变双方所持的僵硬态度，并进而打开谈判的道路。这样一次冲击会使双方，包括埃及在内，都表现出某种灵活性，而在以色列认为自己军事上拥有绝对优势，埃及又由于蒙受耻辱而一蹶不振的情况下，这种灵活性是不可能出现的。简言之，他的目的更多地是在于心理方面和外交方面，而不在于军事方面。萨达特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一九七三年初同我举行的两次秘密会议中了解到，我们愿意从事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外交活动。但是，他必定是由此得出了两点结论：第一、阿拉伯要求以色列完全撤军的全盘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立即可以实现的要求，如果看起来是出于软弱而提出的，埃及就不能给予支持。所以萨达特进行了一场战争，目的不是为了获取领土，而是为了恢复埃及的自尊，从而增强它在外交上的灵活性。（叙利亚打仗是为了更一般、更实际的目标：它就是想夺回被占领土，最低限度是要使以色列遭受伤亡。）战争伊始一个政治家就对这场战争的政治目标有如此清楚的了解，这是罕见的。更为罕见的是，进行一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使这场战争的后果更温和一些而打下基础。

萨达特战略的大胆之处就在于他为没有人能想象到的事作了规划。这就是阿拉伯人能够出奇制胜的主要原因。无论华盛顿还是耶路撒冷的最高决策人，他们所掌握的事实并不少。错误出在他们从这些事实所得出的结论。

事实上，萨达特是利用了对手自己的先入之见而使之陷入瘫痪无力状态的：

◎从一九七一年以来，他每年都扬言要进行战争。年复一年，他大声宣告该年为“决定性的一年”。他作出的威胁从来没有一次达到准备付诸实施的程度。因此，新的战争威胁被当作虚声恫吓而不予置理。

◎以色列的计划制定者以为，只要埃及尚未拥有空中优势，它就不会进攻。而且至少在二十四到二十八小时之前会得到警告，否则是不会发生进攻的。⑤美国将有时间进行外交干预，以色列也会有时间进行动员。

◎预计阿拉伯国家不会不再尝试外交解决的办法就立即进行战争。我们答应在十月三十日以色列大选后采取和平主动，因此他们会等待我们所取得的结果。

事实证明，所有上述设想都是错误的。萨达特所作的没有付诸实现的威胁掩盖了他的真正意图。以色列在仅仅十小时之前才得到警告。萨达特认为等待我们进行外交干预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进行外交干预的可能结果——达成一项从苏伊士运河撤退部队的某种临时性协议——并不能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除非他能把达成这一协议说成是阿拉伯实力强大所取得的成果。因此，谈判日益逼近这一事实很有可能不是推迟而是促使他下了决心；他可以让我们既不能成功，又不至失败。如果我们干预成功了，就会使他的国内政策受到制约；如果我们失败了，就可能损害我们对进行斡旋的兴趣。即将到来的外交谈判也使以色列人对问题的看法反常。以色列人唯恐美国利用战争危险作为借口来压以色列做出让步，于是就贬低阿拉伯的威胁并从中得到了既得利益。

从春天，特别是从五月份——战争前五个月——开始，动乱的风云已经日益明显。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于五月初在扎维多沃

同我举行的会谈中，以及在六月份同尼克松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上，就告诫说会有战争危险。但是我们却斥之为心理战，因为我们当时认为任何一种合理的军事选择都不能不削弱苏联和阿拉伯的地位。约旦国王侯赛因也在五月份向我们发出警告说，叙利亚和埃及在进行军事准备已属确凿无疑，不能被认为仅仅是演习。我向他保证我们“正在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这一派自鸣得意的官腔说明我们确信并不存在真正的战争危险。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新闻周刊》的高级外交记者阿诺德·德博什格拉夫在进午餐时告诉我，战争狂热正在整个中东地区——特别是埃及——升温。此外，在五月份，以色列认为埃及的作战准备已构成充分威胁，足以下令进行部分动员。其结果证明是虚惊一场。*

由于有这些危险信号，我在五月十五日曾召集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来考察有可能产生的战争威胁。以色列政府那种成竹在胸的调子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手下的工作人员总结了以色列的观点，即：埃及人是不会进攻的：

萨达特重新开战以求打破僵局的可能性极小，这并不是因为萨达特不想打仗，而是因为有鉴于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埃及相对的虚弱以及当前的国际局势，他明白采取这一步骤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

报告接下去描述了萨达特的军事准备并不是走向战争的实际步骤。报告认为根本谈不到什么埃及—叙利亚联合行动。

我们自己的估计实质上 and 这个报告一样，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尊重以色列的判断所致。一九七三年五月五日，当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詹姆斯·施莱辛格送给我一份报告，称埃及总参谋部已奉命拟定一个横渡运河的详细计划。但是中央情报局又宽慰地补充说，它并不相信所述渡河计划是符合萨达特的目标的。中央情报局

* 为一九七三年五月这场虚假警报进行动员所付出的代价，使以色列在十月份危机真正到来时更加犹豫不决。

注意到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所进行的军事准备，但得出的结论却认为这些准备都是为了达到心理方面的目的。这样，它对萨达特所说的合理性就作了一个一般化的设想。总的来说，中央情报局相信在联合国进行下一轮辩论（订于仲夏进行）之前不可能爆发敌对行动。同样，五月中旬的一份各部门间的通报指出：即使联合国辩论得不出有益的结果，“这也并不意味着敌对行动因此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可能发生的。”*施莱辛格在五月十五日召开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上说，埃及的军事力量仅限于向以色列偷偷发动一场空袭，这将是“极不合适的”一着棋。苏伊士运河对岸的哪怕是一小片土地，埃及也坚守不了一星期。

所以五月十五日召开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只开了不满四十五分钟，而且还扯开去讨论起黎巴嫩旷日持久的危机来了，真是不足为奇了。不过，我倒确实提出应当有两个应急的方案。第一个是为了对付黎巴嫩万一失去控制这一可能的。对第二个方案我作了如下概述：

……埃及人可能做些什么，以色列人可能作出的各种反应，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外交问题。若是苏联没有实际进行干预，就很难设想美国采取直接行动。但是我们应该考虑怎样设法使苏联人不插手；如果我们希望外交动起来，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场危机使外交动起来，或者，如果我们决定最好还是恢复过去状态，我们应如何利用这场危机使之实现。

我要说我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我提出的问题相当准确地描述了

* 一九七三年五月末，国务院下属的情报研究局在雷·S·克莱因指导下，做出了唯一有远见的估计。令人惊异的是，它并没有不同意上述部门间通报的看法，即：战争不可能发生。但是它在五月三十一日向国务卿罗杰斯提出了一份情报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对于发生一场为了政治目的而进行战争这一危险的看法，比起部门间通报来说要“稍微更具紧迫感”。它预言：如果外交僵局持续下去，“我们认为秋季重新恢复敌对行动就有多一半的可能。”很奇怪，情报研究局在战争真的到来时却放弃了它的预言。

几个月以后我们突然面临的问题。可惜我的分析虽然尖锐，但缺少与之相适应的紧急感。我们对应变的研究还没有完成，战争就在十月六日爆发了。

从六月到九月，我国各驻外使馆所发回的报告都一致认为战争不可能发生。报告中都说埃及和叙利亚对苏联的动机表示怀疑，并认为它们越来越依赖经济压力，特别是石油武器。这些估计在九月份仍然没有改变，而这时埃及取消了休假，征召了大批后备军，并且开始进行大型军事演习；同时，叙利亚则在戈兰高地集结部队。美国人和以色列人都为五月份的假警报所麻痹，认为这些活动不过是更近似实战的演习而已。

九月二十八日，葛罗米柯在白宫会晤了尼克松，再次警告说，把中东当做沉寂的地区看待是危险的。他说：“很可能有一天早上我们大家醒来时会发现那个地区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但是，事实上他的警告反倒麻痹了我们，因为葛罗米柯旋即同意了一项对付这个刚冒头的危机的计划，包括将于十一月开始同中东各方进行初步会谈，随后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在我按计划访问莫斯科期间，同苏联交换意见。

但是，星期日，九月三十日，纯属偶然的一件事使我吃了一惊。那天我正在华盛顿度过出任国务卿以来第一个完全空闲的周末。为了熟悉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能力，我在翻阅他们提出的情报。我翻到一份报告，里面特别提到在戈兰高地聚集了异乎寻常的大量叙利亚坦克。我暗自问道：叙利亚若不是打算进攻，会这样使自己暴露在以色列先发制人的打击面前吗？我立即指示重新检查一遍我们的情报。

情报送达最高级官员手中，一般有两个办法。一是通过参加美国情报联席会的各个机构一致同意发布的《国家情报评价》。这种办法通常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另一个办法就是由为某个内阁成

员服务的情报机构——国防情报署为国防部长服务，情报研究局则为国务卿服务——单独地作出估计。技术上，中央情报局为政府各部门提供服务，但它通常是为总统进行各项专门研究。它的局长是挂名的头头，实际上却是各部门情报单位的协调员。

这一次，我查询了所有各个情报来源。我要求尽快拿到各机构共同作出的估价。在拿到这份材料前，我分别向情报研究局（以国务卿身份）和中央情报局（以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身份）索要了当天的评价。

那个星期天，我恰巧还安排了同以色列大使西姆查·迪尼茨会见，以便审议当年晚些时候开始进行中东谈判的计划。迪尼茨到来时忧心忡忡——可是他并不是因为叙利亚的坦克而忧虑。他慷慨陈词，坚持要求解决另一个问题。根据整个缓和时期放宽了限制的移民政策离开苏联的苏联籍犹太人，一般都要经过位于离维也纳不远的舍瑙的一个奥地利过境营。九月二十八日，一列载着苏联籍犹太人从莫斯科驶往维也纳的火车，在穿过捷克斯洛伐克进入奥地利境内时，遭到了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有些移民被扣押当作人质。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同意了恐怖主义分子提出的释放条件，即：关闭在舍瑙的过境设施。这样一来，就在以色列激起人们极大愤慨，而且在战争开始前关键的一周内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奥地利，而不是埃及或叙利亚。正如阿巴·埃班后来在评论那一周时所说的：“历史学家读到十月初出版的以色列报纸时会惊讶地发现上面没有任何关于危机的提示，更不用说关于战争已迫在眉睫的提示了。”^⑥

因此，我是第一个向迪尼茨提出有关阿拉伯军事集结问题的人。他是否得到了什么消息？后来证明，他得到的指示是把以色列所了解的阿拉伯军事部署情况转告我们的情报官员，但是除非我们提出具体查询，否则就不应在“政治”级别上提到这个问题。以

色列并不想激我们采取外交行动，这特别是因为它当时并不认为形势很紧张。显然，如果以色列当时看出了严重的战争危险，它就会坚持要求进行最高级别的密切磋商。以色列的判断是：阿拉伯进行的军事部署是演习，或者是心理战。尽管如此，我却仍然感到不安，我请迪尼茨每隔四十八小时复查一次对形势的估价。那天当我们自己的情报机构（应我的要求）也报告了基本上相同的结论时，我也要求他们这样做。情报研究局说：

我们认为，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气候说明当前叙利亚对以色列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是不可能的。当然，也不能排除叙利亚进行有限打击的可能性，也许会进行一次为了对九月十三日叙利亚空军遭受以色列打击*进行报复的行动。

但是，上述对有限打击所作的解释仅仅指常见的小规模的袭击和报复行动。这种优柔寡断的调子没有使我们警觉起来，反倒使我们安心了。**九月三十日中央情报局再次让我们相信，开春以来萨达特总统活动的整个矛头是对以色列施加道义、政治和经济压力，使之默认阿拉伯并未做好进行战争的准备。

这样一来，我的惊恐感就被排除了。于是我就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问题，其中包括结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阿拉伯国家的外长。嗣后的情报继续并最终使我们完全放了心：十月三日，以色列外交部官员表示埃及的军事调动是日常的调动，并且认为“理智的声音”在大马士革也会占上风。十月四日，埃班在纽约对我谈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我们自己的报导同以色列的报导一模一样。国防情

* 九月十三日，以色列空军进行了伏击，击落十三架叙利亚的苏制喷气式飞机。

** 情报研究局局长雷·克莱因后来在出版物中辩解说：虽然这一分析没有预告将发生进攻，但它也“远远不是说根本不可能发生进攻”。克莱因先生是我国最杰出的情报专家之一，但这并不说明他一贯正确。读者必须自己作出判断，一个心烦意乱的决策人有无可能从这份情报研究局报告的结论中得出克莱因先生所指出的推论。⑦

报署十月三日上午发布的摘要作出结论说：“叙利亚部队的调动同埃及的战备被认为是偶然的巧合，而不是为了导致重大敌对行动而预先策划的。”两天以后，即战争开始的前一天，中央情报局重申了它在九月三十日所作的判断，即：埃及看来并不是在做同以色列交战的准备。

显然，情报工作出了差错，但是作出错误判断的决不仅限于情报机构。每个决策人都了解全部事实。以色列人当时一直在监测埃及和叙利亚的每一个部队的行动。对总的进攻计划，特别是叙利亚人的进攻计划，是有相当清楚了解的。使用情报的人和提供情报的人一样，谁都不能相信，阿拉伯人会按照这一总计划行动。我们给合理性下定义时并没有认真考虑到发动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以恢复自尊这样一种概念。我们自己的，或是我们盟国的先入之见都没有遭到反驳。

十月五日发生的事件使我们思想上的这种框框表露得更为突出。这一天我们醒来后便吃惊地得到消息说，苏联已经一连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把它在埃及和叙利亚的非军事人员空运出来。不过，技术和军事顾问似乎都留了下来。当时对这一事态发展的错误理解究竟是怎么产生的，现在已无法说清楚了。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件事以及埃及的军事演习，我们每天早晨的汇报会却仍然向我们保证，埃及和叙利亚并不是在计划发动一场战争。

实际上，那天我的白宫办公室对于中东发生的事件异常警觉，因为它曾从沙列夫那里得到秘密消息说，耶路撒冷即将发来一项有关“行将发生的惊人的事态发展”的特别电报。那天安排了埃班、沙列夫和我在下午早些时候在纽约举行会见。为了准备这次会见，彼得·罗德曼努力想从我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惊人的事态发展”指的是什么。他只能找到一份头一天晚上我们驻特拉维夫武官所写的有关苏联撤退其非军事人员的报告。在情况室

进行查询的结果并未发现任何其他重要事件的电报。

根据罗德曼的建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打电话向中央情报局索要新的政治和军事分析材料，以便让我为会议做好准备。这份材料是十月五日中午在白宫收到的，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只是重复了先前否定会发生战争的判断：

看来每一方对于对方的活动都愈来愈关切。谣言和谍报人员的报告可能助长了似乎正在蔓延的不安情绪。已经做出的军事准备并不表明任何一方打算发动敌对行动。

使以色列人感到惊恐的事态显然没有能够使他们发来的电文带有紧急感。我同埃班的约见一再推迟，因为原先说耶路撒冷要发来的电报还没有收到。在此期间，我开始了同各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外长进行会谈的繁重日程。此后，耶路撒冷决定由沙列夫向我转达它发来的电报；同埃班会见已经没有必要了。这样一来当然就贬低了这一电报的重要性。下午较晚的时候，罗德曼向沙列夫建议：在电报到来时如果他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里递交，可能比亲自飞往纽约递交速度要快。我在纽约的日程表安排得一点空隙也没有，而且我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同我在纽约的套间之间又有安全而完善的电报通讯联系。

沙列夫向耶路撒冷查询后，终于在下午五时三十分左右前往白宫交给斯考克罗夫特两份给我的电报，这两份电报的内容差不多互相抵销了。“急电”要我通知苏联和阿拉伯人，以色列不打算发动任何先发制人的进攻，因此，如果阿拉伯的军事准备是为了防御目的，就没有必要了；同时，如果阿拉伯人发动战争，以色列就会报之以坚定而有力的回击。与此同时，沙列夫又转达了以色列的最新估计。这一估计同六小时以前中央情报局所作的估计恰好不谋而合，因而更加深了已经存在的自满情绪。在分门别类地罗列了此时已为人们所熟知的阿拉伯备战活动之后，以色列得出如

下结论：

我们的估计是：埃及和叙利亚目前采取的戒备行动，部分是同演习有关（就埃及而言），部分出于惧怕以色列的进攻。我们认为这两国军队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大。

斯考克罗夫特从头到尾听完了沙列夫的话，然后就把这两封电报立即拍发到我在纽约的办公室。

结果，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见到这两封电报。那天是星期五，晚上我在沃尔多夫饭店的套间里关起门来独自吃了晚饭，便着手准备三天后我将在华盛顿做的重要演说稿。这是自八月二十二日我被任命为国务卿以来，独自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我没有要求手下的工作人员搞什么额外的文书工作，他们也认为没有什么紧急的理由需要打断我的工作。而且，假若那天晚上我就收到了这两份电报，我也不能肯定是否会立即采取什么行动。这时所有有关国家的首都都已是午夜时分了；似乎并不存在什么险情。我们没有得到关于以色列采取了什么特殊防范措施的通报——以色列并没有集合其后备军。事后回顾起来有一点还是很清楚的，即：我们当时如果做出什么努力的话，也必然是学究式的空谈。阿拉伯发动的进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丝毫不是因为惧怕以色列的进攻而引起的。如果在最后一分钟递交给埃及和叙利亚一封信，向他们担保以色列不会先发制人，只会在开罗和大马士革的作战指挥室里惹起一阵哄笑。

我们的失败不是在行政办事方面出了差错，而是在斗智上输了。至迟在十月五日那一天，当我们得知苏联从中东撤退非军事人员时，我们就应该明白即将发生重大事件了。我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以色列所作的估价，认为苏联这样做的理由不外有两条：要不是“同埃及和叙利亚的关系中出现了危机，就是苏联估计到可能在中东爆发敌对行动的结果”。但是当时所预见到的唯一产生敌

对行动的危险在于“行动—反行动这一循环”，即：每一方都害怕其对手将要发动进攻。

有一些急需提出的问题本来是可以很快就触及事情的核心。而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竟没有人想到这些问题，这在事后回顾起来真是无法解释。苏联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中会出现什么危机能够同时涉及埃及和叙利亚两国呢？如果发生了一场政治危机，为什么苏联人只撤退其非军事人员，而不撤走其顾问呢？如果当时他们不是要抢在一个什么限期之前撤退，又为什么采取空运这一应急措施呢？而这个限期如果不是敌对行动开始的时间，又是什么呢？以色列认为苏联人可能害怕爆发战争的观点本应使我们停下来进行一番思索的。因为我们若是思考一下，就会看清楚，苏联人不可能惧怕以色列发动进攻。如果他们真的害怕，他们一定会在华盛顿向我们提出紧急抗议，争取让我们去劝阻以色列，也许他们还会辅之以公开威胁。如果苏联人撤退非军事人员是由于害怕战争，那么他们一定非常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争将由阿拉伯人来发动。

决策人要是抓不住问题的要害，他们是不能把分析人员推在前面做挡箭牌的。决策人永远不可能了解全部事实，但是他们有责任提出该问的问题。中东战争前夕真正出了差错的正是这一条。我们对自己的设想过于自鸣得意了。我们什么都知道，但真正懂得的则太少。对此，最高级的官员——包括我本人在内——必须承担责任。

制定战略

当战争真的爆发时，我们不得不正视若干看起来相互矛盾的问题。我们必须保证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却又需要维持同温和

的阿拉伯国家——如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我们知道在一场持久的危机中，欧洲和日本将焦躁不安，而且如果我们迟疑不决，他们就会同我们分道扬镳。尽管苏联肯定无疑地会小心从事，但也不能指望它从困境中拯救我们；实际上，它很可能会尽一切可能加深我们的困难。

从一开始，我就坚信我们处于左右事态的有利地位。我们事实上的盟友以色列肯定会取胜。我们温和的阿拉伯朋友——尽管他们不可能承认这一点——几乎和害怕他们的阿拉伯兄弟遭到失败一样地害怕凭借苏联武器取得胜利。欧洲的离心倾向可能由于大力强调美国的领导而有所减弱。我们还可以一面准备当外交上的努力失败时进行对峙的手段，一面威胁说要结束缓和，用这个办法使苏联人行事谨慎一些。

但是，这个任务不会是轻而易举的，特别是在美国总统的权威受到创伤的时候。尼克松是否还保持着足够的权威来对付即将降临到他头上的多方面的压力，还不很清楚。但是，万一中东失去控制，我们绝对不可能袖手旁观；不管我们提出什么托辞，全世界都会认为这说明美国的权威崩溃了。美国作为和平的保障和自由人民希望之所在，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我们必须保护我国发挥这一作用的能力。我们就象走钢丝的人一样，停下脚步就会跌落下去；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向前进，不去理会脚下那个大深渊。

尼克松上任以来我们在中东奉行的战略现在终于面临严峻的考验了。只要激进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苏联的压力和阿拉伯的讹诈使妥协失去必要性，我们就看不出有进行认真谈判的可能性。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外交的核心就是要证明，苏联支持的讹诈是无效的。现在我们的战略面临着意外的最后摊牌。如果我们的牌打得好，摊牌的结局是：阿拉伯国家有可能放弃对苏联压力的依赖，而谋求通过同美国合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旦战争打响，外交僵局显然就会打破。但是，这并不是很容易办到的。如果以色列象我们最初所希望的那样，以压倒优势取得胜利，我们就得避免使自己成为所有阿拉伯人仇恨的焦点。苏联可以诡称是它的恫吓使以色列人停止了进军，或是自己也直接卷入这场战争，从而以阿拉伯人救星的姿态出现。我们不能让苏联做到这一点。如果出乎我们意料，以色列陷入了困境，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来搭救以色列。我们不能容许苏联的附庸打败我们的传统朋友。但是，军事选择一旦被证明是无效的，我们就必须利用这一点推动对和平的探求。总之，我们有左右事态的机会，但是我们要冒使自己在所有的纷争中都成为众矢之的的风险。

从一开始，我就决心利用这场战争来开始一场和平的进程。十月六日早晨，在我同黑格第一次长时间地讨论战略时，我对他说：“再没有拖下去的理由了。等我们把战事停下来以后，我们应该利用这个事端推动外交谈判。”尼克松在这次讨论以后热烈地赞同这个意见。十月八日，他对我说：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因为他们（以色列）会赢得胜利而允许他们打下去——他们一定会赢的，感谢上帝，他们应该打赢。但是，我们不能只是让这场冲突再拖上四年就此甩手不管，而使自己同阿拉伯世界对立起来。我们再不能这样干了。

令人捉摸不透的是苏联的意图。苏联人对于战争迫在眉睫这一点究竟事前了解多少？他们究竟是想用武器装备和外交支持来鼓励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呢，还是愿意同我们合作来结束这场战争？

当时苏联人对阿拉伯人的计划知道多少，或是否怂恿他们，现在仍然不清楚。毫无疑问，十月三日夜晚以前他们就已经知道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因为他们驻开罗的大使就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得到通知的。^⑧他们立即作出反应，开始撤退人员。在亚历山大港

和塞得港驻守的苏联舰队在十月五日就驶往海上。苏联人是否希望我们会接收到他们发出的这一信号？我们是否没有能够提出该问的问题呢？这是他们在不背叛自己盟友的情况下对我们发出警告的一种方式呢，抑或仅只是防范措施？

对于这些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缓和被人们设想为存在于敌对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缓和并不能冒充友谊。我在这次战争一结束后就会见的阿拉伯领导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相信关于苏联同阿拉伯勾结的指控。萨达特、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论他们之间存在什么分歧，都一致认为，莫斯科对阿拉伯事业的支持是勉强为之；它交付武器迟缓，而且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就极力催促停火。确实，萨达特在他的自传里坚持认为，尽管苏联人对他的计划了解得并不确切，莫斯科却曾经以放慢交付军事装备的速度以及在叙利亚同他作对的办法，^⑨力图阻挠埃及采取行动。另一方面，一九七三年二月，哈菲兹·伊斯梅尔访问莫斯科以后，埃及显然得出结论认为，只要不采取可能导致美苏战争的行动，它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只顾图谋自己的利益。用外交语言来说，这就等于诱使它打一场有限战争。还有那起恐怖主义分子袭击满载犹太移民从苏联经奥地利出境的火车的奇特事件。在战争开始前一周发生这次袭击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预谋的转移人们视线的一着棋？如果是后者，那么苏联人是否默许了，或者是否知道其目的何在？据当时报道，游击队在捷克斯洛伐克上了车，然后当火车越过捷克边界进入奥地利时，扣押了人质。^⑩似乎很难设想，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警察监视严密的国家里，如果没有当局的配合，武装人员竟能登上火车，而且当局方面若没有得到苏联的认可，也决不会在这样一件后果严重的事件上采取行动。

我的看法是，苏联人仅以一步之差而没有发展到怂恿这场战

争的地步，但是也并没有作出努力来制止战争。苏联所获得的情报无疑已经推断出当时正在酝酿某种军事行动。勃列日涅夫必定以为他在五月和六月对我们发出过警告就已经算是对我们尽到了责任。苏联人没有更进一步具体地警告我们（除非把苏联撤退非军事人员看作一种间接的警告）。也很可能，克里姆林宫相信，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对它都是有利的。如果阿拉伯人干得漂亮，功劳将归于苏联武器和苏联的支持。如果他们打得不好，莫斯科认为它会象一九六七年一样以阿拉伯事业拥护者的姿态出现；阿拉伯世界将会因此而变得激进，这就会加强苏联朋友的地位，甚至能够除掉埃及那个令人伤脑筋的萨达特。就是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驱逐了苏联人员。

到了十月六日，我仍然未能断定苏联是否事先知情。但是，在我思想里，对于地缘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我们得知战争已经打响后大约九十分钟，当我们还一心一意地期待着以色列能迅速战胜的时候，我曾请黑格转告尼克松：

我认为，除非苏联人和我们一道采取中立立场，否则当眼下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如果采取中立的立场那就再糟不过了……如果苏联全力支持对方，那就构成了有害的互相勾结，一九七〇年九月的事件就会重演，所以我们最好要做到冷酷无情。

当然，我们两个人都知道，我们面临的形势同一九七〇年的约旦危机相差很远。那个时候，尼克松正在他当权的鼎盛时期，而现在他的权威正在日益削弱。一九七三年九月，关于尼克松是否应该交出他办公室里录音磁带的问题已经经过了法庭不留情面的审理，就在战争爆发的同一时刻，这个问题发展到了高潮。由水门事件导致的第一批起诉书，包括一份对约翰·埃利希曼的起诉书，已经发出。总统竞选助手唐纳德·塞格雷蒂刚刚承认了在一九七二年总统竞选活动中同“肮脏的把戏”有关的三件行为不端的事情上

有罪。此外，尼克松即将失去他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因为他卷入了一件有关他在出任马里兰州长期间接受所谓酬金的丑闻。十月十日，战争开始后的第四天，阿格纽辞职了。十天之后发生了“星期六之夜的大屠杀”——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被撤职，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也辞了职。这个时候，我正在莫斯科讨论结束这场战争的停火问题。

因此，在整个中东危机期间，尼克松始终挂念着水门事件及其后果。这件事虽然没有阻碍他了解情况或作出关键性的决策，但确实制约了他实行那种容易激动、安定不下来的、敏锐的领导，这是他在前几次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特点。他的勇气并未因此而减退；要是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应该说他的勇气反倒加强了，因为他抱着宿命论的态度面对担任总统职务的最后阶段，而且极力要让人们看到，他是在维护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利益，而这正是他的长处所在。可是，他过于心烦意乱，以致不能制定决策，而只能等待别人向他提出应作的决定。这方面的任务现在落到了我的肩上。我苦恼地看到，不论我们怎样行事，都很可能被指控为别有用心。我们要实现看来是不可调和的一些目标：一方面要挫败由苏联人武装起来的一方的军事计划，另一方面又要争取阿拉伯人对我们的信任。这样我们可以既以中间人的面貌出现，又可以表明通往和平的道路必须经过华盛顿。而我们这样做将会使我们在争取公众支持方面遇到很大困难。

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联合国采取什么策略。我们不想在联合国大会上进行辩论。在苏联充当阿拉伯人的辩护律师、我们的欧洲盟国至少是保持着令人难堪的沉默以及美国陷于孤立的情况下，在联合国大会上进行辩论就意味着对支持阿拉伯极端立场的不结盟国家进行谩骂。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处境比较有利，虽说在那里我们也面临一些难题。难题之一是苏联人或他们

的某个代理人可能提出一项支持不可能实现的全面的阿拉伯纲领的决议,迫使我们投票否决,从而破坏我们在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中的地位。而且,通过一项赞同立即就地停火的决议,也会对人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想要避免在进攻的一方正在夺取领土的时候通过这样的决议,因为这会助长利用联合国使通过突然袭击的办法夺占的领土得到认可的倾向。在很短的时间内——据我们的专家估计,在不到七十二小时以后——作战的风向就会逆转,以色列就将击退阿拉伯人。那时,我们就将面临以色列获胜、阿拉伯人怒气冲天、苏联插手干预的复杂局面,以及把一切挫败都怪罪于我们的危险。

因此,我向尼克松建议,我们应该力求把苏联拉过来同我们一起在安理会上采取联合一致的作法。这样可以防止莫斯科提出自己的提案来给我们找麻烦,而且还可能让莫斯科同它的阿拉伯当事人分手。按照我的计划,两个超级大国将不去追究罪责,而是呼吁交战双方立即回到冲突开始时的防线上去。如果苏联同意这个计划,阿拉伯人也默认了,冲突就能得到遏制。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的损失就会被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损失所抵销。如同一九七二年一样,阿拉伯世界就会认为苏联优先考虑的是他们同华盛顿的关系。如果苏联人拒绝我的计划——而这也是很有可能的——我们就能赢得时间让以色列用武力恢复战争开始前的形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接受一项简单的停火办法,而且,以色列如果确已越过战前防线的话,我们可以坚持要它退回去。我们一旦说明了我们考虑周全的立场,就能使那些头脑发热、急于想提出更多的片面解决办法的欧洲盟国冷静下来。

我迅即于十月六日上午九时三十五分向多勃雷宁说明了我们的建议。我警告说,如果苏联人采取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就别无选择,只有任其自然发展下去,也就是说,只有坐等以色列取胜。我

带着预示不祥的口气说：“那样就会对我们双方的关系产生很大影响。”我告诉多勃雷宁，在得到莫斯科对我们的建议作出答复之前，我们将不在安理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同时，我还表示希望莫斯科方面也相应地避免采取单方面行动。

多勃雷宁此时头脑冷静，是个办外交的老手。他宣称对我们提出的做法很理解，而且近乎同情。我们还照例讨论了如何以最快的手段进行通讯联系。这一次，他认为热线是最快的。既然他一定会想到我们会读到他的信，所以他这样说无疑是有意要再一次表明他什么也不想对我们隐瞒。我准许他使用热线，可他并没有使用。我们这一套外交游戏玩过了之后，现在可以回头办正经事了。

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争取时间。不论前途凶吉，美国的选择余地都会随着以色列进行动员而增加（以色列的动员需要两天时间来完成）。上午十时二十分左右，我向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简要介绍了我们最新的想法，强调指出我们反对联合国大会进行辩论，以及我们打算在得到苏联答复之后才提到安理会上去讨论。他表示同意。我还对他说，我们赞成恢复冲突开始前的状况。瓦尔德海姆会很快把这个意思散布出去，通过暗示美苏合作来使那些热烈鼓吹通过激进的决议的人放慢步子。那天白天，我向好几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吹了风。他们都表示同情，但首先都急切希望能置身于直接的交火线之外。正如我所预料到的，他们赞成就地停火，而不是恢复开战前的状态。换句话说，他们准备认可阿拉伯人在军事方面得到的好处，而在一场我们美国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而承担主要负担的冲突发生时，他们准备立即同我们分手——这里可以看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我还开始给国会领导人一一打电话。此刻他们中大多数人还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此一般都支持我的意见。

上午十一时二十五分，我告诉多勃雷宁，我们听到了关于埃及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申诉的传闻，我们将抵制这一“令人严重不安的暗示”。莫斯科不应该“破坏我们花费了三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一切”。我争辩说，我们提出搞一个主张恢复战争开始前状态的联合停火决议是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

（我们）不相信这种状况会持续七十二小时。七十二小时过去后，问题就将是如何使以色列人回到停火线上去。如果我们一致同意，不论采取什么军事行动，也不管以色列人打得多么顺手，我们都要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将坚持这项提案，并且准备反对他们。

我要求多勃雷宁给予紧急答复。

我们这时正处于有利地位。正如我不久后对黑格所说明的，如果苏联人上了联合行动这个钩，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如果他们拒绝我们的建议，我们就让以色列人“痛打他们一两天，这就会使他们平静下来……（我们）应该在实质问题上强硬，但是不采取任何戏剧性的步骤。”这个如意算盘唯一估计不足的是，以色列恢复其军事形势所需要的时间大大超过了一两天，而在此之前他们则处于惨败的边缘。

有乔·西斯科在这次危机中做我的“参谋长”是很幸运的。他在同纽约和华盛顿两地许多渴望发挥一点作用的外交官保持联系方面是从不知疲倦的。在拟定谈判方案方面，他很有创见。此外，他嗓音洪亮，态度略带些狂热的劲头，这两点并无害处。前者有利于使我听取他的意见，而后者则使他手下工作人员的工作保持高标准。

在我进行上述各项活动的同时，我如饥似渴地翻阅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有关战争进程的消息。以色列的空军和地面部队正在奋力迎战阿拉伯人从戈兰高地和苏伊士运河沿岸发动的协同进攻。埃及装甲部队正从几个地方渡过苏伊士运河。

下午二时三十分，我离开纽约前往华盛顿。在我未到达华盛顿时，多勃雷宁向白宫递交了自战争开始以来莫斯科发来的第一封信。这封信是一篇拖延时间的遁词，被译成苏联大使馆式的英文：

苏联领导人与你们同时获悉中东已开始了军事行动。由于从该地区得到的情报是相互矛盾的，我们正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以澄清那里事态的真相。我们和你们一样，对中东局势的爆发感到关切。我们过去曾反复指出该地区的危险形势。

我们同你们一样，正在考虑可以采取的步骤。我们希望很快再同你们接触，以便有可能协调我们的立场。

苏联的拖延战术同我们自己等待以色列恢复原来的军事形势的战略并不矛盾。只要莫斯科在向我们暗示要进行协调，就为我们解除了它在联合国向我们发动攻势的危险。然而，我仍然认为最好继续保持压力。我从华盛顿对多勃雷宁讲了我对苏联照会的评价。我说：“阿纳托尔，我收到你们的信了。我不认为这封信是稳健的典范。这封信要末意味着你们思想上还不明确，要末说明你们在同他们配合。”多勃雷宁滔滔不绝地抗议说，莫斯科只不过再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便可以制定出应遵循的路线了，此时此刻正在开会讨论。我警告说，我们认为在联合国大会进行辩论是“毫无意义的行动”。我还把我们的警告再升高一级：

如果这个问题弄成联合国大会的一场辩论，那么我们就将听其自然发展。我们确信其结果必定是以色列获得军事上的胜利。那时大家都会来找我们。要是闹得下不了台，我们就将把联系断绝一个时候。

到了当天晚上，我们面临着相互矛盾的压力。在纽约，埃班赞成推迟在联合国的行动，以便使以色列有机会完成动员并击退埃及和叙利亚的进攻。在比斯坎岛，尼克松则急于发表一项公告以表明他还在指挥一切，而把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从理论上说，他是对的。如果联合国名符其实，按照其公开

宣明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办事，此时此刻它就应该开会。但是，联合国已不能实现其初衷了。现在，联合国处在构成大多数的“不结盟”国家的监护之下，而这些国家又是受到共产党怂恿的；联合国实际上认可了阿拉伯人军事上夺得的利益（因为当时这个“不结盟”的大多数确信自己一方的一员正在取胜；在战争刚刚开始的这个早期阶段，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谁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表态）。安理会如果开会，很可能会引出使我们处于守势的讲话，或者会产生一项我们必须投票否决的决议。因此，我极力主张推迟提交安理会讨论。

下午六时左右，当我终于收到苏联的答复时，我发现它不过是一次拖延时间的把戏。答复说：莫斯科尚未得到阿拉伯人的信函，所以不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有关各方都还没有要求安理会开会；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若是要求提付安理会表决，只能是自讨没趣。同别人一样，苏联人也在等待战事的结果。

我努力在这重重障碍之中找到一条出路，我告诉在比斯坎岛的黑格，我们不久就将在不开会的条件下，使安理会卷入这场冲突。为此，我指示我们驻联合国大使、机智的约翰·斯卡利把晚上的时间用于进行“磋商”，即各国代表之间的非正式会议（通常是双边的），通过这种会议，安理会不经过召开正式会议或强行提付表决就能作出裁决。晚上七时二十分，我告诉多勃雷宁我们所作出的决定，并再一次详细解释了各种选择；我说我们并不乞求恩惠，时间对我们有利；

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是：阿拉伯的进攻已经全面受到遏制，他们现在马上就要被击退。随着（以色列）动员的完成（不迟于星期一早晨），这一过程将会加速，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过去情况的重演。

我说，阿拉伯人已经达到了目的；他们已经越过了苏伊士运河。立即结束战争，并且回到我们在敌对行动开始前制定的外交谈判日

程上来，这是很重要的。多勃雷宁在回答中谈到莫斯科主要关心的问题。他说：“根据我对我国政策的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是：阿拉伯人想要收复他们被以色列强占的领土。他们一直在对我们讲这个道理，要让我们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解放你们自己的土地，那实在是荒谬可笑的。”

他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的建议对苏联人来说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特别是在阿拉伯人正得意非凡的时候。另一方面，在战争初起的那个时刻里，苏联的前景看来远不够光明。如果他们什么事也不做，以色列就会战胜，他们就会显得软弱无能。如果莫斯科接受我们的建议，就会损害它的阿拉伯朋友。但是它若要帮助自己的阿拉伯朋友，就不可能不使自己卷入这场战争，这样做反过来又会危及整个缓和的格局。这样一想，我的胆子就壮了，于是我在结束我们的电话谈话时让多勃雷宁最迟在第二天，星期日，晚上九时告诉我是否可以指望两国在安理会上采取共同的态度，或者由苏联独自做出努力至迟在星期二，十月九日以前结束这场战争。如果你自己这一方打胜了，或者你认为如此，你才能有把握提出这样断然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不应成为外交上的常规。

在这乱糟糟的一天结束的时候——还是十月六日——我主持召开了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根据我们的报道，以色列人正把战斗限制在戈兰高地，并正在准备于次日发起重大的地面攻势；但是埃及人也在运河东岸建立阵地，准备通过他们搭起来的几座桥运送更多的部队过河。会上一致的意见认为，再过两三天后，以色列无论如何都会占上风。的确，我那天晚上收到埃班的口信说，以色列人相信“很有希望”在三天之内把埃及和叙利亚军队从他们的阵地上赶走。因此，会议集中讨论在这场战争对我们同阿拉伯国家的长期关系会带来什么潜在的危险上。会议除进行了泛泛的哲理探讨之外，只作出一项决定，即：把第六舰队调往距离战

事较近的地点。在周末进行这一调动可不是什么闹着玩的事。舰队的两艘航空母舰之一停靠在希腊，另外的一艘在西班牙。两艘舰艇上的人员都在岸上度假。需要两三天时间才能把这两艘航空母舰都调遣到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苏联人会把这个地点看作美国正在做应急准备的表示，因为这个地点既近到足以使我们能够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又远到足以证明美国没有侵略的意图。我们舰队的其余舰只停靠在更西边；我们把它们调到塞浦路斯附近海域就可以表明我们的关切加深了。有趣的是，十月五日离开埃及港口的苏联海军部队向西转移了。他们在保持采取迅速行动能力的同时，也在表明不卷入的态度。（后来，这两支表示同样意图的舰队在克里特岛附近海域相遇，开始在那里转来转去。几天以后，多勃雷宁递交了一份针对我们舰队调动的调子很低的抗议书，但是并没有什么说服力。甚至连苏联人也没有脸皮抱怨我们的舰队调往一个好多天来苏联海军中队早已在那里频繁活动的地点去。）

晚上将近九点钟时，我又同埃及外长扎耶特谈了一次。他不怎么乐意接受我提出的恢复交战前状况的建议。我暗示说，由于以色列人很快就会向前推进，过不了几天埃及肯定就会从我们的解决方案中受益。对此，他更难以接受。起初，他认为我的想法“很奇怪”。后来，当他对这个问题开始感到有意思时，又说我的想法“疯狂”。不过，扎耶特并没有用征服者的口吻说话。他没有大吹大擂，没有断言中东问题能够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他说埃及的目的是有限的，就是要向以色列表明：沿苏伊士运河设防并不等于有了真正的安全；同埃及这样的国家讲安全，必须以互相尊重为基础。我说这个目的已经达到，现在该是转而言和的时候了。扎耶特表示同意。他说：“我并不怎么喜欢战争。”我极力陈言，在一场埃及同美国至少部分地处于敌对方面的战争中，双方在感情冲动时还应牢记：日后我们两国在缔造和平方面还需要互相合作。扎

耶特带着这个奇特的口信上飞机离去。他说，美国有一个“冷静的头脑”。我们应该提出一项提案，因为“现在你对他们双方（埃及和以色列）进一言的机会到了，你没有以色列原先所具有的那样坚强的自信，也不像我们过去那样缺乏信心。”

扎耶特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每一次战争都以实现了某种和平而结束，但是过于常见的情形却是领导人一任自己的意向为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所左右。他们忽略了俾斯麦的告诫：最可悲的是一个政治家在战争结束时不能象他在出师之日那样的理直气壮。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同埃及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方面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方军事上过分自信，但却又充满不安全之感；另一方虽然数量上占优势，其心理基础却是一种屈辱感。这场战争有可能填补鸿沟。只要细致、耐心，使阿拉伯这一方恢复自尊，使以色列对进行外交谈判的必要性获得新的认识，我们就有可能协助在冲突的熔炉中铸造出一个和平的结构，最终使所作的牺牲不是无谓的。

十月七日：停滞不前的星期日

战争开始的第二天，十月七日，是星期日。华盛顿的天气温暖而潮湿。头天晚上，两条战线上激烈的战斗都持续未断。埃及似乎已经在苏伊士运河以东五英里处建立起一条连续不断的防线；叙利亚则已插入戈兰高地。我们驻特拉维夫的武官比利·福斯曼上校电告华盛顿，以色列部队仍处于守势，争取时间以完成动员。在整个这场战争期间，福斯曼上校发回的电报在准确性和洞察力方面都堪称典范。此外，在这一天结束时，以色列承认损失了三十五架高性能飞机。在华盛顿有人怀疑以色列损失的飞机数字，以为这是提出要求补充配备飞机的前奏。但是，这个数字是真实的，

证明阿拉伯方面的、特别是在埃及前线的苏联造地对空导弹的有效性。不过，看来此时还没有理由改变我们认为以色列将迅速取胜的基本估计。以色列按计划要等到第二天才开始还击。以色列告诉我们它摧毁了横跨运河的十一座桥中的九座，从而更助长了普遍存在的自满情绪。（事后证明这个说法是夸大了。这些桥梁充其量只不过是短时间内遭到损坏而已。）

星期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沙列夫递交了一份果尔达·梅厄给我们的私人信件，更坚定了我们的看法。她在信中写道：“我们的军方人士估计，我们正在进行激战，但是由于我们有人力和装备上的充足后备，战斗会转向有利于我们方面。我信赖他们的估计，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也从来没有欺骗过政府。”果尔达还忍不住对我们讥讽了一番，如果我们对她的感情不是那么深，如果我们不那么同情她的痛苦，她的那番讥讽本来是会让我们的血压升得还要高一些的。

我们之所以没有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其原因你们是清楚的。由于我们没有采取这种行动，结果就造成我们目前的处境。若是我当时按照我们参谋长的建议授权他在这次进攻前数小时先发制人的话，毫无疑问，我们的形势现在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的确，前些年我曾向西姆查·迪尼茨大使和他的前任伊扎克·拉宾表示过我个人的看法，即：如果以色列先发动进攻，美国帮助以色列进行战争的能力就会遭到破坏。但是，这次危机来临时，先发制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谈起。既然以色列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不存在战争危险，我们怎么可能谈起这个问题呢？战争爆发的当天早晨，果尔达还主动告诉基廷，以色列不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这是她自己做出的决定，并不是由于美国最近的忠告所致。^①这进一步证实了她——完全根据她自己的看法——在前一天要求我们向阿拉伯人转达的信息。我至今仍然确信她是正确的。

若是以色列首先发动进攻，那就会使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前景大为复杂化。事实上，在第一次凌晨召开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以色列首先动手的。而且，时间已经那么迟了才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究竟能否在军事上造成很大差别也是值得怀疑的。摩西·达扬事后写道，向内阁提出唯一的有关发动先发制人进攻的建议，是参谋长戴维·伊拉扎关于攻打叙利亚境内远离边界的地对空导弹的计划——这一措施根本不可能挫败当时即将把以色列打得措手不及的地面攻势。⑫

在目前果尔达给我们的这封信里，她要求我们把安理会的表决推迟到星期三或星期四（十月十日或十一日）。彼时，以色列希望能在各条战线上都处于攻势。果尔达重申：“若不是我认为几天之内形势便会好转，我就不会又来同你们谈了。”为了使成功有双倍把握，果尔达再次明确表示，以色列对某些特殊军事装备感兴趣，尤其是响尾蛇热导地对空导弹。一架波音 747 大型喷气式客机正飞往纽约，以便把我们所能提供的装备运走。沙列夫还明确提出了另一项要求，即加速交付前数周内按例行手续批准的现有供应计划的部分装备。我毫不为难地答应沙列夫将推迟安理会的表决，不过我认为更聪明的策略实际上是要求安理会开会，然后用要求恢复战争开始前状况的办法拖下去。我说：

如果我们要求开会并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我们就会首先发言，我们的决议就会是第一个付诸表决的决议。

如果我们一上来就被迫否决一项简单的停火决议，就不能得到别人的谅解。

我们打算把步子放慢；我们不急于要进行表决。当然，如果进行辩论，主席就会要求其他人发言，包括埃班外长在内。我相信他的开场白至少两个小时还讲不完。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也会告诉我们在纽约的代表把步子放慢一些。

对于军事供应问题，我们政府内部态度的分歧十分尖锐。这也一直是引起很大争论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情况是，包括国务院在内的所有政府机构都希望一九六七年的六天战争能够重演。在战争的那个阶段，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的高级官员相信数量较大的补充供应能够抢在战争结束之前运抵以色列——少量特殊装备除外。普遍的看法是，我们运去的任何其他装备都会因为到得太迟而无助于作战。

及至十月六日一早召开我不在场的第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时，以色列人已经提出了关于供应重武器的初步要求。国防部助理国务卿帮办詹姆斯·H·诺伊斯说“他们并不真正需要这些装备”。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对这个判断提出不同意见。等到当天晚些时候召开第二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时，我们已经收到了要求提供特种装备的请求。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建议推迟实施以色列开列的武器供应清单，因为“把任何东西运进以色列都会毁掉我们作为诚实无诈的中间人的形象。”副国务卿肯尼思·拉什也指出，“他们并不真正缺少什么武器”。

我是唯一持不同意见的人。这是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而不是由于军事方面的原因。我当时并不怀疑在大批的援助抵达之前以色列就能取得胜利。但是，除非苏联人在联合国同我们合作促使战争尽快结束，否则我还是赞成给以色列一些武器援助。如果我们拒绝给予援助，就不能推动以色列战后在外交方面注意听取我们的意见。而另一方面，如果以色列看到在极端困难的时刻自己并不是孤立的，就会对它日后在谈判中提出的领土要求产生影响，也许会使之变得温和一些，而我确信战争结束之后就会进行谈判。当然，对于阿拉伯人会因此而不满的危险我并非毫无所感。但是在我看来，战后的各种关系将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局，而不取决于我们是否供应武器。如果阿拉伯人因为有苏联的支持而战

胜，莫斯科就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大国；激进的做法——军事选择——就似乎被证明为正确的，而温和的阿拉伯人的地位就会更为削弱。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我们在战争期间曾经多么克制自己，美国都会失去它的影响。如果我们的武器援助阻止了阿拉伯人取胜，那么我们所起的核心作用就会确立。需要对阿拉伯的立场表现出谅解的时机是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当和平的进程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个缘故，十月六日早晨我曾告诉黑格，如果苏联对同我们在联合国采取合作的行动作出否定的答复，我们就应该向以色列提供某些数量有限的武器。我那天还告诉沙列夫：“几乎可以肯定，明天我们会批准你们所需要的合理的军事装备；特别是，苏联如果同阿拉伯人站在一边的话，我们一定会这样做。”

在十月七日这一天早晨，我在会见了沙列夫之后立即通过黑格向尼克松报告：“……如果阿拉伯人战胜了，他们就会变得很难对付，谈判也就谈不成了。”黑格表示同意，他说：“如果他们不能把这件事稳定下来——很快地稳定下来，在两三天之内稳定下来，我们就不得不交付我们已经承诺的那些装备了。”我们基本的供应政策就这样敲定了。在国防部的中层人员当中，无疑地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紧急感。官员们相信，我们是为了做出基本上没有必要的姿态而在冒丧失温和的阿拉伯人的友谊以及石油供应的危险。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他们办事拖拉也是由于他们预期以色列会立即战胜，而不是由于他们有意要让以色列在作战时遇到困难。

上午十时十五分，多勃雷宁为在外交上实行拖延战术找到了借口。以色列和我们都认为外交上的拖延战术是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的。他打电话来说，即将收到苏联领导人的一封电报，但两小时以后才能到。我立即报告了尼克松，并极力主张我们应推迟发

表任何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的正式声明。结果，那一天多一半的时间都耗费在等待苏联的信件上了——这正好适合我们想等待以色列完成动员的战略。

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了有关萨达特态度的相互矛盾的报道。据说，萨达特曾告诉一位西欧大使，他不希望安理会开会，也绝不会接受停火，一直到埃及部队收复了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占去的全部领土为止。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则任何停火倡议都将注定失败。看来这种说法同埃及军队的行动不符合。埃及军队一直停留在它现在已经打到的距运河数英里之远的战线上。与这种说法相反，据另一位在开罗的大使说，萨达特的立场是：不要求安理会开会，但是有可能同意应其他人请求而通过的一项停火决议。但是，在当时如果通过一项简单的停火决议，就会对发动这场进攻而获得的利益予以认可——而这正是我们希望避免的事。

因此，在这一场重大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这个专为处理破坏和平事件而设立的机构，就由于来自各个方面的阻挠而陷于瘫痪了。苏联人在拖延；至于埃及，要么是在拖延，要么是在为就地停火做准备，这就要看以哪位大使的话为准了；以色列需要时间来完成动员；叙利亚如何则没有得到消息。只有美国准备到安理会上去讨论，但是我们所属意的决议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套复杂的拖延战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别的理事国会支持我们。既然大家都需要时间，我们又想不让这个问题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我们就决定要求安理会在傍晚时召开正式会议，以便把辩论推迟到次日进行，并争取星期二或星期三才进行表决。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情报是可信的，以色列起码已经恢复了原来的防线。那时，大家都有可能愿意接受就地停火了。

下午一时，勃列日涅夫原答应在一个小时前就发来的信还没有到来。我催促多勃雷宁说，我们为了等待莫斯科的信，一直没有

在联合国进行任何活动。把符合你自己选择的战略的东西说成是对于对方的照顾，用这种办法向对方提出某项要求，这样做从来都没有坏处。在苏联不同我们为结束战争而进行合作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做好准备向以色列提供有限的武器供应。下午一时三十分，我告诉施莱辛格作好安排，把弹药，尤其是响尾蛇导弹，放在弗吉尼亚州一个偏僻的海军基地，由涂去标记的以色列 EL AL 商业飞机运走。等我和总统再进行一次讨论之后，他就会得到动手干的最后信号。施莱辛格推测，以色列明显地没有进行强有力的反击，特别是在南方，可能要表明他们由于没有先发制人而使自己被动挨打，从而便可以以有理由要求美国援助。我则表示怀疑，我说：“我认为这一次他们的确是被打得措手不及了。”

下午三时十分，我还是没有得到多勃雷宁的回音，于是我便告诉黑格，为了心理上和军事上的原因，我们应该着手满足以色列人的某些要求了。必须让苏联人明白，他们的附庸地位是不能靠施展拖延战术得到加强的；决不能让阿拉伯人用苏联武器来夺取胜利，否则他们就会变得无法驾驭。黑格表示同意，并告诉我总统也持同样观点。下午三时四十五分，我告诉施莱辛格着手进行。

与此同时，下午将近三时三十分时，我们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答复，这使我们更容易下决心动手干了。这个答复实质上又是一次拖延手法。莫斯科要不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是在按照和我们不同的估计行事。如果阿拉伯的前景真象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未可乐观，苏联领导人本应当欢迎恢复战前状况的主意；这本来会给他们制止以色列人深入阿拉伯领土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但是，相反地，勃列日涅夫给尼克松的信却只字不提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联合行动一事。信中不谈如何结束战争，而是大谈勃列日涅夫最喜欢谈的关于中东的老一套主张：开展美苏联合外交行动，以便按照阿拉伯的条件实现中东和平（其基础就是以色列全面撤

出)，以换取没有详细说明的安全保障。勃列日涅夫在信中写道，在以色列撤出之前，由以色列“毫无保留地”表示愿意从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走是“非常重要的”。勃列日涅夫暗示这样会加快结束战争，但对阿拉伯相应地应采取什么坚决的措施则秘而不宣。对我们则泛泛地要求做到运用我们的“影响”以取得以色列的默认。很清楚，苏联人是想听任这场战争再继续打一个时候。如若不然，那就是他们对自己的阿拉伯朋友的影响并没有我们原来所想的那样大。

萨达特同我们接触

不久之后，我们便收到了首次直接来自开罗的信息。（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整个这场战争期间，我们连一次直接来自叙利亚的信息也没有收到过。）开罗来信的口气是友好的，信的内容反映了一种情绪，而不是一种政策。在一封通过情报渠道发给我的电文里，萨达特的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向我们通报了埃及对于结束这场战争的条件。这些条件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现实一些，而是同五月份曾提出过的条件一模一样：以色列必须撤出全部所占领土；只有以色列撤出以后，才能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其他事项，如：由一支国际部队临时在沙姆沙伊赫驻军，以保证蒂朗海峡自由通航。这封电报明确地拒绝了缔结部分或临时性的协议。

显然，这些条件只是作为谈判的起点而提出的。萨达特从他以前同我们的接触中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是办不到的。我不认为此时此刻他是要谋求同我们意见一致；他要求的是进行对话。同我们通话已经是够冒险的了。他不能立刻就作出让步，从而可能促使叙利亚放弃同埃及的共同斗争，或是促使

苏联减少供应，结果加重了疏远叙利亚甚至苏联的风险。苏联的支持是他进行战争所不可缺少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电文的内容，而是收到电文这一事实。尽管我们在联合国里主张萨达特放弃他认为属于自己的、由他的军队刚刚攻占的领土，他却仍然邀请我们参加（虽然不是负责）实现和平的进程。电文中有一句话表明萨达特非常清楚他所能实现的目标是有限度的：“我们并不想使交战加深，或使对抗加剧。”要是说这句话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表明埃及并不打算在它已夺得的领土以外的地方继续向以色列发动进攻，或者把美国当作替罪羊，就像一九六七年纳赛尔所做过的那样。但是，如果我们对萨达特和这场战争理解正确的话，那么在埃及的军事部署及其政治目标之间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拉开距离，而这一点迟早必将导致政治谈判。

伊斯梅尔的来电开始了我们同一个曾经攻击了我们的盟友、而且其目的又正在被美国武器所挫败的国家之间奇特的对话。在整个这场战争期间，几乎没有一天我们不向开罗发报或收到开罗来的电报。甚至当后期我们对以色列的空运扭转了战争形势，使之日益不利于埃及的时候，萨达特仍然恪守不在国内煽起反美仇恨的诺言。这并不是埃及对我们的恩惠，而只不过是其在尔后的外交活动中避免把我们无可挽回地推向以色列一边的一种手段。他的计划是要同我们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使我们不仅是形式上而且是心理上的调解人。也就是说，根据这种关系，我们将把埃及的要求同以色列的要求同样看待。经过二十年的敌对之后，这的确是纳赛尔的接班人令人惊倒的新设想。

在收到这份电报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认真地看待过萨达特。由于他曾经多次威胁要进行战争而又从未付诸实施，我认为他不是政治家而更象演员。现在我才开始懂得，他的这种虚张声势的

姿态是有意识地采取的战略的一部分。这种姿态确实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戏剧性的声明之后并不采取行动，这就给人以一种预感——永远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这样，一九七二年把苏联顾问驱逐出埃及一事突然之间具有了新的意义。当时我确实难以理解埃及为什么不就苏联顾问离去一事同我们进行谈判，而是让我们白白得了好处。但是，萨达特是做对了。如果要让苏联顾问离开埃及，就必须速战速决，干得干净利落。如果就此进行谈判，那就很可能使他本人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若是我们不能提出令他满意的条件，他就还得让苏联人继续呆在埃及。萨达特想赶走苏联人，目的是要搬开妨碍他正在策划的这场战争的绊脚石，同时也是为了除去他计划中向美国靠拢的障碍。他认为，不应该让一些为取得有限的暂时利益而牺牲最终目标的小动作危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动。

萨达特这种从战争一开始就紧紧把握住问题实质的本领，使我确信我们是在同一位第一流的政治家打交道。哈菲兹·伊斯梅尔的电报虽然提出了种种难以满足的条件，却说出了一个不算过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心理上的目标，即电文中所称：“表明我们并不畏惧，也并非孤立无援。”萨达特出色地达到了这一目的。这就是他尔后的和平外交的先决条件。

由于现在我们手里有了苏联和埃及人的电报，我们的方针也就确定了。由于某种在我们的先入之见看来难以理解的理由，苏联人和萨达特一样，也在用计让战场上的胜负来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因为我们相信以色列很快就会占上风，所以他们的作法也符合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因此，我们就将前一天对多勃雷宁的警告付诸实施。我们要把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装成出于好心而为，让事情顺其自然发展。同时，我们确信失望正在等待着阿拉伯人，所以我们要使联合国大会的辩论不要让他们过于失望。十月七日那

个星期日下午较晚的时候，我们提出了召开安理会正式会议的要求。下午六时，我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会议上对我们的战略做了如下概括：

埃及不想在联合国同我们对抗，苏联人也不想同我们对抗。我们总的立场应该是要求恢复停火线。阿拉伯人将会大吵大闹，说他们生而有之的权利被剥夺了，但是到了星期四（十月十一日），他们就会跪倒在地上向我们哀求停火……我们正努力在使我们同阿拉伯人以及苏联人的关系受到损害较少的情况下把这一切结束掉。如果我们也能存放些钱在以色列人手里，以便日后谈判时支用，那也不错嘛。*

那天晚上，迪尼茨大使从以色列来到这里。他的到来保证了要发生某种戏剧性事件。三月里，迪尼茨接替了沉默寡言的伊扎克·拉宾所担任的职务。这一职务是以色列政府所能委以其任何一个公民的最重要的三、四个职务之一。这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对其友好大国象以色列对美国依赖到如此地步。在国际讲坛上，美国日益成为同以色列站在一边的唯一的国家。我们是他们独一无二的武器供应者，唯一的军事盟友（虽然我们之间并没有正式的条约义务）。阿拉伯国家因为以色列的顽固坚持而责备我们。以色列看到，只有坚持不妥协才是他们在一种片面的关系中

* 可是，下面这段对话却反映出，我已开始怀疑我们的情报对以色列很快就会战胜这一点的估计：

基辛格：你对阿拉伯人这样目空一切作何解释？他们为什么不要求停火？

施莱辛格：他们这是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科尔比：叙利亚人认为他们自己干得很不错。他们没有长远的考虑。埃及也许本来只打算搞一次越过运河的小规模行动。

基辛格：他们为什么不把已经得到的好处敲定呢？今天见到过萨达特的每一位外国大使都被告知：埃及在打到以色列边界之前不愿意停火。

施莱辛格：你是在按逻辑推理。你不能把这种逻辑硬加到他们头上。

拉什：很难想象萨达特会越过苏伊士运河，然后就坐在那儿不动了。

基辛格：据我看，他一定会越过运河，然后就坐在那儿不动了。我认为他不会再向前推进的。

保全自己尊严的唯一希望。它本能地感觉到，只要一承认自己软弱，或者不经过斗争而做出任何让步，就会招致一张向以色列提出无穷无尽要求的清单，因为每个国家都想让以色列解囊来使自己摆脱困难。要把彻底的依赖变成为反抗，坚持取得援助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接受别人的恩惠，把美国偏离以色列内阁的一致意见变成应予惩处的背叛行径，而不是一种可以谈判的意见分歧——要做到这一切是需要一种特殊的英雄气概的。

然而，以色列的固执尽管十分令人恼火，却最适合我们两国的需要。以色列若是一个奴颜婢膝的附庸，则很快就会招致外来日益增加的种种压力。它将诱使以色列的邻国不断把他们的要求升级。还将使我们为每一次僵局承担各种责难。无论怎么说，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一直就是这个样子。这种关系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沮丧，它由于彼此真诚相待并恪守信义而变得高尚，对于当今这个玩世不恭的时代来说是颇寓有教益的。这种关系又是令人懊恼的，因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利益和一个区域性小国的利益并不总是容易调和一致的，而有的时候则是无法弥合的。以色列是通过启发、坚持以及对我国内政策施加有见识的、并不总是难以捉摸或谨慎小心的影响等等做法来影响我们的决策的。

要闯过这错综复杂的难关，以色列大使必须施展他在美国不能承认、但在以色列他的内阁由于本身竞选的原因又可能加以夸大的影响。他必须设法取得超过美国在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所给予的援助。可是，他还必须使以色列不仅得到美国人的默认，还要使它在美国人的道义信念中站住脚。

迪尼茨是完全能够对付这一挑战的。他机智、好斗，既能坚持，也敢顶敢抗，又聪明又富有挑战性，具备许多优点。象他的前任拉宾一样，他从不阿谀奉承。英雄人物是不求助于甜言蜜语的，他们只是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怀着敬佩的心情读到有

关他们的记述。但是我相信，英雄人物常常是很难相处的。他们如果缺乏自信，就不会有勇气担当起自己的责任；这也就是习俗必须为信仰付出的代价。

迪尼茨因为在总理办公室里担任果尔达·梅厄的私人助理而出名。这意味着他必须在一个成员虽然由总理任命，实际上却不能由总理罢免的内阁中行事稳当得体。以色列历史上每一届政府都是联合政府。要想免除某个内阁成员的职务，总理必须冒失掉某一必不可少的政党或派别的支持的危险，因而可能危及政府的存在。以色列的政治表明，大学教授们关于内阁政府是如何团结一致的说法常常与事实相左，这毫不足怪。在那里没有必须遵守的纪律可言。每一派别都为自己的利益所驱使而设法把困难的决策推给别的内阁成员去承担责任。泄密成了一种治理国事的方法，因为这会使内阁成员显示他的重要地位或高度警惕。

迪尼茨为担任在华盛顿的职务做好了充分准备。他顽强、热情，具有非凡的幽默感。他总是象一只略带忧虑的大黄蜂一样飞向前来，好象在问：象他这样一个小玩意对我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有什么害处？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述说那些目光短浅的美国官僚和政客们对以色列极端不公正的待遇。对于身居我国政府最高职位的少数几个能够理解他的人，他授以纠正这些不公正的特权。但是，总是带有这样一种含蓄的威胁：如果这几个人未能尽到他们道义上的责任，一整窝的大黄蜂就要向他们袭来。

迪尼茨同我成了至交——我现在可以自豪地说，虽然我们两人都已去职，但这一友谊却保持了下来。后来，有一种神话流传开来，说我们两人过于友好，迪尼茨过多地受到了我的影响；说得坦率一些，就是说他上了我的当。在同我们结盟的国家中，其大使在国内会因为同美国国务卿接触过多而受责难的，以色列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多数国家都抱怨说他们的大使见不到国务卿）我

已多次指出，对于一个外交家来说，欺诈不是明智的道路，而是一条走向灾难的道路。因为你必须不断地和同一个人打交道，所以欺诈手法至多只能得逞一次，而其代价却是毁了彼此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对于象迪尼茨这样足智多谋和难以对付的人来说，欺诈手法即使只使用一次也不会得逞。而西姆查和我无论在战争或和平时期，都曾共过事。但我们俩谁都不愿忘记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为我们各自的国家服务。这曾给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带来一点不同的看法。

就象所有有经验的外交家一样，我们小心翼翼地不让我们之间的分歧变成个人意见不合。一种办法就是把某些令人痛苦的决定归咎于别人的责任。这种做法往往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迪尼茨非常善于动员舆论宣传工具和调动国会压力，但是他太聪明了，所以从不把他这套拿手本领做得很明显。当人们听到他的讲话时，只会感到惊讶，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通常都是个人主义者的美国人竟然会自发地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为以色列做的还不够多。反过来，当我有什么消息要告诉他时，我也免不了要推诿说是官僚机构的对立造成的，或是归罪于上级作出来的令人遗憾的决定。我们两人谁也不愚弄对方。我知道大多数压力都是由他在那里组织的。他也明白，我若是在官僚机构的你争我夺中败绩过多的话，也是不能够这样出人头地的。

十月七日那个星期日早晨七时四十分，当我们两人举行这次战争期间的第一次会晤时，迪尼茨从耶路撒冷给我带来了令人乐观的消息。他说：“在两条战线上，我们的部队都正在以最佳的火力向前推进。”他把一天前我们已经被告知的情况又重复了一遍，即：横跨苏伊士运河的十一座桥之中，九座已被摧毁。从第二天（星期一）中午开始（总动员届时将完成），以色列还需要四十八个小时，以便完成已在进行中的军事行动。我有信心能够把任何由联合国

倡议的停火至少拖延到星期二以后再实施。我们在新的军事补给问题上讨论了一会儿。根据军事预测，以色列需要的补给看来并非急不可待。我告诉迪尼茨，一架涂去标志的 EL AL 飞机可以在夜间从弗吉尼亚州的海军基地装上八十枚响尾蛇导弹和支架。可是我们国防部的中层官员们却利用我们关于保密的禁令而拖着不办。他们完全按字面解释禁令，以至于制止任何以色列飞机着陆，甚至包括涂去标志的飞机在内。但是，斯考克罗夫特用我的名义结束了这场把戏。拖延的时间不到二十四小时。这点拖延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大家当时都还确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响尾蛇导弹不过是用来充当鼓舞士气的工具罢了。按照以色列自己的估计，这批响尾蛇导弹也是来不及赶在足以影响战局的时刻运到的。

十月八日：一切均按设想的方案进行

到了十月八日(星期一)中午，我们的战略似乎已经安排就绪了。安理会的会议已经召开，但是正按我们所促其采纳的极其稳妥的步子进行着。会议还没有越过协商的阶段。正式会议最早也得在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才能开得起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还不会有任何决议案提出来，更谈不上付诸表决。早晨的情报简报似乎证实了我们的解释。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一份共同估计认为，到了星期二夜间，以色列人应能在戈兰高地上扭转局势；“若要发动攻势进逼叙利亚人，则可能还得一至二天”——大概是指彻底摧毁叙利亚的陆军。对埃及战场这一边的预测是，至迟在星期三，战争的结局就会明朗化。下述估计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相对来说没有明确倾向性的说法，表明对前景没有什么怀疑：“若干天之内还将有激烈的战斗，因为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摧毁埃及的陆军。”

在这种情况下，外交上的拖延看来是最适合我们需要的了。每过一个小时，我们同安理会其他成员之间产生分歧的不同意见——是应当就地停火，还是我们所谋求的回到开战前的状况——都会被事态的发展抛到后面。一旦以色列军队推进到战争开始时的防线上，我们就可以接受一项简单的停火。如果以色列人越过了这些防线，安理会的大多数一定会采取要求恢复开战以前状况的立场。到那时我们也会随大流，从而使阿拉伯军队免于遭到溃败。使事情尽可能保持平静，以免即将到来的以色列的胜利使友好的阿拉伯国家反对我们，或是让苏联哗众取宠——这是符合或者看上去是符合我们利益的。

十月八日，星期一，清早，我们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一份电报：

我们已就停火问题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接触过。我们希望很快能得到答复。我们感到在维护和平并发展苏美关系的广泛利益的指引下，我们应当同你们配合行动。我们希望尼克松总统也这样做。

当多勃雷宁在电话上向我宣读勃列日涅夫的电报时，我想这正好适合我们眼前的目标。既然我们不想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而苏联又主动提出要同我们配合，我们一定能安然度过这一天而不致发生对抗或面临使人为难的提案。我们相信，到了第二天，以色列的攻势就会占上风；到那时候，安理会就会要求就地停火。我们的盟友到那时已经击退了一场用苏联武器进行的攻势。那时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和平进程。对阿拉伯人，我们可以说，我们阻挡了以色列人前进。对以色列人，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场危机中间曾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因此，我毫不犹豫地电话中告诉多勃雷宁，我们将按照勃列日涅夫电报的精神行事。我们在那一天将不会提出什么决议草案，也不会不提前几小时先向苏联打招呼就提。我们还要指示斯卡利大使在安理会上做富有哲理的发言。我们将避免刺激性言论。我们希望苏联也能采取类似行动。多勃雷

宁同意了。

我们与之接触的对方——苏联、埃及、以色列——都同我们一起默认了这样一种行动方案：哪个国家都不坚持要求通过一项决议，大家都把讲话的调门压得低一些。我让埃班在可能情况下讲话时宁可长些而不追求雄辩——对这位以色列外长而言，这是重大的牺牲。我还促请扎耶特使一切都保持平静。即使在这个较早的阶段，已经日益明显地看出，我们是唯一同双方都保持接触的政府。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这个立场，我们就可能在和平进程中充当中间人。

为了进一步促成这一前景的实现，我在上午十一时四十分对哈菲兹·伊斯梅尔前一天的电报发了一封回电。很清楚，萨达特通过伊斯梅尔来电扼要提出的条件未能提供一项谈判的基础。但這些不大象是埃及最后的定论。因此我认为最好是同他们保持联系而不讨论条件，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依当时还在进行的战斗打得如何而定。我不谈条件而是提出了两个问题并提供了一项保证。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埃及的条件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实际上必须从它所占领的全部领土撤退出去之后才能召开和平会议，还是说只要它接受撤退的原则就可以了？中东谈判尽是这类奥秘的问题。它可以消耗时间而不得出结论。第二项要求是请伊斯梅尔澄清我们通过伊朗国王收到的一份电报中某些含混不清之处。这份电报告诉我们，在以色列撤出的地区内，埃及可以准许联合国的存在。

以上两个问题的目的都在于暗示我们已经预见到以色列某种程度的撤军，从而吊吊埃及人的胃口，而我们自己又不对伊斯梅尔所提的具体条件做任何承诺。我们的设想仍然是埃及军队不可能再向前推进很远了。我在电文中以向对方保证我们打算促进谈判作为结束。埃及已经达到了目的；军事上不能再取得更多的好

处了；要使我们在外交上卷入，也不需要再做些什么事了：

我愿重申：美国将尽其所能协助交战双方把战斗停下来。美国，以及我本人，将积极协助有关方面使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东的那些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

接着，我把注意力转向了国内。多数党和少数党的领袖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和休·斯科特主动提出要使参议院公开支持我们的做法。我极力要求，任何决议都不要对爆发敌对行动而追究责任；参议院要对处理这场危机的方式和方法表示赞许，并把以战前状况为基础恢复停火这一条当做“希望的目标”提出来。对我们的外交活动极为有利的是，这样一项决议当天就在参议院一致通过了。（有些怨言说我曾竭力反对对阿拉伯国家进行谴责。这种说法有些夸大，但也确实反映了我最关注的一件事，即：由于我确信阿拉伯国家的失败已迫在眉睫，因此我认为，使我们自己在这一股预料到的失意浪潮中成为受攻击的目标是毫无意义的。）

那天我们陆续得到的新情报使我们更加自鸣得意。中午，中央情报局报告，以色列在叙利亚和埃及两条战线上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报告还提到了以色列发布的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它的部队已在苏伊士运河的南北两端越过了运河。中央情报局过早地加上了它自己的一项判断：以色列在塞得港附近的频繁空中活动表明以色列人已经在北端越过了运河。这可以说又是按先入之见做出预言的一例。当时并没有任何一点证据表明以色列的地面部队接近于越过运河。但是这一行动已如此广泛地为人们所预见，以致于一切军事行动——甚至某些现在回顾起来曾是一种绝望挣扎的防守行动，如对塞得港的轰炸——都被说成是与跨越运河相一致的。

下午一时十四分，迪尼茨打来电话证实了这项乐观的估计：

前线的情况……看上去已大为好转，我们已从受到遏制发展成为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两个方面发动进攻。我们的军方人士认为：我们把叙利亚人

一直赶过停火线是大有可能的。我们正在把埃及部队赶出西奈半岛。

迪尼茨补充说，总理办公室“还未”能证实以色列部队已越过运河——他暗示这只是时间问题。他所以猜测这一步棋即将实现，不可避免地是来自他的下面一个看法，实际上就是暗示自战争爆发以来我所一直怀疑的一种可能，即：以色列完全可以决定越过战争开始时的防线，并在阿拉伯领土的纵深地区占领新的阵地以确保自己不再遭受突然袭击。我们早就决定我们不能支持这一步棋。如同我们将要求阿拉伯人所做的一样，以色列也必须在战前防线上止步。

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致我们甚至成功地使我们一直非常担心的联合国大会的辩论也流产了。我同联大主席、厄瓜多尔的利奥波尔多·贝尼特斯一起做出安排，只让直接卷入的有关方面上台讲话，然后就听从安理会讨论决定。在安理会内，我们指示斯卡利发表了一项语气柔和、富有哲理性的声明，其中提到重新确立战争前的边界线的种种好处，但不要进一步提出一项决议草案。结果安理会上的辩论完全没有发生戏剧性的表演。扎耶特用标准的措词集中指责以色列，而避免同美国进行激烈的争论。埃班以其惯有的雄辩对历史事实提出了同扎耶特完全相反的解释。他们之间的辩论完全证明了这样一句谚语：战争就是要看谁对历史所做的解释能占上风。

下午五时四十分，多勃雷宁在电话中向我正式保证，苏联“不准备在安理会上采取什么行动，不在那里提出任何决议草案。我们的代表已接到指示，不同美国的代表进行任何论战。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同阿拉伯方面进行紧急磋商。”他希望，在苏联人同其盟友完成磋商以前，我们也不要提出什么决议草案。我欣然允诺遵循这一实际上是我们所希望的办法行事。

我随即去参加已经在情况室里进行的、每天都召开的华盛顿

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中央情报局报告说，以色列人正加紧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反攻，并且实际上已经占领了戈兰高地。看来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以色列可能在未来四十八小时内赢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样，讨论就集中在如何收拾残局和如何避免在阿拉伯世界引起爆炸性反应以及一次可能的石油禁运上。苏联的和解态度似乎反映出他们已经估计到他们的阿拉伯朋友们要打输。可是，我又再一次提出了那个早就开始使我烦恼的问题：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末阿拉伯人为什么不牢牢抓住停火的机会？还有哪些东西是他们知道而我们并不知道的？但是我还是让自己相信了我的同事们的一致看法：阿拉伯人对自己竟然能够成功地越过战前的分界线感到如此惊讶以致弄得晕头转向。他们大吹大擂，得意忘形，只有遭到惨败之后才会考虑退却。

下午六时四十分，迪尼茨同我会面了。我们就安理会上人们的轻松态度谈笑了一番。迪尼茨确信，“在两三天之内”战前的边界线就会对叙利亚和埃及变得十分富有吸引力。他乐观地向我们报告说：

今天上午我们在两条战线上的进攻都很成功。在叙利亚方面，除去赫尔蒙山地区以外，他们都被赶出了高地。我们的人民已经回到自己原来的居民点去照料牲畜。在库奈特拉，他们组织了一次新的冲锋，现在我们正在反击。尽管他们部署了 SA-6 型导弹，我们现在几乎已握有完全的制空权。在埃及战线上，我们已摧毁了一部分埃及的武装力量。明天我们还将继续干下去。我们的空军和装甲部队阻止了埃及人把更多的部队运过河。到了明天，我们就能告诉你们我们将来的计划了。

我说，现在重要的任务是在石油供应不被切断的情况下度过这一周。迪尼茨甚至开始猜测以色列的停火条件。必须释放以色列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所有战俘，甚至连大规模战争以前进行“消耗战”的那些年里被俘的人也都在内。我回答说，对战俘问题我们没

有反对意见。但我警告说，对于获得领土问题我们就不会如此了。“我所强烈要求的唯一的一件事是：回到战争以前的防线上去。”我们将按照战前批准的计划加速交付若干架F-4“鬼怪式”喷气飞机。以色列较早时候提出的供给特殊设备的要求，我们也正在办理。我对迪尼茨说：“只要是能装上EL AL飞机的东西，你们今天夜里就能拿到。”我们处于这种自鸣得意的心情之中，耳边只听见一个刺耳的声音。这就是我们得知萨达特、阿萨德和费萨尔国王正在敦促侯赛因参战。也许他们所处的困境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危急，否则就是他们吃了败仗还不知道。对于这项情报我们并没有认真地看待。

不久之后，当我同尼克松谈话时，我们首先关心的是战后的外交活动。我曾傲气十足地说：“如果我们最终成功了，如果这次战争能够结束而我们同阿拉伯人或是苏联人的关系都没有破裂，那将是奇迹，将是重大的胜利。”此时尼克松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他的思想也是集中在战后时期上：

是的，我们必须十分关切的一件事，这也是当你和我在展望今后的时候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当以色列人彻底击败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时（他们将会做到这一点），他们将变得甚至比以前更加难以对付。这一点你和我在思想上都必须十分明确，我们还应在这个问题上找到外交上的解决途径。

十月八日那个星期一晚上，我甚至有时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海洋研究所特里斯会议上发表了我早已准备好的一篇演说。我在演说中插进了警告苏联的几句话：“我们关于缓和的政策是明确的，我们将抵制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缓和将由于在任何地区（包括中东）的不负责任的行动而无法存在。”但是，这些警告的目的并不是想进行威胁，而更多地是画家在一幅即将完成的画卷上勾上一笔点缀之笔而已。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怀着相信一九六七年六天战争将会重演的希望就寝了。

但是，极度的高傲自信开罪了神灵。他们对于把重大的事件等闲视之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我们所希望实现的历史性变化不能通过行家里手的表演来实现；这种变化只能反映作为其基础的现实情况。就在那天半夜，这一现实情况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

十月九至十日：形势转危

深夜一时四十五分，我刚入睡不久，迪尼茨打电话把我叫醒，提出一个令人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们在补充补给品方面可以做什么事情？我感到大惑不解。仅仅几个小时以前，他还预测说，战斗大约在这时会走向决定性的胜利。那末出了什么问题呢？需要些什么东西？为什么这样急？到此时为止，以色列主要是请求提供特种类型的弹药和电子装备。这些请求已经几乎全部获得批准；国防部方面曾经有过一些官僚主义的拖拉现象，但是响尾蛇式导弹已经交货启运。有待满足的请求主要是以方要求提供F-4鬼怪式喷气机，这批飞机不在我们已经答允加速交货的、通过正常途径运送的数目之内。这件事给我们出了个难题。因为鬼怪式飞机我们不多，除了每月以两架的速度生产出来运交以色列和交付我们自己的战斗部队使用以外，几乎没有多余的；把后者提走，必然要在我们的武装部队和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的抗议。我的头脑中闪过一个不甚高尚的想法：也许以色列人想要我们现在就保证执行一项提交武器的时间表，因为一旦他们获胜，提交武器的紧迫性就不复存在了。我对迪尼茨说，我们明天早晨第一件事就谈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又上床了。

凌晨三时，迪尼茨又打电话来，转达给我基本上相同的紧急信息。除非是他想向以色列内阁证明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否则就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我建议我们到上午把问题

谈清楚。

十月九日星期二上午八时二十分，我们在白宫一楼陈设雅致但很少使用的地图室会晤。我同迪尼茨和他的前任拉宾（还有多勃雷宁）的多次私下会面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当时我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并想使会晤保持秘密。室内稍欠明亮，因为窗口差不多给杜鹃花丛遮盖住了。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使用这间房子作为军事指挥部和通讯中心，当时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屋子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迪尼茨带来了他的武官莫德凯（“莫塔”）·古尔将军来给我介绍军情。我方在场的有斯考克罗夫特和罗德曼。

迪尼茨和古尔毫未浪费时间。他们神情严肃地对我说明，以色列到那时为止，损失极其严重，完全出乎意料。四十九架飞机被击毁，其中有十四架鬼怪式飞机。这个数字很高，但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因为叙利亚和埃及都拥有大量苏制地对空导弹。真正令人惊骇的是损失了五百辆坦克，仅仅在埃及战线上就损失了四百辆。迪尼茨恳求我，这些数字除了总统以外对任何人都要保密。如果泄露出去，那些目前尚在袖手旁观的阿拉伯国家就可能参加进来以便给以色列以致命的一击。一些难解之谜一瞬间迎刃而解了。我大声说：“怪不得埃及人那样趾高气扬。可是情况怎样发生的呢？”古尔解释说，相当多数的以色列坦克是在开往战场途中损失的，因为在兵站仓库中保养不善，在沙漠中行驶速度又太快。我感到惊骇万分，竟然粗率地提醒迪尼茨，前天夜间他还预测星期三可以取得胜利。他承认说“显然出了岔子。”可是究竟是什么岔子，他不知道。

但是这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迪尼茨所报告的情况要求我们对我们的战略从根本上进行重新估价。我们的全部外交活动，我们的补给政策，是以以色列迅速取得胜利为前提的。现在这些设

想都落空了。但是情况涉及到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我指出，叙利亚军队虽然伤亡惨重，但是并未崩溃。因此以色列要想把部队从戈兰高地转移到西奈一线是有困难的。而且，以色列在埃及战线所损失的装备大体和埃及相当。以色列现在面临着一场严酷的消耗战，考虑到人力悬殊，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是没有可能取胜的。以色列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古尔说他认为，对以色列来说，打叙利亚人是上策，因为除非埃及装甲部队冒险前进，大大超出地对空导弹的掩护地带，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发动攻势就会遭到过于惨重的损失。我说，据我判断，埃及部队不会轻举妄动。古尔看法不同，他认为埃及部队将会试图打到米特拉和吉迪山口一带，特别是叙利亚受到压力时他们更会这样。对以色列幸运的是最后事实表明古尔看法正确。

以色列如此惊慌失措，以至迪尼茨和古尔除了知道以色列需要飞机外，竟然不知道它还急需哪些武器。以色列急需坦克，可是坦克既缺货又难于迅速运输。古尔建议从欧洲抽运，可是即使这样也要几个星期。我们达成了协议，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可以立即开始启运更多的消耗品和电子装备。但是区区七架民航飞机，显然是没有力量运输重型装备的。至于大型项目，我答应召开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并在当天晚上以前给迪尼茨一个答复。

古尔要求我们提供情报材料。我指示斯考克罗夫特“把我们所掌握的每一项情报都给他们。”以色列如被苏制武器击败，对美国将会是一场地缘政治的失败，对这一点我坚信不疑。我极力主张以色列要赶在联合国通过外交手段认可阿拉伯国家收复各地领土以前，在某一条战线上取得迅速的胜利。迪尼茨回答说：“我们现在倾全力争取在叙利亚战线上迅速取得胜利，至于埃及战线，时间要长一些。”

会晤即将结束时，迪尼茨要求单独同我会谈五分钟。他对我说，梅厄总理愿意亲自到美国访问一个小时，以便恳求尼克松总统提供紧急武器援助。访问可以秘密进行。我当场拒绝同意这次访问，而且没有同尼克松商量。这样的建议只能反映出要末是歇斯底里情绪，要末是意图进行讹诈。前来访美将会使梅厄最少要离开以色列三十六个小时。在大战正酣之际出国访问将是严重惊慌失措的迹象，这可能使那些仍在袖手旁观的阿拉伯国家全部参加进来。在以色列最需要梅厄无所畏惧的勇气、有待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候，她的出访将会使以色列处于没有领导人的境地。（战后我获悉，就在这一时刻，达扬建议后撤至西奈半岛腹地。）同时由于她的访问无法秘而不宣，我们就会被迫宣布执行一项大规模的供应政策，从而毁掉任何进行斡旋的可能性。阿拉伯世界对我们将会怒火难遏。苏联则可以畅行无阻地任意驰骋。

星期二上午九时四十分，我紧急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举行特别会议，只限各部最高级的代表参加，不许工作人员与会以加强保密。我汇报了同迪尼茨和古尔的谈话，略去了坦克的损失数字。我的同事们持怀疑态度。科尔比报告说，以色列在叙利亚战线上打得不错，在西奈前线也打了个平手；他们这样做，不过是想在取得胜利之前，从我们这里获得最大限度的军事援助，作为我们给予不加限制支持的一种象征，他们的着眼点与其说是这次战争，不如说是在于战后时期。由于我是以总统助理的身份主持会议的，所以由肯尼思·拉什副国务卿代表国务院发言。在这以前没有时间发出任何指示；拉什支持科尔比的意见。施莱辛格认为运交不需要美国技术人员的辅助装备不存在困难。但是他担心，满足了以色列人的要求，从而把一场阿拉伯人正在取胜的战斗局面扭转过来，可能会损害我们同阿拉伯人的关系。施莱辛格指出，捍卫以色列使其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前的边界内得以生存，和帮助以色列

列保持其一九六七年战争中所征服的领土，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其他与会者表示同意这个看法。

我自己的看法是事态的发展已经使这些细微的差别失去意义了。从理论上讲，最好的结局是以色列人获得胜利，把阿拉伯人打退而又不使他们遭到惨败。但是事态已经走得太远了。我说：“不管怎样，以色列已经遭到一场战略失败。二比一的损失他们是承担不起的。”

与此同时，我对苏联人的行为感到疑虑不安。他们曾经默认了我们拖延时间的策略，因为很明显，他们在获得有关战况的情报方面比我们灵通得多。即使情况并非如此，那末时至今日他们想必已经跟上了事态的发展；显然他们意图浑水摸鱼。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休会期间，我从我国驻安曼大使迪安·布朗处获悉，苏联驻约旦代办现在力促侯赛因国王参战，答应苏联将在外交上给予全力支持。当天晚些时候，苏联公布了勃列日涅夫致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的内容相同的呼吁信。我对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同事们说：“这里有两个问题，补给问题和苏联有迹象要在阿拉伯国家中煽风点火的问题。我们不能让苏联人得手而不受惩罚。”展望未来，此刻的形势和一夜以前是多么不同啊！我宣布休会，并要求在中午以前把对以色列进行再补给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准备好。我力促施莱辛格把尚未交给美国部队的、刚从生产线上下来的鬼怪式飞机直接运交以色列。

与此同时，我力图挫败苏联把这场冲突转变为一场阿拉伯圣战的阴谋。迄今为止，侯赛因国王不肯参战，甚至前一天费萨尔国王提议的把驻在约旦的一旅沙特阿拉伯部队调往叙利亚的请求也拒不同意。我写信给侯赛因，呼吁他发挥政治家风度，并许诺一俟战争结束，美国将积极努力缔造和平。他复信给我，表示支持他的阿拉伯兄弟们的目标，申斥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以来拒绝讲和。

他说他将尽可能久地实行自我克制，但是除非美国能早日安排停火，否则他就无法继续实行克制。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将会加强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

依我看很清楚，除非以色列看来正在取胜，否则就不会有停火；以色列必须齐心协力，克服那看起来好象步调紊乱的现象。要恢复信心，就需要有实实在在的迹象，表明美国肯给予援助。与此同时，我们还得制止苏联人图谋利用这一突然变化了的军事形势，军事形势的变化起码对我们来说是突如其来的。白天的时候，我警告多勃雷宁不得鼓动其它国家介入这场冲突。他声称来自约旦的报告一定是一场误解，而勃列日涅夫致布迈丁的呼吁则不过是苏联例行的陈辞老调。但是当个超级大国在相距遥远的各国首都都以同样的方式受到“误解”时，那就颇可说明它是在搞阴谋。

十月九日星期二中午，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举行会议。供审议的有六项可供选择的方案，以满足以色列所提的武器请求。这些方案由低级到高级，范围广泛，从继续有节制的再补给活动，到开始执行一项由美国飞机承运的全力以赴的支援活动。对于事态究竟是否确实紧急，有人持怀疑态度。例如，科尔比报告说，以色列现有的军火起码还够用两个星期。

但是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计算后勤供应是否充足的问题。如果梅厄愿意在战争进行到生死攸关的阶段离开以色列，那么以色列一定是接近于惊慌失措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中有些玩世不恭的人说，如果梅厄认为她可以有空到美国来，那末想必战争已经接近胜利了。我不能同意这个论点。）除了军事上的理由以外，为了心理上的理由，也必须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事情。但是为了我国自己的利益，我们必须找出一个最不惹人注意的运交供应品的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利益同以色列不一致。我对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说，我将把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案提交给尼克松。可是

那天晚些时候，象牙海岸总统费利克斯·胡佛埃一博瓦尼要前来进行国事访问，仪式结束前，是无法找到尼克松的。

在我们等待期间，迪尼茨并没有闲坐不动。国会山不断打来电话，劝我在武器供应问题上不要再裹足不前。迪尼茨自然要表白他并不知情；许多参议员自发地得出了同样的独立的结论。在越南问题上时常折磨我们并且经常指责我们采用“欺诈”手法的邱奇参议员，这时打电话来主张我们不让任何人知道，“悄悄”地把几架鬼怪式飞机运进以色列。我本来耐性不好，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我回答说请他公开提出他的呼吁——这使我们通常的立场颠倒过来了。我当时想，让人们看到国会在催促我们为以色列多做一些事情，是会有好处的；这样可能会转移阿拉伯人对我们的一部分忿恨不满。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黑格、斯考克罗夫特、齐格勒和我同尼克松会晤。我概要说明了当前的问题。从外交上说，我们境况不错。我们是唯一同多数有关方面有接触的国家，包括苏联在内。一俟轮到外交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利用我们的关键地位。但是如果以色列看起来要打输，那末这一理论上的优势地位就毫无意义了：“如果阿拉伯人觉察到以色列的损失比他们承认的还要大，那么阿拉伯人就可能一拥而上。”

尼克松由于全神贯注于国内丑闻，因而心不在焉。阿格纽将于二十四小时内宣布辞职，尼克松那天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这件事上。但是虽然这件事可能使他无暇过问细节，却并未使他看不清楚事物的要害。他说：“一定不能让以色列人失败。”他还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他决定加速提交消耗品和飞机。重型装备在战斗结束前不会运抵以色列。我们将保证补充以色列的损失；这样就使以色列没有必要在战斗期间保持过份多的军用物资储备了。星期二下午六时十分，我向迪尼茨转达了尼克松如下的关键性的决定：

根据你的特别要求，总统批准了消耗品的整个清单，即军械和电子装备——除激光炸弹外的每一个项目。总统已同意——请允许我正式重复一遍——你们所损失的全部飞机和坦克将得到补充。在你们即将获得的坦克中，相当大的数目将为 M-60 型坦克，这是我们最新型的坦克。至于飞机，你们将得到五（二加三）架 F-4 型飞机，可以立即交货。至于别的，请你们拟出一个时间表来。……关于反坦克炮弹和反坦克武器，施莱辛格已经下定了决心。你们知道同国防部的什么人联系。如果有任何麻烦，请找斯考克罗夫特。这是清单上的每一个项目，唯有激光炸弹和飞机除外。关于坦克，你们得拟出一个时间表来。……坦克问题不在于你们在这场战斗中需要什么，而在于战后的形势。你们已得到保证，你们会得到补充的。而且你们还得到保证，如果事态严重恶化，情况紧急，我们将运去坦克，即使用美国飞机运输也要办到。

我曾对施莱辛格说过，在战争仍在进行之际，他有权决定以色列需要各项军用物资的迫切程度。如果他断定战斗期间以色列需要坦克，他就应当立即装运。迪尼茨主动提出以色列将用没有标志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接运一切可以装载的东西。并没有谈论由美国建立一条空中补给线的问题——除非情况紧急迫切需要坦克自当别论。

关于这一谣传，即尼克松政府蓄意扣留军需品不给以色列，以便使它在谈判中较为驯服，我就谈这么多。在以色列迅速取得胜利的前景消失后，我们面临着两个危险：一是军事上长期相持不下，一是突然建议实行停火，而此时以色列在两条战线上都尚未重新攻占战前的边界。我们力图使以色列增强信心并向它提供必要的手段，使它可以对付未来几天的关键性日子，因为这时战争的结局既取决于以色列的武装力量，也取决于它的自信。但是对于给以色列补给的方法上我们也要极力少事张扬；因为我们意识到必须维护阿拉伯人的自尊。

为了同埃及保持对话，那天晚些时候我回信给哈菲兹·伊斯

梅尔，答复他最近的来信。这封信是当天上午收到的，其中表示赞赏我国政府的“良好意图。”我含糊地告诉伊斯梅尔说，我们的行动是我国舆论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的行动——这给埃及一个既能默认这些行动，又能保全面子的台阶。我强调说，美国“现在明确理解埃及有关和平解决的立场。”但是我避免对这一点发表任何意见。在外交惯例上，这等于是表示这一立场不能作为谈判的起点。

相反，我把我们的信件交换朝着实的方面向前推进了一小步。我向伊斯梅尔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来说属于业务性的，容许作出具体的答复。它还有另一个好处，可以把我们在安理会的拖延战略说成是关心埃及观点的一个表示：

然而，美国方面对于埃及方面关于如何结束目前战斗的观点所知较少。了解这些观点，对于美国拟定其在安理会当前辩论中的立场将是极有助益的。美国方面希望听到埃方意见，因此将尽可能推迟在安理会表明美国的最后立场。

美国方面愿意重申，它愿意同有关各方进行紧急磋商，以便在中东实现公正的和平解决。在目前这个困难的时刻，重要的是要铭记这个长期的远景，并在我们谋求解决目前这场危机的时候避免进行对抗和激烈的辩论。……

十月十日星期三上午，我们一醒来就听到不利的消息，苏联对叙利亚实行空运。大约二十架运输机正在经由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飞往叙利亚的途中。这种规模的空运不可能是临时拼凑的；它一定是组织了好几天了。在目前阶段，看来空运限于消耗品，同上星期天我们作出的有关以色列的决定相似，虽然苏联的这一努力规模大得多，搞得也更加公开。它的目标是使这场冲突的战火烧得更旺呢，还是为了支持一个被保护国，并保证苏联在战后谈判中能插一手？这是为了鼓动阿拉伯人拒不让步呢，还是为了表明苏联人对于缔造和平具有诚意？是为了帮助遭到最沉重压力的同伙

免于崩溃呢，还是为了鼓励他们发动一轮新的猛攻？

即使现在答案也不清楚。很可能苏联领导人想保留几项可供选择的出路，而结果却着着失利。他们努力的程度足可确保战争得以延续下去，但不足以影响战争的结局。他们可能想谋求停火，战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都轻蔑地对我们这样说。但是他们如此地犹豫踌躇——而且据萨达特说苏联是如此的口是心非——以致于埃及更加怀疑它的盟国的诚意了。

萨达特写道，几乎从敌对行动一开始——开罗时间十月六日下午八时三十分，或者说战争开始后六个半小时——莫斯科就力劝他接受停火。当时苏联大使对他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战争爆发以前就对克里姆林宫说要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谋求停火。话讲得这么笨，令人难以置信。虽然阿萨德否认提出过这种请求（就阿拉伯政治而论，这并不是最后的证据），苏联人接连几天重提这一请求，直到最后萨达特仍坚持要继续进行战争，一直打到粉碎以色列的“安全理论”时为止，这时苏联人才不再重提这一要求了。^⑬

萨达特的叙述——大概不会由于对苏联领导人的同情而受到歪曲——和同一时期苏联人对我们讲的话一致。十月十日星期三上午八时以后不久，多勃雷宁打电话给我，声称他有重要的信息：苏联同埃及和叙利亚的磋商“旷日持久”，“不容易”。尽管如此，苏联现在可以告诉尼克松，苏联“不准备阻止安理会通过一项停火决议。”换言之，对于一项赞同简单就地停火的决议，苏联将投弃权票；对于一项要求退到战前边界的呼吁，苏联将不支持，也就是说，将加以否决。此外，苏联的照会表示愿意“在被以色列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获得解放的基础上”，致力于通过谈判求得解决。

苏联关于实现就地停火的倡议是在对我国的战略最不利的情况下提到会议桌上的：如果苏联在这个时候大力推行他们的建议，那么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支持这项建议，包括我们的欧洲盟友在

内。另一方面，由于战前局面尚未恢复，以色列定会拒绝接受。假如我们竟然同意苏联的方案，并迫使以色列接受的话，战争就会以苏联支持的阿拉伯部队明显地获胜而结束。美国在战后外交中的地位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在超级大国中只有美国才能促成进展这样一个命题就会破产。苏联武器就可以取得胜利；苏联外交就可以维护这一胜利。发生另一次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因为以色列想要重新夺回以往的优势地位；而阿拉伯人将深信他们可以用一次新的进攻打破每一次谈判的僵局。

要是苏联人当时执行的是一项果断的政策，而阿拉伯国家并未因过于兴高采烈而忘乎所以的话，他们本来可能在十月十日力促实行就地停火，把他们的成就巩固下来。我们要反对就会很困难。但是埃及和叙利亚要末低估了以色列的复原能力，要末不知道如何结束他们之间的互相疑忌——也许二者兼而有之。苏联人希望实现些什么目标难以揣测。他们的矛盾心理使我们有时间争取复原。如果他们希望我们放慢对以色列的再补给活动，那他们的希望就落空了。苏联对大马士革的空运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决定一方面“原则上”接受苏方建议，以约束苏联在联合国的外交攻势，但是另一方面尽量推迟实施苏方建议，以便看以色列最近关于四十八小时内叙利亚前线取得胜利的预测是否能够实现。

因此我就对多勃雷宁说，他可以告诉莫斯科，停火建议是“建设性的”，但是我们需要时间加以考虑。稍过一会儿，我回电话给他说，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以前，即另一位非洲来访的总统扎伊尔的蒙博托离开之前，总统不可能做出正式的答复。但是我的真正目的是要让多勃雷宁知道，我们晓得苏联在进行“规模很大的”空运，我对他说，这是“没有助益的”。多勃雷宁声言这出乎他的意外。我语含讥讽地说：“我敢肯定（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知道这

件事。……他们取道布达佩斯，以备万一他们需要寻找最后一个可以紧急降落的机场。”即使考虑到苏联官僚机构手续的迂腐，多勃雷宁也不可能全不知情。他说他将向莫斯科查询。我说无论现在发生什么情况，苏联的空运将“迫使我们起码采取相同的行动。”

水门事件为再次拖延提供了一个借口。阿格纽辞去副总统职务一事预定当天下午二时宣布。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我借口事先提请他注意再次打电话给多勃雷宁，声称这件事将使总统在几个小时内无法把注意力转到苏联的建议上来。我请多勃雷宁确保不要使我们被迫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作出决定。他直截了当地保证苏联人不会在安理会提出任何决议案。

在当天上午同多勃雷宁通话的间隙里，我同迪尼茨研究了形势。他把梅厄致尼克松的一封感谢信读给我听，信中感谢我们前一天通知他们的关于再补给的“至关重要的”决定，她说，这一决定将“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我们是在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作战的，但是我们完全相信我们将最终获得胜利。我们胜利时，将铭记你们的帮助。”我对迪尼茨说，既然再补充有了保证，以色列就不必囤积储备物资了。没有时间采取复杂的步骤了。一切都取决于以色列尽快打回到战前的边界线去，或者至少在一条战线上越过战前边界。我们无法永久推迟停火建议。

我们同埃及的对话使我们得知在安理会开始活动以前还有一些时间。星期三下午一时，我接到伊斯梅尔对我前一天有关停火条件的询问的答复。他表明开罗尚不准备把埃及已经取得的进展巩固下来；继续坚持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方案，虽然坚持的方式已经经过很大的调整：

伊斯梅尔先生还想表示，虽然埃及方面已注意到美国政府采取的立场所根据的各项动机，但是与此同时，如果基辛格博士能够理解同埃及立场有关的政治因素和其它因素，埃及方面将表示赞赏，就埃及立场而言，审议一项在

中东缔造和平的全面方案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巧妙的阐述——言外之意是，埃及的条件严格来说已经超出了埃及国家利益的要求——表明，在适当的情况下，埃及坚持的全面方案是可以商榷的。在来信的其余部分，伊斯梅尔对他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作了五处修改，最重要的一点是：埃及不再坚持以色列先把部队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去，只要以色列保证撤军，埃及就可以接受，条件是要有明确规定的时间限制；一俟撤军完成，交战状态即行结束；其后就召开和平会议。

伊斯梅尔想必知道得很清楚，除非以色列遭到全面军事失败，目前还不可能使以色列政府同意这样的条件。但是在微妙的谈判中，重要的并非所提修改的内容；而是埃方肯于提出修改这件事，特别是伊斯梅尔并不是在要末接受要末拉倒这一基础上提出这一修改的，而是“供基辛格博士考虑”——实际是请我提出反建议。

虽然最近我对埃及人的机敏老练产生了敬佩之情，可是我仍深信在军事形势发生变化以前，不会进行认真的谈判。但是首先必须使战争不再扩大。白天的时候，我们得悉萨达特这时正在力促侯赛因国王参战。迪安·布朗报告说，国王正考虑派遣一旅装甲部队前往叙利亚，以避免做出危险性较大的决定，例如沿约旦河发起进攻从而开辟一条新战线。但是约旦的任何行动都大有可能鼓励其他阿拉伯国家参战，并鼓励坚持致力于军事解决的倾向。我向国王发出紧急呼吁，请他至少推迟四十八小时做出决定：我对他说，我正在通过秘密外交渠道进行一项重大努力，以求结束这场战斗。我需要时间和他的帮助。侯赛因没有答复，说明他很慎重，但是他接受了我的建议，表明他具有政治家的风度。

我国政府内部在对以色列进行再补给的迫切性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虽然对于最终必须补充它的损失这一点没有争论）。大家都深信，在重型装备可以运到并影响战局以前，战场上就会见分

晓。人们感到担心是有道理的，唯恐我们破坏了我们同温和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而又未能真正帮助以色列——特别是在十号那天上午我们听说，费萨尔国王要求把派驻约旦的一旅沙特阿拉伯部队开往叙利亚一事碰了侯赛因国王的钉子以后，现在决定直接从沙特阿拉伯派出一个旅。施莱辛格在八时三十分左右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主张快速采取行动促成“立即停火”。他非常担心，竟然来征求我的意见，可否让美国部队参与“占领”。我表示不同意。我对施莱辛格说：

关于沙特这件事，我想大家目前都必须保持镇静。调动一个沙特旅意味着要两天以后才能开到战场附近，约旦人也大有可能派一个旅去，那也不坏；这是他们可以做的最起码的事。我们在一两天内将坚持我们的作法，因为我们认为按照我们的作法，这件事可以得到处理。我认为目前没有必要考虑去“占领”任何地方。

我在国务院设午宴，招待比利时外交大臣雷纳特·范埃尔斯兰德。根据事先安排，宴会进行中间，我被召到白宫去接受阿格纽的辞职书。由于某种含糊的法律上的理由，总统或副总统要辞职必须向国务卿提出。这条规定过去从未实施过。我深信，没有哪位别的国务卿会在短短十个月内接受我国两位由选举产生的最高级官员的辞职。

在我忙于处理阿格纽辞职的事情时，斯考克罗夫特会见迪尼茨，向他通报苏联关于（在简单停火问题上）联合弃权的建议，并同他讨论加速进行再补给的问题。迪尼茨和我们一样，也不愿沿现有战线停火。遵照指示，斯考克罗夫特力促以色列在未来四十八小时内做出最大的军事努力。我们不能永远拖延下去，也不能坚持要阿拉伯国家归还以色列未能再次夺占的阿拉伯土地。但是迪尼茨无法把任何意义上的以色列时间表或作战计划提交给斯考克罗夫特，原因要末是这种时间表根本不存在，要末是以色列政府不

愿意告知我们(或告知他)以色列的意图。

从同一次谈话中还明确了一点，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七架喷气机无法运走提供给他们全部装备。在同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主要成员磋商之后决定，美国政府准许以色列向私营航空公司包租飞机，运输那些额外的装备，美国政府将给予支助。

采用包租飞机的办法完全失败；结果，四十八小时后，由美国军方组织了一条空中补给线。后来，有人硬说故意推迟空运是迫使以色列接受停火的一个策略手段。^⑭上面有关我国战略的这段叙述，应当无可怀疑地说明，情况并非如此。十月十三日上午，我们最后认识到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和后勤供应问题对延误租赁飞机计划起多大作用，于是我向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重申了我们的战略，代表总统要求不愿支持这一战略的任何官员辞职：“过去我们需要发动攻势时，我们就需要把物资运进去。现在是在事后运进去，我们希望这时外交能起作用。……如果以色列觉得我们拆了他们的台，而阿拉伯人认为是他们自己干成的，我们就完了。”

延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哪一家租赁飞机的公司愿意招惹阿拉伯人对它进行抵制或者愿意让它的飞机在作战地区去冒风险。国防部本来可以对租赁公司施加压力，因为这些公司都依赖五角大楼的买卖。但是国防部并不感到有此紧迫的需要，因为据它估计，以色列还存有两个星期的储备——或者说比预测的任何军事行动可以支持得更久些。运输部(另一个可能承担这一任务的单位)想置身于军事对抗之外。这两个部都很老练，把球来回地踢到对方的场地上去。斯考克罗夫特和西斯科二人不辞辛苦地组织这次租赁飞机的工作，他们所听到的是一连串的遁词。但是从根本上说，问题在于我们探索了一切可供选择的办法，最后不得不面对现实：由于没有任何一家私人公司愿意承包前往以色列的空运任务，美国政府只好冒这个风险，即：要末由政府本身承担空运，要

末用政府的名义包租飞机。我不能肯定这次延误是否有重大关系。即使立即开始军事空运，也不可能在十月十二到十三日提出第一次停火倡议以前对以色列的作战行动发生影响，这一次停火倡议夭折了。

但是在十月十日，无论我们对再补给问题怎样看，我们必须推迟进行外交活动，等到作战前线有了变化以后再说。我们认为，对于我们计划中的战后外交来说，最佳的军事局面是假定以色列能够恢复战前的形势，或者稍微向前推进一些。这样就可以表明以苏制武器为后盾实行军事解决的办法是一种幻想；而外交上要取得进展必须靠美国的支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许可以在以色列在一条战线上取得军事进展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即使在另一条战线上遭受挫折——不过这样事态就复杂多了。

然而，在十月十日，这两个条件都还并不存在。以色列刚刚重新攻占戈兰高地（不包括赫尔蒙山地区的一些叙利亚前哨阵地）。埃及两个集团军的部队已经跨过苏伊士运河，在那里牢牢站稳了脚跟。在西奈已没有希望发动一场攻势了；以色列唯一可以选择的作法是预定第二天对叙利亚发动攻势。对于苏联的建议我们将采取推拖态度，等到这一作战行动的结果比较明朗以后再说。（必须记着，就在当天人们对我们说，埃及还不准备放弃全面撤退的要求。我们没有从叙利亚方面听到任何消息。）

为了拖延时间，十月十日下午五时四十分我对多勃雷宁说，我们需要时间来考虑他提出的对实行简单停火的提议采取联合弃权的建议。我以后再同他联系。我还安慰他说，我们对停火建议是认真的，即使技术方面比较复杂一些也罢。这句话当然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但又不是那么尖刻。那天晚上，瓦尔德海姆来访，他说任何决议在安理会都得不到多数票，而且只有秘鲁、肯尼亚和几内亚登记要在第二天发言。看来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不想要任何

形式的停火。这对我们倒挺合适。但是瓦尔德海姆感到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人问我，（秘书长）采取了些什么行动来制止这场战斗呢？”——问题提得相当合理，因为一场大战已经打了将近一个星期了，而联合国却尚未采取任何正式行动。

下午九时四十五分，我又打电话给多勃雷宁说：“阿纳托利，明天以前我们还不能给你们答复。”多勃雷宁非常懂得我在干什么，他用和蔼可亲的口吻威胁说：“你表演得不错嘛。可是在俄国人不负责任这个题目上别演得太过头啊！”我再一次就苏联“大规模的”空运活动对他提出警告。

十月十日那天很晚的时候，我们通过贝鲁特从一个预料不到的人物那里接到一个信息，此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脑亚西尔·阿拉法特。现在人们都不大记得，十月战争以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发挥的作用相对来说是次要的。一九六七年，被人奉为神圣的联合国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没有提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决议只是把巴勒斯坦人当作难民来谈。在一九七〇年“黑九月”里，侯赛因国王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连根拔除赶出了约旦，招来同叙利亚的一场危机，后者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更多地出于对约旦的长期阴谋，而不是同巴勒斯坦人在政治上的共鸣。一直到一九七四年年中，人们普遍认为将来要由约旦而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以色列谈判西岸问题。我们在政治上同阿拉法特没有联系。偶而，通过低级的渠道交换一些无关重要的信息。阿拉法特的来信现在宣称

可以百分之九十九地肯定未来几天内以色列人将一举击溃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因此美国在敌对行动结束以前不应当进行干预或向以色列提供进一步的援助。美国应当尽早谋求停火，而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

这表明阿拉伯人既然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过了战前的边界线，已经恢复了相当多的“面子”，可以认真进行谈判了，即使他们象阿

拉法特预测的那样最终要在这场战斗中失败也罢。据阿拉法特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愿意参加这些谈判,不过要保留同约旦清算一九七〇年的宿怨的权利。如果照表面价值来理解,这可能意味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可以同以色列媾和,但决不同约旦媾和。阿拉法特许诺不对美国的人员和设施采取敌对行动——除非美国在战争尚在进行之际进行再补给活动。究竟阿拉法特是真正相信上述估计并谋求参加谈判呢?还是象其他一切人一样玩弄同样的手法,试图进行拖延——阻止我们的再补给活动——以便使他的盟友迅速取得胜利?这没有多少实质的区别,因为我们在战争结束以前并未给予答复。(见第十三章)

那天晚上我回顾了当天的事态发展和我们所取得的进展。我们将同有关各方保持联系。我们的目标是使外交活动放慢而又不要显得有意阻挠,力促加速军事行动而又不要让人看来是进行干涉,然后在各方由于焦躁失意或者发生了意外事件而把这块精心织造的布匹撕得粉碎以前,强制实行停火。

十月十一日:以色列攻入叙利亚境内

第二天,十月十一日星期四,情况变得明显起来,多勃雷宁并没有空洞地进行威吓。一大早又发现有十架苏联飞机向叙利亚进行空运;而且,苏联还向埃及甚至伊拉克进行空运。当天晚些时候,我们获悉有三个苏联空降师奉命处于戒备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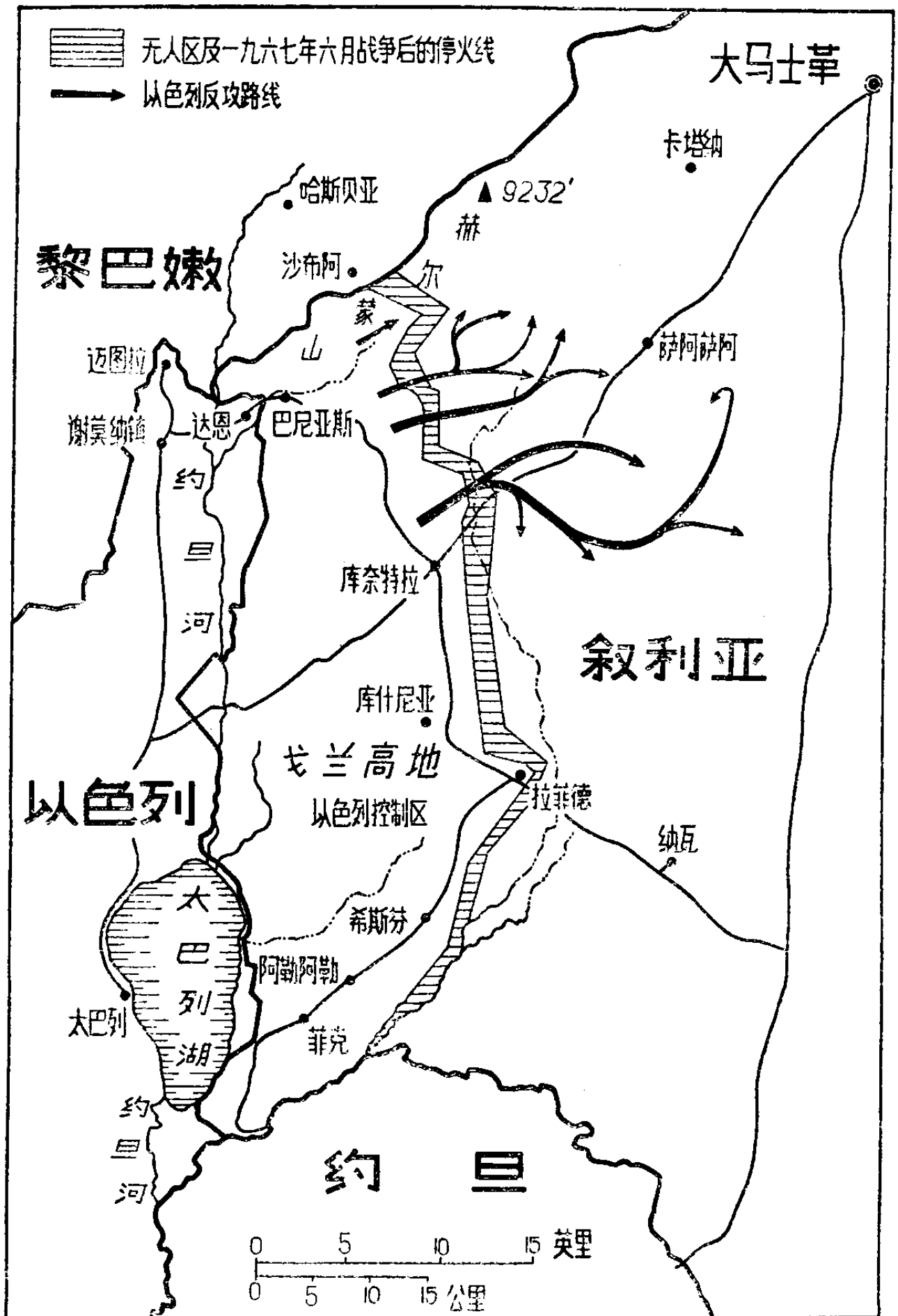
那天上午,以色列的战略也趋于明朗。以色列在叙利亚战线上大举越过战前的边界并深入叙利亚腹地进行空战。新闻收报机传来国防部长达扬的话说,以军正在向大马士革进军途中。到那天晚上,以色列已经越过战前边界线,占领了戈兰高地上纵深十一公里宽十二公里的一块突出地带。以色列的前沿阵地距大马士革

仅有三十二公里（二十英里）左右。只要以色列不声张，它在战场上的这一进展是符合我们宁愿采取的战略的。归根结底，我们在就地停火问题上曾对苏联人拖延了二十四小时，如果以色列人宣布他们正在向苏联的一个盟国的首都进军，我们是很难坚持这一立场的。上午十一时左右，我向沙列夫提出这一问题：

你们一方面要求我使联合国放慢步子，一方面又让达扬在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上说你们正在向大马士革进军，这不太好。你们的国防部长发表这样的声明，我们怎样能使联合国放慢步子呢？……这使人看起来是最坏不过的共谋和欺诈。

但是我继续对多勃雷宁借故推拖，这次的借口是我们必须同以色列和其它有关方面进行磋商，然后方可提出有意义的停火建议。事实上，我同以色列进行了紧急磋商，虽然谈的不是停火问题。但是这次在亨利·杰克逊参议员和某些专栏作家的带头下，进行了日益频繁的公开指责，说我们在给以色列实行再补给问题上推拖因循，苏联人则利用缓和使我们丧失警惕。后一项指责特别令人哭笑不得，因为在我们看来，正是我们试图利用缓和使莫斯科保持冷静以使局势恢复原状。同时这一指责也是非常不公平的。黑格、斯考克罗夫特、西斯科和我一直艰苦努力以确保再补给。我们曾努力想找出办法解决我们不熟悉的包租飞机问题；我们在以色列人的鼓励下是根据这样的设想进行工作的，即待到补给品运到时，在叙利亚战线上战争可能已经获胜。我们也曾竭尽全力保护以色列使它不再遭到来自其它方面的进攻。这种指责使人如此恼火，以致尼克松要我警告迪尼茨，如果继续出现这种含有敌意的新闻报导，他要唯迪尼茨是问——这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空洞无物的威胁之一。

十月十一日晚些时候，英国首相希思打电话给我说，侯赛因国王受到日益沉重的压力，要他为他的阿拉伯兄弟做些工作。侯赛



戈兰前线：以色列反攻路线图

因考虑着要把一个装甲旅开到叙利亚去，这是当时的情况容许他开去的最安全的地方了。他希望以色列对此加以默认，如果可能的话；他想起码能求得以色列保证不利用这件事作为进攻约旦的借口。

只有在中东才可以设想交战一方会向敌方要求准许他采取针对对方的一项战争行动。后来我向迪尼茨提出这一建议时，他语含讥讽地说：“这就叫作又要打仗，又要一切都方便。”一天以后，以色列的答复正如预期的那样是否定的。人们无法期待一个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的国家会正式同意增强敌人的力量；但是以色列的答复没有威胁要进行报复或扩大战争。以色列的信同侯赛因给我的信互相错过了，侯赛因告诉我信的内容，其实我已知道，即星期三我要求推迟四十八小时采取行动，现在时限已经到了；约旦不得不采取一项最不带挑衅性的行动，即派一个旅到叙利亚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抵销“伊拉克—苏联阴谋”并把这场灾难限制在“尽可能小的地区”。我回信给他，敦促他继续努力限制这场冲突的地区和规模。我们大家所面对的形势非常困难，但是我毫不怀疑，只要保持镇定，运用智慧，发挥果敢精神，仍然可以从再次降临到中东的灾祸中获得某种好的结果。我对他说，我已敦促以色列人保持克制，因此他的部队行动谨慎也是同等重要的。

十一日夜间，我接到哈菲兹·伊斯梅尔给我的另一个信息，吁请我们约束以色列不要轰炸尼罗河三角洲埃及的民用目标；据称那里已有五百多名埃及人遭到伤亡。第二天我作答时说，我们将劝告以色列停止袭击纯民用目标，我并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两点。埃及报纸曾经刊载过一些伪造的消息，说美国战斗部队已经参战，我借口对此发表评论告诫埃方不要允许苏军参战。这样的行动肯定会把我们直接牵涉进去并使我们站在同埃及敌对的一方。我并再次通过伊斯梅尔提醒萨达特，——当时我不知道他已经得出这个

结论，即：埃及如果打算在战后取得谈判成功，那就需要美国。

美国部队并没有介入军事行动。除非别的国家从本地区以外以直接的军事行动进行干涉，美国部队决不会以任何方式介入。……美国随时准备以谅解和善意的精神考虑埃及关于结束敌对行动的任何建议。在敌对行动结束时美国将试图提供协助。无论当前事务出现何等不可避免的紧迫情况，美国希望双方不要忘记这一目标。

十月十二至十三日：我们开始空运

在第一个星期结束时，戈兰高地的战斗胜负未决，一项停火建议似乎已经摆到了会议桌上。显然，苏美两国的关系是说明缓和既有可能又有局限性的一个实例。苏联人的确在口头上给他们的阿拉伯朋友以支持。他们的空运活动令人不安。而且此时我们获悉，有七个而不是三个苏联空降师已经处于戒备状态。但是这种支持较之苏联的实际能力还差得很远。战争结束后，所有阿拉伯领导人都向我抱怨说，苏联的空运搞得非常勉强，而海上运输又行动迟缓，就好象要故意触到阿拉伯人的痛处——依赖性。同时苏联人从来没有在联合国发动一场外交攻势，使我们难堪和孤立。我不相信历史将来会断定我们是被利用的一方。战争受到了遏制，美国成功地运用策略削弱了苏联在中东所起的作用。

对东西方关系的这种了解，对于理解我于十月十二日星期五所举行的战争期间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十分重要的。我的话成为批评的对象，原因是尽管我对苏联人发出警告，指出他们快要达到缓和所容许的极限，但是我不肯埋葬缓和。可是如果我对苏联人发动一场口头上的攻击，就会加速某些事态的发展，而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延缓这些事态的发生。一场口头攻击可以促成一次对抗，然而这时的军事形势却对我方的战略不利。这就是我的讲话何以如

此字斟句酌的原因：

我们认为苏联致阿尔及利亚总统的声明是没有助益的。我们认为空运军事装备是没有助益的。我们还认为，苏联迄今为止的行动并未构成星期一晚间我所指出的将威胁到缓和的那种不负责任的状态。当情况达到这种地步时，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象我们在其他历次危机中一样，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坚定的立场。但是在这个时刻，我们仍然试图使这场冲突有节制。在目前这个时刻，我们必须把苏联公开的宣传和他们在安理会的代表的行为所表现的相对克制态度同我们极不赞成的那些行动加以对比权衡。

对于苏联的空运活动，我同样地采取威胁和克制相结合的语气：

苏联的空运目前还是有节制的。但规模不小。它是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空运。必须根据它影响当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来处理这个问题。

就我们自己而言，你们都知道我们同以色列的确有一种不断发展的军事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将继续下去。关于最近的事态所造成的特殊形势，我们正在同以色列进行讨论。……

一位记者问我，阿拉伯人威胁要切断我们的石油供应，这是否会影响我们对以色列实行再补给的决定。我回答说：

在这场危机中，我们一直非常认真努力，要把阿拉伯人感到关切的事和阿拉伯人的看法考虑在内。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沿着我们认为正确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承担其后果。……

有人问我美国现在是否准备象在一九七〇年约旦危机中那样坚定，我以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警告口吻回答：“形势从来无法相互比较，但是在本政府整个任期中指导我们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是一贯的。……”我并公开简要地讲述了我私下向同事们阐明的我国的战略：

我们没有无缘无故地在公共讲坛上寻求对抗的机会，这种对抗只能加深分歧，并为谋求解决增加困难。……我们的目标是以这样的方式促使敌对行动结束，使得我们在敌对行动结束后能同交战各方以及安全理事会的常任

理事国保持接触，因为我们相信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在中东缔造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一事作出最大的贡献。

第一周的星期五上午，我同尼克松谈了一次话。他全神贯注于选择新的副总统这件事，一个在位总统能够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这还是第一次。我告诉他在包租飞机问题上我们持什么态度，以及我们对现已提出四十八小时之久的苏联停火建议进行阻挠的情况。

与此同时，多勃雷宁越来越坐立不安了。在一次午餐时，他气呼呼地拿出一份照会，上面没有签名，说要表示苏联领导对我指责苏联发表公开讲话支持阿拉伯国家一事感到“诧异”。难道我们不是也发表了许多讲话支持以色列吗？（他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它回避了究竟是谁开始敌对行动的问题。）照会还指责我国第六舰队向东调动，这支舰队现在正同苏联舰队一起在克里特岛附近盘旋巡弋。这些基本上都是无关痛痒的怨言，目的要表明苏联人越来越不耐烦了。我提到苏联的空降师处于戒备状态一事时，多勃雷宁的神情立即紧张起来。再也没有别的事情比证明我们收集情报的能力更使苏联官员生气的了——特别是当外交官没有获悉有关军事部署情况时更是如此。多勃雷宁很激动，他着重说明，大马士革受到威胁苏联不能漠不关心。如果以色列继续挺进，局势可能无法控制。我警告说，无论苏联进行什么形式的军事干预都将遭到抵抗，并将破坏美苏关系的整个格局。

在我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前，以色列通知我现在准备同意着手安排就地停火。我本来可以根据这一保证就采取行动，可是为了确保不出岔子，我问他们，关于时机问题有什么建议。三时十五分，沙列夫答复说，以色列虽然不坚持，但是更希望在星期六，也就是第二天下午以前不要把这项决议交付表决。不过美国可以斟酌情况开始进行磋商。五时五十分，我告诉在纽约的埃班，我们的目

标是明天下午较晚的时候以前不进行表决。为了使我们的策略协调一致，安排在第二天，也就是战争发生后的第八天，十月十三日星期六上午九时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下午六时五十分，我同英国大使克罗默勋爵联系，建议英国第二天在安理会提出就地停火。克罗默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但是显然他没有接到训令。我们必须等待，看看希思首相和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意见如何。

下午七时，苏联公使尤利·沃龙佐夫要求我们安排时间立即同多勃雷宁会见，据说他有一封“急信”要交给我。由于尼克松要在晚上九时宣布副总统的人选，我必须在八时三十分到达白宫（下午黑格已经告诉我这个人选是杰拉尔德·福特）。我可以在晚上八时在国务院会见多勃雷宁十五分钟。

七时四十五分，我预先通知迪尼茨，告诉他苏联将提交一份信件。他对我说，以色列对于多勃雷宁午餐时谈话中所包含的威胁感到很不安。梅厄授权让他告诉我，如果我认为合适，就在那天晚上提出停火决议。我表示不同意。没有人愿意在接到通知后这么短的时间就开始行动；而美国突然表现出焦急不安，这只能招致新的压力。我说更重要的是：“一旦你受到威胁，还是坚持原来的方针为好。”

这是我尽可能遵循的一条法则。一位领导人如果让人们知道他曾在恫吓面前屈服过，就只能招来更多的恫吓。一位享有在威胁面前坚强不屈的声誉的政治家并不能避免一切压力，但是他可以使它们减少到他的敌人们认为不可避免的那种程度。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够回避一切对抗，但是如果他慎重周旋，处事果断，他可以避免由于过分好战或过分柔顺而挑起对抗。

事态显然越来越紧张了。要末是苏联人感到胜利已经呼之欲出，要末是他们担心他们的被保护人的士气行将崩溃。在多勃雷

宁来到我的办公室以前，我得悉莫斯科首次发出带威胁性的公开声明。苏联通讯社塔斯社攻击“以色列军方”轰炸叙利亚和埃及民用目标的“罪恶行径”，他们说轰炸中苏联人遭到伤亡。塔斯社说，苏联对这些行动不能“漠不关心”。当多勃雷宁兴高采烈地来到时，他带来了两个而不是一个有关这同一题目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攻击“以色列空军对包括大马士革在内的埃及和叙利亚和平居民中心的野蛮轰炸。……”来信中还威胁说，以色列的居民中心不会无限期地不受侵犯。这封信还对以色列鱼雷艇对叙利亚港口中的一艘苏联商船进行攻击提出尖锐的抗议，最后还威胁说：“苏联自然将采取它认为必要的措施保卫它的船只和其它交通工具。”

苏联第二封来信纯属粗野无礼。苏联一直在对叙利亚和埃及进行空运，三天内总数约达八十四架飞机；自十月十日起我曾不断对此提出抗议。这并没有使他们不反过来指责我们对以色列进行再补给。他们指的偏偏是来回飞行运送装备的那七架以航飞机。大规模的美国补给行动尚未开始。

我简慢地驳回了这一抗议。至于轰炸，我对多勃雷宁说明了我已经向哈菲兹·伊斯梅尔通报过的话，即我们将尽力劝告不要轰炸纯粹民用的目标。我警告说，苏联无论用什么借口进行军事介入都将遭到美国军队的对抗。（要是我在任何其它日子提出这一威胁，可能会使人更加信以为真。因为就在这一天，国会通过了所谓战争权力法，旨在削弱总统在使用美国军事力量方面的决定权。）多勃雷宁指出，莫斯科的来信重申愿意“引导事态朝在中东实现停火的方向发展，”这是两天以前第一次向我们通报过的。我告诉他我已经要求英国研究第二天提出停火决议这个意见。

多勃雷宁刚走，克罗默就打电话告诉我，伦敦原则上愿意提出这样的决议，但是只有在决议能成功的情况下才提出。白厅坦率

地表示怀疑我的建议是否切实可行；白厅觉得除非以色列同意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否则埃及不会接受停火。（当然，伊斯梅尔对我们也是这样说的。）伦敦甚至怀疑以色列是否同意。对最后一点我了解得比较清楚；以色列也许太愿意着手停火了。这时我仍然过高估计开罗和莫斯科的亲密程度，我对克罗默说，没有得到开罗同意，多勃雷宁是不会同意着手进行的。但是过一会我就要在白宫宣布新副总统人选的仪式上仔细向多勃雷宁查问清楚。

时间刚够给迪尼茨简要地通报一下苏联送来的信息。我告诉他我们将增派一艘航空母舰到地中海去，同时，作为我个人的意见——尚未向总统汇报，如果“苏联人员、飞机或地面人员在这个地区出现”的话，我们将进行干预。迪尼茨和我商定晚上十一时左右碰头。

在白宫东厅举行的这次仪式结果成为痛苦的水门事件中一个令人心神不安的插曲。出席仪式的有国会领袖、内阁成员、白宫高级工作人员和外交使团中资历较深的成员（其中有多勃雷宁，他在华盛顿任职的时间名列第二）。仪式上笼罩着一种期待的气氛，就好象大家高声表达的善意能够驱散人们忐忑不安的心情似的，这种不安的心情是认为宪法危机不会到今晚上就结束，事实上最糟糕的事还在后面。挑选颇孚众望的福特激起一阵热潮，暂时冲淡了人们对这个行政权力机构日趋瓦解的国家前途的忧虑。在这十五分钟里，大家都压下内心的疑惧，对这个典型的美国人感到热诚爱戴，大家下意识地感到不久之后他就要接管我国的领导权。不幸，这种欢快的心情随着仪式的结束就消散了。

走出会场途中我同多勃雷宁谈了几句话。我对他说，英国人的印象是萨达特不赞成就地停火。多勃雷宁颇有应付局势的才能。他装出一副由于过份愚钝而常常上当受骗的美国人的神情说，当然他无权承诺埃及人将接受停火决议。然而，他可以向我保

证,如果我们根据埃及会接受的假定而提出这一决议的话,那末我们就是在进行一次“颇有获胜希望的赌博”。我理解这句话意思是说,苏联人知道埃及不会事先表示同意,但是他们将默认在没有同他们合作的情况下达成的停火。

我向克罗默通报我同多勃雷宁的谈话时,就是按照这种思路谈的。克罗默说,霍姆将在明天清晨同我联系——由于时差,使他有八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在各国首都进行磋商。我敦促他“在这些疯子改变主意以前”开始提出停火呼吁。

有关各方可能改变主意——其实他们是否拿定过主意也很难说——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可以从他们含糊其词的答复中,也可以从他们的军事部署中看出来。逐渐有些迹象表明埃及并未着眼于停火,而是致力于在西奈发动一场新的攻势,从他们沿苏伊士运河东岸的滩头阵地上打出去。他们正在把大炮运到运河对岸去;有报导说随后将运去两个装甲师。我仍然认为埃及不会许可它的坦克前进到地对空导弹保护伞以外的地方去。但是如果我的看法不对,那末停火倡议就肯定要胎死腹中。还有,苏联的空运活动规模日益增大。十月十三日,星期六,我们发现了六十七架飞机,大部分飞往埃及——这是为了促使埃及接受停火而给的一些甜头呢,还是为了增强他们继续打下去的决心呢?我们还得悉,苏联还曾试图商请伊朗允许军用飞机飞越伊朗上空前往伊拉克或叙利亚;伊朗国王没有同意,只准许一架据说载有供驻叙利亚的苏联民航喷气机用的零件的飞机过境。即使人们不相信有关载货内容的说法——我就不相信——伊朗国王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刻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对他帮的这个忙我们没有给予相应的报答。

那个星期五夜间,我在等待霍姆进行磋商的结果。十一时二十分时,迪尼茨来到我在白宫的办公室,同我进行了那个星期里又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见。因为这次谈话导致美国全力以赴地进

行一次军事空运。

安全助理的办公室三年以前已经从地下室搬到一楼的一间天花板很高的房间，宽大的落地窗接着天花板。结果，这个办公室看起来比实际的大一些；而且似乎同白宫的草坪连成一片，一直延伸到宾夕法尼亚大街，那里往返飞驰的车辆灯火依稀可见，但是声音却勉强可以听到。在这样安静的气氛中，迪尼茨忧心忡忡地介绍了军事形势。他回顾了军事部署情况，重申以色列愿意着手实现就地停火，花了好几分钟才在地图上找到各个部队的位置。我突然意识到以色列的武装部队那天并没有向前推进多少。我在外交上所进行的拖延其实是徒劳无功的。这引起了下面这段对话：

基辛格：你们要我们今天夜里就开始（外交活动）吗？你们今天发动攻势没有？我的印象是没有。

迪尼茨：没有。

基辛格：要是我们能使你们的行动在时间上配合得更好就好了——我认为要是明天没有军事行动，就会失去紧迫感。如果我早先知道今天你们不发动攻势，我本来会早一点开始外交活动的。

迪尼茨：我一定要告诉你：我们是否决定发动一场新攻势取决于我们的力量。我们曾经认为到这时候发动这场攻势的武器——炸弹、导弹等等都已经都运到以色列了。

基辛格：我也是这样想的。到底障碍在哪里？

迪尼茨说下午六时，他同施莱辛格进行了一次很困难的会晤，他未能使施莱辛格就武器援助问题作出明确的决定。施莱辛格在下午五时四十分时，曾事先向我通报，他即将向迪尼茨提出一项价值五亿美元的大量替换装备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十六架 F-4 鬼怪式飞机，三十架 A-4 空中之鹰式飞机，一百二十五辆坦克（其中有六十五辆 M-60 坦克），供三个隼式导弹营用的装备，和“一系列各种其它用品。”我半开玩笑地请他一定让白宫也得一点功劳。

迪尼茨这时向我表示不满说，这些供替换用的重型装备总是到得那么晚，那些运输供这次反击使用的消耗品的包租飞机耽误了三天。迪尼茨特别着重说明以色列的弹药即将告罄；如果不立即给予补充，以色列就会在两三天内耗尽它的弹药供应。叙利亚一线的攻势就势必要放慢，而西奈前线的处境就会非常危急。

有几个方面使人莫名其妙。迪尼茨从那天清晨起就力主实行停火，而并未提到具体缺少什么东西或者通知我们需要弹药。（事实上，第二天清晨我们收到国防情报局的一份材料估计说，以色列可以按照现在的消耗速度再打十天。）另一方面，以前的估计数字已表明极不可靠，根据平均数字办事，有可能使以色列缺乏关键的物品。我们不能再冒险。

我立刻打电话给施莱辛格，他表示感到惊奇；他简直不相信一支军队会把弹药用光而不事先发出警报。（几个小时以后，他对黑格说，据他看这与其说是军事上有必要，不如说是一种拖住我们的花招。）但是到此时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时只有表示坚决，才能制止苏联人一步一步地升级，并在其它国家卷入这场冲突以前说服阿拉伯人达成解决。

夜间零时五十分，在征求了黑格的意见后，施莱辛格和我决定采取三项临时步骤：我们将按照已经许诺给以色列的那样，派出十架 C-130 运输机装载弹药；我们将把补给品运往亚速尔群岛，由以色列人到那里去接运，这样可以缩短他们飞机的飞行距离，并且大大增加他们的运货量（因为需要的燃料减少了）；同时我们将继续催办包租飞机的事。我对施莱辛格强调说，那些担心阿拉伯人作出激烈反应的人应当记住，对我们在阿拉伯国家地区的利益威胁最严重的是战争长期拖延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一地区的激进化。施莱辛格同意这个看法。深夜一时，我把我们决定要采取的步骤通知迪尼茨。

至于包租飞机问题，必须决定的下一个问题是到底由以色列还是由美国政府出面承租这些飞机；也许我们应当使用美国军用飞机，例如远程巨型 C-5A 飞机。我稍微睡了几个钟头以后，于十月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同阿巴·埃班进行了短促的会晤。虽然迪尼茨现在就在他的身边，但是耶路撒冷还没有把昨天夜间商谈的详情通报给他。所以我们再次商议了空运问题。至于究竟是使用包租的美国飞机还是使用美国政府拥有的飞机会对阿拉伯世界产生影响一事，埃班认为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将在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白宫情况室举行特别会议，这件事将成为中心议题。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以前，我同尼克松谈了一次话。他兴高采烈，仍在为提名福特为副总统出奇制胜而洋洋自得。（尼克松推断）就他同国会的关系来说，短期内福特是一个有价值的因素。挑选福特担任副总统，将会削弱人们要弹劾他的愿望，因为国会不会甘冒风险，去任命一位被认为是没有经验的人负责外交事务。这是一个征兆，说明尼克松对于反对势力的决心多么大和总统一职所依靠的人们的信任遭到他破坏的程度多么深，判断又是何等地错误。尼克松认为，福特不会妨碍他的最终目标：一九七六年指定约翰·康纳利为自己的接班人。

象每一次公开表演取得成功之后一样，尼克松感到得意扬扬。他仍然为他在前一天晚上发表的简短优美的讲话受到鼓掌欢呼而沾沾自喜。他没有认识到，这首先是对福特所表示的敬意。他也尚未理解他的命运已经不再是玩弄策略手段所能改变得了的。的确，尼克松这场苦难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地步，即使福特真的象尼克松所想象的那样微不足道——福特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任命他为副总统也将加速尼克松的垮台，而不是推迟它的到来。如果民主党人认为尼克松的继任人看来是一个他们能够在一九七六年总

统大选中击败的人，那么就更想把尼克松赶下台了。

在我们谈到空运问题时，尼克松再次表现出他的敢作敢为精神。这时五角大楼已经找到了三架巨型 C-5A 喷气运输机，每架可以把六十到八十吨补给品直接空运到以色列去。尼克松立刻同意这项建议。他催促说：“现在就干吧！”

按照这样的指导方针，星期六上午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作出了一项干脆利落的结论。参加会议的有施莱辛格，他的副手比尔·克莱门茨，穆勒海军上将，肯·拉什，比尔·科尔比和我。我宣布开会时以尼克松的名义警告说，谁要是再推推拖拖，裹足不前，就撤他的职。会议其余的时间用于讨论空运的办法。大家仍然一致认为，对我们来说最妥贴的办法是由以色列出面包租飞机。但是越来越清楚，事实上我们不得不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包租这些飞机。在这种方式和直接的美国军事空运之间，很难看出有什么差别，因此要说有差别，就显得有些学院式的咬文嚼字了。还作出决定要大大加速 F-4 鬼怪式喷气机的交货；星期天以前以色列至少要得到十架，星期一另外得到四架。施莱辛格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报告说，这些飞机中第一批已经启运了。

到夜间十二时三十分，我已经可以告诉迪尼茨，在包租飞机问题解决以前，我们将使用 C-5A 飞机对以色列进行直达空运，已经运抵亚速尔群岛而以以色列航空公司无力承运的补给品将由美国的 C-141 飞机运往以色列，同时以色列短时间内就可以获得十四架 F-4 鬼怪式飞机。

星期天上午，即空运开始后二十四小时，我们向尼克松建议把这次空运当作美国的一项直接军事行动来处理。尼克松象往常一样遇到危机就振作起来。他谈到 C-5A 飞机时对我说：“我们反正要受到指责的，三架和三百架都一样。”他说得对。

进行再补给活动的这一段往事一个时期以来同美国的国内政

治纠缠在一起，而大量相互矛盾的指责和反驳象迷雾一般使人看不清楚这一行动所遵循的战略。因此，把十月九日星期二上午果尔达·梅厄发出戏剧性呼吁以后所发生的事件按时间顺序概述一下，是合适的。到十月九日晚上，以色列已经获得保证，它在战争中所遭到的损失将得到补充。有了这个保证，以色列加快了作战物资的消耗，这正是我们的意图。以色列方面的预测使我们起先认为主要的战斗到星期三就会结束，后来根据以色列的重新估计认为要到星期六结束。这时，将按照多勃雷宁星期三上午的建议开始安排停火，以色列星期五已接受这项建议。因此没有人认为军事上的紧迫需要使我们无法探索一种对以色列进行再补给的方法，这种方法对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和工业世界对石油的依赖产生的危害最小。我们这些负责我国国家安全的人，有责任把一切关系重大的考虑同全面的构想联系起来。

和我的同事们相比，我一贯极力主张加紧提供补给品，这并非由于我认为这些补给品会影响当前的战斗，而是因为我想对苏联的空运作出示威性的反应。然而，从根本上说，以色列的难题不在于我们进行再补给的速度，而在于它沉湎于昔日的伟大胜利，因而产生了安然自得的情绪。以色列的战略是建立在再次实现一九六七年闪电战基础上。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懂得，只要他们避免失败，他们的地位就可以依靠一场消耗战而稳步改善。他们的战线有些地方被迫后退了，但并没有被突破。他们给对方所造成的伤亡，使一个不到三百万人口的小国难以承受，尽管它是英勇不屈的。只是到了战争的第二个星期，以色列调整了策略，加上埃及犯下严重的战略错误以及美国大规模的再补给活动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双方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影响，只有这时战斗形势才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后来实际上，一系列的情况保证美国这次大规模的空运活动

能在最不易引起阿拉伯人愤怒的外交形势中进行。在十月十三日星期六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再补给的活动说成是对苏联的空运以及苏联未能履行它自己有关停火倡议的诺言所作出的反应。因为在我们开始实施多勃雷宁十月十日星期三提出的建议时，立即暴露出该建议没有实际内容。

十月十三至十四日：停火未成

在星期五夜间同英国人商谈以后，我预期会在十月十三日星期六早晨接到他们对苏联所提的停火倡议作出经过深思熟虑的答复；原定计划是当天下午早些时候由英国在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决议，要求就地停火。因此到星期六上午九时三十分我们还未听到任何消息时，我感到很不安，因为这时在中东已是傍晚时分，亚历克爵士所进行的磋商活动应该已经完成了。

因此，我就打电话给多勃雷宁说，如果中午以前我们还接不到英国人决定如何行动的消息，我们就要请澳大利亚提出停火决议案了。多勃雷宁说他得向莫斯科请示，不过“我看这没有多大区别。”我说我们看到一些迹象，表明埃及对西奈的攻势已是箭在弦上，我警告说任何欺诈行为都将严重损害我们之间的关系。多勃雷宁说他认为，不管有关各方采取什么无法逆料的行动，我们应当坚持已经商定的方针。他认为等安全理事会就呼吁停火的决议进行表决时我们联合投弃权票，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刚同多勃雷宁谈完，亚历克爵士就来电话。为了理解他的影响，必须就我们对他的评价说一两句。虽然他不擅长分析，但是他却是我所知道的最明智的人士之一。他为人正直，连批评他的人也佩服他三分，在当代政治家中实属罕见。他办事公正，实事求是，本性如此，无需申述。因为他为人十分忠诚可靠，所以他的

话受到人们的信赖，即使有时这些话是逆耳之言。因为他考虑问题很慎重，所以他的意见在每次磋商时都最受重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身体力行的准则比口头上的主张更加受到人们的信赖。霍姆使别人对他产生充分的信任。他同人谈话时表面上从不坚持己见；他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引导人们达到他所希望得出的结论，谈话既精辟深入，又咄咄逼人，而谈话的方式却又极为谦虚委婉。他对美国无保留地持友好态度。他和我们一样拥护自由的价值标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再也没有比他更加受到我们信任的人了。

霍姆现在认为就地停火纯属空中楼阁。萨达特要求以色列承诺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疆界去，任何比这低的条件，他都不会接受。除非莫斯科愿意切断对萨达特的军事供应，对他施加压力，否则我们的建议就不会成功；霍姆不相信苏联人准备走那么远。霍姆提出一个替代的方案，主张就地停火，成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进驻各被占领土，然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色列绝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方案，在有些方面这一方案比萨达特的方案对以色列更不利。归根结底，建立一支国际部队的先决条件是以色列几乎必须立即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去，而另一方面萨达特现在所要求的不过是原则上同意这样做。我对霍姆说，这一方案过于复杂；我们不支持。（一个小时后，我请克罗默转告霍姆，事实上我们将否决这一方案。）

我对霍姆解释说，多勃雷宁的提议似乎是根据这样一个设想：即萨达特不会事先同意停火，但是对于两个超级大国支持的安全理事会的一致意见他会表示服从。很难设想苏联人会蓄意告诉我们假情况，从而甘冒丧失我们对他们的信任的风险——特别是因为他们的骗局几乎立即就会被拆穿。他们从中能得到什么东西呢？必须承认，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此，英国提出一项停火建议，考验一下这个设想，又会有什么损失呢？霍姆

说他担心未经萨达特事先默许就采取行动，会损害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好处。不管怎样，他想再向开罗方面核对一下情况，看看我的假设是否正确。

我立即把霍姆的消极看法告知多勃雷宁。多勃雷宁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他重申无论萨达特怎样想，苏联都要在停火决议案交付表决时投弃权票。这一计划的唯一障碍是英国不肯提出萨达特不同意的决议案。多勃雷宁建议说：“也许我们应该去找澳大利亚人。”我说，我们听到霍姆的回话后有可能这样做。

下午一时四十分，多勃雷宁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澳大利亚方案”并非“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案。”这简直令人莫名其妙。如果莫斯科想要停火，而且假定它确信能使萨达特就范，那么由谁提出决议案都不会有什么关系。拒绝让澳大利亚提出，只能意味着克里姆林宫断定霍姆对萨达特的估计大概是正确的，它不愿付出使他不悦的代价。（当然除非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精心安排的诡计。）我对多勃雷宁说，请他牢记，国际事务中“没有轻易的胜利。”

在等待英国最后的答复时，我命令斯考克罗夫特作好准备，“把大量的物资投到那里去。”如果停火建议由于缺乏苏联合作而陷于失败，那必定是由于他们预期阿拉伯人要打胜仗，或者由于他们不愿意为达成折衷方案而付出代价。无论情况怎样，我们的方针是清楚的。我们必须在战场上造成一种局面，迫使有关各方重新估计他们所处的地位；“我们不能让以色列战败。如果苏联一方获胜，我们的处境就会很糟。”然后我对黑格说，如果停火倡议失败，我们就不得不使用一切可用的飞机，把空运活动扩大到最大的规模，无论发生对抗的风险有多大也在所不惜。只有战斗形势再度发生转变，才有可能再次进行谈判。

十月十三日下午三时三十五分，霍姆打电话通知我们英国的

最后答复：萨达特拒绝接受任何和他的停火方案不同的建议。如果不顾他的反对而提出这样的建议，如果由于苏美弃权而使这一建议有获得通过的危险，萨达特就要要求中国否决这一建议。法国大使对萨达特的看法有类似的印象。霍姆问我缓和是否仍然是我们采取行动时考虑的因素。我对他说：“缓和本身并不是目的。我认为现在事态发展正驱使我们走向对抗。”

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情报看来都表明事态确实如此。到现在为止一直小心保存未用的埃及第二十一装甲师已经开到苏伊士运河对岸去。至少有另一个装甲师也准备随后开去。

现在木已成舟；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再运用权术就等于自杀，而踌躇不前则会带来灾难。想通过使各方权衡自己的利益促使他们结束战争，或者劝说苏联人支持这一方针，目前还不可能。唯一的办法是迫使各方改变对自己利益的看法。我们将大量运送补给品。我们将甘冒发生对抗的风险。要等到人们毫无疑问地认识到不能把一项解决方案强加于人时，我们才参加谈判。

只有当一个人被认为有选择余地时，和解才是有意义的。当我们决定从事大规模再补给活动时，我们无法知道阿拉伯国家是否会以激烈的敌对行动来抵销他们所遭受的挫折，或者苏联是否会接受这一挑战并组织一批国家在整个这一地区损害我们的利益。可是无论怎样我们别无他法。如果苏联武装的国家获胜，苏联人就会控制战后的外交。如果以色列未能迫使对方决定停火，它就会陷入一场消耗战，在这场战争中，即使象以色列人那样有勇有谋，也无法克服全国人口同对方人口为一与三十六之比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困难。

但是上周的事态发展表明我们开展外交活动所依据的基础是何等不牢固。如果我们迫使各方摊牌，我们就会单独和以色列站在一边；我们在联合国将不可避免地处于孤立地位。不管我们认

为苏联是口是心非，还是混淆视听——目前我们对它看法不佳——可是他们还没有设法在联合国使我们为难。他们还没有在联合国提出埃及关于把停火同恢复一九六七年边界联系起来的主张，而这种主张很可能迫使我们投票否决一项阿拉伯国家所珍视的目标的。可是，在这段时间内还远远不能说莫斯科肯帮我们的忙。很明显我们面对着阿拉伯国家的压力、欧洲国家的疑虑和苏联的机会主义，这三者结合起来给阿拉伯人的冒险行动提供了某种保证。对于埃及和叙利亚来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情况于他们不利，他们总能够在联合国找到足够的多数票支持就地停火。而我们却无法长期阻止停火而又不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

我通知迪尼茨我们决定竭尽所能并且动用美国全部军用飞机进行这次空运，然后我敦促以色列加紧进行这场军事攻势，以便能在这个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以后的四十八小时内胜利结束这场攻势。我们无法拖延再长的时间，而且由于许多国家都知道我们不久以前还主张停火，现在要否决它，我们无法自圆其说。

苏联的举动仍然使人莫测高深。难道他们一直是在欺骗我们，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停火？他们是否是在玩弄权术以便延长这场战争？我通知多勃雷宁英国拒绝提出停火决议案时，向他提出了上述指责。他采取守势，但是反过来问我这种手段对苏联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也把我问住了，所以我就漫不经心地提出了预期在第二天发动的埃及的攻势的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并不能说明什么。七十二小时以来是我们在进行拖延，以帮助以色列人打败叙利亚；苏联人在星期三就愿意着手实现停火了。任何手法都躲不过多勃雷宁的眼睛，他早就懂得了我们的战略。他问，我是否认为苏联进行拖延的目的是让以色列打败叙利亚人？“这种假定太有意思了。”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萨达特在自传中断言，苏联自开战第一天起就一直催促他实行就地停火。他们一直等到十月十

一日星期四才开始给埃及提供补给品，并且一直等到那天上午才运去相当大量的补给品，那已经是十月十三日星期六，战争打响后一个星期的事了。

已经发生的情况是，苏联人试图左右逢源：一方面同我们搞缓和，另一方面对他们的阿拉伯盟友提供足够的支援，以便在事情顺利时使他们自己处于不可缺少的地位，但是支援不要太多，以免同美国发生对抗。克里姆林宫可能也盘算着，认为如果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在苏联武器的支援下已经多占了土地，而以色列的反攻尚未取得决定性的结果，这时如能诱使美国同意实行停火，那末苏联在中东的地位就会得到加强。即使到了十月十三日，在以色列对叙利亚取得胜利以后，再实行停火，至少也会使埃及在军事上处于非常强有力的地位。但是萨达特要末是由于军事上的胜利使他忘乎所以，要末是出于对叙利亚的忠诚去减轻他的盟友所承受的压力。我们没有直接听到叙利亚的看法，但是如果他们讲的不比开罗的盟友和竞争对手更强硬些，也就表现不出他们的特点。欧洲各国人士当时正在讨好阿拉伯人，因此客观上鼓励阿拉伯人持有一种无根据的安乐感。苏联人不愿对萨达特施加当时本来会使他同意实行停火的那种压力。

过高估计对手的战略远见是错误的，估计过低也是危险的。最初美国和苏联遵循类似的战略，各方都想设法使自己的盟友能够在战场上占上风。当逐渐形成僵局时，各方开始给自己的盟友提供消耗品。我们动手早一些（星期天我们授权使用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苏联在星期三投入空运活动，规模比我们大得多。要不是在包租飞机问题上发生混乱，我们本来会在星期四晚上或星期五上午就进行同样规模的空运。到星期天时，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和苏联相比，规模不仅相当，而且有余。

然而，我们有两项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的盟友从根本上说比

较强大并且能够较好地利用补给品。同时我们准备比莫斯科冒更大的风险。一旦僵局已形成，无论是由于苏联的阴谋或者它的步调紊乱所造成，我们都将立即采取决定性的乃至残酷的步骤来打破这一僵局。在尼克松第一届任期内，主要是在他的教导下，我学到了一件事，即一旦一个大国对一件事作出了承诺，它就必须取得成功。如果由于内心疑虑不安而在行动上举棋不定，是得不到荣誉的。无论作出决定之前心情怎样矛盾，作出决定之后就必须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沿着已经开始的道路坚持走下去。否则，会由于它的决定而引起争议，同时还要加上一个无能的名声。

无论如何，一旦我们得悉伦敦表示不愿提出停火建议而莫斯科拒绝接受由澳大利亚代替英国行事，我们就会这样作的。我立即向多勃雷宁发出警告：“我们现在准备对这件事撒手不管，不负任何责任，任其自然发展。”后来我告诉斯考克罗夫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既然我们已经陷入一场对抗，我们就应当全力以赴。”我指示他用船把装备运往以色列，以免停火使各方的空运结束，从而使以色列的生命线突然中断。我通知克罗默我们正着手对以色列进行空运，言外之意——并不完全准确——这是由于停火倡议失败的结果。克罗默问我：“要是阿拉伯人大吵大闹要用石油对付你们，你们持什么态度？”

我学着丘吉尔的口气回答说：“不予理会。”

“仅仅不予理会？”克罗默相当合理地提出疑问说：“情况会很困难的，对吧？”

我说：“我们没有选择余地。”

与此同时，我们得到葡萄牙的同意让我们使用亚速尔群岛的拉日什机场作为加油基地。十月十二日星期五我们第一次去接洽时，葡萄牙政府采取敷衍的态度。这个国家无意引起阿拉伯国家的怨恨，而想迫使我们提供一些军事装备供他们在莫桑比克和安

哥拉进行殖民战争之用。这一点我们不准备同意。因此我就起草了一封总统致葡萄牙总理马尔塞洛·卡埃塔诺的信，口气异常粗鲁无礼，表示拒绝提供军事装备，并威胁要抛弃葡萄牙，让它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听任命运的支配。到星期六下午过了一半时，葡萄牙人同意给予我们在拉日什空军基地无条件的过境权。

十月十三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在空运活动已经展开之际，尼克松和我对局势进行了详尽的审议。我们认识到如果埃及人的攻势取得成功，以后二十四小时内战争就可能发生对我国不利的决定性的转变。我推测说，一旦埃及坦克冒险开到他们的防空导弹掩护范围以外，以色列空军就可以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并且粉碎埃及投入这场攻势的主力。但是那些阿拉伯人的确很趾高气扬。如果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占了上风，我们就真得“勒紧裤带了。”尼克松认为以色列的武装部队还没有退化得这样快，以致在一场双方全力以赴的激战中会打败仗。但是他也认为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场意志的较量，他说这就是“那种关键时刻之一，”而“我们这些人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而到这些岗位上来的。”

尼克松置他的痛苦处境于不顾，坚决要把这件事干到底。没有哪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能说服他改变我们的方针。如果说他的痛苦的经历使他不如今前那样全神贯注，那末这种折磨却使他更加镇定自若，好象一个人经历了最糟糕的时刻，从今以后再没有什么事可以使他惧怕的了。老实说，他大概宁愿把他的前途押在捍卫他心目中的自由人民的利益上，而不愿押在为一些事件所进行的可鄙的诉讼的结局上，对这些事件他显然已无法控制了。*

正如往常那样，一旦美国采取坚决行动，苏联人就开始后退。那天傍晚，我们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口信”。口信说，苏联两天

* 指为水门事件而进行的诉讼。——译者

以来就准备实现停火，但是在美国进行拖延时，阿拉伯国家改变了主意。我话中带刺地对多勃雷宁说，也许苏联与日俱增的空运（现已达到每天一百四十架）对阿拉伯人的这种决心不无贡献。多勃雷宁重申，他的领导人希望已经发生的事不要破坏已经取得的全部成果。但是我认为说些息事宁人的原则性的话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是否能取得差强人意的结果，取决于我们能否使苏联人相信，我们方面既不会为了维护缓和也不会由于担心阿拉伯国家的反应而畏缩不前。我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听任缓和被用以攫取单方面的好处。不要认为我们会接受在中东遭受的军事失败。”我把我们在包租飞机问题上所发生的官僚主义的混乱说成是出于好心，声称我们有意推迟进行空运以便使外交活动能发挥作用。但是埃及建议中把恢复一九六七年边界作为停火的一个先决条件，这过去是、今天仍然是“不能接受的。”我们顶多可以考虑在停火决议中提到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号决议，但是我们不会超出这一点或者更确切地阐明“安全边界”这些词的含义。我说，从根本上说，我们将听任事态自行发展三四天，然后再看当时的形势如何。我们准备讨论中东的一项解决方案，但是那只是在停火以后。莫斯科不要认为可以用军事手段对我们施加压力。多勃雷宁并不急于要进行争论。他向我保证，他将把我所说的一切原原本本向上汇报。

在几乎每一次危机中，总有这么一个时刻，无论它是多么转瞬即逝，却传递了一种准确无误的信号：对方不准备把事态推向对抗。勃列日涅夫的口信和多勃雷宁的缓和态度说明一个问题，如果莫斯科不改变主意，我们有可能把我们的新方针贯彻到底。新的一幕戏剧已经开演，第一景将是西奈的坦克战。

十月十四日：战场上僵持不下

现在一切取决于我们打这手牌时是否冷静而审慎。埃及象人们预料的那样在十月十四日星期天发动了对西奈的新攻势——主要为了减轻叙利亚所承受的压力。但是这一战斗我们无法控制。在激战正酣之际，我们审查了我们的计划，并试图减轻我们的决定对阿拉伯国家产生的影响。那个星期天上午，我和尼克松又讨论了一次。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西奈的战斗不会打多长时间。双方的补给品都得从遥远的地方运来，并且很快就消耗完了；沙漠是不适合进行持久战的。

当天上午九时十六分召开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空运的技术问题。我们将放弃包租商用飞机而采用美国直接进行军事空运的办法。当天的下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主要当事人知道我们的意图，并牢记最终要结束这一日益加深的冲突。中午时分，我告诉多勃雷宁说，苏联的行动使我们不得不进行一次规模相当大的空运。我警告他不要增加赌注；我们有能力扩大空运的规模，同苏联的任何升级行动相匹敌。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准备一旦实现停火就停止空运。多勃雷宁态度缓和地说，他将把我的话“逐字逐句地”向他的领导人汇报：“让他们知道你们的心情是很重要的。”

当天晚上我给在开罗的哈菲兹·伊斯梅尔发了一封电报请他转达给萨达特。我已指出过，只有外行才会认为，聪明的外交手法是在不同的各方面前各说一套。事实上唯一保险的设想是假定各方都要交流情况，特别是在中东，背后传话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我在电报中特别强调苏联曾声称埃及准备接受停火，而我们根据苏联这一说法努力安排停火，但未成功。我着重指出苏联对中东实

行空运，美国不能置之不理。当然，萨达特会认为，由于苏联正在武装埃及，美国就有权武装以色列，这是言之成理的，或者由于我们挫败了埃及的军事努力，美国就有理由在和平进程中发挥某种作用：

美国方面愿意通知埃及方面，美国准备在停火实现后立即停止自己的空运补给活动。

美国愿意再次着重说明，它认识到埃及对最近的敌对行动爆发以前所存在的状况感到不满。美国方面将在敌对行动结束时立即进行重大努力，协助在中东实现公正而持久的和平。美国仍然希望保持同埃及联系的渠道，即使在事态急迫的情况下也如此，因为这种渠道是在克服了如此多的困难后才建立起来的。

美国将尽全力按照这个意思行事。

还有另外一个美国指望发挥节制作用的国家，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决定通知它，那就是沙特阿拉伯。尼克松对坚定亲西方的费萨尔国王怀有高度尊重和友好的感情，而无需接受他所代表的国内复杂结构的各项原则。当时我对沙特这个国家或者他们执行政策的那种间接、随机应变和巧妙的方法还毫无经验。沙特阿拉伯拥有人们难以想象的财富，经济却不发达。它正处于由封建主义向不定的未来过渡的过程中。它的目的首先是要避免公开对抗或者发表毫不含糊的声明，力求促进自己的安全而不使自己暴露于直接挑战面前。它的领导人力图使人们认为沙特阿拉伯的政策是平衡各国利益的结果，而不是为了申张沙特的自我意志。他们可以默认他们不愿公开倡导的事；在那些他们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支持的激进计划遭到挫折时，他们会在私下感到宽慰。后来，我逐渐懂得，对那些他们无法影响的事，对那些他们如果明确采取立场就会危及他们小心翼翼地搞平衡动作的事，想要求他们表示赞同，那对他们并没有好处。

可是当时我还没有这种眼力。因此，十月十四日，我们给费萨尔国王发去了两封信：第一封是以尼克松的名义，第二封以我的名义。按照既定的程序和当时尼克松全神贯注于水门事件的情况来看，这两封信显然都是在我指导下在国务院起草的。但是事后很难从内容上证明的确如此——除非我们有意决定要采取一种高层和低层路线双管齐下的作法，而这一点我现在执笔时仍然无法忆及。尼克松的信从心理上说是恰到好处。信中没有提到空运，仅仅要求沙特方面理解我们致力于结束战争和谋求实现持久而公正的和平。信中提请注意尼克松九月五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会上尼克松断言，美国既不亲以色列，也不亲阿拉伯，而是亲和平。信中娓娓动听地说明尼克松愿意齐心协力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信中既没有要求费萨尔对任何东西表示同意，也没有把那些一旦指出他就只能表示反对的形势发展正式通知他。

为尼克松起草而由他自己签名的那封信，道义上站得比较高，相形之下，为我起草的那封信语气生硬笨拙，这封信正式把我们对以色列的空运通知沙特阿拉伯，从而迫使它表明立场。我用和致埃及的函电几乎完全相同的词句说明了我们的推理。但是埃及是在为自己而战，它还有选择余地，可以为了较大的目的而在它的部分目标上作让步；而作为旁观者的沙特阿拉伯却没有这样做的余地；它不得不无条件地支持其它阿拉伯国家。

最后，我同伊朗国王进行了接触。他的国家是我国中东政策在东端的支撑点。他的武装部队由我国加以武装，制约着伊拉克在波斯湾的野心，并限制了激进国家可以投入中东战争的兵力。一九七二年四月，伊拉克同苏联缔结了一项友好条约，这类条约在其它各国总是意味着不仅牵涉到武器供应，而且也要在外交上步伐一致。此外，伊朗有一段漫长的边界同苏联接壤。伊朗在西方战略中的作用是对苏联的侵犯构成一道屏障，除非全力入侵，否则无

法逾越；并且协助保障这一至关重要的波斯湾政权不致分崩离析。这是一种互利关系。伊朗在捍卫自身的独立时，对于那些对我国和我们的盟国，即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安宁不利的各种阴谋，也起过抑制作用。

自伊朗国王被推翻以来，波斯湾地区即陷入持续可怕的动乱。这就最雄辩地表明他对自由世界的安全作出了何等的贡献。对我们来说，他已在十月战争期间引人注目地证明这一点。伊拉克没有敢于派出多于一个师的部队进入叙利亚，它也没有胆量敢威胁它的其他邻国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伊朗是唯一拒绝准许苏联飞机飞越其领空的国家——我们有些北约盟国却未觉得自己已强大到足以采取类似的抗拒行动。我们在印度洋的舰队在伊朗补充燃料。而且伊朗国王继续同萨达特保持密切关系。战后萨达特着手实行他那英勇果敢而险阻重重的缔造和平的方针时，伊朗国王则在道义上、政治上和物质上给予他支持。

伊朗国王虽然执行一条并行不悖的政策，但他却坚持要我们证明拟议中的方针加强了这一地区温和的政权。当涉及重大决定时，我们应确保让他理解我们的推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于十月十四日写信给伊朗国王，这封信表明了盟国和傀儡国家的区别：

美国试图在中东冲突问题上以这样的方式行事，使它能够解决这一地区的各项问题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这既包括结束当前的敌对行动，也包括在公正的基础上实现持久的和平。……

有一个因素必须经常铭记在心。我们希望国王理解，阿拉伯国家如果在目前这场冲突中借助于使用苏制武器而取得胜利，加上一九七一年印巴冲突中使用苏制武器获胜一事，肯定会使该地区的各国政权转向激进，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全球。

国王应当知道我们深刻铭记上述各项考虑，正尽力促使战争结束。我们诚恳希望国王不要受一时策略考虑的左右而损害了我们两国共同致力实现

的重大战略目标。当然，总统非常赞赏国王在拒绝允许苏联军用飞机飞越伊朗国境一事上所表现出的勇气和领导风度。

当战斗形势发生转变或者其中一个主要成员对形势进行重新估计时，僵持局面就会终结。十月十五日星期一清晨，两种情况都出现了。埃及深入西奈的攻势失败了。两千辆左右的坦克投入了历史上少见的一场坦克大战。埃及坦克一旦离开他们的防空导弹掩护圈，埃及就容易遭受以色列空军的袭击；至少二百五十辆坦克在以色列装甲部队、反坦克武器和空袭的联合打击之下被摧毁。以色列上一周所遭受的挫败现在颠倒过来了。没有大炮和防空武器的支援，在战场上坦克就要丧失优势。现在以色列就要开始在南线大力向前推进了。

同时，苏联人开始表示对我们的主张感兴趣。多勃雷宁通知我，莫斯科正在研究我们如下的建议，即把停火不是同以色列撤退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而是同一般重申第二四二号决议联系起来，这一决议在这一点是含糊的——至少以色列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们对此也没有表示异议。如果这种表述方式最后为各方所接受，就可以导致在安全理事会迅速取得进展。

十月十五至十六日：形势再度发生转变

在十月十五日上午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穆勒海军上将估计在埃及的攻势最终被击退后，以色列要再用三到四天的时间突破埃及的防线。这一估计后来证明是保守了；事实上，埃及防线从来没有被突破而是被绕过去了。

我们的空运进行得十分出色。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国国防部所作出的表现是任何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C-5A飞机开始时是每天四架，以后增多了。全部飞机，其中有C-5A、C-130和

C-141, 每天共二十次飞行, 平均运载一千吨装备, 或者说每小时五十吨。我们在第一天的空运量就比苏联过去四天中向所有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运送的总量还要多。我们无可改变地注定要超过苏联的再补给活动。已经运到了一千八百吨, 还有三千吨正在途中。我多少有些发泄怨气地对施莱辛格说: “应当说你要想干的时候, 真了不起。要是不想干的时候, 可也真叫人害怕。”这话并不错, 但是没有必要这样说, 这使我们两人后来在福特政府时期的关系几度出现紧张, 施莱辛格也针锋相对地回敬我。科尔比明智地建议我们不宣布空运的有关数字, 让苏联自己去发现它的规模。

在尼克松第一任期内我就懂得了, 在对手软下去时, 我们决不可以放松压力。正确的战略是把两个看来似乎互相矛盾的方针结合起来: 加强压力并给日益陷于困境的对方指明一条出路。我向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提出了这两种作法。至于压力, 我的论点是:

我们能结束这场冲突的唯一办法是让苏联人看到我们既不会撒手不管, 也不会惊慌失措; 让欧洲人看到他们必须在丧失他们的北约组织的关系和同我们站在一起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这对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也有好处, 并将限制苏联的冒险主义。当欧洲人重新心平气和地看问题时, 他们就会认识到我们是帮助朋友的。

同时我指示各机构避免使用对抗的语言, 并且不要为这次空运自鸣得意。这是为了使苏联人不要增加赌注, 并且使安全理事会进行审议前气氛平静下来。如果穆勒的估计正确, 这次安理会的审议大概将在周末举行。

几乎与此同时, 尼克松主动地插进来一段公开讲话, 这段讲话肯定会增加阿拉伯国家的威胁感。在那天给九名武装部队成员颁发国会荣誉勋章的仪式上, 他即席发言说, 我们的政策同一九五八

年在黎巴嫩或者一九七〇年在约旦所奉行的政策相似：是为了捍卫每个中东国家在独立和安全中生存下去的权利。这种类比不尽合适。在一九五八年，温和的阿拉伯人把我们进军黎巴嫩看作是对他们安全的重大保证。而在一九七三年，说得婉转些，即使最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也不认为我们现在所维护的国家以色列的安全是一项重大的利益所在。至于黎巴嫩，他的意思是，为了以色列的安全，我们不排除要进行军事干涉。当报界大量提出问题时，我并没有从这一暗含的威胁后退，尽管我并不主张提出这样的威胁。我指示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简单回答说，总统谈的是“原则”，不是策略——这句话意义如此含混，致使此刻撰写本书时我也不明白它的确切意思。

考虑到我们所采取的强硬姿态，对我们前一天的信件的反映使我感到惊异。各阿拉伯国家可能尚未了解我们进行空运的规模，但是他们一定知道规模是相当大的。然而初步反应比预料的温和。十月十五日，伊朗国王回信给我们。他只说了一点，若干时间以来他就向我们发出警告，提醒我们注意如果苏制武器在又一场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可能在这一地区产生巨大影响。换句话说，他和我们意见一致。

十月十五日傍晚，伊斯梅尔回信给我，他的答复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说是异乎寻常的。他重申埃及“决心”保持“这一特别联系渠道”畅通。任何其它方面都不能以埃及的名义讲话；换言之，如果莫斯科所作的解释和开罗直接对我们讲的不一致，我们就不要去理睬它们。伊斯梅尔否认埃及有任何要使以色列丢脸的意图，“因为埃及尝过丢脸是什么味道。”他表示他“赞赏”我们争取实现停火作为实现政治解决的初步措施的努力——尽管这同埃及的看法相反。然而，经验使埃及怀疑这种分两步走的办法是否切实可行。简言之，伊斯梅尔对向埃及的敌人提供武器装备的主要国

家讲话的口气，象一个温文尔雅的处理实务的人向另一个这样的人讲话一样。他之所以反对我们的做法，是由于这种做法并非切实可行；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我们的外交可以成功，那么埃及也许可以改变态度。

只有这时伊斯梅尔才提到空运，斥之为“不能接受的”，前几次我们向以色列出售武器时他都是这么说的。但是他没有多谈这个问题，也没有威胁我们要承担什么后果。相反，他力促我加倍努力，把政治解决同军事解决联系起来。然后，令人惊异地他竟然邀请我前往埃及访问：

埃及感谢基辛格博士作出的努力，欢迎他来访。埃及准备在两项原则范围内讨论任何问题、建议或项目，这两项原则是，埃及不能在领土或主权方面作任何让步，我们相信基辛格博士不反对这两项原则，任何人都不会反对。

谨致最热烈的问候。

哈菲兹·伊斯梅尔

这是一位政治家的来信，因为毫无疑问，伊斯梅尔是以萨达特的名义讲话的。随波逐流是容易的；判断潮流的方向就比较难了。但是只有最明智的领导人才具有远见卓识，可以高瞻远瞩，并为了遥远的目标而抗拒一切压力。萨达特知道我们正在努力挫败他的军事计谋。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利用我们的空运为他的挫折辩解，而西奈攻势失利已使这些挫折无法避免了；他本来可以发动阿拉伯世界的下层群众反对我们，正如纳赛尔在一九六七年面临着比现在小得多的挑衅时所作的那样。但是萨达特已经对为徒劳无益的事业而流血感到厌恶了。他不愿为取得进展而大造声势。他和纳赛尔不同，认为充当那些把响亮的词藻误认为是成就的激进阿拉伯人的领袖没有什么前途。他已经看透了苏联支持的份量：总是使局势保持足够高度紧张，但永远不足以解决问题。

但是不应当认为萨达特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他懂得怎样捍卫他的祖国的利益。他一方面在公开发言时注意分寸，彬彬有礼，另一方面他又要让我们意识到他还有其它的选择余地。毫无疑问，他是即将对我们实行石油禁运的监护人。他就是以这种复杂的方式，完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业绩，开始疏远他还完全依靠其武器供应的苏联，并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向正在挫败他的短期图谋的我们。在大战正酣之际，他却开始走上了通向和平的道路。

沙特人对我的信件的答复却复杂得多。副首相法赫德亲王通知我们说，局势正在恶化。他觉得美国的朋友现在是进退两难，一筹莫展。如果阿拉伯人“获胜”，中东即将落到苏联手中。如果阿拉伯人“失败了”，可以指望苏联来重建阿拉伯各国军队；苏联顾问将被邀重返埃及。形势的发展将使任何阿拉伯人都不可能自豪地说自己是美国的朋友。

对于法赫德的分析，即我们和他面临的两种选择，我们并无异议。但是我们开列了一张不同的资产负债表。和借助苏制武器取得胜利相比，失败后由苏联重建阿拉伯各国军队这一风险，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两害中较轻的一害。我们决不认为我们所寻求的和平会使苏联人的地位有所改善。老实说，我们的整个战略目的恰恰相反。埃及的函电表示有摆脱苏联指导的意向；我们决意要探索这一前景。

第二天，十月十六日星期二，费萨尔国王答复我十月十四日去的信。他的复信主要是表示痛心而非坚持己见，他显然把我的信归之于对沙特事务缺乏经验。他表示，大国之间的激烈斗争，使本地区所有国家均面临毁灭的威胁，对此他感到“极为悲伤”。费萨尔没有进行任何指责；他更没有把当前这一危机归咎于美国。他重申了萨达特要求以色列撤回到一九六七年边界的建议。他敦促我们停止向以色列运送任何武器。但是如果我们不听从这些意见，

对此他规定了一项含糊而间接的惩罚：如果我们不停止对以色列的支援，沙特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成为“不冷不热”的状态。我们相信我们不得不冒这种风险，以便促使中东的力量对比对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比较有利——即使他们对我们实现这一事态的手段不得不表示反对，我们也要这样做。

沙特副外交大臣易卜拉欣·马苏德采取了比较具有威胁性的步骤，他召见欧洲共同体各国大使向他们提出警告说，如果他们不促使美国改变政策，沙特阿拉伯就要削减石油生产。我们知道石油部长亚马尼已经首途前往科威特，参加一次阿拉伯国家石油部长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我们开始空运以前提出召开的。当时我还不懂得——虽然我很快就懂得了——沙特阿拉伯不愿和激进的阿拉伯国家直接对抗，就象它不愿同我们直接对抗一样。沙特王国认为它的安全取决于它是否能把它自己装扮成勉强执行别人决定的人。即使我们懂得沙特人的方法，并且知道沙特王国很可能会把他们的决定说成是维护阿拉伯团结的需要，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奉行我们已经着手执行的方针。摇摆犹疑只会延长战争并因而使战争有扩大的危险。沙特阿拉伯的长期态度将取决于我们对战后缔造和平的进程所作出的贡献。而在这一点上，埃及是关键。而且沙特担心苏联将再次打进中东一事也将在埃及受到考验。

这些考虑使我们对伊斯梅尔前一天晚上的信迅速作出答复。十月十六日上午九时零八分，我复信给伊斯梅尔，表示我们同样重视我们之间的特殊渠道。但是我也感到由于事态即将到达摊牌的地步，把问题讲得更具体一些的最适当的时机已经到来。要紧的是使埃及人认识什么是可能作到的事。我们必须给萨达特一个借口，使他能从一个钟头前在议会的演说中再次公开提出的不可能被接受的条件上降下来，这次讲话是以致尼克松总统的“公开信”形式

发表的，他提出以以色列立即撤回到一九六七年边界为条件实行停火。萨达特在一段显然指的是他对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的经历的话中说：“我们不准备接受可作各(种)解释的含糊诺言或者有弹性的词句，从而浪费时间并使我们又恢复僵持局面。”

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说服萨达特，一方面使他相信目前可以实现的事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使他相信我们要在这个限度内严肃认真地作出最大的努力。人们常常想把棘手的问题交给赋有与问题的困难程度相称的神秘品质的人。在中东这个浪漫人物之家更是如此。我参加过的各种壮观的外交活动，从前往中国的秘密之行到越南谈判的胜利完成，使中东领导人头脑中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我能够为他们起同样的作用。虽然这一点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它也包含一种危险，各方将要求我把作出困难决定的担子从他们的肩上接过来。那将是通往灾难的道路。任何谈判人员如果错误地认为自己的人品会促成自动突破，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已处于一种痛苦的境地，这是历史专门为那些以欢呼而不是以成就来衡量自己的人保留的。他们以欺骗自己开始；必将以使别人失望而告终。

我向开罗表明埃及可以期待美国做些什么事，我把停火同以后的谈判分开。我着重指出埃及已经挽回了自己的名誉并改变了战略形势。它可以先冒停火的风险然后依靠谈判。日后的外交和我在十月十六日致伊斯梅尔的信里所提出的建议非常吻合：

基辛格博士愿对当前形势提出他坦率的评价。

美国的目标继续是在有利于实现最后解决的情况下结束目前的战斗。埃及部队已经大有建树。埃及以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在一九六七年以后所感受到的羞辱现已消除。新的战略形势已经确立，在这种形势下，任何国家要想永远依赖军事优势已经纯属幻想。因此，各方日益明了必须实现政治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以作些什么事呢？基辛格博士常说，他只答应他

能作到的事,但是凡是答应过的他都要作到。由于伊斯梅尔先生十月十日来信中所提的五点方案,埃及方面实际上要求以色列把埃及方面关于全面解决的条件,作为停火协议的一部分接受下来。按照基辛格博士的判断,如果不打一场持久战,这是无法实现的。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的影响无法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美国方面可以答应并将履行的诺言是,一旦实现停火,将尽一切努力协助达成一项最后的公正的解决办法。基辛格博士认为,最近的事态发展,有助于美国方面将来比较容易为这样一项解决办法施加建设性的和有效的影响。……

因此埃及方面得作出重要决定。如果坚持最高方案,那就意味着继续战争并可能危及已取得的一切成就。在这种情况下,结局如何将取决于采取什么军事措施。美国方面将不就这一结局进行揣测,但对于是否能取得明确的结局感到有疑问。无论如何,对美国来说进行外交活动的环境并不有利。

如果要给外交活动一个充分发挥作用的机会,就必须先实行停火。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所答应的外交活动才能开展。美国方面将正式作出承诺:它将全力以赴并持客观立场;埃及将从中得到美国认真从事这一活动的保证。

目标必须是实现停火,并迅速使其转变为真正而持久的和平,这一和平将使主权和安全的原则协调一致。

美国方面相信可以在就地停火的基础上取得进展,同时由有关各方保证在秘书长的主持下开始进行谈判,目的在于按照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的一切部分,包括决议中关于撤退部队的规定,达成一项解决。

基辛格博士非常感谢埃及方面盛情邀请他前往埃及进行访问。一旦停火实现,他将很高兴地对这一邀请给予最认真的、赞同的考虑,作为促使中东实现持久和平的认真努力的一个部分。

谨致最热烈的问候。……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在上午十时后不久举行会议。自从决定进行空运以来,会议的气氛发生了近乎奇迹般的转变。上一星期那

种犹豫不决，那些把对潜在的危险后果的责任推卸给别人的企图都不复存在了。一位领导人的最重要的作用，是要在难以抉择的迷雾中承担责任，作出决断。完成了这一点，他的下级就有章可循，可以转而注意执行的问题了。尼克松作出空运的决定时，他就在中东战争中起到了这种作用。我说明指导我们再补给活动的原则：“在这一场半对抗的形势中，我们唯一关心的事是快些超过苏联人。最大限度地促使他们谋求迅速实现解决。我们每天运的东西要比他们多。”作为一个粗略的指标，我建议我们运送补给品的数量至少超过苏联的百分之二十五。我们决定加强海运以补充空运，因为苏联人在黑海一直在用船只装运大量作战物资，包括最现代化的装备。

我们不得不在水门事件的危机中进行这场关系重大的对抗，水门危机使尼克松同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相对立，我们同时还面对着某些国会议员和新闻界的攻击，他们硬说我们在缓和问题上态度软弱。亨利·杰克逊参议员十月十四日公开指责我被苏联人欺骗了。专栏作家乔治·威尔十月十六日断言，意识形态的障碍物——他并未指明——使我对“缓和已经死亡”视而不见。约瑟夫·克拉夫特十月十八日声称我被苏联人欺骗了。^⑮《纽约时报》十月十七日甚至报道说，在所有人中间，偏偏是总统顾问梅尔文·莱尔德同我在对苏联意图的估计上意见分歧日益加深。象往常那样，莱尔德对于问题的看法，我知道得最迟，更不用说知道他持有什么不同的观点了。的确，我一贯主张在公开场合对苏联保持低姿态。在超级大国之间，一场危机的胜利者必须慎重判断迫使对手承认这一事实的时机。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我对我的同事们着重谈了这一主张：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在整个事件中必须保持低调。不要举行说明背景的记者招待会。要是我们能够同苏联人发生对抗、不使我们同阿拉伯人的

关系破裂而能使这件事结束，我们就算没有白拿薪水。其他一切都只不过是卖弄花招而已。我们在实质问题上要持强硬路线，并坚持把物资运往以色列。

整个上午，消息一直对我们有利。在十月十六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举行会议以前，我们就已获悉苏联一架专机首途前往开罗；我们猜想阿历克谢·柯西金总理在该机上，他出人意料地取消了同前往苏联访问的丹麦首相的一次约会。这一定意味着苏联人要敦促萨达特接受我们关于停火的主张；如果要坚持他们前已宣布的路线就无需别人劝说了。而苏联人的压力大概会使苏埃关系恶化。

几乎与此同时，我们获悉以色列一支有二十五辆坦克组成的部队在大苦湖地段越过苏伊士运河，抵达西岸，并开始摧毁埃及地对空导弹发射场。这种事态如果继续下去，就可以保证以色列取得胜利，因为它将使埃及已经越过运河的部队完全暴露在以色列空军力量的猛烈打击之下。但是目前还不能断定以色列是否能够在运河西岸坚持下去。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认为这一行动不过是一次突袭，以色列最初的确也是这么说的。就是在这次讨论战争战略的会议期间，送来了一项新闻公报，说我被授与诺贝尔和平奖金，第八章中对这件事已描述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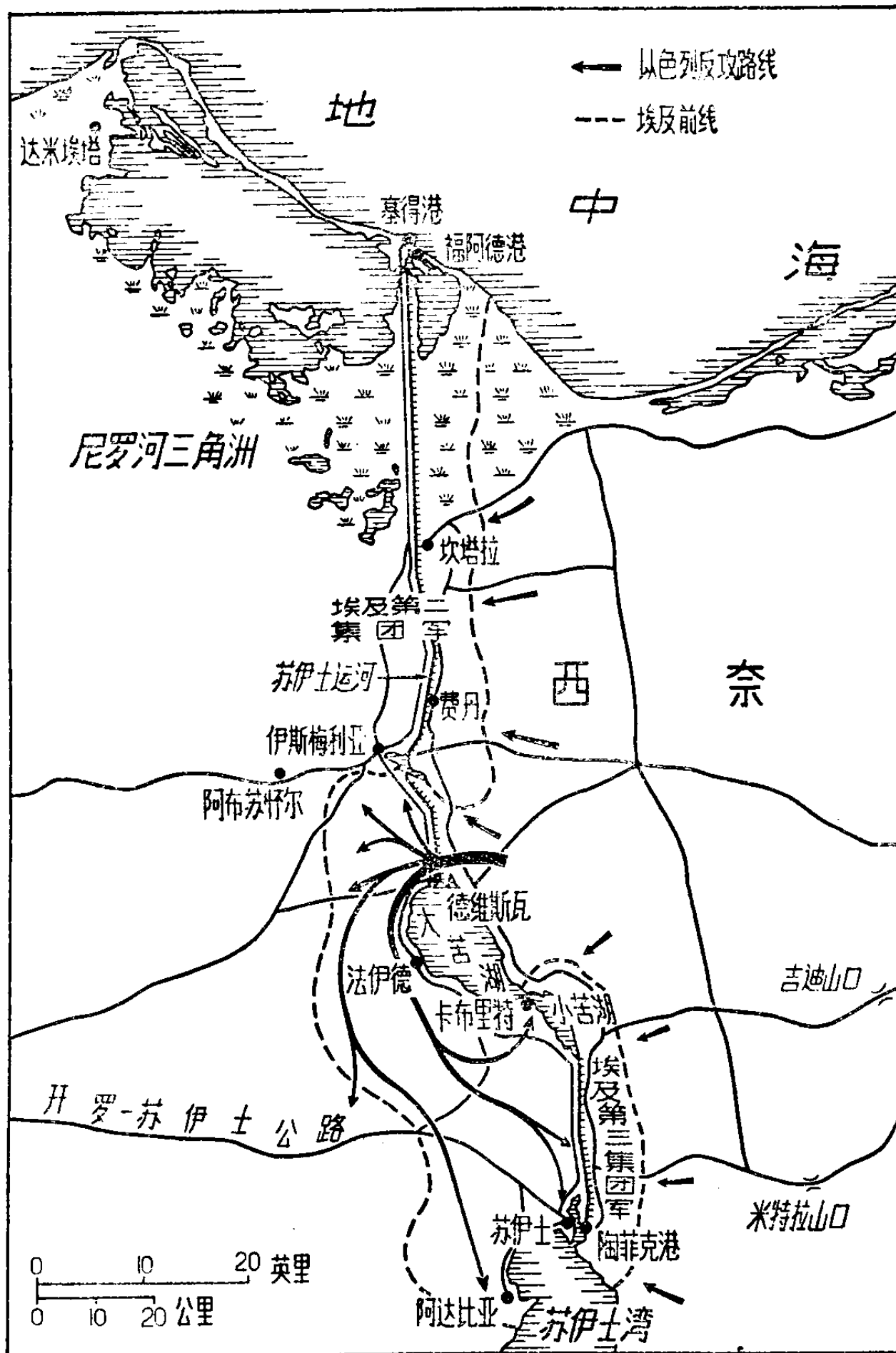
十月十六日星期二晚上，我向尼克松报告说，迅速结束战争有六七成的希望。十月十三日上一次停火努力显得太容易了；我们“过份依靠占卜式的预言了。”现在问题的解决比较可靠，因为我们不再依靠别人的行动了。我们自己投入的资源，将随着时日的推移，改善我们战略的前景。柯西金不是同萨达特僵持不下，从而破坏苏联同开罗的关系，就是使萨达特接受我们的方案。随便哪一种结局都会加强我们在开罗的地位。以色列人打过运河去可能只是一次突袭，我们仍然认为是这样。但是它将削弱萨姆导弹掩护网

并从而提高以色列把埃及人逼回运河对岸去的能力。时间现在显然对我们有利。

十月十七日：走向停火

虽然现在事态已经愈来愈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但是十月十七日星期三又是一个等待事态发展的日子。一大早多勃雷宁就正式通知我柯西金到了开罗。他还带来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强调了一件我们已经知道的事：虽然苏联也许愿意通过代理人打中东战争，但是它在没有与我们发生对抗前就会止步。勃列日涅夫不禁又要提起他以前的多次警告，中东存在着爆炸性危险。他重提人所共知的苏联的立场，即如果以色列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可以由超级大国或者安理会保证它的安全。（由于事实证明安理会在一次重要战争的第二个星期甚至无法进行表决，这一恩惠颇有疑问。）但是这些例行的套话只是一个前奏，下面他声称事情“尚未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两个超级大国应当利用他们的影响要求各方克制。总之，除非苏联人在欺骗我们（而我们的空运已经剥夺了他们这样做的能力），他们是不会进行阻挠的，甚至可能促进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即把停火仅仅同一般重申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联系起来。

到这时我们已处于很幸运的地位，无需再作出任何决定以影响军事结局。在进行补给活动中我们可以超过苏联人，同时我们的朋友组织得比较好，可以充分利用我们运去的装备。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一次会议上，穆勒海军上将提出一种意见说，叙利亚人可能把新到的苏制坦克开到前线去；但不能用来打仗。因此，星期三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为战后的外交准备舞台，并防止未参战的阿拉伯国家在一时激情的驱使下采取无可挽回的步骤。以色列



西奈前线：以色列越过运河及突破防线图

在运河彼岸的桥头堡正在扩大；已经不再是一次突袭，而是一次正式的反攻了。很快地苏联就别无选择的余地了，只能要求停火。

那个星期三，由沙特阿拉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科威特四国外长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前来华盛顿，为阿拉伯国家的事业进行游说。上午十时十五分，我先会见了他们。我说明，美国的短期目标是结束战争，然后“我们将从事一项外交活动，努力寻求公正持久的和平。”结束战争的方式应当使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尽可能地保持友好”。延长这场冲突就会冒在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上发生大国对抗的风险，这是阿拉伯国家经常感到恐惧的事。我说，目前既不可能比一般保证执行第二四二号决议做得更多，也不可能使以色列承诺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线去：“如果你们坚持把这一切当作停火的先决条件，那末战争就要继续下去。”

这场对话上午十一时十分在椭圆形办公室同尼克松继续进行下去。沙特阿拉伯外交国务部长奥马尔·萨卡夫是个温文尔雅而又明智的人，他语调温和地总结了阿拉伯国家的立场：“阿拉伯人并没有威胁要消灭以色列。”这位沙特阿拉伯部长并不害怕明确肯定以色列有权存在，尽管是在其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以内：“我们的要求不过是恢复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尊重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并对他们的损失给予赔偿。这就足以保证以色列的稳定和完整。”

虽然萨卡夫接受了以色列的生存权，这当然是进行严肃认真谈判的最低条件，但是他给我们的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以色列不会由于邻国强加给他们的一场战争而退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去，而且在这场战争中，形势正在开始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没有美国的支持，要朝着比较有限的目标前进也是不可能的。有几个阿拉伯国家派人到总统办公室声称，它们需

要美国的帮助，来抵挡贪得无厌的邻国的威胁（往往是阿拉伯国家），并稳定国内的动乱。他们和我们不得不妥善处理这一表面看来矛盾的局势，而又从来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尼克松由于擅长掌握不可捉摸的事物，完全明白怎样讲才恰到好处：在不承担达成某一特定结局的情况下，许诺进行一次重大的外交努力。虽然尼克松不再有时间和精力经常进行领导，可是他仍然巧妙地处理了同阿拉伯国家部长们的会见，而未表现出丝毫紧张。那时，他正准备同阿奇博尔德·考克斯进行面对面的交锋，而这次交锋导致对他进行弹劾的开端。他试图使这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领会我们的行动有其限度，话比我说得转弯抹角一些：

我将努力争取实现停火，不是为了骗取你们到停火线上就止步不前，而是要利用它作为基础继续前进，争取在第二四二号决议基础上求得解决。我对你们作出这项承诺。现在实行克制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人们的情绪如何，我理解。我们将实行克制，我希望你们也这样。……我向你们保证。我不能说我们可以无条件地使以色列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去，但是我们将在第二四二号决议范围内尽我们的努力。

尼克松越谈越兴奋，渐渐有些夸夸其谈了。他答应让我充当谈判人。他的意思是说这将保证取得成功，这使我大吃一惊。他重提自他第一任以来一个熟悉的话题，向他的客人保证，尽管我出身犹太血统，我并不受国内的也就是犹太人的压力。萨卡夫在这次谈话的前一部分中曾经公开承认我“干得很漂亮。”这时他巧妙地把这个问题岔开了，他说：“我们大家都是闪米特人嘛。”

萨卡夫在离开椭圆形办公室时，发表了一篇和解性的讲话，表示对尼克松非常信任，使那些仇恨尼克松并切望宣布水门事件破坏了我们处理危机的能力的人大为狼狈，他说：“这位能够解决越南战争的人，这位有可能在全世界缔造和平的人，在我们中东地区实现解决并缔造和平的努力中，无疑地可以发挥良好的作

用。”

这样，美国对以色列通过空运进行再补给活动，并没有损害，也许反而提高了阿拉伯国家的信念，认为美国是实现和平解决的关键。看来这几位部长决心避免对抗。在我这方面，以后再次同他们会晤时，我将力劝他们不要要求作不可能作到的事：

我们知道以色列不准备接受阿拉伯国家任何现有的想法。以色列总理昨天已经讲明了这一点。总之，无论压力多大，必须运用美国的影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美国的影响。虽然阿拉伯国家的军队有出人意料的表现，但是这些军队如果不进行长期战争，并冒大国介入的风险，就不可能实现阿拉伯国家的外交目标。

我不能说这些话引起极为热烈的反应；但是也没受到驳斥。这四位外交部长敦促我撇开我那些保留意见而投身于这项工作；一旦你决定信托某一位医生，就应把他的现实感看作是可靠的。我就是这位被委托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扭转局面的人——很不幸，究竟出于什么原故没有人能够说明。

我一面同这几位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谈，一面要求斯考克罗夫特请迪尼茨了解一下，他的政府对把停火仅仅同执行第二四二号决议的一些要求相联系有何反应。我们认为不会有什么困难；归根结底，第二四二号决议成为中东谈判的基础已经有六年之久了。

十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每天例会在轻松的气氛中举行。克莱门茨向会议报告说，我们的空运已超过苏联空运的百分之二十五。我自鸣得意地说阿拉伯国家外长的情绪看来证实了我们的看法，不会马上实行石油禁运。稍微确切一些，我预测在柯西金回到莫斯科以前，外交活动会处于休眠状态。“但是我们一定要继续大量往以色列运东西。我们一定要源源不断地运，直到有人认输为止。”

会议结束时，我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中的同事们带到椭圆形办公室，听取尼克松发表鼓舞士气的讲话。在他全神贯注于有关水门事件录音带的决定的情况下，尼克松仍然表现出是在牢牢地掌握形势：

人们都敏锐地意识到这场赌博的重大意义：它涉及石油和我们的战略地位。不致力于谈判争取成功，就不能实现停火。今天上午（同阿拉伯四国外长）的会晤就是为了在这方面起一份作用。他们中间有几位——不是阿尔及利亚——怕得要命，担心会因此而受苏联的摆布。沙特人、摩洛哥人，甚至阿尔及利亚人，都担心这一点。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这比中东问题广泛。我们不能听任一项苏联支持的行动胜过美国支持的行动。如果发生这类事，各个方面对我们的信任就要发生严重的动摇。

但是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休会时，电传打字机收到的消息带来了新的问题。在科威特举行的阿拉伯石油生产国会议刚刚宣布立即削减石油生产百分之五，然后每月削减百分之五，直到以色列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时为止。此外，还有一项单独的发展，石油输出国组织六个波斯湾成员国单方面把石油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从每桶三点〇一美元增加到五点一二美元。我们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实行禁运的危险上，以致我们认为这次削减产量主要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据中央情报局估计，开始时每天削减一百万桶。当时这的确是个象征性的姿态——但却具有革命性的含意。由于生产国卡塔尔几乎可以任意地以操纵产量来确定石油价格，因此随着这一点日益明显，战后历史就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关各方费了好几个月才领会了这个问题的各个细节。我将在第十九章讨论这个问题。

有一个结果马上可以看得出来。欧洲各国先是隐约不安，后来逐渐惊慌失措起来。同美国疏远日益加速。欧洲除了寻求同石油生产国的友谊以外，似乎没有别的具体目标；除了缓和当前的压

力外，并没有基本的战略。米歇尔·若贝尔起了带头作用。不到一个星期以前，十月十一日，他还坐在我办公室里听取我介绍围绕这次战争开展的外交活动，并且大谈什么最好是听其自然，而不要在联合国仓促行动。但是现在路透社报道说，若贝尔在国民议会发表了一篇尖锐的批评性演说，攻击美国同勃列日涅夫打得火热，同时双方又都把军火源源不断运往中东。

侯赛因也有些坐立不安了。他看到西岸（对他来说，这是最有吸引力的战利品）的以色列军队撤光了。关于和平解决的一些揣测经常贬低约旦的要求。约旦国王给我的一封信中问道，难道以色列的最克制的邻国必须付出被瓮以闭门羹的代价吗？他禁不住伤感地说，以前我们曾以缺货为理由拒绝向约旦提供一些新坦克，可是现在却把大批坦克运往以色列。

与此同时，我们加紧进行空运，我们还同各方保持接触，并力促实现同第二四二号决议相联系的停火。我们必须表现为坚定不移。但是我们也必须给人指出一条出路。而且，我们是在水门事件再次出现高潮时走这条羊肠小道的。

在进行空运的这一星期内，尼克松的注意力主要贯注于上诉法院关于水门事件录音带的决定上了。十月十六日，梅尔文·莱尔德成为公开谈论可能进行弹劾的第一位白宫官员。第二天，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向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转达了白宫的一项建议，尼克松将允许有威望的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对白宫草拟的有争议的录音带的摘要的准确性进行查核。黑格曾经简略地给我描述了这项折衷建议的梗概，他又吓人地说总统准备和考克斯摊牌。很凑巧，几星期前我就约好在十月十七日星期三和理查森共进午餐。他担任司法部长心里并不痛快。本世纪最重要的司法案件水门事件交给了一位特别检察官，使他无法过问。他对我说，他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觉得白宫正试图

诱使考克斯采取某种立场，以便他们能够解除他的职务。这一点理查森是不会接受的。我不记得当时我作过什么评论。

那天下午我告诉迪尼茨说，以色列应当根据如下的假定计划自己的军事行动，即人们向我们提出有关停火的建议后，我们不可能拖延四十八小时以上。我们知道沿苏伊士运河西奈中部战线正在进行一场猛烈的坦克战，但是我们从以色列只得到少数的报告，而且没有一份是能说明问题的。很显然，战争不可能再打多久了。

十月十八至十九日：被邀访问莫斯科

十月十八日星期四上午，以色列宣布增兵加强苏伊士运河对岸的桥头堡，这块阵地的北端宽约八英里，南端宽约四英里。在帮助龙·齐格勒为上午的记者吹风会作准备时，我告诉他我预期星期天或星期一（十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可以实现停火。

那天，费萨尔国王终于给尼克松写来回信，内容和他两天以前给我的信一致。他断言，延长战争将对苏联有利。只有以色列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战争才能结束。信件结尾提出象前一封信一样的含糊警告：“如果美国继续站在以色列一边，那么（美国—沙特）友谊将有被削弱的危险。”但是这一克制的姿态，却被沙特阿拉伯同一天宣布的措施抵销得一干二净了——也许这一姿态是有意要使人对沙特宣布这一措施的意图感到难以捉摸的。沙特阿拉伯那天（十月十八日）宣布，已把阿拉伯国家石油部长头一天决定实行削减产量的数字增加一倍，即削减百分之十。沙特人保证以后每月进行削减，甚至威胁说，如果这些步骤不能取得“迅速、明确的效果”，就可能完全禁止向美国输出石油。

此后不久，十月十八日下午六时二十五分左右，迪尼茨带来果尔达·梅厄对于我们询问把停火仅仅同第二四二号决议联系起来

这一建议的反应。这是说明以色列谈判策略的一个典型例子——极端脆弱感和复杂的国内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所有我认识的以色列领导人在这件事上几乎本能地是一致的：决不接受美国所提的第一个建议，无论有什么优点都不接受。如果以色列没有争一下就顺从了——切莫管实质问题——美国就可能把它看成是一个温顺的被保护者，天知道我们那时会心血来潮地把什么东西强加给他们。

国际环境所鼓励的事，以色列出于国内政治考虑，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肯去做的。以色列领导人采取使人恼火的谈判方法，来源于国内政治的传统做法，即使最小的让步也争个不休，决不作出人意的妥协，只有在人人都弄得精疲力竭时才解决问题，这时人们对结论或善意已失去好感。因为以色列那些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人，只有表明他们是迫不得已或者在谈判中已作到最大限度的坚韧顽强，才能向那些持怀疑态度或者抱有野心的同事们证明，的确别无选择余地了。他们不能摆出宽宏大量的姿态，因为如果他们这样作，他们就无法使政府保持团结一致。代表以色列进行谈判，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一位总理如果不先试一试还能得到些什么东西就接受了美国的一项建议，他或她就要冒被指责为软弱的风险。

情况就是这样，梅厄对停火表示异议，早在一个星期以前她还要求实现停火，她特别反对同第二四二号决议发生联系，而过去六年的谈判中以色列一直把这一决议当作圣经看待。而梅厄现在提出争辩说，那个决议是一九六七年战争的产物，同当前的战争风马牛不相及；它并不是一付万应灵药；“没有必要过份仓促行事。”

信件的措词并非毫不妥协。我也不打算赞同信中的意见。在具有致命危险的两个星期中，我们曾帮助以色列渡过了难关。当符合我们共同的战略需要时，我们曾在联合国进行了拖延；当以色列准备好的时候，我们曾提出实行停火；当以色列处境极端危险

时，我们曾运去大批补给品。现在不能再损害我们同欧洲和日本的关系了，不能去触发一场石油禁运，不能同苏联再进行对抗，也不能因为推迟实行停火的建议或者抛弃第二四二号决议而向那些同我们保持联系的阿拉伯朋友提出挑战。我们曾以第二四二号决议的名义，抵挡苏联和激进的阿拉伯国家的压力达六年之久。我们如果继续推迟停火或抛弃第二四二号决议，也不会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没有第二四二号决议，就不存在今后进行谈判的合法基础。在联合国目前的表决阵容的情况下，任何其它决议案肯定会稍逊一筹的。可是当时我们还只是从理论上谈谈而已。所以我对迪尼茨说，我觉得不久就要提出停火建议了，我力促他们加快作战行动，以便在四十八小时内结束战斗。

十月十八日星期四夜间八时四十五分，我的预感实现了，当时多勃雷宁打电话给我，传来勃列日涅夫的一个紧急信息。突然之间苏联人准备认真做交易了。多勃雷宁给我念了一项预定提交安理会的苏联的建议草案，该草案由三部分组成：（一）呼吁就地停火；（二）呼吁以色列立即分期“从阿拉伯被占领土”撤退到“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所规定的边界线，并在最短的时期内完成此项撤退”；（三）呼吁进行旨在建立公正和平的“适当的磋商”。

第一点显然可以接受；这是五天前我们在以色列同意下提出的；它将使以色列部队停留在离大马士革二十英里的地方，并停留在苏伊士运河对岸。第二点显然是荒谬的；人们不能作为停火条件要求以色列“立即”撤退到没有明确规定的一条线去，并在“最短的时期内”完成撤退。第三点显然也是一个用来引诱人的东西。“适当的磋商”可以意味着任何东西；如果它指的是通常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谈判，由一个中间人在双方之间周旋，那末没有多大意思。然而，如果能够使它导致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间进行直接谈判，它就可以成为中东事务中发生新的重大转折的标志。自从

以色列诞生以来，第一次由阿拉伯国家同它进行面对面的公开谈判。

我立即打电话给尼克松。我说：“他们朝着我们设想的方向动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走到。”我估计还需要再用“四十八到七十二小时”才能完成。

然后我通知迪尼茨，对他的反应我有把握。我没有谈第三点，因为我知道以色列决不会同意第二点，我希望在第三点提出以前，把它修改成双方之间的直接谈判，这种谈判是以色列声称它竭力谋求的。

至于多勃雷宁那里，我采取推拖的作法。我对他说，苏联的建议具有建设性的因素。然而，第二点不能接受，第三点需要再精确一些。为了保持有礼貌的气氛以争取时间，并且给苏联方面一些进行分析的东西，我们在下午十时三十分左右由尼克松对勃列日涅夫前一天的一般性信件作出答复，勃列日涅夫的来信根本没有谈到停火的事。回信长于词藻，滔滔不绝地谈论必需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保证在敌对行动结束后共同努力以促进中东和平。但是我们故意避而不谈苏联的停火建议草案。多勃雷宁非常机敏，不会不理解我们是在拖延——这是假定的胜利者通常的手法，他的地位随着每一个小时的消逝而有所改善。

随着停火临近，同关键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就至关重要了。我打电话给侯赛因国王：

我想让你具体地知道我正在作些什么事。我们正在同苏联人进行商谈，目的在于争取就一项安理会的决议达成协议，这项决议将号召就地停火，然后双方立即就根本解决进行谈判。国王陛下，在这一解决方案中，如果您曾经如此雄辩地向我说明过的约旦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那将是不可想象的。……我可以向您保证，您的意见将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

最需要同我们保持联系的是我们在开罗的半敌手，我们认为

他们目前正在经历着痛苦的折磨。埃及军队现在处境非常困难。但是战争如以埃及遭受羞辱而告终，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曾经想阻止苏制武器得胜。但是我们不愿看到由于埃及遭受全面失败而使萨达特被推翻或者埃及激进化。十月十八日下午十时四十五分时，我在同斯考克罗夫特谈论苏联建议时说：

事实上，毕竟这是苏联的一次失败。基于同样理由，我们不让以色列遭受失败，也将对苏联发生不利的作用，即使他们〔阿拉伯人〕说是军事供应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也应当使他们认识到他们还是站到我们方面来好一些。

所以在午夜时，我写了一封带有和解语气的信给伊斯梅尔，请他转交萨达特。信中基本的一点是重申两天以前提出的建议，把停火同重申第二四二号决议联系起来。为了表明我们尊重埃及的尊严，我表示特别注意如下的事实，即“埃及和它的阿拉伯盟国，由于他们在战场上所显示的力量和勇气，已经使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应当再延长战斗而使这一切受到危害。”信件结束时我再度呼吁实行停火，即使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信件中我没有提这一点）。距离我们的目标已经这样近了，我希望不要因一些转瞬即逝而令人不快的事破坏萨达特和我们一直在并行不悖地促其实现的复杂构想：

伊斯梅尔先生知道，我们非常重视在条件好的情况下迅速结束敌对行动，因为这将有可能通过认真的努力而导致问题的根本解决。这仍然是我们的观点。为此目的，双方保持克制态度，牢记保持长期关系这一迫切需要，是很重要的。

谨致亲切的问候。

我们已经接近于按照我们的条件结束战争了。但是我们不能够鲁莽从事。任何时候，苏联人都可能在安理会匆匆提出他们的停火决议，或者让别人提出来。在欧洲和不结盟国家投票支持的

情况下，这一决议很可能通过；连中国都可能支持这项决议。我们能用什么名义否决它呢？如果我们投否决票，那么在以后的危机中我们就会成为孤家寡人，冒着遭受苏联威胁、欧洲疏远我们和阿拉伯国家激进化的危险。最终我们将一事无成。因为如果我们默然同意以色列的愿望，把第二四二号决议删去，那么进行谈判时，就没有任何一致同意的法律基础了。我们唯一现实的选择是掌握谈判的进程，为以色列的攻势再争取一点时间，然后就实现解决，以便我们能在最佳情况下开始战后的外交。

我正在考虑适当的策略时，勃列日涅夫的急躁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出路。

十月十九日星期五上午，我刚开完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每日例会。我们得到的有关以色列意图的情报非常粗略。我们知道他们正在发动攻势，在运河西岸已经有三百辆坦克；他们正试图在各方面切断埃及的交通。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得悉他们正向北朝着伊斯梅利亚移动，向南去包围大苦湖并切断开罗—苏伊士公路。但是以色列人并未向我们阐明他们的当前目标和他们的战略计划。也没有就他们正在执行的任何战略给我们一个最佳的大体时间范围。那天上午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决定继续进行空运，直到真正实行停火时为止。我们还加速海运，以免突然停火使我们不能运去足够的补给品，并且使苏联人不要鼓励他们的阿拉伯朋友去尝试进行一场消耗战。

上午十一时过几分钟，多勃雷宁打电话来，传来勃列日涅夫致尼克松的紧急信息。口信中谈到中东的危险日益加剧，说它甚至可能“损害”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需要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决定：

由于时间至关重要，现在不仅每天，甚至每小时都事关重大，我的同事和

我建议，美国国务卿、你最亲密的同事基辛格博士从速前来莫斯科，以便同他，作为你授权的个人代表进行适当的谈判。如果他能在十月二十日前来的话，那就太好了。你如能迅速作复，我将甚为感激。

当我读到这一邀请时，我觉得解决了我们大部分的问题。在达成我们能够接受的结局以前，可以使这一争端不提到联合国去。在我前往莫斯科途中和谈判期间，它可以使苏联不再大吵大嚷进行恫吓。我将至少再争取到七十二小时，以加强军事压力。尼克松和我按照这种思路同黑格和斯考克罗夫特进行了讨论。我们的结论是莫斯科之行将促进我们的战略。

有一件技术上令人为难的事。中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大使曾邀请我当晚出席在五月花饭店为我举行的大型晚宴。我不能偏偏为去莫斯科而取消这一约会。但是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一点。这使我们有了个借口，可以把我启程的时间至少推迟到星期六早晨，这样到达莫斯科的时间推迟了，以至在星期天以前无法开始谈判，或者说推迟到四十八小时以后。

我立即在白宫我的办公室给多勃雷宁回电话，对他说我们正在认真考虑勃列日涅夫的建议。但是为什么葛罗米柯不能到华盛顿来？多勃雷宁表示不同意，他说苏联作出决定需要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参加（柯西金刚从开罗回去）。我答应下午给他答复。

与此同时，我向迪尼茨作了简要通报，并同尼克松和黑格再一次议了议形势。下午一时三十五分，我在国务院办公厅打电话给多勃雷宁，给他最后的答复。我将在星期六凌晨动身，晚上抵达莫斯科。星期天上午以前，我不准备开始谈判；除停火问题外，不讨论任何最后的解决方案或者其它问题。我“假定在我前往莫斯科途中，是不会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的，”我所说的单方面行动，指的是威胁，或者在联合国或其它场合提出什么倡议。公告必须说我是在苏联政府“邀请”下前往莫斯科的，以免我以恳求者的身份出

现。

下午四时三十分，多勃雷宁代表勃列日涅夫接受了这些条件。我重申我不准备讨论任何有关政治解决的问题。多勃雷宁认为这一点已经讲得足够清楚了。然后我同迪尼茨会见，就我们的立场交换意见。

与此同时，水门事件以最直截了当的形式插了进来。尼克松比平素显得更加走投无路了；十月十九日是斯坦尼斯折衷方案预定生效的日子（第二天他即将撤去不驯服的考克斯的职务）。那个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黑格通知我，尼克松准备发表一项宣布斯坦尼斯折衷方案的声明，他打算把它和一项宣布我出访的公告一道发表。我强烈地表示反对，说把对外政策和水门事件联系起来是一个“廉价的花招”，尼克松将来要后悔的：“以后人们永远会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掩盖水门事件。我真诚地恳求你。如果他要这样做，就把它当作同另一个公告互不联系的公告发表好了。”

黑格当时刻意要做一个好军人。他转达了尼克松的信息；他也同样细心地转达我的反应。几分钟后他向我报告说，尼克松承认应当把对外政策的考虑放在第一位。这两项公告将分别宣布。他仅仅希望确保在同苏联商定时间以后，由白宫宣布莫斯科之行，而不是由国务院宣布。

下午六时三十分，我简单向中国人作了介绍，六时五十分，向英国大使作了简单介绍。七时十分，我在电话上同迪尼茨再次对全部问题进行了审议。我告诉他我将按照他们的喜爱开始进行谈判，把停火仅仅同在各方之间进行和平谈判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我不会接受苏联的提法，说第二四二号决议意味着以色列必须立即实行全面撤退。但是我对迪尼茨着重指出，我大概不可能完全略而不提第二四二号决议；老实说，我认为把进行谈判的仅存的法律基础破坏掉是不可取的。我要迪尼茨在我在苏逗留期间，向

我提供详尽的军事报告。我预期在莫斯科时间星期天下午以前不会有结果，以后有结果时，将立即通知以色列。以色列应当时刻铭记这一时间表。后来实际情况表明，这一时间表与实际出入不大。

下午七时十五分，我同两个星期来出席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的同事们举行了一次简短的会议，他们是：吉姆·施莱辛格、汤姆·穆勒、比尔·科尔比、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我们每天进行商议，有时气氛挺紧张。我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但是处理了一项危机使它达到差强人意的结局。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道路的尽头了；最严重的危险已被克服。对中东各项问题开辟一条新途径的伟大机会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感到极大的宽慰。我简要描述了莫斯科之行的战略：

派我去可以拖几天，给他们一个保全面子的机会，并避免葛罗米柯带着强硬的指示前来此间。布伦特将随时向你们报告情况。我将争取实现无条件停火，可能附带要求进行谈判。麻烦的是以色列什么也不谈，但是我得提一下第二四二号决议。我可能不得不旧事重提。

中东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他们希望和平，必须通过我们。他们曾经三次希望通过苏联，三次都失败了。

当天晚些时候，我向侯赛因国王和伊朗国王发出函电，通知他们我即将前往莫斯科，说明我们作出这一决定是“应苏联的要求。……在这些谈判中我的目标将一如既往——在有可能早日导致最终、公正而持久的和平的基础上，立即结束战斗。”

自那时以来，我曾自问是否我们接受苏联的邀请有些过急。也许我可以把启程时间再拖后二十四小时，更进一步加强以色列的军事地位。另一方面，苏联方面完全了解我们在干些什么，他们也可能在联合国提出正式决议案或增加军事赌注的方法，设法对付我们的拖延。而且阿拉伯国家因受挫折很可能使阿拉伯世界团结一致转而反对美国。一个星期以前，我曾劝告以色列推迟谋求停

火，因为我认为军事形势不利于展开战后外交。正如在取得战略成功的道路上重要的是决不可畏缩不前一样，切不可超越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们一直在同时处理许多难以驾驭的事物。我们现在不能把手腕高超同长远战略混淆起来。一定要避免为了某些没有把握的收益而使一切都遭受危险，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我们的各项根本目标：为取得外交突破创造了条件，维护了我们朋友的安全，阻止苏制武器取得胜利。我们同处于关键地位的阿拉伯国家保持着关系并为我们在战后外交中发挥主导作用奠定了基础。而且我们是在本世纪最严重的宪法危机中完成这一切的。

现在牌掌握在我们手里。下一步是如何打好这付牌。

① 见阿巴·埃班：《自传》（纽约：兰道姆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第五〇二页。以色列当时的反对党领导人、现任总理梅纳海姆·贝京后来错误地指责我那天上午同意了札亚特关于事态发展的看法，并且指责我自动地“假定”以色列是以所谓的海军袭击而发动战争的。这是完全错误的。见罗伯特·西格尔采访以色列总理梅纳海姆·贝京的报导：《公报：国家公立广播电台（NPR）每周世界事务报告》，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

② 罗伯塔·乌尔斯台特：《珍珠港：警告和决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③ 巴顿·惠莱：《代号：巴巴罗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④ 孙子：《兵法》，塞缪尔·B·格里菲斯译并撰导言（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六十六页。

⑤ 见赎罪日战争调查委员会（阿格拉纳特委员会）：《部分报告》，一九七四年四月二日出版（以色列国家政府出版局，新闻公报），第九——十二段；哈伊姆·巴尔·列夫中将：《奇袭和赎罪日战争》，提交一九七五年十月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关于以色列—阿拉伯冲突军事问题的国际专题讨论会的文件，刊载于路易斯·威廉姆斯编著的：《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军事问题》（特拉维夫：大学出版计划，一九七五年版），第二五九——二六五页。

⑥ 埃班：《自传》，第四九六页。

⑦ 见《外交政策》杂志第十七号（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冬季）雷·S·克莱因：《没有才智的政策》，重点是第一三一——一三三页。

⑧ 安瓦尔·萨达特：《寻求个性：自传》（纽约：哈泼和罗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版），第二四六页。

⑨ 同上，第二四七、二四九、二五二——二五四页。

⑩ 见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纽约时报》第一版。又见克莱尔·斯特玲：《恐怖之网》（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一九八一年版），第一四四——一四五页。

⑪ 见果尔达·梅厄：《我的一生》（纽约：G·P·普特南姆诸子出版公司，一九七五年版），第四二六——四二七页；摩西·达扬：《我的传记》（纽约：威廉·摩罗出版公司，一九七六年版），第四六〇——四六一页；《驻美使节断言：以色列知道攻击即将到来》，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一日《纽约时报》第十八页；爱德华·N·鲁特瓦克：《战争的战略》，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四日《华盛顿明星新闻报》。

⑫ 达扬：《我的传记》，第四六〇页；埃班：《自传》，第五〇八——五〇九页。

⑬ 萨达特：《寻求个性》，第二五二——二五四页。

⑭ 见爱德华·N·鲁特瓦克和沃尔特·拉克尔合著：《基辛格与赎罪日战争》，刊载于《评论》杂志（一九七四年九月）。

⑮ 见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五、十六和十八日《华盛顿邮报》。

第十二章

莫斯科, 停火, 戒备

莫斯科之行

十月二十日星期六凌晨二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启程前往苏联,这时离(中东)战争爆发差不多刚好两周。我请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乘我的专机同往,因为这样他可以快一点回到莫斯科。我是秘密离开的,但飞机起飞之后不久白宫就宣布,尼克松总统派我去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直接商讨如何结束中东的敌对行动。”

在旅途中以及正式谈判开始之前,我们的紧张心情暂时缓和下来,不再担心苏联人会利用阿拉伯人的激烈情绪来掀起一场反美运动了。但那天下午,沙特阿拉伯突然宣布,它和其他阿拉伯石油生产国要对美国实行全面的石油禁运,这使我们隐约感到将会出现另一种危险局面。

我曾经告诉多勃雷宁,在长途飞行横越几个气候带之后我从不立即进行谈判,在莫斯科时间星期天上午之前(即三十六个多小时之后)我不准备开始会谈。我和他都明白,在这段时间内,战局发展只会对我们有利。我曾一再告诉以色列大使西姆查·迪尼茨,要他转告以色列,一定要把仗打好,因为我们谈判停火的建议最多拖不过四十八小时。(最后证明,我的莫斯科之行使这段时间增加了一倍。)

旅途中我收到迪尼茨的两份报告。两份报告都如实地描述了

以色列部队的位置，讲到的都是阿拉伯地名，但没有说明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和占领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时间。其中一份报告表明，以色列人确已了解到停火迫在眉睫，但又暗示，不管在莫斯科的谈判情况如何，以色列部队由于过分疲惫将会限制它继续前进：

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必须考虑到停火（或就地停火）很快就要来临的可能性。当停火生效时，我们应当控制一条具有政治和军事意义的战线。我们的部队必须发挥顽强的战斗精神才能继续推进。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自十月六日以来他们几乎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着艰苦的战斗。

第二份报告肯定，以色列部队已切断开罗至苏伊士城的公路，但预料埃及人会努力重新打通这条公路。埃及越过苏伊士运河的部队号称有两个集团军，每一个集团军约有三万五千人。第二集团军控制着运河北段，第三集团军部署在南段，正对着苏伊士城（参见第一五九页地图）。如果以色列已切断开罗至苏伊士城的公路，那末第三集团军实际上已被包围了。

为告知已收到这两份报告，我回电在白宫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如下：

我要特别强调，必须尽快地让我全面了解战斗进行的情况。我需要精确的估计，而且要快，要随时报告。

迪尼茨必须——我重说一遍，必须——一天至少三次向你汇报，并且必须立即把这些汇报转来。告诉他，要他立即把联络系统建立起来，如果还没有这样做的话。这些报告必须核对清楚。

如果我不能全面了解最新情况并确切知道战场上的情况，就难免要犯错误。

我在莫斯科期间没有收到另外的以色列的军事报告，只收到来自美国的情报。为何消息会中断，并没有向我解释。当时以色列部队在战场上行动迅速，在多条战线上发动进攻，他们的部队位置究竟在哪里，进展最快的先头部队已挺进到哪条战线上，也许连

以色列的领导人也闹不清楚。

旅途公务繁忙，实际上也颇为焦急。我特别担心的是，在莫斯科期间不要由于国内意外的事态发展而丢掉了谈判筹码。因此我从飞机上电示斯考克罗夫特，说国防部可能削减对以色列的空运，以减轻预算的压力；我告诉他，我在莫斯科期间，他要抵制这种倾向。我提醒他注意：“如果以色列打赢了，我们在今后几天内对以色列的补给对谈判不起作用；如果以色列不能取胜或者遇到严重困难，我需要掌握全部的谈判手段。”

飞机快到莫斯科了，这时我感到我们的谈判地位是十分有利的。以色列似乎就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出乎意料，我接到尼克松的一封电报，信心突然发生了动摇。我们在飞赴莫斯科的途中，哪里知道十月二十日这一天竟是决定总统命运的一天。国内发生了那个被称为“星期六夜晚大屠杀”的戏剧性事件，我们全被蒙在鼓里：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拒绝接受经过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检查的尼克松的录音带摘要；他要求交出录音带的原件。尼克松提出另一个建议，要交出录音带，他得放弃调阅其他文件的权利，但也遭到他的拒绝。尼克松被迫摊牌，把考克斯解职，这样一来，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和司法部副部长威廉·拉克尔肖斯也都相继辞职。

我们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这些情况都没有向我们传达。从表面上看起来倒象是尼克松所采取的一次突如其来的外交行动。以往我在出国谈判途中，几乎总是接二连三地接到白宫的指示。尼克松这样做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神经紧张，要求镇定；另一部分原因也是表现自己，说明是他在掌权。过去这种做法只是增加了一些电报往返的麻烦，却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后果。然而这一次尼克松采取的做法对于谈判却造成了重大的无可挽回的影响。开始是斯考克罗夫特发来急电，转述尼克松想通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

立即转交勃列日涅夫的信件的初稿。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尼克松授予我“全权”，信内还提到“在你们商谈的过程中他(基辛格)所做的承诺将得到我的全力支持。”尼克松的信还向勃列日涅夫作如下的呼吁：

我们两人要坚定地承诺，为实现该目标(持久和平)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并成为该地区我们各自朋友的坚强的有说服力的领导。我将致电基辛格博士，要他口头向你转达我个人有关这方面的坚定的承诺。

对此，我大吃一惊。这封信意味着我将无法使谈判再拖延下去。既然授我以“全权”，我就不可能再把临时协议从莫斯科转给总统批准——除非靠征求以色列同意的办法来拖延时间。这还不说，这封信还意味着要我们和苏联人把一项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强加于各方，而且我还受权来商讨这个问题——这是一种让步，是与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策略背道而驰的，我们的策略是把停火与政治解决分开。

尼克松急于插手，其用意如何尚待证明，当然不会是由于那个没完没了令人厌恶的录音带的法律争端，而是某种更高尚的东西。问题是尼克松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不像往常那样笔调委婉。他告诉苏联领导人，说他对我完全信任，这个愿望是好的。但他的措词跟他的本意却大相径庭。他给我帮了倒忙。当时的情况，时间对我们是最有利的因素，但他的来信却剥夺了我拖延时间的机会，使我没有回旋的余地。

因此我急电斯考克罗夫特，一反常态，拒绝授予我以全权：“一定要使我能够对俄国人坚持，双方提的建议定要向总统汇报，并请他考虑。授予全权，就会使我无能为力。”至于“成为该地区我们各自朋友的有说服力的坚强领导”那句话，我只略微提醒斯考克罗夫特注意，“如果这句话公开发表，总统将会遇到困难。”

我的电报到达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那时尼克松心情是颓丧的，

但他却装得精神振奋，他不等我表示意见就催促斯考克罗夫特把信打好，并立即交他签字。当尼克松硬要他的心腹秘书把信准备好发出的时候，斯考克罗夫特只好让步了。不了解白宫情况的人不知道，那封最后打好的信所以搞得无法挽回是因为尼克松在信上还亲笔附加了一句话：“尼克松夫人和我对勃列日涅夫夫人和你致以最亲切的问候。”斯考克罗夫特在回电中还扫兴地说：“这样一来我就毫无办法了，不然我还可以修改”——意思是说如果没有那句附加的话，他会按照我所建议的改动，把那封信重新打过。那封信在华盛顿时间上午十一时二十五分送交苏联大使馆。

苏联人一看到信后喜出望外，他们立即拍板定案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几小时之内勃列日涅夫的复信就到了华盛顿——只不过是信件往返的时间，我在白宫期间信件往返如此之快，这是绝无仅有的事。勃列日涅夫对当前的情况了如指掌：

完全像你所说的那样，我理解基辛格博士是你所充分信任的最亲密的同事，这次也将代表你讲话，并理解在我们同他商谈的过程中他所作的承诺将得到你的全力支持。

勃列日涅夫也照样不拘礼仪地亲笔附加了一句话：“勃列日涅夫夫人感谢你们的问候，并同我一起向尼克松夫人和你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勃列日涅夫的这封复信是我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他时才知道的。

历史将会证明我不曾多次拒绝授权。但这一次使我十分恼火。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授予“全权”只能束缚谈判的灵活性，而不是增加谈判的灵活性。

我们于十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约七时半到达莫斯科。这是我第一次作为国务卿访问莫斯科。我的对手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到机场迎接我。他陪同我以惯常的赛车般的速度直奔宾馆。

这座宾馆建在列宁山上，俯瞰莫斯科河。宾馆质朴而华贵，我以前曾在这里住过；不过这一次，由于我新任国务卿，为了对我表示尊重，宾馆上空升起了美国国旗——这个外交上的礼节使我格外激动。我们刚刚安顿下来，就要我们去出席例行的盛大宴会，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没有自由活动的余地。然后他们又企图抛开我曾对多勃雷宁坚持过的话，即在第二天上午以前不准备谈判。但他们想出了一条妙计，勃列日涅夫邀请我们去出席克里姆林宫政治局办公室星期六夜晚的“私人”宴会，尽管我们刚吃过一顿。

不管我们怎样判断对方的动机，总书记的社交邀请我们是不能拒绝的。这时我们在十五个小时的飞行之后头脑昏昏沉沉，又加上一顿俄国大餐肚饱腹胀，但也只得立即出发，以快得要命的速度急赴克里姆林宫。晚上九时刚过，勃列日涅夫身穿一套天蓝色的看上去象丘吉尔式的跳伞服的服装接见我们。他把我们引进他的私人办公室。室内有一张会议桌，足供四十人开会之用；房间的另一端安放着一张大办公桌，桌上安装着一架中型的自控电话机。

苏联人的心理战术非常有效，当勃列日涅夫建议我们吃饭以前“随便”谈谈的时候，我们几乎丧失了警觉。看上去他很遵守那项谅解，即第一天晚上不进行谈判——虽然与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统治者闲谈这种措词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勃列日涅夫谈锋甚健，大谈苏联领导人和尼克松的特殊关系——显然那意思是说，当坐下来正式谈判时，不要太顽固。他也没忘了提醒我，我是被授予“全权”的，因此没有必要把事情向华盛顿汇报。为了拖延时间，我也就顺应着当时的气氛，谈了一些原则问题，如绝不可只对一方有利，避免加剧紧张局势等等。

这场谈话看来似乎是为了争取时间不得不付出的一点小小代价，但我们也没有被那种异乎寻常的气氛弄得晕头转向。正当两个超级大国每天都在以成千吨的物资运往激战中的各方，彼此都

在力图削弱（如果不说是彻底消除的话）对方的势力的时刻，却在谈其双方关系。勃列日涅夫设法缓和气氛，便说苏联人对中东的空运和海运并不是什么反常的事情，他们只是在履行早已存在的为期四年的协定，“根据协定，我们必须运交那么多武器。”莫斯科明明是在给中东的战火浇油，却说成是在履行人所共知的法律义务，这种骗人的说法也未免太过分了，即便是为了保持和谐的气氛，拖延一晚上时间那也是说不过去的。对此，我含有讽刺意味地回答说：“在我们看来，你们好像是要在两星期内完成四年的协定。这种做法倒是怪新鲜的。”

同苏联领导人呆一晚上如果不对你来一点恐吓那是不可能的。勃列日涅夫再次谈起中东危机所包含着的战争危险，不过感伤的语气多于愤怒。他利用这一点来压对方接受他在扎维多沃和圣克利门蒂经常谈起的主张，即超级大国应该把自己的全面和平方案强加给中东。我把他顶回去了。我说，我是来谈停火的，不谈解决方案。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但双方同意第二天星期天上午十一时正式举行谈判。我开玩笑说，这样晚才开始，一定是想让多勃雷宁有时间到教堂去做礼拜吧。勃列日涅夫也巧妙地回敬了一句：“那是他的衷心愿望。”其实，我们两个都明白，我们都需要时间来估计军事报告，以确定我们的谈判立场。

我确信我们的谈判地位是强有力的，基本上能够按照我们所谋求的条件来结束谈判。这些条件是：就地停火；含糊地提一下安理会的第二四二号决议，并在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直接谈判这个问题上实现突破，那将是以色列自建国以来第一次直接谈判。可是我回到宾馆之后，又碰上一件使人泄气的意外事件。等待着我的的是尼克松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件中提到的那些指示以及白宫发表的关于指示已发出的公告。尼克松给我的信的内容分为两部分：对当前中东局势的分析以及他要我向勃列日涅夫口头转达的具体

内容。尼克松口授的这封信尖锐地讨论了中东问题，而且考虑到当时水门事件闹得正凶，他也是以非凡的毅力集中精力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虽然信中的意见我大部分不能同意。分析形势的部分是专门对我讲的，它表达了尼克松的坚强信念，即苏联和美国应利用这次战争的结束来迫使中东接受全面的和平：“以色列当前在苏伊士取得的胜利决不可使我们偏离自己的目标，我们现在仍须全力以赴地去实现一项公正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施加“一切必要的压力使它接受一项合理的解决办法，并且要求苏联人也迫使阿拉伯人接受的话”，那样也许更符合以色列的最高利益。尼克松接着又列举了迄今使问题不能解决的那些障碍：以色列拒不让步；阿拉伯人不肯采取现实的谈判态度；以及我们自己“忙于搞其他倡议”。这些已不再能成为永久解决的障碍。“美国的政治考虑”——这是尼克松对犹太人选票的委婉说法——“绝不会影响我们在这方面的决定，绝对不会。我想让你知道，我已准备对以色列施加一切必要的压力，不管国内会产生怎样的政治后果。”

向勃列日涅夫口头转达的那一部分内容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他要我说明，在中东外交问题上与履行美苏贸易协定不同，他的行动国会无权否决。尼克松还写道，勃列日涅夫六月份在圣克利门蒂提出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

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自己绝不可能以合理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而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则能够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必须插手，以便确定公正解决的适当行动方针，然后对我们各自的盟友施加必要的压力以谋求解决，使这一多事地区最终获得和平。

谢天谢地，刚才当我同勃列日涅夫“非正式”会谈时还不知道这封电报。美国的策略一直是把停火与战后的政治解决分开，并削弱苏联在停火后的谈判中所起的作用。现在尼克松的想法似乎是要我们进行一次广泛的谈判，然后把谈判的结果强加于以色列

来结束这场战争，而阿拉伯一方是使用苏联的武器来进行这场战争的。莫斯科将因迫使我们纳入一条我们一直企图避免的轨道而得到阿拉伯人的信任。我们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将会消失。他们将去依靠苏联——除非苏联愿意放弃他们阿拉伯计划的强硬路线，而这一点我们还看不到有丝毫迹象。退一步说，即令尼克松想改变既定的策略，莫斯科也不是合适的地方。这种想法将会使停火谈判复杂化。我们最多也只能达成原则协议，今后多年还会牵扯进去不得解决。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我在这次出使莫斯科之前就向尼克松提出，这次只谈停火问题，尼克松也是同意了。现在要扩大谈判议程，包括一项全面解决方案，这将使我们陷于困境。

两周来过度的紧张，过度的疲劳，再加上睡眠太少，这一切都化为一股怨气，我给斯考克罗夫特的电报相当尖刻：

给勃列日涅夫的信已经被利用来反对我。我对总书记说，任何方案我都得发回华盛顿考虑，总书记拒绝接受这一点，他的根据就是总统已授予我以全权。

这么一来，我在这里的处境很难办。如果我照总统信中的指示去办，我手上仅有的一点谈判本钱就要全部搞光。必须把停火作为我们的首要目标。要使以色列接受停火已很困难，这也不可能成为全球交易的一部分。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后果将无法估计。我们只能在停火之后，在以色列的默认下执行总统所设想的方针。在此期间，继续公开议论只能把事情全部搞糟。

当我徬徨不安时，我很少只是依靠一条渠道来了解情况。因而我公开打电话给黑格，表示我对收到的命令极为不满。但黑格一反常态，很烦躁地说：“你别再找麻烦好不好？我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我叮问了一句：“星期六晚上你在华盛顿又能有什么麻烦呢？”

黑格不耐烦地回答说：“总统刚刚解除了考克斯的职务。理查森和拉克尔肖斯都辞职了，全都乱套了。”

我这才了解到星期六晚上在华盛顿遇到了什么麻烦。

停火协议

现在立即结束战争更有必要了，不然的话，我们国内的政局激变就有可能为苏联人所利用。因此，我坚决按照我出发前由尼克松批准的有限计划去办。勃列日涅夫也急于要停火，因而尼克松的信里对我有什么指示也无暇深究了。

第二天（十月二十一日，星期日）我与勃列日涅夫的会晤推迟到中午才举行，这倒也好。尽管我曾通过迪尼茨提出要求，以色列政府却一直没有向我提供专门的军事报告。中央情报局向我报告了以色列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六下午发表的战报，说以色列部队已切断从开罗到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的所有的公路和铁路，把埃及在运河东岸的部队孤立起来。正如以色列在战争期间发表的其他许多战报一样，这一点还有待证实。不过在我们呆在莫斯科的人看来，情况似乎已进一步证实，以色列对埃及战线发起进攻的主要战略目标正在实现。

我们继续注意到莫斯科已下令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以便随时对中东进行干涉，其中包括七个空降师。显然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因为公开表示和平的愿望而放松了警惕，他已准备好一旦谈判失败便采取另外的一手。

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天早上我们自己的情报更加糊涂了。中央情报局报告说，激烈的战斗正在苏伊士运河一带进行，并认为双方可能都遇到了困难。据说以色列部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大苦湖和伊斯梅利亚之间的地区——意思是说正在向北推进，而不是侧翼运动，正在向南方的苏伊士挺进。（实际上当时以色列的部队正在向南北两个方向挺进，但向南推进的速度更快一些。）斯考克罗夫

特的电报说，他已告诉总统，以色列的部队确有进展，但进展速度“相当缓慢”。我没有直接从以色列得到任何消息，说明他们对战局的看法和意图。

最明确的消息倒是来自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一篇广播讲话。他宣称，以色列的部队肯定会随着战争的继续而每天有所进展；虽然如此，但以色列不反对停火。他建议在两种条件下实现停火：双方回到这次战争前的那条战线；或者双方保持停火时所占领的阵地。当我们获悉达扬讲话的报道时，我们正在顺利地实现第二种条件。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在我和勃列日涅夫会晤之前，我还从华盛顿得到开罗方面的一个消息。哈菲兹·伊斯梅尔第一次表示，萨达特也许愿意把停火与全面解决分开来谈。他写道，开罗会赞成召开一次和平会议，由美国和苏联“保证”停火，并在停火后以色列部队立即撤退。我们绝不可能给予这样的保证，更不要说和苏联一起保证了。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伊斯梅尔的信息就是埃及在这个问题上说一不二的立场。

由于时差——那时华盛顿正是凌晨——关于“星期六夜晚大屠杀”那个乱子我再也没有听到更多的消息。在谈判结束之前，直到我回国途中，我再也没接到任何指示。

我们这方面情报工作这样差，而且毫无紧迫感，而苏联人的消息似乎比较灵通。星期天中午，我们在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办公室会晤时，我们发现苏联方面要求解决问题十分迫切，严格说来几乎没有经过谈判问题就解决了。一开始，勃列日涅夫泛泛地讲了几句，他说无论是谈全面解决的原则或是谈停火都可以。我说，我只准备谈停火，他也就欣然接受了。

谈判开始，勃列日涅夫先玩弄苏联人所惯于采用的那种进逼的手法，硬说我已同意了多勃雷宁在华盛顿提出的苏联三点方案

(参见第十一章)。这对我倒是新闻，因为我的印象是我已拒绝了苏联三点方案中的两点。这样，我又得重新阐明我们的立场。我说，苏联方案的第一点是要求停火，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第二点要求以色列“立即”撤退到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规定的那条线”，这一点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样一条线双方从未取得一致意见，要以色列回到并不存在的一条线上去，是说不通的，还因为应该把战后解决与停火分开来谈。至于苏联方案的第三点，呼吁为进行谈判而“适当磋商”，应当制订一条明确的义务，使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直接会谈。

通常苏联人总是对他们表面上的立场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才放弃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算作是一个让步。但这一次，甚至我还没有提出我的看法，勃列日涅夫就表示同意了我的观点：“我也不认为这个方案就是理想的，或者可以原封不动被接受的。”

为了避开苏联方面草拟的谈判方案，我先提出了我和乔·西斯科昨夜拟定的我们方面的草案。我们的第一点是要求就地停火。我们的第二点打消了苏联人要以色列立即撤到新的战线的要求；实际上完全没提撤退问题，只是吁请双方开始执行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的“所有部分”——这是个相当含混的提法，外交家们争论了多年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我们的第三点是要求“有关的双方”在“适当赞助”下，立即进行谈判；换句话说，停火将导致与以色列直接谈判，而这一点是阿拉伯国家一直加以拒绝、而以色列的历届内阁所一直要求的，直接谈判就是打开对他们让步的大门。我们没有提保证问题。

出乎意料，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接受了我们的草案，只稍微作了一点文字上的改动。^{*} 但后来他们又忽然变卦，要求把对直接

^{*} 我们达成协议的文本变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第三三八号决议。该决议见本章末注①。

谈判的“适当赞助”改为由美苏双方对谈判的结果加以保证——这是把和平强加于谈判双方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我拒绝了这个主张。我给“赞助”一词下的定义是：在谈判开始的时候以及此后仅仅在谈到关键问题时美国和苏联的外交人员到场。这一点，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也很少争论就接受下来了。

谈判只用了四个小时，停火决议的文本就商定了，另外还有一项关于“赞助”定义的谅解。考虑到需要进行翻译、校正文字，并且会谈经常中断以便各方碰头商量，这个进展可以说是了不起的。

这项协议实际上比我们两星期来所酝酿的那个方案还要好一些。美国原来提出的方案是停火，并结合停火一般地提一下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四个月以前，在美苏最高级会谈的公报中，勃列日涅夫断然拒绝提这个决议。这以后以及在这次战争当中，苏联人一直坚持由美苏双方共同解释第二四二号决议，并把我们的条件强加于有关各方，而按照苏联的方案，那些条件无异于它的阿拉伯强硬路线的翻版。现在是我们的方案占了上风，第二四二号决议的解释问题由有关双方直接谈判去解决。美苏“赞助”的定义模糊有一个好处，这一点我在给斯考克罗夫特的电报中讲到了，那就是可以防止其他方面插手谈判——我的意思是担心我们的欧洲盟国——从而给我们增加压力。

剩下来要在莫斯科谈的问题就只是在什么时间把我们双方作的这个停火决议通知纽约了。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要求把这个决议立即提交安理会，从决议通过的时候起，停火就立即生效。这着重说明了当时阿拉伯军队已处于绝境（不过，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还没有收到我们方面或是以色列方面的任何正式的报告）。然而，他们的这个要求是完全做不到的。现在是莫斯科时间下午四时，华盛顿时间上午九时。我们起草报告和指示，用电报发回华盛顿至少还要一个小时，而且还得与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成员商量，

尤其重要的是还要与以色列商量。假定我们的估计正确，这些讨论也要在华盛顿时间中午十二时才能开始。因此我提议，美苏代表在纽约时间下午六时提出要求，要安理会在晚上九时开会（留下九个小时供他们协商）。停火应在决议通过后十二小时生效，而通过决议也还得要进行几小时的辩论。勃列日涅夫很勉强地接受了这个时间安排，照这个时间表，停火生效最多推迟大约二十八个小时。勃列日涅夫还表示一定尽可能施加影响，促使交换战俘早日实现，这一点是我代表以色列向苏联提出的。

美国代表团回到国宾馆立即开始工作。我和我的工作人员很快起草了一份给总统的报告和一封总统致梅厄总理的信，此信到达华盛顿后将立即由斯考克罗夫特亲手交给迪尼茨。我们估计这封信最迟不会晚于华盛顿时间中午十二时到达，也就是安理会开会之前九小时和表决之前约十二小时。尼克松致梅厄夫人的信说明了我们的成就：

总理夫人，我们相信，这对你和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对你的部队的英勇战斗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一）它将使你的部队停留在原地不动；（二）决议中绝对没有谈到“撤退”这个字眼；（三）我们第一次使苏联同意了一项要求在适当赞助下由双方直接谈判而不附带条件或限制的决议。同时，我们和苏联人已经私下达成协议，共同对你和阿拉伯人提供赞助以促进这一进程，如果你们双方都同意的话。

信中还指出，现在提出的这项停火决议与萨达特五天前公开提出的计划有很大的不同。最后要求尽快回信。

我们还起草了给哈菲兹·伊斯梅尔、伊朗国王、侯赛因国王和我们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斯卡利的信件。这些工作大约在莫斯科时间下午五时半即华盛顿时间上午十时半完成。

下午六时半我会见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驻莫斯科的大使；会见英、法大使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会见澳大

利亚大使是因为十月份轮到这个国家的代表担任安理会的主席。外交人员对于他们的政府尚未表明立场的问题向来是不轻易发表意见的。但是这一次他们不等到急电报告他们的首都就满有把握地相信他们的政府会对此表示热烈祝贺。由于通讯线路重叠交错，频繁往复，他们的报告很可能到得比我们还早。

这以后我躺下休息了一个小时。晚上八时左右（华盛顿时间下午一时）醒来，我吃了一惊，发现所有的信件华盛顿都没有收到。我的工作人员先是想通过我们的大使馆发这些信件，大使馆在莫斯科市中心，有四十五分钟的路程。但大使馆有很大困难，因为发机密文电的程序很麻烦，也很费时间。然后我们又想通过我们的总统专机（它停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发电，经由卫星转播站与白宫情况室联系。但是通过专机发出的信件华盛顿收到后几乎无法辨认。我的同事拉里·伊格尔伯格通过公开的电话与我们的大使馆联系，然后又与华盛顿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取得了联系。斯考克罗夫特能够了解我们已达成停火协议，但是那封给果尔达·梅厄的信传到迪尼茨手上时已经面目全非了。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又转回来通过大使馆发那些信。

我这时的反应后来拉里·伊格尔伯格在一段送给我看的回忆录中作了如下的描述：

回想当时的情景就像是在昨天一样，我坐在宾馆一个大房间的书桌旁，在电话上大骂使馆的通讯人员。（我生气是因为电话老接不通，不是认为这样会使通话快一些。不像某些国务卿那样，我从不认为大声吼叫会对那些死东西起多大作用，尽管它们很不好用。）房间里有二、三十人，都在噼噼啪啪地讲话，以乔·西斯科吵得最凶（他是一个一会儿也不能安静的人）。总而言之，房间里挤满了人，声音嘈杂，我几乎被人群遮住了，声音也听不清楚了。

……我没有觉察到，就在这当儿，你走进来了，显然听到了我在讲些什么（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你怎么听到的）。人群中一声吼叫：“什么，电报还没有

发出去!?!”我抬头一看,看见你站在房间中央,怒气冲天,而且别的人都不见了(只有一个例外,我马上就讲到)。二、三十个人——无疑是以西斯科为首——都溜之大吉,快得比胡迪尼*的戏法还快。唯一的例外是温斯顿·洛德,他像是缩在一个角落里,可是——上帝保佑他——他想凑上来打个圆场,使我镇定下来。从那以后,温斯顿在我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当然对他的非凡的勇气也是十分钦佩的。

这可不是好玩的事情。总算起来至少失掉了四个小时的时间,也大大失掉以色列对我们的信任。起初,我以为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技术故障;他们说,大气中的电暴中断了所有的电讯联系。第二天又碰到倒霉的事情,总统专机上的直接通讯设备不能用了,所有的信道居然都同时失灵,这是五年来的外交使命中从未遇到的事情。这时我想起一九七二年四月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之前我秘密访苏时的一段经历,那次我从停在机场的专机上给尼克松发电,也费了不少周折,而且电传失真。^② 如果这次干扰确是有意搞的(这一点我还不能证实),** 那对苏联也没有多少好处;但这件事本身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使人十分气愤的是,苏联的官僚们搞这么多小动作,似乎是甘愿以丧失信任来换取极有限的好处。

毫无疑问,电讯干扰减少了以色列可资利用的时间,不然的话,以色列可以在临停火之前调整自己的部队发起最后的进攻。但这是无关紧要的。以色列知道我到莫斯科去是谈判停火;我们曾一再告诉他们,谈判一开始,他们完成军事行动的时间就很有有限了。我曾告诉迪尼茨是四十八小时,到现在为止,时间差不多已超

* 胡迪尼(Harry Houdini, 1874—1926),美国著名的魔术师。——译者

** 无线电师通常总是在频谱上保留很多频率,以便在有些频率受到干扰不能使用时可以保证发电。这一次所有的波段都受到干扰被打乱了——这是很少有的事情。从专机上和从美国大使馆发出的电文都模糊不清。这件事情很怪,但又不能马上查清。大多数专家断定是由于大气干扰和其他技术故障,但专机上的无线电发报员确信这样长时间的广泛干扰只能是有人在捣鬼。

过了一倍，因为他们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利用，而且以色列现在很可能在全速前进。除此以外，我还把“丢失”的时间又捞了一些回来，我打电报给在纽约的约翰·斯卡利，说我们并不像苏联那样急于要在午夜前通过停火决议，虽然我们曾向勃列日涅夫这样暗示过。（决议最后于纽约时间午夜十二时五十分通过。）*

苏联搞的这一手（如果真是有意的话）主要是对美国 and 以色列的关系产生影响。由于通讯联系耽误了时间，以色列就只有八个小时来考虑问题了，而不是我们原来所计算的十二个小时。这样，在耶路撒冷看来就象是最后通牒一样，而我们本来并没有这个意思。同时还使我们不能及时通知我们政府的其他部门，通知国会的领导人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斯考克罗夫特象往常一样，迅速完成了这些工作。中国联络处主任黄镇态度和藹可亲，但是吃不透他是什么样的看法——中国外交人员在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向来是不明确表态的。他对于美苏联合向安理会提出的提案中那种共管世界的味道肯定是不喜欢的。但我们已经让中国人了解了我们的策略的细节。（最后在安理会上中国没有参加投票——这是一种表示不参预的最温和的方式。）

当时我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最大限度的成果。如果还想榨取更多的东西，那就很可能会引起重大的危机，为了一点小便宜而危害我们已确定要开始并要加以控制的和平进程。我们已经表明，苏联的武器不可能使阿拉伯人在军事上真正有别的出路。我们一方面显示力量，另一方面也必须表明节制是会得到报偿的。在未来的和平进程中，阿拉伯人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伙伴，我们无意把阿拉伯人赶到激进派或是苏联人的怀抱里去。至于苏联人，我们主动跟他们搞对抗是没有意义的。正如以后几

* 决议实际上是午夜十二时五十二分通过的，但联合国为方便起见正式定为十二时五十分。

天的事态所表明的那样，当我们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也不怕对抗。但我们认为，乘阿拉伯人遭受挫折之机，把他们彻底搞垮，并不代表我们的切身利益。

此后不久，斯卡利报告说，安理会已通过了美苏联合提出的停火提案，即第三三八号决议。十月二十二日纽约时间午夜十二时五十分，莫斯科时间已经是七时五十分了。我和葛罗米柯在国宾馆共进早餐，这样一来我倒成了主人。经过极度紧张而且冒极大风险的谈判之后，通常总是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主要目的是重新确定一下“适当赞助”的含义。苏联人显然急于要向他们的阿拉伯委托人炫耀，表明我们上了他们的圈套，保证实现他们的计划；我们的目的和他们刚好相反。我们起草的一个文件给“赞助”下的定义如下：

有关双方的谈判在谈判开始时以及此后在谈判过程中涉及解决关键问题时，将在美国和苏联的积极参加下进行。

席间酒后感慨，大谈美苏保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也开了不少玩笑，反映了在重大的谈判过去之后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葛罗米柯的妙语之一是把他的盟友萨达特称作“纸骆驼”。虽然是大清早，每个人都以白兰地祝酒，但大家都心里明白，我们只不过把彼此间的对抗改变为外交谈判罢了。中东交战双方的激烈情绪，执行决议的困难，以及美苏利益固有的竞争性，很快又将支配着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紧急访问以色列

那天晚上当华盛顿和耶路撒冷为拟议中的决议紧急交换文电的时候，果尔达·梅厄总理曾经提出，要我在从莫斯科回国途中访问以色列。这倒是提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从莫斯科到华盛顿中

途不经过特拉维夫。幸好，果尔达还没有提出，以色列接受安理会第三三八号决议要以我同意访问以色列作为先决条件。她虽然没有这样说，但是事情很明白，战后怎么办，她如何向内阁交代，这些问题她都需要得到保证。

我决定去访问之后，立即通知萨达特、侯赛因、苏联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大使。这就引起了一系列新问题。我是在十月二十二日早晨六时左右作出这个决定的；四个小时以后离开。我们的计划作了改变，要得到新的飞行许可证。时间那样早，苏联的官员还在睡梦中，要想找到一个负责的官员是不容易的，要他批准一个飞越苏联大部国土的飞行计划那就更难了；苏联的国土通常是不对外国人开放的，特别是他们本来以为我们是向西飞行，现却偏偏要向南飞行。我们驻莫斯科的代办阿道夫（斯派克）·达布斯（他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官，一九七九年任驻阿富汗大使时被暗杀）使用外交官非到绝对必要时不肯使用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最短时间内把一切工作都安排好了。

莫斯科时间上午十时左右我们登机起飞。飞至中途我忽然想起我们是在向战区前进。按规定，停火还得几个小时后才能生效。我想最好由美国第六舰队派飞机保护一下，这样做也许不为过分。拉里·伊格尔伯格从我们的飞机上与五角大楼联系；五角大楼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答应立即安排，而且说到做到。这件事突出地表现了美国的军事效率，我们和美国海军的一个大机群在塞浦路斯上空相遇，他们护送我们直到在特拉维夫的洛德机场着陆。

实际上这件事比我当时所知道的要复杂得多。当时第六舰队司令是海军中将丹尼尔·墨菲，在这之前他曾是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的助手，后来又任副总统乔治·布什的参谋长。那件事发生后几个月，伊格尔伯格在华盛顿的一个社交场合偶然碰到墨菲，祝贺他在一九七三年十月那一次干得特别出色。墨菲向拉里描述了

当时的经过。

舰队正在进行飞机发射演习，这时忽然接到五角大楼的命令，要我们对国务卿进行护航。舰队司令当然要问我们的飞机位置。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笼统地告诉他在莫斯科至特拉维夫之间的某处。（也许我们的飞行员不愿意讲明确切的位置，他怕别的不友好的飞机也在跟踪我们。）墨菲立即下令其余的飞机全都起飞，一起飞向地中海东部巡视，并命令早先起飞的飞机也搜寻我们，只要燃料够用就继续寻找（这时那些飞机上的燃料已经用掉一多半了）。墨菲焦急万分，不时狂暴地询问他的飞行员们找到没有，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段时间内他对五角大楼的询问只能冷淡地回答一句：“我们还没有找到，但很快会找到的。”果然很快找到了，舰队司令才松了一口气。但这时飞机上的汽油已经不多了，刚好够返回航空母舰上。墨菲对伊格尔伯格说，这是他在第六舰队任职期间最紧张的经历之一。

常有人问我，我在政府任职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什么事情。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很多，而且发生这些事情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又各不相同，很难加以比较。然而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我到达特拉维夫的那一天肯定是最使我难以忘怀的事情之一。

我们在当地时间下午一时到达特拉维夫洛德机场（现称本一古里安机场）。事后有相当数量的报道，描述了以色列是多么希望把战争继续下去，以及他们知道停火以后心情是多么痛苦。但没有人能料到这次接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士兵和老百姓欢迎和平来临，觉得这是最大的幸事。以色列是英勇的，但是它忍受痛苦的能力已经达到最大限度。来机场欢迎我们的人似乎都从内心里感到他们已临近地狱的边缘，两星期的战争已经把他们搞得精疲力尽。三三两两的军人和老百姓含着眼泪向我们欢呼。他们的面

容显得疲惫不堪，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忍受痛苦的能力已达到限度。以色列的确是筋疲力尽了，尽管在军事地图上表现出另一种情景。以色列人民正在迫不及待地渴望着和平的到来。

在特拉维夫近郊赫兹利亚的宾馆里人们也是表现出同样的神情。这个所谓的宾馆是一幢带有神秘色彩的现代派建筑物，位于山顶上，果尔达和她的阁员就在这里接待我。建筑物的周围布置了带刺的铁丝网，警卫森严。房间的设备入时，但还说不上精美。我曾经好几次到过这里；显然，这里是从不接待“客人”的。这是一处安全所，是用来同外国来访者举行秘密会议的。

接待我们的有：果尔达、达扬、参谋长戴维·伊拉扎，以及其他官员和部长们。还有前任大使伊扎·拉宾，他当时没有担任官职，是被邀请前来参加会谈的，但是他一言不发，态度暧昧。他们全都面带倦容，非但是身体疲倦，而且精神上也显得疲惫不堪。往常以色列人那种趾高气扬的架势依然有所表现，但这一次却是很勉强地装出来的，已经不再那么神气十足了。他们说胜利即将到手，但又没有十分把握，更多的成分像是要保持那个不可战胜的形象。他们埋怨说，不然的话，再有三天时间的战斗，埃及的第三集团军就会完全被包围歼灭。也是这批领导人，曾多次预言“我们再需要三天时间”，但始终证明他们是过分乐观了。何况，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再给以色列三天时间而不引起超级大国的危机和毁掉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而且以色列的领导人明白这一点。他们的语气只是希望那样，而不是反驳责备；是更多地怀念一九六七年那样的光辉战绩，而不是反映当前的现实。

第三集团军的问题总算没有成为在宾馆讨论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当时我问果尔达，假定不停火，以色列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她说是福阿德港——位于运河的北端，是埃及第二集团军控制的地区，那离第三集团军实在太远了。何况，有一点是很明显

的，在宣布停火的时候，以色列已经伤亡惨重——死亡达二千人，按人口比例，等于美国死亡二十万人。

以色列人深思之后认识到，他们虽然打赢了最后一仗，但无敌的神话破灭了。阿拉伯军队并没有被消灭。阿拉伯国家没有打赢，可也不再怕以色列的威力了。以色列幸免于了一场灾难，在军事上占了上风；结局是攻占的阿拉伯领土多，失地少。但从此它也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孤独的时期，可靠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更加使人忧虑的是，他们已意识到，过去那种洋洋自得已加重了这种局面。

参加会谈的以色列的每一个领导人，由于各人的职责不同，对于这次创伤的态度也不同。他们模糊地意识到这次战争葬送了他们的个人前程。果然，不出一年他们都纷纷垮台。对果尔达来说，她已经担任过各种重要职务，这一次也乐得退出舞台了。她所感到痛苦的倒不是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是以色列所遭受的损失，她相信如果有预见的话，这种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她牺牲了个人的幸福而献身于事业，把整个以色列当作她自己的家。以色列每牺牲一个人都是她个人的损失。她不仅是为以色列所受到的损失而伤心，而且为以色列的前途伤心，在这一点上她比她的同事们看得更清楚。

果尔达对于战前情报工作的失误甘愿承担责任，她不找借口，不作解释。她已没有政治野心；她本能地感到现在应准备迎接对以色列的挑战，那就是说，以色列多年来所迫切要求的直接谈判必须作出让步才能实现。对她来说，战争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在她的同僚中间，只有她在准备下一场战斗；她认为这会完全排除外来的——特别是美国的——干预，认为它们是想拿以色列作牺牲来缓和自己的问题（她心目中拿以色列作牺牲通常是指对现状作任何变动）。她在宾馆的秘密会议室里往返徘徊，深思熟虑，坚持要以以色列的妥协来换取最大限度的代价。我明白，跟她对话，首先

会遇到的就是她那股顽强劲。

参谋长戴维(“戴多”)·伊拉扎将军的情况刚好相反。他明白,每次战争总会有受害者;他将成为以色列麻痹大意的牺牲品。政治发展的进程一旦转向对战争的过错进行分析时,他在军队或政府中的事业就要立即结束。我不想冒昧地加入一场辩论,断定他对于以色列未能及时动员自己的军队负有多大的责任,因为这与我此行的目的无关。伊拉扎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才能出众、任劳任怨、行动果断的人。他向我们简单地叙述了战争的经过,他神情镇定,仿佛战火纷飞的日子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次年,以色列的一个委员会把战前未作好准备的主要过错加在他身上,于是他辞掉自己的职务。他过着隐居的生活,郁郁不得志,一年以后便去世了。医生诊断是心脏病。这是那些富有经验的人为这颗伤透了的心找到的最恰当的说法。

达扬的情况极其复杂。以色列的历史的嘲弄之一是,这个散居在世界各地经常受到迫害而且富有智慧的民族,在建立自己国家的过程中却造就了一种新型的领袖。这位土生土长的农民出身的领袖为人老实,想象力不是过于丰富(只不过对于灾难却是很敏感的),他是寸土必争的先锋,在他看来外交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这一点克劳塞维兹曾经指出过——它也完全遵循战争的规律。在达扬身上兼有新旧两种人物的特征。在同僚中间,唯独他视野广阔,思想敏捷,能够把以色列摆在世界格局中来考虑。他的业余爱好是考古学,因而具有观察历史的能力,甚至比他本民族的悠久历史看得更远。他了解并不是只有犹太人经受了历史的灾难,虽然命运之神似乎对犹太人特别无情,他们的灾难比其他民族更多一些。因此,他比其他以色列的大多数领导人更了解其他社会的观点,特别是阿拉伯人的观点,所以也能更忍让一些。他具有诗人的敏感气质。有时他能看到一个问题的很多方面,因而不能抓住

重点，而这对于所有的领袖人物却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一点上他的总理则很突出。不过我始终认为，当和平进程开始时，他的特殊才能将是非常需要的；并认为达扬很可能成为把以色列引向和平的政治家。

达扬的悲剧是，正如同摩西已经窥见天国一样，在攀登顶峰的征途中他却丧失了实现自己愿望的能力。象许多多才多艺的人一样，他了解自己的重要性，也难免有虚荣心。他身居要职已有二十年之久，但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非凡的才能。他保持自己的地位是由于人们公认他是一九五六年战争的英雄，后来又是一九六七年那场战争的辉煌胜利的策划者和救世主（尽管拉宾可能认为他应该获得这个荣誉）。然而命运是冷酷无情的，正当需要他发挥才能的时刻，他的光辉形象却幻灭了。如果说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是参谋长的过错，那么国防部长自然也难辞罪责。说到底，对参谋长的每一种批评都同样适用于他的顶头上司。

达扬感到无比痛苦的是，在以色列的领导人中，他虽然具有远见卓识，但当他的预言即将成为现实时，他却未能察觉。多年来，他一直提醒说，如果以色列坚持呆在运河沿岸，战争必不可免。他曾主张双方部队脱离接触，或者必要时以色列单方面撤退以形成一个缓冲区。他一直未能说服其他内阁成员或是果尔达。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单方面撤退的想法。达扬的远见果然得到了证实，但也几乎把他毁掉。有很多原因说明他未能看出他所提醒的进攻即将到来；其他许多人对于埃及的意图也得出同样错误的结论。但是英雄人物承认也可能犯错误就有损于自己的威信。于是达扬极力维护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因而不能采取使他能避免厄运的唯一做法，也就是果尔达实际采取的做法：老实承认自己的估计错误。

非但如此，一九七三年以后的达扬完全变成另外一副样子。在

整个战争过程中他摇摆不定，时而悲观失望，时而过分乐观。他曾建议向西奈内地撤退，继而又经常过早地宣布胜利，从而危害我们商定的外交工作。他使我想起参加轮盘赌的赌徒，输了钱又想返本，不断地加大赌注。他想当和平总理的美梦即将实现，舍不得让这个美梦破灭；然而命运之神似乎又离他太远，他想抓又抓不住它。他不象果尔达那样已经登上高位，是否继续当总理已经无所谓了，也不象伊拉扎那样已经被打入冷宫。他野心未泯，又感到厄运来临，因而犹疑不定；野心大难于实现，引退又没有把握，末日将临是肯定的，但又不愿承认倒霉的时刻已经到来，说不定还可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因此，在宾馆会见的时候，他时而嘲笑辱骂，时而精神振奋。只有在他以为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才能看出蕴藏在他心底的忧郁和懊丧的心情，而这正是使这位杰出人物今后生活苦闷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情绪激动的时刻前来访问，我同果尔达三次会晤：第一次是私下会晤，时间是下午一时三十五分至二时十五分；第二次是在午宴席上，双方有大批的官员参加，时间从下午二时半到四时；最后一次是军事汇报会，时间是从下午四时十五分到五时。

我同果尔达在密室里坐下来，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有关战争的事，而是她最担心的以色列的前途问题，即美苏之间有无秘密协议要把一九六七年的边界线强加于以色列。我着重说明没有。她又问是否有协议要把任何其他边界线强加于以色列。我也说明没有。她把对美国的可疑之点全都问了一遍之后，就谈起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举例说明从地理位置和人口数量来看，以色列是很不安全的，进而又谈到以色列完全依靠美国的帮助。两星期来我们一直站在以色列一边，甚至冒石油禁运的危险，而且最后终于对美国实行了禁运。与此同时，又进行了外交活动，并在第三三八号决议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因为在第一星期中我们根本没考

虑过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直接谈判的问题。现在，战争结束了，宽慰的心情几乎明显可见，但却引起了对战后问题的严重不安。二十五年以来，以色列的外交工作一直在大力争取直接谈判，现在这个目标就要实现了，果尔达却忧心忡忡，因为她意识到谈判的议程将使以色列面对长期以来它想避开的可怕的难题，而这一点她的同事们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

以色列的历史性恐惧是隐藏在犹太教法典的注释中的。会谈中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停火决议的第二款（即保证执行第二四二号决议）是否与第三款规定的直接谈判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即直接谈判是否仅限于谈如何回到一九六七年边界线的问题，还是以色列有权对第二四二号决议提出自己的解释？我再一次向果尔达保证，没有任何秘密协议，对于任何一方要提什么也没有任何限制。

总而言之，以色列感到到处都有危险，甚至纸面上的文字也是刀枪林立。果尔达很清楚，双方的心理状态变了，即使实现了直接谈判也无法补偿心理上的损失。我问果尔达，萨达特能否从战争后期的军事挫折中恢复起来。她的回答很干脆：“能恢复。因为他是一位英雄。他有胆量。”她是对的。以色列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以色列在战争中打胜了，但它的任务超出了人的能力。它是不能单纯靠武力、靠击败自己的敌人取胜的；必须彻底粉碎他们，这样他们才不能恢复。双方人口数量悬殊，仅开罗一个城市就等于以色列全国人口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民族，不管它多么英勇，也不能无限期地担负起这样的任务。因此，对以色列来说，和平固然可怕，但又是必要的。我这次到以色列来想要弄清的真正问题就是，当以色列还保持着英雄气概，汹涌的浪潮还没有淹没这个孤岛的时候，能否缔造和平。

午饭时，我们得到消息，知道埃及已接受停火，于开罗时间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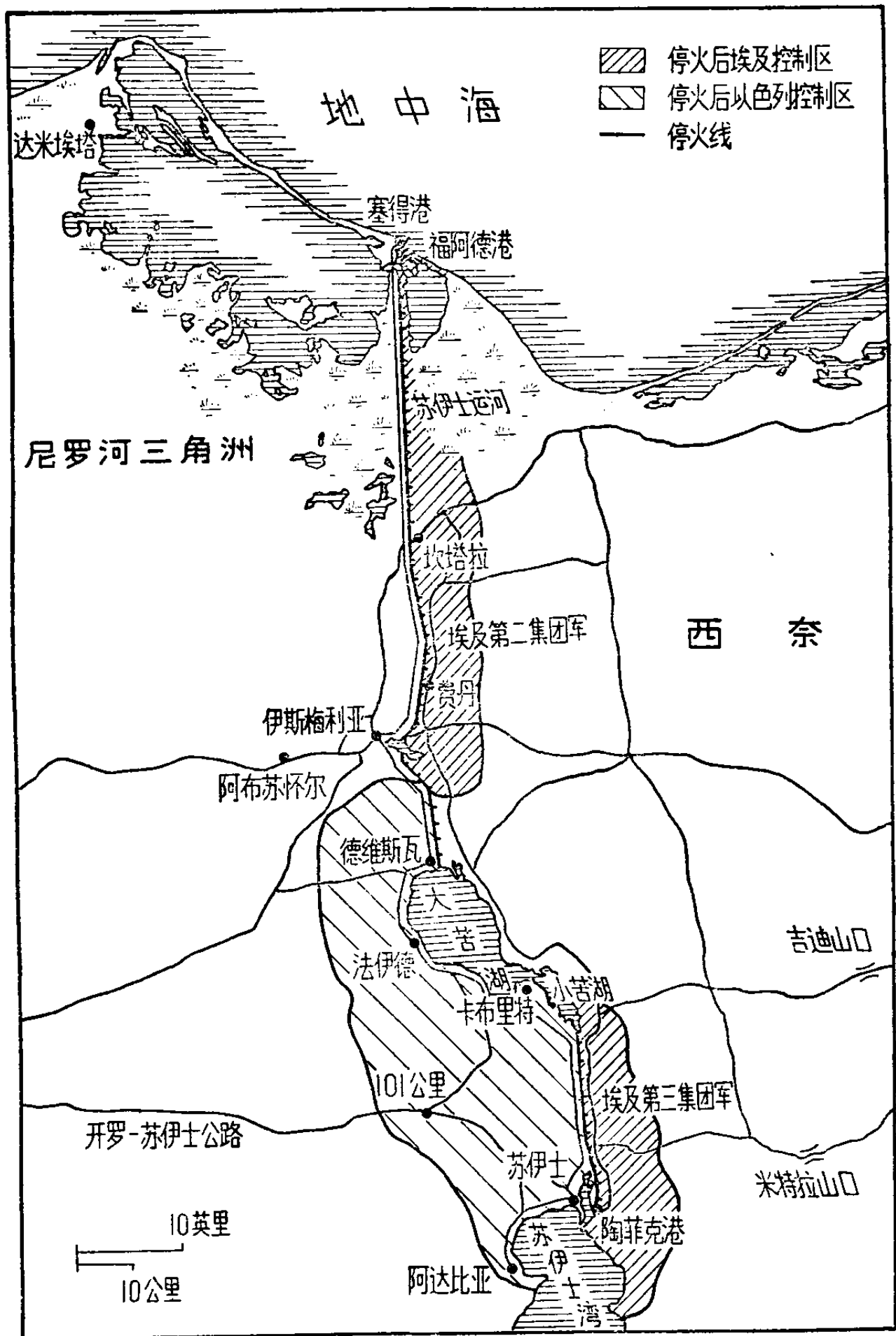
午五时生效(实际上比决议规定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餐桌上以色列人的反应是复杂的,宽慰、欣喜而又无可奈何,他们既抱有希望,又怀疑不安。接着,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停火的程序来了,继而一片混乱,也搞不清谈什么了。每当历史性的时刻,这种现象自然是常见的。人们搞不清开罗的时间是否与特拉维夫的时间相同;两个社会隔绝太深,似乎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我派伊格尔伯格给华盛顿打电话查清这个问题。在等待正式答复时,我建议以色列于当地时间下午六时五十二分宣布停火——即停火决议通过后刚好十二个小时——让开罗把这个时间换算成埃及时间。(后来证明两地时间相同。)

这天下午稍晚一些,我们从军事汇报会上第一次得知一星期来我们想从以色列方面得到的消息:他们的部队在苏伊士运河西岸的确切位置和进攻的目标。军事地图标明,除最南边的一条次要的公路外,埃及通向第三集团军的所有的供应路线都被切断了。以色列的军官赞扬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的战斗素质;他们对于所遇到的伊拉克部队的印象要差一些。

我离开以色列时既很高兴,也很担心。我们实现了我们的战略目标,但这仅仅是开辟了通向茫茫荒原的一条道路,要跨越这个荒原还需要纪律、团结和意志。我们又收到哈菲兹·伊斯梅尔的来电,邀我在从以色列回国途中在开罗停留。我觉得这样的访问以色列恐怕难以忍受,而且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没有准备好跟埃及进行认真的对话,因此我婉言谢绝了这一邀请:

基辛格国务卿对于伊斯梅尔先生惠予邀请他访问开罗谨表谢意。遗憾的是,在接到邀请时,国务卿已离开这一地区,正在去伦敦途中。停火既然已经实现,他很愉快地接受伊斯梅尔先生的邀请,早日访问开罗。他期望在最近彼此确定一个方便的时间,并继续利用该渠道同伊斯梅尔先生交换信件。

与此同时,继“星期六夜晚大屠杀”之后,在华盛顿引起了剧烈



西奈前线：十月战争后的停火线

的震动。在向西飞行的途中，我只收到两份简单的报告。斯考克罗夫特在一份关于其他问题的来电中提到这件事：

当前人们最关心的是理查森—考克斯—拉克尔肖斯事件。所有新闻机构都对弹劾问题发表评论。停火的消息当然是头版头条新闻，但最近的水门危机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

黑格的来电讲得更详细些：

不幸的是，由于考克斯被革职以及随后理查森和拉克尔肖斯的辞职，你将在全国处于重大危机的情况下回到国内。由于局势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在莫斯科所取得的成就的一些细节似乎已不为人们所注意，其真正意义也不能充分表现出来。因此，你必须竭力保持全局观点，并尽最大的努力使全国重新注意总统在解决中东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求弹劾总统的浪潮明天就可能发展到国会中去，但我们相信头脑冷静的人会占上风，如果总统的本钱得到正确运用的话。

至于现在，总统认为，明天我们必须召开一次两党领袖的会议，在会上你可以详细地报告中东的局势，并特别强调总统迄今所获得的成就，以及保持全国团结和在未来危机中保持坚强领导的必要性。

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晚上我们到达伦敦附近的希思罗机场，在那里作短暂的停留，向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汇报情况的时候，我才从英国的报纸上了解到国内事情的全部经过。弹劾的程序即将开始。我就要回到这样一个国家的首都，即使对中东和平作出了贡献，在国内也难免威信扫地。

停火没有解决

亚历克爵士对于战争结束表示欣慰，但怀疑停火能否巩固。他得到的情报说，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正在策划在第二天发动进攻；战争有可能再度爆发。由于与华盛顿联系会浪费时间，外

交部霍姆的助手代我接通了苏联驻伦敦大使的电话。苏联外交官没有那种临机应变、主动作出反应的特长。我花了不少时间而且在英国外交人员的帮助下才使他相信我不是冒名顶替的骗子。这位倒霉的大使也许还以为我是在邀请他参加晚上的宴会呢；他一定要把我想传达的话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由谈话变成信件。我告诉他，以色列已经接受停火决议；如果叙利亚发动进攻，其后果我们不能负责。对此，他不敢主动地表示意见。

但中东问题复杂多变，人们很难加以预料。停火问题的确没有解决，虽然事态不是以我们在希思罗机场所担心的那种方式出现。看来战争在超级大国的主持下正要结束，新闻机构刚刚发现美苏缓和有所建树的时候，十七天来我们一直设法避免的对抗，又在我们面前突然爆发了。

麻烦是出在苏伊士运河沿岸。我是在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凌晨三时到达华盛顿附近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从莫斯科出发，中间在特拉维夫和伦敦停留，经过一整天的长途飞行后，我就回家就寝。我睡了四个小时，于早上回到办公室，发现有两份电报：一份来自开罗，另一份来自耶路撒冷。哈菲兹·伊斯梅尔的来电简洁扼要，他说以色列部队破坏了刚刚生效的停火，并正在占领新的阵地。埃及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伊斯梅尔询问美国和苏联正在做些什么来使以色列遵守决议。

驻以色列大使肯尼思·基廷的来电很长，也很复杂。果尔达刚刚邀请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果尔达一开始就指出国内有相当多的人反对停火；她要花相当大的力量才能得到议会批准。然后她就振振有词地对约旦阳奉阴违的立场表示不满：侯赛因已公开接受在约旦河西岸停火（西岸确已停止射击），但实际上他又躲在叙利亚未发布停火命令的地区进行战斗（约旦在那些地区派有部队参加战斗）。由于她故意避开不谈苏伊士战线，基廷在来电中

提到当天早些时候收到的以色列军方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说埃及在大规模地破坏停火。基廷含蓄地说，这些说法是可以引起怀疑的，因为以色列的部队似乎在顺利向前推进。他断定果尔达知道这种危险。果尔达承认她的部队指挥官曾经请求“再给他们两三天时间”，以便完成对南线第三集团军的包围（这一点，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不曾告诉我们），但内阁否决了他们的意见。她坚持说，遗憾的是，当天夜里已经停火以后，埃及破坏了停战，发起大规模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她已命令以色列部队继续战斗，直到埃及人停止战斗为止。

我和基廷有同感，也抱怀疑态度。头一天在特拉维夫的军事汇报不能说明埃及有可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果尔达对基廷谈话的前一部分也说明以色列的指挥官无意严格遵守停火。我也感到心情沉重，因为在以色列的时候，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我曾表示，为了补偿莫斯科通讯中断所造成的四个小时的损失，在我回国途中，在停火的时间限制之内，如有几小时的“滑动”，我会谅解的；我的这番话也许壮了他们的胆。但现在这场新的战斗继续进行已远远超过我所默许的那个短暂的时间。现在已超过停火的时限将近二十个小时了。而且以色列无论如何也讲不出任何理由来说明这是自卫。但另一方面，伊斯梅尔和果尔达的言论仍相当温和，并不说明危机就要爆发。

我们收到的两个消息显然还没有引起莫斯科的注意。不然的话，克里姆林宫也会像我们一样，把违反停火的任何行动看作是一场剧烈冲突的恶兆。相反，上午七时五十分苏联代办尤利·M·沃龙佐夫却转来了莫斯科的一封肯定的复信（多勃雷宁还未从苏联首都回任）；原来我在希思罗机场曾发出警告，说叙利亚即将发起进攻，这封来信是就这件事而发的：

国务卿基辛格的来信收悉，我们已采取适当步骤。现谨通知基辛格博

士，关于最近安理会的决议，据我们所知，叙利亚方面并未考虑采取那类行动。

上午九时半左右，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打电话告诉我，埃及已正式提出控诉，指责以色列破坏停火，并要求安理会开会。瓦尔德海姆建议由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国家组成一支国际部队来监督停火。我告诉他我要和我的同事及苏联人商量。

几分钟后，我同主管联合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戴维·波珀商谈监督停火的做法。他认为最方便的办法是由原先驻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联合国观察员小组来监督停火。

然后，我与沃龙佐夫通话。开始以肯定的语气来讲，我请他转达我对勃列日涅夫的谢意，感谢苏联人对我的热情接待。同时我强调，双方议定谈判在两国的共同“赞助”下进行——这一点苏联人十分注意——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迅速实现勃列日涅夫的诺言，即释放以色列战俘。然后我转到这次谈话的主题，告诉沃龙佐夫关于破坏停火的情况，而且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我说，最好的办法是由安理会责成瓦尔德海姆吁请双方立即遵守停火。如果安理会愿意派遣联合国观察员或是联合国部队，我们也会赞同。沃龙佐夫显然没有接到指示。他只是含混其词地答应“是”或者“对”，表示已经懂了我的意思。我建议他通过白宫的交换台赶快与莫斯科联系；他说不必，并向我保证他会“立即”取得联系的。换句话说，不出所料，在战争的第一天，多勃雷宁说通讯联系太差，要求利用我们的通讯设施，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想借此表明苏联与阿拉伯人并没有什么勾结。

不到五分钟沃龙佐夫就回了电话。显然当我打电话的时候，莫斯科也同时打来了电话，说明他们现在也很焦急。原来是勃列日涅夫给我的一封短信——这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因为在过去勃列日涅夫总是给尼克松通讯。苏联大使馆把勃列日涅夫的信

译成英文发出用了一个小时。信中告诉我以色列部队正在沿苏伊士运河西岸向南推进。这个消息来源于莫斯科“自己的可靠情报”——换言之，不是埃及提供的情报；据推测可能是米格-25 蝙蝠式超音速飞机提供的情报，当时这种飞机正在从埃及机场起飞执行侦察任务。勃列日涅夫说以色列的行动是“不能接受的”，是“明目张胆的骗局”，由此可见埃及人的处境极为困难。他建议安理会中午开会——离中午已不到两小时——重申停火，所有的部队都撤回到十月二十二日停火决议通过时那条线上去，也就是停火生效之前十二小时的那条线上去。（这是苏联人聪明的一着，因为这样一来以色列人就要撤到目前战斗开始时他们发起进攻的那条战线后面去。）勃列日涅夫的信中还附有苏联准备向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其内容就是上述思想。

我们当时的处境很不妙。勃列日涅夫急切呼吁正好说明埃及第三集团军的处境远比我们的情报所了解的或是以色列人告诉我们的还要困难得多。而停火是美国倡议的，它的国务卿又访问了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埃及军队正在被歼灭而美国见死不救，那末即使最温和的阿拉伯人也不会再同我们合作了。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上午十一时零四分，我急忙与西姆查·迪尼茨联系，想了解除基廷报告的情况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情况。他说他不知道新战线的位置。然而他却转达总理的话说，她“以个人名义，坦率诚恳地担保，埃及前线上的任何行动都不是我们首先采取的。”我对果尔达本人是十分敬爱的，但她所谓的“首先”我却不能轻信。停火使埃及第三集团军免于覆灭，停火之后它却发动进攻；而且发动进攻之后又四处奔走请求再次停火，与此同时又在向处于被动地位的以色列人不停地开火，而仅仅是为了防御的以色列人却又在不断前进——这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

但是时间不允许进行抽象的辩论。我把苏联准备向安理会提的决议草案向迪尼茨读了一遍。我告诉他，我们不赞成苏联的提法，即双方回到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时的战线。但我觉得没有理由拒绝撤回到停火生效时的战线（决议通过后十二小时）。我说，我们赞成联合国派观察员监督停火。迪尼茨答应向国内请示。

几分钟之后，果尔达直接打电话给我，再次向我保证，是埃及首先破坏停火。我含混其词地说，我的印象是她的士兵并没有因为事态的突然转变而灰心丧气。我的巧妙回答产生效果之后，便开始说明我对联合国决议的想法。我建议以色列从现在的战线后撤几百码，就是说过去的那条停火线。我说：“在那片沙漠上，谁能知道现在这条线或是过去那条线究竟在哪里呢？”果尔达的不高兴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我只佯装不知道。她回答说：“那好，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现在的战线在哪里。”

现在我才明白，以色列已经切断了通向苏伊士城的最后一条供应路线。运河东岸的埃及第三集团军已被全部切断联系（参见第一五九页地图）。一场危机就要来临。

我首先努力争取时间来消除这场危机。上午十一时三十二分，我与沃龙佐夫联系。我说中午安理会开会没有多大问题，不过我们还没有准备表决，要拖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表决。无论如何我们不准备接受苏联的建议，即要求撤退到安理会表决停火时所占领的那条战线上去。

中午，迪尼茨打电话给我，所谈的情况相当复杂。但谈话的实质是以色列不愿意从现在占领的阵地撤退。他说，以色列政府同意那种说法，即没有人能讲出原来的停火线在哪里，因此它将不接受撤到那条战线的呼吁。但以色列不愿破坏联合国的威信，如果以色列同意一项本质上无法执行的新决议，那就是破坏它的威信。对联合国如此关怀体贴却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以色列过去很少

有这样的表现。但这也未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指示驻纽约大使斯卡利，要他在事情未决定如何进行之前暂不表明态度。

中午十二时三十六分我们收到勃列日涅夫发来的急电，这次是给“尊敬的总统先生”的信件。来信愤怒谴责以色列“背信弃义”，并绝对保证阿拉伯领导人会遵守停火。这封信由于火气太大而有失精确，它漏掉了那个可能给我们造成极大困难的问题——以色列是否撤退和撤到哪条战线。信件只集中地谈停止战斗。它以美苏共同保证停火的名义——苏联人提这种并不存在的保证也许是为了引诱开罗接受原来的停火——要求我们共同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并且“毫不迟延地”迫使双方接受停火。我考虑，如果苏联只是要求重新停火，那倒比较好办；如果是要求以色列撤退，我们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于是我们抢先一步，不让苏联提出更具体的建议，按照第一种理解来复信。信件在一小时内以尼克松的名义发出。有些事情我们本来还不太清楚，但也作为明确的事实提出：

我想向你保证，我们承担全部责任使以色列一方完全停止敌对行动。我们自己的情报表明，违反停火的责任是在埃及一方；但现在不是辩论这个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坚持要以色列立即采取措施停止敌对行动，并要求你对埃及方面采取同样的措施。

下午一时三十五分我把我们的决定通知沃龙佐夫。我们将支持再次停火的呼吁，并要求双方回到停火生效时所占领的阵地去。我提醒沃龙佐夫，那条战线的位置必须由埃及和以色列谈判决定。我向他讲明，我们预料那会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我说：“我们希望你们和我们对于这场辩论都要耐心一些。”沃龙佐夫似乎急于要弄清我们真正的态度，他说，“让他们争论好啦，只是别再打起来就行。”我又着重补充了一句：只要埃及释放以色列战俘，什么事情都好办。

沃龙佐夫向莫斯科请示并决定接受我的意见只用了五分钟的时间。下午二时二十六分，勃列日涅夫采取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做法，他在给尼克松的另一封信中又把上述决定重复了一遍。这时我们仍然不知道以色列军队的确切位置。但苏联的来信如此紧急，这就说明埃及军队已经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使以色列有了充分的讨价还价的余地；它可以利用这次谈判提出它所关心的其他一些问题，特别是释放战俘问题。但以色列所要求的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东西，它不管有没有道理要把我们的全部决定推翻，并放手去消灭埃及第三集团军。

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下午我们收到果尔达一份措词严厉的来电，是迪尼茨向我们宣读的。她硬是把新提出的安理会决议说成是埃苏两国把埃及违反停火的既成事实强加于以色列：“俄国和埃及一再使以色列面对最后通牒，而美国随后予以同意，以色列对此难以接受。”吁请以色列和埃及停火，谈判撤军的一条战线，我们事前非常谨慎，而且没有肯定这条战线，这当然不能说是一种最后通牒。我们对苏联的原提案已经作了很多有利于以色列的修改，但以色列三个星期来所经历的种种艰难挫折使它有这样的反应。果尔达告诉我们，以色列将不遵守新提的决议，甚至谈都不必谈。以色列似乎已下定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一定要使埃及屈膝求饶。我们不愿看到萨达特垮台——停火是我们倡议的，更不愿看到由于停火失败而使萨达特垮台。这几个星期以来，以色列受到的震动太大了，不然的话，以色列会理解它的这种想法会使和平永无希望，而且它还将注定要进行长期斗争。这是因为，假如萨达特垮了，起而代之的很可能是一个亲苏的领导人，他将利用苏联的武器重建相当于第三集团军的一个军是指日可待的，这样迟早又会爆发一场战争，而我们现在刚刚克服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又将重新出现。我们所左右的和平进程甚至还未开始就完蛋了；等到和平在

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恢复时，赞助的条件就会差多了。

以色列内阁念念不忘民族痛苦，因而它没有这样长远的看法。它的目标就是复仇，就是恢复其不可战胜的声誉。它从来没有经历过和平，因而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放弃已经到手的东西——不论是用什么手段得到的——来换取美国模糊的直觉所设想的和平进程。过去的几次战争都是在停战的条件下爆发的，以色列身受其害，所以它也不认为破坏这次停火就是了不起的国际事件。

开罗的情况看来截然相反。下午三时十五分发来萨达特直接给尼克松的紧急信件，信件是通过情报系统递交的——这是萨达特第一次公开以自己的名义写信，说明局势已到了严重地步。萨达特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建议，埃及与美国断交已达六年之久，他却要美国“进行有效地干预，在必要时甚至使用武力，以便保证按照美苏共同协议充分实施停火决议。”接着他还硬说（可能是根据苏联错误的解释）美国提出过停火的“保证”：“就你的保证来说，目前发生的事情不能使人相信未来任何其他的保证。”他威胁说要断绝这种刚刚冒头的美埃关系，但在信的末尾却仍然“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埃及建议我们使用美国的军队来对付我们的盟友以色列，当然，这个建议也和以色列要把停火之后被包围的一个埃及集团军置于死地，却希望我们进行外交干预一样，都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们决定照既定方针去办，要双方停止战斗，然后促使它们就停火线的位置进行谈判。下午五时十五分，我回答勃列日涅夫当天早上给我的信（给尼克松的信稍后一些）。复信的内容与尼克松的复信相同，但更具体一些。我肯定说，鉴于停火生效的重要性，我们已同意新的联合提案，尽管仍有某些保留意见。一方面支持停火，但另一方面对于双方停火后怎么办则含混其词。我着重指出，确定十月二十二日停火生效时的停火线的确切位置是

困难的：

我已对沃龙佐夫先生说过，而且他已肯定，我们之所以愿意接受你的安理会提案的原则是由于你的政府向我保证，当双方就争议中的（停火的）位置发生分歧时将表示克制。

我还强调，立即交换战俘对于保证有效停火将有极大的帮助。

星期二傍晚，我们代表尼克松给萨达特复信。我们首先排除苏联那种说法，即美国曾经“保证”停火：“我们的全部保证——不管旁的其他来源是怎样告诉你的——只是尽极大努力建设性地去促进一种政治过程，以便有可能获致政治解决。”复信继续说，虽然如此，我们方面仍在催促以色列遵守第三三八号决议。同时我们建议埃及部队也要保持停火。

下午八时三十分，迪尼茨通知我，我可以把果尔达的庄严保证转告萨达特，她保证：如果埃及确实遵守停火，以色列也将停止射击。这个建议看来慷慨大方，但迪尼茨的一番话又冲淡了它的意义。迪尼茨承认通向第三集团军的各条道路都被切断。饿死第三集团军比军事上消灭第三集团军要慢一些，但其结果一样；这样一来肯定会引起和苏联人的对抗。停火是美苏共同倡议的，其结果却使一个依附于苏联人的国家上当受骗，他们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幸亏，我们还未面临这样的问题。以色列已经同意再次停火，我们这方面也要保持信誉，于是我给哈菲兹·伊斯梅尔发去一个和解性的照会。我敦促萨达特命令他的军队停火。为了不留破绽，我还补充了一句：“如果他决定发布这样的命令，根据他的意愿，伊斯梅尔先生可以把这一事实告诉基辛格博士，以便其他政府同我们接近时美国方面可以加以疏导。”

这样，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二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似乎就恢复了平静。安理会通过了第三三九号决议，重申十月二十二日的停火，并“敦促”（不是“要求”——这是起草工作的一个小小收获，对此我

感到很满意,但以色列却很冷淡)双方回到以前的战线。*以色列和埃及都同意十月二十四日即第二天早上当地时间七时(华盛顿时间半夜一时)实现停火。此外,十月二十三日晚,叙利亚也终于宣布正式接受停火。

看来我们至少在外交上又有了回旋的余地。黑格星期二晚上告诉我,由于水门事件,尼克松“很消沉,非常消沉”。那一天,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了八项弹劾总统的决议案。但是我知道,无论他个人遭到多大的不幸,他在未来复杂的外交工作中仍将是坚定而敏锐的。

戒备: 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危机也象物体的运动一样有其动量。停止军事行动符合我们的外交目的,却违反军事现实。埃及第三集团军必定力图突破包围,而以色列,不管停火不停火,也不愿丧失良机,必欲打垮对方而后快。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上午八时——按理说再次停火已经七小时了——我到白宫办公室的时候,哈菲兹·伊斯梅尔的来电正在等待着我处理。来电说“以色列又恢复了进攻。”萨达特将再次急电尼克松谋求采取“有效措施,以迫使以色列实行停火。”

我们向迪尼茨家里打电话,但是他说回办公室需要时间,在办公室里才有直通以色列的电话;好容易等到九时二十二分他才给我回话。他说被围困的埃及第三集团军曾经企图从三个方向突围:西向苏伊士城,东向米特拉山口,北向埃及第二集团军阵地。各路突围的军队均被击退;以色列的行动完全是自卫,仅仅是“阻止”

* 第三三九号决议的全文见章末注③。

埃及的攻势（却也奇怪，在此过程中它却又夺取了埃及在苏伊士的海军基地）。我对迪尼茨其人感情很好，但他这一报告却很难使我相信。一支被围困的部队企图解除包围，向供应基地突围是可以理解的；但向着米特拉山口进攻却离被切断的联络站更远了，这不可能是它的战略目标。以色列企图搞垮运河东岸埃及的桥头堡，那是更容易理解的。停了一会，我警告迪尼茨：“今天夜里到头来你抓住两万埃及俘虏，那时你就不能再说是他们发起进攻了。”

同迪尼茨打电话刚刚结束，就接到萨达特给尼克松的来电。萨达特指控以色列恢复进攻，再次恳请尼克松“进行干涉，甚至就地干涉，以迫使以色列遵守停火。你曾经答应过这样做。”从来电的口气看，不象是他的军队处于攻势。

我又立即通知迪尼茨。很明显，如果这样下去，必然会引起同苏联人的对抗。同埃及建立新关系的希望，以及谈判的前景都要全部告吹。前一天晚上苏联人已正式发表声明，警告以色列，如不停止“侵略”，就要承担“最严重的后果”。苏联的几个空降师已经处于戒备状态，苏联在地中海的舰队已经增强了力量，现在由于勃列日涅夫亲自过问，事态比以前更加严重了。我告诉迪尼茨，外交的艺术就在于懂得掌握胜利的时机。出于对以色列的友情，有些事情我们不能超过限度，这个限度就是不能愚弄另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我告诉迪尼茨，如果萨达特也象对我们一样，请求苏联人出兵强制执行停火，那么以色列就失策了。

迪尼茨回答说，以色列愿意停止战斗，如果埃及也这样做的话；他还建议美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的武官去前线核实停火的进展情况。我知道这主要是消磨时间的办法。这时战斗已经进行了多半天了。要交换信件确定另一次停火和派遣美国的军事观察员到西奈半岛最远的地方去，那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在执行外交政策中，我们必须当机立断。我们立即回答萨

达特。不管我们对情况怎样怀疑，尼克松的复信总要保持慎重态度，采取一种中立的方针；复信告诉埃及说，我们反对发动进攻，同时以胡萝卜相招引，提出举行和平谈判：

以色列政府已经答复，大意是：埃及第三集团军首先发动进攻；以色列部队处于防御地位，并已接到命令只许击退进攻。事实真相这里无从判断。我想向你肯定的是，美国一贯反对以色列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并已采取有效步骤制止他们。与此同时，你可否肯定，你的部队也应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今天晚些时候，国务卿基辛格将与伊斯梅尔先生取得联系，讨论我们双方就战后外交直接对话的可能性问题。

我们还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消息。但很可能，萨达特也已向勃列日涅夫发出了同样的呼吁。发电、翻译和考虑问题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断定，要不了多久，莫斯科就会刮来一股冷风。

我决定赶在前面。上午九时四十五分，我给刚回任的多勃雷宁打了电话，告诉他：“中东的那些疯子们似乎又打起来了。”我不作十分的肯定，对他说：每一方都说是遭到对方的攻击。我觉得没有理由采取守势，于是断言：“这一次可能是埃及首先发起进攻，但我们也没有十分把握。我们没有确实的根据来作出判断。我只是想要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向他说明，我们已经要以色列停止进攻。他们已经同意，如果埃及也这样做的话；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使停火得到实施。多勃雷宁看来未接到指示；他只表示要向莫斯科汇报。这一点正中下怀。二十分钟后，即十时十分左右，我又提出另一件事让苏联的官僚机构考虑。我象是作出重大让步的样子告诉多勃雷宁，以色列曾建议在联合国观察员到达之前由美国武官到前线观察停火。我还把尼克松致萨达特信的副本送给他看。这样做可能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有一些面子；通常这也是一种善意的表现。

有一种理论认为，当别的国家正在研究你的来信的时候，它们

就不能考虑自己主动采取什么行动，据此，我把最近的事态发展告诉萨达特：

以色列总理刚刚通知我们，已对以色列武装部队下达严格的命令，要他们呆在自己的防御阵地上，不得开火，除非他们遭到射击。

为响应你要美国派战地观察员的建议，以色列政府也已同意让美国武官立即赶赴冲突地区，以便观察这些命令的执行情况。

此刻你如能向你的部队发布同样的命令，那将会大有帮助。

但是中东事件发展的势头用这样的办法已经控制不住了。上午十时十九分，多勃雷宁电话告诉我，勃列日涅夫另一封信就要送到。这封信措词严厉，但仍不具体。开头的称呼是“总统先生”，不再象昨天那样是“尊敬的”了。来信相当详细地告诉我们在同意最近停火决议的几小时内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发动“挑衅性”进攻的情况。信的口气是威胁性的，但结论却含混其词：

对于这一切活动的内幕我们自然要产生怀疑。总统先生，我愿坦率地说，我们相信，只要你想制止特拉维夫的这种挑衅行为，你是有可能对以色列施加影响的。

我们谨希望，我们两人都要信守我们的诺言以及已经达成的谅解。

我将以赞赏的心情获悉你对以色列立即严格遵守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安理会的决定所采取的步骤。

我告诉多勃雷宁，我们拟好复信后就通知他。与此同时我必须使以色列深刻了解危机的严重性。每当我强调信息的重要性或者避免个人与以色列内阁发生对抗时，总是请黑格代表尼克松给迪尼茨打电话。这一次我也这样做。此刻正是尼克松极为痛苦的阶段，我怀疑迪尼茨会认真对待这个做法——但至少这也表明需要作出慎重的决定。黑格要求以色列停止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星期三上午十时三十分，我主持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会议，向同事们谈了最近发生的情况，并极力主张采取稳健的方针：

阿拉伯人可以鄙视我们，痛恨我们，或者厌恶我们，但他们已经懂得，如果他们想解决问题，就必须求助于我们。没有别人能打开局面。他们已三次依靠苏联的装备，三次都打输了。因此，从战略上看，如果我们懂得善于运用，我们是完全可以大显身手的。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后，我继续努力使双方冷静下来，并争取时间进行外交工作。我电告伊斯梅尔，表示接受萨达特提出要访问开罗的邀请，并建议提前于十一月七日访问，以便“研究局势，并计划采取适当的行动，以谋求永久解决。”

同时，我了解到，黑格给以色列的电话所得到的反应是模棱两可。达扬通过迪尼茨电告，果尔达与基廷大使接谈，两人都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以色列尽量“克制，不予还击”；一天来，他们并未试图前进，“将来也不想这样做。”（这就是说，仍有可能进行一场消耗战，使埃及的供应消耗净，进而迫使第三集团军投降。）以色列曾经请求联合国观察员从开罗来运河西岸，但埃及人似乎在阻止他们。（至于运河东岸情况如何，则避开不谈。）以色列有具体的证据，说明埃及在计划继续进行战斗，已从开罗派出坦克增援，企图突破运河西岸以色列的防线。以色列不想进攻西岸的埃及部队。（当然，我们所关心的是以色列在东岸的活动。）达扬还补充说，他们将向基廷提供全部情况，并允许他索取以色列的情报，“以便进一步使国务卿安心，并显示以色列的良好意图。”

不管我们私下里有什么想法，对待达扬提供的情况却只能按照它的表面价值去处理。因此，下午一时发出总统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件，概述了以色列所肯定的几点。一封类似的信以我的名义发给伊斯梅尔。但在我向开罗发信的同时，又接到萨达特给尼克松的信，从而使危机发展到了高潮。萨达特声称，以色列再次发动了进攻，接着他又表示同意我所没有提过的东西：立即派遣美国观察员或军队到埃及一方执行安理会的停火决议。这封信的新内容

正是我在三小时以前所担心的事情：萨达特告诉我们，与此同时他已“正式地”向苏联人发出同样的请求。接到萨达特的私人信件不久，我通过新闻公报了解到，开罗已公开宣布要求安理会开会，请求美国和苏联向中东派遣“部队”。看来一场危机正在形成。

我们没有准备派美国军队去埃及，也不会同意派苏联军队去。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缩小苏联在埃及的军事存在，决不是为了同它联合起来，在联合国形成一纸决议，重新把它引进埃及。我们也不会同苏联人一起参加一支联合部队，因为这样一来它在这一地区的作用就合法化了，激进分子的力量也会加强。而反苏的温和派如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和科威特这些国家对于这种合作也将大为惊慌。苏联军队将从此不再撤走；它将有无穷无尽的借口处处与以色列作对，或者与温和派的阿拉伯政府作对。

当我们正在观望开罗的报道是否只是一个假警报时，苏联人却加快步伐，使局势更加紧张。下午三时三十五分，多勃雷宁带来一封信，这一次是葛罗米柯的来信。我们的对手从首脑一级降到外交部长一级应该说多少是一件好事，但来信的内容却凶相毕露。葛罗米柯断言以色列在加紧军事行动，并说以色列矢口否认全是捏造。但来信并没有要求采取具体行动，只是要我把此事告诉总统——把一个没有确定的问题推给我们解决，这是制造一个论据，好让我们承担责任。我告诉多勃雷宁，于下午四时到我办公室来。同时我又与迪尼茨核对情况。他强调说，不到五分钟前他刚刚得到消息，说西奈战线现在无战事。

苏联和以色列的说法相互矛盾可能有几种解释。双方可能都是讲真话；葛罗米柯和迪尼茨可能是根据不同的时间表说话的。当葛罗米柯发信的时候，考虑到发电所用的时间，停止军事行动的消息也许还没有到达莫斯科。如果是这种情况，当得到消息的时候，

莫斯科就会平静下来。也许是一方或双方都没有讲真话。如果以色列与它跟我们讲的相反，仍在继续军事行动，那末对抗是肯定的。如果葛罗米柯明知以色列已经停火却定要发这封信，那又有两种可能，或者是莫斯科想要博得开罗的好评，把已经实现的停火伪称是它争来的；或者是想寻找借口摊牌，以解第三集团军之围，并把自己的军队重新派回埃及。总而言之，停火不能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即便军事行动已经停止，第三集团军仍处于包围之中，岌岌可危。

我们决心在必要时以武力抗拒苏联军队进入中东，不管它是在什么借口下到那里去。四时刚过，多勃雷宁来访。我告诉他，我们将否决要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派军队去的任何决议——这是一种微妙的外交词令，也是使苏联人改变主意的一种保全面子的客套话。

多勃雷宁没有接到新指示，但谈话的口气是和解的。当时莫斯科时间已经过了夜间十一时，他一定觉得再请示时间已太晚，也许事情正在平息下来。他沉思半晌说，也许再麻烦安理会正式通过一个新决议不是最好的办法，倒不如由安理会主席表示“一致同意”再次呼吁停火就够了。我松了一口气，同意这是消除危机的最好办法。此后我们交换意见，讨论中东和平会议的地址、参加者和程序，气氛似乎很平和——这一点我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谈过了。如果多勃雷宁心里明白他是在谈什么（通常他是明白的），那就是说苏联领导已经决定，在形势不利的时候退而求其次，把事情迅速引向和平会议，作为摆脱困境的最好的办法，也包括使第三集团军摆脱困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愿意合作。

本着这种精神，我要求国务院近东局就和平会议的程序和组成准备文件。在纽约，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立克还没有迹象支持萨达特要美苏出兵的请求。这时莫斯科时间已过午夜。

看来至少是又一个大半天避免了危机，而每争取一小时都有利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这以后，即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晚七时零五分（莫斯科时间半夜两时零五分），苏联领导人突然决定摊牌。多勃雷宁向我宣布，马立克刚刚接到指示，要他支持派遣美苏军队去中东的决议，如果别人这样提的话。我知道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起码埃及会这样做。我刚刚告诉多勃雷宁，我们决不会同意这样的决议，就接到总统的电话，因而不得不中断与多勃雷宁的谈话。

从电话中听出来尼克松还象过去一样焦虑和感伤。他谈到他受到弹劾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他希望在明天上午举行的情况介绍会上我能向国会的领导人讲讲他在处理中东危机中所起的主导的不可缺少的作用。他早就催我向某些参议员作这类宣传——这是这位自尊心很强的人感到自己处于绝境的一种表现。他谈到他在政治上已到末日，甚至肉体也要死亡：“他们那样干是想毁掉总统。他们有可能成功。我很可能死掉。”我尽量安慰他。我说，他处境不利，但声望正隆。可是这一次他听了我的话还是不放心：

他们决意要破坏。我有时真想说见鬼去吧。我倒想看看他们来管理这个国家，看看他们怎么办……真正的悲剧在于，如果我走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垮掉。俄国人将寻找别的主顾，中国人将失去信心，欧洲人将——他们简直不明白他们是在把一切东西都往窗外丢。凭良心说，我简直不懂……

这次简短的电话交谈就是水门悲剧的缩略。尼克松的感觉是对的，他已预感到水门事件在国际上可能引起的后果，他对于那些存心整他的人的动机也看得相当准确。然而他也的确被他的宿敌抓住了算老账的机会。现在双方已经陷入无法改变的冲撞轨道：他的批评者正处于情绪激昂的顶点；尼克松则已无能为力，灾难将临，他既不能及时加以说明，化险为夷，又不能体面地加以摆脱。

我们面临的局面可能成为尼克松任职期间最严重的外交危

机——因为这涉及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对抗；而此刻总统因受到迫害而情绪极为消沉，国会又刚刚通过战争权限法，限制总统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力。正是在这种忧郁的心情下，我于七时十五分结束与总统的谈话，转而又去与多勃雷宁联系。多勃雷宁承认三小时前他讲的情况是“错误的”。苏联现在想要联合国派军队——包括苏联军队——去中东强制执行停火。对此，我老实不客气地回答说：我们将予以否决。

必须立即做好准备。在十分钟之内我做好了以下几件事情。我指示斯卡利要否决任何有超级大国参加的维持和平部队，也要否绝对以色列的任何谴责，因为这会为以后的干涉提供借口。我们的主张是根据安理会第三三九号决议增派联合国观察员。我还告诉斯卡利把我的指示转告中国大使黄华，因为我相当肯定中国不愿意看到苏联部队在联合国的名义下进驻中东。中国了解我们的观点就可能同我们联合起来否决上述提案。我还不知道哪位中国大使同国内联系更为方便一些，因此我又同时要斯考克罗夫特把我们的决定和意图告诉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

部署既定，七时二十五分我再次打电话给多勃雷宁，我提醒他不要逼我们走极端。要是增派联合国观察员，我们愿意合作；要是任何伪装下派苏联军队，我们不能接受。多勃雷宁回答说，在莫斯科“他们非常愤怒，他们要派军队去。”他责备我们纵容“以色列为所欲为。”我督促他阻止提出这类提案：“出现对抗那是令人遗憾的。”在一场危机中，多勃雷宁什么事都不能自作主张；他完全是执行任务。他说他要把我说的话源源本本地向莫斯科汇报，不过他肯定说，他们已经讨论过，并已下了决心。

我立即打电话给英国大使洛德·克罗默，请求伦敦和我们一起否决。下午七时三十五分我又把情况告诉迪尼茨。八时刚过，我再次打电话给多勃雷宁。我告诉他，根据我们的可靠情报，中东

现已全部停止战斗。现在还来得及避免对抗。这是一种提出警告的方式，而不致于变成一场勇气的赌赛。多勃雷宁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你要把确切的情况告诉我”，他冷淡而干脆地说，好象莫斯科需要了解我们在中东的情报部署，“我要发电报。”

正当剑拔弩张就要形成对抗的时候，却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哈菲兹·伊斯梅尔发来电报，接受我于十一月七日访问开罗的建议。

晚上八时二十五分，多勃雷宁告诉我，几分钟前埃及外交部长札亚特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已正式提出要美苏出兵。我催促多勃雷宁“大力制止”。埃及的提议还没有形成正式的提案。一旦成为提案，“我们就将由密切合作而走上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多勃雷宁没有接到新指示；他说明他“只是重述札亚特在安理会讲过的话。”

我立即以尼克松的名义发了一份急电给萨达特，告诉他，我们将否决包含埃及上述呼吁的任何决议。并且提出警告，这样的做法将使我取消开罗之行。萨达特正在谨慎地向我们靠拢，他如坚持要超级大国派兵，他的行动计划就有告吹的危险。

这之后，安理会又传来了好一点的消息。约翰·斯卡利电话通知我，苏联的发言尽管谴责了以色列并顺带攻击了美国，却没有真正同意埃及要超级大国进行干涉的要求。我告诉斯卡利表明我们的立场；他在发言中强烈反对大国干涉，并要求迅速增派联合国观察员去中东。他既没有指责埃及也没有指责以色列。

晚九时三十二分，我把联合国开会的情况通知黑格，请他转告总统，我们还讨论了总统在明天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开头讲些什么，当时总统已经就寝。黑格和我都认为，一场最富于爆炸性的危机可能很快就要降临，需要由我们来紧急处理。

没过几分钟，我们所预料的一场风暴果然降临了。多勃雷宁于晚上九时三十五分打来电话；此刻正是莫斯科时间凌晨四时三十

五分，他就接到勃列日涅夫的来信，而且那么急，非要在电话上读给我听不可。我了解其中道理。这实际上是最后通牒：它提出由苏联和美国共同派兵来确保停火的实施；非但如此，还要确保实施“我们同你们就保证执行安理会的各项决定所达成的谅解”——换句话说，就是把一项综合和平方案强加于中东：

让我们，苏联和美国，一起把苏联和美国的军队紧急派往埃及，以确保十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安理会关于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决定的实施，并确保我们同你们就保证执行安理会的各项决定所达成的谅解。

必须毫不迟延地遵守协议。我愿坦率地说，如果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不可能同我们一起行动，我们就不得不紧急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步骤的问题。我们不能容许以色列方面的专横行为。……

这是一位苏联领导人对一位美国总统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信的开头就不礼貌，直呼“总统先生”，结尾同样无礼，竟要求“立即给予明确答复。”而中间的内容则提出非但强制执行停火，而且强行最后解决；解决的条件虽不具体，但莫斯科一年来曾反复加以说明，而我们也曾一再拒绝过的。这还不说，如果我们拒绝的话，还威胁我们要单独出兵。*

这种建议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同意与苏联联合行动，它的军队就会在我们的赞同下重新进入埃及。我们在反对以色列的联合行动中或者成为苏联的尾巴，或者就是跟苏军发生冲突，而冲突所在的这个国家必定赞成苏联关于停火的看法，对此还不能持反对意见。

不仅如此，影响将远远超出埃及一个国家。如果苏联军队戏

* 多勃雷宁后来告诉我，说我把上述第二段第一句中“adhere”（遵守协议）一词搞错了，他当时念的是“act here”（即刻行动）。但这个词的改动并不能改变这封信的意图；这且不说，后来我们也不曾接到正式的更正，因为在尼克松致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中曾经引用过上述文本来说明我们的观点。

剧性地出现于开罗而美国尾随其后，这种明显的美苏共管的局面将使我们在阿拉伯温和派中的老朋友畏缩不前。我们四年来的外交工作以及两星期危机以来所苦心经营的战略也将土崩瓦解：埃及将会倒退，重新纳入苏联的轨道；苏联及其激进的盟友将成为中东的支配因素。中国和欧洲对于这一关键地区出现美苏军事勾结将大为震惊。如果共同努力失败并转为美苏危机——很有可能——我们就将孤立无援。

对于苏联的这一建议必须顶回去，这一点在我心目中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必须采取强硬的态度，使苏联慑于威势而放弃他们威胁要采取的单独行动——不只是威胁，根据我们各方面的情报，他们正在策划这种行动。因为我们确实有理由认真对待这种威胁。据中央情报局报告，虽然我们在继续空运，苏联却于二十四日晨停止了对中东的空运；这是凶恶的兆头，说明他们的飞机正在集中起来准备空运某些伞兵师，而我们注意到这些伞兵师早已提高了战备的级别。东德的部队也已加强了战备。苏联在地中海的舰艇已增加到八十五艘——从来没有这样多过。（后来达到一百多艘。）第二天我们发现苏联舰艇十二艘包括两艘登陆艇正在向亚历山大开进。在一些特别敏感的地区还传来了一些坏消息。这使我不能不相信，苏共政治局敢于如此猖狂地进行挑战与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处于明显的软弱状态大有关系。

当我向多勃雷宁复述勃列日涅夫的来信以确定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时，上述一些想法很快掠过脑际。我警告他不要单方面采取行动。他说他要把我的警告向莫斯科汇报。这时我们两人是以对抗的语气讲话，这是很自然的。双方必须有一方改变方向才能避免冲撞。

晚上九时五十分我通知黑格。他开始认为，这只是苏联人在搞讹诈：“战争结束了，他们不会出兵的。”我不认为这是讹诈，但这

无关重要。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认为他们不会出兵。如果我们在威胁面前处于被动，苏联领导就会乘机把威胁变成现实。我们只能在两种捉摸不定的可能性中加以选择：或者揭穿它的讹诈；或者正视严重的现实。我问黑格，可否把总统唤醒。他只简短地回答：“不可。”我懂得他的意思。黑格认为总统心绪烦乱，不宜参加这样的初步讨论。此事责任重大，但必须由我们来承担。从这天晚上我同总统的谈话来看，我相信黑格的想法是对的。

这件事需要召开政府高级官员紧急会议作出决定。晚上十时三十分我在国务院召开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与此同时，十时我打电话把勃列日涅夫信的内容告诉迪尼茨，并征求以色列的意见。我说，我们不打算接受这个建议。

十时十五分，我打电话给多勃雷宁，让他知道我们立场坚定，并防止他们采取突然行动：

基辛格：我们就要开会，考虑你们的信。我只想告诉你，在我们答复之前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多勃雷宁：是的，好。

基辛格：这件事关系重大。不要对我们施加压力。我再重复一遍，不要对我们施加压力！

多勃雷宁：好。

这次谈话的弦外之音使我们更加感到勃列日涅夫这封威胁信的严重性。多勃雷宁本来可以慷慨地说，在接到我们的答复之前苏联决不采取行动。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家来说，他本来可以有多种办法暗示，说我们的反应过分强烈了，说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威胁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是一个主权国家感到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正常做法。但多勃雷宁并没有这样做，他给我的印象是危机的确就要到来，苏联在中东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可能性并没有改变。我国政府行将进行的审议，主要是基于这种理解而作的。

晚十时二十分我和黑格再次通话。这时我们两人都深信，我们的确面临苏联干涉的威胁。黑格极力主张把这次特别行动小组会议搬到情况室去开，表明会议是由白宫主持的；他还认为，我应以总统助理的身分而不是以国务卿的身分来主持会议。他的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们再次商量，是否把总统唤醒。黑格只是含混地说，我最好提议会议在白宫召开。他的意思是说，由他掌握从白宫发出通知。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黑格告诉我这封信时，我说，他和基辛格应该在白宫开一次会制订计划，对苏联这种几乎是赤裸裸的单方面干涉的威胁作出坚定的反应。讲空话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的是行动，甚至宣布处于军事戒备状态。^④

会议于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晚上十时四十分在白宫西侧地下室的情况室召开，由我主持。会议由于各种原因几次中断，直到星期四凌晨二时才结束。出席会议的有：国防部长詹姆士·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黑格，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帮办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国家安全委员会我的军事助理乔纳森·T·豪海军中校和我。

白宫后来把这次会议说成是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后对于这次会议是否是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曾有过一些讨论，因为总统没有参加会议（副总统也没有参加，因为杰拉尔德·福特是尼克松总统于十月十二日才提名的，参议院还没有批准。）实际上除总统和副总统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都参加了。*

*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根据一九四七年的国家安全法成立的。该法授权总统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指定委员会的任何成员来代他主持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不仅包括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以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法定顾问），也包括国家安全资源局（已不存在）等机构和其他一些后勤部门（早已不起重要作用）的

现在我发现我们的内部记录把这次会议叫作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一次“首长会议”——这个名称很少用，但也不是绝无仅有。自我晋升国务卿以来，我就认为国防部的代表也应列为内阁成员；因此，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尼克松在过去从不参加特别行动小组的讨论（只是偶尔到场讲几句鼓励的话）。会上没有人认为这次他不参加是违反常规。

会议开始，我先详细介绍情况。大半天来并没有惊人的事情发生。事实上，事情似乎正在平息下来。但傍晚七时左右（莫斯科时间凌晨二时）苏联人突然决定，开始是支持停火，继而是坚持美苏共同出兵进驻中东。我说，在我看来，同苏联人搅在一起将是“一场鲁莽的游戏”，其结果将使我们对中东、对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全部遭到破坏，因为它们出于不同的考虑都怕美苏共管。存在三种可能性：（1）苏联人早有此打算，邀请我去莫斯科只是为了争取时间；（2）他们决定这样干是因为阿拉伯人失败的后果已更加严重；（3）他们觉得以色列和我们骗了他们，因为在停火之后，以色列继续推进，要扼杀第三集团军。我认为他们这样干的动机可能是第二种和第三种。

这是我任公职以来最需要认真思考的一次讨论的开场白。参加会议的人衡量苏联的行动、动机和意图。这天夜里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苏联就要采取重大行动。我们预料，两小时以后，在东欧黎明时分，苏联将开始空运。晚上十一时，我暂时休会，在白

首脑。该法没有提到像财政部这样的部门，它的参加对于切实讨论世界事务往往是必要的。因此，在做法上自五十年代以来已较原法案有所发展，即总统可随意邀请其他人参加会议。约翰逊总统常邀请大法官阿贝·福塔斯参加会议；尼克松常邀请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参加会议。据此，尼克松总统仍有权召集主要顾问人员开会，不必给会议指定具体名称——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或是别的会议。总之，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成员和议程——或者根本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三十多年来一直由总统决定，不存在什么做法上或法律上的后果问题。

宫西侧的一个偏僻的休息室里会见了迪尼茨。我再次对他说，我们将立即拒绝苏联的建议，只是拒绝的方式还有待决定。我们仍然很希望听到以色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当我回到情况室的时候，大家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即能否用吸引他们对话的办法推迟苏联人的时间表。这就是说由美国作出语气和解但内容强硬的答复。大家还一致认为，光是这样一封复信是不起作用的，还必须辅之以某种引起注意的行动，以表明我们决心抵制这种单方面的行动。最好是在我们的书面答复到达之前让莫斯科注意到我们的反应。因此，我们暂时停止起草总统给勃列日涅夫的复信，讨论各种战备措施。

我们的部队通常处于不同的战备状态(代号是“德弗康”，DefCon，即Defense Condition的缩写，译为“防御状态”)。战备状态分作五级。一级战备就是战争。二级战备是即将遭到进攻。三级战备是加强警戒，但还不能确定就要发生战争；实际上这是基本上处于和平状态下的最高一级战备。我们大部分部队通常处于四级或五级战备，只有太平洋部队例外，这是越南战争沿袭下来的一种状况，他们在一九七三年经常处于三级战备。战略空军司令部通常是五级战备。

我们一致认为，至少要提高到三级战备才能引起苏联人的注意。即使如此，他们也许仍不能很快认识到这种变化的重大意义，以致影响其外交行动。我们都同意讨论三级战备以外的战备措施。与此同时，海军上将穆勒于午夜十一时四十一分向全军发布提高到三级战备的命令。

在将要发布命令之前(午夜十一时二十五分)，迪尼茨转来了以色列对苏联建议的答复。这实际上是以色列一九七一年曾经提过的脱离接触方案的翻版，即双方部队交换防地，以色列部队撤退到苏伊士运河东岸，埃及部队撤退到运河西岸；在运河两岸建立一

个十公里的非军事区。这是一个根本行不通的方案。要萨达特从自己的领土上撤走，他会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就连以色列也不曾否认那是埃及的领土。他也不可能从战争开始的地方后撤十公里来结束这场战争。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已来不及磋商如何避免苏联的干涉，如果干涉确已迫在眉睫的话。如果萨达特被激怒，坚持要大国干涉的话，这个方案甚至会加速苏联的行动。我告诉迪尼茨，我将和我的同事讨论以色列的建议，但我知道这是行不通的。这时我们最关心的是如何防止苏联的行动，已无暇顾及以色列的方案了。

我们的下一个决定是引导开罗收回邀请苏联出兵的提议，使苏联无法进行外交上的选择。午夜十一时五十五分，会议批准了以尼克松的名义致萨达特的信，重申我们将拒绝美苏联合出兵的提议。信中有一段话具有执行效力，提出警告：假使苏联军队出现，我们必将在埃及土地上予以抗拒。最低限度，在这种情况下也必定取消我为开始和平进程所预定的开罗之行：

请你考虑一下，如果两个核大国在你的土地上发生对抗，对你的国家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还请你考虑，如果两个核大国中的一国的军队在埃及土地上被牵涉进去，我们将不可能进行基辛格博士于十一月七日以访问开罗开始的外交主动行动。

发布三级战备命令后，我立即请斯考克罗夫特离开会场去给多勃雷宁打电话，并对他作了以下指示：

告诉他，在我们答复之前停止一切行动。告诉他你没有受权作任何答复。我正在开会，不能脱身。不可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如果采取了，那将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如果他说什么，你就说你有指示，不加评论。他们也会知道我们是认真对待的。

但是双方可能都在施加威胁。多勃雷宁只答应向莫斯科转达消息，除此以外，二话不说。他不作解释；不说这是误会；不提夜里

好好休息，明晨再谈，因为没有大不了的事。他只干巴巴地讲了一句：等待我们的答复。

如果多勃雷宁的姿态是想增加我们的危机感，那他是做得太漂亮了。当晚，我们还了解到苏联八架安-22号运输机——每架可运军队二百多人——在几小时内将从布达佩斯飞往埃及，这使我们更加相信苏联就要采取行动。我们还发现东德的某些部队将从华盛顿时间凌晨五时起（即五小时后）处于戒备状态。我们估计苏联每天可向埃及空运军队五千人。我们决定，光是三级战备还不足以引起苏联决策人的注意，必须采取一些别的措施。十二时二十分，我们命令第八十二空降师待命行动。十二时二十五分我们命令航空母舰“罗斯福号”——这时正在意大利海面——迅速开往东地中海与克里特岛以南的“独立号”航空母舰汇合。“J·F·肯尼迪号”航空母舰及伴随它的特遣舰队受命全速前进，从大西洋驶向地中海。

会上还议论了一些别的问题。谈到苏联人是否乘人之危，同一个“代理”总统较量。我说：“我们现在正处于软弱的顶点，但如果甘愿屈服，就会遇到真正的困难。”还谈到，既然苏联出兵埃及，美国能否采取相应的行动，也把军队派到那里去。还担心我们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否容许我们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但我的态度是坚定的，我们必须以民族利益为重，采取行动，不管新闻界怎样怀疑，或者政治上加以反对：“如果怕个人受打击而不能做该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应该做认为正确的事情。如果国内新闻界指责我们挑起事端，我们可以与之争论。真正的指责，应该说是我们太软弱才惹起这次事端的。”

这些戒备措施是我们向莫斯科发出的信号。午夜十二时三十分，我们重新起草总统给勃列日涅夫的正式复信。我们决定清晨五时三十分左右（华盛顿时间）发出这封信。只要苏联要以我们的

信来决定它是否进行干涉，那么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准备工作。到那时苏联人也会注意到我们部队运动的情况。半夜一时零三分，我把我们的各种戒备措施和给勃列日涅夫的信告诉克罗默大使，请他转告英国政府。我告诉他，发信一小时后，即布鲁塞尔午时左右，我们将正式通知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我们希望英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以及其他国家的首都支持我们。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同英国有“特殊关系”，也说明同盟国商量有一定的限度。我们认为把情况告诉英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尽管希思政府在欧洲尽可能同我们保持一定距离，并曾相当突出地强调他们在中东问题上同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能事先同其他盟国商量，因为我们想让苏联人自己察觉我们的这些戒备措施，而不是通过我们盟国泄露消息知道这些措施；这样一种做法不可避免地要包含一些让盟国感到放心的成份，从而减轻了我们的决心所起的作用，而我们正是要向苏联表示这种决心的。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在发出我们的复信之前一两个小时告诉我们的盟国；我们应该冒泄露机密的风险。

半夜一时三十五分，迪尼茨又出现了。他代表总理提出，不要要求以色列撤退到最初停火生效时（十月二十二日）那条战线。我向他保证，我们是在对付苏联的威胁，无意强迫以色列做些什么。

半夜一时四十五分，我再次要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给多勃雷宁，内容同以前一样，但只增加了一点：我们还需要考虑几小时才能答复。我拒绝跟他谈话，多勃雷宁凭这一点就可以推断，我们没有心情谈判。他再次回答要向莫斯科汇报，不作任何解释，并说他将等候消息。与此同时，我们通知欧洲部队司令，参加一年一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演习的美国军队推迟回国，这次演习的目的是要考验我们迅速增援欧洲的能力，这些部队按照计划是要回国

度假的。

半夜二时零九分，即我们结束正式会议后几分钟，我告诉迪尼茨，我们已完成了给勃列日涅夫的复信。除增加联合国观察员外，我们将不提任何新的建议。我们将明确拒绝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必要时并将抗拒单方面的军事干涉。我还请迪尼茨告诉我，如果一定要摊牌，以色列消灭第三集团军要多长时间。

半夜三时三十分，参谋长联席会议按照指示命令关岛基地的B-52飞机返回美国。它们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还留在那里是为了防止印度支那的战火复燃。一九七三年夏国会的行动已使战争不可能再起了。但我们希望让河内感到弄不清我们的宪法程序，所以没有调动这些飞机，同时也认识到我们不能老是愚弄这些长期参加战争的熟练军人。现在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结束这场虚假的游戏，并再次向苏联人显示，我们正在调集部队准备摊牌。

最后，在五时四十分，给勃列日涅夫的复信以尼克松的名义发给多勃雷宁。复信全部拒绝了苏联的要求。信是由信使送交的，以免通过解释而减弱了信的力量。信中提出美国赞成——并愿意参加——由非战斗人员临时组成的扩大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其唯一任务将是提供“有关双方遵守停火条款的充分的情报。”复信还说：

然而，你必须了解，我们决不可能接受单方面的行动。这将违反我们所达成的谅解，违反一九七二年我们在莫斯科签署的各项原则以及防止核战争协议的第二条。如上所述，这样的行动对我们两国都将产生难以估计的不利后果，并将使我们经过艰苦努力争取实现的一切目标全部结束。

危机消除

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早晨六时三十分，我睡了三个小时醒来，

发现美国公众已经知道我们的部队已在全世界处于戒备状态。这天早上各报全都报道了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真是出乎意料，这样公开宣扬一定会把事情变成一个对莫斯科的信誉问题，在国内引起人们的愤怒，并将使苏联后退的可能性大大复杂化。这也说明，自一九七〇年九月约旦危机以来，这三年中我们政府的纪律起了很大变化。那时我们也采取了类似的战备措施，但危机过后三天公众才知道戒备规模之大。^⑤这次战备措施在半夜里不到三小时就透露出去了；我们现在将面临公开的对抗，不是象一九七〇年那样同苏联的代理人公开对抗，而是同克里姆林本身直接对抗。

但这天早上在我的白宫办公室里一开始情况倒还不错。八时前几分钟我们收到埃及相隔一小时发来的两封信。这是对我给伊斯梅尔和尼克松给萨达特的信的复信。从来信看，埃及人对局势的严重性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心。这两封信的先后顺序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思想的变化。第一封信是伊斯梅尔对我的信的答复。我在十月二十四日中午给他的信中讲到我们为使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所作的努力。伊斯梅尔对我们的帮助表示赞赏，尽管第三集团军处境非常危险——关于这一点，他装得满不在乎，一句也未提。他认为派美国武官去是不够的；他仍然认为美苏联合部队是最好的保证。不过，“既然美国拒绝采取这一措施，埃及正在请求安理会提供一支国际部队（重点是作者标的）。这就是说埃及正在收回产生这次危机的那个请求，而代之以一支“国际部队”。按照联合国的惯例，国际部队不包括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部队，因此，勃列日涅夫所要求的美苏部队自然也不包括在内。

在第二封信中这一点就讲得更清楚了。萨达特给尼克松的这封信里不但同意昨夜以尼克松名义发出的信的实质，而且也同意这封信所讲的理由：

我理解你对美苏联合部队提出的考虑，而且我已请求安理会迅速派遣一支国际部队到这一地区，以检查安理会决议的执行情况。我们希望，这将为执行安理会十月二十二日决议中规定、旨在为本地区建立公正和平的进一步措施铺平道路。

我们就要赢得这场外交竞赛了。没有埃及的支持，联合国形成一项要求美苏联合出兵的决议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苏联出兵那就是单方面的行动，既没有东道国的许可，也没有联合国的许可。这样一来我们加以抵制就容易多了，而且我们已经决心这样做。这表明——当时我们还只能这样猜想——萨达特是在把他的前途寄托在美国的外交支持上，而不是寄托在苏联的军事压力上。

第二个可喜的消息是驻联合国的约翰·斯卡利清早发来的报告。昨天晚上他对美苏联合出兵的提议表示坚决反对，这以后那股拥护这种主张的热情显然冷下来了。只要超级大国中有一个国家坚决反对，安理会没有别的办法可想，是很少准备进行表决的。寻找别的办法是聪明的。不结盟国家面对美国的否决已于二十五日晨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要求秘书长增派联合国观察员，并“立即在(安理会)的授权下，建立一支联合国紧急部队。”尽管这一决议草案措词含糊，但它却为排除超级大国参加紧急部队开辟了道路。安理会将于上午十时三十分开会审议这个决议草案。

此后，这天早上我们还获悉英国对勃列日涅夫的信的反映——同我们的反应相同。克罗默告诉我：“他们(伦敦)对勃列日涅夫信的看法当然和你们完全相同。”英国政府已指示驻莫斯科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提出紧急抗议，警告他不要采取单方面的军事行动。

这样一来，尽管局势仍很紧张，但已有解决希望。黑格和我正是在这种心情下向尼克松作了汇报，时间是十月二十五日星期

四上午八时刚过。我不知道这天早上前几个小时黑格跟尼克松讲了些什么。为确切起见，我把昨天夜里所采取的外交和军事行动都讲了一遍。正如在历次危机中一样，尼克松头脑清醒，办事果断。我们一致认为，如果苏联远离自己的疆界并且违反当地政府的意志，把有组织的战斗部队投入一个遥远的地区，那将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因而也就是一次重大的挑战。尽管战争权利法刚刚通过几天，尼克松却决心与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军队集结较量一番，而把这次行动的结局交给国会去处理——按照这个新的法律，这样做是可以的。

与总统晤谈之后，我们发出总统致萨达特的复信。复信欢迎萨达特“在维持和平问题上采取的政治家态度”，并表示美国支持建立一支不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部队。

上午八时四十分至十时，尼克松和我向国会领袖汇报了昨夜发生的事件。这些可尊敬的先生们既表示支持，又无定见，又自相矛盾。他们赞成采取戒备措施；他们高兴我们拒绝了美苏联合出兵的提议，但他们更多地是从越南战争时期那种孤立主义的思想出发表示支持，而不是从战略全局考虑给予支持。他们反对美苏联合出兵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想把美国军队派到国外去；要美国军队参加进去，他们大为恼火，苏联军队参加似乎就无所谓了。根据同样的理由，即使我们认为必须出兵抵抗苏联的单独行动，他们也是会反对的。至于这样的退让会影响全球均势和我们的切身利益，他们也并不认为事关重大。因此，当尼克松陈述，如果苏联单独出兵，我们决心派兵到以色列或者到友好的阿拉伯国家与之抗衡的时候，他们合作的兴头就突然冷下来了。有几位国会领袖表示严重保留。他们虽未公然反对，但明确表示，他们支持戒备措施并不等于说批准动用军队。

上午十时十五分，特别行动小组又开了一次会；之后，中午接

见记者。此时，同国会领袖之间的严肃谈话仍萦回脑际。而群众和国会中的各种议论象潮水般地袭来，使我们忧心忡忡。关于缓和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反对缓和的论调甚嚣尘上，他们说我们上了苏联人的当，天晓得把我们引向何方。事实刚好相反；我们的政策是要削弱并尽可能消除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这个政策事实上正在缓和的掩饰下取得进展。不搞缓和的话，苏联人可能早就在中东对我们发动政治进攻，最低限度也会使我们的战略遇到很多困难。而且正当我们的行政机构处于最软弱状态的时候，就会与苏联人发生公开的对抗。我们能经得起吗？而且这样做目的何在？那些夸夸其谈，主张采取强硬政策的人，曾经提出过比我们目前实际执行的政策更强有力的方针吗？缓和并不是我们对苏联人开恩。搞缓和，一部分是由于客观需要；一部分是由于我们想把中东拉过来，向我们靠拢，而离开苏联远一些，这样就得稳住莫斯科；再者，处于核时代，这样做在道义上也绝对必要。

因此，记者招待会一开始，我就先把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想法——事先并没有准备讲稿——作了一番冷静而富有哲理性的解释：

美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当然是敌对的，在政治上某些方面也是敌对的。但是美国和苏联也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两国都拥有能够毁灭全人类的核武库。我们两国都负有特殊责任，要把对抗保持在不致威胁人类文明的范围之内。我们两国迟早会认识到，今天使世界陷于分裂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不应该使人类遭到一场空前的核战争浩劫。……

我在国际海洋研究所特里斯会议的一次演说中曾经指出，有些事情我们不能超过限度。我说过，我们将反对任何谋求统治地位的企图，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一个地区。因此，我们将抵制任何利用缓和政策来削弱我们盟国的企图；如果有人想利用局势的缓和作掩护在国际上的多事地区加剧冲突，我们就要作出反应。在当前的局势下，我们遵循的就是这些原则。

搞对抗是容易的，但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懂得，这样做结局如何，而不仅是知道开头要打击什么。

我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对当前危机的决心：

美国不赞成也决不许可派一支苏美联军到中东去。美国认为，目前中东最需要的是弄清事实，弄清战线在哪里，弄清谁在开火，这样安理会才能采取适当的行动。要大国派出足够数量的军队去压服作战双方，那是不可思议的。把大国的角逐移植到中东去，或者由美苏对中东实行军事共管，那也是不可思议的。美国尤其反对任何大国、特别是任何核国家，单方面把军队派到中东去，不管是在什么伪装下派去。

我继续加以解释，故意含混其词地说：“我们发现某些行动、某些通讯和某种戒备措施形迹可疑”，因而决定命令采取预防性的军事措施。如果说应付危机需要采取冷酷的甚至残酷的措施以表明决心，那末同时也需要向对手指出一条出路。哗众取宠的做法可以满足人们的虚荣心，却不是好的外交政策。公开挑战会促使苏联人一意孤行，使苏共政治局不能慎重考虑。很多战争打起来都是由于没有后退的余地，只好应战。超级大国负有特殊义务，不能使对方感到屈辱。正是由于我们即将取得胜利——苏联人了解这一点——我在说明这场危机的结局时尽量注意不伤害苏联人的自尊心：

我想说明一点，目前的情况是，苏联还没有采取任何不可挽回的行动，我们希望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我再重复一遍，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曾经多次讲过的话：我们不是在寻找机会与苏联对抗；我们并不要求苏联撤消它所做过的任何事情。

在安理会和在以后的外交行动中，我们采取共同方针的机会还是存在的。我们采取的措施和总统发布的命令是预防性的，不是针对任何已经采取的行动。因此，任何国家没有理由收回它还没有做的事情。……

我没有提勃列日涅夫的信，怕有碍这位总书记的个人威信。

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这封信只有少数人知道，但不知怎么搞的，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也知道了，而且公开宣扬，说这封信是“蛮横的”，“威胁性的”。一位记者问起杰克逊的谈话。对此，我避免回答，但后来我说，一星期之内会有更多的事实公布*（这个说法是不明智的）。我的责任不是进行一场辩论说服他们，而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维护美国的利益。历史教育我们，最危险的时刻往往是，当对手看来准备退却的时候，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就会立即又采取强硬的对抗行动。

这些戒备措施很快就与水门事件连在一起了，那些怀疑此事有不可告人的动机的人认为与水门事件有关。于是向我提出两类问题：一是，苏联人的行动是否是由于我们国内的纠纷所造成的；另一类是从反面提出问题，这次危机是否出于国内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外交政策考虑由我们制造出来的——另一位记者干脆问，我们的行动是不是真正“合理的”。当问起苏联人的动机时，我抓住机会隐约地讲出我所一直担心的事情：“一个社会发生权力危机达数月之久，那就不可能不在某些地方付出代价。”

有人问起我们的动机，更加令人伤心；我们这些人面对捉摸不定的危险局面，彻夜不眠，殚思竭虑，自然难以忍受。但这也表明我们在政策上的活动余地是多么狭小。若是按照那些狂热反对缓和的人的主张，主动去搞对抗，那些水门事件的猎手们几乎可以肯定要破坏，他们会把对苏联的每一挑战都看作是一种计策，是他们所痛恨的对象尼克松想要借机逃脱。为了使我们有更大的活动余地，我相当激动地回答说：

我们执行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是要对选民负责，而且要对我们的子孙

* 国会各委员会在内部会议上听取了关于戒备及有关情况的汇报；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和我在各自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所发生的事情的主要内容。但由于上述理由没有把所有的细节都公开讲出来。各委员会都同意这一决定。⑥

后代负责。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有一种倾向，甚至还认为美国部队处于戒备状态是出于国内的原因。……

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我说：

我们是想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保持和平。女士们和先生们，你们可以自己判断，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是否还要在外交领域也制造一场信任危机。……

对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应该有最起码的信任，他们是不会拿美国人民的生命当儿戏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危机旷日持久，我们的命运实在不堪设想，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幸而苏联也怕冒长期对抗的风险，虽然我们国内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

记者招待会刚刚开完，下午一时十分，我就收到萨达特的来信，正式接受由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组成一支国际部队（安理会的提法是起草信件时的笔误；他的意思是说，不包括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都可参加）。几分钟后我从瓦尔德海姆那里了解到，苏联大使马立克支持这一方案。

下午二时四十分，多勃雷宁打电话告诉我，他接到勃列日涅夫的另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看起来好象昨天夜里的危机不曾发生过似的。来信根本不提昨夜来信中那种单方面干涉的威胁，而是告诉尼克松说，他已派出苏联“代表”——显然不是指军事人员——去观察停火的执行情况。勃列日涅夫以其一贯的高傲姿态把停止对抗说成是好象我们屈服于他的建议：“据我们理解，既然你们现在准备向埃及派出一个美国观察员小组执行同样的任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同意跟你们联合行动。”他还提出一个惊人的论点，即过去二十四小时的事件应该成为更加明显的合作的前奏：

继派出观察员之后，我们还将以紧急态度继续执行符合安理会决定以及我们所达成谅解的其他政治措施，该项谅解是基辛格博士代表你在莫斯科谈

判期间所达成的。

苏联人缩回去了。眼前的危险过去了；但我们仍然在一条狭窄的航道上航行。我们现在知道，靠运气和巧妙的工作，我们将对和平进程产生更大的影响；的确，这种前景已经有助于诱导萨达特放弃邀请苏联军队重返埃及领土了。

一场危机过后总是有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是宽慰和松弛；另外也有一种预感，好象某种不那么重要的挑战又要来临。我打电话给吉姆·施莱辛格，他曾陪我在情况室通宵开会，我感谢他和汤姆·穆勒以及比尔·克莱门特所作的贡献。我深信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坚强意志使我们度过了这次权力危机，使我们能够以罕见的果断和团结一致采取行动。我建议施莱辛格暂时停止昨天午夜开始的戒备措施。

一些首席记者打电话来要求公布更多的情况，他们所提出的一个很平常的借口是，这样可以使那些持怀疑态度的记者深信确实曾发生了真正的危机。一位专栏作家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对这样重大的行动所提供的事实似乎太少，不能令人置信。”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感情，作了较温和的回答。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使苏联受到公开的屈辱肯定不是聪明的做法。

星期四下午三时零五分，我向尼克松汇报了情况，他表示非常满意。我们讨论了安理会的决议、停止戒备措施的计划以及勃列日涅夫的信。我告诉他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没有具体说明十月二十四日那封信的性质，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是危险的，会把事情变成总统和总书记之间的个人对抗。我还告诉他有些记者提出含沙射影的质询，怀疑他为了缓和国内的困难处境而制造这次危机。总统对此十分愤慨。他比那些批评家更了解这是捏造，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这天下午安理会通过了第三四〇号决议，再次吁请双方回到

十月二十二日原来那条停火线去；原来的决议用词是“撤退”，我们经过努力争取改用了—个较温和的字眼“回到”。决议规定建立一支由联合国会员国组成的国际部队，但不包括大国在内（第三四〇号决议全文见章末注）。⑦我打电话给瓦尔德海姆，郑重提出这支国际部队不能包括苏联集团的国家，因为依照惯例，现有军事同盟的成员国都不应邀请参加。

果尔达对这次决议也象对前一天的决议一样表示坚决反对。她没把握不干——不管是否采取了戒备措施；在她看来，哪怕是同以色列在策略上的分歧也会变成习惯性做法。

与此同时，这一天我们一直与开罗交换信件。开罗要求帮助，向被围困的第三集团军供应血浆和其他医疗用品。以色列虽然原则上表示同意，却迟迟不提供任何东西；它还是想迫使第三集团军投降。

这时我的思想已越来越转向外交方面，即如何改变目前的微妙局面。目前刚刚摆脱危机，我想使阿拉伯人定下心来考虑和平的前景。十月二十五日夜，我借口询问访问开罗的技术性安排，发信给哈菲兹·伊斯梅尔，信中也说明了我访问的目的：

我期待着同你和你所认为适当的其他任何人会晤，并就我们两国所关心的各种问题进行建设性的初步讨论。在我们会晤之前这段时间，我们双方必须做到使埃及和美国的关系保持建设性的气氛。

这天深夜，尼克松从戴维营打来电话，他看到我关于召开记者招待会的电视报道，向我表示祝贺。可以想见，他当时正在为水门事件苦恼，不得脱身——“星期六晚大屠杀”事件毕竟刚刚过去几天，国会也正在准备对他进行弹劾。就公共关系而论，他主张放手去干。他现在希望我明天把新闻界的首脑人物都找到白宫来，向他们介绍这次戒备的情况。他希望我强调他的重要作用。倘使国会议长卡尔·艾伯特——这时他的地位仅次于尼克松——遇到

这样的问题，他会怎么办呢？过了几分钟，他又想起一个主意，要我同样向犹太领导人强调：“把他们统统都找来，向他们说，你们首先是美国人，是美国犹太社会的成员，而且都关心以色列。现在谁想去拯救以色列，将来谁想去拯救以色列？”

他的话忧郁而又明确。他勇于承担责任，面对复杂的情况镇定而果断。然而我们只有确有把握地做到不使水门事件影响我们的行动，才能保持我们外交政策的力量和连贯性。如果在公众心目中把我们的外交政策与水门事件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外交政策的希望，也就是和平的希望就要破灭。因此，我与黑格商量，极力主张不照总统的想法去做。这些主张肯定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恶果。黑格同意我的意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只有一件事还不能肯定。苏联一支由十二艘舰艇组成的舰队继续向埃及的“一片陆地”开进——我们的某些政府报告喜欢这种含混的说法。这支舰队在安理会第三四〇号决议通过后还在继续前进——也许是莫斯科把这支舰队忘了，而更大的可能是他们想确保执行停火不再发生问题。最后，十月二十五日夜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说，这支舰队在马特鲁港以北一百海里处停止前进；第二天各舰艇就散开了，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苏联海军的威胁性行动。

戒备的日子就此结束。

余 波

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五早上，美国报纸象潮水似地纷纷对我们的军事戒备行动发表评论，大多数报纸都对我们跟苏联的一场严重对抗得以幸免表示宽慰，并普遍支持我们的决定：拒绝苏一埃提案，反对超级大国出兵干涉。

这一天的《华盛顿邮报》写了两篇社论。一篇是关于“同水门事

件的联系”的，认为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暗示报界在破坏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对此表示愤怒，并说“我们国内的危机是由总统造成的。”另一篇社论认为，这次危机既表明缓和政策的局限性，也表明它的实用性。说尼克松的“反应，在我们看来是令人钦佩的，是坚定而克制的。”

在这次危机中我们是否真正接近于那种(危险)，我们还需要知道更多的情况，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说的，政府还要公布适当的文件和事实。对这一点做出判断还要等待。现在重要的是，我们以郑重感谢的心情注意到，尼克松先生和勃列日涅夫先生近年来所建立的关系，在这一周的激烈对抗中，使他们两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纽约时报》十月二十六日的两篇社论也提出，这次危机表明“苏美之间的缓和仍然十分脆弱。”该报主张尽快举行谈判：“基辛格先生昨天表示，组织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做到。我们认为这是不太好的。”

《华尔街日报》坚决支持政府的立场：“某些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提问，暗示总统在幕后策划这场国际危机，以便转移对国内危机的注意，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置信的。”《洛杉矶时报》的社论说：“美国的部分动员……是做得对的”，并赞成自战争开始以来应付危机的一系列做法。该报强烈反对超级大国出兵干涉，并赞扬政府拒绝这种主张。《芝加哥太阳报》认为，“基辛格先生所制定的中东政策是可钦佩的”，“在这样一个时刻，美国人对自己政府的外交政策应该表示信任。”

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尽量避免触犯苏联的自尊心，以便消除危机。现在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这样就必然会让莫斯科抓住另一个借口，推翻前一天夜里所取得的成果。

就勃列日涅夫那方面说，十月二十六日他在莫斯科世界和平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和解性的演说。他极力鼓吹缓和的

重要性；他没有提美国的戒备措施，而是严厉斥责以色列，说它“背信弃义”，违反停火。他再次重复了苏联解决中东问题的老一套的路线，实际上等于全盘支持阿拉伯人的强硬路线。但这一次不象过去四年他所做的那样，他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执行他的计划——这个空白为我们的战略提供了机会。

我的同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很好地概括了公众辩论的矛盾状态：

（勃列日涅夫）所以发表这一和解性的演说，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前天夜里我们对苏联威胁的坚定反应；另外也是由于勃列日涅夫自己把赌注压在缓和政策上。这次演说在我们这个狂热的城市里将进一步引起那种武断的说法，即所谓我们为了国内的原因而制造了这次危机。如果我们加以说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那么其结果或者是着重说明了缓和的脆弱性，或者是引起苏联人的反应——他们会表明，在这次对抗中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恐吓而退却。

显然，缓和并没有象我们的某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应该防止危机。他们这种说法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却是不真诚的。他们忘记了缓和的含义并不是友谊，而是敌对者之间一种相处的策略。说到底，我们中东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削弱苏联的作用和影响，而苏联人也是想削弱我们的作用和影响。但是我认为，缓和已经平息了一系列的危机，而这些危机由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利害的分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促进了国家的利益。

例如，虽然危机已逐渐消失，但我们仍然想限制勃列日涅夫派往埃及的观察员的作用和人数。现在既已决定由联合国派观察员，因此苏联这种做法无论如何也讲不通了。尼克松的复信在勃列日涅夫十月二十五日来信到达后将近二十四小时，即于二十六日下午一时发出；信中明确表示我们想把超级大国派观察员的人数

减少到最低限度：

既然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已经扩大，联合国紧急部队也已建立，美苏单独派遣监督人员就不恰当了。我建议，在这样一个时刻把联合国观察员的组成问题交给秘书长去处理。我们的想法是按照联合国紧急部队的组成办法限制观察员的人数。然而，如果秘书长愿意的话，他可以提出请求，要美国派遣少量观察员，我们将予以考虑。苏联观察员也可以同样方式参加。我们不认为各个国家单独派观察员到该地区活动是必要的。

这一天其余的时间，多勃雷宁和我都花在美苏观察员人数的争论上；我首先提出并且坚持双方都不得超过二十人。最后达成协议，双方各派三十六人。其实这样讨价还价是白费力气，因为后来埃及很快改变了主意，不愿意派观察员了。埃及新任代理外交部长法赫米在开罗说，埃及既不希望也不需要派遣观察员。苏联人玩弄的要美苏单独派观察员的这一花招始终没有顺利进行，随后由于其他外交活动，这个问题就没有再提了。

我们一直在对付苏联干涉的威胁，但引起干涉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埃及第三集团军仍被围困之中；它没有遭到攻击，却在忍受饥饿，最终必致投降。过去二十四小时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把医疗队派进去，以色列人则借口各种理由加以阻挠，致使医疗队被阻于苏伊士郊外不得前进。以色列声称它正在直接输送医疗用品，但我们也没有办法核实。至少这种说法也是想使埃及人丢脸，因为这着重说明他们是依赖以色列部队的。这样下去萨达特是不会接受的。

果然如此。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刚过，萨达特急电尼克松，指责以色列人利用当前的局面“隔断通向第三集团军的交通路线，企图孤立第三集团军，并迫使它投降”。此外，还继续阻止联合国观察员进入该地区。萨达特威胁说，他要采取单方面的行动重新打开这些供应线。他告诉我们，他也把这些情况通知

了苏联人。接下去他还暗示，这种僵持局面继续下去将会危及同我会谈的“建设性”气氛。他写道：“我愿告诉你，为了准备这次访问，我们正在拟定一整套方案，我们希望这些方案将会成为最终和平解决的转折点。”开罗之行居然成了双方一再讨价还价的筹码，看来需要出现某种奇迹才能满足各方面的期望，而这些期望主要是由一些无关宏旨的策略上的考虑引起的。很明显，我们和开罗都想利用这次访问来增强自己的地位——我们是想离间苏埃关系，并使萨达特不求助于苏联；萨达特是想引诱我们阻止以色列去消灭埃及第三集团军。凑巧，双方的目标正是不谋而合。

由于种种原因——历史的、道义上的和战略上的原因——我们在整个这场战争中都支持以色列，而且在国内危机的情况下冒一场与苏联作战的危险。但在消灭第三集团军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共同利益。

第三集团军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以色列在停火生效之后才完成对第三集团军的包围的，而停火协议是经过我们谈判达成的。尽管以色列能做到这一点，它却不能使第三集团军投降。前天深夜（十月二十五日）我曾问到以色列这方面的情况，据答称，还需要三天或四天的时间，在全线进行战斗，而且还要得到大量的现代化装备才能摧毁第三集团军。要这样干，就一定会引起与苏联的另一次严重危机，引起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长期仇恨，而且要使萨达特蒙受耻辱。

在停火之后最后消灭第三集团军也不符合以色列的长远利益。以色列的领导人对于遭受这次突然袭击无比愤怒，对战场上的严重伤亡无比沉痛，对给他们造成这次灾难的萨达特极不信任，他们一定要把萨达特搞垮才肯结束战争。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之一是鼓励阿拉伯领导人进行克制。我们同开罗交换信件的结果使我们深信，安瓦尔·萨达特给我们提供

了在中东争取和平的最好的机会。

现在我们既已阻止了苏联的干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开始这一和平进程。这就需要立即向第三集团军提供一些救济物资——这是一个困难的策略问题。我们的政府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却存在分歧。国防部提出的计划是用美国的 C-130 飞机向第三集团军输送物资。还有很多人极力主张停止对以色列的空运。我对于这两种主张都觉得不妥。我们不能在两星期之内，在一场中东战争中，对敌对的双方都搞空运。另外，突然停止对以色列的空运，可能被误认为是跟我们的盟国断绝关系，从而促使阿拉伯国家采取强硬态度，甚至可能重新引起苏联的干涉。

因此，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五这一天，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设法说服以色列主动向第三集团军供应某些物资，以避免迫使我们公开反对他们。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一个敏感而高傲的国家，一个在战争中过度紧张的友好国家，要想说服它不要坚持自己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又可得到国内人民的好感——当然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而且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还要在表面上保持密切合作的姿态。在说服以色列的艰苦过程中，还要保持埃及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还得加紧进行说服工作，因为第三集团军已经快要达到不能忍受的极限，同时还要考虑到埃及温和派政府的前途问题。刚刚又哄又压把俄国熊赶回笼子里去，我们还要保持警惕，必须注视着不让它再冲出来咬人。就这样，我们又整整折腾了一天。

接到萨达特的信之后，在几分钟之内我就与迪尼茨联系。与此同时，第三集团军企图在苏伊士以北突围。这说明它已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而突围又要消耗一部分物资，更加重了它的困难。而

* 以色列大选原定十月三十日举行，后因战争改为十二月三十一日举行。

且这样做又会使我们面临一次违反停火的争论。我催促以色列做两件事：邀请联合国观察员立即进入两军之间的地点去监督停火；允许向第三集团军输送食品、饮水和药品。这样做，第三集团军依然处于包围中，不能战斗，但仍可作为谈判的本钱，而又不致使它受到投降的屈辱。迪尼茨答应很快给予答复。我还把我访问开罗的计划告诉了迪尼茨。

此刻尼克松正在戴维营，他是为准备晚上的电视记者招待会到那里去的。上午十时三十分，我以他的名义给萨达特发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我向以色列提出的建议：

对这些问题要得到肯定的答复还需要几个小时。我们迫切希望在此期间你能避免采取任何不可挽回的行动。

你为基辛格国务卿即将访问期间所要进行的讨论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对此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你可以相信，他会采取建设性的态度。我们希望他的访问将成为走向持久和公平解决的道路上的里程碑。

中午左右，我给在戴维营的尼克松打了电话，向他汇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但他听到这天早上萨达特的紧急信件时，他“坚决”主张把这封信转给以色列人。（“坚决”是他的原话；实际上我已经这样做了。）“我们要采取一致立场”。

我等了将近四个小时还没有得到以色列方面的答复，于是再打电话给迪尼茨。他还没有接到指示，但是他提出了一个“个人的”想法：任何埃及人想离开第三集团军，都可允许，但要把所有的装备都留下来。换句话说，让埃及公开出丑——难怪他作为“个人”意见提出了。我再次向他提出，急需的非军事供应要允许通过——主要是食品、饮水和药品。我还补充说：“不许你们俘虏第三集团军。我的话是当真的。”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之后，我再次警告：“坦率地说，如果你们硬要搞成一场全面对抗，那会犯错误的。”我又一次要求他赶快答复。

下午二时半左右，即五个小时之后还没有得到以色列的答复，这时又收到萨达特给尼克松的另一封非常激动的信：

此刻在我收到你关于未来和平的令人鼓舞的来信时，以色列人正在捏造的借口下对第三集团军发动空中和地面的进攻，他们的借口是第三集团军首先发起了进攻。

我愿向你提出，此刻是关键时刻，未来和平正在受到威胁。你对于安理会决议的保证正在伪造的借口下受到挑战。

我希望我们能迅速行动，立即制止局势的恶化。

此后不久，库尔特·瓦尔德海姆通知我，在纽约的札亚特以非常激动的态度同他联系，询问能否召开一次安理会特别会议，抗议他所谓以色列新的违反停火的行动。埃及军队决不会投降。埃及将被迫单独行动。据札亚特说，现在正是转折关头。

下午四时十五分，我把埃及的来信转告迪尼茨，他仍然没有接到指示——这时离我提出紧急要求已经七个小时了。很明显，以色列政府在继续拖延，希望迫使第三集团军投降。迪尼茨唯一的暗示是，以色列内阁将派一名将军向我说明情况，并提交一份“全面的建议。”但这需要时间，我们不能等待。我提醒迪尼茨，有一个限度，不能把我们推到超过这个限度。迪尼茨的答话中透露了以色列人的打算：“不能让他们（第三集团军）逃脱而毫无所获。”当然，如果我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官僚机构来处理，其结果几乎可以肯定是按国防部所建议的去做，即由美国向第三集团军空运物资。我向迪尼茨暗示说，以色列的谈判地位是优越的，会得到一些东西，但不会是第三集团军的投降。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安排埃及和以色列的直接讨论——这是以色列长期追求的目标。但是照现在这种做法干下去，那将是一场灾难：

你们必须为这种讨论争取时间。我们很高兴地提出，你们和埃及人之间就要进行直接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愿意跟你们合作，但我要告诉你

们，苏联人就要再次提出最高的要求，你们不能老是一天天地让总统去搞对抗。

我要求在晚上九时安理会开会辩论之前给予答复。

我还是希望避免同以色列发生冲突，希望最后能得到建设性的答复，因此我以尼克松的名义给萨达特的信里讲了一些敷衍搪塞的话。信中告诉萨达特以色列已同意的接受联合国观察员的地址，以及以色列原则上同意派药品运输队到苏伊士城。信中还指出，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对违反停火的说法各执一词，刚好相反：“你们一定知道，要我们正确判断谁遵守停火、谁违反停火是不可能的事情。”信中答应，一旦公正无私的观察员到达现场后，美国就将准备确定谁破坏停火，并予以谴责。

这对于萨达特来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灾难就要临头——埃及的荣誉就要受到损害，第三集团军的供应越来越少，而我们则需要进行复杂的外交工作。

晚上七时十分，正当尼克松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们终于得到了以色列的正式答复。它还是玩弄拖延战术。这一次梅厄总理接受了我的直接谈判的建议，愿意同埃及商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仍然不对第三集团军提供救济。果尔达的想法似乎很简单：

我们相信，我们会对他们提供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既不是投降也不是屈辱，而是体面地摆脱这种局面。埃及人全部所需要做的只是提出时间、地点和他们的代表的军衔。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阿拉伯人接受直接谈判从心理上说本来就很难，而故意羞辱第三集团军又怎能消除这种困难呢。安排一次会议最低限度也需要时间，而每过一小时第三集团军就更加削弱。果尔达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想让我们放心：“他们（第三集团军）并没有陷于绝境；而是萨达特陷于绝境。”但是这样说丝

毫也不能消除我们的顾虑，因为我们固然关心保存第三集团军，但更关心保存萨达特。然而事实是，这两件事是紧密相联的，萨达特代表第三集团军，搞掉第三集团军就是搞掉萨达特。晚上七时五十五分，我把果尔达来信的要点转告在开罗的哈菲兹·伊斯梅尔，建议埃及和以色列直接谈判。

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两件事使问题更加激化。下午四时半左右，我们接到通知，苏联的另一封信正在送出途中。过去，接到通知后很少超过十五分钟信就到达了。但这一次过了两个小时信还没有收到。我问多勃雷宁，他说不知道。这是不是一场心理战，要把过去四十八小时那种危机重新表演一遍来折磨我们呢？是不是莫斯科对于它所提的建议又另有想法呢？我们只能等待，但我想，我们刚刚度过一场危机，似乎不可能很快又面临另一次同样严重的威胁。

当我们正在等待苏联的来信时，尼克松在白宫东大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于晚上七时开始了。这次招待会几乎打乱了我们的精心部署——我们的打算是既要表示坚定，又要不刺激对方。通观历史，我得到一个信念：在刚刚取得一场外交胜利的那段时间里，也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刻。胜利者往往倾向于一下子把螺丝拧紧，而失败者，在创伤未愈时又饱尝失败的羞辱，则可能急于寻求报复，甚至突然丧失理智，抛弃原来的考虑。

但尼克松另有需要。他决心显示一下，尽管一星期来围绕“星期六夜晚大屠杀”事件吵嚷不休，尽管他受到弹劾的威胁，但他依然在掌握全局——的确他是不可缺少的。他需要让公众相信，的确存在一场危机，并不是由水门事件造成的。出于这些因素，促使尼克松尽可能把这次危机向新闻界说得严重一些。

“我们得到的情报”，他说，“使我们相信，苏联正准备派遣一支很大的力量，一支军队到中东去。”是他下令采取戒备措施，目的是

“向苏联表示，我们不会接受他们采取的任何单方面的行动。”

而且这种明显的挑战是针对勃列日涅夫个人的；他以一种夸张的方式说明交换信件的内容：“且不说他的口气是粗暴、蛮横的；我要说的是，他的态度是很坚定的，使人不可能误解他的意图。因此我的回答也是很坚定的，使他不可能误解我们将要作出的反应。”尼克松接着又追述勃列日涅夫怎样理解美国的力量，特别是尼克松的力量。尼克松回忆说，自从他任总统以来情况一直是这样的；他曾不顾公众的各种压力下令轰炸越南：“就这样迫使勃列日涅夫采取了现在这种做法。”尼克松把勃列日涅夫的退缩描述了一番之后，又加上一句非常尖端的话，说这是“自一九六二年古巴对抗以来最困难的一次危机”——这种对比，是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有意避免的。

他所讲的情况大部分是真实的。但这不是同勃列日涅夫较量勇气的有利时机。一连几夜过分紧张，睡眠不足，我也有些急躁；我对黑格发了脾气，好像已经公开讲出去的话能够收回似的。黑格有他自己的问题，因为那些疯狂的记者们并没有因为国际局势紧张而放弃追捕自己的猎取对象，他们接二连三地、顽强地、甚至是蛮横无礼地围绕水门事件提出问题。尼克松的回答为自己辩护，他们的问题则想破坏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意图，而尼克松的意图之一就是向公众显示领导人的镇定、坚强和果断的形象。所以，也难怪黑格这样对我说：“你今夜跟他谈谈，让他不要着急。他现在简直要发狂了。”几分钟后，黑格又打电话来，说明安慰他是多么必要：“我现在跟总统在一起。我们注意到只有你一人没有打电话来。”我非常清楚，尼克松在每次公开亮相后那种近乎狂乱的不安全感，何况现在又加上水门事件的痛苦。在这样的时刻，在处理危机的细节问题上同总统辩论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残酷的。我对黑格讲了一句语意双关的话：“这确是一场精采的表演。”

两次记者招待会的气氛表明，如果再进行不合时宜的较量就很可能引起人心浮动，因而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而且不仅在国内是这种情况。当天晚上记者招待会之后，斯卡利向我报告联合国的情况：“我认为，除非我们使以色列后退，否则我们在这间大厅里将失掉一切朋友。”

晚八时四十五分，我“不以国务卿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朋友”给迪尼茨打电话。我告诉他苏联的信件正在途中。我说，我的印象是以色列宁愿接受强迫而不愿自行决定。只要有可能，我不愿看到以色列在压力下屈服，这样做将为未来树立一个坏的先例。我再次催促迪尼茨提出某种变通的提案，以缓和联合国的辩论。但迪尼茨软硬不吃，个人劝说无动于衷，公事公办也无济于事。他又诉说以色列在战争中的损失；他争辩说，第三集团军如得到供应就要发动攻势。（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没有人提出供应军事物资，只不过是提供非军事必需品使这支军队活下去。）以色列似乎已下定决心要把第三集团军饿垮。我不耐烦地说：“如果到那一地步，你们就被动了。”我充其量只能答应做到，“不到无法避免的时刻，不让你们受压。”

晚上过了九时，勃列日涅夫的信才姗姗而来。这位苏联领导人还是进行威胁，但不像前两天那样明显了。他只限于指责以色列危害普遍和平的利益。勃列日涅夫把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又重复了一遍：萨达特已请求美国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略，并向第三集团军提供救济物资。我们已同意在几小时内给予协助，但是时间已经过去，萨达特的请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如果在今后几小时内还没有消息表明已采取必要措施来解决萨达特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就将引起我们对于美国方面的意图的最严重的怀疑……

勃列日涅夫要求美国在几小时内给以肯定的答复。他还第一次谈到我们的戒备措施，说我们的行动是无端的，无助于缓和国际

紧张局势，只是他没有作出反应就是了。

这是一封很奇怪的信。它谈到对普遍和平的威胁，却不谈苏联准备如何对付这种威胁。它要求美国在几小时内答复，但除了对我们的意图表示严重怀疑外，却没有威胁要我们对后果负责。它对我们的戒备措施表示不满，但措词又非常谨慎，表明已经得到某些重要教训。此外，还表明苏联领导人的软弱和忍让是有一定限度的。

我已顶住了官僚机构想要美国对第三集团军输送物资的压力。我理解以色列拒不妥协是不安全感和绝望情绪的反映——是害怕陷于孤立和大祸将要临头的预感所造成的，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饱经忧患已经在灵魂深处打下了烙印。他们还担心一旦屈服于压力，就会对他们无穷无尽地进行勒索。他们所以不肯退让还反映了以色列内阁的意见分歧，僵持不下，内阁成员中没有一个敢于表示比别人“软弱”。一整天我都在想办法避免与以色列公开决裂，哪怕在劝说他们不要凭借自己的优势而走极端的时候，也设法照顾到他们的心理状态。但是事情越来越明显，以色列是不可能作出决定的。看来它宁愿被迫放弃它的猎获物，而不愿自动地放弃。我最后的责任是作为美国的国务卿行事，而不能充当以色列政府的精神病医生。我极不情愿但也只好决定：我的责任是要强行摊牌。我对以色列的唯一的友好表示是不把事情宣扬出去，如果以色列允许我这样做的话。

于是，在星期五晚上十时五十八分，我代表尼克松打电话给迪尼茨。我不记得事前曾否跟总统商量过：不管曾否商量过，无疑总统是会支持我的。这时尼克松正在为记者招待会的反应和水门事件烦恼，无暇他顾，不然的话，他很可能早就强行决定了，或者是同意另一种选择，即由美国向第三集团军输送物资。我对迪尼茨说：

我分几点向你说明总统的反应。第一，他要我非常明确地说，我们不能容许在达成停火协议之后的情况下摧毁埃及军队，因为停火协议一部分是由我们参加谈判达成的，因此不存在这样的选择……。第二，他希望你们在明晨八时以前对于允许向埃及军队提供非军事物资的问题给予答复。如果你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就只好在联合国支持一项关于强制实施第三三八号和三三九号决议的决议案。由于你们不能作出决定，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不管是什么理由，总统要我告诉你们，这就是我们的立场。你们的答复要允许某种谈判，并对非军事供应问题作出某种肯定的反应，否则我们将联合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我必须再说一遍，你们的做法是自杀性的。不许你们消灭这支军队。你们在破坏谈判的可能性……

我告诉迪尼茨，这个新做法我们不会告诉开罗；我们将把以色列的任何建议都转达埃及；我们将支持以色列不向第三集团军提供军事物资。迪尼茨是头脑最敏锐的驻华盛顿大使之一，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并没有要求以色列撤回到十月二十二日的停火线，而且很可能为此而感到宽心。我也没有把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事告诉任何别的政府。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凌晨二时三十分，我们发出总统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件。这封信措词温和但不明确。它表明我们对停火承担义务。尼克松答应催促以色列政府让非军事物资通过送交给第三集团军。这封信没有说明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也没有说明我们所确定的时限。我们不想让苏联人死扣住这个时限向我们提最后通牒。这封信还答应莫斯科在星期六下午给予答复，比我们为以色列政府定的时限晚得多，这样好有充裕的时间对联系的结果进行必要的澄清。尼克松的信最后提到戒备问题：

至于美国由于你十月二十四日的信而采取的行动，我愿引述你那封信中的原话：“必须毫不迟延地遵守协议。我愿坦率地说，如果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不可能同我们一起行动，我们就不得不紧急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步骤的

问题。”总书记先生，这些话是很严重的，我们在华盛顿这里也是严肃对待的。

我们刚刚发出给莫斯科的信，就接到以色列以果尔达的名义给我的来信。虽然我是以尼克松的名义传达我们的要求，果尔达却满有把握地不同尼克松直接打交道。她使我们相信，她总是和她的下属发生争吵。她把总统置于受尊崇的地位，不去碰他，好让他有回旋的余地，说别人破坏了果尔达所谓的和睦一致，从而改变自己的方针。如果这一着不成功，最后必须对总统作出让步，她再施展某种巧妙的手法，也许最低限度在将来还可以捞到某些好处。

这封信最典型地说明了果尔达的风格：感情奔放，高傲自尊，精明干练。这封信的写法一方面想对以色列内阁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想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她有意把这个问题同超级大国的干预联系起来，暗示我们屈服于苏联人的压力——这个论据如果宣扬出去，肯定会在我们国内造成最大的压力反对我们。她说：“我不抱任何幻想，任何事情都是两个大国强加于我们的。”这就是对我们一项请求的答复；我们的请求是要以色列提出某种建议，以便于我们在安理会抵制苏联的压力，她拖延十八个小时后却作了这样的答复。她的信还说，她唯一的请求是要我们明确地告诉她应该做些什么，“以便埃及能够宣布它的侵略得到了胜利。”这就是对我们一项建议的答复；我们的建议是允许食品和饮水通过，送给停火（美国参加了这个谈判）之后被围困四十八小时的一支军队，而且即使他们得到这些最低限度的供应之后仍然处于被围困状态。她可以做出某种让步，但决不能强迫这头母狮子去做：“只有一件事情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们去做，那就是宣布局势的真相；以色列受到惩罚，并不是由于它的行为，而是由于它是一个小国，由于它是独立自主地行事。”

这是以色列内阁的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件：如同大卫向歌利亚

挑战*，而又想办法使自己不承认有任何错误。

她尽管大发雷霆，有一件事却瞒不过我，她的回答再次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拒绝提出一项建议。她坚持要我们提出一项建议，而这正是我要极力避免的。果尔达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自信，一部分是由于以色列政局复杂，此外还因为以色列大选即将来临，这样更便于她下台而不参加竞选。

我在读这封信时又赞赏又恼怒（我对斯考克罗夫特赞叹说：“他们是狂人英雄。”），正是在这种心情下我起草给萨达特的回信——又是通宵未眠。我们未能解决的问题萨达特却为我们解决了。星期六凌晨三时零七分，哈菲兹·伊斯梅尔来电告诉我，埃及已接受直接谈判，由埃及和以色列各派一名少将级的军官来“讨论如何执行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第三三八号和三三九号决议有关军事方面的条款。”会谈将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在开罗至苏伊士公路 101 公里处举行。唯一的条件是在当天（星期六）开罗时间下午三时会晤之前两小时实现“彻底”停火，并在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的监督下，允许一支运输队通过，把非军事物资送给第三集团军。

果尔达的脾气发得太早了。通过我们的策划，以色列就要同阿拉伯的代表们直接会谈，自以色列独立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而且当时联合国几乎一致要求以色列退到十月二十二日的战线，在这种情况下，它仍能控制通向第三集团军的路线。作为交换条件，它所做的只不过是允许一支携带非军事物资的运输队通过而已。

凌晨四时三十一分，我告诉哈菲兹·伊斯梅尔，他的来电我们极表赞同，已“作为最急件”转达以色列。六时二十分，以色列全部接受埃及的建议；我立即通知萨达特。三个小时之后，我们才以尼

* 据《圣经》记载，大卫是古代以色列国王，他在童年时曾打算杀死非利士勇士歌利亚。此处喻以色列向美国挑战。——译者

克松的名义发信给勃列日涅夫，告诉他埃及和以色列的会谈即将开始，以色列已同意运输队通过——我们所以推迟三个小时再通知苏联，是不想让它有太多的时间去制造麻烦。

但是中东问题解决起来总是不那么痛快。每前进一步都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华盛顿时间上午十一时（开罗时间下午五时）以色列通知我们，埃及人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没有出现。于是又紧急通讯联系。原来是埃及前往101公里处会晤的军事代表被以色列的哨兵拦阻，停在85公里处不能前进，因为他们未接到命令不准埃及代表通过。一位埃及少将坚持要同一位以色列的同级军官直接对话，对于这样一种从未遇到过的现象，他们竟然不同自己的司令部联系，这似乎是一件怪事。这个误会很快就解决了。我亲自给果尔达打电话谈这件事。以色列显然忽略了通知联合国的恩肖·西拉斯沃将军作必要的安排，而我告诉伊斯梅尔，以色列会通知的。^{*}我催促再定一个时间，并且事先都要通知到。文电往还又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双方相距几百英里，需要通过华盛顿交换文电，总算起来是一万二千英里——才决定两位将军在午夜会晤。

最后，于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当地时间一时三十分，即在新规定的时间之后一个半小时，以色列和埃及的军事代表终于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会面了，这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直接会谈。但是，在这一整天，以色列仍然想尽办法阻挠运输队通过。他们在二十六日晚间曾对我说过，第三集团军的食物和饮水的供应还可以维持四十八小时；他们下决心要使埃及人断粮。如果运输队尚在途中，埃及这支军队被饿垮，耶路撒冷是决不会伤心落泪的。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早晨，我终于能够向哈菲兹·伊斯梅尔报告，运输

^{*} 后来我有机会同西拉斯沃将军核对这件事。他肯定这确是误会，但在当时我曾怀疑这是以色列在捣鬼。

队已抵达目的地。埃及同意继续会晤。这件事尚未结束，就又开始转向谈判。此后不久，谈判就一直进行下去了。

和平的前景

我们即将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战争结束了，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也渡过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我们已成为外交中的主要因素。埃及正在开始向我们靠拢，这样一来即使是激进的阿拉伯国家也要重新考虑他们政策的前提。萨达特已发出了明显的信号：他想改变方针——他的有步骤、有节制、有远见的行动不可能作别的解释。而这一切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的：我们在战争中支持我们的以色列朋友，在停火问题上错综复杂的外交工作中我们没有使他们陷于孤立。

我们的地位越来越优越，这可以从苏联来信的腔调中看出来。十月二十九日，勃列日涅夫再次给尼克松来信，其内容哀怨、责难和威胁兼而有之，他指责埃以会谈受到阻挠，救济物资不让通过。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的行动客观上等于支持以色列的“军事集团”（这个论点显然与美国的某些批评家的意见相左，他们认为我们与莫斯科相勾结），从而引起了信任危机。勃列日涅夫强烈要求我们合作，反对“侵略”和企图破坏美苏关系的“骗局”。

这封信说明苏联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并对我们所策划的一整套做法迷惑不解。勃列日涅夫的大棒恐吓既已失败，他的威胁也就基本上失灵了。与此同时，他们的抗议和抱怨也必然落后于事态的发展。莫斯科与开罗联系，然后再与华盛顿联系，需要花一些时间，而当我们收到克里姆林的来信时，问题往往已经解决或者接近解决了。十月三十一日我曾对尼克松这样说：“只有我们真的向以色列人提供援助，否则他们（苏联人）总是会想办法找借口，威

胁我们，或者逼迫我们，要我们做这做那，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做了。”

苏联人遭受挫折的另一表现是，他们企图抛开联合国，以某种双边形式同我们对话，以便取得监督停火的合法地位。为了让苏联人放心，免得天天纠缠不清，十月三十一日我向多勃雷宁提议，由两国各派一名代表参与安理会第三三八号决议中和平谈判的“赞助”工作。第二天葛罗米柯故意把这两名代表说成是监督停火。萨达特这时已十分相信美国的作用，因此我把这项建议转交给当时正在华盛顿的埃及代理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去考虑。他跟我们一样对苏联的监督作用已经不感兴趣了，因而搪塞过去，这项建议就没有再提。

很明显，如果我们敢于放手大干，就可以逐步削弱苏联和激进派在中东的影响，或者迫使苏联人采取比较温和的方针。十一月三日，我们才回答勃列日涅夫五天之前的来信，重申我们对和平共处信守不渝，坚决摒弃对单方面有利的行动；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考察了当时美苏谈判的现状——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到美苏经济关系的前景。我们的目的是要表明，除对抗之外，还有另一条积极的方针；同时也表明，要正确看待刚刚渡过的一场危机以及将来必定出现的紧张局面。

然而，我们这个社会习惯于比较简单的答案，这个国家正在经受着被水门事件肢解的痛苦，我们的政策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这自然会引起国内日益增涨的反对。保守派人士对于美苏对话这件事大为不满。自由派人士又怀疑这是搞实用主义。这两种人都典型地表现了美国人那种怀念比民族利益更为“高尚”的政策倾向。我已开始准备我的中东之行；这次中东之行不仅将考验我们的外交，而且将考验我们应付国内各种互相矛盾的压力能力。在争取中东和平的斗争中美国已成为主要角色，它能否打开

二十五年来僵持局面，重新进行组合呢？

①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安理会第三三八号决议是在莫斯科拟定的，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1. 要求现在战斗的各方，不迟于本决定通过后十二小时，在它们目前占领的阵地上，立即停止一切射击并终止所有的军事行动；

2. 要求有关方面于停火后立即开始执行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的所有部分；

3. 决定有关方面在合乎时宜的赞助下，立即同心协力地开始进行停火谈判，旨在建立中东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② 《白宫岁月》，第一一五五页。飞机驾驶员认为这是计算机发生故障。J·F·特霍斯特和拉尔夫·艾伯特齐上校合著：《飞行白宫：“空军一号”的经历》（纽约：科沃德、麦卡恩与盖根出版公司，一九七九年），第九章。

③ 十月二十三日通过的第三三九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念及其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三三八（一九七三）号决议，

1. 确认其立即停止一切射击并终止所有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促请双方军队回到停火生效时他们所占领的阵地；

2. 要求秘书长采取措施，立即派遣联合国观察员监督以色列部队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部队遵守停火，并为此目的使用联合国现在中东的人员，首先使用现在开罗的人员。

④ 理查德·尼克松著：《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塞特与邓拉普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第九三八页。

⑤ 参见《白宫岁月》，第六一四——六三〇页。

⑥ 参见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文件：《对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采取戒备措施的质询》，即第九十三届国会一九七四年第二期会议众议院第一〇〇二号决议的附件：第九十三至九七〇号报告。这个报告一般地叙述了当时汇报的情况，并同意政府的看法，即已对公众充分说明了情况。

⑦ 十月二十五日通过的第三四〇号决议如下：

安全理事会

忆及其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第三三八号和十月二十三日的第三三九号决议，

遗憾地注意到，据报第三三八（一九七三）号和第三三九（一九七三）号决议未被遵守，停火一再受到破坏，

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报告说，联合国的军事观察员还不能到停火线的两方去，

1. 要求立即遵守彻底的停火，各方面回到他们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格林威

治时间十六时五十分所占领的阵地；

2. 请秘书长增加派在两方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数目，作为一项立即采取的步骤；

3. **决定**立即在安全理事会权力下，建立一个联合国紧急部队，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外的联合国会员国派出人员组成，并请秘书长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就这方面采取的步骤提出报告；

4.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以及第三三八（一九七三）号和第三三九（一九七三）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理事会作紧急的和持续不断的报告；

5. 请联合国各会员国与联合国充分合作执行本决议及第三三八（一九七三）号和第三三九（一九七三）号决议。

第十三章

第一次中东突破

法赫米和果尔达

一九七三年十月底，战争结束了，但是，在周围还存在着大量高度爆炸性的因素。埃及第三集团军在西奈被切断了联系。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已实行石油禁运，并削减了石油产量。苏联正为它的惨败和丧失影响而痛定思痛。我们已设法实现了停火，并开始取得和平过程仲裁人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原先设想的对埃及进行的一次访问——我对一个阿拉伯国家的第一次访问——成了走访几个中东国家的旅行。

但是，我此行不会是一次盛会，只不过是提供一个机会，也许是一个陷阱。最好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战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如果此行失败，那就很可能导致灾难。如果美国表现得软弱无能，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就不敢再支持温和派的方针；叙利亚就会更加寸步不让；埃及到头来可能再次加入苏联阵营。苏联人就会恢复原来的地位，而且有所进展。莫斯科在刚克服了危机之后表示，它准备发表一些威胁性的言论，虽然并不总在威胁之后继之以行动。

大家神经都十分紧张，因此开罗迫不及待地要我早点到达那里。我们当时还未能充分理解这种情况，萨达特想显示美国的关键性作用的心情之迫切，几乎不亚于我们。十月二十八日，我突然得到通知说，代理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正受萨达特总统的派遣前来华盛顿，而事先并没有通知我们。此外，由于我此行将不

在以色列停留(早些时候,我曾于十月间到过那里),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也将到达华盛顿来进行定于十月三十一日开始的我中东之行前的讨论。

在法赫米和果尔达都首途前来华盛顿的情况下,我马上面临的陷阱是,我们可能因为脆弱的停火而互相指责,把我们的战略机会消耗掉。也还有一些实际问题。如果埃及第三集团军继续陷于困境,就免不了经常发出警报。以色列将会容许给养运输队到达陷入重围的这支埃及军队那里,还是想把它饿死在那里呢?怎样才能使它确保得到补给品,而又不致于危险到把事情闹翻呢?如果埃及人得到无限量的供应,那渡过了苏伊士运河而到达运河西岸的以色列军队就可能面临被围困的局面(请看第一五九页上的地图)。以色列还要求释放它的战俘。为了加快实行停火,勃列日涅夫曾答应我全力支持迅速交换战俘。但我很快发现,埃及和叙利亚都不知道有此保证——而以色列有理由坚持要履行这个诺言。以色列还要求自由通过红海南面入口处的曼德海峡,而这个海峡被埃及海军未经宣告就封锁了。

如果说,冲突的废墟对我是一种危险的话,急不可奈地想立即实现永久的、全面的解决则是另一种危险。确实有人曾批评过我,说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去这样解决问题。^①但是,这是一种幻想。我们知道,以色列坚决拒绝恢复一九六七年的边界线,包括拒绝放弃耶路撒冷古城。而要谋求全面和平,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哪怕是最温和的阿拉伯国家,都不会提出少于这一条件的要求。被阿拉伯人的进攻惊呆了的以色列刚刚恢复过来,似乎仍处于瘫痪状态。它面临着选举;它想重新确定自己的方向;为了进行全面谈判而对它施加压力的话,比较大的可能是促使它采取铤而走险的措施,如中断停火,或是在心理上垮下去,而不是求得解决。至于阿拉伯人,要是想全面解决问题的话,那必须所有有关的方面都同意才

行，这样，阿拉伯世界的激进分子就可以享有否决权。埃及就无法自己作出决定。苏联就会作为阿拉伯一方的律师插足进来，提出一个最高纲领，而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纲领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的欧洲盟国和日本都会支持阿拉伯人的立场，使我们完全陷于孤立。

正是由于慎重考虑了这些可能出现的风险——陷于讨论细节、或者是追求可望而不可即的全面目标，因而把我们的精力消耗掉的风险——才促使我们决定宁可采取“步步为营”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作出雄心较大的努力，一旦失败了，大家心情沮丧，我们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以色列人会责备我们向他们索取的东西太多，阿拉伯人会怪我们没有把话说清楚，我们的盟国会责备我们使它们无能为力；苏联人则可能利用由此而造成的动乱局面来达到他们的霸权主义目的。政治家必须权衡一下成功的奖赏和失败的惩罚。因为只许他猜一次。他不象一个观察家，在他的判断被证明是错的时候，有权在另一篇论文中修正它。政治家的错误很可能是无可挽回的。我们需要在各方心理能力之内确定目标，确定那些寸步不让的人或狂热分子无法否决的目标。我们每走一步都必须表明我们能取得成绩。这么一来，每一步进展都会建立起信心，使下一步较易进行。十一月二日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我说：

如果我们能实行一个温和的计划，我们就能减少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并使石油禁运得以解除。而我们正要这样做。否则的话，阿拉伯人就会被赶回到苏联人的怀抱，石油将会丧失掉，全世界都会反对我们，在联合国将没有一个国家投票赞成我们。我们必须向阿拉伯人证明，他们按照一个温和的计划和我们一起打交道，要比按照一个激进的计划和俄国人打交道上算些。

但是，到那时为止，一切都还是理论。我从未访问过一个阿拉伯国家，也没有和阿拉伯领导人打过很多交道。他们来华盛顿访

问的次数不多，除了从这些访问中了解他们之外，我无法知道，在我看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事，他们是不是也那样看。当时也还不清楚，我能否和他们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当我被提名为国务卿的时候，阿拉伯世界曾对我的犹太人背景感到有些不安——但是，也欣赏我在越南停火谈判中所获得的声誉，以及我有可能对以色列施加一种起缓和作用的影响。

我很幸运，第一个从阿拉伯世界来和我会谈的人是伊斯梅尔·法赫米。他不久将就任埃及正式的外交部长。（十月三十日批准他任外交部长，不再是代理的了。）十月二十九日（星期日）那天，他没有和我预先约定，一下飞机便直奔我在国务院的办公室，他快步跑了进来，想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攻占堡垒。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总统派我来和你认识一下，让我回去向他汇报关于你的情况，并为你的访问作准备。”换句话说，萨达特派他来看看我这个人怎么样；法赫米准备给我打分数。

萨达特作的这个选择是再幸运不过了。法赫米这个人既开朗又阴沉，善于交际而又喜欢磨人，说话和蔼而又带刺。他在联合国任职多年，在那段时间他一直住在美国。他有一个孩子是在这里抚养成人的。在纳赛尔执政时期，他因为被指责有亲美偏见而吃过苦头。这是纳赛尔对他的误解。法赫米是真正致力于和西方改善关系的，他也是一个热情的埃及民族主义者。和萨达特一样，他向我们靠拢不是感情用事，而是由于冷静地分析了埃及的利害关系。纳赛尔的政策带来的是灾难；和苏联调情的结果并未能恢复埃及的失地。想通过施加压力从我们这里得不到的东西，也许能通过信赖和合作精神得到。法赫米能够灵活地运用策略，但是，对于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他是明确的，在原则问题上他是寸步不让的。

法赫米这次来是要对我软硬兼施。他的浪漫的个性使他觉得

蛮可以向我施展他的外交手腕。他所施展的外交手腕甚至超过了我自己的不算很低的估计。阿拉伯人似乎生来就相信，某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或人物将会从一般的平凡人中脱颖而出，这是人类中常见的事。他们认为，能够创造奇迹的人就是能够设法避免作出棘手的选择的人。由此而来的法赫米的策略是要我出个胆大妄为而又复杂得惊人的点子——这也使我注意到，象他这样一个能够看透极其复杂奥妙的谋略的人，对我所能提出的一些比较粗浅的点子是不会感到满意的。不过，法赫米也是一个熟练的外交家，他特别善于把萨达特的往往是一些设想而没有具体内容的指示变成实际的谈判建议。法赫米的脸盘又圆又胖，他要显得愉快并不难。他确实是个好人。但是，他的锐利的目光说明，他有透视问题的本领。归根到底，他的举止与埃及的上层人物一样，为避免不必要的对抗，他可以采取宽容态度，但他也使人确信，如果分歧无法调和，对抗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阿拉伯国家这一群不寻常的外交部长当中，法赫米是我与之接触时间较长的头一个外交部长。这些外交部长见面时“称兄道弟”，但是彼此之间却似乎没有什么好话。他们彼此间对别人的图谋互相猜疑，已成病态；他们交换情报速度之快使人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他们言不及义，却又装腔作势，口若悬河，以此来掩饰其真正意图。和这些人在一起，虽然有点伤脑筋，却还是颇有意思的。和法赫米“称兄道弟的这些人”老是抱怨说，他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会议上的人，而不是阿拉伯联盟的人；他则认为，这些人是无知的外行，他们宁可做失败的好汉，而不想去取得实际的成就。他们各有各的理。法赫米和他的绝大多数同僚比较，确实对西方有较大的同情心，对西方的了解也多得多。他还懂得如何把洋洋大观的宣言变成实际成就，而他的一些同事则似乎根本不懂得如何这样做。但是，谁要是忘记了法赫米肩负着阿拉伯人的使

命，那可是一件冒险的事。他的民族主义包括范围更广的阿拉伯目标。我们成了虽然相处谨慎但却关系甚好的朋友。

法赫米这次到华盛顿来的任务基本上是要起一种心理作用。他提出了一个阿拉伯和平计划，但并不期待会立即获得成功，因为他知道，这要和以色列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而且，不论是拖延还是失败，萨达特都经不起。因此，法赫米强调说，他的目的是比较广泛的，是要消除埃及和美国的关系中存在着将近二十年的紧张局势。

他没有对停火遭到破坏进行指责，虽然要是他责备我们未能执行谈判成功的东西也是很自然的事。他确实称赞我们实现了停火以及推动了以色列和埃及在 101 公里处举行谈判的过程。埃及人善于巧妙地利用外国人，这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他们当然懂得，诱导一个人去替他们办事的最好办法是使他有要维护的声誉。奉承人的万无一失的方式是称赞他已完成了的业绩。

法赫米没有因我们国内动乱而有什么消极想法；他倒是很高兴地硬说，萨达特在国内的问题还要大得多：“你们这里的水门事件是小事；在我们国家里，整个局势是一场危机。”为我们自己着想，我倒希望他说的这些话不是由衷之言。如果说埃及的危机比我们的危机还要严重，一个建筑在使埃及大大改变其同盟关系的基础上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法赫米又说，尽管萨达特有他的困难，但是，他还是殷切希望不仅是对美国、而且对以色列都有根本的改变。他说：“我们并不想把以色列赶到海里去，也不想进攻以色列，尽管存在着巴勒斯坦问题。”换句话说，埃及不但接受了以色列的存在——这在当时正是愈来愈多的国家在中东问题上拿来大作文章的主题，但是法赫米十分肯定地说，埃及不会让巴勒斯坦人阻碍问题的解决。这和哈菲兹·伊斯梅尔在这一年的前些时候向我表示过的立场比较，是一个很显著的变化。

法赫米也懂得，在中东，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心理作用的问题：“信任是关键……以色列和埃及必须建立信任，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前进。”总而言之，有关给埃及第三集团军运送给养问题的谈判细节决不能妨碍大家认清真正革命性的目标，这个目标将从根本上改变以色列和阿拉伯对话的职权范围。

不过，法赫米对于如何解决给埃及第三集团军运送供应品问题、释放俘虏问题和对曼德海峡的封锁问题，确实有若干主张。这些主张所依据的前提是：以色列要么撤退到十月二十二日的停火线（在它把埃及的第三集团军包围起来以前它所控制的那条线），或至少在开罗—苏伊士公路两侧空出一条宽十公里的走廊——这正是以色列担心会发生的事，那就是：眼看着它的军队在苏伊士运河的西岸遭到两支敌对军队的夹攻。因此，看起来，这些主张哪一个也不是特别切实可行的。为了缓和这种担心，法赫米提出保证说，决不在这条路上运送军用物资——这倒是个实质性的意见，如果我们能建立起适当的检查制度的话。

果尔达很快就要来访，在此之前，我避免进行详细的谈判，但是，在研究了法赫米的主张以后，一有机会我们就能很快行动起来。在那时以前，我主要关心的事是避免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无休止的游击战。我是这样对法赫米说的：

如果我把我的本钱花在停火的每一个细节上，那我就留不下什么本钱来花在和平谈判上了。如果和平谈判不能成功，我们可以承认现在的战线或十月二十二日的那条战线——这条战线反正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又会有另一场战争。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能把停战安排好，使它在会后三至六个月中我们进行和平谈判的期间能维持下来。

同时，我告诫法赫米，石油禁运会妨碍而不会促进我们的和平努力：“如果不制止石油禁运和减产，我们将不得不停止我们的外交努力。不能这样施加压力。”法赫米是个十分精明能干的人，他

能想象到，不管有没有压力，他仍然能把一切交给我们去管而用不着作任何让步。他一面坚持他的关于十月二十二日战线的立场，同时也表明，如果以色列同意可以定期给埃及的第三集团军运送非军用物资，埃及愿意考虑解除对曼德海峡的封锁和释放以色列的战俘。但是，以色列会允许把任何一种物资运送给陷入重围的敌军吗？只有以色列总理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果尔达·梅厄于十月三十一日到达华盛顿，此时的梅厄和几个月以前的梅厄相比，简直判若两人。这位以色列领导人几个月以前曾那么信心十足，甚至趾高气扬地对尼克松说：“我们现在的景况好极了。”现在战争把她弄得狼狈不堪；她保持了她的坚强领导，但是，每出现一个有阵亡将士的以色列家庭，她都很痛苦。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她还必须引导她的人民进入一个新的、基本上是不熟悉的国际环境。

人们开始深刻地认识到，这场战争在战术上是打赢了，但在战略上却是不分胜负。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已荡然无存，自信心也随之消失。一个四分五裂的民族对待当前的处境简直是不知所措，而在一年以前，他们是会欢庆胜利的。直接谈判一直是以色列一九四七年以来公开声明的外交目标，现在已由以色列军人和埃及军人进行，然而，谈判的成果却随着其含义的日趋明朗化而化为灰烬。一切有形的让步——尤其是领土——都是要以色列去作出的；一旦作出了这种让步，那就无可挽回。而阿拉伯人的交换条件却是无形的，即如外交上的承认或一种法律上的和平状态，这些总是可以修改、或甚至撤回的。以色列曾希望它终于会为它的邻邦所接受，但是，了解到了在其他国家看来承认只不过是外交的开始而不是外交的终结以后，看到了阿拉伯政策的改变未必是真的、也不见得是永久的以后，这个希望变得渺茫了。

美国卷入这场外交活动只是局部地减轻了它的困难。随着我

们变成调解人，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必然会在许多细微方面发生变化。以色列想要美国采取的是两种近乎互不相容的行动方针：其一是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谈判立场，而由于以色列国内政治情况的驱使，以色列的谈判立场往往在策略上也是寸步不让的；其二是对阿拉伯国家施加影响，促使它们接受以色列这个国家并和它缔结和约。要充当第一个角色，我们实际上就得充当以色列的律师；要达到第二个目标，我们就必须获得阿拉伯人的信任，而且要有办事公道的声誉。要是我们认真对待和平过程，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看待阿拉伯人的观点；我们偶尔还得表示我们不能支持我们认为不合理的以色列的立场或行动。几年前，我曾对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伊扎克·拉宾说，只要美国的政策是要使阿拉伯人依赖苏联支持的情况归于失败，那么美国的政策和以色列的政策便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一旦阿拉伯人对苏联的幻想完全破灭，一旦阿拉伯国家开始以一种合作的精神转向我们，那美以之间就很可能出现观点或策略上的分歧。至少就埃及而论，这样的时刻现在快要到来了。这一切使以色列害怕得不得了，它生怕美国可能作很大的承诺，要和阿拉伯世界建立新的关系，以致它对以色列的支持会变得不那么肯定了，因而以色列会失去它的唯一的朋友。

正是由于这种恐惧心理迄今尚无任何根据，它就更显得令人讨厌。以任何国际关系的正常标准来衡量，在战争期间和战争所造成的动乱局面中，我们一直援助以色列，其程度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用空运接济的办法，并在外交上进行干预，挽救了以色列。在果尔达来访之前的那个星期，我们防止联合国谴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我们采取戒备措施，威吓住了苏联人。但是，我们已第一次表示，我们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我们划定的界线是，不能支持以色列在停火以后摧毁陷入重围的埃及第三集团军。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表示不能支持以色列，是在当时情况下所能想

象到的最温和的做法。我们并没有要求以色列撤退到十月二十二日的战线，我们只是要求容许一个运送人道主义供应品的车队通过以色列的阵线。但是在以色列，实质性的东西没有象征性的东西那么重要。如果我们表示不支持以色列竟成了习惯性的行动，那么，以色列就完蛋了。

要是在别的时候，果尔达是会冷静地估计形势的，并且会决定，以色列只有和显然同情以色列的战略考虑的美国政府制定联合战略，才能够很好地维护它的安全。但是，这次来访是在停战才过了九天、苏联发出威胁造成戒备状态才过了一个星期时开始的。她显得精疲力竭。她用表面上的不顺从态度来掩盖她的恐惧。她在谈到让运输队通过一事时语调阴沉，说这是埃及的“胜利”。

这一切正说明了果尔达真正担心的是什麼，而这恰好是缔造和平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假若以色列的谈判立场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话，那么，退让起来，何处是止境呢？假若美国保留自己的权利，不跟着耶路撒冷亦步亦趋，那么，以色列还能指望什么呢？对这些问题还是有答案的，我们在以后几个星期找到了答案。但是，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时间，在果尔达看来，她的国家好容易摆脱了军事失败的幽灵，却又遇上了缓慢的外交摩擦的危险。果尔达在十一月一日那天说，“我现在离开了家。”她的这句话给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第一次会晤定了调子：

因为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除了实质问题外，必须把事情说清楚……我们需要知道正在讨论的计划。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不是要接受既成事实？是不是要由别人定下来以后才让我们知道？……也许以色列不得不完全按照埃及的意旨办事。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双方之间正在策划什麼。有没有谈判的计划？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人民负责。

当然，问题之所在丝毫也不是硬要以色列接受埃及所要求的条件。我们倒是认为，使埃及的第三集团军不致于被摧毁，是开始

任何和平过程的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而以色列比哪一个国家都更需要这一和平过程。但是，果尔达不相信我们或其他任何人懂得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在她见到路线图之前，宁可留在原地不动。而且，她把握住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对以色列的要求愈来愈多，这些要求与其说是抽象地分析是非曲直，倒不如说是大国施加的压力。两天以后，她说，“假定我们开始举行和平谈判，那么，我们会是什么样的遭遇呢？苏联人不会有什么变化，欧洲人、日本人也不会会有什么变化。石油仍然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你怎么知道，到底会不会有更多的压力要求继续搞石油禁运呢？”如果这就是以色列的命运，为什么不在苏伊士运河面对这种命运，而要在更靠近以色列边界的地点去面对它呢？

果尔达的这个问题提得好，要想从理论上去回答它是不可能的。我们设法减轻以色列害怕孤立的心理。但是，依赖关系可不是什么安逸的关系，特别是所依赖的是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小国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可能取决于一念之差，这一点，离它很远、安全系数较大的国家是不那么容易理解的。美国必然比以色列更加愿意为谋求和平而冒风险。而且美国所冒的风险毕竟是间接的风险。但对以色列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美国蛮可以作些实验，而以色列只要有一次失算就能带来浩劫。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自从有了国际关系即已存在。在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里，每一个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参照其他国家的目标和政策调整它的目标和政策；哪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在行动上处处显得只看重它自己的爱好。阿拉伯人的毫不妥协的态度和苏联的压力造成了这么一种错觉：以色列只需要有国防政策，用不着奉行什么对外政策。但是，发生了十月战争，埃及现在变得温和了，这种简单的事态也就终结了。果尔达咒骂的不是美国的战略，而是一个新的、更加复杂的现实；

梅厄：这场战争不是我们发动的，可是……

基辛格：总理女士，我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悲惨的局面。这场战争确实不是你们发动的，但是，你们还是需要作出明智的决定，以保护以色列继续生存下去。这就是你们现在面临的局面。这是我作为一个朋友诚实地作出的判断。

梅厄：（她的声音发抖）你是说，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基辛格：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我向你说明的那种国际形势。

梅厄：你是说，我们必须接受美国的判断……我们必须接受你的判断？哪怕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务？那就是说，是我们的上策？

基辛格：我们大家都必须接受其他国家的判断。我们听从你的判断。

果尔达的疑虑是，一旦她接受了我们认为什么是上策的判断——即使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的胃口就会愈来愈大，就会进一步要以色列作出让步。因此，她走向另一个极端，坚持说，以色列用不着考虑任何其他国家的意见。而这样一种独立性不过是奢望，连超级大国也是享受不到的。

至于我们，我们亟须和以色列拟订出共同的处理问题的办法，否则的话，我们的战略就会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如果以色列寸步不让，我们外交中主体思想就会解体。我们往往能够大大地减少激进分子和苏联人要求的东西。但是，正如我对果尔达所说的，“只有我们能够表明我们能兑现、而他们却不能时，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为中东拟定的外交议事日程表削减到等于零。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那么，阿拉伯人就没有什么劲头要和我们打交道了；那要想使埃及人和苏联人分裂开来就会变得不可能；也就不会有可以代替阿拉伯人激进主义的温和路线。哪怕是以色列的最好的朋友也不能够完全避免进行谈判和作出让步；的确，只要是真诚的朋友，那他就不能鼓励以色列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必然使以色列的地位逐渐削

弱，并且还会有另一次爆炸。

果尔达在理论上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在这早期阶段，她还不愿意正视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因此，她在给埃及第三集团军运送供应品这个问题上拼命打一场后卫战。她很巧妙地选择好她的战场——一个优秀的战略家应该是这样的——她不是为以色列的国家利益说项，而是告诫美国不要和苏联勾结起来。她巧妙地运用这个策略的目的是激起美国的以色列支持者中有势力人士的义愤，但是，却激怒了我们这些好不容易熬过了三个星期的危机的人，我们的愤激情绪几乎不亚于我们对果尔达的高度敬佩之情。

事到如今，她也顾不得尊重对方的官职了。当她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尼克松会晤的时候，尼克松力图说服她采取谈判的政策：

你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在没有求得和解的情况下，你所奉行的政策——以鬼怪式战斗机和天鹰式战斗机武装起来的政策——能否获得成功。问题是，只准备打仗的政策——哪怕是在和平解决以后，你还是要准备打仗——是否足以解决问题。

这次战争证实了这么一个十分令人信服的结论，即一味蛮干，要我们向你们提供武器，而你们自己去打仗，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你们既然准备进行会谈，那你们的政策就要有所改变。

果尔达对尼克松的这番话一点也听不进去。她不打算使她的人民靠刚刚发动了突然袭击的邻人的保证来维护自己的生存。她根本不考虑给一支陷入重围的敌军供应东西，不管它是在什么时候陷入重围的。

她的态度反映了她的内阁的信念。失望和惊惶确实把果尔达的同事们搞得毫无灵活的余地了。为了打破僵局，我建议以色列“原则上”接受十月二十二日的战线，并随即提出与埃及进行谈判，以确定这一条线的具体位置。这样的谈判必然十分消耗时间，实际上是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在谈判的同时，非军用供应品可

以通过联合国设在开罗—苏伊士公路的各个检查站运给埃及的第三集团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设法把这些讨论转变成关于军队脱离接触的更广泛的谈判，这一谈判最终也就会使停火线的问题失去实际意义。起初，果尔达接受了这个建议，但要经她的内阁同意才行。第二天晚上，她不得不拒绝这个建议，因为她的内阁既不同意原则上接受十月二十二日战线，也不同意联合国在开罗—苏伊士公路上设检查站。他们只是准备讨论一般的军队脱离接触问题。

但是，以色列关于军队脱离接触的想法是在发出戒备命令的那天晚上提出的：是拿领土来作交易，以色列军队撤回到苏伊士运河东岸，埃及撤回到运河西岸，然后双方再从运河后撤十公里。萨达特根本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建议。要求埃及接受的不仅是放弃它在最近这次战争中所获得的全部领土，而且，还要再从运河的西岸后撤十公里，而在这次战争以前，埃及的军队是可以不受限制地部署在西岸的。这一想法肯定会遭到拒绝——果尔达本人也承认这一点。的确，如果我们参与这样一种策划，萨达特就可能认定，美国的调停毫无结果，他除了恢复敌对行动以外，没有其他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果尔达才容许一个运送非军用物资的车队在我去访问开罗以前再次通过。

在我们每天举行的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大家火气愈来愈大了。我的同事中有些人仍然主张由美国空运来接济埃及第三集团军；国防部甚至一度指派运输机去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尽管我自己也很气愤——毕竟因为熬过了几乎是通宵不眠的三个星期而弄得神经很脆弱的并非只是以色列人——我还是极力反对这样做。要是美国为一支埃及军队空运物资，那就会是美国大大改变外交优先次序的信号，就会从根本上削弱我们自己讨价还价的地

位。我敦促特别行动小组的同事们不要公开表示对以色列的不悦之意，因为我们在中东的影响有赖于让人们看到以色列是我们难以动摇的亲密盟国。一旦让人们看见我们之间发生了分裂，那就会招致愈来愈大的外部压力；那就会鼓励欧洲人、苏联和不结盟国家去提出一种比我们正在讨论的解决办法更难以实现的解决办法，因此，也就很可能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我们靠蛮干去打破僵局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只会使别人提出更多的要求，要我们再三地去这样做。

果尔达的私下处境虽然十分困难，但她还是理解到，硬要把事情弄到破裂的地步，对以色列是不利的。的确，她的目的之一是要教训别人。她是想教训我们：要想牺牲以色列的利益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不会是毫无阻力的，而且可能是痛苦的。她这样做是由于在策略上有此必要：她十分清楚，埃及第三集团军的问题非此即彼，总得解决，但是，她不想要她的内阁负责作出这样的决定。要求一个刚刚遭受阿拉伯军队的袭击而几乎受到灾难的民族这样做，那是太过份了。对以色列来说，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较之挑起主动提出慷慨建议这付重担要容易一些。她了解到，过早地摊牌是没有意义的。在她听到了萨达特对我说过的话以后，她愿意开始认真地讨价还价了。当她在布莱尔大厦时，她的内阁可以否决她的决定，但是，一旦她在他们面前就座主持会议，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

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接触

在以色列所做的一切恶梦中，再没有比一九六四年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威胁性更大的了。一个自称有权把整个巴勒斯坦据为己有的集团有可能获得某种合法地位，这被看作是对以色列

继续生存的基本威胁。另一方面，在谈判即将开始的情况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更加野心勃勃地想担任一个角色，而我们即将开展的外交活动在面临它的积极破坏的情况下就会更加困难——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当然，在这个时候，巴勒斯坦人还没有得到哪怕是阿拉伯国家的最后的政治承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通过的第二四二号决议只是把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作为一个“难民”问题来谈；这个决议没有给予他们任何明确的政治地位。中东危机的根源是巴勒斯坦问题，但是各方在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态度方面显得异乎寻常地矛盾。在一九七三年的时候，他们在联合国仍然被当作难民对待，在美国和西欧被当作恐怖主义分子对待，苏联人把他们当作可以利用的机会，阿拉伯世界则把他们看作是既令人鼓舞又使人为难的东西。十月战争以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地位变得愈来愈重要，它的一些支持者的自相矛盾的心理也就更严重了。要想确定阿拉伯人的这种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正的承诺，反映对巴勒斯坦人恐怖主义的潜力的恐惧，还是希望以此来博得国内激进派的支持，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至于美国，我们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打交道的经验不能使人增强信心。一九七〇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三架飞机在约旦降落，把数以百计的乘客当作人质，其中有几十名美国人，这些乘客被他们拘留了几个星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过去曾好几次试图谋杀侯赛因，这一次，它又试图接管他的王国；在“黑九月”的血腥斗争中，侯赛因把它赶出了约旦。一九七二年，它为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被杀害承担了责任，这就进一步失掉了美国的同情；一九七三年三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者刺杀了在喀土穆的两个美国外交官。由此可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公然反美的，也是致力于摧毁美国的两个重要友邦——以色

列和哈希姆约旦王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在没有那么大的劲头去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对话”，尽管后来流行过这种说法——这不是由于受到以色列的压力，而是由于我们看清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

我们了解到，在巴勒斯坦组织内部有许多不同的成分，有些是明目张胆的恐怖主义者，其他一些人在制定他们的目标方面则比较含糊其词，不过他们谁也不愿意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好些阿拉伯国家都控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些派别，用影响巴勒斯坦的政策的办法来作为维护它们自己国内安定的手段。但是，这样做也给他们自己造成了复杂情况。例如，叙利亚最喜欢的那一派是“闪电”突击队，这个突击队肯定更多地响应大马士革政府的号召，而不那么响应在贝鲁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机构的号召。

因此，在一九七三年以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很少参与国际谈判。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结束时发表的新闻公报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人，更不要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了。我和葛罗米柯一九七二年拟订的那些根本未起作用的“一般工作原则”也只是把他们作为难民才提到他们的。^②一九七三年的美苏最高级会谈新闻公报谈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益”，但是，没有具体指明这些权益是什么。和其他国家政府进行的关于约旦河西岸的规划和讨论都假定侯赛因国王是以色列的谈判伙伴。

因此，在一九七三年，和巴勒斯坦人接触的问题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这个问题很少出现，即使出现也几乎总是在低级的情报渠道中出现的。成立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治理的一个巴勒斯坦国的主张不是认真进行对话的话题。

然后，到一九七三年中的时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动设法和

我们接触。七月下旬，我国驻伊朗大使理查德·赫尔姆斯正在美国安排伊朗国王来访事宜，他通知我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一个亲信曾去找过他的一个随员。据他报告说，阿拉法特很想和美国对话。对话将以这么两个前提为基础：“以色列将继续存在下去”，在约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换句话说，必须推翻侯赛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还要求澄清一些问题：对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新闻公报中所提到的“巴勒斯坦人的权益”我们是怎样理解的？我们打算怎样落实到行动上？我们对约旦王国的继续存在承担了什么义务？赫尔姆斯正确地指出，“问题是，你是不是想和阿拉伯突击队举行政策会谈。”

我对赫尔姆斯说，我将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我的反应不大可能是积极的。我认为侯赛因国王是美国的可贵的朋友，美国把在这个地区的外交活动取得进展的主要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加强他的地位，而不是鼓励一个在第一次和我们通信中就表示下决心要推翻他的集团。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治理的一个巴勒斯坦国肯定会奉行民族统一主义。即使它改变它公认的目的，它也不大可能长期保持温和的态度；它的许多极端派别不会容许它这样做。它和苏联的紧密关系也会把它引到变成象利比亚或南也门这样的激进国家的方向上去。在约旦河西岸不论建立什么样的巴勒斯坦国，它都会千方百计地把矛头指向约旦——因为这样至少可以取得一个可靠的基地以便日后向以色列作战，并避免在将来的和平协议中不可避免地规定使西岸非军事化。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暗示可以和以色列共存是违反这个组织建立时的文献——即一九六四年的巴勒斯坦国民誓约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策，按其最温和的提法，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由穆斯林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混合组成的非宗教国家——说

得委婉一些，就是要把以色列肢解掉。在所有阿拉伯人当中，巴勒斯坦人对犹太国的怨恨最深。即使以色列在西岸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并且让出耶路撒冷古城——很少人认为这是可能办到的事——巴勒斯坦人也要想方设法得到与其名称相联系的那些领土。对他们来说，在西岸建立一个小小的国家只能是过渡到他们的最后目的的一个中间步骤。

八月三日，我对赫尔姆斯说，我们要把“一个内容空洞的信息”发回去，我们大体上是借口说，我们的目标是使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和平共处。美国倒是很想听听巴勒斯坦人有什么想法可以通过谈判来促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毫不含糊地回答了第三个问题：要推翻阿拉伯世界的现有各国的政府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对约旦王国的继续存在承担了义务。

十分有趣的是，在八月十三日那天，我们收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通过摩洛哥发来的与上次基本相同的信息。哈桑国王把同样的那三个问题传达给了当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弗农·A·沃尔特斯中将，他那时正在卡萨布兰卡哈桑国王那里作客。第二天，我特别注意把阿拉法特两次设法和我们接触的情况以及我们的答复通知了以色列大使西姆查·迪尼茨：

我们一定告诉他，在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进行讨论。当然，他想得到的是，要我们把约旦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国家。我们决不会同意这样一种事情。你可以把这一点告诉总理。

迪尼茨当时没有作答，以后也没有。八月十七日，我对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说，我们的政策倚重的是约旦，而不是巴勒斯坦人。（我把这一点作为一般的意见来谈，由果尔达去把阿拉法特和我们接头的情况通知她的外交部长。）埃班要我们讲清楚，他说：“当你们谈到巴勒斯坦人的问题时，你们的意思是说，要在解决以

色列和约旦问题的范围内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说反映了美国的政策，要我同意自然没有什么困难。

一九七三年九月三日，哈桑国王对沃尔特斯将军说，要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对话，将是可能的；摩洛哥愿意帮助安排这件事。十月十日——中东战争爆发已经四天的时候——我们从阿拉法特那里得到信息。这次倒不是通过摩洛哥得到的。正如我在第十一章中所说的，这个信息是通过贝鲁特传到我们手里的。阿拉法特预言，虽然埃及和叙利亚会打败仗，但是，它们已有足够的“面子”去进行认真的谈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在准备参加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谈判；它是要和约旦算账，而不是和以色列算账，但是这没有必要成为当前阶段外交活动的一部分。

当时战争正在进行，我们没有给他答复。但是战争过后那种紧张的局面促使我们再次考虑巴勒斯坦人的这些试探性的行动。在同苏联人发生对抗的情况下，使阿拉伯人对苏联干涉的支持减少到最低限度是重要的。等到危险过去以后，为温和派国家的政府参加和平进程创造最好的环境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制造麻烦的潜力很大。正当我们处在和埃及接洽的早期阶段，当我们正在寻求沙特阿拉伯的支持的时候，我们希望它会循规蹈矩。再者，十月二十三日——由于违反停火协议而造成的对抗局面正走向第一个高潮的那一天——我们再次收到信息，重申阿拉法特对会谈感兴趣。

十月二十五日，我们发出战备命令的那一天，我们决定对阿拉法特的建议采取行动，为的是争取到一些回旋的余地。在我任职期间，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唯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通讯，是通过摩洛哥发出的一个信息，表示我们准备派一名代表去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官员会晤，以便我们能够决定美国对阿拉法特建议的反应。（换句话说，我们的使者不是受权去进行谈判；如果有

什么正式反应的话，也要等到他汇报以后。)我们委派沃尔特斯将军担任我们的代表。他在巴黎曾起过我们同北越人及中国人通信的秘密渠道的作用，是一个执行秘密使命的专家。我们建议在十一月初举行一次会晤，这正是我首途前往开罗的前夕，这样也就保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这个微妙的阶段不会有什么活动。

这次会晤是十一月三日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举行的。我给沃尔特斯的指示是，要争取到尽可能多的时间，并尽可能明确地了解巴勒斯坦人的想法。没有授权他提出任何建议；他应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即：作为一个情报官员，他只有“听取意见”的任务。至于巴勒斯坦人将来担任什么政治角色：

美国没有什么建议要提。美国并不那么通晓阿拉伯人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历史，因此它想不出有什么解决办法。但是，巴勒斯坦人必须明白，美国有一个坚定的原则，那就是：它不会出卖它的朋友。我们把约旦国王看作是我们的一个朋友。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期待着，在全面解决的范围内，巴勒斯坦运动和这个哈希姆王国之间的关系能朝着和解的方向发展。

换句话说，我们建议不把巴勒斯坦问题当作一个国际问题看待，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阿拉伯人内部的问题看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怎样解决它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那是它自己的事——我们只提这么一个条件：我们不会参加针对约旦的计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现实的选择是和哈希姆约旦王国和解而不是把它推翻。

适用于约旦的原则，对于以色列更加适用。沃尔特斯的任务表明，美国将反对对以色列的存在的任何威胁和对它的合法性提出的任何异议。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再使任何美国人流血，我们将要进一步积极反对。

沃尔特斯以他所特有的值得骄傲的效率和处事能力执行了他的任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是阿拉法特的一个亲信，他叙

述了巴勒斯坦人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他发言攻击的主要对象是约旦；巴勒斯坦人决不能生活在哈希姆的国家里；他们也不能仅限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就是说，必须把哈希姆王朝推翻以便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一个立国的家园。他避而不谈在什么条件下——如果有任何条件的话——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会承认以色列。他谈到建立一个世俗的国家（这些话是摧毁以色列的代号），或者可能的话，把以色列降低到一九四七年联合国分治计划所规定的地位——这意味着甚至把一九六七年以前的以色列也要削掉一部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沃尔特斯一样，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最初几次会晤总是要作一番临时的探讨，哪一方也不想使自己处于被驳回的不利地位，每一方都摸索对方立场的伸缩性。

结果证明，我们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话的开始，也就是它的终结。只是在一九七四年三月又举行了一次会晤，但是，这次会晤所商谈的问题并没有超过第一次会晤的范围。

这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个阶段，让巴勒斯坦组织参加进来是同中东冲突中任何一方的利益都不相容的。即使某一个巴勒斯坦领导人接受了联合国第二四二号决议和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权利——这是这个组织直至今日一直拒绝做的事——这个运动的发展规律也使它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温和的色彩。拉巴特的会谈表明，不管怎么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只把一九六七年的边界线看作是第一阶段；一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是坚决要肢解这个犹太国的。约旦面临更加迫近的危险；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接触使我们毫不怀疑这个组织对哈希姆王朝的图谋是什么。

在拉巴特的会晤本来是要保密的，要是这个秘密失掉控制泄露给了其他国家，所冒的潜在的爆炸性的风险就太大了。而且，如果是由阿拉伯人作为流言蜚语传播开去，那么其引人注目的效果

就会比我们意想不到的还要大，特别是会使那些我们为事态向着温和方向发展而必须依靠其支持的国家感到不安。因此，我通知了侯赛因、萨达特和布迈丁，而且后来又和阿萨德讨论了这件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把这件事向迪尼茨大使作了简要的通报。

沃尔特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会晤达到了当时的目的：争取时间，并防止激进分子对早期的和平进程加以攻击。在那以后，对美国人的攻击——至少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的阿拉法特那一派的攻击——停止了。除此之外，会晤没有产生其他持久的效果。

我的首次中东之行

我在十一月五日星期一离开华盛顿，在对埃及进行关系重大的访问之前，先到摩洛哥和突尼斯。我希望哈桑国王和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这两位美国的老朋友对于我们对他们的阿拉伯兄弟们所做的工作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我们大概在当天晚上十时左右到达摩洛哥，这是我第一次踏上阿拉伯国土。这也是我第一次检阅仪仗队。这次检阅显得很威严，由于谁也没有对我说过，要我作好思想准备，因此显得更加如此。

当我走下飞机的时候，前来迎接我的是由高大的柏柏尔人组成的一个步兵连，他们身穿肥大的红白两色的袍子，头戴白色头巾。看到这一景象使我为之愕然。第二天在哈桑国王的宫殿，我遇到的是一队更加壮观的皇家卫队，他们身穿深红间绿的肥大军装，佩带长剑。一名军官手持出鞘的剑走到我面前，请我去检阅他们。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一套礼仪是怎么回事，应当怎样做才对。我当时一心只想尽快把这一套礼节对付过去。我从这些士兵的前

排走过的时候，步履之快显然出人意外，甚至可以说是创造了世界记录，因为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那个陪我检阅的军官正迈着正步走在我后面，他还有一半的路没有走完。我站在那里等他，当他跟上来走到我跟前的时候，我把手伸了出来——而当时被我弄得莫明其妙的那个军官手里还拿着出鞘的剑以四十五度角向前举着，我的这一姿态也就碰了壁。这个军官倒是很会应付这样一个场面。他以一种又怜悯又殷勤的眼色看了我一眼，把剑插进剑鞘，把洁白的手套脱了下来，想要和我握手——但这时我的手已缩了回来，我向他敬了个礼。最后，我还是和他握了手，然后赶快离开。同一天在皇宫里，乔·西斯科坐在哈桑国王会客室里一把有金饰的红色丝绒椅子上，他把椅子往后翘着，思考着一个深奥的问题。这把椅子一下子散了架，西斯科摔倒在地，正好在这个时候，国王陛下走进了会客室。好在摩洛哥和美国的关系还经得起这些挫折。③

摩洛哥位于非洲、欧洲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十字路口，濒临大西洋和地中海。在它的崇山峻岭和荒凉的沙漠中曾经涌现出统治北非和西班牙达数百年之久的征服者，他们的统治有时是很残暴的，偶尔是宽宏大量的。但是，由于它地处交通要道，也就免不了不时受到入侵。摩洛哥或为刀俎，或为鱼肉，历尽人间沧桑，有显赫的时候，也有衰败的时候。它的上层人物衣冠楚楚，珠光宝气，受法国的理性主义的影响不小，但是，骨子里是忠实的伊斯兰教徒。人民大众对多少世纪以来摩洛哥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种种状况，基本上采取了逆来顺受、漠然置之的态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摩洛哥一直处在其他国家战略宏图的交叉点上，这就迫使它的统治者要设法巧妙地、机智而自信地掌好舵。

自从十七世纪成立王朝之日起，摩洛哥一直实行王位继承制。这一传统又因为哈桑的父亲是争取独立、与法国进行斗争的主要领导人而得到了加强。这种王室的统治可以说是一面镜子，它反

映了摩洛哥国魂的两重性。国王哈桑二世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有高雅的鉴赏力，他从不犯伊朗国王那种公然炫耀世俗主义的错误。他既是一个对自己的国家在宗教上的保守主义十分敏感的穆斯林信徒，又是一个干练的、有理性的政治家；他实行的是很讲礼仪的极权主义，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作为一个距离和以色列的冲突最远的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他利用他的影响来起些和解的作用，他不但让沃尔特斯在他的国家里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秘密会晤，而且还让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在他的国家里多次秘密会谈，这些会谈导致了萨达特一九七七年对耶路撒冷的访问。

摩洛哥一些邻邦的政体，历史根源没有它那么深。社会主义的阿尔及利亚总想找机会来削弱它的邻国和竞争对手；革命的利比亚到处搞颠覆。面对着这些激进派的挑战，哈桑国王运用谋略，避免显得落后或封建。他一直是巴勒斯坦人的最有影响的支持者之一，从不放过机会为巴勒斯坦问题据理力争。在一九七三年的战争中，他忠实地派了一支摩洛哥军队到叙利亚前线去作战。不过，这位国王对激进政策是不抱幻想的。他懂得，只有使阿拉伯世界内部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力量对比有利于温和派，他才能解除他的国家所受到的压力。为此，美国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他通过许多友好的行动以及明智的劝告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在我们头几次会谈中，我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必须空运物资接济以色列；我所提出的理由是，我们不能容许在中东用苏联的军备击败美国的武器，要是这样的话，就是把整个中东地区送给激进派和苏联的势力。这位国王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国王说，“那我们就活不成了。”我们是在拉巴特的宏伟的宫殿里进行会谈的；头一次会谈是在一个大型的小组会上进行的，以后各次会谈则在他私人办公室里单独进行。我想让他知道我们的策略：避免把我们在外交上的本钱浪费在停火线上，而是直截了当地采取行动，在更广

泛的范围内使双方的军队脱离接触。哈桑支持我这个想法。他告诉我说，他将为我发一个信息到开罗去，好让萨达特放心；他说：

（基辛格）不是按照古典的外交意图办事的，他宁可尽量少感情用事，少凭想象去处理事情；他宁可以冷静、心平气和和客观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和现实情况。我们坚持我们的主要印象：一旦他承担了义务，他是会履行的。

当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形的东西时，这位国王从心理上解除了萨达特的顾虑，这就给我们帮了最大的忙。

十一月六日我向哈桑国王告别，乘飞机到突尼斯，以便取得另一个温和派的领导人、美国的朋友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的支持。布尔吉巴是老一辈的独立战士，他的远大抱负驱使他加入西方的价值体系，而不是去摧毁它。他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在法国留学；尽管他多次坐牢或被放逐，却并没有因此打消他要给他的国家带来大都会文化和现代化的愿望。突尼斯早在一九五六年便获得了独立，因此，它已经有变成古董的危险。布尔吉巴一直是坚决地亲西方的，他的言论是温和的，从他的政策看，他也是个温和派。和他的摩洛哥同僚一样，支持巴勒斯坦人是用以表明他忠于阿拉伯事业的一种方式。但是，突尼斯之所以能在其邻邦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对它虎视眈眈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下去，部分原因是它的这两个邻邦互相倾轧，因此，它需要的是一个克制的世界。它图存的最好办法是使人们在感情冲动的时候冷静下来；它害怕苏联势力和阿拉伯人的激进派力量壮大起来。

布尔吉巴住在他建造的一所宫殿里，从这个宫殿可以俯瞰迦太基的遗址。这倒是人们对人们的一个提醒——如果有此必要的话：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布尔吉巴的这座宫殿的奇妙设计使一个人哪怕是在这里坐牢也能过得不错。它看上去简直象个游艺场所。宫殿的走廊上到处挂着画、半身像和布尔吉巴的照片；我现在回想不起别的什么了。这座宫殿的房间都很宽敞。这一切正反映了这位

矮小的老人的经历，他具有法国知识分子的仪表，他是一个坐过牢的人，因而给人一种烦乱不安的印象。

在会见他之前，我已得知，他已开始有些动脉硬化的征象。但是他神志还是清醒的，虽然在言谈之间他并不总能针对别人提出的问题来谈。他对苏联的意图表示严重怀疑；他认为，苏联力量的不断增长是个不吉祥的兆头。他还认为，西方缺乏进行有效抵抗的组织纪律性。他希望美国在中东起重大作用。我解释了我们的战略：“别人能给武器，但是，只有美国能给领土。”但是，要拿石油来讹诈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照着自己的信念行事的，我们对压力是不买账的。布尔吉巴很不愉快地——而且是明智地——表示同意说，“采取敌对态度是阿拉伯人所犯的一大错误。”

在这以后，我们终于首途前往开罗，在开罗的停留将决定我们此行的成败。

六点协定

当我于十一月六日星期二很晚的时间到达开罗飞机场的时候，那里正实行灯火管制，因为实行停火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外交部长法赫米站在舷梯下面，隐约可见。法赫米在黑暗中还是半开玩笑地发牢骚，这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一套习惯的手法。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历数——美国的和以色列的——没有履行的诺言，我便听到一大群人的脚步声从幽暗的飞机跑道的那一边向我们冲过来。那是驻开罗的记者团，他们要看看自从战争爆发以来第一个到达那里的高级美国人士。突然间，拍电视的曝光灯亮了。我的保卫人员立即散开，作好部署。这是无济于事的。这些保卫人员，就象站在他们面前的许多外国人一样，被汹涌向前的埃及的人流把他们吞没了，那情景就象是附近的沙漠无情地向他们拥过来

一样，直到这些来访的客人站在那里动弹不得，终于不得不听天由命。好在这些肆无忌惮地破坏保卫规定的人显然是出于善意，否则我们真受不了。幸亏没有恐怖主义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冒充记者，因为这一大群满腔热情的人把我和法赫米挤在中间，他们似乎更感兴趣的是和来访的客人作某种实际接触，而不是向他们提一大堆问题。一支密集队形的军队终于前来搭救了我们，赶快把我们护送进停在那里等候的奔驰牌高级小轿车，这辆小轿车在纳赛尔执政时期是纳赛尔的专用车。

在我的住处——尼罗河希尔顿饭店，法赫米把日程安排告诉了我：大清早就去游览埃及博物馆；然后和萨达特会晤；参观金字塔；去法赫米家里赴晚宴。我和萨达特的会晤就这样安排在两次观赏名胜古迹之间，这也许是告诫我说，埃及把所有外来的人都征服了——不是把他们打败，就是把他们拖垮。

第二天早上，我站在我下榻的饭店的阳台上第一次观赏了开罗的市容。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平淡的景色，一条混浊的河从中间流过，把它分成两半。看不见有什么很象样的高楼大厦，只有纳赛尔在六十年代初修建的开罗塔比较突出。据说，这座塔还是用美国中央情报局给的钱修建的，他说要把这笔钱花在“某种无法形容，但是，很大、很醒目、很耐久而又很昂贵的东西”上面。^④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这个毫无用途的建筑物从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得见。和那么多埃及的名胜古迹一样，它的主要特点是耐久而不是实用。说不定这座塔还能长期保存下来，因为在这个不朽的国家里，空气干燥，阳光充足，人们所做的蠢事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是都能保存下来的。

埃及博物馆仍然作好了战争准备。人工复制品都装在楼房下面几层的箱子里；一条条胶带贴在玻璃箱上面，使人看不清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到处都是沙袋。最引起我注意的东西，是埃及对

它的暂时征服者的艺术影响。在一个大厅里，人们可以看见亚历山大大帝以后希腊雕塑艺术的逐步“埃及化”。当希腊人最初到达的时候，他们的塑像都是现实主义的，大小和真人一样，面貌十分严肃，表情很真实。随着人事代谢，这些塑像的眼光的确是高了。他们现在凝视着的不再是另一个人的眼睛，而是远在天边的地平线。他们的视线超越欧洲的田野和山谷，凝视着埃及的无边无际的沙漠之海。他们脸上严肃的表情没有了，表情变得比较抽象了，简直是怡然自得、十分超然的样子，仿佛世间的人事沧桑对他们无关重要似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漫步走过解放广场去埃及博物馆和从那里走回来的时候，过路人对我表示友好的情景。我在埃及不可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不过，在我身边做保卫工作的那些警官必定已跟他们说清楚，我就是报纸上报道过的那个来访的美国客人。他们友好的情谊溢于言表，据我看，他们是满怀希望的。正如两个多星期以前在以色列，可以感觉到人民盼望和平，盼望能见到希望的信号。

我担负着决定命运的责任，这个责任并没有因为一清早和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阿诺·德博什格拉夫的一席谈话而变得轻松一些。德博什格拉夫对我说，萨达特已断然决定恢复敌对行动；所有他的高级军官都认为，埃及第三集团军的被围困是对埃及荣誉的奇耻大辱。虽然六个月以前德博什格拉夫预言很快就要爆发阿以战争是猜中了，但我并不认为他这次的预言就一定应验。我不能相信，如果萨达特打算强行摊牌的话，他会那么坚持要我来，也不会在外交上表现出那么大的灵活性。不过，这个预言至少使我更加感到情况的确严重。

开罗街上的群众比语言更能生动地表明，以色列为什么对它的安全那么不放心。正如已指出过的，开罗市的人口几乎比以色

列的人口多一倍。每三年埃及人口的增长数就有以色列全国人口那么多。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以色列有求得和平的力量，但是没有求得和平的信念。阿拉伯人在军事上仍然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他们人多，时间也对他们有利。他们有时间等待以色列犯致命的错误。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危险，以色列在外交上才那么紧张，那么僵硬。

我也意识到，不论是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都没有为我提供多少回旋的余地。尼克松是愈来愈不安了；他知道，批评他的人会把我此次出使失败归咎于水门事件，使他的垮台来得更快，信誉也下降得更快，因而将来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必然要受到侵蚀。十一月五日，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布鲁克成了美国总统自己党内要求他辞职的第一个参议员；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和《底特律新闻》也相继要求尼克松辞职。在被逼到了墙角的情况下，尼克松决定以攻为守——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而他的以攻为守的办法看来是要在中东来个惊人的突破。十一月六日，在一次讨论能源问题的内阁会议上——当时我正在开罗——尼克松出其不意地提出了中东问题。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给我发来了电报：

在内阁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总统就中东问题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当时大家都感到惊奇……总统说，他不要求大家作记录，也不要求进行讨论，他只想让内阁的阁员们知道，同能源有联系的一件事是，可能有必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避免出现石油严重短缺的问题。他说，果尔达先是表示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接着就变得毫无妥协的余地了；她显然相信，以色列可以继续拥有它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他说，美国也许有必要向联合国提出向以色列施加其他种类的压力。他希望不会有这样的必要，但是，如果确有此必要，他期待内阁理解并支持所发生的一切……

这件事，整个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们只好希望这件事不泄露出去……我倒是确信，这件事在官僚内部不会有什么影响。

以石油禁运为理由而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是一种铤而走险、自招失败的行动。一旦我们为结束石油禁运而承担义务去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那我们就是开创了这样一个先例:他们可以一再地一面提出要求一面使用石油武器。我们到头来可能在各方面都以失败而告终:非但不能实现阿拉伯人的计划,而且,如果我们帮助他们毁坏了以色列的倔强声誉的话,也不能说求得妥协的解决办法是我们的功劳。黑格和斯考克罗夫特保守机密,没有让尼克松的这些话泄露出去,这简直是奇迹。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我这次出使失败,尼克松是会下令执行这一战略的。

正当我们快要到达开罗的时候,我还获悉,欧洲共同体于十一月六日通过了一项关于中东问题的宣言,强烈敦促以色列立即撤退到十月二十二日的停火线,还着重表示完全赞成阿拉伯人对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号决议作的解释。这一退让不但表现了欧洲低三下四的弱点,而且造成危害。它缩小了萨达特的回旋余地。他能以比欧洲人所提的条件还低的条件来求得解决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能求得什么样的成就,因为欧洲人所提的计划肯定会造成旷日持久的僵局。把以色列推回到十月二十二日的停火线,争取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是太小了。但是,如果把这一点同言外之意的承诺即强迫以色列接受一九六七年的边界线联系起来,这未免又野心太大了。一种情况是所要取得的成就太小,另一种情况是目标太高又达不到,因此,我们宁可把本钱节省下来花在可以达到的军队脱离接触上面,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由此可见,我和萨达特都已被逼到了墙根,毫无回旋的余地。萨达特的处境是:埃及的第三集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同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继续从苏联转向美国的一切希望也有落空的危险。我在这次会谈中是拿美国在中东的地位来冒险的,而且会谈的对手又素不相识、只是前不久才懂得应予以尊敬的一个领导人。萨

达特的资本是，他能够造成僵局。我的资本是，僵局对萨达特的长远目标毫无助益，而且我有可能协助打破僵局。

塔赫拉宫位于开罗郊区一度很时髦的赫利奥波利斯，这一地区现正力图保持其旧观而不可得，因为它的地面正在被大量占用，开罗市区的贫民窟正不断地向这里延伸，而与开罗飞机场相连的军人住宅又一点点地朝市区挤去。这所宫殿过去一度住着法鲁克国王的一位王妃。它反映了埃及人的建筑构思，这座皇家建筑物的外观是法国枫丹白露式的，而里面的陈设却是英国乡村别墅式的。它座落在一个宽敞的大花园里，作为总统的总部显得太空旷了。

十一月七日上午我到了那里，两位老相识在门口的台阶下迎接我。一位是仍然任萨达特安全顾问的哈菲兹·伊斯梅尔，他身躯挺直，温文有礼——他是与华盛顿联系“渠道”的开罗一方的负责人。另一位是阿什拉夫·戈尔巴尔。我对这位在美国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杰出的外交家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担任驻华盛顿的埃及权益小组负责人，工作做得很出色。他满腔热情地相信，埃及的命运是在西方这一边的。（在纳赛尔和莫斯科调情的那些紧张的日子里，有一次戈尔巴尔曾寄给我一首诗，含蓄地要求我要有耐心。）他现在拥抱了我。我知道，他是衷心希望我这次使命获得成功的。在当时情况下，细小的表示能使人增强信心。伊斯梅尔的在场，特别是戈尔巴尔的在场使我感到轻松了一些，也觉得更加有希望了。

我匆匆忙忙登上宽阔的楼梯，走向一座可以俯览花园的游廊。站在楼梯的最高一级上往下一看，对于花园里为什么那样寂静心里就明白了。看来，驻中东的每一个记者和总统的半数的工作人员都会集在游廊里，这又是一个群贤毕至的场面。看得出来，还是没有采取什么保卫措施。人们从四面八方把我挤来挤去，拍电视

的灯光把我弄得眼花缭乱。正在这当儿，从我背后突然传来了深沉的话音：“欢迎你，欢迎你呀。”

萨达特出现了。他身穿普通卡其布军服，肩上随便披着一件大衣（因为十一月份在埃及的宫殿里面是挺冷的）。他的个子比我预想的要高，肤色比我预想的要黑，仪表比我预想的更有气派。他表现得充满活力和信心。这个农民的儿子显示出一种天生的尊严和贵族的神态，看上去威严而异常镇定，和他的革命历史很不相称。他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在一场战争中，我们曾武装了埃及的敌人，接着——在戒备期间——又威胁着要对埃及本土进行武装干涉，这场战争刚打完后两星期就来开会，我对于以上这些也尽可能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们两个谁也不想表现得把这次会谈看作是事关重大，即便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快就要开始少数几次开创新局面的外交会谈之一了。我们坐在沙发上互相打量了一番，一面说些客套话，这样，我们就会显得很自然，好让摄影记者照相：

“一路上好吗？”

“很好，总统先生。”

“你在这里很受欢迎。”

“谢谢你，总统先生。”

然后萨达特把我引进他用作办公室的一个大房间里。这个房间的一面是法国式的窗户，从那里可以看见下面的一块草坪，草坪上有一些藤椅，摆成半圆形，是让我的助理人员休息用的。萨达特一面往烟斗里放烟丝，一面说：“我一直盼望你的这次来访。我为你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可以叫做基辛格计划。”

说完了这些话以后，他便走到对面墙上一些形势地图那里，让我看一个脱离接触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以色列将撤离西奈三分之二的地面，撤到从阿里什到穆罕默德角一线（请看第四页上的地图）。萨达特谅必知道，这是办不到的。如果说，要说服以色列

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后撤几公里、撤到十月二十二日的停火线就已经是很困难的话，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想象可以诱导以色列这么大踏步地向东后撤，放弃苏伊士运河、吉迪山口和米特拉山口这两个战略通道和西奈的大部。再说，要以色列这样做，交换条件又是什么呢？萨达特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说明他是在考验我。他吸了一口烟，然后征求我的意见。

不管这位总统的想法是多么不现实，我想，刚开始会谈就拒绝接受是不明智的。我不希望让萨达特扮演斗牛士，而我却扮演被他制服的雄牛。^{*}因此，我主动转了话题。我对他说，在我们谈论手头的事务之前，可否请总统告诉我，他是怎样设法在十月六日那天如此成功地发动了那次令人目瞪口呆的突然袭击的？那是个转折点；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个转折点的必然后果。

萨达特眯缝着眼睛，又吸了一口烟，他微笑了。他明白，我问他这件事是恭维他，确立他的地位。他不是从软弱的地位出发来进行谈判的；他不是一个低声下气的人；他已为埃及取得了谈判的权利；总而言之，他恢复了埃及的荣誉和自尊心。

萨达特先是慢慢地，但却是愈来愈生动地诉说了他一个人单独作出决定的前后经过，诉说了他在一九六九年的罗杰斯计划失败后怎样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只要以色列能够把安全和军事优势等同起来，那就绝不会有严肃的谈判可言。要埃及从一种屈辱的地位出发去进行讨价还价，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他告诉我，他对苏联的认识是怎样愈来愈清醒的。莫斯科看重的是它和美国的关系，认为这比支持埃及重要；在尼克松一九七二年莫斯科最高级会

* 这个比喻出自西班牙著名现代派画家毕加索的一幅名画，在这幅名画里，一个西班牙斗牛士把一头凶猛的雄牛制服了。——译者

谈的新闻公报中那么干脆地对待中东问题，这就使人们打消了在这方面还保留的任何怀疑。^⑤ 萨达特由于苏联领导人不尊重埃及人，尤其是由于苏联领导人肯定会设法阻止他计划采取的军事行动，或者，阻止不成的话，便设法利用这个计划来达到苏联的目的，所以他要求苏联军队在一九七二年七月撤离埃及。

萨达特本来想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发动进攻，但是，他的军队还没有准备好，他们确实对这整个事情抱怀疑态度。他撤换了他的参谋长，任命了一个对他的计划有信心、而且颇得他信任的指挥官担任这个职务。他利用了这段空隙来使叙利亚在步调上和埃及完全一致。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动员，使他要和以色列摊牌的威胁能起到麻痹以色列的警惕性的作用。一九七三年五月间，以色列针对埃及的动员情况采取了对应的行动，也进行了动员。埃及的这次动员本来是准备达到最高潮时渡过苏伊士运河的；萨达特也针对以色列的动员采取了对应的行动，他再一次把进攻推迟到十月份，希望这次动员所造成的报警的假象会有助于达到他的目的。当他的军队再次动员起来的时候，以色列对此麻痹大意的可能性会更大。这正是当时实际出现的情况。

我问他，为什么要坚持这么干？为什么不等待我们答应过的在外交上采取主动行动？萨达特回答说，为的是教训一下以色列，它想用称霸的办法来求得安全，那是办不到的；也是为了恢复埃及的自尊心——这件事不是外国人能替埃及办到的。萨达特对我说，他既然已经维护了埃及的荣誉，他就提出这么两个目标：重新获得“我的领土”，这就是说，恢复在西奈的一九六七年边界线，并讲和。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他会和过去准备进行一场战争那样，既有决心也有耐心。

萨达特在英国统治埃及时期坐过多年的牢，他在坐牢期间大量阅读英文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来提高他的英语水平；他和一块

坐牢的一个难友用同样的方法自学了德语。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说英语的时候多少有一点矫揉造作，而用词却相当准确，也很规范化。他说话时态度十分严肃，但是，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在骨子里却是非常热情的——仿佛他的自我克制就是一座堤坝，必须用这座堤坝拦蓄住那内在的力量，它一旦排放出来就会一泻千里，不可收拾。萨达特说话的时候略为眯缝着他的眼睛，他不是看着他的对谈者，而是向前看着远方地平线上的什么地方，很象我刚才在埃及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塑像的样子。

我听萨达特谈起他是如何既有远见而又做得巧妙，如何既有荣誉感而又有胆略，如何既有决心又有以柔克刚的精神力量，我认为，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萨达特不那么注重细微末节，而一些平庸的领导人却往往以为注意了细微末节就能左右事态的发展，到头来反而被事态的发展所左右。我还不能断定，是否有可能既获得和平，又能恢复一九六七年的边界线；也不能断定，萨达特是否有那么大的忍耐力去走完为了弄清楚结果而必须走完的长途旅程。但是，我感觉得出来，萨达特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使人们可以从以色列立国以来在中东一直存在的那种僵硬态度中超脱出来。未来的考验是，他是否准备在不提供最后成功的保证的情况下分阶段地采取行动，把发生冲突的势头扭转过来——这首先要求守信义的行动。因此，他必须理解，按照我们的判断，什么是可能办到的，和为了把事情办成，他必须做什么。

于是在下半个小时我便把话题转到讨论概念问题。能否合作要看怎样理解我们的长远目的而定，有了正确的理解，采取什么策略就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向他说明了美国的战略，所说的内容和我对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同事们所说的基本上相同。我说，历史已经表明，要在谋求和平方面取得进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愿意把言论同实际联系起来的阿拉伯领导人，和一个愿意

为和平出力的美国。我们不愿意在压力下运用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让人们看到，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反映了我们的选择，而不是在威胁下就范的结果。那些一味去光顾苏联的国家是引不起我们的兴趣的。纳赛尔的政策是试图在苏联的支持下，动员第三世界来反对我们，逼我们让步，这个政策过去行不通，将来我们也不会容许它奏效。靠用苏联军备来打败美国的盟国是不可能在中东实现和平的——最近的事态已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埃及所执行的是它自己的国家政策的话，那它就会发现，我们是愿意同它合作的。我们并不谋求在埃及有显赫的地位。我能够看得出来，在我们之间没有不可避免的利害冲突。

萨达特问道，“那么以色列怎么样呢？”我坚持说，以色列不一定是冲突的根源。摧毁以色列不见得对埃及有利，也解决不了阿拉伯人的问题。埃及有数以千计的人为其事业丧生，但从未被迫沦为需要由美国加以支援的地步。我继续说，要是以色列被摧毁，我们绝不会置之不理，但是，我们愿意帮助平息阿拉伯人的合理的不满。到目前为止，我们从阿拉伯人那里听到的计划全都是要一下子彻底解决问题的计划，这些计划是以要么全盘接受、要么拉倒的态度提出的。经验已经证明，这个行动方针只能以僵局而告终。以色列确实顽固，有时真令人生气。但是，一个在谈到他的国家的尊严时说得那样娓娓动听的人，也必须理解这样一个国家的心理：它从来没有得到过邻邦对它的主权的最低限度的承认。

我促请萨达特把和以色列讲和当作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外交问题来考虑。正如他正确地坚持的那样，如果说，以色列不能把它的安全建筑在军事的优势上，那么，在没有得到邻国信任的情况下，它也不可能感到安全。这正是要求最有影响的阿拉伯国家埃及作出的贡献。如果埃及提供了这个条件，我们一定尽我们所能去求得领土的变化，虽然变化的规模也许没有他的

“基辛格计划”所设想的那么大。

萨达特凝神听着这些与阿拉伯人的思想格格不入的怪论，同时毫无表情地吸着他的烟斗。他没有什么反应，只是问我：“那我的第三集团军怎么样呢？十月二十二日停火线又怎么样呢？”

我谈策略问题是谈得太多了一些。我回答说，他有两个选择。依靠欧洲共同体的宣言和苏联的支持，他可以坚持要以色列军队撤退到十月二十二日停火线。对我们来说，这是困难的，甚至是棘手的。我们最后也许会被劝导同意顺从这个做法。但是，时间可能要拖好几个星期，而他要兴师动众，施加这种种压力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使以色列军队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后撤几公里——而为了真正把双方的军队分隔开，导致以色列军队渡过苏伊士运河后撤，这个过程以后会在更加困难的情况下重来一遍。较好的方针是暂时维持现状，因为一旦给埃及第三集团军供应非军用物资的系统建立起来，所要维持的现状就是可以接受的了。在眼前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以后，美国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安排双方军队的真正脱离接触，使以色列军队渡过苏伊士运河后撤——虽然后撤的地段没有萨达特计划中所规定的那么大，很可能甚至不会超过吉迪山口和米特拉山口。但是，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从阿拉伯领土上后撤，不论它对这块领土所占领的时间有多长；这就为下一步骤创造了互相信任的气氛。劝导以色列恢复十月二十二日停火线的外交工作，和为产生脱离接触计划而需要做的说服工作差不多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完成这两项工作。说也奇怪，撇开十月二十二日停火线不谈反而会使以色列人更快地从苏伊士运河撤退。萨达特应当作出选择。不管他所作的是两个选择中的哪一个，我将尽力促其实现。

萨达特坐在那里，陷入沉思之中，有许多分钟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向他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我实际上是说，和平的关键

在于他默许埃及第三集团军连续许多星期一直在沙漠里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为此，他要信赖一个美国人的估计，而这个美国人他才初次见面，而且对中东外交毫无经验。沉思良久之后，他使我感到惊讶。他并没有提出异议或进行争论。他对我的分析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他没有提出另外一种办法。他简单明了地说，他既同意我的分析，也同意我所建议的程序。这是违反外交的正常做法的，因为正常的做法总是千方百计地使对方让步。他断言，过去埃及想用折磨美国的办法来达到它的目的，那是愚蠢的。埃及对战争已经感到很厌烦了；它并不打算摧毁以色列。现在他既已使他的国家恢复了自尊心，蛮可以转而谋求和平了，因为他的人民渴望和平。他准备接受这样一个论点：以色列需要有信心来从事和平的进程。但是，要求他去争取一个正占领着“他的”国土的国家的信任，这未免太过份了。

我是用分析的方法提出这一点的，并不是要进行讨价还价。他愿意冒险让双方的军队在苏伊士运河两岸脱离接触。他说，他愿意接受我的战略。埃及的第三集团军就得等待了。只要供应有保证，它是能等待的，而保证它的供应需要由我负责去和以色列谈判。为了使我所概述的外交活动得以进行，他愿意暂时不提十月二十二日停火线的问题。同战争的苦难和风险比较，任何东西都显得次要和微不足道。

说老实话，这真是一个很有胆略的举动。萨达特听信一个他不认识的美国人的话——我当时对他说，我们将力图在三个月的期间内取得重大的进展——决定冒险一试，我们后来了解到，当时他的顾问们几乎一致反对他作出这个决定。如果出了什么毛病——如果我对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估计过高，如果我骗了他，或者，如果埃及第三集团军在沙漠中断绝了供应，士气垮了下来——那萨达特就完蛋了，埃及也会受到屈辱。

萨达特又说，不管怎么样，埃及第三集团军不是美国和埃及之间的问题的核心。他已下定决心了结纳赛尔遗留下来的问题。他将尽快和美国重新建立关系，一旦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他就会进一步谋求友谊。但是，要重新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总得有某种口实，然后埃及的公众和他的阿拉伯兄弟之邦才会理解这些步骤。他愿意等到有了某种具体的外交成就以后。*但是，推迟纯粹是策略上的，主要是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起来考虑的，并非以此作为讹诈的手段。他准备立即宣布他的意图——事实上，是在我们的会谈一结束就宣布的。与此同时，他将把他的权益小组负责人的地位提升到大使级的地位。他希望，我们也同时发表这样一个公告。我们谋求恢复关系已有四年时间；我受权带有恢复关系的建议。我们商定，两国大使将立即行使他们的职能，反正以权益小组作为工作地址和在大使馆办公没有多大区别。

萨达特对他已承担了义务的这个行动方针中所包含的危险，没有神经紧张的表现。他象一个外科医生正在冷静地考虑什么是最佳的行动方针，他请我提出具体建议；他断定，我比他更加了解以色列会接受的是什么。这也是一种有胆略、善于察言观色和施展计谋的表现。我确实知道果尔达会接受的是什么，也了解以色列内阁拒绝接受的是什么。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我们已经商定的方针有赖于我们来努力促其实现，他对我们表示信任要比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和我们争论更有把握使我们承担义务。

我说了，以后的成功有赖于现在的克制；最好是把争论减少到最小最小。埃及的基本要求是，通过标明不是由以色列人管的各个检查点不间断地把非军用物资运送到埃及第三集团军手里。因此，我根据果尔达在内阁否决她的决定之前她在布莱尔大厦接受

* 正式的外交关系是在三个月以后，即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恢复的，正好是在埃及和以色列签订了第一个脱离接触协定以后不久。

的东西，提出了一个设想，这个设想后来具体化而成为双方在几天以后便签字的下面这个六点计划：

一、埃及和以色列同意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要求认真遵守停火协定。

二、双方同意，一俟就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和分开达成了协议，便立即在此协议范围内开始讨论恢复十月二十二日位置的问题。

三、苏伊士城每天可得到食物、水和药品的供应。苏伊士城内所有受伤平民均撤离该城。

四、不得阻碍向苏伊士运河东岸运送的非军用物资。

五、设在开罗—苏伊士公路上的各个以色列检查点由联合国检查点取而代之。在该公路的苏伊士终点，以色列军官可以和联合国共同监督运河岸上运送的非军用物资。

六、一俟开罗—苏伊士公路沿线各联合国检查点建立，即交换全部战俘，包括受伤的战俘。

遵守停火协定的条款是照搬过去的条文，没有增加什么新内容。第二点，即关于以色列回到十月二十二日停火线的讨论应在军队脱离接触的范围内进行，是新增加的。果尔达·梅厄前往华盛顿访问期间曾亲自提出过这个方案。当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她回答说，“没有什么意思。”它的实际意义是把关于十月二十二日线的争论埋葬掉。要么是脱离接触的办法可行，把脱离接触的那条线移到运河以东，远远超过了十月二十二日线，要么，就是处于危机之中，这个问题也就不必谈了。不管这两种情况出现哪一种，十月二十二日线现在都是无关紧要的了。

正是这个态度才解决了有争议的埃及第三集团军的通道应由谁控制这个问题。果尔达在华盛顿的时候，由于她的内阁的反对，不得不拒绝由联合国来控制开罗—苏伊士公路。另一方面，要求萨达特通过以色列的检查点运送非军用物资是一种屈辱，我也不

想让他受这样的屈辱。解决的办法是，根本避开这个问题，也就是达成这么一种妥协，不论谁接受它都标志着信心是主要的而问题的实质则是次要的。各个检查点都置于联合国的控制之下；同时容许以色列军官参与“监督，以核实运送的物资为非军用物资”。这样，以色列人便可以说，联合国设在那里的检查点是经过他们默许，设在“他们的”公路上的；埃及则可以坚持说，有联合国在那里就有效地取消了以色列对这条公路的控制。以色列人又可以指出他们的军官参加检查这一事实；而埃及人则可以说，这是联合国程序的一部分。根本的事实是，现在有了一套办法，可以不间断地给埃及第三集团军运送非军用物资。

为所有这些让步大开方便之门的是，萨达特也同意在第六点中规定的，一俟联合国的各个检查点建立起来，便立即交换战俘——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以色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萨达特对我们所提草案的主要内容只作了一些最轻微的改变。他正确地认为，这个草案既是一种信任投资，也是对双方迅速执行协定的一个促进。

还有一项秘密谅解，即：只要以色列答应只是“有节制地”使用曼德海峡，埃及即应“放宽”对这个海峡的封锁。萨达特说，因为从来没有正式宣布封锁这个海峡，所以不能正式解除封锁。而且，公开让步太多会损害他在阿拉伯兄弟们当中的地位。萨达特——后来还有法赫米——把“放宽”一词的具体含义解释为：埃及不干涉通过这个海峡的正常交通运输。这整个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形而上学的一个杰作，因为首先，我们找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实际上有过任何船只被禁止通过这个海峡。

和一切好的协定一样，这个六点计划给每个人都带来一点实惠。埃及获得了对它的第三集团军的有保证的供应和由一个国际组织出面管理开罗—苏伊士公路。以色列获得的是，它的战俘获

释，它在十月二十二日线这个问题上所受到的压力得以解除。萨达特也运用了我所日益熟悉的方法：抛开琐碎问题，直接处理主要问题，作出重大的、甚至是急促的策略上的让步，以换取一种不可逆转的心理上的势头。由于他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建议草案，这就使我们有义务去力图实现他真正想要的脱离接触。他在十月二十二日线问题和释放战俘问题上肯于作出让步，这就有助于缓和以色列由来已久的对他的动机的怀疑。然而，他所作出的让步，从本质上说不是什么重大的让步；假若他在一些细小问题上和我们争论的话，那么，他所得到的改善也许只是装点门面的东西或者是满足一下虚荣心而已。明智的政治家懂得，评价他们的标准是他们所推动的历史进程，而不是他们在争论的问题上得了多少分。

当然，我们决不能把萨达特看作是人人称道的温文尔雅的大叔。他很强硬，也很有耐心。他毕竟是坚韧不拔地、耐心地甘冒一切风险为十月战争作好了准备的那个人。他并不准备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曾恳请他帮助设法解除石油禁运，他根本听不进去；他坚定地回答说，只有在谈判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他才能去说服他的兄弟。

当我们讨论完了计划中的六点的时候，萨达特拍了一下手，一个随员出现在我们面前。萨达特要求他去把乔·西斯科和伊斯梅尔·法赫米请进来，这两个人当时正坐在草坪上的藤椅上，我们从房间里能看见他们。他们将把我们讨论过的东西加以提炼，形成六点计划的正式文字。当我们等着他们的时候，萨达特转过身来提醒我，我们还有很远的路程要走：“基辛格博士，千万不要忘记我是和美国，而不是和以色列达成这个协议的。”这确实是问题的核心——但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一部分。对美国的信任能成为架设在四次战争所造成的鸿沟上的桥梁。

我们商定，一旦六点计划形成正式文字，乔·西斯科和哈尔·

桑德斯便到以色列去向他们提出这个计划。一架埃及飞机将把他们送到塞浦路斯；我们将安排让以色列派一架飞机到那里去接他们。我认为，可以预断以色列会接受这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包含了几乎以色列内阁一直坚持的所有各点，而且确实超过了果尔达所已经接受了的東西。西斯科和桑德斯将谋求正式确认此事。我将留在开罗，因为法赫米已邀请了若干位尊贵的客人出席他为我而设的晚宴，特别是因为我想回避事先没有计划便突然前往以色列所必然会造成的戏剧性场面。事实证明，我当时还不了解中东。对各方最关紧要的不仅仅是问题的实质，而且还有无形的心理因素。后来我才懂得，根本不应该那么想当然地对待耶路撒冷——它之所以能够存在下去有赖于让人们看到它是本身利益的强硬保卫者。法赫米的晚宴很丰盛，我是尽情地享受了，但是，倘若我当时把日程改变一下，事情本来是可以进行得更顺利一些的。

在通常情况下，任何一次谈判都是一连串事件的一部分；谈判结束往往使人精疲力尽而不是轻松。人们对所参加的事件很少能认识到它们就是转折点。我这次到开罗来是希望在四年来一直进展十分缓慢的战略方面能向前推进一步。真没有想到，在战争开始之后一个月，我们和埃及总统仅仅碰了一次头，就实现了一次突破。萨达特明确地把他的政策的赌注押在和美国的联系上面；如果我们明智地继续执行这个战略，他要想改弦易辙就会变得愈来愈困难。削弱苏联的势力现在只不过是时间和技巧问题；某种程度的和平前景显得光明了——只要我们能在以色列人的疑惧和阿拉伯人的缺乏耐心之间保持平衡。

当时我更为担心的是，在白宫能够宣布任命大使和果尔达能从西斯科和桑德斯那里了解到六点计划的内容之前，对我们的成就一定要保密不要宣扬出去。如果只是在开罗宣布此事，那就会在白宫和耶路撒冷引起轩然大波。任何一个总统都愿意为他自己

保留宣布好消息的特权，这种倾向是正常的。尼克松由于水门事件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的这种倾向就尤其强烈。我和萨达特已商量好，在当天华盛顿时间的中午在白宫和开罗同时宣布此事，当时离开宣布的时间大约还有七个小时。在西斯科和桑德斯在耶路撒冷提出六点计划之前，我们也不谈这个计划。要是这个计划作为埃及建议出现的话，难以对付的以色列内阁就可能拒绝接受。

我和萨达特的会谈进行了三个小时；会谈结束以后，我便和他到花园里去和我们的助理人员重新会合。我和萨达特都希望暂时不要把我们的协议宣布出去，但彼此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和萨达特坐在摆成半圆形的藤椅当中那两把上，摆好了准备照相的姿势，因为，正如哈尔德曼尼斯所说的，这正是“照相的机会”——让记者们照相的机会，但不是提问题的机会。但是，常规几乎从来也限制不了那些特别有进取精神的新闻记者，这些新闻记者认为，提问题不算违反规则，回答问题才算违反规则，而回不回答问题，首先是由制定规则的人掌握的。

萨达特沉不住气，回答了记者们向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一个记者问道，“总统先生，美国是不是从现在起不再给以色列空运军用物资了？”

“你的这个问题应当向基辛格博士提出，”萨达特回答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十分清楚地知道，我已作为一个机密对他说了，空运很快就要结束。（事实上，我们多进行了几天空运正是为了好让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我立即回答说，“幸亏我没有听见这个记者问的是什么问题。”但是，下一次我就不那么幸运了。

一个很机灵的记者问道，“基辛格博士，在埃及和美国之间，会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吗？”我既要谨慎小心免使尼克松勃然大怒，又

不愿意说谎，因此，我当时踌躇了一下，没有说话。萨达特却没有这种种约束。他痛快地对记者说，“今天过些时候我们会有消息告诉你们的，你们要有耐心。”他这么一说，实际上就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⑥

我这次埃及之行的高潮已过，以后发生的事情就不那么重要了。当天晚上，我出席了法赫米在他那套可以眺望尼罗河的公寓里为我设的晚宴。他还邀请了安全理事会的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同时还邀请了埃及政府的一些领导人和很有势力的新闻记者默罕默德·海卡尔。中国大使找了个借口，谢绝出席，大概是因为有苏联大使出席的缘故；其他三个国家的大使都出席了。（后来海卡尔就宴会上的交谈情况发表了一篇很有诗意、富于想象的报道。）⑦法赫米和其他埃及高级官员利用那天晚上的机会作出戏剧性的表态，用以表明埃及正在增加它的选择的机会，不再像纳赛尔时期那样单纯依赖苏联了。

第二天，十一月八日星期四上午，我和法赫米会晤，商讨日内瓦和平会议的计划，并确定“适当的主持者”，这是在莫斯科商定的停火协议的一部分。十月二十一日那天，莫斯科毫无疑问曾敦促萨达特接受停火协议，它当时所持的理由是，苏联参加“主持”这次会议可以保证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现在埃及正在把它的侧重点转向美国，把全面的解决办法改变成循序渐进的解决办法。要让苏联在这里面起重大作用看起来就远不是那么可取了，也许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莫斯科能够以激进派代言人的面貌出现，以此来阻挠萨达特达到他认为可以达到的目标。因此，埃及和美国都想方设法防止把“主持”变成使苏联实行否决权的工具。如果苏联人和他们的激进派盟友在力促求得全面解决的幌子下，坚持一种要么全部接受、要么拉倒的态度，那么，战争的结局还会像以前一样造成那种爆炸性的僵持局面。当时连叙利亚会不会参加

谈判，也还不清楚；它很可能只同意导致六年僵持局面的那个议程，而不同意其他议程；它所采取的阿拉伯立场决不会比莫斯科的立场有所逊色。我们使埃及和以色列同意把脱离接触列为和平会议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只不过是把门开了小小一道缝，前面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我们的做法是把外交工作分成一系列的步骤来进行，这样在谈判期间就可以把苏联进行阻挠的能力降低到最小最小。但是，我们只有向克里姆林宫显示这样一个前景，即在将来一定的时候它会有机会参加一次全面的和平会议，我们才能使苏联默许这个方针。莫斯科无疑会对脱离接触阶段持顺从态度；部分原因是，它拿不出自己的办法来解决埃及第三集团军被围困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它相信，美国人所担任的独唱角色只能在开幕式上演出，以后就唱不成了；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盘算着，日内瓦会议迟早总是要举行的，到那个时候它可以大显身手。我们由他们去想，不惊动他们；我们就召开和平会议的程序问题小心翼翼地和他们磋商。我在十月间前往莫斯科的时候便已使联合“主持”和平会议一事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当时商定，美国和苏联的代表只是在会议的开幕式和讨论关键性问题时才参加。将来，我们打算在给“关键性”这个词下定义的时候，把它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但是，我们一直把召开和平会议的前景说成是大有希望的，以使他们安心，不去干涉脱离接触的阶段。

我第一次访问开罗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我的希望。由于取得这一成就，我得到了公众对我的一些称赞，说我有进行谈判的才能。但是，如果这种称赞是指我在谈判中说服了萨达特，促使他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那就错了。在局外人看来象是通过谈判才取得的突破，事实上是埃及和美国的观点多年来一直互相接近，终于汇合到一起了。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原因想和对方建立伙

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打开了和平的大门，并且促进了中东所有各国人民的利益。

安瓦尔·萨达特

我在一九七三年第一次和安瓦尔·萨达特会面，在此后的年代里，他成了一位世界闻名的人物。在我出访开罗的时候，他在美国还是一个不大知名的人物，充其量人们把他看作是阿拉伯世界中许多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中的一个，这些阿拉伯领导人喜欢装腔作势，在他们内部互相争吵，说起话来尽是华丽的词藻，滔滔不绝，使人想起来觉得很有趣，却又感到莫测高深。但是，自从那次和他会面以后，我知道，我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人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我很荣幸能有机会在安瓦尔·萨达特刚踏上和平旅程的时候就和他合作，共同努力。后来，我去职了，他则继续大踏步前进，在一年之内接连采取了许多我本以为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实行的大胆的新措施。正当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已经在望的时候，他被杀害了。预言家们的作用在于以他们所憧憬的东西去激励普通的男男女女，但当被激发起来的热情逐渐消失的时候，他们就要付出代价了。因此，我希望读者会原谅我以比较短的篇幅，离开正题去评价一下我的这位现已与世长辞的朋友。

艾赛亚·柏林*曾经写道，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在于他有能力把自相矛盾的东西转变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当安瓦尔·萨达特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时候，阿拉伯国家对它们的武装信心太小，而对它们的空喊又信心太大了。多数阿拉

* 艾赛亚·柏林(一九〇九——)为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伯国家依靠苏联,但是,苏联只能向它们供应武器去进行毫无结果的战争,却不能向它们提出取得外交进展的计划。这些阿拉伯国家在谈判中一味提高调门喊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口号;它们似乎想要得到和平的果实,但又不敢说出“和平”这两个字。西方国家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眼看着一场影响它们命运的戏剧在演出,而似乎又没有能力去施加影响。

在短短的几年里,萨达特便把这些谜全破了。当他去世的时候,和平的进程已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埃及和美国的友谊已成为中东稳定的基石。他在一九七七年专程到耶路撒冷去访问,向所有那些纠缠于眼前事物的人们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他明白,一种英雄的姿态是能够创造新的现实的。

伟大的领导人和普通的领导人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表面上的智能的高低,而在于有没有洞察事物的本领和办事果断的胆略。伟大人物明白问题的实质;而一般的领导人只理解问题的表面现象。伟大的人物集中注意各个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的领导人只看到一系列似乎毫无联系的事件。伟大的人物善于憧憬未来,这就使得他能够以长远的观点来看待眼前的障碍;普通的领导人却把路上的鹅卵石变成巨石。

萨达特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忍受了由于把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境界而必然要产生的那种孤独感。他来自埃及的人民群众,他具有埃及人民群众的那种安详和耐心。他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上的米塔布科姆村,他常回故乡,有一次我就在这里一幢简陋的房子里访问了他。对于一个习惯于看一般的地形的人来说,那一带一望无际的平原,看上去简直令人吃惊。在这个平原上,找不到一个可以起识别作用的地形地物,在个人和空旷的宇宙之间,没有什么起中介作用的东西;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无所不在、而且永远存在的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在埃及,人口的压

力是关于这个国家的著述中的一个标准的特色。在萨达特故乡的那个村子里——我想大概下埃及的所有村子都是这样——人们几乎可以十分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不说别的，萨达特那幢小房子及其周围邻居的难以胜数的烟囱上升起的那些飘荡在树木和篱笆上空的炊烟，就说明了问题。沉寂笼罩着大地，但人们知道在他们周围正在进行着活动；人们可以凭直觉感觉到一个文明古国的旋律，但是，这是既看不见、也听不到的。人们有一种奇特的隐遁的感觉，就好象是在胎中的婴儿一样。萨达特有一次若有所思地对我说，在黄昏的时候，他感到最舒畅，因为他知道，所有的村民们都在他们家里做饭。萨达特的内在的安全感和他对他的人民渴望和平的感性认识，就来源于这里，并且不断地得到更新。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萨达特，一个不满足于在他的老家休闲的萨达特；他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喜欢到处游历的人。萨达特夫人有一次对我说，这是他坐牢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毛病：要是他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太长了，他就会感觉到象关禁闭似的。萨达特怕关禁闭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他对于把生活的意义限于维持现状的任何事情在心理上都感到不舒服。他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自己的人民能看到崭新的前景。在这个过程中，他为阿拉伯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比他那些专门发表堂皇的好战言论的阿拉伯兄弟所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他收复了更多的失地，从西方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并使阿拉伯人的事业在国际上获得好评——他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比在所谓拒绝阵线的集会上经常辱骂他的任何领导人所作出的贡献都要大。他动员他的人民和西方结成伙伴关系，因为他懂得，具有同样的价值感比摆出一副出击的架势挑战更有把握能博得支持。正当他这样把一些怪现象转变过来，并且解决了难题的时候，他却被一些狂热分子杀害了，他们是些平凡的、心怀疑惧的仪式教派的贩子们，是些庸俗卑劣、为萨达特所不齿因而很

快失掉权势的人。

萨达特随着他的和平使命不断取得进展，他对和平的热情也日益强烈和深厚。当我第一次和他会面时，和平还是谋求埃及的利益的一种策略。到他逝世的时候，和平已经变成他为人类服务的一种职业了。

在我们互相认识的早期，有一次他正在视察一所军用医院，他很动人地和我谈到埃及是怎样吃了大苦头，为什么必须结束毫无意义的冲突，他是怎么也不想再让年轻人去送死。他说，埃及再也不需要烈士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一九八一年在他所乘的专机上，他正从华盛顿飞往纽约，这一次访问竟成为他对我们国家的最后一次访问。他刚刚会见过从他开始和我们合作以来的八年中所会见过的第四个美国总统。他当时显得有点疲倦，也许是由于我们的政局的变化使他不得不在相隔那么短的时间里再度开始建立信任和解释他的想法而感到有点颓丧。但是，过了不久，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显得快活起来了。他说，他正计划在一九八二年四月底以色列把西奈归还埃及的那个场合举行一个星期的庆祝盛典。考虑到我曾经和他一道开始走这段路程，也许我能参加至少这个庆祝典礼的一部分。在参加了庆祝典礼以后的那一天，我们可以登上西奈山；在那里，他就能够指给我看一块可以居高临下望见沙漠的地面，他计划在那个地方并排盖三座教堂——一座清真寺，一座犹太教堂和一座基督教堂——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和平的象征。到那时，我就可以和他在那里冥想一会儿了。

然而，在评判一个政治家的时候，切不可单纯地把他看作是一个哲学家或不切实际的梦想家。在一定的時候，他总得要把他直接感觉到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有时是面对着阻力这样做的。萨达特既不是一个过分乐观的人，也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并不认为，为了和平要付出一切代价。他愿

意和别人协商，但决不盲目顺从。我从来不怀疑，在他认为没有光荣的道路可走的时候，他是会造就许多英雄烈士的。

因此，对萨达特进行简单的评价很可能是错误的。几十个拜访过他的美国人都觉得他这个人很有魅力。他也是一个态度冷淡，善于思考和喜欢孤独的人。和许多伟大的人物一样，他简直跟权力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时，他也能谈吐自若，但是，和他深交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于闲聊是不耐烦的。他宁可用闲暇的时间去单独地思考一些问题。他的大胆的主动行动绝大多数是在一个幽静的地方隐居思考的时候想出来的，而且往往是在他故乡的那个村子里设想出来的。我不知道有其他的领导人能象他那么清楚地了解孤独的好处，象他那么善于独立思考。

他看上去文质彬彬，这很容易使人忘记他早年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生涯，当时他为了争取他的国家的独立而斗争，接连不断地坐牢受苦。这样的人绝不是“平庸之辈”，虽然表面看来温文尔雅。革命的领导职务只是对那些有高度献身精神的人才有吸引力；革命志士断然抛弃一切正常的飞黄腾达的机会，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事业高于通常的盘算。人们只有作好了进行斗争的准备，才能对这样的人的信念提出异议；要想去阻挡他们，那就必然要付出代价。萨达特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的，但是，他也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萨达特有惊人的能力能看透别人的心理。他在同他所认识的四个美国总统打交道时，各有一套十分巧妙的手法。他对待尼克松的态度是把他当作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待福特的态度是把他当作满怀善意的典型；对待卡特的态度是把他看作一个道德高尚的传教士，在尘世中似乎过于正派；对里根的看法是：他是一位人民革命的仁慈的领导人，善于体察每一个人的想法，并获得每一个

人的信任。他力求找出埃及的利益和美国自身利益的共同点。他一再向我们提出挑战，问我们敢不敢和他进行谈判——不是作为调停者而是作为参加谈判的一方，或者表示愿意接受我们提出的建议——对于他的这一表示，我们只有把它理解为一种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放弃权力，这样才能对它表示热烈欢迎。不过，他这样做也有真诚的一面，并不仅仅是为了设法达到他的国家的目的。萨达特对美国的正义感是深信无疑的。正由于他信任我们的领导人，他能维持自己的地位，并在此过程中促使他们愿意尽其所能来信守诺言。

萨达特作了正确的分析，他认为阿拉伯的激进主义有可能进一步加强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的伙伴关系。它使美国没有选择的余地，除了同以色列原有的道义上的紧密联系之外，又多了一个在战略上有必要保持这种特殊关系的理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萨达特开始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还未证明行得通之前，人们会认为这是疯子才走的道路。萨达特的目标是：促使美国采取一种较为“不偏不倚”的态度，建立另外一种道义上的联系，美国就会乐得去援助阿拉伯人恢复他们所认为的失地。从这一意义上说，萨达特一九七七年的耶路撒冷之行既是一种高尚的行动，同时又是一种从心理上解除以色列武装的方法；既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和解姿态，同时又是孤立这个犹太国的计谋。

这说明为什么以色列对萨达特抱有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几十年来，以色列一直是它的各个邻邦憎恨的对象，因此，它最初对待萨达特的提议是抱怀疑态度的，继而又满怀希望，甚至洋洋得意。但是，以色列也总还是有一种难以消除的疑惧，它怕萨达特把美国引诱过去，最后会使以色列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这个犹太国家总是游移不定，既对萨达特的提议表示热烈欢迎，又对他所提出的条件斤斤计较；既抱有希望，又怀

有疑惧。以色列的希望和疑惧是否会成为现实，这是历史的最后一页，这一页尚待后人书写。

和所有的伟大人物一样，萨达特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他那种勇于超越障碍的素质也使他对那些不同意他的崇高理想的人的神经敏感感到不耐烦。他很难相信那些批评他的人是真诚的，即便退一步说，这些人对他的批评有些过份，他毕竟还是不能以宽宏大量的态度承认对他的批评意见容或有可取之处。当他受到责难的时候，他便进一步朝着他所选定的方向前进，特意表明反对他的人没有办法制止他前进；这么一来，他的大无畏的精神就变成了对那些抵制他向和平进军的人的一种挑衅。他是那样全力以赴地去谋求和平，因而往往把普通埃及人日常渴望得到的东西也看作是次要的了——特别是在普通埃及人已经把和平看作是根本不成问题的事、不再列为尚未实现的愿望的时候，他还采取这种态度。我们需要有伟大的人物来打破旧的框框；而在这以后，他们的命运往往是由于和大家合不来，而引起人们对以前要求不那么高的领导的怀念。

但是，萨达特不仅仅是起了他所应该起的作用。这个农民的儿子，原先被人们低估了的政治人物，以他创造的奇迹之一证明了他具有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而且偶尔还有预言家的那种洞察事物的能力。然而他的所有这些素质中又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有谁能忘记，是他主动提出来要收容落魄的伊朗国王。这个国王竟为受过他更多恩惠的朋友们所抛弃，而萨达特则本着仁慈和高尚的精神救助了他，这就补偿了所有那些经不起考验的朋友们的荣誉。

在我不再担任美国政府职务以后，有一次我到埃及去进行访问。访问期间，萨达特邀请我、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到他在亚历山大城的海滨别墅去和他共进晚餐。餐桌正好就摆在那块草坪上，我

们曾经谈判并且签订了第二个脱离接触协定的那个地点。在这天晚上的谈话中，我对萨达特说，凡是和他一块工作过的美国人都受益不浅；他使我们这些人都有了光彩。我的这些话使他感到不安；他一再表示实在不敢当。他不想让人们把他辛辛苦苦干过的事看作是他个人的功劳；为了恢复他的人民的尊严，为了给他的国家以至全世界带来希望，他认为这是他应该做的份内事，而不是凭个人的好恶去做的。

不过，萨达特的这一番话没有说对。他的确使我们感到光彩。只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显得太容易、太自然了，因而我们总觉得，这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现在他已离开了人世，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从今以后，我们只好单独地走上和平的旅程了，我们心里都十分明白，我们多么需要他。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能象埃及人那样，喜欢追求不朽的东西。哪一个国家的人也不象他们那样坚持不懈地不让时光白白流逝——为此，他们有时胆大无比，目空一切，有时则比较被动；有时依靠耐力而不是依靠大规模的进攻，有时建造起十分宏伟的建筑物以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在吉萨的金字塔既简单而又庄严肃穆，它经受住了自然界风风雨雨的侵蚀和人间的劫掠，其时间之长，几乎可以说达到了与人类共存的永恒程度，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的人们完全是由于自己的成就之一而感到自身渺小的。那象海洋一样一望无际的沙漠被青绿色的尼罗河谷分成两半，这一条狭线一直向外延伸，把人的视界引到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没有一样天然景物可以使它相形见绌；所有最有吸引力的突出景物都是由人建造的。这些建筑物是那么宏伟壮丽，尤其是它们所体现的那种构思使人生畏。那些宏伟的埃及塑像也使人产生同样的感觉。这些人像比真人大，但是他们的面容是那么栩栩如生，很有人情味，它们的目光把我们引向遥远的天边。

安瓦尔·萨达特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不是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使之不可逆转,是不是象古代埃及法老艾克纳顿*那样,梦想在佩戴着全副甲冑的埃及诸神当中建立一神教,而过了一千年以后他的这一梦想才在人类当中被接受——到底情况如何,有待以后见分晓。不管将来揭晓的是哪一种情况,凡是懂得历史的人都决不会忘记,中东走向和平的旅程是由安瓦尔·萨达特开始的,没有他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进展的。至于我们能否达到我们的目的地,那就要看我们了。就安瓦尔·萨达特所起的作用而言,他已经获得了他的埃及的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不朽的英名——这个不朽的英名,如果我们将来获得成功,就是对我们的一种激励,如果我们失败,他的榜样则会使我们感到惭愧。不管我们将来成功还是失败,和平的事业都将是他的金字塔。

西斯科和桑德斯在以色列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我之所以派西斯科和桑德斯去以色列,是因为我不想得罪法赫米请到他家来共进晚餐的许多尊贵客人。况且,让我的全班人马——包括随行记者——出动,有可能会被看作是美国发生了危机,或者是到以色列去施加压力。我是怎么也不能相信在耶路撒冷能有多大的争论。毕竟,以色列会得到一些东西:把战俘接回来,减缓了要求它撤退到十月二十二日停火线的压力,埃及对曼德海峡的封锁也解除——这一切的唯一交换条件是,它容许联合国在一条其主要地段依然在以色列控制下的公路上设几个检查点,以保证埃及第三集团军可以重新得到接济,因为国际形势(还有以色列自己的利益,如果它能正确理解的

* 艾克纳顿是公元前埃及的一位法老,曾力图把当时的多神教改为一神教,但失败了。——译者

话)反正不容许摧毁这个集团军。为了使事情更加有把握办成,我已授权西斯科可以向以色列保证,只要以色列接受六点计划,将来联合国若是通过要求以色列撤退到十月二十二日线的决议,我们一定加以否决。

虽然如此,象征问题仍然令人遗憾。对于一个总想掌握自己的前途的国家来说,我派我的下级人员去,不管他们多么能干,也很容易叫人产生恶梦一般的疑虑,怕美国背着以色列作了安排而硬要它承认——尽管我在四天以前才结束了和梅厄夫人的一次会谈。

西斯科和桑德斯于十一月七日(星期三)晚上在宾馆和以色列的谈判小组会晤。我和果尔达两个星期以前也是在这个地方碰头的。会谈开始进行得很顺利。果尔达为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向西斯科表示祝贺。但是,过了不久,基本的现实情况终于起了主导作用。萨达特作为一个古老国家的代表,本来就意识到,时间对埃及有利,因而蛮可以表现得落落大方。而以色列呢,它正在为其生存权利而斗争,它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救亡图存——或者说,它所接受的历史教训就是如此。以色列的国内政局,再加上这个国家的不安全感,也使人无法否认它在谈判中气急败坏、一味纠缠枝节问题是有道理的。

果尔达象一头嗅觉敏锐的猎犬——她一只眼睛盯着选举前的民意测验结果——任何细小问题也不放过,她探查了她预想到议会中的反对派可能提出的、或在联合政府中的合伙人可能加以利用、给她找麻烦的一切问题。以色列谈判代表特别提出了这么一些问题:“有节制地”使用曼德海峡是什么意思;各个检查点都设在从开罗到苏伊士那条公路上的什么地方;谁实际控制各个检查点之间的公路——事实上,所有各点如有蒙混之处都关系到整个协定能否达成。表面上看,我们似乎处于一种无法再谈的境地;以色

列谈判小组似乎是干脆要“否定”我们已经谈成了的东西，从他们的谈吐中看，仿佛以色列在突然面临着埃及接受了自己的提议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收回这次在埃及方面得以实现突破的那些次要的让步似的。不过，果尔达是个既强硬而又明智的人。在把西斯科折磨了几个小时，并且一本正经地表明了她有警惕性之后，果尔达要求西斯科告诉我的无疑是她立即就作了结论的事：

我们将在明天上午和内阁一块开会。我希望我们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有的话，我们将设法克服。请替我向他问好，并告诉他，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迪尼茨在十一月八日上午向斯考克罗夫特传达了一个类似的信息。虽然如此，在几个小时内，事情开始揭晓了。果尔达对她的内阁的顺从作了过高的估计，她的内阁坚持以色列谈判策略中的另一套神圣的仪式：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搞一份“谅解备忘录”。以色列由于意识到在世界各国中它只有一个朋友，它总是没完没了地要求更多的让步，或搞一些附加文件来解释现有的协定，这样它才放心。这一次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是详细说明以色列打算怎样解释六点协议的各项条款。以色列的这些解释并不是不合理的，我们准备秘密地接受并且保证一旦有了争端，我们一定支持它。但是，我们不能办的事似乎正是以色列内阁想要我们办的事：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变成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基本协定。这么一来，我们就需要再回到萨达特那里，要求他正式肯定他只能在事实上接受的东西：即如，解除对曼德海峡的封锁；由以色列控制开罗—苏伊士公路；和关于给埃及第三集团军运送物资的详细规定。这些事项要是让每一个阿拉伯人都知道了，那真是非同小可的事。桑德斯机智地建议由果尔达去向以色列议会宣布这个解释，我们不作与此矛盾的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够要求萨达特正式同意以色列的这个解释，虽然他实际上是默认了。这似乎

解决了问题。

西斯科和桑德斯赶到利雅得来和我会合。我们计划在第二天，十一月九日（星期五），由我写一封公开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以此作为宣布接受六点协定的手段。我从利雅得同时向开罗和耶路撒冷发出内容大致相同的信息。

正当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就绪的时候，星期五一清早法赫米打电报通知我，以色列坚持要对协定作新的解释。在101公里处举行会谈的以色列方面的代表阿哈隆·雅里夫将军已着手做了西斯科和桑德斯告诉过以色列绝对不能做的事；他实际上已要求埃及正式接受由以色列和美国商定的对协定的解释。法赫米还抱怨说，耶路撒冷已经把关于解除对曼德海峡的封锁的秘密谅解泄露出去，并且坚持要由以色列“控制”开罗—苏伊士公路。他建议，在把各项问题加以澄清之前，推迟宣布达成协议。

我一直担心会出现这样的事。秘密谅解对以色列内阁是毫无用处的，特别是在选举的时候，因为这种谅解会使政府受到各方面的指责，说它未能取得本来可以取得的一切成就。我想不起来有哪个谅解备忘录不是一达成以后就很快公开的。至于雅里夫将军，他显然决定要力图证明我们对运输的东西的判断是错误的。

我担心，如果我们延期宣布已达成的协议，谈判就会纠缠于细节问题而僵持不下。我决定把分歧分成两半去处理。当我仍然在利雅得的时候，我便立即给法赫米发出一个信息，使他可以挽回面子。我们无法防止人们对放宽曼德海峡的封锁的各种揣测，但我们能够负责保证不去证实这些揣测。其他问题应由双方的军事代表在101公里处讨论；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全都是一些技术问题，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把我们对协定的解释按照西斯科和以色列商定的内容复述了一遍，但是，不要求法赫米对我们的解释表明态度。在信的末尾，我强烈地恳请他们在约定的时间宣布协议（当时离开

约定的时间不到十个小时了), 否则的话, 一旦出现新的复杂情况, 就会根本达不成任何协议。

我从伊斯兰堡(我当时在巴基斯坦, 正首途前往北京) 给果尔达发了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我重述了一下埃及方面的不满意见, 并敦促以色列方面避免向记者说一些使人激动的话, 避免对协议作公开的解释。我还对果尔达说, 萨达特已明确表态说, “只要(以色列人) 出现在那条公路上, 就会使他对待协议的立场无法维持下去。”我重述了已发出的给法赫米的答复, 然后敦促果尔达按照约定的时间宣布协议: “重要的是, 以色列现在就以一种积极的精神按照协议的条款行事, 同样重要的是, 你们的谈判代表不要采取一种使人为难的态度。”

法赫米在三个小时以内便给了我积极的回音。他明白, 对于一个迫于现实而寻求挽回面子的协议, 不作过于详细的解释是对大家都有利的。因此, 法赫米承认, 他对我的“解释”感到满意, 并且敦促我按原定计划着手给瓦尔德海姆写信。

果尔达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虽然表面上有点怒气冲冲。她表示, 硬说以色列谈判代表找麻烦使她感到气愤。她召见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肯尼思·基廷, 把我发给她的电报描绘成又一个“最后通牒”——这样描述实在叫人费解, 因为埃及已经接受了以色列的基本方案, 我们也已同意支持以色列对这一方案的解释。我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事情不要做得那么露骨, 以便让实践而不是理论去决定该怎么安排。果尔达含蓄地谈到她准备辞职不干, 好让一个比她强硬的人来担任谈判代表——这样一个前景确实是怪吓人的, 好在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果尔达虽然发了一顿脾气, 但是, 她的结论确实是温和的。她往往是这个样子, 用非难的语言来达到实际上进行合作的目的。她说, 既然我们在谈论由美国出面给瓦尔德海姆写信, 她没有权利不

让美国写。就她而论，以色列是会宣布在原则上接受协议的，不过需要经过“澄清”才行，而她明明知道，她已经得到了澄清。你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再发出最后通牒，对你来说必定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这也是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泄露出去的好办法。）

我们决定抓紧时间办事。在最后时刻，法赫米想要我们删去致瓦尔德海姆信中的有关某一需要保密的问题的一个短语。我们对他说，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六点计划在美国是十一月九日中午宣布的。（但是，以色列由于犹太人的安息日的缘故，把签订协议的仪式推迟到十一月十一日。）我从伊斯兰堡给果尔达写了一封措词委婉的信，把我当时并不是那么平静的心情掩饰过去了。（我把闷气发在和善的肯尼思·基廷头上，因为我认为他对果尔达的那顿恶骂回答得不够坚决有力——这证明他比我聪明。）

果尔达现在承认，她对所取得的结果感到非常高兴。法赫米比她早一天也作了同样的表示。基廷见到果尔达的时候，她“心情舒畅，热情，很好说话”。她在证明她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以后——关于这一点，她觉得比我们更需要加以证实，而我们身上还有她早先攻击我们所造成的伤疤哩——她设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使她的内阁同意了协议。协议是十一月十一日在101公里处签字的，当时我正在中国。

这个协议在它为脱离接触的协议所更替之前生效的两个月里，在执行上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谅解备忘录从来没有援用过，这证明双方彼此间的了解要比粗声粗气地说话、拿我当作受气包的那种情况要好得多。

安 曼

为了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交换意见，我还来去匆匆地走访周

围的一些国家的首都。我访问埃及以后第一个停留的国家是约旦。我是十一月八日去那里访问的。从世界各国人士交往频繁的大都会开罗来到单调枯燥的安曼，变化真不小。安曼是在约旦河东岸紧挨着山地的山城，在晴朗的夜晚，从安曼可以看见耶路撒冷的灯光。这次到达安曼又给我提供了一个练习检阅仪仗队的机会。这一次，我想办法放慢我的脚步，以便和陪同我检阅的军官的步伐一致，虽然我还是掌握不了按照军乐队所奏音乐的节奏走路的艺术。

我们乘车到国王的宫殿，这个宫殿按照中东王室的标准来说，确实不算宏伟。国王在那里迎接我们，这么客气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惯例，同时也表明当时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很亲密的。我们感到遗憾的事情之一是，我们最好的阿拉伯朋友在和平进程的这个阶段只是处在外围。他一直没有参加战争（只是派了一个旅到叙利亚），因此也就不需要稳定下来的停火线。由于他一直对我们友好（也由于已有多年历史的哈希姆王朝*和沙特王朝**之间的争执），他为自己着想而没有用石油来向我们施加压力。其结果是，我和他的谈话，只是谈到一些抽象的事情，或是回忆往事。

侯赛因对引起战争的一系列事件表示痛惜。他说，战争在那个时间爆发，他真没有想到。他确切地说明了他当时的进退两难的处境：

约旦不论是从国土还是从人口方面来说，都是阿拉伯色彩最浓厚的国家。要是参加这次战争很可能导致约旦的毁灭，而且为激进分子造成一个可填补的真空。要是不参加又可能使约旦完全陷于孤立，我们就会成为替罪羊。

这个分析十分尖锐。不幸的是，靠走中间道路是争取不到外

* 指约旦的王朝。——译者

** 指沙特阿拉伯的王朝。——译者

来支持的——而当和平进程触及到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约旦的独一无二的作用就会变得愈来愈关键。侯赛因作了如下的概述：

我们的处境和叙利亚、和埃及的处境都不一样，它们和巴勒斯坦问题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们在一九六七年的战争爆发以前便已经有了国际边界线。约旦的一九六七年边界线是停战时划分的边界线。约旦河西岸既是约旦的领土，又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在那里的人口既有约旦人也有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问题跟约旦河西岸和约旦都毫无关系，而只是和以色列有关。问题在于谁代表巴勒斯坦人。我们的看法是，以色列占领着的约旦河西岸是约旦和巴勒斯坦的领土。约旦有责任收复失地，而只在互惠的基础上作小小的改变。此外，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对耶路撒冷的穆斯林部分和基督教部分的责任，但耶路撒冷应该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城市。

总而言之，侯赛因和以色列一样坚决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约旦河西岸担任什么角色。根据这位国王的说法，如果要为这个阿拉伯国家收复巴勒斯坦领土的话，应当由约旦出面去进行谈判。在这以后，就可以采取民族自决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位国王显然担心他的权益受到忽视。他不会反对在其他各条战线上达成脱离接触的协议，但是，他主张在取得全面解决、即“一揽子解决办法”之前，暂缓执行这些协议。困难的问题是，战争刚刚结束之后，互相对垒的各方军队的兵力部署情况不容许我们作这样的选择。埃及的第三集团军不能继续呆在沙漠里，以色列的军队也不能继续停留在距离大马士革只有二十英里的地方，等待专门设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我对侯赛因说，脱离接触是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护约旦权益的最好办法是邀请约旦充当日内瓦会议的一个发起国；这就会使它成为巴勒斯坦人的代言人。我还扼要地向他介绍了六点计划的情况。

我们当时正在争取时间来克服这次战争所留下的各种问题，

以便腾出手来随即处理和平问题。有的时候，这是完全能做到的。但是，时间是个客观因素；它不能代替政策。就这个实例来说，正如我将要论述的，约旦可以进行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是由于以色列的（还有美国的）国内形势不妙，阿拉伯人由于激进分子火上加油而情绪激昂，还有脱离接触的进程必须进行下去。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利 雅 得

正当我在中东来回奔波的时候，水门事件也正由美国国会和司法机关作冷酷无情的最后处理。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继“星期六夜晚大屠杀”之后，紧接着正在审议八个弹劾总统的决议案。十一月五日，利昂·贾沃斯基宣誓就任特别检察官，接替了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他已要求尼克松同意，他将不会被革职，或者只有有限的独立性，除非经过指定的国会议员批准。十一月九日，当我正在利雅得的时候，有六名水门事件的被告由法官约翰·赛里卡作了宣判。

可以理解，尼克松热切地希望用实际行动表明，这些灾难都没有影响他对外交政策的掌握；的确，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成就为他应该继续担任总统的想法提供了依据。黑格报告说，尼克松对于刚刚宣布了六点协定这件事感到“洋洋得意”。他完全有权利对于由于他的坚定才办成了的事情而感到自豪——特别是面临逆境而仍能取得这些成就，更是了不起。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在外交政策方面不论取得什么样的成功也克服不了危机了；因为受到攻击的是尼克松在国内的行动，用国外取得的成就是抵挡不了这种攻击的。这一点当时在美国白宫可不是那么明确，白宫当时打定了主意，蛮有把握地认为，在我的旅行路线上每一个停留的地方

都可以设法取得辉煌的成果。继在开罗达成了协议之后，应当在利雅得设法结束石油禁运。我是十一月八日到达利雅得的。黑格强调说，结束石油禁运这件事我在旅途中绝对不要宣布；务必让人们看到，这是尼克松采取主动行动所取得的成果。因此，黑格打电报给我说：

他希望在这一个领域中所取得的进展能等到你回来以后由他从白宫宣布。关于和宣布这件事有关的事宜，正如斯考克罗夫特前些时候通知过你的，他希望尽早在下个星期就与费萨尔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会谈之后，他希望宣布在石油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

由于长时间的奔波劳累，加上在中东又受到种种互相矛盾的压力，使我的反应不能那么十分体谅尼克松真正劳神设想的这一套做法。任何一个总统都想被人看作是一次胜利的主要设计师，这是很自然的；尼克松在沙特阿拉伯又有那么高的威望，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反映现实情况的。但是，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强行实行石油禁运还不到两个星期，就要沙特阿拉伯解除禁运，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出于偶然解除了禁运，也不可能在我此行余下的时间里对这件事情保守秘密，因为我还要在沙特阿拉伯呆十天。战争刚结束不久就要邀请费萨尔到华盛顿访问，这也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这会使沙特阿拉伯的整个战略冲刺归于失败，而这个冲刺的目的就是取信于那些阿拉伯国家的激进派政权。

我给黑格打了电报：

要想现在就在华盛顿与费萨尔举行会谈，那简直是发疯。到目前为止和我谈过话的每一个阿拉伯领导人都明确地表示，要他们在事实上缓和压力要比作为一项公开的阿拉伯政策来缓和压力要容易得多。我们只有再走我们现在正在走的这条行得通的道路。向费萨尔发出邀请会被整个阿拉伯世界解释为美国的垮台。这只会更加促使阿拉伯人利用石油武器向美国施加压力，而不是减少这种压力。在和平解决过程的这个早期阶段，也不能设想费

萨尔有任何理由会愿意到华盛顿来举行友好的会谈。假若事实证明费萨尔愿意公开宣布就石油问题达成的协议的话，那我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反对意见不同意总统在华盛顿宣布这个协议。

尼克松所盼望的这个场合始终没有出现。事实证明，在利雅得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行动，因为堂堂皇皇地办事是违反这个国家的传统本身的，也是不合乎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心理的。

一九七三年秋天，沙特阿拉伯王国不自愿地硬被卷进了世界事务的漩涡。由于它的历史背景和心理背景同几乎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历史和心理背景都不一样，因此，它不得不奋力去同周围的激流搏斗。

麦加和麦地那是穆斯林世界的两个圣地。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最先是在阿拉伯半岛的严峻的沙漠和崇山峻岭一带传道的；各路大军也是从这里出发把他的教义传播到当时所知道的世界的大部地区去的。此后不久，历史的帷幕再次降落，以后的若干个世纪历史上很少记载，而是更深刻地留在居住在这块辽阔领土上的各个部族和统治者的记忆中了。因此，在这个辽阔的高原上——在那里，人们凭着他们的高尚的信仰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所必定发生过的动乱、他们所经受的苦难以及盛衰荣辱，人们便很少知道了。

今日的沙特阿拉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摆脱了土耳其人的统治才出现的。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名称是按照伊本·沙特家族的姓氏而命名的，伊本·沙特是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他把分散在阿拉伯半岛各地的各个不同的封建公国统一起来，并且凭着它们对一族之长的忠顺和对严格的清教徒般的伦理道德的宗教虔诚把它们维系在一起。沙特阿拉伯人总是处处小心提防那些不讲信义的人，对外国人抱多疑的态度。在这方面，他们和这个引人注目的地

区的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没有什么不同。埃及人所信赖的是，他们能用他们那套怀柔的办法来把外来的陌生人制服；叙利亚人则是将信将疑地认为，他们能在战斗中把外来的生客击败；但是，沙特阿拉伯人却总是想用不问世事的办法来保护他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沙特阿拉伯人总是显得那么与世无争，令人莫测高深，抱着超然物外的态度。谁也没有能力去征服一种神秘的东西，因为它的主要实质是免受政治权力方面所发生的事故的影响。就这样，沙特阿拉伯人以其神秘莫测来掩饰其脆弱，以冷漠的高傲态度来掩饰其对外来者的动机的捉摸不定。

沙特王室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它的统治下，既有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对王室非常忠诚的各个部族，又有近乎西方大都会的、住得很集中的城市人口。一个刚露头角的中产阶级，是在一种古老的和相互承担义务的半封建意识的背景下存在的。处于统治地位的亲王善于把君主制和一种协商一致的制度结合起来，让远房的皇亲国戚共同参政，可见他们的办法是很高明的。外籍工人——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埃及人、巴基斯坦人和也门人——具体数字不详，但肯定是大量的，他们在这里混居杂处，由伊斯兰教的共同纽带和对传统权威的尊崇把他们维系在一起。

沙特阿拉伯王国现在富到无法想象的程度，然而却没有能力光靠财富来得到安全，因此，毫无疑问它意识到了它的易受攻击的地位。它的统治者们老是象在做恶梦一样担心它的邻国们的贪婪会变成企图征服它的行动。由于意识到附近一些国家的命运，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们对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问题不能不抱一种既欢迎又恐惧的态度，因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可能损害他们的传统统治。当代沙特阿拉伯的政策的特点一直是小心谨慎，把一些迂回曲折的做法提高为一种特殊艺术。因为，如果这个王国奉行一种好出风头的政策，如果它使它自己成为一切争端的焦点，别的

国家就会对它恳求、威胁和讨好，这种种情况积累起来的影响可能危及它的独立或是全国的团结一致。

因此，它养成了一种时而拐弯抹角，时而坚持不懈，时而沉默不语，时而说话果断的作风。沙特阿拉伯王国一直巧妙地设法不使自己站在对抗的前列，尽管它所拥有的资源可以支持它这样做——这次搞石油禁运就说明了这一点。它一直巧妙地避免给别人这样一种印象，好象它的单方面意见是决定性的。它总是努力争取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保护自己，而对于这种协商一致意见的形成，受责备的又必定是别人——有时是伊朗国王，有时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居多数的激进派国家，有时是寸步不让的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人总是让别人先干起来，然后他们才采取行动。这真是避免受到压力的十分高明的办法，也是和这个王国的需要绝对相符的办法。

而且，这也不单纯是策略上的权宜之计。沙特阿拉伯王国不得不在某几根固定的桩子中间掌握好航行的方向，这几根航标是：和美国的深厚的友谊；对阿拉伯事业的强烈忠诚感；意识到国内的和外来的危险。要求达到目标偶而出现相撞的事，这并非沙特阿拉伯的过错。在这一意义上说，沙特阿拉伯的政策模糊不清是大势所趋，而不是它想要这样做的。

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使这个王国的统治者们统统站不住脚。绝大多数领导人出于虚荣心往往喜欢夸大他们自己的重要地位；费萨尔以下的各个亲王，不受这种虚荣心的支配，他们也没有改变这种一直保持下来的基本格局。沙特阿拉伯的那种叫人摸不透的作风既足以抵制人们对它的游说，也同样足以对付别国对它的威胁。要是听信了别人的游说，或屈服于别国的威胁，那都会意味着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愿的，这就会招致外国不断地向它提出各种恳求或要求。千方百计地设法使每一件事情都显得

不是沙特阿拉伯力所能及的事情所造成的后果，这个办法就高明得多了。利雅得根本就不是可以取得引人注目的突破的地方。

我的专机在夜幕行将降临的时候降落，停在短短几年前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高原上的一个现代化的迎宾室前面，对于这幅景象我以前是很少了解的。沙特阿拉伯外交国务大臣奥马尔·萨卡夫站在舷梯脚下迎接我（费萨尔仍然为他自己保留了外交大臣的头衔）。萨卡夫很有礼貌，善于应酬，我上次和他见面的时候是在华盛顿，那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他当时穿着很讲究的西服。现在他穿着很宽大的白袍，头带阿拉伯头饰，手里拿着念珠。他领我走在两列士兵中间，一直走到一个用大理石砌成的王家接待大厅——这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面，家具都沿着四周墙壁摆设，因此一眼望去是那幅铺满整个地板的精美的东方地毯。穿着袍子、很有礼貌的服务员给我们端来了小杯的苦咖啡。

利雅得，和巴西利亚一样，是人们有意识地把国家的重心移向内地的见证。但是，和巴西利亚不一样的是，利雅得没有国家的宏伟建筑或文物古迹可以作为中心点的象征。可见这个城市是沙特阿拉伯崇拜西方技术的产物，而又终于证明它与西方技术毫不相干。这里需要有一个整体的城市规划，但是，按照阿拉伯的价值标准，根本不看重中心规划。宏大的宫殿和矮小的房屋并存，既没有传统的古老城市的魅力，也没有现代城市的繁华景象。连一座正式的王室宫殿也没有，有的只是被选定作为国王的亲王的私人住宅，就算是王宫了。直到一九七三年为止，政府各部从吉达搬到利雅得的仍然寥寥无几，它们凑合在用水泥板盖成的临时建筑物里办公。甚至到了后来，各个部都扩大了，有时已变得很庞大，它们仍然随随便便地临时凑合，在各处设些办事处，这样就使人无法把利雅得的任何一部分说成是政府中心所在地。伊斯兰教教长和亲王们的住宅也是这个样子，这些住宅都用高高的围墙围起来，不让人

看见里面是什么样子，而且和最普通的住房鳞次栉比地紧挨着。王族毕竟是在沙漠地带中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的后裔，在石油财富大大膨胀之前是按照传统的方式过简朴生活的。

一九七三年用作国宾馆的那个建筑物（以后已改用别的房子）就是临时凑合的一个例子——作为国宾馆实在不雅观，看起来是过渡性的。经过短时间安顿下来以后，我便被领到国王的宫殿去出席费萨尔国王为我而设的招待会和晚宴——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誉。

费萨尔的宫殿十分宏伟壮观。以两名佩带着剑的武士为先导，我被领到一个非常大的会堂里面——看起来这个大会堂真有一个橄榄球场那么大。这个王国的数十名尊贵的男人（妇女照例是严格地隔离开的）一律身穿大黑袍、头戴白色头饰，坐在靠墙的一列座位上，一动也不动地保持肃静。空气中有点香味，这香味由空调设备散发到整个大会堂。国王费萨尔·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有一点点驼背，仪容庄严，他坐在一个略为升起的平台的座椅上，离我大约一百码。当我进入会堂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这么一来，所有亲王们和伊斯兰教长们都得一个个相继站起来，看上去象跳芭蕾舞似的，黑白相间，动作整齐。他朝着我向前走了一步；其余的距离就得我去走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这样向前走这一步就是十分有礼貌的表示了。我当时的主要感觉是，似乎走一辈子也走不完那一段路。沙特国王陛下和我并肩坐了几分钟，俯视下面一大群衣冠楚楚的人物，这时，我以一种诧异的心情陷入了沉思，是受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命运的主宰，使我能从一个逃脱了纳粹迫害的难民如今竟成了代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出使阿拉伯世界的使者的呢！仪式的下一项是由王室的首席礼宾官把我领到大会堂周围去介绍我和列队站着的权贵们认识，我在他们面前走过，他便把他们的姓名一个个地告诉我，我即和他们一一握手。

然后，国王领着我参加晚宴。他和我坐在与两排接连摆在一起的长桌成直角的一个主宾席上，在那长桌旁坐有穿西服的客人，在这样一个阿拉伯的环境中显得别扭得出奇，这些穿西服的客人就是陪同我的那少数几个成员，他们是闯进这清一色的优雅的大袍子当中的不速之客。那真象是一曲排练得很刺耳的交响乐。国王讲话的时候，全体肃静得鸦雀无声；而我的话音则被淹没在一片噉噉喳喳的交谈声中。这位国王讲话时一片肃静，使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讲话，它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以至许多遥远的地区会立即被认出是费萨尔的标准的讲话。这个讲话的基本论点是：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现在正在时而并行不悖地、时而纠合在一起，共同破坏我们所了解的文明世界。费萨尔大概不知道我的祖籍——或者微妙地把我当作特殊人物看待，他坚持说，必须一劳永逸地结束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这个双重阴谋。这个阴谋在中东的前哨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是布尔什维主义安插在中东的，其主要目的是要把美国和阿拉伯人分开。

要回答他的这样一种论调，真不知道应当从何说起。当费萨尔继续发挥说，现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阴谋正在试图接管美国政府的时候，我认定，改变他的话题的时机到了。我的办法是问国王陛下下一幅挂在远墙上的画，我认为这幅画是装饰艺术品。我得知，这幅画画的是神圣的绿洲——因为表现派的艺术品在伊斯兰教中是违禁的。这句失礼的话一下子使费萨尔有好几分钟陷入愁闷之中，使宴会席上的交谈完全停了下来。在那一阵子奇怪的沉默当中，我的同事必定感到纳闷，想知道我做了什么，那么快就损害了对西方的石油供应。我提到，萨达特是阿拉伯人的领袖，这也于事无补的。国王陛下愁眉苦脸的反应表明，讲阿拉伯人的团结是不能超越一定限度的。

这位国王说话总是温文尔雅，哪怕是着重谈某一问题时也是

如此。他喜欢发表含蓄的、可作多种解释的谈话，从而保护他自己，以防有人引用他的话而无法控制，以至造成难堪的局面。他掌握听众的办法是，他自己坐在会堂的正中央，让和他对话的人坐在他的右边，担任口译的人则面向他们，而双方的顾问们则并排坐在离他很远、小声说话听不见的靠墙座位上——会堂很大，实际上只有大声嚷嚷才勉强听得见——，这样他们就被有效地排除在交谈之外。他在和我谈话的时候，目光总是直接向前看，只是偶尔绕过裹着的头饰偷看我一眼，看看我是不是真听懂了他随便讲到的某一猜不透的谜语。

这一切都是我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因此，开头是难以找到作出判断的标准的。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要弄明白费萨尔国王的标准的漂亮词令倒并不难。但是在我对他有了了解之后，我认识到，他是一个具有非凡的素质的人，他有很高的智慧，很有魄力，然而却十分机智地从不显示他的实力。他善于把出于他自己的信念非做不可的事情和策略上的权宜之计结合起来，因此，他既相信他正在做的事情是对的，也做符合他的目的的事情。他的那番关于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话，不管在来访的西方客人听来觉得多么奇怪，显而易见，却是他的肺腑之言。同时，这个讲话也恰好反映了这个王国在策略上有这样做的必要性。他直言不讳地反对共产主义有助于使美国放心，这样，他声言有权保护自己不受外来的威胁（事实上，所有威胁都是由于苏联提供武器装备造成的）也就有了根据。他以恶毒的语言表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可以使激进分子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放心，这样就可以缓和一下他们总想从国内破坏这个君主政权的企图。讲话猛烈攻击的东西是非常含糊其词的，不会意味着有什么具体的后果；除了泛泛地反共之外，很少具体表明它要采取的政策。

费萨尔把宗教的激情和外交上的机敏结合起来——在他登基

当国王之前，他担任外交大臣多年，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宗教给了他内在的力量去面对沙特阿拉伯所遇到的危险，并且设法平静地克服各种危险。宗教还能使一个国家团结起来去实现现代化——尽管是忽冷忽热地搞现代化；同时也保护这个国家，不致为那些贪得无厌的国家所乘。要对付一个普普通通的政治家，并对他施加正常的外交压力，而且就中东来说，可以施加相当粗暴的压力，这是一回事。但要去讹诈一个置身于战斗之外的圣洁的人，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费萨尔享有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的声望，他既具有显赫的地位而又可以不抛头露面，在发生事端的时候，他既可以施加巨大的影响，又可以采取超然的态度。费萨尔总有办法表演一种非凡的绝技：在一场飓风中使自己刚好躲在一个无风点上，虽然他从不忘记在他的周围狂风在怒吼。这是需要有很高的技能和内心的超然之感的。

费萨尔以为人正直而著称，对此他是受之无愧的。他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人，同时又十分精明。他说话用词十分认真考究。从来不说废话，他的每一句话都有重大意义，不过脑子比较笨的人也许要捉摸一阵子才能理解到它的含义。我们感到幸运的是，费萨尔对美国保持了一种真正友好的感情——对此，我们是礼尚往来的，不过对我们的敏锐和到头来是不是那么可靠也掺杂有怀疑罢了。他十分接近在沙漠地带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的传统，主要靠个人的关系来支持他的政治行动。他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一般来说，他兑现的东西比他所允诺的还多。另一方面，在他担任高级职务的这三十年里，他所看到的美国政局的动荡够多的了，这就使他不敢把他的国家的前途毫无保留地托付给这么一个反复无常、无法预断的国家。因此，他总是不轻易下赌注，只要有可能他把赌注押在美国身上，但如果他认为那样做会危害沙特阿拉伯的利益时，他就不押了。他尤其了解他自己国家的弱点。他

从来不想充当调解人，因为他深信，尽管它很有钱——也许正是由于它很有钱——沙特阿拉伯要是充当一切危机的正式的仲裁者，那它是担当不起的。

当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的时候，我发现，对费萨尔来说，似乎是自发地采取行动要比应别人的请求采取行动更容易一些。那样会提高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他可以老老实实地说，没有人向他请求过援助，因此，也没有允诺过什么东西。这样也不会使他不能独立地采取行动——看起来象是全然自愿采取的行动——来支持我们的目标。这么一来，他就用不着向他的兄弟汇报说，这是向美国人承担的义务，或作出的允诺。我总是想办法保证把我们谈判的详细情况通报给他；我常常在利雅得停留以便亲自向他通报。在那头几次会谈以后，我从来不提具体要求。但是，我常常通过其他渠道发现沙特阿拉伯助人为乐的足迹，这个足迹是那么轻巧，一阵风就能把它刮得无影无踪。

费萨尔国王所表演的是一种绝技。在他的领导下，他的国家被人们认真看待，但它保留了确定扮演什么角色的权利。不论他是否有意，由于他利用石油武器使沙特阿拉伯在世界事务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使世界经济发生了一场革命，并且打乱了世界力量的平衡。但是，他总是能够想法把这场革命说成是不得已才十分痛心作出的决定，是别人的贪得无厌和这个地区的无法控制的感情冲动迫使他采取的行动。

如果把沙特阿拉伯的政策理解成该地区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形成各种力量的原因，这种看法是对的。如果说政治家的作用是在惊涛骇浪的茫茫大海中当掌舵人的话，那么，费萨尔总是能够十分巧妙地把他的那一叶扁舟迎风驶去，而仍能安然无恙地脱离险境——想到他周围的各个国家的命运，这可真是了不起的成就啊。

晚宴过后，当我和费萨尔坐下来会谈的时候，所有这些倾向都出现了。他和萨达特不一样，他不是善于采取引人注目的主动行动的人；他的伟大之处是藏而不露的。我需要他的善意来进行我们在中东的外交活动，因此，我想使他相信，石油禁运是对我们两国关系的严重打击。会谈中的两种打算——我想要他理解的东西和他准备承认的东西——并不总是一致的。我们象两个摔跤运动员那样，在交手之前小心翼翼围着对方转圈，仔细看着对方的一举一动，但直到末了，却始终没有超越这一初步阶段。

我解释了我们的中东战略，内容和我向萨达特说明过的大体上一样，只是省略了策略上的细节。费萨尔对我当时谈的东西是理解得很透彻的；他的表情说明他是注意和同情的。但是，他所说的话——这些话无疑会传到其他阿拉伯领导人那里，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是冠冕堂皇地重申全面解决方案是和我们的战略不相容的。和以色列讲和是可能的——费萨尔承认这一点是很不寻常的，但他立即作了补充说明，他说，讲和的条件是，以色列撤退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线，并使全体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一百多万阿拉伯人涌进一九六七年以前的以色列。费萨尔阐述了他想要成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巴勒斯坦，必须经过协议成立一个由犹太教徒和穆斯林教徒混合组成的国家”——换句话说，恰好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纲领。我顶了他一句说，这是不可能的。费萨尔机灵地回答说，“一旦以色列看到你们不再保护它，不再拥抱它，它就会立即撤退的。”他是国王的身分慢条斯理地说这句话的，但是，也是毫无灵活的余地的，仿佛费萨尔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制定原则，而不是怎样具体行动。费萨尔针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只是表明一种态度，而不是提出一个方案。

当我们谈到石油问题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在尼

克松的催促下，我很想说服费萨尔解除或放松石油禁运。当时我对石油定价的那个复杂过程不太了解，不然的话，我会认识到，沙特阿拉伯削减石油产量是比石油禁运更危险的一着，因为削减产量会严重地影响世界的石油供应，从而为石油价格暴涨提供了前提条件。我对这个问题不了解在当时也没有起什么坏作用。费萨尔对石油定价的那套复杂办法确是很了解的，因此他明确地表示，一旦解除石油禁运，他就会增加石油的产量；他甚至表示，他是“十万火急地想要尽可能快地办这件事的。”不幸，沙特阿拉伯当时处在一种“很为难的”境地；它需要证明已取得具体进展，然后它才能向其他阿拉伯国家提出把石油武器收起来的建议。正是由于费萨尔是美国的朋友，他才不能单独地采取行动。

既然从地缘政治方面不能说服他，于是，我便从心理上来向他做工作。我说，受到一个朋友的压力是痛苦的事。要是屈服于这种压力，那是不体面的。费萨尔却反过来从心理上向我做工作，他坚持说：“我吃的苦头甚至比你们还多。”他暗示说，那种紧张劲真可能使他得精神分裂症。我争论说，我们总不能在众目睽睽下向讹诈低头就范。费萨尔对此也毫不示弱。他赞赏我的“正确的”解释，但不幸的是，石油禁运的决定是全体阿拉伯人联合作出的，沙特阿拉伯无权自己处理问题。“我所需要的是某种东西，我好拿着去找我的同事们，敦促他们同意这样做。”

我试图走妥协的道路。如果说，沙特阿拉伯的确不准备解除石油禁运的话，也许它能在执行禁运当中放宽一些。费萨尔十分赞成来个妥协办法。他说，也许双方愿意同意这么一个折衷的办法，即如果我们不能促使以色列放弃它所征服的一切东西并容许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可否以美国向以色列提出要求的方式把这一点作为一个目标宣布。我婉言拒绝了 this 个妥协办法。

我们俩庄严地跳完了这场小步舞，但两个人的步调始终不和

谐。费萨尔始终没有让作记录的人记下什么东西。

虽然如此，当他陪着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为我们的外交表示了祝福之意，而这正是我们在进行了几个小时的复杂的会谈中所求之不得的。他做得非常神秘，当时已没有人在场为他作记录，可是亲王们都听得见，他所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仿佛是事后才想起来的，或者象是一种表面的客气话：“我们向全能之神祷告，恳求他继续使你的所有这些崇高的努力获得成功。恕我对阁下说话十分坦率，因为我敬重您的经过考验的能力和智慧。”费萨尔说的话都不会是废话；既然他说我们的循序渐进的解决办法是“崇高的”，那他就是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的政策，虽然他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支持的。而且，他当时——当着他的高级顾问们的面——对我说的这些话并不仅仅是客气话，或奉承我的话，那是他个人表示赞成的话，尽管我所信仰的宗教和他的不一样。

由于费萨尔不能十分肯定我已理解了他那番话的真意，在我和这位国王的会谈结束之后几分钟内，有两个人相继到宾馆来拜会我。第一个是当时任内政大臣的法赫德亲王。人们普遍地认为，法赫德在这个王国是仅次于费萨尔的铁腕人物。到后来，我对法赫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才知道，这位国王的同父异母的兄弟说话办事不那么拐弯抹角，但是，却和费萨尔一样老谋深算，一样机智。他是我们国家的好朋友。我和国王会谈的时候他在座，因此，不论是从他本人的信誉来说，还是从当时的场合来说，都是能够申明国王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不愿意明确说出的一切。这次会谈的记录不公开宣布，因此，不用向整个阿拉伯世界分发。法赫德说：“我赞赏地”

听取了那么你那么精辟地向国王陛下说明了美国的困难，特别是那些不了解美国的人不会明白的那些特殊困难。

我愿意向阁下保证，在你明确定下来要走的那条道路上，我将是愿意助

你一臂之力的人中的一个……

当我们在听阁下简要地介绍你们已经采取的步骤的时候，我们是感到放心的，同时，我也不能不感到会有良好的效果。我们也估计到，事情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都办成，而是必须一步步地来，但是，也还是要从速办理。

这是王室对我们循序渐进的做法的一种认可，是投了非常宝贵的一张信任票。法赫德接着保证尽他的最大努力去排除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关系上的障碍，其中包括石油禁运。他不久就要去访问美国，以显示沙特阿拉伯的友谊。

当我在宾馆门口和他道别的时候，奥马尔·萨卡夫——他也参加了我和王室的会谈——已经在那里等候着要见我，他的来访也没有公开宣布。他显然也是奉国王之命前来更加开诚布公地说话，因为在正式会谈中是不可能这样做的。萨卡夫担心我会由于理解不到国王谈话中所包含的真意而感到气馁。他直言不讳地说：“就我所能理解到的情况来说，你们二位处境都有困难。但是，这毕竟是朋友之间的困难。你将会看到结果的。”他说，沙特阿拉伯人赞赏我的努力；要是没有萨达特，受到苏联保护的阿里·萨布里就会取而代之。我说，“如果阿拉伯人当中的激进分子用苏联的武器取得了胜利，那么你们自己就会受到威胁。”萨卡夫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在研究中东的各种趋势，他同意我的这个看法。他以委婉的措辞说出了阿以问题的实质：“双方都需要明白，对方并不想杀害他们。现在是一种恶性循环在那里作怪。”萨卡夫和法赫德一样，向我转达了沙特国王的殷切希望，希望我继续执行我的使命。这么一来，就使这个王国同我的使命的成败有了十分密切的利害关系。它不会在我的路途上设置障碍；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会帮忙的。

正如沙特国王已经对我说过的那样，萨卡夫告诉我说，叙利亚殷切希望和我建立最高级联系；这就是说，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

阿萨德建立联系。我告诉他，我一回到华盛顿就和阿萨德联系。我知道，这样就使萨卡夫有机会在我和大马士革取得联系之前，他先向他们通报这件事，这样就使他能够既为我到那里去铺平道路，也为沙特阿拉伯王国获得某种声誉。

我的十一月的中东之行标志着中东战争的真正结束。我此行使停火稳定下来，也使紧接着战争以后的分界线定了下来。十一月十四日，埃及和以色列便在101公里处制定了执行六点计划的详细协议。在所有这些谈判中，我们一直是大力协助的。我们正在逐步地取得这样一个地位：我们的支持是取得进展所必不可少的，而苏联从中捣乱的能力则正在逐步遭到削弱。我们现在可以集中力量去进行下一个步骤了——召开日内瓦会议，规划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但是，在这样做之前，我们首先还得在外交的棋盘上移动其他一些棋子。

① 威廉·B·匡特著：《决策的十年：美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六年》（柏克莱市：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第二五一——二五二页；爱德华·R·F·希因著：《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和基辛格：美国在中东的外交秘史》（纽约：《读者文摘》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可随意翻阅各页。

② 《白宫岁月》，第一二四六——一二四八页和第二十八章的注③和注④，第一四九三——一四九四页。

③ 理查德·瓦莱里安尼著：《和亨利·基辛格一道旅行》（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一九七九年版），第二四九——二五一页；马文·卡尔布和伯纳德·卡尔布合著：《基辛格》（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一九七四年版），第五〇五——五〇六页；约翰·P·沃利奇：《既是旅游者……外交家……又是谈判代表的基辛格先生》，载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波士顿星期日先驱广告报》，第二十四页A。

④ 迈尔斯·科普兰著：《各国的游戏》（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一九六九年版），第一七七页。

⑤ 安瓦尔·萨达特著：《寻求个性：自传》（纽约：哈泼和罗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版），第二二八——二三一页；《白宫岁月》，第一二九五——一二九七页。

⑥ 马文·卡尔布和伯纳德·卡尔布合著：《基辛格》，第五〇九页。

⑦ 希因著：《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和基辛格：美国在中东的外交秘史》，第五十一——六十一页。

第十四章

波斯湾插曲

离开利雅得以后，我访问了伊朗、巴基斯坦、中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对解决中东当时的危机作用较小，但对我们设想的一个安全而且比较太平的世界却很重要：伊朗是保持波斯湾平衡的关键；巴基斯坦是我们一直力图维护其独立的老朋友；中国对全球均势是必不可少的；日本则是我们联盟体系的一个主要支柱。（北京和东京之行将在以后几章中讨论。）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我们到达访问的第一站——德黑兰，去会见三十七年来一直是美国盟友的伊朗国王。时间和伊朗人民对这位国王是无情的。美国及其盟邦后来对他的态度也是丢脸的。它们不仅政治上抛弃了一个朋友（这可能是国家利益的残酷要求），而且从人情上说，在这个朋友到处漂泊找不到避难的地方、因此需要援救的时候对他视若无睹。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就伊朗国王的遭遇而言，胜利者是残忍的。

关于美国同伊朗国王的关系存在许多错误说法。它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美国支持这位伊朗领导人是出于个人友谊或对专制统治者的偏爱。实际情况则比较复杂；一种关系能够在分属两党的八位总统执政时期都得到蓬勃的发展，必然有比个人癖好更为深刻的原因。美国同伊朗的友谊反映的并不是个人倾向，而是地缘政治的现实。伊朗本身的重要性无法用两国领导人的个性来加以解释。伊朗位于埃及和中国之间，具有最悠久的自治历史。它本来可能成为沟通苏联和阿拉伯中东地区的陆上桥梁；在伊朗国

王统治下，它却成了保护易受伤害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使它们免受苏联扩张主义和中东动乱压力的屏障。工业民主国家进口的石油中，百分之四十以上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海峡沿岸无可争议的最强大的国家。伊朗每天生产石油的能力也大大超过六百万桶（最高曾达到八百万桶），是世界石油供应的一个重要来源。一九七九年伊朗国王被推翻以后，伊朗石油减产曾引起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并不需要所谓偏爱独裁者或个人魅力等复杂理论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美国总统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吉米·卡特都确认美国同友好的伊朗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

好处也不是单方面的——否则两国关系不可能延续这么久。无论继伊朗国王上台的那些被引入歧途的狂热分子怎么说，从历史上看对伊朗独立最严重的威胁并非来自八千英里外的美国，而是沿着传统的入侵路线来自北面贪婪成性的苏联和西面企图取消半个世纪以前强行规定的边界线的伊拉克。谨慎的伊朗统治者必然认为依靠位于两个大陆之外的国家要比依靠一个从来不承认周围任何国家拥有真正独立的邻邦更为安全。而美国感到幸运的是：这个人口最多、从潜力来看是最强大的波斯湾国家并没有赶时髦去奉行一种同反对美国越来越难以区别的不结盟路线。

伊朗国王是一位精明的外交政策分析家。他把伊朗的安全建立在同美国结盟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超级大国之间采取模棱两可的玩弄权术的方针。与此同时，他看到英国已经从波斯湾撤走而美国已陷入东南亚的泥淖，从而预见到伊朗还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力图实行现代化，发展经济，目的是使自己的统治得到人民的支持，并且使伊朗有能力承担它应负的防务责任。他认识到：在出现严重的紧急状态时，如果伊朗能够自力更生地抵抗来自本地区的威胁，甚至能够迫使苏联——如果他们决定威胁伊朗的话——扩大冒险范围、以致彻底暴露自己的意图，伊朗得到外来援

助的可能性会更大。

后来，当我们的利益已经无法挽救时，美国有些人为了驱除自己的内疚，越来越时兴地谴责尼克松一九七二年决定向我们的盟友出售先进武器，认为这个决定造成了伊朗的毁灭。这种批评似乎使两个根本不同的、在其他方面存在严重分歧的集团走到一起来了。一个集团是新保守派，其中有些人不久前还反对美国在国外承担任何军事义务，而现在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尼克松主义”具有根本性缺陷。既然伊朗和其他遭受威胁的国家任何时候也无法拥有自卫的能力，我们早就应该懂得只有在波斯湾派驻美国军队才能建立必要的安全保护伞。^①其他人则采取了与此相反、而且更为流行的理论，用自由主义那一套陈词滥调大谈贩卖武器的罪恶以及伊朗国王的所谓镇压。从历史和地理角度来看，这两种说法都毫无意义。

因为尼克松一九七二年面临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际问题。一九七一年底英国撤出波斯湾之后，伊拉克和苏联在一九七二年四月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结果使现代化军事装备大量涌入当时最激进的那个阿拉伯国家。为了防止伊拉克在波斯湾取得霸权，我们如果不增加美国的力量就得加强当地部队的力量。美国急于把越南置诸脑后，加上后来保守情绪的重新高涨，都使人们忘却了当时那种精神状态。那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必须降低卷入国外事务的程度——甚至保守派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实际上还是支持的。国会对每一项军事预算都大加砍削。我们想在迪戈加西亚岛建立我们在印度洋的唯一军事基地，也受到国会不断的攻击。只有把这个基地称为支援设施，并明确放弃在岛上建设重型轰炸机机场的要求，才能得到拨款。在岛上驻军是明令禁止的——而迪戈加西亚距离伊朗海岸还有两千英里。美国想独自建立令人信服的、保卫波斯湾的军事能力，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会有极大

的、可能是无法克服的实际困难和后勤补给困难——正如我们现在发现的那样。一九七二年我们面临的抉择是：要么帮助伊朗自己武装起来，要么就得容忍一种危险的真空状态。尼克松主义也从来不希望任何国家可以单独对付一个超级大国的进攻；它明确提出要援助遭到一个核大国——这是对苏联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进攻的、愿意保卫自己的盟国。^②几十年来，伊朗在国王领导下对该地区的稳定和国际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我们的接班人奉行比较明智的政策，伊朗国王——或与他观点相同的集团——可能继续起这种作用。

对我们的政策还有另一种批评，认为我们的错误不是决定武装伊朗国王，而是给了他一张“空白支票”，使他可以毫无限制地购买武器。这种说法是故弄玄虚；根本不存在什么空白支票。尼克松是因为伊朗国王要求购买新的先进飞机——F-14 或F-15 型飞机——才做出这个决定的。五角大楼虽然没有正面反对尼克松的决定，但却拖着不办。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部分是由于它宁愿出售一些日益过时的装备，部分是由于它希望增加我们自己的储备。尼克松一九七二年五月访问德黑兰时，伊朗国王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他可以不买美国飞机而去买法国飞机；法国飞机的性能同美国飞机差不多——如果说稍微差一点的话。尼克松原则上同意出售F-14 或F-15 型飞机。他回国后发出了相应的指示。针对这个指示，国防部提出了反建议，要求伊朗国王暂缓就购买飞机问题作任何决定，待两种飞机都取得运行经验以后再说。虽然F-14 型飞机一九七三年即可准备就绪，F-15 型飞机则要等到一九七六年或一九七七年，也就是说，要把作出决定的时间推迟四年。为了制止这种拖延，尼克松命令他们把购买飞机的类型和时机问题留给伊朗政府自己去决定。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就是人们经常引用的那个指示的含意。指示最后还附带提出了一点一般

性意见，即五角大楼不要试图去改变伊朗选择何种装备的决定。

无论如何，只有对我国政府的工作过程毫无所知或急于在辩论中赢得几分的人才会认为，尼克松这个指示在水门事件和总统辞职以后还继续有效，并且对后来两届政府的全部决定起了推动作用——事实上，百分之九十的重要军火交易都是在后两届政府当权时进行的。福特和卡特这两位总统后来批准的军火交易比尼克松当权时批准的规模大得无法相提并论；我怀疑他们可能根本不了解尼克松曾经有过那个指示——我自己就忘记了。他们鼓励伊朗国王增加军事力量和尼克松批准第一批武器交易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这种交易符合美国、伊朗以及保持海湾地区稳定的压倒一切的战略利益。（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派他自己的代表常驻伊朗，处理伊朗的武器要求。）这种战略判断的价值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伊朗国王逝世后，革命的伊朗遭到用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伊拉克的进攻（当伊朗同美国的联盟完整无损时，这种攻击是无法想象的），亏得有了曾受到过辱骂的美国武器救驾，才幸免于难；扣留美国人质的伊朗政府不时还要求美国提供零件，作为释放人质的一个条件。

十年以后回顾起来，可以说伊朗国王的垮台同他购买军事装备几乎毫无关系。其实，如果美国在动乱开始的时候采取不同的方针，伊朗军方权势集团本来有可能在君主政权瓦解时成为同激进主义抗衡的政治力量。促使伊朗国王垮台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他效法西方的政策：使封建的伊斯兰社会现代化和迅速发展经济——在伊朗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发展的部分远远超过购买军火的费用。伊朗国王刻板地看待西方学术界的一些理论，认为经济成就落后于期望是造成政治不稳定的原因。按照这种理论，在“日益增长、变化的期望”得到满足时，几乎自然而然地会出现政治上

的稳定。西方自由派的格言使伊朗国王想要按照凯末尔*的改良主义模式建立一个世俗的现代化国家，把工业化硬塞给一个几乎还没有脱离封建时代的人民。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似乎搞得很顺利。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逐年增长。它还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公共教育和妇女权利，鼓励工人分享利润，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带来学院派理论预言的政治安定。工业化使农民背井离乡、流入拥挤不堪的城市，使他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感到漂泊不定，没有着落。由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同欧洲历史上相应阶段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个阶段要求在管理国家方面起更大作用。教育的发展带来知识界的骚动，使激进主义具有了吸引力；它同伊朗国王实行的那种专制君主制度肯定是互不相容的。促进现代化的西方文化影响冲破了伊朗闭关自守的文化堤防而泛滥起来，压倒了伊朗的宗教传统和社会传统。漂泊的人群、新兴的权贵、正统派人士以及精神上流离失所的人从完全不同的、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动机出发，汇成一股充满疯狂报复性的浪潮，摧毁了伊朗国王的统治。

但是报复什么呢？当然，伊朗国王朝廷里存在贪污腐化现象，尽管按照波斯湾地区的标准、甚至按照继任政权的标准来看这些现象并没有达到不寻常的程度。伊朗令人恐惧的秘密警察“萨瓦克”组织的暴行，即使去掉大量夸张成分，也是无法宽恕的。**毫无疑问，伊朗国王由于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因此无法了解他的经济成就造成的新的政治现实是不能用镇压手段来对付的。但是，

* 凯末尔（一八八一——一九三八）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和第一任总统。
——译者

** 在革命政权统治下，“萨瓦克”组织换了新的名称和新的主持人，但仍在行使权力。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他的失败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波斯湾地区其他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所作所为带来的严重后果——而这些国家却并未受到嘲骂。当时发生的任何情况都无法同后来出现的具有政治迫害性质的审判、处决、恐怖和疯狂行为相提并论——这些行为的血腥程度和法律上的虚伪性都使人想起罗伯斯比尔*最恶劣的暴行。

合理的不满以及对现代化概念本身、对伊朗国王作为奉行温和路线的世界领导人的作用开始增长的愤恨情绪加在一起推翻了这位国王的统治。人们讨厌伊朗国王，更多是由于他做对了而不是由于他做错了。他是被仇恨改革和仇恨西方的人打倒的；这些人仅仅反对以世俗原则为基础的专制统治，而不是笼统地反对专制统治。直接的胜利者并不是开明的、信仰自由民主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伊朗社会中最反动的集团——把人类尊严和古代道德宗教法规、而不是和自由进步视为一体的宗教领袖们。他们实际上等于发表了一篇独立宣言来反对由于世界进步而造成的使人类日趋一致的全部文化影响，反对共产主义和西方的各种外来理论；他们认为现在的世界代表的是缺乏根基的、使人堕落的一致性，因此要设法寻找特性和信仰。

七十年代也有人对我们的政策进行了正当的批评，指出我们没有看到这种近乎玄奥的对现代化的反抗。我们曾经因为忠于伊朗国王而受到批评——虽然对一个国家来说，坚定不移地支持一个盟友并不是最糟糕的罪名。但是我们之所以陷入盲目性不仅是由于这种忠诚。西方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概念——这是对伊朗国王垮台表示幸灾乐祸的那些批评家习惯开的药方——也是使我们盲目的原因之一。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离开德黑兰时我曾对

*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一七五八——一七九四）是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中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译者

随行记者说：从历史上看，伊朗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导致革命。但是我当时不过是臆测，因为我立刻指出：十分迅速的发展速度造成的势头看来可以克服工业化带来的政治危险。我错了。事实上，这种现代化速度加快了政治动乱的出现。一九七六年表面的安定具有欺骗性。在我离职两年以后，出现了爆炸性局面；德黑兰和华盛顿的拙劣反应促成了这场悲剧，摧毁了二十年来伊朗国内的成就——也摧毁了曾经为波斯湾和平事业服务的国际纽带。

但是问题不仅是简单地承认错误。假设我们当时了解这种危险，美国应当提出什么建议呢？我们有什么政治理论可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改造吗？我们懂得在封建宗教社会里如何使权威和自由、自由和无政府状态保持均衡吗？有人认为：如果加快实行自由化就可以挽救伊朗国王；如果采取措施实行代议制民主、使更多人参加政治活动，就可以消除压力。说一说是容易的。即使不谈我们是否有权力采取这种措施，这些“开明的”药方本身就可能加快灾难的到来。伊朗国王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对这种西方观念毫无兴趣的集团。他的真正死敌是社会特权受到剥夺的封建保守集团和激进的左派分子。这两种人对代议制民主都丝毫不感兴趣。事实上，在打倒国王以后，他们就镇压了鼓吹民主制度的少数人，然后又用相互消灭的办法解决他们自己的纠纷。

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实行代议制民主要求社会具有内聚力，而这是许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无法达到的。在政府是维系社会的主要纽带的地方，人们对反对政府和破坏权威以及破坏国家往往不加区别、甚至不可能加以区别。伊朗的革命领袖显然不是一个具有改良倾向的民主派，而是一个满腹怨气的反动派。他一上台就捞取了远远超过伊朗国王的独裁权力。

事实上，我们对如何引导发展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自然力缺乏明确的概念。自由民主思想是在基本上属于贵族和资产阶级性质

的社会里经过几百年发展才形成的；西方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普遍实行普选制。（甚至在美国，迟至一九一三年，参议员还是通过间接投票选举的。）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少数派有机会成为多数派；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不会遭到毁灭。但是，在部族、宗教或种族分歧根深蒂固的国家，在人们除了都曾遭受殖民统治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经历、而现在却硬把他们置于同一个国家统治之下的地方，情况是不同的。强制群众参预政治更有可能导致极权主义，而不是导致民主。列宁主义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有吸引力，并不是因为它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显然已经失败），而是因为它为保持官职提供了合法的依据——说到底，独立运动的多数领导人首先就是为了当权才参加政治活动的。这是当代的一个讽刺。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既不能抛弃自己的价值观念，又没有学会如何建设——至少在早期阶段——能够承受发展带来的政治考验的体制。

美国在波斯湾有许多传统的朋友今天都和我们一样面临这种令人困惑的局面。我们知道他们在国内的基础很不稳定，但是对如何加强他们的基础缺乏明确的见解；支持这些在位的统治者对我们的国家利益诚然十分必要，但肯定不符合民主的理论。在波斯湾地区，如果抛弃友好的独裁政权，敌对的极权主义政权就会取而代之。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试图移植过去的政治概念，照他们看来，基本上只能起破坏社会团结的作用；如果他们别无他策，他们很可能宁愿同席卷该地区的激进潮流设法妥协。这个难题现在仍然是对美国和西方政治思想提出的最令人伤脑筋的挑战之一。

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那一天，在中东所有国家中，这类想法似乎同伊朗最沾不上边。我在德黑兰停留既有象征性意义也有实质性理由；所谓象征性就是为了着重强调我们对美国和伊朗关

系的重视，从而阻止贪婪的邻国采取冒险政策；从实质方面说，我们想要了解伊朗国王对世界事务、特别是中东局势的分析。我首先还要对伊朗国王在过去一个月的危机中给予我们的坚定支持表示感谢。

我们应当大大感谢伊朗国王在十月战争期间表现的始终不渝的忠诚。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曾经容许苏联通过它们的领空向中东空运物资；伊朗国王却坚决予以拒绝。他基本上是同情萨达特的，但并没有对我们施加外交压力。他不断把他所了解的阿拉伯人的意图告诉我们，而且愿意为我们从中奔走——只是由于萨达特同我们有直接联系，所以这个任务就不太必要了。最重要的是，他拒绝同波斯湾其他产油国一起对我们施加压力。伊朗没有参加阿拉伯石油禁运，也没有削减石油生产。禁运和减产一开始就引起了惊惶失措的情绪，接着造成了石油短缺，最后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尽管其他国家应该对石油涨价负同等的、甚至更大的责任，篡改历史的学者们却还要把罪名加在伊朗国王头上。）*他继续向以色列供应石油。当我们把航空母舰特遣舰队派到印度洋去时，伊朗没有讨价还价就给舰队提供了燃料。它如果采取敌对态度，就会使我们无法进行曾经帮助我们渡过危机的那些外交活动；它如果漠不关心，我们的任务也会大大复杂化。我一直认为我有责任提醒大家记住伊朗国王对美国、对自由的人民所做的这些贡献——特别是在他后来命途多舛的时候。

如果世界注定要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的话，飞机场将成为这个村落进行交流的市场；现在的机场大楼已经既没有文化特点也没有民族特点了。德黑兰的麦赫拉巴德机场里金碧辉煌的王家

* 见第十九章。

大厅除了铺在地上的精美绝伦的波斯地毯外，同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贵宾接待区毫无二致。我们在大厅里仅停留了几分钟，同德高望重的外交大臣阿巴斯·阿里·哈拉巴里寒暄一番。他陪同我和理查德·赫尔姆斯大使前往德黑兰郊区的王宫。同往常一样，外交大臣把我们领到国王书房门口就走了，没有参加我们同国王的谈话。他从来都不参加这种谈话。实际上，他的地位更像礼宾司长而不像伊朗的外交首脑；他负责迎接级别低于国家元首的客人，以伊朗代表身分出席不值得国王亲自关怀的会议。但是全面掌握外交政策的权力则保留在国王自己手里。我不厌其烦地讲这么多细节的原因是：在发生革命以后，这位举止完美、与世无争的庭臣经过不到一小时的荒谬的审判就被毫无道理地处决了。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同往常一样，态度谦和而矜重——这种态度包括三个同等重要的因素：腼腆；意识到我们在礼宾上属于不同的级别；对帝王应有风度的认识。这是他那位在二十年代篡夺王位的、作风粗率的哥萨克父亲给他灌输的；但是人们从来没有感到伊朗国王喜欢这一套。他的教养迫使他处于孤独状态；当他过流亡生活时，四十年来一直追求他的恩宠的人几乎全都冷酷无情地抛弃了他，使这种孤独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伊朗国王对总的战略形势的分析十分精到。他认为奉行激进方针的伊拉克将被人利用，成为攻击该地区一切持温和方针的亲西方政权的急先锋。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伊拉克还不是苏联卫星国，但它一旦用苏联武器充分装备起来就会威胁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亲西方政府，从而为苏联的意图服务；与此同时，它还会对约旦、甚至对叙利亚施加压力，因为叙利亚虽然倾向激进派，但还远不是苏联的傀儡。苏联将力图使伊朗处于受阿富汗和它保护的伊拉克两头夹攻的地位。在喀布尔最近发生的革命中，一位新的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取代了阿富汗国王。这次革命使伊朗国王特别忧

虑。它是具有明显亲苏倾向的军官领导的，为将来的动乱播下了种子。达乌德的革命很可能是更激烈的动乱的预演——事实说明这是一个很有先见之明的预测。尽管达乌德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他追求的目标却会破坏该地区的安定，这就很容易为苏联的意图服务。阿富汗要求收复原有领土的方针，目的是煽动巴基斯坦和伊朗边境地区心怀不满的种族集团（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这个方针可能导致一种钳形运动，其实际结果将使苏联势力更靠近印度洋。伊朗国王将在我们的法律允许他使用美国武器的范围内尽量支持巴基斯坦。我们必须努力防止肥沃的新月地带——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沦于巴格达统治之下。他将支持伊拉克国内库尔德人的叛乱，并在边界附近保持一支大部队，使伊拉克无暇他顾。

尽管伊朗国王对萨达特充满同情，他仍然认为以色列是本地区的战略关键。它使叙利亚或伊拉克不敢对约旦采取军事行动，因此间接地维护了约旦的独立。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也保证了黎巴嫩的独立。照伊朗国王看来，以色列对总体安全的贡献具有战略意义，不幸的是它的外交政策却不够明智；以色列的生存归根结底得依靠奉行温和方针的阿拉伯各国政府，但是它在外交上毫不退让的态度却使这些政府的立场复杂化，并可能削弱美国的影响。伊朗国王赞扬我们在中东战争期间的表现——特别是使部队保持警戒这件事。他欢迎我们同埃及重归和好。我向他通报了六点计划的内容。他认为萨达特最有希望使局势发生温和的、和平的转变。美国应当尽最大努力去鼓励他。

我强调指出：阿拉伯石油禁运和削减石油生产使我们处于非常难办的地位。我们准备对阿拉伯国家合理的关切作出响应；但是我们决不会使任何人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可以利用所谓石油武器强迫我们做出我们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做出的决定。激进国

家的压力是徒劳无益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掌握在美国手中——证明这一点对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的所有朋友都是有利的。如果我们放弃这一立场，一切外交成就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只能鼓励进一步讹诈。伊朗国王表示同意。他答应向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做工作，要它们结束石油禁运。几天之后，他就按照自己的诺言派了一位使节到沙特阿拉伯去，并且给萨达特去了信。

我同伊朗国王的谈话说明伊朗和美国的关系在国王执政时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当然，他的某些分析的出发点是自我利益，是为现行政策提供理论根据。但是自我利益无损于分析的准确性。波斯湾和印度洋的风暴正是亲西方的伊朗垮台引起的，而且直到作者执笔时尚未平息。

人们应当把伊朗国王和他的国家的遭遇永远引为鉴戒。它说明简单的答案是不存在的。希望世界比较太平的人必须对这个世界的性质有所了解。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必须懂得正义不仅是发泄怨气。一些友好国家的稳定对我们的安全是重要的，我们对它们的政治演变必须考虑更周到一些。就这个问题来说，我们或许还可以从那场代价巨大的悲剧中汲取教训。

我们在友好的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过夜。巴基斯坦性情容易激动的领导人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后来的结局也很悲惨，但并没有改变我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的人，办事冷酷无情而又才华横溢。他的邻居伊朗国王之所以垮台是因为他把个人专制保持得太久了；布托则因为过分急于得到人民委托，又要操纵选举结果，从而使自己走向毁灭。他如此任性的做法很可能是想提高自己的声誉，赛过他所痛恨的对手、刚刚在印度颁布法令实行“紧急状态”统治的英迪拉·甘地夫人。但是也必须指出：布托的傲慢所反映的他对自己才能的估计是公平合理的。在

他参予社会生活的整个时期，他在思想意识方面能够很巧妙地——有人或许会说是机会主义地——随机应变。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在一九七一年印巴战争使巴基斯坦遭到肢解、使它的东半部分裂出去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孟加拉国时，我也亲眼看见他如何把自己的国家从一次摧毁性失败中挽救出来。在那个悲惨的时期，布托的行动表现了引人注目的信心和智慧。他后来一直是美国的坚定不移的朋友。

人们曾经从不同方面指责布托“软弱”——一会儿说是对苏联，一会儿说是对中国。我从来不怀疑他是能同任何国家接近的，只要他认为这个国家能为巴基斯坦的民族利益服务就行。事实上，在一九七〇年以后，努力加强同它曾经帮助撮合的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往是最符合巴基斯坦利益的。巴基斯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这两个国家都保持盟国关系。但是，如果说这个事实使巴基斯坦得到颇为可观的外交支持的话，它也增加了巴基斯坦处境的危险性。因为苏联要向印度洋推进，而印度对一九四七年的印巴分治又怀恨在心，巴基斯坦很容易受到这两方面的压力。它的强有力的朋友对它的感戴要化为具体措施也并非易事。美国国会不肯批准给予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也不同意伊朗把美国供应的军事装备转给它。中国则缺乏提供大量军事物资的工业基础。在我任职的整个时期，我们在维护巴基斯坦独立方面碰到的困难是说明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内各种障碍相互矛盾的最好的例证。我们充分意识到巴基斯坦的重要性，然而国会每次开会都使我们深深认识到我们无法提供按照我们的分析应当提供的援助。我们设法搞成了一次数量微乎其微的一揽子军事援助，从而实现了约翰逊总统五年以前许下的诺言；此外，我们还安排了许多虚张声势的会议来实现肯尼迪总统十年以前做的一项保证：证明美国对巴基斯坦独立受到的威胁并非无动于衷。水门事

件时期，我们不得不利用各种杂乱无章的权宜手段来拼凑一个总的战略方针。

布托对苏联战略的分析同伊朗国王的分析相去无几。他也担心阿富汗新领导人达乌德会在苏联鼓动下打着普什图和俾路支自治的旗号攻入巴基斯坦，并向印度洋推进。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达乌德确已开始执行这个方针，但是当他意识到苏联从背后威胁着阿富汗本身的独立、因此再想得到更多领土已毫无意义时，他又逐渐缩回去了。从那时起，达乌德就停止了他对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恶作剧，并开始小心翼翼地走向真正的不结盟。作为他这种放肆行为的代价，他在五年后一次共党政变中丧失了生命。这时，苏联的阴谋也完全像伊朗国王和布托预言的那样展现出来。

对于美国人来说，亚洲的南沿——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可能是一个遥远和陌生的地区，但它却是世界安全的枢纽之一。在我一九七三年访问之后不过几年，它就变成了一个动荡地区。从伊朗革命到苏联入侵阿富汗、再到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事态的发展戏剧性地说明了波斯湾——西方石油供应的生命线——是多么容易受到危害。这个地区的极端重要性很久以来就是两位精明的战略分析家——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论的主题之一。我下一站就是去访问他们。我们要谈的内容是很多的。

① 见诺曼·波德莱兹：《预警飞机：过去的总统阴魂不散》，载《华盛顿邮报》，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社论与专栏版第七页。

② 例如：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尼克松外交政策报告《七十年代的美国外交政策：建设和平》第一部分：《尼克松主义》。

第十五章

阴影笼罩着周恩来；同毛泽东再次会谈*

周受到攻击

我是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回顾我同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最后几次谈话的。这次交换意见比我们的计划晚了大约三个月。到我们会晤时，他已经行将去职——虽然我们当时并不知情。

我在第八章里谈到：一九七三年五月底和六月，周恩来曾经同意运用中国的影响来支持美国结束柬埔寨战争的折衷建议；这个方案要求实行停火、美国停止轰炸并立即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谈判，以便建立一个接受他的中立主义领导的联合政府。除非周恩来有理由认为他可以设法使红色高棉接受这个方案，否则他是不会承担这种义务的；而如果不是我们的轰炸使红色高棉无法获得他们想要获得的全面胜利，他们也不可能采取这种完全不符合他们性格的姿态。这个方案原定七月份第一个星期西哈努克经过长途旅行回到北京以后立即开始；当时我计划于一九七三年八月访问北京进行定期磋商，并会见西哈努克，开始政治对话。

就在西哈努克回到北京的几天之前，国会投票禁止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一切军事行动；我们被迫同意在八月十五日以前停止对柬埔寨的轰炸，从而失去了我们讨价还价的主要筹码。既然我们已经用法律形式规定必须停火，红色高棉就没有理由还要进行谈判。由于我们的失败而在国内受到政治伤害的周恩来放弃了准备

* 本章译文略有删节。——编者

对西哈努克采取的主动行动，并且断然把我的访问推迟到八月十六日，即停止轰炸后的那一天。这等于一记耳光，周恩来肯定知道我是会拒绝的。我在七月二十五日表示了拒绝。

在这个不幸事件之后，北京和华盛顿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了。双方都感到泄气，而且都为对方的反应感到恼火。周恩来在国内的困难也日益增加。为确定另一访问日期而交换意见的工作也出现长时间的拖延。中国人正忙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以一直让我们等到八月十七日才同意我于九月六日前往访问。但是八月二十二日宣布了我被提名担任国务卿的消息。我在国会批准提名以前是走不开的，因此又把访问推迟到十月底了。在宣布提名的第二天，我以个人名义给周恩来发去一份电报，说我认为中美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我通知他，我将要求戴维·布鲁斯大使离开北京回国来帮我安排担任新职务的过渡工作。布鲁斯已奉命请求会见总理和当时代理外长职务的乔冠华副外长，以便了解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评价。

八月二十九日，乔冠华在外交部接见了布鲁斯。他除了转达周恩来总理对我的任命表示祝贺外就没有再提到过他。中国人“欢迎”我即将前往访问。但是在访问前，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话要讲。乔冠华认为我们关系的发展是“正常的”。两国在对方首都建立的联络处正在创造一种客观现实。换句话说，没有理由需要担心；我们的关系现在已经有内在的动力。当然，在这种关系的许多方面，我有我的看法，“中国人则有他们的看法”——这无疑是对我在周恩来中断有关柬埔寨问题的谈判时作出的强烈反应的一种转弯抹角的说法。（“这是在我们发展新关系的过程中，中国人第一次说话没有算数。”）但是乔冠华提到这些分歧主要是为了强调双方利益的根本一致性。他说，中美关系和上海公报给外交带来了一种新的作风，就是“不要企图掩盖我们的分歧，而且坦率地承

认分歧。”用布鲁斯十分精练的语言来说就是：“虽然乔冠华同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显然不想把这场正在变得只是互相打趣的谈话继续下去。”

对中国人的冷淡可以做多种解释。我对他们取消有关柬埔寨的倡议作出的严厉反应无疑还在使他们感到恼火。事实上，毕竟不是中国人改变了主意，而是美国国会破坏了作为谈判基础的前提条件。我们国内的混乱肯定使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他们对我们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坚定可靠的伙伴也感到没有把握了。有关柬埔寨问题谈判的流产加剧了中国内部对周恩来的攻击；看来有人对他提出了指摘，说他在我们试图挑动苏联反华时上当受骗了。

在九月份，我们从中国高级外交人士在世界各国首都发表的言论中看到混乱的讯号。原来前后连贯的、始终一致的路线消失了。在我们的经验中，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它几乎肯定是中国内部斗争的反映。这场斗争使中国驻外代表无法肯定哪一方将要取胜，并且使他们按照自己对可能结局的估计调整自己的发言。有的人说美中关系已“陷入僵局”，主要原因则是台湾问题。另外一些人暗示，只要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就不难取得进展——这种说法听起来更像一种挽回面子的办法，而不像一项具体政策。我们这个时期没有讨论过台湾问题，也肯定不存在争论。因此，这个问题一定是作为国内围绕同美国和解是否有价值的问题进行的权力斗争的一部分而提出来的。我们听说，周恩来把我八月访华的时间推迟是因为他的政策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因此他需要首先加强国内的基础。周恩来的一名主要助手突然调到渥太华当大使也加强了我们的这种印象——据说他之所以调动是因为他曾经批评美国试图操纵中苏的对立。应当强调指出，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事后才了解的。当时我们只注意到混乱的讯号。

另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是中国报界正在开展的“批孔运动”。

无论孔子在形成中国文化和使国家成为无所不在的教育机构方面发挥过多么大的影响，他毕竟已经死了近两千五百年了。西方对攻击这位哲学家的目的存在几种不同看法。中国报界那种转弯抹角的伊索寓言式的语言使人几乎看不出什么端倪；我们的分析人员甚至争论过这场运动究竟是为了保周还是反周。考虑到孔子是一个贵族，他的作风和克己哲学统治中国公众生活达数千年之久，各种证据使我们倾向于认为运动是指向周恩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里的杰出的中国问题学者理查德·H·索罗门提醒我注意中国党刊《红旗》杂志十一月登载的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这篇文章批评古代一个“贵族”主张同“远”方的国家交朋友来对付具有威胁性的邻国，说这个人正坐在火山口上。*

甚至周恩来似乎也产生了疑虑。他向一位来访的外交官表示他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前途没有把握。周恩来感觉，如果两个超级大国达成协议，中国这张牌对美国就不会像过去那样有价值。但是周恩来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不会诅咒现实。同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中的一个站在一边去反对另一个巨人，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容许苏联压倒或侮辱北京则更违背我们的利益。因此，周恩来后来说的话听起来似乎同前面那些话毫无关系。尽管存在怀疑，他还要继续改善中美关系。但是他表示中国所能采取的行动客观上是有限制的；无论中国如何重视它同华盛顿的联系，它不可能支

* 这种明显的影射是中国人辩论方式的一个例证。代表周的那个人物批评他的反对者。

“为了保持自己的世袭特权而搞‘远〔指美国〕攻近〔指苏联〕交’的政策，进一步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政策。范雎〔周〕的路线博得了秦昭王〔毛〕的赞同，于是，‘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但是，范雎〔周〕虽然位居相位，实际上却是坐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在秦国，旧贵族势力〔地区军事长官？〕当时还是相当强大的。”**

** 中文引自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第二版。方括号内的话是基辛格加的。——译者

持美国的柬埔寨政策。

到十月初，我们得到的（错误的）印象是：中国内部的争端即将结束。乔冠华副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标准中国式的火气很大的演讲，并于十月三日在沃尔多夫饭店我的套间里同我亲切地共进晚餐。当时，这也成了一种标准做法。

乔冠华兴致很高。他认为他在联合国的演讲“（给我们）帮了不小的忙。”但是从他那篇充满革命词藻的讲话中，我看不出帮了什么忙。

“不是到处帮忙，”我有礼貌地表示异议。

“如果我到处都帮你们的忙，那我就任何忙都无法帮了，”作为黑格尔专家的乔冠华回答说。他利用这次机会解释了有关柬埔寨的问题。“作为一个哲学家”讲话，他说他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双方卷入柬埔寨都错了——这是中国人罕有的一次承认自己也会犯错误。更惊人的是，他断言中国对谁在柬埔寨取胜基本上不感兴趣。他说：

“无论柬埔寨是变成红色、粉红色、黑色、白色或其他什么颜色，究竟会给世界历史带来什么不同呢？最好的出路是：我们双方都不要卷入柬埔寨。我知道你们存在某些我们没有的困难——同国会和报界的关系方面的困难。

换句话说，中国已经不因这次失败而责备美国政府；责任在于国会和报界。我曾经暗示中国同北越在柬埔寨问题上利益并不一致。乔冠华再次巧妙地运用他在研究黑格尔时得到的训练，回避了这个问题。他说：“我认为与其说利益不同，倒不如说所处的环境不同。”这是一种没有差别的区别，等于承认河内和北京存在观点上的矛盾。但是机伶的乔冠华也防止美国企图把中国再次诱入柬埔寨的泥淖，所以先发制人地说：这件事实际上无关紧要。中国在一九五四年以前，对柬埔寨根本一无所知；从历史上看，它也没有注意过柬埔寨问题——意思是说，中国将保持传统的冷漠态度。

这位中国外交部长断言，中美两国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方针是把柬埔寨置诸脑后。他说：

柬埔寨问题对我们两国有某些共同性。你们没有请我们帮忙，我们也没有请你们帮忙。我想强调指出的是：从全局看，柬埔寨问题肯定只是一个枝节问题。

作为正统革命理论源泉的北京显然不想管柬埔寨问题了。它既没有对某种结局表示特别感兴趣，也没有夸夸其谈地指责我们的政策。中国人是精明的分析家，对柬埔寨未来事态的发展肯定不存在什么怀疑；他们也不可能不了解，柬埔寨的垮台势必加快南越的垮台。他们错误地估计了我们坚持下去的能力和我们对地缘政治的认识程度，以为美国懂得失败对自己的全球地位的影响。因此，他们相信我们会制止印度支那形势的发展，在这片前法国殖民地上保持四个独立国家。这种结局最符合北京的民族利益，使中国免于面临一种使它担惊受怕的战略形势：即在它的南部边界出现一个强大的、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的、并且同苏联紧密结盟的统一的国家。现在由于我们国内的分歧，过去无法想象的形势已经在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贬低几乎已经肯定的结局的重要性，虽然他们实际上并不相信这种看法。周恩来认为让他在地缘政治方面受到的挫折影响同美国的整个关系、并因此使挫折更加严重是毫无意义的。乔冠华的话说明：我们相互都了解对方在印度支那所处的困境；决不能容许这些困难妨碍遏制苏联军事力量这个压倒一切的共同目标，从而使灾难更加扩大。

因此我们的会晤以和解而友好的调子结束。乔冠华劝美国在中东采取比较“照顾两头”的政策，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要均等对待。他说：作为“现在已经有多年交情”的朋友，“我们可以坦率地谈话。”他有时可能不得不批评我们的某些政策；但是作为朋友他决不会批评我个人。表面看来，北京的斗争已经以和解路线取

胜而告终。继续中美和解进程的方向亮起了绿灯。

我对北京的访问由于中东战争的原因再度推迟到十一月。访问前又出现了一个表示善意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又涉及到柬埔寨。无论中国人和我们可能多么希望贬低柬埔寨的意义，它却总是缠住我们不放。十月十五日，北京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给我带来周恩来的信：西哈努克亲王的母后在金边病重；西哈努克希望在她死去以前再见一次面。他答应不利用王太后进行政治斗争。十月十六日，我答复说，我们已经做了必要的安排，王太后和她的医生可以乘法国航空公司专机前往中国。值得称道的是，西哈努克十分审慎地信守了自己的诺言，没有利用他的母后在北京的逗留做什么文章。

我在环球飞行行将结束时到达中国。布托在伊斯兰堡机场给我送行时让我不胜荣幸地检阅了通常专为国家元首使用的骑兵仪仗队。布托在电视讲话中解释说，考虑到曾经访问巴基斯坦的担任那种职务的“蠢货”数量之多，让那些马见识一下人类智慧的典范是完全公平合理的。

我们沿着秘密访问时曾经走过的路线前往中国，再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周恩来派去护送我到中国的欢迎队伍几乎同上次完全一样。当然，经验是不可能完全重复的；未知数引起的激动情绪是不可能再有了。同上次基本上属于单独冒险的访问比较起来，这次我作为国务卿来访声势要浩大得多。足以自慰的是，从第一次访问以来刚刚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成就。我们前往访问的国家对我们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具有类似的观点；它的领导人对世界事务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星期六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我到达北京，受到非常热情的欢迎。这是我第六次访问北京。周恩来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和我们见面，然后举行了近二百位客人参加的宴会（按中国标准，规模并不算大）。在这以前，周恩来已同我非正式见面，谈了约半小时，双方只有几名顾问参加。周对我在中东搞的“旋风外交”——当时还没有发明“穿梭外交”这个词——表示祝贺。他要我向尼克松总统转达他良好的祝愿（暗示水门事件并没有改变中国对他的尊敬）以及他对我们十月份宣布戒备状态时表现的决心的钦佩。他赞扬我们为削弱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而做的努力。他承认他原来以为我们在萨达特驱逐苏联人员时错过了机会，现在了解我们的战略是等待能够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有利时机。

然后，周恩来陪我走进宴会厅去。由于礼宾规格的原因，宴会是由外交部长姬鹏飞主持的。一切都按照中国方式经过特意安排，造成一种赞扬与合作的气氛。在我多次访问中，这是第一次有军乐队奏乐（当然，尼克松来访时是有的）。他们轮流吹奏美国和中国歌曲。外交部长在祝酒时欢呼我们的关系取得进展，特别提到两国的联络处，表示相信两国关系将会正常化。我的答词证明我这个人是不乐意放弃漂亮台词的。我在六次访问中第四次提到中国对我们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可是现在已不再神秘了。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周恩来以宽容的微笑掩盖了他的厌烦。

这种友好气氛为后来几天的停留定了调子。我们的讨论分两级进行。专家小组研究双边问题，特别是扩大交流和贸易以及冲突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把美国冻结的中国财产宣告解冻，作为交换则要解决美国公民索赔问题。在过去的访问中，我们总是让国务院人员忙于技术问题，我则进行政治会谈。既然我现在当了国务卿，就无需再玩这种把戏了。但是，事实说明这种工作程序效率很高，因此还继续采用。我想，这大概可以证明，某些官场手段甚至还有点实质性价值。

按照当时早已确立的做法，这次访问的中心是由周恩来和我以及双方高级助手详细回顾国际形势。我在开场白中指出：我们之间已经养成一种坦率、真诚并且从长远考虑问题的习惯。这并不是外交上的客套话；事实上，当两国关系还无法取得多少具体成果、还取决于一些难以捉摸的因素时，这种习惯已成为中美关系的关键。我们之间的纽带不是通过正式协议、而是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共同认识建立起来的。第一次随我访问中国的报界人士倾向于用台湾问题是否取得进展来评价这次访问。周恩来懂得，在台湾问题上，当时可能取得的成果并不符合人们的愿望，因为这种成果将使中美关系在两国都引起争论。但是，由于中国国内政治上的明显原因，他不能这么说。同往常一样，我们的谈话大部分都是追叙我们对世界局势的分析。我们的分析是相同的，虽然由于同样明显的原因——考虑到苏联人的敏感——也不能公开这么说。因此，尽管这次访问也许是我所有的访问中最亲切的一次，它却是在报界的评论认为中美关系出现僵局的背景下进行的。

同我二月份访问以及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内部争论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周恩来并没有提出美苏关系问题。他也没有象年初那样询问我们的政策是否要使“祸水东引”。可能他已经在国内争论的这个具体问题上获胜；更可能的是，他在国内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因此不敢对我提出这方面的问题，以免使那些批评他的人的论点合法化。

结果是我第一次主动就我们对苏战略问题进行了分析，内容同我九个月前对他讲的差不多（见第三章），也只能差不多。战略毕竟不是隔几个月就变一次的，否则就会破坏信任。政治家很重视一个伙伴的坚定性和可靠性，而不是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断寻求什么新的法宝。

我宁愿直截了当地回答人们通常对缓和提出的批评。我说我

毫不怀疑苏联力图利用紧张局势的缓和来涣散西方的团结，削弱西方的防务。这仅仅意味着苏联领导人有他们自己的意图，就一个大国的政策来说这是可以预料的。我们则认为时间对我们有利。苏联的制度似乎需要一种人为的危机感。我们能够比他们更好地承受紧张局势缓和的考验。苏联集团的瓦解趋势已经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明显暴露出来，而且必然还会出现。我提醒周恩来注意我十月八日在国际海洋研究所特里斯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其中我警告说：我们不会容许缓和损害我们同友好国家的关系；我们将反对苏联利用国际危机扩大自己影响的任何企图。我说：

在出现侵略行为时，我们将采取果断行动，必要时还要采取残酷的行动，但我们需要事先证明是别人在向我们挑衅。我认为，我们在处理中东危机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周恩来对这些论点并没有提出异议。可能他已被说服；更可能的是他认为我们的政策已经完全确定，辩论也无济于事。他对我们的欧洲盟国举棋不定的态度感到迷惑，无法理解它们对美国宣布处于警戒状态以及对我的中东之行的矛盾心情。他说，警戒问题毕竟也没有同中国商量过，但是中国还是为我们的行动叫好。我的回答是准确的，但不很宽宏大量——反映了美欧关系的紧张状态（见第十六章）。我说：

如果一个人既想下大赌注，又不想冒风险，这个人大概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我们的西方盟国暗中梦想在中东恢复它们一九四〇年的地位，而又不想冒任何风险或做任何努力。因此，只要我们比较活跃，就会出现一种模模糊糊的忌妒和不安的感觉。

此外，欧洲领导人已经习惯于以东西方之间的调解人的面目出现。他们在本国公众面前装得比美国更爱好和平，心里十分清楚，不管他们怎么做，我们都会继续坚持阵地、反对苏联的。我说：

这些领导人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他们内心深处都懂得我们采取的行动基

本上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国内原因只能言不由衷。因此，特别是在事情已经过去以后，他们常常采取一种同他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相径庭的公开立场。

当美国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时，欧洲领导人就不能这么舒服了。这种政策迫使他们更为严肃地对待本国的防务问题，使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建议承担责任。第二天，在讨论同一主题的另一次会议上，我说：

如果说我们这样做比西欧人略微左一点的话，这不过是防止他们再往前走的一种手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担心我们同苏联作出单独安排。这就会使他们大伤脑筋，足以使他们开始考虑本国的防务。

周恩来点头表示理解。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时间证明是无法答复的论点：“关于这个问题，人民是无法理解的。”这诚然是我们的难题。如果我们要经受住长期危机，我们必须向本国公众证明我们的和平意图。为了保持盟国的团结，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欧洲伙伴自称对缓和拥有垄断权。但是，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走得太远，就可能使本国公众看不清苏联的意图，或者使我们的盟国开始争先恐后地向莫斯科跑去。在这样复杂的策略基础上制定的政策在水门事件时期已经证明是难以实行的。到本书执笔时为止，整个西方也还没有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然而西方的团结、西方目标的坚定性，以及西方的安全和自信终将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在后来几天里，周恩来和我对国际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广泛的回顾。早在我们到达以前，周恩来已经正确地分析了我们在中东奉行的基本战略。十一月十一日，我对他说：六点计划——碰巧埃及和以色列就是那一天在计划上签字的——的意义并不在于其中的具体条款（虽然这些条款也很重要），“而在于它是撇开苏联而由埃及和美国谈判达成的。”周恩来早就领悟到这一点。他说：“昨天晚上我就想为此向你祝酒，但是我担心记者们会听到我们的谈

话。”我解释了我们有关日内瓦会议的策略，我们将利用全体会议正式重申大家已经熟悉的论点；真正的谈判将在会外、在我们的赞助下由各个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在双边基础上进行。

关于印度支那，我重申了我们对西哈努克的政策：

我们原则上并不反对西哈努克。在他私下和公开发表的许多言论中，他似乎误认为美国政府原则上是反对他的。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如果他能以真正独立的地位重返柬埔寨，我们对他担任领导人很有兴趣。如果他是某一特定派别的俘虏，只是被这个派别极为短暂地利用来争取国际承认，我们就没有兴趣。

但是，已经吃过亏的周恩来不愿意再度介入此事。他回答说：离开整个印度支那这个背景就无法讨论柬埔寨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在我访问后期专门开一次会来谈它。事实上，他再也没有谈这个题目，只是告诉我他同北越领导人的谈话表明：他们“无意于现在发动大的攻势”——严格按照“大”和“现在”的定义来说，这个判断已经证明是正确的。

周恩来只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上才抛弃了被动的态度。根据他的分析，苏联人被埃及赶出来以后就以伊拉克作为他们中东政策的枢纽。美国需要十分注意防止激进的伊拉克取得波斯湾的霸权；另一方面，伊朗国王则是一个了解世界局势的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再次证明北京把地缘政治置于意识形态之上。至于阿富汗，周恩来对使穆罕默德·达乌德上台的政变表示严重关切。接近达乌德的军官们是亲苏的；阿富汗的动乱很可能尚未结束。阿富汗针对巴基斯坦和伊朗两个邻国提出的收复失地的要求即使不是苏联挑动的，也会为苏联的阴谋服务。它将削弱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地位，使莫斯科获得一条通往印度洋的通道。美国应当加强处于严重危险中的巴基斯坦。

无论周恩来和我相互如何尊重，不幸的是我们面临着完全相

反的问题。周代表的是一个能够进行强有力的智力分析，但是缺乏把这种分析付诸实践的物质手段的国家。而我作为外交部长，所代表的国家虽然拥有这种物质手段，也同意他所做的地缘政治分析，但是在经过越南战争以后、在发生水门事件的情况下却由于国内缺乏一致意见而无法实施自己的想法。尽管我很同意周恩来的建议，我知道根本不可能使国会批准我们认真去加强巴基斯坦。军事援助已经不时兴了；国会里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是：印度对我们更为重要；同巴基斯坦建立军事关系将使印度生气。我对周恩来来说，我们最多也只能用加强伊朗的办法来支持巴基斯坦。由此可知，伊朗国王之所以成为邻国的保护者，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内部的混乱使他不得不那样做。

用一般外交的任何标准来衡量，同周恩来谈话都是高水平的。但是过去曾陪同我访问中国的同事们、特别是温斯顿·洛德注意到他已失去原来的锋芒和闪耀着火花的活力。周恩来提的问题是深刻的、有助于澄清情况的；他对我们的陈述发表的意见也充满才智。但总缺少某种东西。在过去的会晤中，他十分精采的长篇分析使人们的思想非常活跃。现在他第一次避免做这种分析。他是否已丧失权威？抑或是我们的看法如此接近、以致无需进行分析了呢？

同他一贯的特点相反，周恩来好象有点踌躇——似乎他知道他需要利用我们这次访问尽可能多地播下种子，但对自己能否见到收获却没有把握。他似乎急于消除使北京的反美派纠合在一起的台湾问题。他耐心地听我解释美国为什么不能对台湾采取“日本方式”——按照这一方式，美国必须同台北断绝外交关系，作为同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我提出，只要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或许不按照日本方式也有可能实现正常化。周恩来没有拒绝这个办法。使我惊讶的是，他第二天问我是否在这方面有什么明

确的方案。这几乎象导致我们建立联络处的那些会谈的重演。周恩来甚至在公报中写进这样一句话，意思是说正常化要求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而这一点从来就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后来再也无法了解周恩来究竟是怎么想的了，因为在我们有机会了解这句话的实际含义以前，他已经被撤职或失去工作能力了。

在这种几乎是渴望表示善意的情绪中，讨论双边问题的小组取得显著的进展。双方同意增加联络处的人员，扩大联络处的工作范围，安排更多的文化交流，并增加贸易。财产索赔问题也接近解决——尽管周恩来情不自禁地指出，我们所谓要采取法律行动维护产权要求的威胁是徒劳无益的，你怎么可能控告一个你并不承认的政府呢？十分奇怪的是，在通常属于外交例行公事的这些问题上取得的这一切进展却使我们产生了一点不安情绪。我们闹不清周恩来为什么好象如此急于解决问题；他一反常态地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表明最终目的何在。这种情况令人感觉象是一个阳光灿烂而又有点气闷的夏天，明媚的风光是一场遥远的雷阵雨的前兆。

再次会见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会见毛泽东主席。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收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

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毛泽东看上去比我过去见到他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健康。他同陪我前往的戴维·布鲁斯和温斯顿·洛德开玩笑，说布鲁斯上了年纪、洛德还年轻，而他则比他们两人年龄都要大。他已经八十岁了。

这都是标准做法。新奇的是，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点的隐喻——虽然他的谈话和我前两次同他会见时一样是简短的、苏格拉底式的。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他一开始就询问周恩来同我讨论了什么问题。

“扩张主义，”周恩来回答说。这清楚表明：遏制苏联仍然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谁在扩张？是他吗？”*毛泽东问道，同时用手指着我，好象这一切对他都是闻所未闻、而且周恩来也没有每天向他汇报似的。

“是他开始的，”周恩来说，“但是别人现在赶上来了。”毛泽东高兴地接着周恩来关于苏联人现在是主要威胁的暗示谈下去。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制止任何不适当的、可能使人倾向于迎合迁就苏联的危机感。他反驳说：苏联的扩张主义还“可怜得很”；他们是野心大、胆子小，就象古巴导弹危机和美国最近宣布戒备时期已经证明的那样。他谈到一九六九年他同未经邀请就来到北京机场讨论缓和中美紧张关系问题的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的会晤，再次表明他对苏联领导人的蔑视。他说：

我说，我曾经说过这场斗争要进行一万年。现在看在他亲自来找我的面上，我愿意减少一千年。（笑声）你们看我多大方。一让步就是一千年。

后来又有一次，（一位罗马尼亚官员）也来为苏联说情。这次我又让步，

*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并非原话。下同。——译者

再减少一千年。(笑声)你们看,我规定的期限是越来越短了。

第五次,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也来了——这是两年以前的事。他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这次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能再让步了。”(笑声)

现在决心要斗争八千年的这位主席认为玩弄策略是没有意义的。他说,美国外交太喜欢“打太极拳”;他的战略是以比较直接的打击作为基础的。当然,同样真实的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打消了任何灵活的想法。但是我认为辩论策略问题并无意义。我说:无论我们的策略如何不同,我们已经证明自己已有决心抵抗挑战。关于这一点,他和我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他说:“我相信这一点。因此你最近访问阿拉伯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

我发现毛泽东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我们的对苏政策,而是我们的国内局势,具体地说,就是水门事件。如果我们由于国内分歧而削弱了执行遏制战略的能力,这个战略还有什么好处呢?他根本无法理解水门事件引起的喧嚣;他轻蔑地把这整个事件看成是“放屁”。事情本身“不过是芝麻大小,而现在却因此闹得翻天覆地。反正我们不喜欢就是。”他看不出有什么客观理由要攻击一位成绩卓著的总统:

失业人数似乎减少了一些,美元也比较稳定。因此,看来并不存在任何重大问题。水门事件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突然爆发出来呢?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制度,甚至最高级官员也得受法律控制。要向中央王国的绝对统治者阐明这种制度比较微妙之处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话也有道理。他并不关心我们国内上演的这出戏本身的是非曲直。水门事件使他感兴趣,首先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能力。这种情况在地缘政治方面造成的后果可能使原来的罪过相形见绌。

关于我们长远的对苏政策,周恩来从来没有明显表达中国的

忧虑；他也没有提出过令人害怕的美苏共同统治世界的问题。毛泽东则不象他那么讲究，虽然出于自尊心也不愿直接要求我们重新作出保证。他选择了一条捷径，暗示我们和莫斯科可能有秘密安排。他说，过去他曾怀疑我们保持机密的能力。现在他相信我们能够保密；我第一次访华就没有走露风声。最后他露出了真意，“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你们最近同苏联进行的交易。”我们同苏联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交易，我如实地说了；我们不会同克里姆林宫进行一种如果透露出去就会使我们陷入孤立的谈判，否则等于把自己抵押给他们了。我们进行的任何讨论都向北京作了充分的通报。

我很明白，我的重新保证并不比我表示亲密的说法更能使一个为忌妒所苦恼的人相信。产生怀疑的不安全感本身就要给这种保证打折扣。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宁愿按照表面价值来对待我的讲话，并从这一点出发对苏联的整个战略地位进行了英明的分析。

毛泽东认为，莫斯科虽然表面强大，实际上摊子铺得太大，力不从心。它不得不提防日本和中国；它必须注视南亚和中东；它还在欧洲面临另一条战线，不得不把更多兵力放在欧洲、而不是放在中国边境上。事实上，苏联的整个兵力中只有四分之一是布置来反对中国的——这多少有些估计过低。因此，毛泽东的结论是，苏联无法进攻中国，“除非你们首先让它进来，首先把中东和欧洲拱手相让，使他们可以把部队调到东边来。”反过来说当然也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是全球安全的关键。真正的危险在于潜在的受害者不了解保持地缘政治均势的需要。如果一切遭受苏联侵略威胁的国家携手合作，就可以保证每一个国家的安全，苏联人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如果它们不合作，每个国家都会陷入危险境地。换句话说，遏制苏联是必要的。

然后，毛泽东按照这种观点评价了欧洲各国的态度。令人惊

讶的是，这位年迈的领导人对于遥远国度里的国内政治居然了如指掌，不用任何提纲就能够以无可抗拒的力量推演出结论。毛泽东的信念的核心是，虽然我们的欧洲盟邦由于各种原因而犹豫不决，它们最终绝不会受苏联人的甜言蜜语的诱惑，从而抛弃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重要的是不能把暂时令人恼火的策略同长远趋势混为一谈。即使我们有些朋友似乎犹疑不决，我们必须保持坚定的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从我们的领导中得到勇气。

毛泽东并不是一口气说出这些意见的。相反地，他用一种优雅的、精雕细刻的语言讲话，每句话都很费力气。或许他是由于中风以后身体虚弱，不得不使用对话方式，使他可以从容思考。也可能他是一贯喜欢把对方扯进来一起谈。无论原因何在，他的话段落很短，每一段结尾几乎都是一句问话。问话本身就包含着答案——而且使你无法得出其他结论——同时又使我不得不陪他进行这种智力旅行，一直到达他预想的目的地。

毛泽东用了大约一个小时对国际形势进行基本分析，然后突然转到台湾问题；他并不是提出不同意见，而是间接暗示出一种解决办法。他说，他听说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在美国还有大使馆。我肯定了这一点。“但是苏联并没有要求你们首先取消这些大使馆才同你们建立外交关系吧！”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因为建立关系时苏联还承认这几个国家。但是，如果毛泽东是在暗示同台湾的关系不一定会妨碍中美关系正常化，我没有理由要来指出这种微妙的历史区别；因此我表示同意他的见解。周恩来也帮忙插话说，这几个波罗的海国家虽然同美国保持外交关系，但进不了联合国。我不知道这些话是否意味着中国可能默许台湾保持单独的法律地位，只要求把台湾从联合国开除出去就行了。

* 指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译者

毛泽东的谈话又转到另一个方向，用更为绕弯的方式做了同样暗示。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信徒，他一开始就肯定矛盾的存在。如果我们想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原则上我们必须同台湾断绝关系。他也不相信和平过渡；台湾领导人毕竟是“一群反革命”。

但这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他并不急于实行他那不可动摇的原则：“我说，我们眼下没有台湾也过得去。可以等一百年再谈。这个世界的事不要太急。何必那么急呢？”另一方面，北京同华盛顿的关系也无需按照中国国内争吵的锣鼓点慢条斯理地进行；没有必要等那么久：“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我看不需要一百年……但这得由你们决定。我们不催你们。”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否还是暗示可以把正常化同台湾问题分开对待？暗示关系正常化的速度将取决于我们？它至少是暗示：中国并不企图在以后很快就吞并台湾；台湾问题肯定不会成为我们两国关系的障碍；同大家的看法相反，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受到压力。我倾向于相信，同周恩来前一天的做法一样，毛泽东是在间接地要求我们提出能够把统一中国的原则同某些适应现状的实际安排结合起来的建议。我们无法知道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因为中国国内形势瞬息万变，不容许我们对毛泽东讲话的全部含意进行探索。这件事对最近的将来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毛泽东已经清楚地说明，中国“一百年”也不会从他谈的一般原则中做出政治结论。为了避免我们不能领会他的含意——西方人的敏锐性从来都是很难说的——他把台湾的情况同香港和澳门进行了比较。中国对香港和澳门问题也并不着急（事实上还同“占领”这两个地方的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并不重要，他说：“重要的是国际全局问题。”

台湾问题的讨论就这样结束了——不仅没有施加压力的迹象，而且明确地把它抛到一边去了。接着，毛泽东就转到中东问

题上来，似乎是故意把台湾问题放在讨论如何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遏制苏联力量问题的过程中来谈的。他回顾了他对我在宣布警戒状态那天同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一次谈话的反应，借以表明他对中美关系的关心。对不幸的黄镇来说，我的通报是突如其来的；因此他还是按照老一套办法重申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立场的支持。毛泽东煞费苦心地把这次谈话放在正确的背景上来看。黄镇正确地谈到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目标的支持，但是“他不了解美国抵抗苏联的重要性。”中国“欢迎”我们“把苏联置于困难境地，使苏联无法控制中东。”换句话说，遏制苏联超过了其他一切考虑——包括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追求。

然后，毛泽东几乎逐一分析了这个地区各国的力量和弱点，强调指出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对阻碍苏联扩张的重要性。他对伊拉克和南也门感到不安。他敦促我们加强在印度洋的力量。毛泽东的谈话都没有提纲；他的同事也没有给他任何提示，只是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

毛泽东在环顾世界形势的最后转到日本问题上来。他赞扬我决定在回国途中到东京停留几天。一定不能让日本感觉美国在怠慢它；它生来就感到不安全，十分敏感。他保证中国不会强迫东京在中美两国之间作出抉择。那样做可能使日本政治力量出现两极分化，肯定会加剧日本的不安全感，而且可能引起传统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首先需要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毛泽东以赞同的口吻说。“其次才是我们。”这位世界革命的鼓吹者将尽力使日本继续按照这个优先次序办事；他不希望看到一个毫无拘束的日本在各国之间挑拨离间，因为这种情况会加强沙文主义情绪。我们的任务是同日本保持密切联系。作为第一次“尼克松冲击”——指我对中国的秘密访问——的设计师之一，我个人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他们怕你。你应该努力减少他们的恐惧。”这些话出自他的口中

显然是不协调的，中国对美日同盟的热烈支持同我第一次访华时他们表现的猜疑完全相反。建立联系不过两年，这位两鬓皤然的革命家就在教导美国的国务卿如何保持盟国团结了。从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发，我们在保持全球均势方面却成了具有默契的伙伴。

谈了两个半小时以后，周恩来表示该到告别的时间了。但是主席对美国国内局势还放心不下，要谈下去。他的政治理论曾经预言美国国内会出现动乱，而且鼓吹这种动乱。但是现在他最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他象一位交响乐的作曲家一样，最后又回到他开始的主题：他多少比较同意现在的总统的看法，但是水门事件会不会削弱这位总统的权威呢？这场混乱可能产生一位什么样的新总统？他“怀疑”如果民主党总统上台可能会使孤立主义死灰复燃；我怎么想呢？我深信：如果伪称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任期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九七六年，而且可能提前结束——能够保证美国的对华政策，这种说法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我说：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我们的主要政策方针都将取决于现实；但是，在得到这个教训的过程中，出现某种空隙是可能的。毛泽东抓住了这句话的微妙含意。他立刻反击说：“那么你似乎同我一样。我们双方多少都有点怀疑。”

他对美国军队可能象民主党参议员不断建议的那样撤出欧洲特别感到不安。我说，我们两党在“面临挑战时立刻采取强硬行动”的意愿上也存在差别。毛若有所思地说，没有必要使用外交词令；我实际上是指冒战争风险的意愿。他大笑着说，虽然他以战争贩子著称，但他希望发生战争时仅限于使用常规武器。我想制止这种猜测：“无论怎么说，我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他听到这种保证并不那么高兴，所以在分手时他警告说：“苏联欺软怕硬。”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去消除莫斯科对我们可能喜欢打仗的担心。

当我们正要从沙发上站起来告辞时，毛泽东突然重新提到我们二月间谈话的主题：我们必须提防中国的女人——指他的夫人的阴谋诡计。将近三小时的会晤就此结束。主席费劲地站起身来，没有要人扶他，然后缓慢地移动脚步把我们送到外间接待室——这是一种非凡的荣誉。当他同我们告别时，又照了一些相。他对我说：“请向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转达我个人的问候。”

周恩来把我引到一边去商量公告的措词，其中讲到“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有远见的交谈”，还提到主席向尼克松表示问候。按照中国标准，这几乎是以有力的方式表示毛对中美关系的认可。

这是一场惊人的表演。三十年来曾经会晤过欧洲所有伟大领导人的戴维·布鲁斯说，我们刚才亲聆的谈话是他有生以来从一位政治家口中听到的最不同凡响、最有条理的陈述——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次谈话显得如此自然而随便。

但是，这一切有什么含意呢？为什么毛泽东认为有必要运用他巨大的权威对国际局势进行如此详尽的评价？中国人对这次会晤无疑是非常重视的。会晤时间长得异乎寻常（加倍耐人寻味的是对方并非国家元首）、公报措词热烈、中国报刊对会晤的重视、以及随新闻同时刊登的照片都反映了这一点。他们选登的照片是满面春风的毛泽东用双手握住我的手，而态度比较严肃的周恩来则明显作为陪衬。

甚至时间的安排也必然引人注目，因为戴维·布鲁斯已经计划在同一时间里在外交俱乐部为各国使节举行招待会来欢迎我。由于同毛的会晤时间很长，所以到我出现时客人们已经走了。从中国观点来看，这样做的好处是迫使每一个大使向本国首都报告这次漫长的会晤——而且中国人把会晤看得如此重要，不惜让整个外交使团站在那儿等待。他们也不是出于无意，因为会晤快结

束时毛泽东曾向戴维·布鲁斯表示歉意，说“占用了原来安排其他活动的时间”。（是否还有一个次要目的，就是教训布鲁斯仅仅作作为联络处主任不应邀请各国正式大使参加半公开的招待会？）

毫无疑问，我们性格复杂的主人采取这些行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我现在认为毛泽东的长篇谈话有两个基本的、或许相互有联系的原因：一是内部存在深刻分歧，二是周恩来即将引退。从夏天以来，中国一直在激烈进行外交政策的辩论，柬埔寨的失败又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时可能需要用毛泽东压倒一切的权威才能结束这场辩论。但是毛很少毫不含糊地支持一派；他通常总要保持机动的自由。很可能在他采纳周的政策的同时，他个人至少还赞成周的某些反对派。这可以说明他为什么在谈话中间突然问我是否见过“懂德语的”郭沫若——虽然在此以前“懂德语”并不是同我见面的前提。当我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先生时，毛泽东说：“他是尊孔派，但现在是我们的中央委员。”我为什么要在一场批孔运动中去见一位尊孔派呢？中国又有谁能够如此胆大妄为地安排这种会见呢？它是否暗示尊孔并不妨碍一个人担任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也就是说批孔运动已经结束？我提到我同乔冠华副外长共进晚餐时的谈话，又引起了一阵短暂的欢闹。“乔老爷，”毛泽东回答说。这个回答也许是开玩笑，也可能是不祥之兆，暗示乔冠华出身于即将被消灭的上层阶级——而这正是指控孔夫子的罪名。

无论在我访问期间中国国内的游戏是处在什么状况中，反正不到两个月周恩来总理就从领导工作岗位上消失了。官方解释是生病。总理表现踌躇是因为他知道癌症正在夺走他肉体上的生命，还是因为他的政治生命即将结束？这是出于毛的策划（就像他对待其他所有副手那样），还是因为周感到了政治压力或大限将临，在不可抗拒的事物面前让步了呢？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从来

不随便讲话，他总是有目的的，即使我们无法弄明白也一样。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同周恩来进行严肃的会谈。一年以后，我带着妻儿到一个被称为医院、但看上去像宾馆的地方去拜望他。我们谈得很随便；在我这个外行人眼里，他的容貌并没有变化。但是每当我提出一个严肃话题，他就要改谈其他问题。他说医生不准他讨论这种问题。从来没有人解释过为什么政治问题会比闲聊更有损于他的健康。这是一次令人痛苦的会晤——很可能对我们两人都是如此。

我在结束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这次访问以前，看到了正在迫近周恩来的某些压力。在最后一次宴会上，那种节日气氛和开怀的祝酒使我情不自禁提出了孔夫子问题。我的脑袋一定是给时差的多次变化搞糊涂了，要不就是茅台酒喝得太多使我有醉意。我现在无法解释我当时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具有爆炸性的主题。我不揣冒昧地说，中国好像很自然地把国家看成是调节人们的行为、道德和政治活动的一个庞大的教育机构；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从来都是信奉儒家的。我还说，这种概念似乎仍然存在，尽管现在教育的内容不言而喻是同儒家学说针锋相对的。

这个说法以罕有的冒失方式实质上把毛泽东也叫做儒家了。周恩来一听就沉不住气了——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尽管只有翻译听见了我的话，他还是十分激动地坚决指出这种类比是荒谬的。虽然我申辩说他应当把我的任何误解当作无知的表现，他也拒绝接受。周恩来坚持说下去。

无论周恩来是由于什么原因没落的，反正在这次访问以后曾经同我谈话的中国人谁也不再提起他的名字。每当我谈到过去同他的讨论时，中国人回答时总是引用毛泽东的谈话。后来发现，这次谈话包括了双方都感兴趣的一切领域和几乎每一个国家。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同毛泽东的会晤既为当前目标服务，也为长远目标

服务，尽管后面这一点我很久都不清楚。在我任期剩下的时期里，同毛泽东进行的这次谈话成了中国人处理中美关系的圣经。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是一次建设性的谈话。虽然它未能防止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激进派的兴起，但它却规定了一个界限；甚至在激进派对日常事务的影响不断增加、从而使我们的关系暂时陷入停顿的时候，他们也无法把周恩来取得的成果破坏到超过这个限度。

当然，在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里，这些情况我并不清楚。我的访问似乎一帆风顺，在开罗取得了胜利，在北京又受到欢迎。在毛泽东的明显的认可下，一切谈判都迅速而顺利地结束。财产索赔问题解决了，只剩下一些估计不会成为障碍的技术和法律问题。双方同意的最后公报表明我们的关系前进了一大步；只是由于报界一心只关注台湾问题才低估了公报的意义。公报把共同反对霸权的范围从一九七二年上海公报所说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大到全球。为此目的，它确认两国有必要在“具有权威的级别上”^{*}加强磋商。双方将加强交流，增加贸易，扩大联络处的工作范围。周恩来还加了一句话：“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在我们完成公报全文以后，周几乎是顽皮地建议我们检查一下公报有什么新的内容。他特别提醒我注意有关台湾的那句话——因为微妙的暗示很容易为野蛮人所忽视。“确认……原则”并不是无法做到的要求；我们在上海公报里已经很接近这一点了。实际上，我们的对华政策在任何阶段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毛泽东和周恩来语焉不详的提法显然是一种苗头，但是它的意义当时还不清楚。周恩来说，他将召回黄镇，就公报发表后加强对话的性质给予指示。

访问以一种非常善意的调子结束。这是毫不奇怪的。在我们

* 公报的话，中文均引自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的全文。——译者

最后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对我们帮助作出安排使西哈努克的母后离开金边表示感谢。他还对我说，他的礼宾官员给了他一张在柬埔寨失踪的西方记者名单——这是我故意留在宾馆的桌上，目的是避免就中国是否对红色高棉有任何影响一事进行辩论，以免使我们双方都感到尴尬。周恩来说他将尽力而为，虽然我知道他能做的也很有限。因此，在我们最后一次正式会议结束时，有一种由于新方针已经确定而充满希望的感觉，同时也有一种缱绻之情，似乎预感到好景不会再来了：

周恩来：容易受表面仁慈温厚的人欺骗也许是美国人的性格。（他指的是印度。）

基辛格：是的。

周恩来：然而世界并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祝你成功，也祝总统成功。

基辛格：谢谢。还要感谢你一向给我们的热情接待。

周恩来：这是理所应当的。同一九七一年一样，方针一旦确定下来，我们就会坚持下去。

基辛格：我们也是如此。

周恩来：所以我们用“有远见”这个词来形容你同主席的会见。

周恩来把这次访问同我的秘密访问相提并论，认为是取得重大进展的起点。结果并非如此。周恩来和我都被国内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所淹没。黄镇像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奉召回到北京，但是呆了四个多月还没回华盛顿。到他回华盛顿以后，他也没有同我们谈什么。中国人用显而易见的托词中断了有关财产和索赔问题的谈判。交流也失去了活力。总的政策方向是保持下来了，但政策的实质内容基本上处于冻结状态。后来我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再去访问时，他们的态度不是冷淡就是踌躇不前——虽然两国关系从来没有倒退。

这种状况是两国同时出现的国内危机造成的。被内部斗争搞

得四分五裂的华盛顿不是使中国很感兴趣的伙伴。随着总统权威的消逝，我们的可信性也必然下降，无论我如何大言不惭地否认也没有用。退一万步说，即使中国本身是团结一致的，它也完全有理由要等水门事件这场戏演完再决定如何下赌注。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当时也在经历一场领导危机。虽然毛泽东同我的谈话规定了主要的政策方针，但任何一项文件也不可能把各种细微的解释全部包括进去，而解释政策的权力当时却越来越受到激进的“四人帮”的控制。

但是，如果说一九七三年底怀抱的希望并未实现，至少我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的哲学前提还是保存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年迈的主席在同我谈话时为防止他自己的激进倾向提供了保证。我后来同周恩来事实上的接班人邓小平副总理以及不久以后就提升为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也定期举行高水平的讨论。这些讨论缺乏过去那样的热情，但也没有改变过去谈话的实质。在当时存在的那种混乱中，在两国都由于和外交政策无关的原因而受到压力时，我们实质上维持了对世界和平举足轻重的一种关系。政治家们常常干得比这糟得多。

第十六章

盟国的纠纷

一九七三年秋天，我们为使美国和它的民主伙伴的联盟恢复活力的努力碰到意外的障碍。欧洲优先考虑的是设法加强它本身的团结；欧洲各国政府都面临国内压力；美国则在忍受水门事件的折磨。十月战争和石油短缺使困难臻于极点：各个盟邦都埋头应付国内的难题；大多数政府都丧失了国内基础，以致无法采取富有远见的行动——实际上，一九七四年尚未结束，那些主要的领导人就全部下台了。我们同欧洲和日本的关系进入紧张时期。石油危机给我们的大西洋联盟和太平洋联盟都造成了紧张，但由于各个地区的文化和历史不同，紧张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欧洲年的结束

从来没有有什么伟大的计划比我们设计的欧洲年造成的混乱更大。问题在于按照这个设计采取的步骤大部分是难以捉摸的。我们希望通过一个所谓大西洋宣言响亮地阐述我们共同的积极目标，说明遏制共产主义侵略的必要性，从而给西方联盟一个新的、政治上的推动。我们认为，如果各国政府想保持自己的正统地位，如果西方联盟要保持团结，就需要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看到，他们的领导人并非局限于小心翼翼地处理一些技术抉择问题，而且在致力于更为远大的目标。但是我们的盟国有它们优先关注的问题；它们利用我们要求制定大西洋宣言

的创议作为铁砧来锻造自己正在形成的体制，对于为大西洋团结奠定新的基础兴趣不大。有的国家认为我们的创议——甚至可能是故意地——妨碍了它们关心的头等大事。我并不是说我们的盟国都不对，而只有我们才是对的。同大多数悲剧一样，双方从自己的观点看都是对的，都在从事高尚的事业。

这一年确实是民主国家出现集体瘫痪症状的一年。理查德·尼克松成了水门事件的俘虏；乔治·蓬皮杜正在走向死亡；维利·勃兰特的权威日益明显地发生动摇；热衷于同欧洲各国搞好关系的爱德华·希思也被国内危机搞得越来越无暇他顾。所有的领导人都未能把权威同本来可能使他们大家都从爱好玩弄策略的习惯中解脱出来的宽厚行为结合起来。欧洲人的目标同美国的目标至少是互不协调的。

在这一切当中，法国外交部长米歇尔·若贝尔是善于摆漂亮的迷魂阵的组织者。我在第五章曾经描写他如何劝诱我们绕过欧洲共同体，让法国设法使欧洲取得一致意见；转过头来他又坚持有关欧洲年的讨论只能通过共同体进行；同时他又组织共同体反对我们的建议。他最巧妙的办法就是安排一种拖延时日而且令人屈辱的程序，从一切实际意义上都是迫使欧洲确立一种如果不是同我们针锋相对、也是同我们有明显区别的特性。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三年七月的哥本哈根。当时，在既没有提出警告也没有事前同我们磋商的情况下，欧洲领导人决定，在共同体形成一致看法以前任何成员国都不得就这个问题单独同我们打交道，尽管这个问题是美国提出的。每个国家都要把我们同它接触的情况报告其他成员国，对我们则不予答复；然后欧洲各国外交部长将拟定一个宣言草案。只有在草案已经拟就时，才能由当时按照半年轮换一次的原则担任九国外长会议主席的丹麦外交大臣克努德·博尔格·安德生给我们看。这位值得尊敬的先生还无权进行谈判。他可以听

取我们的意见，并转达给他的同事。他们则将听取他的报告，进行讨论，提出新的方案，然后又按同一程序进行下去。

这种程序不是使磋商恢复生气，而是要我们参加一场使磋商无法进行的官僚主义游戏。他们要我们去同一位没有权威的部长谈判，而拥有权威的人则不理睬我们。我们原来是想使大家对共同目标承担新的义务，对共同前途有一种新的观点。但是他们为大西洋对话建议的程序甚至比我们同苏联谈判代表见面的程序更为死板。苏联人虽然态度僵硬，并受到各种约束，他们一般还要谈一点意见，而不是只听不说。

我们的盟国为拟议中的总统欧洲之行设想的方案也同样不恰当。按照这个方案，在讨论安全问题时，总统可能会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见到其他政府首脑——尽管还不能肯定。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总统却只能会见当时主持部长理事会的丹麦首相以及——如果法国同意的话——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然而欧洲各国政府首脑并不准备参加这种体现他们团结的讨论会。如果促进欧洲共同体的内部安排是西方政策的头等大事，这一切就完全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关于大西洋联盟道义上需要确定新的方向的想法有任何价值的话，欧洲人墨守条文的做法只能使这种想法陷于失败。按照这样一种拘泥形式的程序，等到阐述共同目标的宣言制定出来时，它已不会有任何鼓舞人心的力量和意义了。

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同我交谈时暴露了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不共同发言，怎么能体现欧洲统一呢？”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英国外交大臣说。“除了每半年任命一次的理事会主席以外，我们能让谁来当代表呢？”使我们烦恼的并不是这件事。我们不反对同理事会主席打交道，而是反对其他成员国都拒绝同我们打交道。我对他说：

我们欢迎欧洲采取共同立场，也支持欧洲团结的想法。但是，如果这样

做的代价是我们不能同传统的欧洲朋友交谈，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可能使我们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

问题在于欧洲为什么要用这么拘泥于形式的做法来对付它最亲密的盟邦，把二十多年来精心设计的双边协商渠道堵死。我们的盟邦同世界任何其他地区搞外交时都没有采用这一方式。这种对话有一个令人奇怪——坦率地说是令人愤怒——的方面，为了避开美国总统而想出这种妙计的那些领导人同时却极力要求我们和他们一起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举行最高级会议，来结束欧洲安全会议。在这种场合，他们全都打算同来自东欧、特别是来自苏联的对手会晤，而不是把他们的理事会主席推出来充当唯一的发言人。

如果换个时候，我们会甩手不干。但当时还有一线希望，而且我们也有点进退两难。政府处于软弱地位时诚然容易采取它们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决不会冒险采取的顽固态度。由于水门事件，我们不那么想宣扬总统权威有任何降低；此外，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当时我们如果收回自己的创议，人们必然会指摘我们破坏欧洲团结。在使共同体这部笨重机器同大西洋对话挂上钩以后，我们所有的盟邦都很愿意继续按照这个程序办事，因为它对突出欧洲特性可以起烘云托月的作用。谁也不希望发生危机；然而谁也不知道如何结束欧洲年计划而又不发生危机。我们被吊在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之间；我们等待着——如果不是耐心地、至少也是保持相对沉默地等待着。

经过一个夏天的拖延，到一九七三年九月，欧洲年突然恢复了生气。我们听说共同体成员国的政治司长（相当于我们的副国务卿）将于九月十日把一份大西洋宣言草案提交各国外交部长。我们并没有得到正式通知，而是由致力于维护大西洋纽带的老朋友未经授权向我们透露的。九月八日，我国驻巴黎大使约翰·欧文

报告说，若贝尔认为我们对任何草案都会感到满意，即使草案的内容非常空洞也无所谓；赋予实质内容是不必要的。大使的报告说：

既然我们（美国）需要一份文件（即说明原则的书面宣言），那就搞一份大家（即我们和欧洲人）都能同意的文件。他认识到我们宁愿要一份有某些实质内容的文件，但暗示他认为我们只要得到文件就会感到满足。

后来证明，若贝尔这种极端玩世不恭的态度是错误的，同他的预言相反，我们宁愿让计划流产也不准备签署一份毫无意义的文件。

九月二十五日，作为欧洲对我五个月前讲话的反应，安德生外交大臣终于提出了一份软弱无力的文件；它引起一场聋子的对话。这份使我们等待了好几个月的文件却在提交给我们以前泄露给《纽约时报》了。这个事实对气氛是毫无补益的。安德生念了一份事前准备的声明，把共同体拟定的草案交给了我，但无权就草案进行谈判。这时我几乎只能哑口无言了。安德生是一个虔诚献身于大西洋联盟的人。不得不同丹麦强大的盟邦进行一场基本上属于对抗性质的外交，使他感到羞愧。但是他的同事没有给他留任何灵活的余地；丹麦在欧洲内部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发挥个人的主动。

安德生奉命建议，将来就宣言草案开展的任何谈判都应在政治司长一级进行。为了防止我们提出不同的方案，他建议几乎要立即举行会议。这等于抛弃欧洲年的一个主要目标。这种程序不可能产生任何象征新时代的文件。欧洲各国外交部里的政治司长属于文官，无权做出政治决定。交给他们的任何题目必然会得到仔细而内行的研究；至于富有远见和想象力的行动则必须留待领导他们的政治官员去决定。因此，他们建议的对话至少是非常费时间的，因为一切新思想以及一切分歧都必须转给更高一级去处理，还得经历和最初产生这份文件同样费劲的过程。安德生和我的对

话说明了大西洋两岸的差距：

基辛格：我们的问题是，从七月二十三日 to 九月十九日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磋商。你交给我们一份文件，并且要求在一星期内同政治司长举行会议。我们涉及的领域极其重要，但是并没有继续不断地磋商。

安德生：你一定理解九国取得现有协议是多么困难。

基辛格：是的，这对欧洲是一项巨大成就，但对大西洋关系则并非如此。

欧洲共同体提出的草案也不值得再费那么大力气去研究。它几乎只是摘录了另外两份文件：前一年十月发表的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宣言以及国际贸易谈判东京回合通过的原则。它强调欧洲共同体和美国各自的特性，明确要求美国承认欧洲共同体在世界事务中是一个“独特的实体”——这是一种伤感情的提法，言外之意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是反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倡议才产生的事物。文件没有提“相互依赖”，甚至也不提大西洋“伙伴关系”，更不用说需要扩大或加强这种关系了。他们提出的宣言草案既缺乏创新，也没有崇高的内容；它实际上等于要美国赞同欧洲人将近一年前在他们自己的首脑会议上作出的有关他们内部安排的决定。

同日，我对德国外交部长沃尔特·谢尔概括地谈了我的反应：

我们感觉，在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二十多年以后，我们需要对自己前进的方向有新的认识。我们希望把大西洋两岸的人团结起来，共同从事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们不应采用同敌人进行谈判的程序。

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无谓的争执可以在首脑会议上解决。但是我们的盟国显然不愿意同已经受伤的美国总统会晤。在揭露水门事件的文章源源不断出现在报刊上的时候，任何盟国领导人都看不出会见尼克松有任何好处。有些领导人认为这种会见将削弱他们在国内的地位。当我说这个程序可能会拖到第二年的时候，谢尔的答复就流露了这种精神状态。他说：“我们宁愿今年开会。由

于心理原因，今年开会较好，因为明年轮到我們担任主席”——意思是勃兰特不愿在尼克松访问期间主持会议。（说句公道话，谢尔可能认为在大西洋对话的最后阶段由一位德国总理充当欧洲发言人是不聪明的——但是，如果其他政府首脑同意与他合作，这个问题本来不难避免。）

就若贝尔而言，他阻挠大西洋对话取得明显进展是因为他唯恐使欧洲特性从属于大西洋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出现引人注目的失败，因为失败可能削弱我们为保卫欧洲承担的义务。因此，第二天，九月二十六日，我与他共进午餐时，他竭力使问题处于悬而不决的状态，既无进展，也没有失败。我们把整个情况回顾了一遍，相互虽不协调，但是快活地斗着嘴。我欣赏若贝尔的聪明和善于挖苦人的机智；他则羡慕尼克松授予我的自由处置权。若贝尔在开场白中说：“我将用英语发言，虽然这对我是困难的。”我回答说：“说个‘不’字并不需要懂得多少英语。”他几乎像患有偏执狂一样地攻击我们的动机，坚决认为我们同其他欧洲人谈话实际上是想破坏欧洲统一；当共同体宣言尚处于草案阶段时，英国无疑已经交给了我們一份。（我不懂这为什么会成为一种罪过；而且它碰巧并非事实。无论怎么说，如果希思对欧洲的忠诚还不能使若贝尔满意，那么对这两个人就都没有多大办法了。）

这样开场以后，他接着对尼克松建议访问欧洲的动机进行了恶意的解释：“关于总统的访问，你有什么想法？国内会有什么问题说明他不能来吗？或者说你真希望他来吗？”我尖锐地回答说：

总统是否出访取决于两个问题。首先是实质问题。他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周游各国首都。那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其次，在任何情况下他也不会和与他不同级别的人共同签署什么文件。他不会同比他级别低的人举行多边会晤。

为了对付后面这个问题，若贝尔有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什么不

把这件事整个推迟一年，等到一九七四年下半年蓬皮杜担任主席时来完成呢？这样做当然会加强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但它将如何解决我提出的问题——即我国总统不可能同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组成而仅仅由一位政府首脑担任团长的代表团举行会议——若贝尔并没有惠予答复。

但是，正当我们看来要无穷无尽地绕圈子的时候，若贝尔作出了比参加大西洋对话的其他任何欧洲部长都更有建设性的姿态。他提出了一份大西洋联盟宣言草案。这份草案考虑周密，同十分勉强的欧洲共同体宣言适成对比。它主要是法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那位杰出的大使弗朗索瓦·德罗斯起草的，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肯定了加强共同防务的重要性。它用适当的语言谈到使战略适应情况变化的必要性以及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关系。它非常出色地说明了大西洋联盟的目标。它有一个并非最不重要的优点，就是明确指出紧张关系的缓和使得大西洋联盟的必要性更大了，而不是更小了。

草案不足之处是缺乏政治性。它谈到要协调对待东方的外交政策，但是提法同法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一样难以捉摸。它也不谈欧洲需要努力加强防务。而我们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国会刚刚通过所谓杰克逊—纳恩修正案，把分摊负担当成美国一项重要目标；无视这个问题可能使国会再次施加压力，要求减少驻欧美军。但这些缺点是可以想办法克服的，通过认真的谈判一定可以消除。

但是我很快就了解，这只是若贝尔玩弄的基本手腕的又一个变种。他在大西洋联盟宣言方面很乐于帮忙，但在欧洲共同体宣言方面却固执己见、寸步不让，因为他认为大西洋联盟的胜利和欧洲的失败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若贝尔要美国充分承担保卫欧洲的义务，同时又希望尽可能减少我们和欧洲的政治联系。这

是典型的戴高乐主义。所谓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保卫欧洲、因此欧洲无需为美国的军事保护付出任何代价的说法毕竟是戴高乐及其一切门徒的信条。他们认为美国决不能让苏联人占领欧洲。按照若贝尔的看法，定期重申共同防御的必要性并无害处——实际上还可能有某些好处。但这并不包括进行政治磋商的义务。有什么东西能比一份强硬的北约宣言和一份软弱无力的共同体宣言更好地为这些目标服务呢？因此就出现了若贝尔孜孜不倦地支持一个宣言、而又同样孜孜不倦地阻挠另一个宣言这种咄咄怪事。

但是外交政策并不是抽象的逻辑练习；如果它忽视人们实际存在的心理状态，则无异于沙上筑屋，缺乏牢固的基础。美国舆论不会无止境地赞成让大量美军去为一个拒绝谈“伙伴关系”或“相互依赖”、在说明共同目标方面躲躲闪闪的大陆冒生命危险。我们建议举行欧洲年正是为了加强美国在道义上承担的义务。如果我们同欧洲缺乏共同目标，就会把美国的作用降低为提供战斗部队；维护大西洋关系的心理纽带就会涣散。法国的分析是符合理性的；但是在各国关系中还有一种道义和心理因素，政治家如果忽视这种因素就会碰到危险。

到九月结束时，事态的发展已足以使有关各国都有理由要把大西洋对话坚持下去。欧洲统一的鼓吹者认为对话可以促进他们的目标。那些比较小的欧洲国家想找到一种既可加强大西洋纽带、又能加强欧洲团结的方案。我们则终于得到了一份可以开始工作的草案，而且很不愿意宣扬我们的失望。承认失败可能刺激国会要求撤军的胃口（当时参议院已经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建议把我们在海外的全部驻军削减百分之四十）；它也可能使我们的盟国加快向莫斯科提出单独的外交倡议。

因此我们还是鼓起勇气坚持下去，既没有拒绝举行政治司长会议，也记住法国起草的大西洋宣言的积极特点。在一九七三年

九月二十六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给情况抹上了一层富有希望的色彩：

我们同欧洲人对话碰到的问题是几种不同的过程搅在一起造成的——有欧洲统一的过程，也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进行安全问题辩论的过程，还有涉及所有领域的、重新规定大西洋关系的问题……

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已经朝着我们今年早些时候确立的目标走得相当远了。这些讨论是有益的，并且将以富有建设性的精神继续进行下去。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争论主要涉及程序和时机问题，而没有涉及实质和目的问题。所有的人——甚至包括若贝尔——都不愿公开对抗，都煞费苦心坚持说我们的分歧只说明存在误解或技术性争论，而并不说明我们的利益存在冲突。如果让倡议自流地发展下去，完全有可能产生较好的结果；利用程序问题进行阻挠毕竟有它不可逾越的限度。结局很可能达不到我在“欧洲年”讲话中提出的最高希望，但反映其中一部分也足以指明积极的方向。

但是，中东战争的爆发结束了这种幻想或猜测。在盟国十分关切的某些问题上，我们的利益出现了分歧，有时甚至发生冲突。更令人痛苦的是，我们的某些盟国似乎在寻找机会使分歧明朗化。

中东战争的冲击

一个家庭为了装饰门面会把内部存在的严重不满情绪压抑下去，但是一旦找到借口这些不满就会加倍激烈地爆发出来。同样地，我们的联盟中积聚的紧张情绪也随着中东战争的爆发而突然发泄出来。过去只是理论上争论美国和欧洲利益是否永远并行不悖，或者抽象地辩论缓和的性质和限度；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这种辩论突然激烈起来。

从我们盟国的观点来看，他们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多数盟国

确实认为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我们未能迫使以色列接受一项解决办法，认为我们实际上是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而不惜拿欧洲人的切身利益冒险。人们以日益明确的方式提出他们过去一直隐藏在心里的看法，即：只要以色列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中东紧张局势就会突然消逝。同他们相反，我们认为，阿拉伯激进主义的产生不仅是由于阿以冲突，而且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在苏联压力下让步将加强而不是削弱激进派的地位；提出无法达到的目标将有损民主国家的威信。但是在人们感到惊惶失措而不去进行分析时，我们这些论点就更没有说服力了。我们的欧洲盟国对循序渐进的方针缺乏信心；它们认为自己可以把激进的阿拉伯国家争取过来。在中东战争以前，争执还勉强掩盖着；大西洋两岸都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调到摊牌的程度。战争一旦打响，我们许多盟国就为弥补过去的克制而行动起来。

现在谈这个问题并不是要说明谁的分析正确。我在前面各章已经详细解释了我们的理由。欧洲人的立场肯定不是没有道理的；欧洲不仅依赖石油，而且由于在他们过去曾处于显赫地位的一个地区发生危机时只能袖手旁观而感到丧气。十月战争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在出现紧急状态而它们对这种状态的起因和解决办法确实存在不同观点时，盟国之间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才合适。它们是应当利用伙伴的困难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呢，还是有义务使他们的分歧服从于这样认识，即：让那个无论如何是处于最能影响结局的战略地位的盟国遭受屈辱，将削弱共同防御结构并妨碍达到共同目标？一九五六年英国和法国企图占领苏伊士运河时，美国曾面临这种抉择。当时它把自己的判断强加于盟国。我虽然对英国和法国的军事计划持怀疑态度，但那时还是坚决反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我一直认为，我们后来碰到的许多困难都是因为我们当时对盟国采取了缺乏体谅的态度。这种态度既激

起了一种长期以来不断恶化的怨气，也使它们滋长了一种无能为力感觉，使它们加快从海外承担的义务中脱身，从而增加了美国的负担。

现在形势倒转过来，欧洲的表现也不比我们将近二十年前的做法聪明。十月六日，战争打响的第一天，英法两国就不愿支持我们要求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敦促有关各方恢复原状的建议。十月十日，我们的北约盟国土耳其通知我们说，因契尔利克空军基地以及美国在土耳其的其他设施只能供北约组织使用，不得作与中东战争有关的任何用途。十月十一日，土耳其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既然它的头号对手已公开表态，希腊是不可能长期落在后面的。十月十三日，希腊外交大臣赫里斯托斯·赞托普洛斯—帕拉马斯宣布：“美国基地与阿以战争毫无关系。”^①（十月十三日碰巧正是我们开始全力以赴地进行空运的那一天。）

佛朗哥的西班牙虽然不是北约成员国，但与美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尽管如此，西班牙政府却在十月十一日宣布，它将不容许美国“在阿以战争这一类局部冲突中”使用西班牙基地。他们唯恐这个声明还不够清楚，后来又发表了一个使人无隙可乘的声明：美国在西班牙的基地不得“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无论直接或间接”^②用于同中东战争有关的目的。

无论人们认为我们过去受到盟国批评的中东政策是否明智，当时已是势在必行，无法改弦更张；战争拖得越久，对所有民主国家的危险就越大。避免灾难的最大希望在于尽快结束战争。在这方面，西方如果显示团结，本来可能起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的盟国除葡萄牙、荷兰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段时间）外全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示同空运不发生关系，并禁止我们飞越它们的领土。从那以后，从德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就必须飞向大西洋，绕开法国和西班牙，从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然后

再直飞以色列——绕路近两千英里。（战争结束后，我曾向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抱怨说，苏联当时能够比美国更自由地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空，因为苏联对中东的空运相当大一部分都经过我们盟国的领空而没有受到挑战。）

整个战争期间，人们通过象英国这样一个同我们关系如此密切的政府所能使用的多种间接方式使我们了解，如果我们不利用英国基地进行空运或在中东收集情报，伦敦将不胜感激。他们从来没有正式拒绝我们空运，因为他们已经明白表示，我们根本不应提出要求。我们偶尔派 SR-71 超音速高空侦察机飞越作战地区（这对我们的决策过程是必需的），也因此不得不从美国基地出发，这既增加了费用，又减少了飞行效果。使飞行更为困难的是，为这些飞机加油的空中加油飞机的基地是设在盟国领土上的；现在这些基地也封闭了——我们只有玩弄某些复杂手腕才避开这种禁令。

在对待我们的态度方面，若贝尔十月十一日在华盛顿对我说的话是有代表性的。他说，法国无意参加为结束战争而进行的外交工作。只有美国和苏联能够成功，“如果两个大国意见不一致，我们就毫无办法。”若贝尔说法国不会采取任何莽撞行动，而且——对他来说是不寻常的——对我们的策略说了些好话。尽管如此，仅仅过了六天，当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他就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说，对我们进行激烈攻击。若贝尔把以色列说成是一贯阻挠中东和平的国家，然后就严厉申斥美苏两国使战争继续进行，并在道义上把两国相提并论——这是欧洲中立主义的思想前提。他说：“我们看到缓和的鼓吹者勃列日涅夫先生同现已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基辛格博士一面握手言欢，一面又把数以千吨计的军火交付空运。”

由此可知，他们不仅要在中东战争问题上同我们分道扬镳，而

且打算在同苏联的关系出现任何可能的危机时置身事外。他们对“我们”同苏联的缓和未能发挥作用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倾向——似乎我们的盟国不是早我们好几年就走上了这条道路，并且曾经对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效法他们。与此同时，他们又期望通过我们利用这种缓和的能力使危机得到解决。

北约组织的秘书长约瑟夫·伦斯曾于十月十四日公开指出，在中东战争的某些阶段，苏联违背了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一九七二年签订的国际行为准则，^③特别是违背了不寻求单方面利益的保证。这是事实。但是为什么只提美国呢？因为欧洲主要国家好几年前就签署过类似的文件，他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名义提出抗议。但是他们不这样做，而是把在中东遏制苏联的任务留给我们。只有假设美国和欧洲在中东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欧洲不象美国那么担心中东激进化的情况下，才能把苏联扩张主义看成完全是美国的问题。这种看法是荒谬的，因为苏联统治中东的影响对欧洲甚至比对我们更严重。此外，如果使克里姆林宫遵守它承担的不加剧冲突的义务是重要的话，欧洲和美国就必须共同行动。施加经济压力、放慢欧洲安全会议的步伐以至放弃这个会议、减少交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大西洋两岸联合行动。这是后来那些年代大家都看到了的。

但是，随着担心对抗的情绪的增长，我们的一些盟国却走上了相反的方向。他们继续要求以首脑会议的形式结束欧洲安全会议；他们不愿让中东问题危及他们同共产主义世界结成的经济关系网——由于石油危机触发了世界范围的衰退，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些关系对他们越来越重要了。又是若贝尔用最严厉的方式表达了这个概念。

如果说战争时期若贝尔似乎从道义上把美国和苏联混为一谈，那么战争刚刚结束以后，他在详细说明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

时，则对苏联采取了比对美国更为积极的态度。实际上，他反对苏美缓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这种缓和可能妨碍苏联大量增加它同欧洲的接触和贸易。*对他来说，缓和可以为三种目的服务（都是针对美国的）：把未能防止中东危机的责任推给缓和；利用缓和结束紧张局势；期望缓和为欧洲提供选择余地，以免它完全依赖美国。

中东一旦爆发战争，美国在战前、甚至在战争期间奉行的政策是否一贯明智就不应成为问题了。问题在于欧洲究竟是同我们分道扬镳还是同我们加强团结才最有利于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同阿拉伯激进派的主张调情究竟是保证了石油供应，还是鼓励他们拒绝妥协、从而有可能延长战争并使外交陷入瘫痪呢？提出毫无接受可能的建议究竟是有助于和平进程，还是破坏了象萨达特这样准备采取一系列可行的步骤的阿拉伯温和派的地位呢？同美国分道扬镳究竟是缓和了苏联的政策，还是诱使克里姆林宫在西方盟国之间挑拨离间、从而危及所有自由民族的安全呢？我们认为团结可能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我们多数盟国选择了分裂的道路。

* 若贝尔十一月十二日在法国议会演说时有下面几段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同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一样，我们希望缓和……就这一点来看，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是十年来作为国际局势特点的一种趋势的自然产物。在此期间，相互敌对并囿于冷战偏见的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逐渐从少量会谈开始，发展了日益密切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关系。法国在戴高乐将军倡议下沿此方向采取的行动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们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扩大这种趋势。法国同苏联以及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最高一级进行接触——例如我国总理在访问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期间进行的那些接触——是因为我们想要说明，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克服政治制度不同造成的障碍，说明人们迫切需要和平和相互了解。

但是，尽管这种磋商常常使我们有可能表明——特别是在苏联和法国之间——我们对某些世界问题或欧洲问题的分析是相同的，我们还是担心——而且告诉了我们的苏联朋友——过份重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话会使我们丧失增加对欧洲大有裨益的合作的机会。

为了避免正视这一令人痛苦的现实，欧洲提出了一个基本上属于死抠条文的论点，认为北大西洋条约规定的义务并不包括中东。但是我们要求盟国团结是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以法律条文为基础的。如果亲密的盟国相互象能干的律师那么办事，如果他们把象中东这样举足轻重的地区都排除在共同关心的范围以外，他们的关系就容易受到情绪波动的损害。

他们争先恐后地同我们分道扬镳的做法是随着停火和阿拉伯国家削减石油生产开始的。在我出发去莫斯科时，霍姆曾在一封给我个人的来信中对我此行表示热烈欢迎；十月二十一日我在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完成停火谈判后不到一小时就向英国和法国大使通报了情况；实际上，由于第十二章谈到的电讯联络中断的原因，伦敦和巴黎很可能比华盛顿更早、而且肯定比耶路撒冷更早了解我在克里姆林宫讨论的结果。但是在十月二十二日的停火受到压力时，盟国脆弱的团结就化为乌有了。十月二十三日，我们驻波恩的大使马丁·希伦布兰德突然接到通知，说联邦共和国将不再同意美国从德国港口向以色列运送设备；第二天，德国又采取了一个强硬行动。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保罗·弗兰克向希伦布兰德表示，联邦共和国在战争期间曾对我们的利益表示理解，因此现在有权要求我们理解他们的利益（似乎原来并不涉及德国利益，而是他们给了我们什么恩惠）。他们这种提法是有代表性的。

宣布戒备使局势更加紧张起来。美国甚至在水门事件造成权力危机时期仍准备为捍卫全球均势而冒重大危险。这件事原应使我们的盟国感到宽慰。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感到宽慰，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戒备问题上，因它涉及美国驻欧部队而事前又没有同他们磋商。他们提到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我们宣布戒备是因为我们深信苏联人正在考虑派兵前往中东，而我们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内提出警告，要他们住手。我们想要证明，我们对苏联干涉的前景是认

真看待的。

后来，报界报道了美国宣布戒备的“爆炸性新闻”在欧洲产生的“冲击波”。^④人们普遍抱怨说，某些盟国只是从新闻电讯中才得知戒备的消息。当然，这个说法并不适用于所有政府。正如第十二章指出的那样，早在十月二十五日，我们就把勃列日涅夫的威胁信和我们打算宣布戒备状态的对策都通知了英国大使克罗默。当时离我们做出初步决定还不过一小时，这些对策还远没有付诸实施。克罗默后来证实，伦敦同意我们对勃列日涅夫威胁的严重性的估计。但是，我们把戒备问题事前通知英国，同我们在讨论防止核战争协议（见第七章）时和它进行特殊磋商一样，使英国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不愿引人注意英国在华盛顿仍然享有优惠地位，因此英国官员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来自其他盟国的批评浪潮，而且还附和那些在磋商不够问题上发出的盛极一时的喧嚷。十月三十一日，《纽约时报》报道，希思首相前一天曾尖锐地拒绝同意实行核戒备——从而使华盛顿的情绪更加激烈起来。

抽象地说，我们盟国的抱怨是有道理的。现实情况是我们的时间太紧迫，而且不得不对各种严重问题细加斟酌。我们的目光盯着苏联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我们打算提高戒备程度并让苏联人察觉我们的准备工作，希望他们会因此感到犹豫；我们准备在华盛顿时间上午五时半左右交给勃列日涅夫的书面答复将给他们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借口。我们驻北约组织的大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将奉命在我们给苏联的照会递交一小时后向北约组织进行通报。我们选择这种时机，首先是因为我们知道，要获得盟国支持就必须重新保证我们承担的义务是有限度的；我们希望，在苏联政治局至少已经作出初步决定以前这些保证不会通过我们的盟国传到莫斯科去。

盟国实际上并不是反对这个时机，而是反对不给他们影响我

们抉择的机会。但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不容许我们交换意见；老实说，我们当时也不可能接受和我们不同的判断。要么就宣布戒备，要么就不宣布戒备，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当时涉及的问题只是戒备措施，而不是行动。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当时显然是非常时刻，作为西方安全监护人采取行动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对危险的估计是否正确必须由研究那个时期历史的学者更为不偏不倚地去确定。但是在可能出现危机的那个夜晚，我们有义务按照我们了解的事实行动起来。当然，象宣布戒备这种单方面措施只能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只要有可能就应当和盟国磋商。但是非常时刻肯定还会出现；如果在迫在眉睫的苏联干涉面前让官僚主义程序束缚自由世界安全的主要保护人的手脚，对任何人都是不利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戒备采取的疏远态度甚至扩大到我们希望借以制止正在逼近的美苏对抗的外交工作方面。为了给苏联人一个保全面子的出路——并为苏联单方面行动制造法律障碍——我们主张建立一支把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都排除在外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当萨达特接受这个建议时，我们以为已经成功了。但是英国和法国反对把他们排除在外，虽然我至今也无法理解参加联合国部队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有很短一段时间，这两个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威胁要使用否决权，尽管这样做有使苏联在中东的军队问题再次成为悬案的危险。

十月二十五日，即宣布戒备的那一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决意把它私下已经对我们讲过的话公之于众；它发表了一份语气傲慢的政府声明：

利用西德领土或设施、从美国设在西德的兵站向交战国一方运送武器是不能容许的。西德政府指望美国终将停止从西德或通过西德运送武器。

既然我们已经在执行联邦共和国私下提出的请求，因此公开声明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尖锐的危机中使波恩疏远华盛顿，借

以讨好他们心目中的阿拉伯选民。西班牙政府也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后自行宣布：美国的戒备不适用于西班牙的美国基地，因为使用这些基地需要双方同意。十月二十六日，我们的盟国在法国要求下暂停讨论北约宣言草案，借以对美国不经充分磋商就宣布戒备表示不快。十月二十七日，意大利政府的一个发言人说，参加大西洋联盟并不等于意大利有义务支持美国的中东政策。

我们觉得自己在危机时刻被人抛弃了，因而感到愤怒；一连几天彻夜不眠也使我们的神经紧张起来。所以我们作出反应的方式必然使紧张状态进一步加剧。十月二十五日，我们给波恩送去一份措词尖锐的照会：

美国政府认为：在得到苏联支持的、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面前，如果西方表现软弱和不团结，就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提出了类似的抱怨。积累的不愉快和神经紧张在十月二十六日以大量公开声明的形式爆发出来，从而证实了公众认为西方已陷入混乱的印象。我指示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告诉记者：“我们注意到一些盟国颇费力气地、实际上是公开地要和我们脱离关系。”麦克洛斯基尖锐地说：“如果我们能够得到稍许比较一致的支持，我们本来会表示感激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也参加了争吵。他在五角大楼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在欧洲的行动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战备程度。但是，

德国外交部的反应造成了一些问题，即他们是否和我们同样看待战备问题，因此我们将不得不予以考虑。

那天晚上，也就是我们宣布戒备之后还不到四十八小时的时候，尼克松凑巧也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把自己同以上批评扯在一

* 他正是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描绘了他同勃列日涅夫的戏剧性对抗（见第十二章）。

起，以赞同的口吻明确提到麦克洛斯基的简单发言，还加上他自己的花样：“欧洲百分之八十的石油来自中东。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它今年冬天就会冻死。”尼克松是暗示我们的行动（包括宣布戒备在内）对保证欧洲石油供应所做的贡献大于欧洲疏远美国的作用。那天较早的时候，我已对德国大使伯恩特·冯斯塔登提出同样论点：

我们承认欧洲人比我们更依赖阿拉伯石油，但是我们不认为你们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疏远我们就会使你们不那么容易受到损害。就阿拉伯世界来说，这种疏远帮不了欧洲人的忙。阿拉伯人知道只有美国能提供帮助，使他们得到政治解决。欧洲向阿拉伯人投降不仅不会使阿拉伯人保证他们的石油供应，而且可能在对苏关系上造成灾难性后果。如果让苏联在近东取得胜利，它就很可能在其他地方推行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政策。从减少苏联影响的角度来看，即使我们要付出短期的代价，但是我们会得到长远好处的。

我们的盟国根本不准备为减少苏联影响付出哪怕是短期的代价。德国人把维利·勃兰特十月二十八日给尼克松的信立刻泄露给报界——说明他们认为信中的论点对德国群众有一定吸引力。勃兰特对美国的行动表示了小得可怜的支持也并不是因为他赞赏这些行动，而主要是因为除了美国以外其他任何国家的力量都不足以对付这场危机。他认为有必要补充一点伤人感情的意见，说他做出这种判断时还不了解我们行动的细节，也不了解我们如此行动的详细理由。当时距离我们宣布戒备的时间已经过了七十二小时；几天来公开的和私下的通报已给他做了很充分的说明。因此，他的言外之意是我们的通报并未使他信服；要么就是我们的行动并不明智，要么就是我们对他隐瞒了消息。勃兰特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解释德国为什么禁止我们从德国兵站向以色列提供补给品。德国这么做是因为大西洋联盟的共同责任不包括中东——似乎这种联盟禁止北约盟国在欧洲以外地区相互支持。

但是，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防止苏联人或阿拉伯激进派统治中东对所有盟国都是有利的。尼克松在十月三十日给勃兰特的回信中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

你指出这场危机不涉及联盟的共同责任，向以色列提供军事装备的目的也不属于联盟的责任范围。我认为在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深深卷入此事的时候，在这场危机势将影响整个东西方关系的时候，我们无法做如此微妙的区分。照我看来，大西洋联盟不能按照双重标准办事，不能把美苏关系同我们盟国的对苏政策截然分开。我们的盟国可能认为，他们在中东疏远美国就可以维护他们眼前的经济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盟国希望把他们同苏联的关系和其他关系隔绝开来，实行有区别的缓和。这种缓和只能使我们的联盟陷入分裂，最终只能给欧洲带来灾难性后果。

这是美国同欧洲争吵的实质。早在中东战争爆发的半年以前，我们就建议设法确定共同的全球目标。我们的盟国用五花八门的实质性和程序性借口规避这个创议。他们甚至拒绝在象征西方团结的各种宣言中写进“伙伴关系”和“相互依赖”这一类字眼。中东危机突然使我们恍然大悟，欧洲提出的反对意见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仅仅涉及形式问题或规章制度问题，也不是美国说话不得体引起的——尽管我们的措词并不总是十分妥当。越来越清楚的事实是，欧洲希望得到选择的自由，使他们可以奉行一种与美国不同的政策，在中东客观上是同我们发生冲突的政策。曾经抱怨我说他们主要关心区域利益的那些国家现在突然声称他们承担的义务完全是区域性的。

从欧洲观点出发，人们肯定可以对美国的政策提出严厉批评。换句话说，各国对根本利益的看法存在矛盾；如果置之不理，矛盾就会恶化。大西洋联盟如果要保持蓬勃的生气，就必须竭尽全力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这正是我们提出欧洲年的目的。如果出现危机，大西洋两岸都应仔细衡量究竟是保持疏远更危险，还是加强团

结更危险。事实上，如果盟国想要压倒任何由于客观条件而处于最能影响事态发展的地位的伙伴，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们是否担得起这样做的后果。如果伙伴们都不愿为保持联盟的活力而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这个联盟就会走向瓦解。在一九七三年的中东，美国的失败对西方将意味着灾难——即使欧洲的估计比我们高明也罢，至于是否高明我至今仍然非常怀疑。美国政策垮台的受益者不会是西欧，而是那些不大可能对各个工业民主国家细加区别的力量。

在回顾当时的历史时，我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我们的欧洲盟国相当明确地表示不喜欢我们的政策，但他们从来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有条有理的替代办法。他们也没有正视我们战略的失败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后果——虽然他们的政策似乎是以预计我们失败为基础的。除了希思在十月三十一日曾经给尼克松写过一封考虑周到的信以外，再也没有任何人企图提出与我们不同的战略或企图进行严肃的磋商。我们的盟国满足于让我们承担外交责任，但不准备分担外交风险。

在中东政策上，实质性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战后外交的目标以及对石油禁运和削减石油生产的反应。

可能除了荷兰以外，我们的欧洲盟国对停火以后应当怎么做都有明确的意见，即美国应当施加压力使以色列立即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他们设想我们有力量迫使以色列俯首听命；如果我们踌躇不决，则一定是我们想使欧洲的利益服从我们国内的压力。当时他们还要求尼克松不顾水门事件造成的困境，顶住这些压力。至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谁也提不出明确的看法。他们也没有考虑，当埃及和以色列的军队处于相互切断对方运输线的充满危险的状态时，当一支以色列部队盘据在离大马士革二十英里远的地区时，中东面临着更为急迫的问题。阿拉伯多数领导

人，甚至包括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的领导人——这是我于十二月第二次访问中东时人们多次告诉我的（见第十七章）——都认为，使这些部队脱离接触是当务之急。我们的盟国看来很不了解他们的豪言壮语可能加强阿拉伯激进派对温和派的地位并增加苏联对双方的影响；他们似乎看不见在这个阶段试图全面解决所有问题的障碍和风险——当时我们和叙利亚还没有任何高级接触，对埃及发展的方向还没有把握，战争结束时的军事部署也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问题。所有这类论点，人们即使听取，也认为这是美国在为自己考虑不当的政策寻找理由或为继续控制谈判过程寻找托词，因此不予理睬。同大西洋对话一样，我们的盟国用程序问题掩盖实质问题；他们争辩说，他们应当以某种未予说明的方式参加战后外交谈判。然而他们具有亲阿拉伯的倾向，而且支持一种实际上根本行不通的要就得到一切、否则就不干的态度。这使他们根本不能居间调停。他们为自己只能旁观感到恼火，虽然这种旁观地位主要是他们自己的行动，特别是他们不愿采取共同石油政策造成的。

欧洲共同体的政策对争取石油生产国的善意寄予很大希望。我们的盟国顽固地拒绝任何稍稍带有“对抗”味道的措施，例如在石油消费国之间确定共同立场。石油和信念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驱使欧洲越来越激烈地反对我们的中东战略。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领导人坚持欧洲必须团结才能产生影响的说法就不仅是理论上要求从体制方面作出新的安排了——事实上我们是同意作出安排的。当时的背景使这些说法带有更多不祥的味道。十月三十一日，蓬皮杜号召欧洲制定共同的中东政策。他争辩说，必须让欧洲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由美苏解决世界危机可能造成危险，可能导致普遍冲突。这个论点如果有任何意义，它就是说，欧洲应当有权对中东事件的双方都加以反

对，并且可以在某些东西方冲突中置身事外；这是防止冲突普遍化的唯一办法。为了获得这种能力，他建议法国的欧洲伙伴定期举行首脑会议，而且立即开始。蓬皮杜的同事迅即接受了这个建议。

隔了不到一个星期，欧洲可能奉行的独立的中东政策是什么样子就一目了然了。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六日，共同体在布鲁塞尔举行外长会议。尽管我当时正在前往开罗途中，尽管他们事前已得到通报，知道我们的战略是优先解决军队脱离接触问题，而不是就十月二十二日停火线问题讨价还价，他们竟然提出一个对我们的政策进行直接挑战的方案。我们的欧洲盟国既不通知我们，又不等我出使开罗的使命产生结果就要求以色列立即撤退到十月二十二日停火线以加强停火，还要求它撤退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以实现和平。谁是谁非问题暂且不论，欧洲声明所起的作用是对我们的外交工作釜底抽薪，或表明欧洲同这件事毫无关系。两者都是不足取的。对欧洲人这种迫不及待的做法，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希望抢先表明立场，因为我们如果成功就会使他们的论点站不住脚；而如果我们失败，他们就有了一个反对我们的政纲。

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引用布鲁塞尔的欧洲“外交人士”的话指出，中东危机使人们更反对我们把“伙伴关系”和“相互依赖”这类字眼写入拟议中的美国和欧洲共同体的宣言中去。^⑤ 他们的口号似乎是要要求独立——这是同我们对立的前提条件。

如前所述，若贝尔十一月十二日又在法国国民议会发表了一篇尖刻的讲话，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谴责美国在中东战争期间不同盟国磋商，攻击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垄断中东问题的解决，从而使欧洲——用他的话来说——成为

这场冲突中一个为人遗忘的牺牲品，但终究还是一个牺牲品，尽管它不断谴责这种危险行为。它的苦恼和怨恨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也注意到：在大国的

独断独行中，它只不过是一个走卒，而不是一个工具或一种财富。它可以而且应当由此汲取一个基本教训。

许多人期望欧洲不仅作出反应，而且终于得到真正的新生……

若贝尔的讲话等于是一项建议，即欧洲明确宣布自己的特性就是不断对美国提出挑战。欧洲和美国的利益被认为是背道而驰的。欧洲只有准备同大西洋彼岸的盟国对抗才能维护自己的观点——尽管若贝尔同时宣称这个盟国仍然是共同防御所不可缺少的。^⑥既然欧洲在我们认为涉及共同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同我们脱离关系，那么美国为欧洲提供安全保证的可信性还能保持多久呢？这个问题私下很少讨论，公开则根本没有讨论。

十一月中旬，勃兰特对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又重弹这个调子。他说：“世界的命运不能也不应当仅由两个超级大国来决定。在这个世界中，统一的欧洲的影响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十一月二十日，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在哥本哈根开会，为举行欧洲首脑会议讨论中东危机进行筹备。尽管当时我们正在为推动中东走向和平、为召开日内瓦会议进行微妙的谈判，他们却丝毫不向我们透露他们得出的初步结论。

在正常情况下，来自我们盟国的这种攻击原应使美国内部加强团结。支持美国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基石参预世界事务的两党领袖本应团结起来捍卫已经取得的成就——就象他们曾在一九七一年反对曼斯菲尔德主张从欧洲撤军的修正案那样。

但是一九七三年并不是一个正常年头。在水门事件造成的气氛中，欧洲关于美国推行高压外交的指摘找到了愿意接受的听众；大西洋联盟的许多传统支持者在任何问题上都不相信尼克松可能是正确的。《纽约时报》十月三十一日发表社论，附和其他主要报刊的观点：

华盛顿虽然信誓旦旦地说要磋商，但没有磋商；在必然影响盟国利益的

军事戒备问题上，它决定不预先通知盟国。这种情况同本届政府令人沮丧地为大家熟悉的办事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尼克松先生和基辛格国务卿可以口若悬河地大谈美欧关系的必要性；但是他们的行动，特别是危机时期的行动，同他们的言论并不一致。

十一月初，爱德华·M·肯尼迪参议员发表了一份长达五页的文件，指摘尼克松政府“肆无忌惮地在大西洋联盟中制造危机”，并要求重新肯定“盟国协商原则”。^⑦十一月二十一日，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教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重弹当时已经开始成为党派之争的调子。他写道：“难以想象有什么方针能够比美国最近单方面奉行的方针更为蓄意地破坏联盟关系，特别是破坏盟国协商的概念。”^⑧

当然，问题远比协商不够更为严重。这一点从英国对我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反应中表现出来。我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大西洋联盟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同时，

人们无法避免得出或许是令人悲哀的结论，即我们的某些欧洲盟国认为自己的利益同美国利益大相径庭，以至准备在具有严重国际影响、而且我们碰巧认为对它们也同样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上同美国分道扬镳。

最后，我指出缺乏磋商并不是主要问题：

说明这种状况的一个根本事实是，磋商最多的国家后来证明是最难合作的，而最合作的国家却是磋商得最少的。

我的讲话本来是和解性的，但最后这句话引起了希思的争论，因为他——正确地——认为我心目中磋商得最多的国家之一就是英国。他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同美国记者共进晚餐时发泄了这种情绪，开始是“不做记录的”，但是随着他谈兴的高涨也放松了这种谈话的基本规则。希思的谈话无意中强调了我的基本观点。磋商不够只是造成欧美分歧的表面原因；真正的困难在于政治观点的冲

突，而这是无论进行多少磋商都无法消除的。我们的大使馆把希思的看法报告如下：

美国和欧洲对中东问题从来就缺乏共同的认识。“我不想提出苏伊士运河问题；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中东不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管辖范围。六年来——从一九六七年战争开始算起——美国有充分的机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它进行谈判，但却无所作为。当我们举行四国会议时，美国人警告我们不要插手。我们大家都了解将要出现什么情况；这种情况的确出现了。另一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希思讲话的主要内容表明，他认为英国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就不同意美国的政策，而美国在制定中东政策时根本没有考虑英国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方采取单独行动都会促使另一方采取单独行动，使这种行动成为一种自动实现的预言。把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从中东和平会议中排除出去是令人恼火甚至感到屈辱的。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肯定使以色列无法把他们看成是不偏不倚的；甚至对我们说来，欧洲人似乎更接近苏联的立场，因此客观上起了阻挠我们认为可能实现的唯一战略的作用。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我们某些主要盟国最关心的并不是制定长远战略，而是结束阿拉伯国家针对他们实行的减少石油生产——必要时这些盟国会不惜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了在我们万一失败时保护自己而织造安全网和推动我们走向失败——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美国同它的民主盟国不仅在走向分裂，而且在走向竞争。对这种趋势感到不安的不仅是我们。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对此也十分关切，因此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他的首相大发雷霆的第二天）以个人名义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坚持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英国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的关键。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甚至在认为美国政策是错误的时候也盲目予以支持，我想你们就不会把我们看成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朋友和盟国。”他解释说，英国多年来

一直主张在中东采取首尾一贯的政策，并没有由于最近事态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然后，他概括了他对如何克服危机的看法：

在可能导致严重对抗的东西方关系问题上，我们坚定地同美国站在一起。如果出现任何捉摸不定的情况，我们在衡量孰是孰非时会决定性地倾向美国一边。但是，从你们方面来说，你们必须尽可能缩小捉摸不定的范围——使我们更有系统地了解你们内心的考虑，在危机和对抗还处于酝酿阶段时就同我们磋商。我认为这也适用于中东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我认为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对我们以及其他国家的中东政策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国家为此有大量的话、或许还不止大量的话要说……我相信，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恢复过去那种亲密关系。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说明这个目标是无法达到的。

我曾经强调指出，霍姆是我有幸见到的最明智、最正派的人士之一。我们从来不曾怀疑，大西洋伙伴关系对他是一种道义上的需要；霍姆不象他的首相，并不认为英国在欧洲的事业需要放松大西洋两岸三十年来建立的联系。他的信件的内容很少是我不同意的。他对美国过去政策的批评也有一定道理。我们方面则愿意——不，应当说是迫切希望——改善磋商程序。使我感到关切的是欧洲共同体采用的新程序正在妨碍这个目标。至于如何使欧洲特性同大西洋伙伴关系——特别是这种“特性”在中东问题上同我们的特性直接发生矛盾的时候——协调起来，我们谁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在霍姆的敦促下，我们决定再做一次尝试。

北大西洋理事会和移民协会讲话

十二月，大西洋联盟全体成员国的外交部长都来到布鲁塞尔，参加北大西洋理事会半年一次的部长会议。气氛远非理想。我们意识到——很可能是过分执着地意识到——自己胸中的不满情

绪。属于九国集团的盟国似乎被欧洲统一过程迷住了。从他们的行动来看，似乎只要指出使欧洲取得一致意见是多么复杂的任务，而这个任务进行得比任何人可能设想的都要快就足以回答我们对实质问题的关切。

然而这次会议必然会起一种缓和作用。北大西洋理事会是北大西洋联盟体制的具体表现。它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要加强共同安全——即使在最紧张的争执中也没有任何盟国对这一目标提出异议。它采用的程序比较强调意见的一致性。正如法国利用意见一致程序统治欧洲共同体一样，我们作为提供核保护伞的国家在理事会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非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盟国不希望大西洋两岸的争吵损害他们的安全。九国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在不受共同体程序约束时都亟于避免在（得到英国支持的）法国和美国之间进行选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精力充沛的秘书长约瑟夫·伦斯对任何脱离他关于盟国团结的需要的概念的人都会象长辈一样进行叱责。

整个说来，布鲁塞尔会议的确有助于治疗创伤。我到达布鲁塞尔时发表了一篇和解性声明，重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这种陈词滥调似乎起了平息怒气的作用，虽然人们在说这句话时包含着显然不同的政策。我还要求采取新的有远见的行动使联盟更富有生气。第二天我专门同各国外交部长举行单独会晤。最初两次谈话是同在整个中东危机期间一直支持我们的盟国——荷兰和葡萄牙——的部长进行的。这是最近出现的不愉快情绪留下的主要痕迹。正如人们引为自豪的许多微妙手法一样，这种做法的意义显然遭到我的同事的忽视。否则就是他们认定注意这种手法毫无意义。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每次开会都为美、英、法以及联邦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提供了共进晚餐的机会。北约组织不承认按国家大小

或影响划分等级的制度，因此举行这种等于四大国会议的晚餐的借口是他们对管理柏林负有特殊责任。从一九七一年签订柏林协议以来，有关柏林的事就不多了；有问题也可以在几分钟内解决。剩余时期专门用于回顾国际局势。十二月九日的晚餐进行得颇为融洽。霍姆鼓起勇气极力为最近的分歧进行粉饰，强调人们熟悉的法律条文，指出大家从来不认为北约组织在中东负有什么责任。欧洲各国彬彬有礼地抱怨在军事戒备问题上缺乏磋商。我回答说，我们的努力已经防止苏联武器取得胜利，并且正在削弱苏联的影响——这个目标对所有盟国都是有好处的。若贝尔收敛了他恶作剧的一面。他仅限于提出尖锐的事实问题，并且答应在第二天的全体会议上发表一篇心平气和的演说。

由于我们对西方防务作出了关键性贡献，全体会议必然要围着美国国务卿转。他的讲话是一个重要项目。十二月十日，我敦促会议制定一个三点方案：尽快完成两个联合宣言；为磋商北约组织范围以外的共同问题制定程序；共同对付能源危机。为了减少人们对磋商不够的怨言，我建议定期举行副外长级会议来协调北约范围以外的政策。法国人在五月份举行的雷克雅未克会谈中已经半心半意地接受了这个想法——至少我们是如此理解的——但是从未付诸实施。

若贝尔坚持要在最后发言。我不了解他是一直就想发动进攻，还是我的发言促使他进攻的。无论动机何在，他撇开我加强磋商的建议，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对所谓两个超级大国建立共同统治进行他现已排练成熟的攻击。他引用《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中的磋商条款作为最突出的例证（见第七章）。他暗示只有自行制定政策才能更好地为欧洲服务。我利用很少使用的答辩权进行了尖锐的反驳。我解释了那个协定的条款，其意义和历史若贝尔完全清楚。最后，我说：“我重申这些事实是为了公开记录在案。如果

这些条款继续遭到曲解，就不可能是出于无心了。”

但是这场风暴很快就过去了。对若贝尔来说，北约组织不是发动攻击的好讲坛。能言善辩并不能抹杀二十五年合作的记忆。第二天早晨，若贝尔和我在早餐桌上见面。我们私下的接触从来都是愉快的，甚至是一种享受，因为我这位法国同事具有非凡的魅力、透彻的理解力和敏锐的机智。为了表示善意，他撤消了他过去反对我和欧洲共同体各国外交部长举行会议的意见。

同九国外长(其中八国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只有爱尔兰是例外)举行会议居然成为大西洋关系中的一个问题，这说明大西洋团结被正在脱颖而出的欧洲煞费苦心制定的程序——至少是若贝尔运用这些程序的方式——扼杀到何等程度了。若贝尔禁止在拟议中的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宣言中使用“伙伴关系”、“相互依赖”等字眼，而且反对美国同欧洲进行任何部长级讨论。这种立场之荒谬一定使若贝尔的同事都感觉太过份了。丹麦外交大臣安德生肯定有这种看法。他当时作为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正在庄严而能干地执行自己的职责。若贝尔可能感觉到自己在北约组织会议期间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无论出于什么解释，我在北大西洋理事会闭幕以后、在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同共同体九国外长举行了会晤。

局面是离奇的。我同其中八人刚刚在一起度过近三天时光，和他们集体地和个别地会晤，确实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可谈。此外，为了照顾法国人不愿使欧洲共同体“溶解”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敏感，我的同事们认为，在布鲁塞尔郊区的北约总部开会是不明智的，虽然我们碰巧都在那儿，因此那是最方便的地点。若贝尔不愿在任何官方建筑(例如大使馆)内开会，其原因如果我当时知道的话，现在也想不起来了。作为折衷，我们决定在布鲁塞尔的希尔顿饭店里安德生的套间开会。

外交史上不会把这次会议作为一次曾经增加任何人的知识的会议记录在案。唯一例外的是喜欢恶作剧的爱尔兰外交部长加勒特·菲茨杰拉德。他从来没有见过横跨大西洋的部族仪式。为了他的缘故，我再次阐述了支持欧洲年的论点。这些话我的其他一些同事肯定都听腻了。还有两三位部长也不得不敷衍地谈些意见。他们的创造性并不比我高明，也找不到什么独出心裁的话可讲。这一套玩艺儿对菲茨杰拉德都是新奇的，因此使他十分开心。但是，尽管他头脑敏捷、富有机智，还是无法使会议超过一小时。若贝尔为此感到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希望确保这次会议不致出现什么因素鼓励人们把它变成一种例会。

作为九国集团主席的安德生已经到了任期的最后一个月。会后，他喜气洋洋地同我一起下到一楼，把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消息告诉等在那里的记者。这位丹麦人是共同体死抠法律字眼的形式主义和我们关于伙伴关系的抽象概念之间角斗的无辜受害者。会开完了——至少对作为主席的他来说是结束了——似乎使他感到慰藉。照我看来，这次会议突出表现了美欧关系的病态，而不是使它有所缓和。

因此，我再次作出和解的表示以结束争吵。很早以前我就同意在伦敦的新大陆移民协会发表讲话。这是一个很有威望的组织；顾名思义，它的宗旨是确认英美关系。由于中东战争的缘故，我不得不一度取消这次访问。这次讲话被重新安排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之后，亚历克爵士主动表示愿意充当我的介绍人。在整个困难时期，他都不遗余力地加强欧美之间的纽带。他慷慨地赞扬我的布鲁塞尔之行，认为它“使联盟得到加强”。他还使欧洲为大西洋两岸的紧张关系承担了部分责任。他对记者说：欧洲人“没有象美国那么快就认识”中东战争的战略意义。

十二月十二日晚间，我在协会举办的庄严隆重的宴会上发表

演说，再次概括了我们建议举行欧洲年的理由：欧洲实力的增长、核均势的出现、紧张局势趋向缓和时期的影响、我们的经济日益相互依赖。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人们的心理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情况有可能削弱盟国团结的道义基础。我说：

欧洲、加拿大和美国下一代领导人不会象大西洋联盟的缔造者那样对联盟有一种个人的怀念，也缺乏他们那种献身于这个联盟的感情。即使在今天，大西洋两岸的多数人都对促使联盟诞生的威胁缺乏体会，也不感觉联盟的成长是自己的成就。即使在今天，美国还有四十多位参议员一贯投票要求单方面地大规模削减美国驻在欧洲的部队。即使在今天，欧洲还有一些人竟然认为应当用摆脱美国的程度来衡量自己的特性。在大西洋两岸，我们都面临这样一种反常的、也是危险的局面，人们在心目中越来越把同敌人的关系视为外交政策的胜利，而吵嘴和放任自流似乎成了盟国关系的特征。

然后，作为同欧洲盟国对话的基础，我列举了美国政策考虑的四个基本因素：东西方共存的必要性（同时提出警告：“我们必须注意，追求缓和不得损害使缓和成为可能的各国友谊”）；共同防御的必要性；欧洲团结的现实；以及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的事实。我们愿意按照这个议程或欧洲可能提出的任何其他议程进行深入细致的磋商。与此同时，我告诫说，这种磋商不能太拘泥形式：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记住，即使是最好的协商机构也不能代替共同观点和共同目标；它无法取代作为大西洋两岸关系、特别是英美关系的真正支柱的一系列无形的纽带。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以免用过分拘泥法律条文的方式对待欧洲团结问题，从而丧失我们联盟的独特之处：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欧洲和美国相互之间并不认为对方是搞传统外交的外国，而是从事共同事业的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成员。从事这一事业有时是痛苦的，但归根结底总是相互合作的。

放眼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挑战，相形之下我们最近的争执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正在取代战争刚结束时建立的结构。中国和苏联的

对外政策正处于过渡时期。西欧正在走向统一。新建立的国家要求确立自己的特性，并发挥适当的作用。即使是现在，经济关系也比培育这些关系的体制变化得更快。我们——欧洲、加拿大和美国——只有两种抉择：共同进行创造，否则就分道扬镳。

我要求各工业民主国家组成一个能源行动小组，作为发挥新的创造性的例证。参加这个小组的

富有威望的高级人士的任务，是在三个月以内制定一个在有关能源问题的一切领域内进行合作的初步行动方案。至于九国集团的成员是否宁愿作为欧洲共同体参加这个小组，将由他们自己决定。

在结束讲话时，我再次呼吁道义上的团结。我说：

无论从责任心还是从自我利益出发，我们都有一切理由要维护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伙伴关系。美国将致力于使大西洋共同体同过去一样继续成为一支富有生气的积极力量。最近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必须予以更新。这不是美国对欧洲提出挑战，而是历史对我们大家提出的挑战。

我不惜篇幅地引用这次演说的内容是因为我认为，维护和欧洲之间生命攸关的伙伴关系比其他任何目标都更为重要。在这次讲话中，我力图平息欧洲人过去的各种不满，为进行更密切的磋商开了一张空白支票，明确肯定了欧洲的全球责任，正式埋葬了所谓我们试图使欧洲仅起地区性作用的谣传。我建议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曾经使我们的盟国接近惊惶失措的能源问题（见第十九章）。

我在移民协会的讲话原应消除一切可以用语言加以消除的怨气。由于许多怨言是针对我最初就欧洲年问题发表讲话时的某些提法，我不是撤消了这些提法，就是根据当时的背景进行了解释。这样做本应使合作精神得到恢复。

但是，后来的事态证明，问题比我所想的要深刻得多。我们希望使大西洋关系具有一种新的目的感；我们的盟国则优先考虑建

立统一的欧洲。而且他们认为——照我们看是错误地认为——这两种事业是无法齐头并进的。无论怎么说，两方面的努力都经常被国内动乱、外国危机以及两种重要事业相互冲突的时间概念所打断。不久以后，我们就重新陷入了已经过去的一年当中发展起来的那种局面。

我离开伦敦去探索中东和平进程——基本上是单方面行动。几天后，欧洲共同体的各国政府首脑就在哥本哈根开会，同样是单方面地试图确定他们的特性。他们对我在移民协会的演说没有作出响应，对我提出的新的协商办法和建立能源行动小组的建议都不予理睬。他们准备具体讨论的是中东问题。他们再次呼吁全面解决——而我当时正设法召开日内瓦会议，试图在分阶段进行的基础上开始脱离接触的过程——甚至激进的阿拉伯国家也支持这种做法。这一次我是在利雅得听到有关欧洲声明的消息的。我还获悉，我们的盟国将不会满足于发表宣言：法国人正在要求举行单独的“欧洲—阿拉伯对话”。按照欧洲已经宣布的目标，这种对话必然会同我们的努力发生矛盾。欧洲首脑会议还有一件事令人想起我们日益增加的分歧。一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也出现在哥本哈根。他们在会晤共同体各国政府首脑方面似乎没有什么程序性困难——事实上，比尼克松在追求欧洲年的过程中碰到的障碍要少得多。他们同美国总统的情况不一样，没有人提出这些外交部长只能会见共同体主席。诚然，有些盟国声称这些阿拉伯人的出现是出乎意料的；这件事完全是临时安排的。我们心中有数，他们也明白这一点。

十二月十九日，我在这种气氛中前往法国外交部拜会若贝尔，向他通报我刚刚结束的中东之行和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同往常一样，个人的善意和小翼翼的角斗混杂在一起。若贝尔询问我处在真正的朋友当中有何感觉。我说，无论是真是假，只要同朋

友相处我就感到满足。他喜欢说怪话，也爱开玩笑。他乐于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个人的看法不同于民族利益或他的总统强加于他的政策；他对我说，他实际上同意我们在中东采取的分阶段进行的方针。不幸的是，他作为法国外交部长不得不采取不同的立场。他将尽可能搞得慢一点、更巧妙一点。我问他为什么采取违背自己信念的行动倒会符合法国的利益。他说，法国必须在中东保持自己的体面。说到底，美国已把欧洲踢出了中东。对此我予以否认。我问道，如果法国在中东，它打算干什么呢？若贝尔回答说，原则上，留在中东对法国是一种很大的满足，但事实上他确实不知道法国想干什么。

这样说来，一切姿态和磨擦都不过是门面问题吗？若贝尔没有透露自己的想法。相反地，他在实际上声称他个人同意我们的中东政策以后，就开始就欧洲问题同我们捣起乱来。他指摘我们在所有国家中居然选中卢森堡来阻挠九国集团的团结。这种说法之荒谬甚至连若贝尔也无法自圆其说，因此他又用一句怪话来结束讨论：“行了，反正你们决不会有一个强大的欧洲。”既然如此，发表那些激烈讲话和挑战性声明又是为什么呢？若贝尔像一个命定要为自己国家的荣誉、即使失败也要干到底的人那样行事。他对各种大西洋宣言也同样含糊其词。他可能插手也可能不插手为欧洲共同体起草宣言；究竟如何，他将在一月初告诉我（事实上从来没有告诉）。他断言，无论怎么做，结果都不会有多大的区别。若贝尔看到了局势中存在的各种复杂问题，但看不到可能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的方向。或许他感觉任何解决办法都会威胁法国在欧洲的卓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对法国来说，最好的结局就是什么事也不要发生；按照这种解释，保持僵持局面对若贝尔是有利的。

第二天，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我最后一次会见乔治·蓬皮杜。实际上，他谈的也是同一问题。蓬皮杜是用比若贝尔更强

硬的材料制成的，不像若贝尔那么爱开玩笑，而且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后来我才知道，极大的肉体上的痛苦几乎不断地折磨着他，但当时他并没有显示痛苦的迹象，而是保持了他一贯雍容华贵的气派和彬彬有礼的态度。但是，也许是由于命运强行缩短了他的生命，使他对一切可以想象的创议都以不寻常的粗率方式加以拒绝。他宣称法国对日内瓦会议不感兴趣，因为苏联和美国已经把法国排除在外了。至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他对任何使这种关系法律化的企图都表示怀疑。他说：

我作为一个法国人可以告诉你，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搞一个正式宣言作为欧洲同美国关系的基础。但是我们对此尚无定见——我们倾向于根本不搞什么宣言，或者只搞一个很简短的宣言，而且要由欧洲采取更多主动。这就可以不需要由美国“正式批准”。

他也反对我建议的能源行动小组。石油消费国搞任何组织都有同生产国发生对抗的危险。断绝法国石油供应的可能性即使微乎其微，也是他不愿接受的；因此，组织消费国集团毫无意义。

如果法国坚持在中东问题上自由行动、拒绝参加能源消费国集团、并认为任何大西洋宣言都毫无意义，大西洋对话就没有多少内容了。当有关前途的两种观点发生冲突时，势必只有一种观念可能被证明是对的。通过预见不能创造的局面必须通过亲身体验才能实现。大西洋国家的不团结使他们注定要经历这样一种最痛苦的受教育的过程。欧洲年就算过去了。

毛病何在？

失望是多种因素加在一起的产物。一九七三年人们提出的大部分批评现在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有些批评本来就不足挂齿或出于党派观念，例如说我们同敌人谈判比同盟国谈判更感到自在，我

们同欧洲国家磋商不够，我们对朋友施加压力等。

同极权政府谈判的复杂性诚然较小，但是我们致力于欧洲年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向共产主义世界提出的任何倡议。因此我们才在多次遭到拒绝后还把另一边脸颊凑上去准备挨打。至于磋商问题，我前面的叙述相当充分地证明有关欧洲年的磋商是不计其数的。

我们无疑犯了战术错误。企图由国家安全顾问来提出这种重大外交政策倡议是颇为尴尬的。但是总统希望这么办，而在罗杰斯国务卿即将离职的情况下我确实很想试一试。在其他方面，我们曾经撇开国务院办事并获得成功。但是美欧关系无法先搞秘密外交，然后发表惊人的声明。牵涉国家太多，无法使用秘密渠道。北大西洋外交有早经确立的磋商方式，各国官僚机构都小心翼翼地、有时是很激烈地维护这种方式。如果我从一开始就担任国务卿、而不是国家安全顾问，我很可能对于使盟国外交部参预其事的必要性更为敏感。但是从白宫来看，同各国政府首脑打交道比较容易。这就得罪了各国外交部的专家，而我们的倡议所要求的细致的谈判离开这些专家的善意是不行的。

这都只是表面的困难。真正的问题更为深刻，包括中东冲突、东西方关系、欧洲加强政治团结的运动以及水门事件等四个方面。

中东危机使大西洋关系中两个基本问题表面化了：在虽不属于正式条约义务范围、但涉及每个伙伴的切身利益的领域里，盟国应当怎么办才正确呢？当盟国在政策问题上出现根本分歧时，他们应当怎么对待呢？当然，不是盟国的一切分歧都会产生同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对一方的影响特别突出，寻求一致意见是没有多大好处的。在这种情况下，谅解和默认——或者是静悄悄地磋商——可以防止分歧达到危险程度。我们对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就采取了这种态度。困难在于有些问题涉及双方类似的利益，而看

法却不同。中东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关于法律义务问题，我仍然认为，如果把大西洋联盟降低到只剩下法律内容，迟早有一天即使在正式义务包括的范围内它也会不起作用的。联盟的生命在于这样一种共同信念，即每一个盟国的安全，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都关系到其他盟国的切身利益；在发生危机时，他们决不能采取找律师核对、搞清楚自己是否对此负有法律义务的态度。归根结底，西方联盟不仅必须得到各成员国理智上的支持，而且必须得到它们感情上的支持。因此，当一个伙伴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时，即使这种威胁从技术上说并没有包括在联盟条约的任何条款之内，也不能漠然处之。如果西方安全受到威胁，这种威胁究竟来自何处显然不会形成决定性的区别。苏联如果统治中东，就会控制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生命线；欧洲肯定会垮台，正如苏联部队推进到英吉利海峡时的情况一样。如果激进的阿拉伯政权占了上风，结果也是同样的，过程则可能更为曲折——尽管某些欧洲国家并不同意这种判断。

盟国在北约组织以外的领域里保持团结，从理论上说是重要的。但是，在观点根本不同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什么呢？盟国是否必须使自己的判断服从一个地位较高的伙伴单方面做出的决定呢？我们的欧洲盟国就经常这样提出问题。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是无法回答的。必须作出重大的、远远超过已经做过的努力来避免出现这种矛盾。如果分歧无法调和，某个伙伴就必须十分英明地靠边站一个时期，至少让一种政策有取得成功的机会。如果所有盟国都坚持实行自己的不同观点，毫无疑义，就会出现竞争和冲突。双方都要冒既使对方遭受挫折、自己也无法达到目标的危险。分歧会引诱外界施加新的压力；联盟就有垮台的危险。

一九七三年秋天，大西洋联盟似乎无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无论我们某些盟国对我国战前的中东政策是怎样判断的，我在这

一章叙述的他们的行动的实际效果是，如果他们成功，就会使我们的战略陷入瘫痪，如果失败，就会突出欧洲的无能为力。无论是好是坏，我们毕竟是能够取得迅速进展的唯一盟国，而这种进展又是消除危机、减少苏联攫取政治利益的机会的先决条件。在如何处理违反停火事件问题上，欧洲同我们意见分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在我到达开罗的那一天公布自己的观点，则给我们和萨达特的战略增加了困难，最后对任何自由国家都不利。

在这一章里，“欧洲”这个词事实上用得并不恰当。反对我们的力量是以米歇尔·若贝尔为代表的法国领导的；它得到希思的支持并为勃兰特所容忍。希思和勃兰特这么做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比、荷、卢三国和丹麦、意大利对日益增加的对抗是感到不安的。尽管他们私下也有保留，他们并不想对我们的中东政策表示异议。但是他们也珍视共同体新出现的政治体制，因为这种体制加强了共同体表面上磐石般的团结。欧洲共同体似乎是用两种办法中的一种取得政治一致的：或是用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空洞、含糊的词句统一思想；或是一个伙伴热烈鼓吹某种政策，而那些不太热烈、甚至还略有不同意见的伙伴则认为自己有义务予以支持，以便维护欧洲团结。

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他们促使我们提出倡议，同时又是使这种倡议陷入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想使民主国家在如何对待共产主义世界的问题上保持心理上的平衡。正如我在移民协会讲话时所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克服公众越来越用我们同敌人的关系来衡量外交政策的成功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我们确实想要重新肯定大西洋团结，并准备使缓和政策服从盟国的一致意见。但并不是我们所有的盟国都愿意这么干。好几个盟国单方面对东方提出倡议，在国内和国际方面都下了很大的赌注。第三五五页引用的若贝尔讲话表明，我们的某些伙伴希望我们放慢争取缓和的

努力,从而使他们可以加快自己的努力。

法国和德国虽然迫切希望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但不愿以协调西方政策作为代价。勃兰特不希望他的东方政策受到必须在更大范围内使大西洋国家意见一致这种需要的约束。德国自行其是的外交引起了巴黎的不安。早在七十年代初期,蓬皮杜就曾用靠拢我们的办法同德国抗衡;一九七三年,在若贝尔影响下,对波恩的怀疑曾经激发蓬皮杜的戴高乐主义本能,使他试图用强调欧洲利益和美国利益截然不同、并且同德国竞相接近东方的办法来箝制德国。欧洲竞相接近莫斯科迟早可能成为欧洲芬兰化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同美国的政治纽带的松弛不可能永远不涉及安全领域。但是,在一心考虑眼前策略、而政治家们又经常以此来掩盖对前途的深切忧虑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不是被置诸脑后,就是遭到忽视或嘲笑。

造成僵局的第三个主要原因在于欧洲的政治时刻表同我们的时刻表不协调。既然越南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来克服国内的创伤。但是我们的盟国并无此种迫切要求。相反,他们感觉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经过长期拖延以后,共同市场已经在一九七三年初从六国扩大到九国。我们建议讨论大西洋关系不可避免地——虽然并非故意地——提出了谁将代表欧洲发言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欧洲人制定了一套极为拘泥形式、同任何正常概念的协商都不合拍的程序。甚至那些认为加强大西洋纽带同欧洲团结并不矛盾的领导人也担心欧洲无法同时兼顾这两个过程。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接近于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们本来会选择另一种时刻表。我们本来希望使新的九国共同体有时间逐步安顿下来,经过更充分的考虑逐步取得共同的立场。但是大西洋两岸和日本的事态造成了压力,使我们大家都不得不加快步

伐。

其他国家，特别是比较小的国家，则同意让·莫内的论点，认为大西洋两岸的对话实际上可能有助于欧洲团结，因为它迫使欧洲用一个声音讲话。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使我们陷入了欧洲十年来的争吵。在这场争吵中，法国坚持要在统一的欧洲起领导作用；比利时这样的国家坚持形式上的平等地位；联邦共和国则在这两种不同概念之间左右为难。

某些欧洲人——特别是法国——认为欧洲团结同达到团结的方式是分不开的。他们不希望这种团结来自美国的创议。英国的希思也有类似想法，因为由美国提出创议至少会使他面临不得不在巴黎和华盛顿之间作出抉择的讨厌的前景。他认为这正是一九六三年他为使英国进入欧洲而进行的谈判流产的原因。他甚至在还不需要作出抉择时就先发制人地选择了巴黎。勃兰特开始最乐于帮忙，尽管在一九七三年的情况下所谓帮忙也是相对的。但即使是他也不愿为此同法国和英国同事发生争论，特别是在他宁愿避免加强大西洋纽带、以便保持执行东方政策的行动自由的时候。

使我们左右为难的是：如果我们像莫内建议的那样促进欧洲团结，就一定会重新挑起六十年代的法美争论，因为巴黎会认为我们是在对它争取欧洲领导权的努力进行挑战。考虑到法国的敏感，我们是通过法国而不是通过欧洲共同体同各国打交道，这样就疏远了我们的创议的许多天然支持者。为自己免于受到排斥，那些比较小的欧洲国家就紧紧抱住欧洲共同体那种未经考验的、旷日持久的、已成为困难主要来源的协商程序不放。结果是殊途同归：我们最后还是同法国争吵起来。我想这大概可以证明：如果因为前十年工作失败现在就反其道而行之，并不能永远保证成功。

一位高屋建瓴的欧洲政治家本来可以把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变成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反应。不幸的是，有可能起这种作用的欧

洲主要领导人当时都有自己的问题。一九七三年，蓬皮杜已经开始受疾病折磨。这种折磨，再加上治疗疾病的药物的影响，使他无法象不断制定政策所必需的那样集中精力和保持内心的冷静。他需要竭力控制自己才能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十分成功地掩盖了自己的痛苦，以至我们的情报分析人员还辩论过他的疾病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他知道自己的时间有限，因此急于作出安排。他很容易生气，对高压手段特别感到厌恶。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上帝赐予他更长的生命，他本来不会这样。我们曾经指望蓬皮杜在欧洲年问题上会是我们的盟友。我相信在一般情况下他本来会如此的。

参加大西洋对话的其他主角也命途多舛。由于个人或国内原因，他们几乎同时丧失了前途和权威。维利·勃兰特在他的东方政策取得象征性突破后，在他的专门才能不大适应的经济政策和日常外交工作方面碰到一大堆琐屑问题。撤换他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到六个月，他自己的党就找到一个借口撤消了他的职务。当我们提出倡议时，爱德华·希思似乎还在英国处于支配地位。一九七三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为英国的工业政策问题卷入了精疲力竭的斗争。

但是，尽管欧洲各种踌躇不前的表现有其合理的基础而我们对此有时缺乏敏感，尽管欧洲各国有一大堆自己的问题，但他们用一种粗鲁的、而且是不屑一顾的态度对待使他们得到经济复兴、在安全方面他们还继续依靠的国家总是不大说得过去的。肯定欧洲的特性并为欧洲团结而努力是一回事；采取故意同美国对抗的策略来达到这个目的则是另一回事了。

欧洲在确定他们自己内部的安排时可能不希望美国插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按照莫内的说法，欧洲一体化也总带有某些对华盛顿保持独立的动机。如果我们的盟国使欧洲年迅速得出

结果、然后以新确定的大西洋关系为基石精心安排他们的体制，他们本来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而且以更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达到这个目标。一年后产生的大西洋关系宣言本来可以在提出建议后三个月内草拟出来并在大西洋联盟首脑会议上圆满通过。但是我们的盟国却选择了一种伤人感情的、行不通的、破坏性的程序。这种程序后来再也没有人遵守了。

欧洲领导人就程序问题和技术问题提出的反对意见一部分是水门事件的反映。和他的所有同事比较起来，尼克松面临的危机当然最严重，虽然他保持职务的时间最长。面临弹劾的美国总统根本不可能领导西方重申道义上的一致。

从九月份一篇报道中，我们看到说明水门事件影响的有趣的证据。这篇报道谈到比利时外交部政治司长艾蒂安·达维浓的看法。他认为若贝尔对迅速结束欧洲年有了新的兴趣，因为他预料水门事件到十一月就会过去，那时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将得到改善。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大量其他证据。尼克松第二届任期开始的时候，英国曾经研究过请他进行国事访问（即总统以国家元首身份访英并住在白金汉宫）的问题。当水门事件的严重性充分显示出来时，这种讨论就冷下去了。维利·勃兰特的邀请从技术上说仍然有效。但是据可靠报道，德国外交部的常务负责人曾经说，总统的访问可能引起“缺乏克制的事态”——这是公开示威的一种漂亮说法。法国从来没有撤消邀请，但也从来没有就访问日期提出建议。

欧洲领导人两面下注。当水门事件越闹越大时，他们每次同美国开会都故意议而不决。因此，原来打算比较快地通过一次盟国首脑会议取得结果的创议落到了官僚机构手里，而这些官僚机构对维护他们那一套神圣程序的兴趣远远超过对重申民主国家价值观念的兴趣。我们国内出现的真空状态使欧洲更容易拖延时日。总统主要是在为自己辩护。欧洲批评我们的人当然注意到这

个事实。他们认为，即使他们对美国的政策提出最不足挂齿的抱怨，我们也会以比较同情的态度予以听取，而在通常情况下这本来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即使他们玩弄最卑劣的花招也不大可能碰到挑战。

尽管如此，我仍然必须指出，虽然当时我们所做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尝试一下还是对的。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最好的证明是：这些问题大部分是我们今天仍然必须正视的，可是条件已经变得困难多了。我们的努力终于陷入失败，是因为那些关键性国家未能使国内政治适应未来的明显需要——这是对现代民主制度最深刻的挑战。

日本的观点

我们同我们在太平洋的主要盟国日本的关系也存在类似问题。但是日本不存在意见不一致的危机，也没有提出哲理方面的挑战。我们的分歧从来没有达到尖锐的程度。因为日本的民族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我初上任时最不了解的一个主要国家就是日本。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钦佩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令人惊奇地复兴。但是我不了解日本独特的性格。西方在长达一百五十余年的工业化过程中逐渐消灭了封建主义。日本却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把相互负责的封建价值观念同讲究工业效率的新的精神气质融合起来，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建立的管理体制是以权威概念作为基础的：管理者有权发号施令，而命令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法律或宪法准则。日本则依靠意见一致。领导人处于显赫地位并不意味着他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和他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而只说明他有机会寻求他们的同意——至少表面上要这样

做。日本的高官显爵无权发号施令；他们的特权是带头进行说服。

几乎在任何其他地方这种管理体制都会导致停滞。但是日本不同。它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在拥挤不堪的岛屿上建立了伟大的文明。日本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动力，又给这种文化赋予了自己微妙的特殊形式，从而建立了一种传统，使日本社会更象一个家庭而不象一个国家。它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使人们对各种事物的含义、各种难以捉摸的因素得到相同的认识，因此可以在社会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在其他任何地方则要通过政治程序）。至于日本人是否因为必须在拥挤而又缺乏资源的岛屿上共同生存才形成这种文化、日本是否由于有了这种文化才繁荣昌盛起来，这是要由人类学家去研究的问题。

无论怎么说，社会价值观念和政治结构的共生现象无疑带来了非凡的成就。同后来变成殖民地的许多国家一样，日本在十九世纪后期似乎必须在西方式的现代化和传统方式之间作出严酷的抉择。日本是在武力面前被迫“开放”的。但这并没有使它屈服。相反地，日本统治集团为了继续掌握自己民族的命运，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手段——即发展现代科学和工业。日本设法做到了似乎不可能做到的事；它获得了各国通用的技术，建立了常规的政治制度，然而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色。这在作出抉择时是无法预见的。为了保持独立，日本甘愿冒丧失特性的危险，这种行动反映了非凡的勇气和献身精神。

相形之下，面临类似压力的中华帝国却不敢拿它认为使生活充满乐趣的事物冒险；它甚至在处于孱弱地位时也依靠外交手腕来操纵外国人。它以不断遭受屈辱为代价，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在剥削中国方面利益均沾，从而避免了彻底殖民化。它还在为贪欲所驱使而相互竞争的各国之间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为自己保持了少许自主权。

日本对本国文化的卓越程度和自己的外交手腕都缺乏这种信心。它决定首先使自己强大起来，使任何外国都不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取得了把它自己坚决抗拒的东西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地位，走上了夺取殖民地的道路。

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后来在日本已经成为标准的办法在一代人时间里完成的。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派代表团到国外去向军事、政治、商业、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最先进的国家学习技术。它在海军和议会制度方面努力赶超英国，陆军赶超德国，而在技术知识方面则越来越以美国作为赶超目标。一个具有惊人的团结而又十分善于把西方经验同本国的国粹结合起来的领导集团从这种学习中汲取了教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惨败以后，日本领导人又以典型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着手恢复日本的地位。他们使日本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在国内实行了民主。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要求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因为根据他们精明的判断，奉行突出自己的外交政策将超过世界对肆无忌惮的经济竞争所能容忍的程度，并可能危及美国安全保证所提供的廉价军事保护。

他们取得进展的方法经受了长期的考验。领导集团提出的长远目标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意见一致并不是个人不同爱好的折衷产物，而是在详细调查国内外主要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取得的。日本比其他任何工业大国都更肯花力气研究外国的实践，而且能够比他们更有效地运用研究的成果。强调意见一致已经成为探索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应付未来局势的一种办法，而不是——象其他国家倾向于做的那样——一种同意保持现状的制度。一个国家必须具有了不起的士气和团结才能保持高度的纪律，以至无需用正式法律明确规定就可以确定社会任务的轻重缓急，无需引起重大社会冲突就可以规定把劳动力转用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全国性目

标。⑨

日本经济复兴有一套独特的制度作为基础，其中包括实际上实行终身雇佣制、并把职工看成是为共同利益合作的伙伴的家长式劳资关系和社会结构，以及让人们通过新闻界——从哲学上说也是意见一致的一部分——参预整个决策过程而形成的舆论。（因此日本政府很难保密。在政府和新闻界并非相互对立、而是把对方看成同一过程的参加者的情况下，开放是它们工作作风固有的特点。）

美国人难于理解日本的制度。我费了很多时间才了解他们如何做出决定。甚至在理性上有所认识以后，我也不是每一次都懂得他们是如何具体运用这种制度的。日本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难于为外界人士理解。并不是日本领导人要掩盖自己的意图，尽管他们如果想这么做——并非经常情况——是可以做得特别谨慎的。更有可能的是，按照西方含义来说，他们不象通常的官僚机构的决策过程有那么多机密。在其他工业民主国家，人们首先确定问题，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然后由某个人从中做出抉择或进行折衷。官僚机构的固执己见和对实质问题的关切都搀杂在一起。有时可以看出谁是胜利者和失败者，有时则是反映力量对比的各种观点的综合。到处都可以看出官僚机构玩弄权术的状况。

作为对比，日本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避免对抗。他们不明确阐述正式的立场，而是进行长时间磋商，其目的不是达成妥协，而是明确方向。日本决策的艺术在于：他们避免在讨论过程开始阶段明确表态，因而可以继续进行认真的考虑，使参加讨论者有改变主意的余地，没有必要在真正取得一致意见以前就做出决定。这样一来，外界人士即使获得有关他们内部活动的正确情报——这也不容易——也没有多大好处，因为早期的讨论是变化无常的，后来的演变取决于集体心理状态。

日本因此获益匪浅。确实没有任何人能够独自作出决定。只有缺乏专业经验的人才会设法对个别日本大臣施加压力；即使这位大臣出于礼貌作出让步，他也无法执行自己的诺言。但是当它们形成一致意见以后，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就会以任何西方国家无法比拟的速度、决心和气概付诸实践。由于许多关键性人物都参预了决策过程、并充分理解决定的各种含义，因此就造成了极大的势头。有什么社会能够比一个贪得无厌地搜集情报、对压力无动于衷、而执行决定又一往直前的社会行动起来更为有效呢？

对于外国人来说，过低估计日本领导人是危险的。这些领导人诚然不象——举例来说——中国人那样善于思考，不象大多数欧洲人那样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不象美国人那样坦率得近乎粗暴。人们挑选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任何上述的特点。他们搜集外国人的情报，并不试图通过语言来说服外国人。他们为自己的社会确定未来行动路线，不需要用词藻来说明社会的目标。

在日本，领导人的看家本领不是说服人们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而是使他们愿意做符合共同利益的事，从而形成一致的意见。日本外交官几乎从来不按照通常程序和别人打交道，即提出建议，然后围绕这个建议进行谈判。这样做等于说他们有权自行做出决定。它将使他们处于似乎可以改变他们并没有决定的事情、拒绝妥协或作为最后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尴尬境地——这些做法都会触犯日本传奇式的礼貌，因为它是一个解决社会矛盾时从不明确表明谁胜谁负的国家。

典型的日本领导人在同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出于自己的教养，几乎会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明确表态。这种做法给外交造成了几乎无法跨越的文化障碍。西方外交是有系统地寻找共同点——而这却是日本的精神气质积极反对的。在举行国际会议时，日本的主要代表很少发言，有时似乎在打瞌睡，而他的助手却

一丝不苟地把会上的发言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以便送东京研究。日本的立场通常是通过一份精心拟定的声明一次表达出来，后来很少有讨价还价的情况。但是他们也不攻击其他国家的立场。参加会议的其他人的观点将由东京进行分析。这些观点也会引起反应，但这种反应将基于对日本必须承担的责任的认真估计，而不是基于会议的需要。如果认为日本领导人平庸无能，如果把他们的拙于言词同缺乏见识混为一谈，那就犯了危险的错误。在日本，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取得卓越的地位；在训练过程中，第二流的人才会遭到无情的淘汰。但是善于按照日本的情况、而不是按照一次会议情绪的起伏做出日本的决定的能力是会得到嘉奖的。日本领导人认为会议程序带有偶然性——几乎是随意性。

在任何情况下，到日本领导人出现在国际会议上时，他们所做的准备通常都远远超过其他领导人。他们认为无准备的会议将迫使某些人让步或者以不符合任何人的目标的妥协告终。因此，日本领导人倾向于在外交接触开始以前就做出让步，对待谈判就象对待其他一切决定一样，要进行过细的准备。他们从川流不息的非官方使节那里获得必要的情报。这些使节包括许多地位很高的人——前首相，暂时不担任大臣的党内高级官员等等。这些人的有利之处在于他们无法使政府承担义务。谁也无法责备他们不提出建议，因为根本不能期望他们这么做。但是他们的经验使他们具备非常优越的条件去探索同他们谈话者的思想，供日本决策时考虑。日本领导人的决定通常都认真考虑了其他国家的观点，这是有助于增加他们的声誉的。

同其他日本领导人一样，日本外交官也努力寻求一致而不是争取胜利；他们懂得，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社会里，把观点强加于人并不能保证大家都乐于执行。日本外交官着意追求一种有条不紊的和解过程。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愿意调整自己的立场——

最好是会前，必要时也可以在会后，但是在谈判过程中要他们调整立场则是非常勉强的，因为日本的制度并没有赋予任何大臣个人做出决定的权力。

如果有人希望自己的观点得到日本政府的考虑，他必须在他们有机会统一思想以前把意见早早转达过去，最好是通过一位从技术上说不属于官方、但是得到高度尊敬的日本人转达。同样地，当一位日本高级外交官——甚至是一位大臣——提出问题时，他很少是为了获得教益。他是最含糊、因此最少压力的方式表达他们一致的意见。这时，他期望的是同意。如果确有分歧，就必须很委婉地提出，使对方可以进行调整而不失面子。谁也不要以为日本谈话对手有权立即作出响应；必须留出时间使他们可以改弦易辙。

官方与非官方界限不明、表达方式含糊不清、对不同意见的表面的（而且使人误解的）无动于衷可能使人们在同日本外交官会晤时感到极为恼火，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误会。我在担任政府工作的早期曾经误解了非官方使节所扮演的“官方”角色，因此对他们置之不理。我仔细听取日本外交官的讲话，但经常无法领会他们企图表达的难以捉摸的含义。在发生问题时，我就找负责的大臣，试图说服他接受我们的观点。这位不幸的大臣被如此粗率的态度搞得不知所措，又因为过分讲究礼貌而不承认自己无权自行做出决定，就会用闪烁其词的办法逃避。在逼得走投无路时，他也会表示同意，但却不知道如何才能付诸实行。*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我在访问中国之后到达日本时，这些倾向

* 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的纺织品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正在于此。当时担任首相的佐藤荣作不愿当面拒绝尼克松，也不那么愿意当面拒绝我，因此同意了他明知得不到国内支持的方案。这就导致了一种离奇的局面：这位日本首相要求我们在谈判执行方案时提出**更强硬**的建议，使他在说服同事和其他关键性决策人时有施展手腕的余地。我们的官僚机构为了达成妥协却挖了他的墙角。它提出的要求是温和的，从而破坏了本来已经微乎其微的使谈判圆满结束的机会。^⑩

都受到了考验。当时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正处于困难时刻，因为使欧洲惊惶失措的各种压力也使日本受到折磨。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日本受到的压力更大。能源危机彻底震撼了日本。同其他工业国家一样，日本是靠廉价能源得到繁荣的。它几乎完全依靠外部来源，百分之九十的能源需要进口。阿拉伯石油减产、价格开始上涨（十月份几乎翻了一番）、以及把石油供应同在阿以冲突中采取亲阿拉伯立场联系起来压力使日本极其为难。在此以前，日本的外交政策并不突出自己的意见。它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我们的军事保证上。日本领导人和他们的某些欧洲同事不一样，他们懂得处处都想占便宜是不可能的。如果得到一个外国的保护而又假装认为可以在关键问题上无限制地同这个国家保持距离，那是不顾后果的做法。日本领导人也不象欧洲领导人那样感觉需要用刺激美国的办法确立自己的特性。

然而到了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日本领导人也同他们的欧洲同事一样开始——不无勉强地——感到自己的民族利益可能要求他们同美国的中东政策脱离关系。他们深信，日本公众要求他们证明自己在能源危机方面正在有所作为——至于什么作为则是无所谓的。

这并不是说日本领导人自己对我们的中东政策有实质性的异议。他们从来没有对我们表示过明确的意见，或许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意见，因为他们对自己无法施加影响的事情是不愿浪费精力的。当时涉及的是一些更带根本性的问题。日本令人捉摸不透的独特性使它必然对影响日本生存的要求具有不可思议的适应性。它在外来冲击的影响下放弃封建制度而实行军事专制，然后又放弃军事专制而实行民主。每次它都决定——或许不完全是有意地——以能够保持日本的精华的方式去适应外部压力。对日本领导人来说，问题不在于各种观点孰是孰非——对此他们基本上漠

不关心——而在于对各种需要注意的压力进行估计。

日本对石油禁运和削减生产的初步反应是习惯性地依赖美国。因此，当欧洲人十一月六日就中东问题公开提出和我们已经阐明的政策背道而驰的目标时，日本并没有参加欧洲共同体的合唱。但是，当我十一月十四日到达东京时，日本已经有了新的考虑。它重新考虑的不是我们战略的实质，而是阿拉伯国家控制石油生产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状况可能持续多久的问题。如果能源危机反映的是一种新的趋势而不是偶然的偏差，日本就不能冒单纯跟着美国外交走的风险。无论逐步解决的方针是成功还是失败，情况都是如此。日本领导人自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属于不可知论者，我认为他们说的是真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失败，阿拉伯世界的失望情绪可能全部发泄到日本身上——正如田中角荣首相对我指出的那样。即使美国政策成功，石油生产国也不会认为同日本有什么关系。我们将得到荣誉，而日本的关切将遭到忽视。

日本的政策虽然形式上同欧洲的政策差不多，精神则根本不同。欧洲人确实不同意我们的政策。好几位欧洲领导人认为我们国内政治压力造成的限制威胁到他们国家的繁荣和他们本人的政治前途，因此感到生气。日本人并没有指责我们的意思。他们不是对一种政治抉择提出争论，而是在日本各种精巧细腻的形式保护下像科学家一样冷静地估计本国能源形势的客观需要。他们需要的是留下记录，而不是执行政策。和欧洲人不同，日本并不鼓吹自己的观点，也不自称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它采取一种它估计有可能使日本避免压力的姿态。如果日本领导人无法使我们同意他们的目标，他们也会不遗余力地减少因分歧而需付的代价。

数百年来，人们一直把马基雅维里看作是犬儒主义的化身。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他的格言反映了他观察到的世界，而不是他理想的世界。而且他深信只有具有强烈道德信念的

统治者才能在玩弄各种不幸为生存所必需的权术时保持坚定的方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同我对话的日本人的态度。他们并不自称他们的行动方针是公平合理的，甚至也不自称是明智的。这种方针反映了必要性，因此是无可争辩的。

负责向我转达这个消息的领导人是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交大臣。田中是打破传统格局的第一位日本总理大臣。他不是任何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出身寒微，具有西方那种进取精神，不象典型的日本政客那样用耐心的转弯抹角的办法掩盖自己的野心。他是一个特别年轻的日本首相——不过五十出头。他取得显赫的地位是因为他能在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内组成最大的“派系”——派系是靠相互照顾维持的。按照事物正常的发展，本来要由资历较深的领导人去竞争最高职务，田中还得等待好几年。但是他或许是过分缺乏耐心，或许是怀疑自己作为局外人是否能保持派系的团结，顶住那些态度比较狡猾而在玩弄计谋方面同样残酷无情的老牌政客的系统侵蚀。（在这个问题上，结果证明他是搞错了。因为在他自己的事业饱经沧桑的过程中，他的派系不但保存下来，甚至还壮大了。）

田中是一九七二年用日本人认为接近政变的方式获得首相职务的。他为此付出了代价。当他受到各种指控时，他发现日本权势集团并没有象它通常保护自己人那样支持他。

因此，田中的命运同尼克松有奇怪的相似之处。他同尼克松一样具有非凡的才干，地位也很不稳定，而且——对于一个日本人来说更引人注目的是——还表现在外面。他只当了十八个月的总理。我发现他极为聪明，而且不寻常地直率。在所有日本领导人当中，他最接近于以其他国家政府首脑惯用的方式——用个人权威发言。非常奇怪的是这反倒使他的发言不那么可信。他的讲话比他的同事更清楚，有趣的是却不如他们讲话那样令人了解情况，因为

人们无法完全肯定他反映的究竟是日本真正的一致意见，抑或是他个人的意愿。因此，日本这种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的、使论点在一定背景上逐渐明确的办法微妙地胜过了西方喜欢的那种理性的交谈方式。

田中在连珠炮似的而又有些口吃的讲话中阐述了日本面临的问题，既不使用隐喻，也不躲躲闪闪。他列举了石油进口的统计数字，说明了减少能源消耗对日本的生产 and 生活方式的影响。他说，不能让日本公众认为他对事态的发展完全放任自流；无所作为就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日本默然同意别人把它捏死。据田中说，发表某种对阿拉伯事业表示同情的声明是必要的，尽管它并不会改变美国的政策。他强调说，日本真正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影响美国的政策。

我对美国的战略作了解释。我问道：欧洲人疏远我们究竟得到什么好处呢？一方面祝我们工作顺利，另一方面又采取至少是无视我们的政策、甚至可能破坏我们的政策的行动是讲不通的。这种行动将使阿拉伯温和派更难于接受低于我们盟国所同意的方案的要求。如果日本按欧洲共同体的方针办事，我们最多只能保持沉默；如果被迫表示意见，我们就不得不持批评态度。

但是，当一位日本首相陈述一种主张时，他并不是在征求意见，而是在宣布一项决定。因此，在双方均已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后，问题就搁置起来。最后，田中说他和他的同事将研究我的意见——这就是说，他们将干下去。

大平正芳符合典型的日方模式。公道地说，这种模式并非自然而然地符合我比较喜欢突出自己的气质。要想找到两个比较细致含蓄的日本外相和爱好分析的、其政策当时造成了明显的戏剧性的美国国务卿之间差异更大的人物绝非易事。我在一九七二年六月访问日本时初次见到大平正芳。我们的大使馆为我和日本几

位前外相安排了一次晚宴。不幸的是，当时正在挑选佐藤荣作首相的接班人，大平是一位关键性人物。他不准备对一位他不了解的、而且记录证明在有关日本的问题上缺乏某种细腻感情的美国人敞开自己的思想。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大平说话很少，但以一种奇妙的彬彬有礼的方式表现了极大的善意。这种惊人的技巧使我得到深刻的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友谊在真挚的感情基础上增长起来。大平耐心地教我领会日本的事情，增加了我对细微差别的理解。他谦虚的态度掩盖了他巨大的才干；他给予的永远比他许诺的多。他证明了一句谚语所包含的哲理：友谊所在处，无言胜有言。

大平正芳在他的回忆录中描绘了我们的亲切关系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我到达日本时他们内部进行的讨论。^⑩日本内阁成员绝大多数主张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大平独自为日美团结辩护。他在回忆录中以赞同的语气引用了我的话：奉承巴结只会使阿拉伯领导人瞧不起日本，而并不能赢得他们的善意。

然而他在同我会晤时完全没有显示日本内部的紧张状态。实际上，正因为他采取了非常迂回委婉的方式，他在许多方面甚至比田中单刀直入的讲话表现了更坚强的决心。大平同我谈话时，一开始就用典型的拐弯抹角的方式透露了日本的想法而又不正面对我们挑战。甚至在我们开始就实质问题交换意见以前，他就提出了一份备忘录草案，建议在会谈后以此为基础向报界介绍情况。备忘录的实质是，必须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它在和平谈判中采取灵活态度。大平这样做可以达到几种目的：既可以使我了解日本的想法，又可以后退而不丢面子；如果我提出异议，大平显然不能宣布双方达成协议。当我象料想的那样表示反对时，大平立即撤回了建议——从而有可能告诉阿拉伯国家的首都，说日本的选择受到美国压力的阻挠。

谈话的其他部分——比我同田中谈话的时间要长一倍——符合大平在自传中讲的箴言：

在外交工作中，即使无法达成协议也必须使双方都了解对方的立场。事实上，促进谅解和信任同真正达成协议同样重要。特别是在日本和美国之间，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⑫

大平就中东政策问题对我进行耐心而又温和的盘问，既带有试探性又毫不容情，既表示理解又具有坚强的韧性。我设想的时间表如何？我们的目标何在——是局部解决还是全面解决？既然欧洲人已经发表了有利于阿拉伯人的声明，我们为什么还反对日本发表这种声明呢？特别是在日本并不强迫谁接受自己意见的情况下，发表这种声明可能造成什么损失呢？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大平虽然一句这样的话也没有讲，但却十分清楚地表明，日本在面临能源危机的情况下，不可能不宣布一种和我们不同的立场，同时也表明，它将尽力维护它同美国的友谊。

这种象医生诊断病情似的态度同我自己的分析基本上不搭界，而且是以一种既不要求你接受、也不容你拒绝的方式表达的。我争辩说，阿拉伯国家有三种选择：依靠苏联的压力；依靠欧洲和日本的压力；依靠美国。我们决心阻止第一种选择，也不相信第二种选择——其实际结果可能使我们完全停止我们的和平外交。大平并没有被这种说法吓唬住；他知道我们奉行的战略有我们自己的理由。他彬彬有礼地、准确地概括了我的立场。正如官方记录表明的那样：

大平外相说他理解国务卿所说的意思，并把他的理解复述如下：国务卿说，日本即使嘴上支持阿拉伯人的要求或采取具体行动也不会使阿拉伯人当前实行的石油禁运有所缓和。但是，大平还希望肯定国务卿是否也有这样的意思，即如果日本同阿拉伯人站在一起就会使美国争取和平解决的任务更为困难。结果，看来国务卿的意思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无论阿拉伯人施加

什么压力，日本都应按照美国的战略采取行动才最有希望早日解决中东问题，从而免受石油禁运的厄难。

大平的概括完全准确；它证明所谓协商能消除误解的格言是不对的。问题在于我们相互之间确实非常了解。大平概括的我们的立场显然同他和田中所说的日本政策的基本前提互不相容。他们的前提是日本必须采取明确的、和我们不同的立场。这种提法本身就意味着不可能被接受，但它同时也对我保持了礼貌，说明我的意思已经得到理解。然后我们就转入其他话题：欧洲年、我的中国之行、为驻日美军提供石油问题。谈话结束时可以明显看出，日本将走欧洲制定的道路。但是我也了解到，它这样做有点勉为其难，并非很有信心。它将发表各种声明，但不会运用它的影响来干预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欧洲盟国不同，它并不是对我们提出挑战，而是做它不得不做的事。主要是在大平的指导下，日本以一种圆滑柔和的、暗示的方式，在尽可能减少摩擦的情况下，使我们了解到它认为自己的民族利益和国内安定所必需的立场，而没有危及日美伙伴关系的实质。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同欧洲共同体类似的声明。它以典型的方式为此准备了条件。我离开日本以后不久，东京英文报刊就充斥着所谓我同日本领导人意见分歧的报道（日文报刊对此则默不作声）。这些报道从技术上说是真实的，但没有正确反映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和谐良好的基本情绪。然而它们达到了目的，就是通过中东各国外交官最有可能阅读的报刊传达了日本不服约束的信息。我对日本大使表示抱怨以后，大平就对日文报刊发表声明，否认存在任何不和或分歧。日文报刊原来就没有报道分歧，当然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登载声明。尽管他们玩了种种复杂的花招，我对大平正芳还是非常信任的。我指示国务院发言人在发表评论时说：虽然我们不同意日本的决定，我

们理解它不得不这么做的原因。

无论是由于什么原因,到一九七三年底为止,我们一直梦寐以求的工业民主国家的团结还很渺茫。但是,尽管出现了种种危机和分歧,我们努力播下的种子并没有落在石头上。有些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如此。不过两年,现实的必要性就促成了我们本来希望在一九七三年开始的对话。一九七三年后期的能源危机迫使石油消费国初步组织起来。一九七四年后期,建立了国际能源机构以便促进消费国在研究新能源、节约能源以及抵抗新的禁运方面进行合作。各国的相互依赖使民主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不得不举行经济方面的最高级会议来确定共同目标。这些会议是由欧洲、实际是由法国创议的,*很快就扩大到政治方面,并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到一九七六年底,由于各种压力和见解的出现,工业民主国家的关系有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我们在发起欧洲年时怀抱的许多希望。

在那以后,也还出现过分歧。和以前一样,分歧的核心是实质而不是程序问题。尼克松以后一连三届政府当权时期,辩论持续不断,事实上更尖锐了。这说明,辩论不仅涉及策略方针上的分歧,而且涉及更深刻的因素。事态的发展使我们在试图举行欧洲年时预见到的危险——即容许苏联人实行有选择的缓和、在某些盟国之间挑拨离间的危险——得到特别戏剧化的表现。由于人们未能正视七十年代初期技术和军事力量的变化,以致这些问题在十年以后又爆炸性地表现出来,使否定一切武器的和平主义者与认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正是一位法国总统、即蓬皮杜的继任者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坚持要求尽可能减少与会者的数目,最好限于法国、英国、联邦共和国和美国。只是不顾法国的反对才邀请了其他国家: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以及欧洲共同体的一名代表。

为一切武器都有用的武器专家都更加走向极端。最突出的还是理论问题，因为感情和技术都不能提供适合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方向感。经济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各个工业国家还在摸索如何使国内政策的需要同相互依赖的现实调和起来。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自由社会如果只顾眼前而对将来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它们甚至无法保持国内的团结。回避问题就会导致危机，这种情况发生得太多了。人们必须塑造未来，否则未来就会把灾难强加在人们头上。对于民主政治家的才能，这仍然是最关键的考验。

①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② 同上，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一日和十月三十日。

③ 《纽约时报》，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五日，第十六页。

④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⑤ 保罗·凯麦吉斯：《据说共同市场在联合声明问题上抵制美国》，载《纽约时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

⑥ 南恩·罗伯逊：《法国批评美苏作用》，载《纽约时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⑦ 转引自戴维·宾德：《美国和三个盟国试图弥合分歧》，载《纽约时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

⑧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谁是中东的胜利者？》，载《华盛顿邮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⑨ 埃兹拉·沃格尔：《日本名列第一》（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并见中根千枝：《日本社会》（伦敦：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一九七〇年版）。

⑩ 《白宫岁月》，第三三六——三四〇页。

⑪ 大平正芳：《生活散记》（东京：外文出版中心，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一九——一二〇页。

⑫ 同上，第一一八页。

第十七章

日内瓦会议

战 略

正好在一九七三年圣诞节前夕，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日内瓦进行了二十五年来第一次面对面的高层政治谈判。在这次会议的背后和会议之外，进行了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很长时间以来，以色列人一直要求举行这样一次会议；他们的渴望之情现在已经随着会议的迫切性的下降而淡漠了。但是，为了保持停火和显示缔造和平的势头，特别是为了创立一个能够把两支互相敌对的部队（我们对他们双方都承担了义务）分隔开来的架构，使这次会议能够尽快召开仍然是一件重要的事。

在导致实现停火的那些外交活动的后期，产生了最初的一种想法，即在美国和苏联共同主持下，举行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全面和平解决问题。没有疑问，苏联在向其阿拉伯小伙伴兜售十月停火时，会向他们力陈，美苏“共同主持”会使苏联能够力争最大限度满足阿拉伯人的要求。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实现勃列日涅夫在圣克利门蒂磋商中曾经竭力向尼克松兜售的全面解决计划。

可是，我们的逐步解决战略占了上风，因为最终各方面——甚至包括激进的叙利亚和苏联——出于自己的利害考虑，都一致认为，由战争遗留下来的犬牙交错的军事态势是不稳定的、危险的和不能持久的。但是，为了走向日内瓦，我们必须把各国迥然不同的

目的协调起来。日内瓦会议是使各方面步调一致的一个象征性行动(至少是暂时的),从而使它们能够各走自己的道路的一种方法。召开这样一次大型会议,其复杂性与为了保持事态平静而在会后展开外交活动的复杂性一样。

萨达特对他自己的目标有最清楚的了解。他决心改变同苏联的结盟,而同美国建立紧密的联合。这是一个棘手而冒风险的行动。在任何具体的一步上,他都有可能因为脱离苏联太远而得不到它在外交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因为同美国的关系不够密切而使我们不能充当埃及的辩护人。他在同阿拉伯兄弟国家的关系上,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如果萨达特容许叙利亚对他的政策持有否决权,他就永远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他自己的和平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之前,他需要以重新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他不与叙利亚结盟,那就不会有什么人相信他的这种恫吓。萨达特游离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既对叙利亚不放心,而在一次摊牌中又要依靠叙利亚,他认为举行一次日内瓦会议是万无一失的;如果其他道路都失败了,日内瓦会议可以为他提供一个讲坛。

叙利亚的矛盾心理同萨达特恰恰相反。在大马士革执政的激进的复兴社会党的纲领,就是不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可是,同以色列一道参加一次和平会议,必然意味着叙利亚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犹太人国家,不然,你是在同哪一个别的什么政治实体谈判呢?这样,在国内就要付出政治上的代价,而又得不到明显可见的补偿。另外,在以色列军队驻扎在大马士革大门口的时候,叙利亚国内是不能正常生活的。因此,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便勉强地被迫走向脱离接触的谈判。

在萨达特看来,由于叙利亚处在矛盾心理的情况下,埃及将不得不单独媾和,脱离接触就是媾和的第一步。阿萨德可能合理地

考虑过,在恢复与以色列对抗(至少在外交上)之前,脱离接触是最后的阶段。

约旦的态度可能是最复杂的。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声称致力于巴勒斯坦事业,这一部分是出于信念,一部分是为了迎合这一地区的激进潮流。公开声明致力于巴勒斯坦人的目标,甚至对那些参与逐步解决的国家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势必出现的妥协可能被说成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个阶段。除了我们的朋友侯赛因国王外,每一个阿拉伯领导人都能够参与这场争逐。只有在牺牲约旦以前在巴勒斯坦的地位(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七年,约旦曾管理过西岸领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而巴勒斯坦国的出现,确实可能标志着一场新的斗争的开端,这场斗争将围绕着约旦河东岸哈希姆国的存在的问题而展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多次明白无误地声称,同侯赛因的血海深仇比同以色列的还要大。而且,侯赛因不能指望得到他的阿拉伯同胞的任何支持。

不但如此,约旦也没有力量威胁重新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侯赛因由于在讨论中的脱离接触计划里没有任何直接的风险,因而赞成举行日内瓦会议,因为他参加这次会议有助于他宣称他是代表巴勒斯坦人说话的。而且,达成的任何脱离接触协议,都可能有助于树立一个使约旦重返西岸的先例。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要求侯赛因出席日内瓦会议。

以色列对于逐步走向外交解决的日内瓦会议,也很感兴趣。只要以色列想尽可能驻留在它暂时占领的地方,它就需要几个师坚守苏伊士运河对岸的领土,不让其军队复员。以色列在叙利亚的战俘也决不会得到遣返,除非它撤除对大马士革的包围。

至于两个超级大国,它们由于目标不同,对前途的看法也各异。正像在我整个任职期间的情况一样,苏联陷于它固有的困境

之中。只要它不使自己摆脱全盘解决的阿拉伯计划，它就不可能对外交行动有所贡献；即使美国施加压力，这个计划也是实现不了的。正像刚刚结束的战争所表明的那样，莫斯科不能够用向它的小伙计供应武器的办法，来使阿拉伯的条件付诸实现。它也没有决心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正像警戒期间所证明的那样。外交上的僵化、笨拙，使得克里姆林宫无能为力，因此，它就想利用日内瓦会议作手段，来减少我们行动的自由，如果会议取得进展，就叨我们的光而共享声誉；而更可能的是，如果会议最终陷于僵局，就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我们身上。

我们的处境既有复杂的方面，也有充满希望的方面，我们自己有一个可以执行的计划。埃及，最后还有叙利亚，坚持要我们参加，它们重视（可能高估了）我们对以色列的影响；对它们来说，接受美国的谈判建议，比答应以色列的要求要容易些。如果我们通过逐步解决的办法取得某种重大的突破，激进的雄辩家就必然会哑口无言；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则会受到鼓舞而坚持它们的立场；苏联的影响就会下降。通过脱离接触而实现经过谈判同意的撤军，如像我们某些盟国所声称的，不是无关紧要的；从心理上说，这是采取更长远的步骤的先决条件。归根到底，这将表明，通过谈判，以色列被诱导第一次同意撤出它占领的土地，不管已经占领了多长时间。

因此，美国的政策是在几个不同的级别上同时进行工作。我们帮助组织日内瓦会议作为我们对全面和平承担义务的象征，作为在停火有垮台危险这个微妙的阶段中同苏联保持接触的手段；同时，如果其他途径都陷于失败，也可以借此取得一个回旋的余地。由于苏联在十月警戒和十一月六点计划之后，发觉自己无能为力来实行开罗和大马士革共同要求的脱离接触，因而我们工作顺利。莫斯科知道，埃及特别不能容许由于成年累月举行讨论全面和平的会议，而使它的第三集团军在西奈继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

此，破坏在西奈的脱离接触，其实际结果如果不是因为第三集团军试图突围而爆发一场战争，那更可能就是连日内瓦这块牌子都不要，而直截了当地作出单独的安排。因此，莫斯科同意使脱离接触成为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这样，它也就是同意一个以减少它的影响为目的的战略。

西欧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和日本是旁观者，是不热心的。它们希望取得外交进展以结束石油禁运和生产削减，因为这些有破坏它们的经济的危险。但是，它们对美苏“共同主持”的、把它们排除在外的谈判非常不热心，虽然甚至是它们自己的政策促成了这种局面。它们反对当时可望达成的那种协议，而坚持要求全面解决。这样，我们的盟国对我们所选定的讲坛是冷淡的，对我们所预见的唯一现实的结果（非显赫的事态发展）是怀有敌意的。

这样，无可置疑，不管有没有水门事件，我们都必须顶住苏联、激进派和欧洲人在中东的压力。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同吉姆·施莱辛格、比尔·科尔比、汤姆·穆勒和肯·拉什举行的一次非正式午餐会上，我解释我们的战略说：

我们的战略必须是：当苏联、英国人和法国人加压力时，我们就顶——这样，他们就都知道只有我们能够予以回击。这将对萨达特和温和的阿拉伯人有所帮助。所有的阿拉伯人都会支持我们。我们将在（十二月）十六日开始采取行动。那时就更接近以色列的大选了。*然后，我们必须推动脱离接触。外交工作首先取决于可供使用的资本。这方面我们占上风；我们要运用外交。

* 我们认为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举行大选之前，以色列不会作出任何让步。日内瓦会议最初是订于十二月十六日举行，后来改到十八日，最后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开幕。

101公里处的会谈和脱离接触的开始

在我们的计划逐步展开的同时，我们还要花一些力量来应付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埃及的一个军被围困在沙漠之中，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它的苦楚必然与日俱增。即使萨达特愿意等待我们的战略取得进展，但是他手下某些急于打破以色列对第三集团军的包围的人们，可能想要加快进程，而不等待通向日内瓦的那种复杂的慢条斯理的行动的完成。他们可以凭借的手段就是在开罗—苏伊士公路上101公里处举行的埃、以军事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以色列的阿哈隆·亚里夫将军和埃及的阿卜杜勒·加尼·贾马斯将军制定了执行十一月六点计划的指导方针。首先，会议主要讨论了诸如交换战俘、对苏伊士和第三集团军的供应，以及建立检查站等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六点计划中的后四点。*（埃以第一次交换战俘是在十一月十五日进行的。）前两点——维持停火，特别是“在脱离接触和联合国主持下把双方部队分隔开的协议的范围内，恢复到十月二十二日以前的阵地的的问题”——仍有待讨论。我同萨达特达成的谅解是，只有在日内瓦会议开始之后，我们才来讨论脱离接触问题。

可是，萨达特手下的人急不可耐。他们希望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就在脱离接触方面取得进展，不管是通过谈判制订一个全面的计划，还是强迫以色列立即撤退到十月二十二日的战线——不管这条线当时可能在哪里——都行。断然拒绝考虑这一点当然就是造成前几个月的危机、包括十月警戒的因素。**不管怎么说，贾马斯对于101公里处的会谈给予了一定的推动，使得同亚里夫的讨

* 六点计划请参看第十三章第二六〇页。

论比我根据我同萨达特会谈的经验所预料的为快。

在以色列也有一些人被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就迅速实行脱离接触的想法所吸引。对以色列来说，101公里处的会谈是使它摆脱美国的监护的一种手段。会谈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考验一下以色列所赞赏的互相从苏伊士运河撤退的计划，是否象我曾经断言的那样不起什么作用。果尔达也不愿意在为重新当选而奔走的时候向选民表示，某种事情正在101公里处进行。可是，问题在于以色列政府对于在101公里处应当取得什么结果意见不完全一致，对于同埃及寻求什么样的脱离接触也意见不一。前情报首脑，卓越的战略家亚里夫将军，对于制定在西奈地区各条战线上重新安排以色列、埃及和联合国部队的各种供选择的计划，表明具有极大的独创才能，他的创造性使得以色列提出一系列的提议来考验贾马斯，并逐步详尽地提出了一个以色列的脱离接触的军事设想。贾马斯对亚里夫的提议提出了自己的反建议，从而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不幸，双方的谈判者都不是完全代表自己的政府讲话。亚里夫的计划并不总是得到内阁的赞许，而萨达特则要把我们牵连进去，而不是把我们排除在外。谈判陷入了僵局。

整个过程考验了我们的耐性。首先，我们一点也不知道101公里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从以色列人、埃及人和联合国方面收到的有关报告，对正在举行特别会议的帐篷里所发生的事情说法各异。它们的唯一一个共同点就是会议至少已经进行了四十八小时。对于会上出现的一个僵局，我们经常是得到三种不同的说法——常常是四种说法。在脱离接触问题上的僵局是我们最不

** 从军事观点看，以色列的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甚至连埃及国防部长伊斯梅尔·阿里将军在十一月中也对美国外交官说，撤退到十月二十二日战线会使运河西岸的以色列军队处于非常狭小而易受攻击的阵地；唯一的可行计划是使双方军队实行广泛的脱离接触。

希望出现的事情，因为把在西奈的敌对部队分隔开来是我们战略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其次，坦率地说，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我们并不太希望在101公里处出现突破。正象我在十二月三日提醒迪尼茨大使注意的：“如果让亚里夫成为一个脱离接触的伟大英雄，那么，十二月十八日你们（在日内瓦）还有什么好讨论呢？”我们的战略首先要求我们把日内瓦会议召集起来，以缓和局势，并作为取得进展的象征，然后，到那时我们就利用发起会议这件事来发挥我们的中心作用。如果议程上没有脱离接触问题，我们势必要就更广泛的问题进行没完没了的议论；而对这些问题，我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很快加以处理的，即使不是全都如此的话。

可是，在101公里处的真正问题是，不象是要出现突破，而是陷入了僵局。第一，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果尔达不愿意在以色列大选之前（因此，也就是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来实际考虑这些问题，而且她的内阁也同意她的观点。第二，埃及也没有准备好。确实，亚里夫提出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后来被采纳进脱离接触计划中去了——例如在联合国监督下双方建立兵力限制区。但是，他关于在这些地区内可以设置什么武器的意见，由于限制太严，使得甚至最温和的埃及领导人也不能接受。不管怎样，事情很快就清楚了：萨达特不能接受在埃及领土上对他的军队实行任何限制，要是这种限制是由以色列提出的。美国的居中调解变成必要的了。十一月二十九日，埃及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它中断了101公里处的会谈，据说是因为亚里夫突然间往后缩，拒绝详细提出他设想的限制区内部队的水平或者限制区的范围。正象我们所计划的一样，脱离接触问题要等日内瓦会议召开后来讨论了。

长期以来，苏联的行动都给人以假象，好象它是遵循这样一种理论行事的：莫斯科总是在执行一项由洞察一切的战略家制定的大计划，它对哪怕是采取一小步行动也如此感到不安，因而也宁愿

把脱离接触问题推迟到日内瓦会议上去。十一月二十六日，我要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使他在开罗的同僚谢尔盖·维诺格拉多夫*安静下来，后者一直兜售法赫米的方针，即在召开日内瓦会议之前必须实现某种脱离接触。第二天，多勃雷宁回答说，维诺格拉多夫只是重复埃及人的某些不满；他并没有使自己同他们搞在一起。十一月三十日，我同多勃雷宁讨论了101公里处会谈的破裂问题，好象我们的目标并行不悖，而不是怂恿埃及脱离莫斯科的开场戏。我说，由于实现我们所选择的战略的道路已经打开，“我确实认为我们现在走上了正道”，虽然记录和我的回忆都没有说明，为什么我认为多勃雷宁也同意我的这一判断。多勃雷宁平静地回答说：“我们可能不喜欢这种没有后撤的局面，但是，从现实出发，我们同意你的看法。”我对多勃雷宁说，虽然我不能保证双方军队究竟将在哪一天分隔开，可是，我可以确定一月初是美国作出重要努力以实现脱离接触的开始日期：“在那以后恐怕还要好几周的时间。”

自命不凡的维诺格拉多夫哪怕对一件区区小事也要情不自禁地抓住不放而加以利用（甚至不惜冒丧失信任的风险）。他把上述日程表告诉了法赫米，而且说得好象这是苏联通过外交活动好不容易确定下来的（把我们也说得好象是外交工作的门外汉，以致未经同萨达特讨论就把日程表给了莫斯科）。维诺格拉多夫的表演只是赢得了法赫米的嘲弄。

同多勃雷宁交换意见的实际结果是制止了苏联与埃及共同施加压力，要求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在脱离接触方面取得迅速进展，因

* 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七四年四月，苏联先后有两个姓维诺格拉多夫的人任驻埃及大使。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维诺格拉多夫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七〇年八月任苏联驻埃及大使。他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病死。从一九七〇年十月到一九七四年四月，苏联驻埃及大使为弗拉基米尔·米哈伊诺维奇·维诺格拉多夫。这里提到的维诺格拉多夫显然不应是前者而是后者。本书作者可能把两个维诺格拉多夫搞混了。——译者

而也就把脱离接触谈判的步调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莫斯科作出一项决定要考虑到很多因素——包括对它在日内瓦增加其在中东的影响的能力估计错误——它的自我克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希望维持同美国的关系。勃列日涅夫在十一月十日写信给尼克松说：“我们愿意确信……我们不仅能克服当前的中东危机，而且还能在加强我们两国的关系方面更向前迈进。”

在整个十一月份，苏联外交（尽管它的倾向是钻空子占小便宜）继续保持这种精神，同我们一起为召开日内瓦会议而努力，不理睬埃及为预先得到补偿而施加的压力。莫斯科可能没有什么上乘的选择，但是它能作出的那些选择一点也没有给我们增添麻烦。缓和并没有妨碍我们设法降低苏联在中东的作用，也不妨碍苏联人不时赢得阿拉伯人的好感。但是，说句公道话，我们不得不承认，莫斯科从没有对我们发动过全面攻击。而我们的为难之处在于，一方面要削弱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能公开羞辱苏联，缓和是缓解对手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培植友谊。

在101公里处的谈判破裂之后，埃及的不耐烦情绪似乎增长了。（我说“似乎”是因为我不能肯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法赫米的一个计谋，以使我们保持紧迫感。）法赫米向我们驻埃及的新大使赫尔曼·艾尔茨强烈抱怨没有取得进展。据他说，甚至萨达特现在也坚持要在脱离接触方面有所进展，作为埃及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一个先决条件。有迹象表明，埃及可能要求美国和苏联设法打破僵局，再不然，它也可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出呼吁。艾尔茨提醒说，萨达特和我曾经一致同意，脱离接触问题应当是和平会议的第一项议程。这招致了法赫米的强烈反驳，他说，和平会议随时都可以讨论脱离接触的第二阶段。可是，他自己心里一定清楚，这种意见是完全行不通的。以色列决不会同意在一个月之内作两次重大的撤退。而埃及呼吁苏联和美国政府来打破僵局，只会使

上个月的危机再现，最后结果同样是一事无成。

象在中东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法赫米开始时是施加压力，以示恫吓，后来却有弄假成真的可能，因为，有关方面总是爱倾听他们自己人的说话，而且喜欢他们所听到的一切。我们开始收到一些报告说，埃及正在考虑恢复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显然是必要的了。十二月一日，我们发出了尼克松给萨达特的一封信措词强硬的信，接着，我也向法赫米发出了一封信，警告埃及不要向超级大国发出任何呼吁：

尽管出于正当的考虑，但要求美国和苏联到这一地区来保证安理会决议的执行，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步骤，这一步骤既不符合贵国的利益，一般来说也不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

尼克松的信明确表示，我们在十二月份将抵抗苏联的压力，就象我们在十月份曾经做过的那样。同时，信中重申了我对法赫米也强调说过的话——恢复敌对行动只会毁掉几个月来取得的全部成就：“停火破裂将令人遗憾地再次迫使我们陷入对抗境地，（和平）机会可能被不可挽回地葬送掉。”

我们在发出警告——我想这些警告对萨达特来说不是完全不受欢迎的，因为可以用来对付他的性急的部属——的同时，还指出外交上的乐观前景。两封信都说，取得进展的客观条件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尼克松在信中保证，一旦日内瓦会议召开，美国将作出巨大努力。他说：“在和平会议上，美国将能够对实现以安理会二四二号决议为基础的和平施加建设性的影响。”为了协调一个共同的战略——这几乎毫无疑问是埃及表示抱怨所要达到的目的，尼克松派我再作一次中东之行，于是，我于十二月十三日到达开罗。

埃及方面的反应是：萨达特第一次发了一些牢骚，法赫米更加怒气冲冲地表示了一些恼怒，以及对是否恢复和在什么条件下恢

复 101 公里处的谈判表现出有些拿不定主意。但是，时间对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有利的。由于我们越来越接近会议的预定日期（十二月十八日）和以色列的大选（十二月三十一日），每次意见交换都没有机会作长时间的争论，在订不出一致同意的其他议程的情况下，脱离接触就成了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这样美国进行调解和逐步解决的道路就打开了。

通向日内瓦的道路

和平会议可望开起来的前景，迫使我们不得不在看来矛盾的情况下行事。我们一方面力争召开一个多边的会议，而我们的目的却是利用多边会议作场地，主要是进行双边外交。为了召开日内瓦会议，需要得到苏联的合作；而在会议开起来之后，我们又要设法把苏联的影响缩小到最小限度。和平会议可以安抚莫斯科的神经，让莫斯科把它看成是一个无疑将会考验我们之间关系的时期的序幕。

我在十一月份作环球旅行归来休息之后，于十一月十七日在华盛顿会见了多勃雷宁。他的上级对我突如其来的阿拉伯各国首都之行不会是兴高采烈的，对于在苏联没有参与、甚至事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达成的六点协议，更不会感到高兴。我的北京之行也不是一种使克里姆林宫心平气和的行动。看来最好是谈一些争论少的问题。在同多勃雷宁进行了简短交谈和浮皮潦草地说明了一下我的出访情况之后，我转换了话题。我说，我们准备着手召开日内瓦会议了。我建议由美苏两国共同向联合国秘书长写一封信，然后，他就可以向有关各方发出邀请，我提出邀请的国家有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我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人）。我告诉多勃雷宁说，我们很快将向他提出一份信件的草稿请他提意见。换句话说

就是，让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为过去的事互相指责，而马上着手眼前的事。

对于一个职业外交家来说，没有什么事比面临一个重要的会议更加心情振奋的了。它将提供一个考验的场地，考验人们毕生在研究程序问题、微妙的礼仪问题、“主持会议”和“当主席”问题等方面获得的真本领。所有这些问题在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时候都碰上了。

过了四天，十一月二十一日，我把给瓦尔德海姆的信件草稿交给了多勃雷宁；信中只是简单地说明，美国和苏联征得主要有关方面的同意，请求联合国秘书长邀请约旦、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参加将于十二月十七日或十八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的会议。会议将由美国和苏联“两主席”主持。信的其他部分是谈的技术安排。

第二天就收到了莫斯科的答复，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这反映了莫斯科的紧迫感。多勃雷宁告诉我，拟议中的会议日期是合适的；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将欣然与会。他将感谢我能够给予这次会议以最充裕的时间。我答应他两天，并邀请葛罗米柯在会议前夕共进晚餐。

过了一天（十一月二十三日），多勃雷宁交给了我一份经过改写的信件草稿，它清楚地表明苏联怀疑日内瓦会议可能会流产。它在我们的草稿上加上了我们有意不提的一条：会议将由美国和苏联“共同主持”。它强调会议要在外交部长一级开始，然后应由“专门指派的大使级代表”继续进行。苏联急于使它在会上的特殊地位得到肯定，并且对某种形式的高级常设机构承担义务，这种情况反映了它担心（这种担心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可能设法使会议降格。从莫斯科的观点看来，麻烦在于，如果其他有关各方都同意苏联所怀疑的东西正是我们的战略，那么，任何程序性的花招都不能阻止我们执行这一战略。如果外交活动的焦点转到双边讲坛上

去,那么,特命全权代表的级别就几乎是不相干的了。葛罗米柯正确地分析了他面临的问题;他的困难在于,找不到什么解决办法。

同时,苏联人渴望召开会议还在下一事实中反映出来:葛罗米柯重新草拟的信,同我们的信件草稿一样,一点也没有明确提到巴勒斯坦人(它只提要邀请叙利亚、埃及、约旦和以色列,“不排除在以后的阶段可能有更多的参加者”)。

在为召开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以色列究竟要撤出多大面积的土地)而进行的这些努力中,阿拉伯领导人觉得有必要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过去,他们所以能够协调各自不同的观点,只是靠肯定会唤起激情的高谈阔论;阿尔及尔最高级会议也不例外。十一月二十四日,举行了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举行了政府首脑会议。会议情况表明,就像每个人有截然不同的个性一样,与会者的目的,也是各不相同和互相冲突的。阿拉伯队伍中的两个极端派(利比亚和伊拉克属激进派,约旦属温和派)根本抵制会议,极端派之所以抵制,是因为它们反对任何和平进程;侯赛因国王之所以反对,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担心(这种担心是对的)会议的决议会偏向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埃及之所以出席会议,是想得到阿拉伯世界对它自停火以来所奉行的政策的认可;它对同美国建立新的联系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对它自己单独推进和平进程也信心不足。叙利亚想要表明阿拉伯的团结一致,以制止埃及单独媾和的倾向。沙特阿拉伯力求取得一致意见,以避免必须在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作出抉择。其他国家有些站在萨达特一边,主张谨慎行事;有些则要炫耀阿拉伯团结,如像其他所有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一样,想把这次会议扭向好战方向。

结果是每个人都得到了一点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埃及得到了对它已经采取的行动的有条件赞同,至少是使和平进程得到了不

冷不热的批准。可是，推进和平进程的纲领同六年来使问题陷于僵局的那些要求并没有什么不同：以色列立即撤出被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在内；“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充分的民族权利”。^① 第一项条件小心翼翼地避免为“被占领的领土”下个定义。但是，既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并表示同意，那末，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为了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不再坚持一九六七年的边界这种标准立场，而是走得更远，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按一九四七年联合国分治计划划界。会议对巴勒斯坦人的“充分的民族权利”作何理解也未作详细的说明；最高级会议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这就着重说明他们不满约旦对西岸领土的统治。

最高级会议的后果是使以色列和约旦——阿尔及尔会议的矛头所向——对日内瓦会议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十二月一日，约旦首相扎伊德·里法伊告诉迪安·布朗大使说，阿尔及尔决议等于要约旦设法同以色列谈判归还西岸土地和耶路撒冷的阿拉伯部分，对可能是必要的任何领土让步承担责任（最后是承担一切罪名），然后把所得到的一切都交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约旦不愿意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可是，里法伊重申，约旦“原则上”愿意出席日内瓦会议；它认真看待我们提出的意见，即如果它不出席会议，就好象它放弃了对西岸的要求，那就有正中其对手的下怀的风险。

劝说以色列同意出席会议也是较为困难的。以色列决心抵制阿尔及尔会议所阐明的要求。这样，阿尔及尔最高级会议就给外交活动带来了新的紧张，人们很快发现，所有有关方面都对邀请信的草稿争论不休。以色列要求邀请信要明确说明，除非得到一致同意，否则，除了原来商定的以外，与会的代表团不得扩大——这就正式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排除在会议之外了，而且以后参加的话也要遭到以色列否决。以色列还对联合国抱有很大的怀疑，除了主

持仪式的活动外，它不希望联合国起更多的作用。同时，在阿尔及尔会议之后，埃及的法赫米，态度发生了如所预料的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他坚持邀请信要明确提出在会议的稍后阶段，请巴勒斯坦人参加。他提出的方案是：在会议的第一阶段将讨论“巴勒斯坦人参加的时机”——这当然就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参加的事实已经定了下来。他除了坚持这一点外，还对我们的邀请信提出了其他意见。他想消除苏联的影响；因此，反对美苏“共同主持”，而要联合国起更大作用。叙利亚则保持沉默。

不管这些反对意见多么琐细，每一条都要知照其他有关方面；所提出的每一条折衷方案，都要争取一切有关方面加以接受。会议有陷于文件堆中的危险。对我来说，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我在十二月八日（星期六）要去布鲁塞尔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然后再周游中东。因此，华盛顿收到的每一条修正案，不管我当时在什么地方，都必须及时转给我，然后，我再把意见通过华盛顿告知所有有关方面。这就忙坏了我座机上的通讯联络人员，他们的工作干得很出色。

十二月五日，我们拟定了邀请信的新的文本，想使所有与会者都可以声称它的某些观点已经得到采纳。当然，每一方同样也可以抱怨说，它没有实现自己的全部要求。后来证明，它们更多地是表示不满，而不是满意。

我们的邀请信草稿是用一种巧妙的措词来处理联合国的主持问题的，这种措词可以解释为联合国只是召开会议，而不是包办会议；秘书长的参加表达上限于会议的开始阶段。至于巴勒斯坦与会的问题，我们提出的是，他们的参加“问题”（而不是参加“时机”）将在会议第一阶段讨论——这意味着问题没有解决。对我们来说，这看来不是多大的让步，因为它只是容许每一个与会者不管怎样都有权提出：是否应当有更多的方面参加会议。可是，对果尔

达来说，这显然是走得太远了，她坚持反对提到巴勒斯坦人，不管在提到的时候是多么模棱两可和有保留。

于是，有趣的场面开始了。苏联坚持由美—苏主持；埃及则坚持要求联合国主持。苏联和埃及都认为，原先关于巴勒斯坦人参加的“时机”这一措词，是神圣不可更易的。以色列唯恐我们过于自信，反对联合国主持，并且提出了一项新的条件：即使最后的文本证明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叙利亚没有全部释放以色列战俘之前，它不会同叙利亚坐在一起开会。这时离拟议中的会议开幕日期只有十一天了。

结果迫使我们发出一连串电报。十二月十一日，所有有关各方（除一个外）都作出了一些让步，非正式地接受了我们十二月五日的信件草稿。越来越接近大选的以色列，坚持原来的态度。正如达扬十二月七日对华盛顿进行闪电访问时告诉我的：“只要巴勒斯坦人的与会问题存在着疑问，果尔达就不能参加选举。”

但是，在选举问题之外，果尔达·梅厄本能地抓住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是不关痛痒地提到巴勒斯坦人。可是，阿拉伯人坚持要提到他们，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实质性的、而不是程序性的意图；它在一封邀请信中提出一项议程，并要求予以特别的注意。因此，对果尔达来说，这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而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她知道，和平会议一定会把程序性问题逐步发展成为可恨而又可怕的实质性问题的。

一经深入研究，果尔达就寸步不让。甚至在尼克松进行了实际干预之后，她仍然表现无动于衷。十二月十三日，总统在上午的情况汇报会上得悉了以色列政府的消极态度。他写了下面一张便条：“基（辛格），告诉埃班等人——如果他们的这一要求招致另一次战争，他们就只好自己去打仗。”由于我不在国内，由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把尼克松的信息转告了迪尼茨——我想语气可能缓和

了些。当尼克松从水门事件造成的垂头丧气状态中重新打起精神的时候，他的那种好斗的劲头又表现出来了。他向果尔达写了一封私人信，信的末尾发出了撤销美国的支持这样不祥的警告。

我愿非常严肃地奉告阁下，如果以色列不能作出赞同的决定，参加在我们草拟的信件的基础上召开的会议，那不论在美国或者在世界上都不会得到谅解，我们也不能够为给予贵国的支持进行申辩，而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我一向是坚持给予这种援助的。

果尔达采取她通常采取的策略，对尼克松的信不予置理，而声言要在耶路撒冷亲自对我作出答复（她从未答复）。至于斯考克罗夫特，他只得到了一个简短的回话，即总理没有被说服。

十二月十三日，我从欧洲前往中东。日内瓦会议定于五天后开幕。可是，对于邀请信的措词还没有取得协议。

阿尔及尔

我每次的中东之行都有着不同的安排。我们在三个方面同时采取行动：美—苏关系；在阿拉伯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争取影响；阿拉伯—以色列危机。这些行动有时是交叉进行，有时是单独进行。因此，在中东的每次大胆行动都归功于一个三环杂技表演。主要不同的一点是，当一个演员在玩他自己的一环的时候，另外两个环的演员就停下了他们正在进行的表演，而根据他们所看到的，或者（更加为难的是）根据他们认为他们所看到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动作。

经验教育我，尽管高喊阿拉伯团结，而紧张的阿拉伯内部斗争和猜忌却是无法估量的因素，而要预测则更加困难，因为这些争斗和猜忌大都是集中于个人之间。举例说，在利雅得为费萨尔国王举行的宴会上，我提到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作用时，反应冷

淡(参看第十三章)。后来,我从其他阿拉伯人士那里听说,沙特阿拉伯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有人曾劝告我们说,不要把这一点视为当然,即费萨尔国王会同意萨达特所同意的任何事情;沙特阿拉伯将坚持它自己的看法。

我还发现,在阿拉伯世界,消息传播得惊人迅速,每传到一个地方,就走一点样,而其总的结果是,对事物的说法更具有心理特色,而不是事实特色。既然大多数政治打算都是在人的头脑中产生的,因此,心理因素就常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阿拉伯领导人爱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这是一种用来美化他们的行动和建立道义阵地的手段。由于阿拉伯主要领导人依靠谣言机器,相信它胜于相信直接的报道,因此,聪明的作法常常是,弄清楚某一阿拉伯领导人已受到某个人的论点的影响,以准备立论的根据。即使他们不相信他们的阿拉伯兄弟告诉他们的某些话(这几乎是对人的气质的一种强制性考验),却很容易轻信第二手消息,把这看成是可以提高他们的知内情者的地位,并且认为这可以使他们胜过对手一筹。可是,人们也要注意保留某些重要消息以提供给其主要对话者。他很重视间接消息,但是更重视独家消息。

日内瓦会议的一个目的是使和平进程不要在阿拉伯世界激进派和温和派的两极分化中搁浅。从这一点看,大马士革在我第二次中东之行中是关键的一站,就象开罗在我第一次中东之行中所处的地位那样。如果叙利亚参加日内瓦会议,或者甚至在会议上表示默认(我们当时还没有听到它直接说过一句话),并且同意把脱离接触作为第一项议程,那么,我们的基本战略就保险了。否则,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艰苦的斗争。人们有理由怀抱希望。自从战争结束的时候起,叙利亚就一直试探同美国接触。十一月二日,我在华盛顿同叙利亚外交部副部长穆罕默德·查卡利亚·伊斯梅尔举行了一次会晤,他是为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到美国来的。他

没有得到任何训令；多年来一个比较高级的叙利亚官员第一次访问华盛顿，这一事实看来颇能说明大马士革可能产生的政治形势。十一月八日，我在沙特阿拉伯被告知说，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想直接与我们会谈。其后，我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了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哈赛姆·卡拉尼，这是我定于十二月十五日访问大马士革的前奏。

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比阿尔及利亚总统胡阿里·布迈丁——强烈坚持独立，并且是一个同叙利亚保持着特殊关系的激进派——更适合于在大马士革进行准备工作了。在十月战争期间，他曾经前往莫斯科进行闪电访问，要求苏联对阿拉伯事业给予军事支持。据开罗的谣传，他失望而归。我并没有指望布迈丁公开支持美国的一项外交行动；因为他太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了。但是，如果他在私下以赞同的态度同叙利亚谈谈美国的外交行动，哪怕是不表示反对，阿萨德就可以有借口实行合作，而激进派对沙特阿拉伯的压力就会减轻。

我们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四）在一场连绵不断的细雨中在阿尔及尔着陆，天雨使欢迎显得冷淡。侃侃而谈的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他曾作为阿拉伯国家外交部长代表团的一员在战争期间访问过尼克松和我（参看第十一章）——完全不像他的同僚那样表情严肃。他年轻，英气勃勃，穿着入时，常常身披一件大斗篷，嘴叼一支大雪茄。他从不放弃在电视上露面的机会。他在欢迎我时的讲话，比当时官方路线所定的调子要热情些。

当我们迅速驶向布迈丁那座可以俯瞰地中海的山中寓所时，我的脑子里映现出二十年前同法国伟大作家阿尔贝·加缪在巴黎的加里马尔出版公司他那间小小办公室里会见的情景。我当时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家叫作《汇流》的小小刊物的编辑。这个刊物登载欧洲和美洲作家撰写的各种问题的文章，以促进大西洋

两岸的了解。我们曾转载过加缪的一篇文章，为此我去向他表示敬意。他对我的年轻毫不表示惊异；他未提到我的季刊是登载过他的文章的最微不足道的刊物。突然之间——他几乎是像自己对自己说话，而我不过是能够引起他作出反应的一个适合情况需要的陪衬人物罢了——他开始谈起阿尔及利亚，这是他的出生地，那时是法国的一个省。他温文地谈到阿尔及利亚是和解和谅解的化身，它是地中海太阳，严格的传统和对各种不同文化兼收并蓄的产物。在这里而不是在任何别的地方，人类可以努力追求兄弟之谊的理想。那时候，加缪已经对他的祖国的前途感到忧虑了。他希望民族主义不要摧毁其文明使命。他不忍去想我们时代的激情可能把阿尔及利亚吞没，并把它与它分开；它对个性的追求决不应采取同法国分离的方式。当时，对我来说这还不是很清晰的，因为阿尔及利亚革命的雷声才刚刚开始。现在，当我去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胜利的领导人时，法国已被赶走十多年了。不管对一个现代的阿尔及利亚还能够说些别的什么，但和解、兄弟之谊、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的谅解看来都不是它对历史的贡献。它是一场艰苦战争的产物，它把不妥协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辞藻运用于外交活动之中，不妥协哲学使它实现了内部团结，而马克思主义辞藻使它的领导人能够保持控制，而无需借助于定期的选举。

布迈丁的寓所是前法国总督的官邸的一部分。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院子里排列着仪仗队迎接。会议厅呈深长的洞穴状。布迈丁站在大厅的一端，身躯挺直，披着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手里拿着一支雪茄。这看来是阿尔及利亚的标准服饰。后来，我听说布迈丁是以他抽掉的雪茄数目来判定会议开了多长时间的。有一支雪茄的会议和两支雪茄的会议，间或也有三支雪茄的会议。由于不知底细，我没有计算递给我的雪茄的数目；不管怎么说，看来他的时间很充裕。

几乎是在会议一开始，布迈丁就决心告诉我，他抽的雪茄是古巴的。他神态庄严，有着一个狂热者的敏锐的目力，可是举止得体，谈吐斯文。他的言谈举止看来象是并不满足于曾经是争取独立的一场艰苦卓绝战争的军事领导人。布迈丁象许多自学成长起来的军人那样，并不在人前夸耀他的军事才能，而是更多谈论他所不熟悉的另一个领域的问题——政治哲学，这就给人以神秘感。他是属于这样一代的人，第三世界理论的流行教义已经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美国是“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进步的”；第三世界是“受剥削的”和天生“爱好和平的”。象加缪一样，他坚持认为阿尔及利亚的行动具有普遍意义。可是，有一点同这位法国绅士不同的是，他认为阿尔及利亚的可贵之处不是在于珍视和解，而是在于纯洁的革命坚持性；在于不妥协的对抗，而不在于成为他自己藐视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革命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和资本主义的美国国务卿之间的这场谈话，主要涉及我们之间互相对抗的国际关系哲学，就象两位政治学教授在辩论他们的信条的性质那样。

布迈丁一开始就显得彬彬有礼，使人立即感到放心。他说：“阁下在中东进行工作，很好。”如果激进的阿尔及利亚也欢迎我的努力，我们的战略目标就完成了一半。布迈丁可能意识到说得太过分了，因而接着就警告说：“这是一个感情激动的地区。问题很多，变幻莫测。”他不等我发表意见，就单刀直入地陈述了他的主要论点，他把这叫作“阿尔及利亚行动方式”：

近年来，你对中国作出了伟大的开端，你的苏联之行是一个伟大的主动行动。你解决了印度支那问题。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不是美国政策的转变？世界是不是还分为两个或者三个阵营？另外，我是属于蒙受过两种屈辱的一代的一个阿拉伯人，这两种屈辱是：英、法殖民主义的屈辱，和一个叫作以色列的殖民主义的屈辱；这个有三百万人口的国家，由于得到某种大规模的支持而成了这一地区的宪兵……

客观地说，就这一点来看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阿拉伯的和平，甚至是同以色列谈判实现的和平。我自己就同法国谈判过。可是，谈判是不能以武力来完成的。我们很希望能谈判。在世界还保持目前这个样子以及美国和苏联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另一种可能性是苏美式的和平，正是它们安排了停火。在这一谈判中起主要作用的正是美国。

我不能相信的是，如果是美国式的和平，那会是公正的和平。分开来看，一方面，有越南的和平，另一方面，却还存在一个以色列。一方面，有个巴基斯坦，另一方面，却还有一个智利。*

这种陈述事实的逻辑是为了消除疑虑。布迈丁暗示他愿意“甚至”同以色列进行谈判——这是一个以自己的激进引为自豪的阿拉伯领导人的重要变化。而且他强调了美国的中坚作用。他所需要的不是一种理智上的宽慰，这就是：美国（从他所受的政治教育来看，美国是马克思主义教义里的幽灵）不会象他自己估计的那样来行事。他对美国打开通向中国的道路、同河内进行谈判以及站在它的巴基斯坦朋友一边，表示赞赏。但是，他对我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和所珍视的东西而采取的步骤，则不那么热情。他好象要作些挑剔；甚至想使我们相信他那种牌号的激进社会主义。在未能作到这一点之后，他表示愿意使自己相信信任我们是可能的——但是他没有说明：根据他自己关于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信条，为什么我的一些陈述是有说服力的。

在布迈丁提出的三种可能性中，看来他对美苏的中东安排不大热心；经过简短的意见交换表明，尽管他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可是他并不信任苏联。

布迈丁：你认为苏联会为阿拉伯人而战吗？

基辛格：不。

* 有趣的是，布迈丁认为，我们在一九七一年转而倾向于巴基斯坦是“进步的”行动。

布迈丁：我也不这样认为。

布迈丁既已定了调，就无需浪费时间来向他解释我们关于日内瓦会议的邀请信草稿的奥妙所在了。布迈丁的信任并不是由于我们在含糊的措词上表现出来的技巧而赢得的；不管有可能达成什么样的谅解，那都取决于布迈丁理解——如果说不是接受的话——我们的目的。同从前的对手或潜在的对手——阿尔及利亚确实曾经是对手而且很可能再次成为对手——打交道的先决条件，就是确立一种哲学前提，这种前提能够经得住因现实的需要而可能提出的种种无可避免的考验。因此，我在会谈中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说明确定我们的政策的一些设想，特别是针对着布迈丁对超级大国的控制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我解释说：

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基本观点是，在当前的客观趋势和条件下，要想取得实际上的控制是办不到的。因此，我们想要作的就是，鼓励真正的独立潮流，使美国摆脱——我不喜欢“帝国主义”这个字眼——为世界其他地区作决定的这种客观需要。因此，我们欢迎欧洲的统一而不是反对它；即使它有时攻击我们，我们也不予反对。因为，如果它有真正的独立的精神，它迟早总会保卫自己而抵抗它面临的真正危险。如果它要作到这一点，它就需要得到它的人民的支持。

我们不谋求控制是出于与人为善之心，因为任何其他作法都会把我们搞得精疲力竭。

我力陈说，因此，阿尔及利亚同美国的关系不应当根据一些时髦的口号——如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来决定。相反，应该考验我们协调显而易见的民族利益的能力：

我们的目标是致力于阿拉伯国家的真正独立。如果你们在对外政策中采取我们所强烈不赞同的行动，我们就要作出反应。如果我们采取你们所强烈不赞同的行动，你们也会作出反应，就象在联合国常常发生的那样。如果这种关系不凝结为长期的敌对，我们可以听其存在下去。在战争期间，我在华

盛顿曾经告诉贵国的外交部长说，一待战争过去，我们就将作出重大努力。而且我当着一些更加保守的外交部长的面告诉他说，我们尊重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的方面。

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寻求的并不是美国式的解决办法，而是寻求一种可能性，使阿拉伯国家能够从对以色列的疑惧中解放出来，并且听任阿拉伯世界自然发展。

布迈丁不会轻易放弃他认为超级大国会背信弃义的老一套看法。如果苏—美不是共同统治的话，那末，它们就必然是互相争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要求知道，我打算把两个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划在哪里，我们怎样来争取“灰色地区”——这些地区既担心大国的竞争，同时又想利用这种竞争给小国提供的机会。这又为我提供了一个对共同统治加以批驳的机会：“我们不承认苏联势力范围，也不要求有一个美国势力范围。”我们同苏联争夺不会以中东作为牺牲品。同时，我也不愿意鼓励这样一种想法：小国可以挑唆我们互相反对：“总统先生，严肃的人是不会被争取到的。我们也不是要来争取你们……你们将按你们的利益行事，因此，决不会有永久不变的胜利。对我们来说，问题是你们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不是可以并行不悖。”

象不结盟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一样，布迈丁对超级大国的竞争在内心里也是矛盾的。他公开表示不愿成为争夺的目标，也无意于探索这是不是为阿尔及利亚提供了一个充当掮客的机会。他显然不喜欢苏联，当我发表下述意见时，他没有表示反对：“但是，你一定会理解，如果苏联在日内瓦作出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姿态，我们将予以抵制。我们不会接受压力。”

当我们具体谈到中东外交的时候，布迈丁表明他是非常实际的。刚刚参加了在本国首都举行的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的布迈丁，接受了这样一个建议：日内瓦会议在最初阶段应集中讨论脱离

接触问题。这就一定意味着阿萨德已经同意了这一点，或者甚至要求他提出这个问题；在一个对他这样敏感的问题上，布迈丁是从来不肯表明他自己的观点的。后来他又表示，他想弄确实，叙利亚不会被排除在我们的外交活动之外，这就立即证实了上述的结论。我就这个问题重新向他作了保证。我告诉他说，对我来说，阿拉伯世界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至在我停留的每个不同地点，都要找出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他可以随便把我向他谈到的一切通报大马士革——这并不是什么让步，我会见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把我的态度事先告知叙利亚（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希望在我去叙利亚之前，尽可能弄清楚阿萨德的想法）。无论如何，布迈丁肯定会向阿萨德通报的，而不管我愿意向他通报些什么。我告诉他说，如象在西奈一样，脱离接触的原则也适用于戈兰高地。但是，我反对这样一种建议，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完成西奈的脱离接触，尤其是因为这样可以（他说）缓和我们的石油问题。

对于最后一点我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对我们来说，石油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会接受有些人在要求我们帮助的同时，又对我们发出威胁。我们不能作无法兑现的许诺。我们将坚持我第一次同萨达特会晤时提出的日程表：在举行过第一阶段的会议之后，我们就使日内瓦会议休会，然后于一月十天左右复会。其后，我们就将作出重大努力完成西奈的脱离接触。下一步我们就转而致力于西奈的脱离接触，可能在二月份——但是，只有在取消石油禁运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

我的战略是强调取得能够实现的东西，为此，我回避了一九六七年边界问题。关于围绕邀请信可望产生的争论，我警告说，在现阶段提出巴勒斯坦人问题将会毁掉取得进展的一切机会。布迈丁不再坚持，也许是由于知道了沃尔特斯将军在拉巴特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举行会晤的情况而放心了，曾向他介绍过这次会晤的情

况。

我们在亲切的气氛中结束了会谈。布迈丁原则上同意华盛顿与阿尔及尔之间应该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尽管他认为眼下时机还不成熟；但是，我们各自在阿尔及尔和华盛顿的利益机构的负责人，马上可以提高级别，这和四个星期之前同埃及作出的安排差不多。我们决定用坦率的（意即有分歧）但是“非常建设性的”（意即在广泛领域取得了一致看法和创造了良好的气氛）这样一些措词来形容我们的两小时会谈。

布特弗利卡在机场向群集的记者宣布，我的访问标志着阿尔及利亚—美国关系的转折点，阿尔及利亚支持美国在中东谋求和平的努力。这就意味着，阿尔及利亚在大马士革将会为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起帮助作用，而不是阻挠作用。

在阿尔及尔取得的和好是有限度的：它等于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实行战术合作，其后实行一种心照不宣的谅解，不激化我们在处理世界事务的方式上不可避免的分歧。可是，在我们的中东外交几乎还处在非常容易夭折的最初阶段时，我们得到了阿尔及利亚一定程度的支持，而由于阿尔及利亚在第三世界的革命形象，这种支持在使我们能够把事情推向前进方面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

重 访 开 罗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四）傍晚，我从阿尔及尔到达开罗。那里仍然在实行灯火管制，离前线毕竟只有五十英里远。外交部长法赫米在机场迎接，他象往常一样脾气暴躁，以掩盖他前两周所采取的巧妙而富于建设性的行动，当时他发出关于埃及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种好战叫嚣。我还不知道果尔达拒绝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

邀请信草件。我为埃及接受了我们关于巴勒斯坦的措词（即：“……问题”）而高兴。法赫米对我们的信件草稿表示同意，认为这是在同美国和苏联大使举行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取得的“叙利亚—埃及的”共同立场。把我们的建议作为埃及的要求来提出，这就减少了使苏联再作考虑的引诱力。事先就这一点同叙利亚取得协议则防止了苏联或激进派提高赌注的企图。

但是，也有迹象表明，埃及的灵活性是有限度的。在我到达开罗的当天，当地的主要报纸《金字塔报》警告说，取消石油禁运取决于以色列撤出阿拉伯领土。这家报纸还说：“问题的解决不在于具有双重含意的各种精明的外交方案，各方为了自己的目的都可以把这些方案按自己的方式加以解释。”如果这是指我们为召开日内瓦会议而作的努力，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如果是指我们中东外交的实质而言，那就完全没有说到问题的点子上。我在飞机上对记者们说：“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那是愚蠢的马基雅维里主义。”^② 我希望他们把这个信息转达给他们的同行。

法赫米和我乘坐纳赛尔的老式奔驰轿车，径直驶向萨达特的另一座别墅巴拉基斯。正是萨达特而不是别人将再次决定，究竟是在还有五天就要举行的会议上把和平进程推向前进呢，还是无休止地辩论邀请信的草稿和决不会在一开始就提出来的各种精明的方案，从而虚耗我们的本钱。围绕邀请信展开辩论只会产生僵局，而不是取得进展。而且，即使邀请信措词拟妥了，它也不能取代实际的谈判。必须彻底打破僵局，不然我们的外交就会从僵死走向垮台。

日内瓦会议如何安排也不是件小事。就象下棋一样，开始几步可以决定最后的结果。我渴望把会议分成一些小组——埃及—以色列、叙利亚—以色列、约旦—以色列——这样，就可以使苏联无法在全体会议上利用激进的阿拉伯国家作卒子，阻挠会议取得

进展。可是，苏联迅速同意了分成小组的方案，这可能是因为埃及和叙利亚急于要求脱离接触。但是，莫斯科把我接着提出的一项建议推迟到日内瓦会议上才默然同意。这项建议就是，除非得到有关方面的邀请，美国和苏联的代表将不参加小组（实际工作却是在小组进行的）。我想促进直接的谈判和保持在幕后采取迅速行动的灵活性，免得受到苏联的否决。如果萨达特同意我的作法，苏联就无能为力来加以阻挠了。

巴拉基斯在开罗北郊，是一所漂亮的建筑，上个世纪兴建供英国工程技术人员居住的。它位于尼罗河谷一片四季常青的地区，周围是一些面积很大的花园，傍着一条古时候用于灌溉的运河。我们驱车经过一个花园，园内长满了茉莉花和榕树。一条雅致的梯道通向一所大别墅。入口的左侧是一间大会客室。萨达特身着军服，正在那里等着我。

当新闻记者和保卫人员退出会客室后，萨达特就开始了他的谈话。他坐在靠一端的墙放着的一张矮沙发里。后来推进来了一张带轮子的桌子，双方共进晚餐。席间他继续其谈话。他没有谈到日内瓦会议的一些难题，而是概述了他自己对未来的看法。他说，他极不信任苏联。他每去一次莫斯科，都为苏联的粗暴和盛气凌人而感到羞辱。苏联只是要利用埃及来实现它自己的自私目的。说实在的，他们使纳赛尔很伤心。他死前几个星期，刚刚结束对莫斯科的最后一次访问，回来后决心摆脱那种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控制。萨达特既然已经恢复了埃及的自尊，他就打算实现这一目的。他将逐步消除苏联在埃及存在的一切痕迹：从开罗西郊机场起飞进行侦察飞行的四架米格-25 狐蝠式超音速喷气机和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苏联舰队将被遣送回国。他将让苏埃友好条约慢慢消亡或干脆废除——他还未决定两者中选择哪一种作法。但是，在和平进程没有进一步推进之前，他不能这样干。他坦率承认他对苏

联军事供应的依赖。他宁愿转向美国寻求武器，可是，他看不到马上会有这种可能。在他不能指望另一条道路会取得具体成果之前，他不能完全摈弃苏联在外交上的支持。如果谈判陷于僵局，他必然会被迫再次走向战争。他现在指望着美国，他引用了很快成为大家所常说的一句话，“所有的牌都在你们手里。”

至少，这是对事情的一个不寻常的陈述。通常的作法就是进行明白无误的敲诈——扬言除非按所希望的方向前进，否则就要加强同某人的对手的联系。萨达特并没有发出威胁，甚至连暗示都没有。他显然想摆脱他同苏联的联系。为了使他切断他同我们的主要对手的联系，我们要作的一切，就是奉行我们为了自己的原因而决定奉行的方针。萨达特常常假装天真以掩饰其精明。他曾得出结论说，依靠苏联人，保险会陷入僵局。因此，他认为，通过使他自己的计划不能实现来要挟我们，是没有意义的。最好还是作出必不可免的让步，建立礼尚往来的关系，首先是奠定互相信任的基础，这一点是他的战略的关键。

萨达特还说，我刚刚在四个星期之前就强调指出过，和平首先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但障碍不单单是在以色列一边。阿拉伯人是自豪的；他们蒙受过耻辱。对他们来说，困难在于，他们不知道怎样从他们发觉自己已经陷入的绝境中摆脱出来，走向他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和平。萨达特设法走出一条道路——必要时他单独干也可以，但是，他希望不要走得太远，以致他的弟兄们最后会不跟随他前进。但是，以色列必须向他提供某些帮助。我可以告诉果尔达·梅厄，萨达特是真心希望和平的，但不是以牺牲“我的”领土为代价。他问我是不是认为果尔达强而有力足以媾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他知道，和平不会由一个和善的以色列领导人来缔造，而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缔造。我告诉他说，如果实力是首要条件的话，那么果尔达就是他所希望的人。

当然，这些哲学性的思虑无助于当前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在这样一个尴尬局面上，就是邀请信的草稿有使人们已经同意召开的会议陷于夭折的危险。萨达特慷慨地把解决这个难题的工作推给了我。

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深深相信处理好邀请信的措词是神学家而不是外交家的任务。我们永远不会就它的条款的解释达成一致意见。我主要的贡献就是首先阐明一些原则。我说，无论怎么说，我并不认为有现实的军事选择。如果战争再次爆发——就象萨达特所暗示的，那么，十月战争时的客观现实将会再次出现。埃及的军队仍然要由苏联的武器来装备，仍然要依赖于苏联的补给；他将被迫再次倒向苏联。如果我们表明问题不能由苏联的武器来解决，那我们就会保持住我们的地缘政治利益。结果就会是在更高的暴力水平上出现另一次僵局和象现在面对的同样的困境。那时候，他就只会成为莫斯科的俘虏，而再也不能转向我们了。

至于邀请信，我强调说，重要的是撇开一切枝节问题，由于存在这些问题，有关各方正试图利用邀请信的起草工作做文章，在会议甚至还没有开起来以前，就确定下会议的结果。中东的和平是不会从依附性的条款中出现的。也许我们应该抛弃那封冗长的邀请信，而拟定一封只有寥寥数语的邀请信，让会议来解决一切程序上的枝节问题。如果我们对首先是在埃及前线然后是在叙利亚前线实现脱离接触一事是认真的，那么，首要的任务就是用一封最简明的邀请信使会议在日内瓦开起来，然后尽快分成小组（最好不要有苏联参加），进行认真的谈判。任何提及巴勒斯坦人的话都必然会触及以色列神经的痛处。在就要举行大选之前和进行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推翻了以色列过去政策的许多前提）之后，要以色列这样来面对这一问题是太过份了。一封简短的邀请信可以避免进退两难的局面。

萨达特眯缝着眼睛，以他特有的姿势听取了我的意见。他的反应同一个月前一样。他未经争论就接受了我提出的主要方针。他说，即使叙利亚不参加，埃及也要出席日内瓦会议。草拟一封能够满足每个人的要求的邀请信是人的智力能办得到的事。他赞同一封简短的邀请信，虽然草拟一封全新的邀请信有冒再经历一次排除障碍的全过程，从而使事情推延下去的风险。我利用这一契机提出了另一个把关于巴勒斯坦人的措词问题冲淡的妥协方案。我告诉萨达特说，如果我们坚持那封长信，那末最好是我们先就谈及其他参加者的一个中立表述方式达成协议，而完全不明确提到巴勒斯坦人——比如，“更多的参加者的问题”将在日内瓦会议的初期阶段加以讨论。阿拉伯人可能会说，他们要利用这一点邀请巴勒斯坦人参加；以色列则会说，它将予以拒绝——但是，这一切都只有在会议开幕之后才会发生，而且这个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除非它在事前已经解决。

萨达特说，他将在我访问大马士革后就这一方案作出决定；他使人毫不怀疑，它几乎可以肯定会得到赞同的。为了缓和以色列的焦虑，他提出了一个对以色列更带根本性的保证。不管邀请信的措词如何，他都不会在谈判脱离接触的阶段提出巴勒斯坦人问题——换句话说，在许多个月内都不提出。

就我提出的程序性问题而言，萨达特同意会议应该尽快分成小组进行——事实上，这是可以迅速在西奈实现脱离接触的唯一道路，因为叙利亚肯定会在一次全体会议上阻挠单独行动。为了一个类似的原因——这一次是防止苏联否决——他同意苏联和美国都不应参加小组的建议。但是，他提出了两项要求：美国必须积极参与谈判；作为这方面的一个表示，他要求我在一月份重返中东，与他共同制定脱离接触计划的原则，这样，日内瓦会议按计划于一月十日复会时，就不会退回到僵局去。

时间已过午夜，萨达特建议第二天上午再讨论脱离接触问题。但是，从布鲁塞尔动身算起，经阿尔及尔赶到开罗，这一天还没有结束。我离开了萨达特，于上午一点三十分到达开罗，会见了苏联大使维诺格拉多夫。我向他说明了发出简短的邀请信的一个应急计划。在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他除了向莫斯科报告外，不能作任何表示。

在整个这段时间，我一直惦记着水门事件和我们国内脆弱的基础。由于先前采取回避态度，尼克松已经失去了控制事态发展的能力。他对水门事件作了些陈述（我仍然这样相信），他确实不知道录音带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些事使得他心神不定。十二月，在一盘录音带上发现有十八分半钟的空白，报界又指责他在缴纳所得税方面有不正当行为，这两件事使他受到了一阵猛烈的攻击。

尼克松真要成为一个超人了，要是他始终能够抑制着自己的不满情绪，听任他的国务卿为一项对外政策（这一政策就是靠他本人的坚定性才得以执行的）而受到称赞的话。每当某些戏剧性事态变为众所周知——政治家们的生命线——的时候，情况就更其是这样。而尼克松的压抑着的受挫情绪这时会突然爆发出来。现在回顾我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恐怕比当时更能谅解他。

像通常一样，真实情况是复杂的。尼克松显然没有得到他应得的赞扬。对于他的下属的功绩的注意有一部分是不相称的，但是，我的名噪一时反映了尼克松的困难处境，而不是造成了他的困难处境。一旦水门事件的发展越过了某一限度（最迟也是在发现了录音带之后），它就有它自己的势头了。

但是，使尼克松要一干到底的那同一个坚定性，也使他很难放弃自己的一种希望，即某种惊人的成就可能会魔术般地使苦难告终。例如，受到报界广泛报道的十二月十二日我在伦敦朝圣者协会发表的演说，使他大为光火（参看第十六章）。对于这次计划中的演

说，我曾好几次告诉了尼克松。我还把演说全文送交各主要机构审阅修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给了他一份草稿。我不知道尼克松有没有读过它；在他心事重重的情况下，他很可能没有读。他的反对决不在于演说的实质内容，而是在于演说出乎意外地受到欢迎——特别是因为演说涉及能源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希望能够出现某种惊人的突破的。

因此，十二月十三日，当我到达中东的时候，尼克松就采取了一个报复行动，他突然召见苏联大使多勃雷宁进行私下会晤——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事态，斯考克罗夫特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几分钟前，总统指示要多勃雷宁前来与他单独会晤。他笼统表示要讨论中东问题，除此以外，未作更具体的说明。多勃雷宁来了，与总统会晤了大约三十分钟，刚刚离去。我问多勃雷宁，会晤进行得怎样，他说进行得很好——是他与总统曾经有过的最满意的会谈之一。

这显然是对朝圣者协会演说的反应。我将问黑格能否弄清楚谈了些什么，当然，弄清楚将立即告诉你。我想这可能是个不利的发展，也许还会更糟糕些。

最后一句话是出于斯考克罗夫特的敏感和谨慎。我并不如此客观地看待这次会晤——特别是由于向新闻界作了大量说明，说这次会晤是“对美国和苏联之间全面关系”的“一般回顾”。在萨达特告诉我他打算结束苏—埃友好条约的同一天，由白宫来宣布总统采取了只会被误解为是加强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的行动，那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我全神贯注于中东当前的严肃的工作，当天凌晨向斯考克罗夫特和黑格发出了一连串电报，要求向我报告总统到底同苏联大使讨论了些什么。我警告说，关于日内瓦会议的谈判正处在微妙阶段，我很快将在日内瓦会见葛罗米柯，对于总统的谈话，我所知道的不能比葛罗米柯少；萨达特对美苏勾结十分警惕。

不管是黑格还是斯考克罗夫特，都没有从尼克松那里弄清楚究竟讨论了些什么；归根到底，尼克松的目的是要表明他仍然在履行职责。另一方面，谈话也许是一般性的；因为在苏联给我们的各种来件中，一点也没有提到总统的这次谈话。镇定的斯考克罗夫特（由于他进入了美国军事学院，美国治疗精神病的这一行业失去了一个可能很杰出的成员）向我解释为什么还会更糟糕些，以图使我放心。他说：“我们（黑格和斯考克罗夫特）至少取消了已约定好了的沙特大使的一次来访。”黑格要我确保，不让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散布我与白宫之间有隔阂的任何印象。最后，他明智地说：

指望目前的困难会消失，那是愚蠢的。我确信，我们必须继续克服这些困难，并对同它们有关的问题要保持敏感。可是，自招失败的莫过于让这些困难处于支配地位，而影响对于具有压倒一切重要性的问题的处理。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说，对这个问题保持适当的敏感都是必要的。我们总是设法从容不迫地来处理这个问题。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虽然太阳已经照临开罗，可我还没有就寝。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十时，我回到巴拉基斯同萨达特会晤。我们转而讨论脱离接触问题。萨达特要我们拿出“计划”；他不愿意打消一种想法，即一定有个什么“基辛格计划”。我告诉他说，制定一个不容变通的计划是错误的。它一定会被泄露出去；它的具体条件无法实现就会成为失败的象征，使以色列有重大意义的撤退和实现埃、以军队的隔离所产生的实际成就黯然失色。我建议我们研究指导谈判的一般原则。

在这样作的时候，101公里处的谈判证明毕竟是有用的——尤其是亚里夫向贾马斯提出的以色列的某些想法。以亚里夫—贾马斯的会谈为基础，我提出了一个设想，经过削减的埃及部队继续驻留在运河东岸，以色列部队撤到距运河约二十英里的米特拉山

口地区，由一支联合国部队驻扎在两支部队之间。萨达特和我没有致力于划定界线，或确定适用于每个地区的武器限额。这要留待下一次访问和在随后的日内瓦谈判（这仍然是我们所期望的）中去解决。

在与萨达特共进午餐之后，我们共同会见了记者。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拟议中的日内瓦会议的议程肯定下来：“我们同意，军队脱离接触——把军队隔开——应当是和平会议第一阶段的主要议题，我们将前往其他国家讨论它们对会议如何进行的看法。”萨达特把话题接了过去，并且表示同意我公开说过的话，甚至同意我本来打算私下向其他领导人提出的程序。他说：“经过我们长时间的、富有成果的讨论，我确实是满意的。”

对于脱离接触的时机，又进一步交换了意见。有一个记者问萨达特，他是不是仍然希望在圣诞节之前达成脱离接触协议（这个记者把那个节日对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判断错了）。萨达特回答说，是的。他本来非常清楚，我们已一致认为，在一月初我下一次访问之前，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他还没有学会如何对付难以对付的美国报界——后来他卓越地掌握了这一技巧。

在我离开开罗的时候，我感到各方终于开始各就其位了：埃及几乎肯定要出席日内瓦会议；约旦不会呆在会议之外，除非它愿意把阵地让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们同开罗就时间表和脱离接触计划的要点达成了协议。萨达特还允诺在脱离接触实现之后，于一月份建议取消石油禁运。叙利亚仍然是个大问号，但是，我就这个问题同布迈丁举行的会谈也是令人鼓舞的。我再一次用我自己在一九七二年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越南谈判突破的腔调，对记者们说：“根据我的判断，会议就要举行了。”

重返利雅得

利雅得市座落在一片光秃秃的高原上，好象是巧合，其实却是一项深思熟虑的决策的反映：是有意把这个王国的工作首都从酷热而潮湿的吉达，转移到地势较高、空气较为干燥和相对——必须强调相对一词——来说沙漠气温较为可人的地方来的。因此，利雅得就成为这个国家有些神秘这一特点的具体象征了。虽然国王和他的大臣们一年至少在这里住八个月，可是，它却不具有官方地位。外国大使馆和外交部的官员都在吉达，而外交部的首脑、外交大臣萨卡夫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利雅得同国王在一起。

这种难以思议的安排的目的是，在于限制外国进行纠缠或施加压力的机会。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利雅得的旅馆还很少而且简陋，未经事先约定而到达那里的大使，可能会找不到食宿之处，而且在安排会见方面肯定会遇到困难。外交官除非是被召见，否则，必须事先约定接见的地点。美国大使对这种安排没有感到不便，除非他像赫尔曼·艾尔茨出使沙特阿拉伯期间一样，每当需要举行高级会见的时候，总是不愿搭飞机而是驱车十个小时赶到利雅得去。我们的外交官只要公务需要，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受到约见；关系是和谐而友好的。

我在十二月十四日的到达——这是我第二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反映了这种友好关系。外交大臣奥马尔·萨卡夫，身着白色长袍，手持那串永不离手的念珠，再次在飞机舷梯旁来欢迎我。像以前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领着我从两排身着白袍的士兵之间，走向用大理石建成的皇家接待厅。我们共进苦味的沙特咖啡，电视记者录下了这一接待场面，随我采访的美国记者在寻找机会提问。

在沙特阿拉伯，随同我采访的记者，在我看来总是好像缺少他

他们在其他大多数停留地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和冲劲。他们像客人一样受到最好的礼遇，人家也期望他们报以同样的礼貌。在许多次长途旅行中，我总是让我的随行人员彬彬有礼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他们可能会否认他们被吓住了；也许他们表现克制是由于，我们通常都是在被弄得精疲力竭的旅行之后到达利雅得的，他们想要得到休息。在那时候，这个城市里只有一家旅馆，如果旅馆的办事员没有为他们订下床位，他们就随时都会有得不到休息的危险。

我被再次安排在宽敞的国宾馆里，它的雅致和舒适与它的规模之大简直不相称（但在后来的访问中，不仅这些缺点得到了克服，而且还有所改进）。匆匆进餐之后，萨卡夫带我去见国王。我在国王私人书斋受到接见。象我上次被接见时一样，书斋中央摆着两张椅子，我的坐椅在国王坐椅的右边，译员面对我们。顾问们在房间的另一边坐成两排，距离之远使他们仅仅可以听到谈话，而不能参与谈话。在拍照的时候，国王沉下了脸。我知道，布迈丁可能已经派来了一个使者；在机场，我还看到一架埃及的专供显要人物乘坐的飞机，因此，我猜想是萨达特派其心腹阿什拉夫·马尔万前来向费萨尔报告我们开罗会谈的情况的。

国王陛下先向尼克松表示敬意。他与总统相识已二十年，存在着私人之间的友谊。他以简洁明确的方式说，不管水门透露些什么，都不会影响他对尼克松的敬重。当我们转而谈到实质问题时，费萨尔修改了他在一个月前说过的话。那时，他所建议的解决方案涉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持的绝对立场：他敦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既包括犹太人，也包括穆斯林的世俗国家，这是取消以色列的一种委婉说法。现在，他只要求让以色列退到它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包括让出耶路撒冷旧城。在我上次访问时，费萨尔曾坚持，一切巴勒斯坦人都应当享有返回家园的权利（结果是以大批阿

拉伯人的涌进来毁灭以色列),不然,就给他们以赔偿。这一次,费萨尔不像那样坚持了,只着重谈赔偿问题,并且表明,他也要采取点灵活性。他对他以前的立场的修正,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提出来的,好象这些修正是找上门来的外来真理。他冷冰冰地表示沙特阿拉伯第一次把自己同和平进程联系起来,不管在这样作的时候是如何犹豫和迟疑,这就是费萨尔谈话的重要意义所在。显然它还远不能作为妥协的基础。这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纲领,它意味着沙特阿拉伯不会阻挠别人的和平努力。

在这种气氛下,我重新检查了召开日内瓦会议的计划 and 拟议中的小组划分以及议程:先在埃及前线实行脱离接触,然后在叙利亚前线实行脱离接触。费萨尔以小心而简明的方式表示同意我们的作法。这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说明叙利亚是愿意的。因为费萨尔决不至于如此冒失行事而不顾引起叙利亚不快的危险,特别是他的最亲密的顾问之一拉希德·法龙是一个叙利亚人。

然后,在回到宾馆时,我得到了一个有可能使一切都告吹的信息:以色列推迟了就出席日内瓦会议问题作出决定;邀请信的草稿,即使经过了修改,说是也还不能令人满意,不管附加什么条件,都不能同意提到巴勒斯坦人。既然在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四)之前我不能访问以色列,原定的十二月十八日日内瓦会议的开幕日期就太紧迫了。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它推迟三天,推迟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或者作为一个最后的办法,必要时就使会议在我同萨达特讨论过的那封短的邀请信的基础上举行。我打电报给萨达特和葛罗米柯,提出了这一方案。(他们希望会议开成的心情有多么热烈,可以从这次再度延期没有招致他们反对一事中反映出来。)在这同时,由我起草,再次以总统名义向果尔达·梅厄发出了一封严厉的信,通知她建议中的延期,同时,警告说,不管以色列如何决定,美国都将出席开幕会议。四十八小时后我去访问的时候,以色

列必须拿定主意。

星期六上午，机敏而老迈的奥马尔·萨卡夫前来国宾馆拜会我。我说“老”，是因为他虽然刚五十出头，可是却饱经风霜，满脸老相；他显然是奋斗了一生。像四个星期前一样，他的到来是要来说明他的国王的复杂意思：

国王陛下不能作某些他不相信的事情。从一九三六年以来，他就笃信这一点。他相信这一阿拉伯事业。他是一国之君。他觉得他更像泰国国王而不像蓬皮杜总统。这是他思考问题的方式。这就是他之所以支持一项事业，而在没有看到某些情况之前不能加以改变的原因。当然，你看到了，从实际意义上说，他是积极的。我深信，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作了更多的说明。

我遗憾地承认，他究竟讲了些什么，我并没有弄得很清楚。事实上，如果追根问底的话，我也确实没有弄清楚费萨尔讲了些什么——当然，这正是狡黠的国王所要达到的目的。他的意图显然是善意的，他们的行动将视情况而定，包括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压力和谈判的进展情况。因此，萨卡夫的乐观陈述的主旨是要说明，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的地位不断得到改善。因此，沙特阿拉伯的行动自由也增加了。他向我解释正在发生渐变的阿拉伯各国的观点，话语之简略仅略逊于他的主子，从而使得我们的谈话听起来就像在拚命模仿海明威早期的作品似的。萨卡夫在谈到布迈丁时说：“他非常明智。”

他已经改变了。以前他所奉行的政策象伊拉克或利比亚所奉行的一样。他表示愿意向我们提供飞机和武器，如果我们需要的话。因此，就这一意义来说，他的政策没有改变。但是，他已经不是从前的他了。他向你提供了选择。

基辛格：确是如此。

萨卡夫：要就是战斗，要就是求得一个解决。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時候，大家并不是在为事业，而更多地是为阿拉伯人的尊严而战斗。……他是一个

能够使用先进武器的人呢？还是仅仅跑出去送死的人？

基辛格：我从来不相信阿拉伯人不能战斗的理论，因为我了解历史。

萨卡夫：是的，是的。你了解历史。

基辛格：在以色列，也有些人这样想。可是，几百年来人们都担心阿拉伯人永远不会忘记战斗。

萨卡夫：哈菲兹·阿萨德曾对我说，他不相信他自己。可是，我们有三十年关系不好，有十年关系很糟。

他为了使我放心，说：“我认为，同国王的会晤进行得很好。”然后，萨卡夫要求同我和美国大使詹姆斯·埃·阿金斯单独会谈。他正式承诺，沙特阿拉伯不但将取消石油禁运和增加生产，而且要敦促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也来这样作。由于他没有提出具体日期，因此，这些话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倒是更具有戏剧性。但是，当萨卡夫在机场为我送行的时候，他公开宣布了这件事情：“我认为我们能够消除我们关系中的每一个障碍。”

萨卡夫又画龙点睛般地说：“我赞赏同我的朋友基辛格博士——我叫他亨利——举行的这次会晤。”这样，他就成了阿拉伯领导人中第一个以我的教名称呼我的人。它标志着一个新趋势的开端。它不仅因其人性的温馨而使人高兴，而且肯定会对我的下一步叙利亚之行有所裨益。

初访大马士革

叙利亚的形象是如此可怕，以至现实情况同我到达之前人们告诉我的情况不能相比。叙利亚曾以自己是最不妥协的阿拉伯政权之一而与众不同。它确是所谓拒绝阵线国家——这些国家与以色列毗邻，直到现在坚决拒绝同以色列谈判——中最富战斗性的国家。从一九四六年独立以来，叙利亚的历史是一部暴力、剧变和

政变不断的历史，这些都反映了叙利亚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和阿拉伯政治与思想意识的压力。现任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写此书时仍然在职）在约旦危机中进行的赌博惨败之后，于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把他的更激进的前任赶下了台。阿萨德那时候是国防部长，他尝到了莽撞的苦头，汲取了经验教训。迄今他在位已经十一年，他创造了现代叙利亚领导人任职时间最长的记录。

直到一九七三年，叙利亚都一直拒绝就和平问题举行任何谈判。叙利亚认为以色列国是一个非法产物，因而一心一意要消灭它，不管它的边界在哪里。一九六七年以后，大马士革断绝了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甚至不容许我们像在开罗所保留的那样在这里设立一个小小的利益照管机构作为来往的渠道。在诸如联合国等国际论坛上，我们知道叙利亚是苏联的一个朋友和激进集团的领导者之一。我的访问是一个美国国务卿二十年来的第一次访问。

我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六到达，在机场受到从工作关系上说是我的东道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达姆——的欢迎。从机场乘汽车到首都市内，约需半小时，头二十来分钟是沿着一条笔直的大道迅速行驶，然后，在一环行道绕行半周，即驶入现代大马士革的通衢大道。高速行驶可能与机场附近设有巴勒斯坦难民营有关。我被出动数目之多和在其他地方从未看到过的保安部队包围着——载着武装人员的汽车前呼后拥；另外许多汽车里是数不清的便衣，在机场出来的路上，每隔二十英尺就有武装士兵站岗。可是，安全感并不像可能有的那样大，因为我感到提心吊胆，记得有位中东专家曾经向我提出警告：“如果你在叙利亚遭遇任何不幸的话，那将是来自保安部队。”

哈达姆是叙利亚矛盾心理的升华物。他身体结实，精悍强干，表情稍带凶相，同他爽朗的笑声和动人的蓝色眼睛（一份十字军时代的遗产？）不大相称。他体现了叙利亚骄傲的民族主义和在国际

间发挥作用的愿望。他不能很好地判定哪一种作法糟糕：游离于谈判进程之外，还是参加进去。哈达姆对我说，一方面，他不愿意成为同以色列签订一项文件的第一个叙利亚人；另一方面，我是应叙利亚的明确邀请而到达大马士革的。既然我的访问不可能有别的目的，而是要帮助叙利亚以某种方式参加谈判，正在作出的这种不寻常的努力就表明——不管哈达姆讲了什么相反的话——叙利亚想要得到某种东西。叙利亚的言词可能是不妥协的，但是，它的行动令人鼓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和平进程的。我没有故弄玄虚让叙利亚误解美国的外交将要采取的作法。在我到达叙利亚外交部对哈达姆进行礼节性拜会时，我当着他的同僚的面告诉他说：

二十五年来我们一直在辩论公告、宣言和主张，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你会从欧洲人那里得到比从我这里得到的为好的宣言，但是，另一方面，你会从美国得到更多成果。我诚恳相告，不管我们国内局势怎样，我们可以尝试的唯一道路不是要谋求终极解决，而是要一步步走。我们不是小孩子，没有你们的同意，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同你们打过交道的人，没有谁会幻想你们将放弃自己的原则。但是，我们必须采取这第一步，不然，我们就永远走不了最后一步。以坚定的言词为开端的努力，只会触发爆炸性的局势。

还没有来得及等对方发出必然的好斗的反驳，我就被召去总统府了。

叙利亚人以典型的夸张所乐于称道的总统府，事实上不过是一座小小的、现代化的建筑物。它从前是一所私人宅邸，位于一条狭窄的林荫道上，周围全是不显眼的中等大小的别墅。它过去想必是为一个富商所有。只有大门外的两个绘有条纹的岗亭，表明了它的官方性质。穿过前面的玻璃大门进去，走到一道楼梯，沿楼梯而上，到达一道狭窄的平台，迎面就是总统总是用来接见我的那间房间的门。用国家元首的通常标准来衡量，房间是小的，靠墙散

放着一些安乐椅和沙发。可能是为了安全的缘故，厚厚的丝绒窗帘总是拉起来；不然的话，街对过房子里的人每天可能把这里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随着我同阿萨德会谈次数的成倍增加——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五月叙利亚穿梭外交期间，从而产生了一种幽闭恐怖的气氛。

阿萨德中等身材，富有表情的脸上一双炯炯有神的黑色眼睛和一簇髭须十分显眼。他的后脑勺看上去好象是从颈部笔直长上来的，因此，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脑袋总是向前倾，好象随时要向不提防的对话者猛扑过去。我们总是并排坐在一只棕色的沙发上，因此，我们举目向左都可以看到一幅画，画的是阿拉伯军队攻克十字军最后据点的情景。这幅画的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阿萨德经常指出，以色列迟早要遭受同样的命运。他说话语调平静而坚决，略带某种羞怯；他热情真切，而萨达特对人淡漠；他思想开放，而萨达特城府很深——这两个人只在激情方面有些相似。

阿萨德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而历史却又很短的国家的总统。大马士革既是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祥地，又是一个它所遭受的挫折的陈列馆。经过征服者——最近的征服者是土耳其人和法国人——数世纪持续的统治，叙利亚国从来没有实现过它的创立者的梦想。当前版图内的叙利亚，拥有一个自治政府的历史并不长，不象埃及那样历史悠久；也没有埃及的总统们赖以自信地行事的那样大的幅员或历史的连续性，这种自信心是从这样一种信念产生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国家都是中东事态发展的焦点。叙利亚的历史既有成就也有灾难，而更多的是灾难。外国人的不正义深深地烙在叙利亚人的心灵中。阿萨德曾经对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土耳其出卖了叙利亚，其后是英国和法国，更近一些是美国，它建立了一个以色列国。

当一个民族深信它的一切困厄都是由国外引起的时候，病态

的怀疑就成了民族特征。叙利亚既没有埃及那种对自己文明发展的信心，又没有沙特阿拉伯的财富和目空一切的孤傲。它的领导人的信条是对抗，可是又没有信心坚持对抗，他们想要领导阿拉伯世界，可是又力不从心。因此，他们就顽固地坚持着他们事业的纯洁性，郁郁寡欢地欣赏着实行这一事业的可行性。

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甚至是在他们自己不愿意完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叙利亚的力量同它的愿望不相称，而且它的愿望即使在叙利亚内部，也是有争论的。叙利亚不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民族，它分裂为逊尼派穆斯林——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三，和其他穆斯林派别，其中包括阿拉维派（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以及并非微不足道的基督教徒（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另外还要加上将近二十万巴勒斯坦人，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复兴社会党自诩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精华。在这一点上，它受到其分支、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非议。由于复兴社会党主张毫不妥协地卫护阿拉伯主义，因此，对叙利亚领导人来说，甚至在讨论和平解决的确切条件之前，哪怕是仅仅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也会是一个造成心理创伤的事件。这种信念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而更加强了；叙利亚领导人必须小心谨慎，不要使可恨的伊拉克党在不妥协方面超越它。看来，只有军方才理解对抗的后果。

政府是由阿拉维人——阿萨德是其一员——控制着，他们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是被瞧不起的居住在农村的少数民族，只能被雇来从事家仆劳动。但是，象许多这种没有什么特权的集团一样，他们在武装部队中占了不相称的比重。武装部队，象在其他地方一样，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创家立业的机会。阿拉维人由于参加了复兴社会党，特别是参加了军队，因此，一九六三年复兴社会党在大马士革一掌握政权，他们就地位显赫了。自从那时候起，他们象其他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一样，在国内把他们的统治建立在

自己的内部团结和控制关键职位——超出他们人数的比例——的基础上，在国外，则建立在不懈地重申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基础上。他们也确实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叙利亚军界领导人必须随时提防别人暗算他们，因为激进的政客们总是要利用狂热的民族主义作工具来东山再起。叙利亚是政界领导人往往比军界领导人更好斗的少数国家之一。

当巧言令色与现实大相径庭的时候，精神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九七三年出现的无可规避的现实是，“拒绝”方针造成的只是僵局；它使以色列军队部署在离大马士革只有二十英里的地方，并使叙利亚在其对抗行动中陷于孤立。阿萨德原是想摧毁以色列国的，可是，他认识到，不管是埃及，以及最终还有沙特阿拉伯，都不会参与他的这一事业，而单独从事这一事业的代价，将会危及叙利亚的国内结构，甚至会危及它的生存也未可知。他已设法使自己在位的时间比他的任何前任长得多，因为他同那些前任不一样，他行事谨慎而不是单凭感情办事，他重视现实而不是单从意识形态出发。

当我会见他的时候，阿萨德得出结论说，叙利亚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把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在实现更大的雄心之前，必须先收复自己的领土。这样，阿萨德就勉强得出了萨达特已经自觉得出的同样的结论。他将让和平进程继续下去。作为第一步，他将为缔结戈兰高地的脱离接触协议而努力。我不敢相信他甚至已经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行事。

可是，即使为了实现他的初步目标，阿萨德也面临着复杂的策略问题。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没有萨达特那样的个人权威，我不记得萨达特什么时候谈到过推行他的政策在国内有什么阻力。即使存在阻力的话，他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溶掉这些阻力；他以个人名义行事，这等于说他对埃及负责。（最后，他为这种一往直

前的精神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阿萨德并不声称自己拥有这种权威。他开始只单独同我以及仅仅我的译员——也许是为了不给他的试探留下任何痕迹——举行许多重要的会晤，特别是在谈判开始之后。他的手法是，一开始就发表一篇表明极端立场的声明，以试探在现有情况下可以得到些什么，其后，他就可能后退到谋求可以谋得的东西的立场上，但仍然要进行一场顽强的后卫战，以使别人看来只有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从他那里得到让步，并且打消他们的奢望。(就这方面来说，他的谈判风格同以色列的谈判风格没有多大不同，尽管他们都厌恶人们作这种对比。)一旦阿萨德认为自己已经摸到了底，他就把他的最亲密的同僚，包括一些高级军人，当然还有叙利亚的译员召来。然后，我们把整个过程重新回顾一番，把我们以前的对话尽可能详尽地加以复述。这时候，阿萨德和我都好象在排演一出戏，这种程序稀奇古怪，浪费时间，叫人伤透脑筋，可是，在阿萨德看来却有很大好处。别的姑且不论，至少乍一看来他无需亲自为得到让步而进行争论，担子是压在我身上的。他的同僚是谈判的参加者；他们有机会提出反对意见；可是他们几乎从来不这样作。不管什么论据，只要是使阿萨德信服的，也就能使他的同僚们信服。这是为了有效地推行国内政治而使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因为在叙利亚穿梭期间，在同阿萨德谈妥之后，我还必须赶到以色列去，向一个以并不比叙利亚态度软引为自豪的谈判组去通报情况。

而且，通过接触，我对阿萨德的敬重大大增加了。就叙利亚全局而言，他简直是温和的。他依靠苏联作为自己军事装备的来源。可是，他决不是苏联的一个傀儡。他有第一流的头脑，也敢于说刻薄的幽默话。我相信我是第一个他曾与之持续打交道的西方领导人。他抓紧机会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提问，要我给他免费上课。在叙利亚穿梭期间，几乎每次谈判开始时，都要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对西方民主国家的体制和人物，提出各种很有见地的问题。由于阿萨德这时候正在学英语，这些长时间的谈判可能至少会留下一个持久的痕迹。有一次，我对他开玩笑说，他将是唯一的讲英语而带有德国人口音的阿拉伯领导人。

阿萨德永远不失其自信。他象江轮上的一名赌徒那样大胆而又顽强地进行谈判，非把可能得到的让步一分也不少地弄到手不可。我曾告诉他说，我们遇到一些谈判者，他们故意使自己走到悬崖边上，以表明他们再也没有回旋余地了。我甚至还遇到过这样的谈判对手，他把一只脚迈出了悬崖，其实是以跳崖相威胁。他是唯一可能真正跳崖，然而又希望在下跳过程中抓住他所知道的在某个地方存在的一颗小树，以免一落到底的人。阿萨德听后微微一笑。

在十二月十五日第一次会谈时，我们都尽可能彬彬有礼，以试探一下彼此的态度，而不是匆忙作出结论。阿萨德一开头就说，他已经从他的阿拉伯兄弟，具体说就是萨达特和布迈丁那里，获悉了我同他们的谈话。意思就是说，我无需再兜圈子，而且，他所听到的东西，至少是值得探讨的。过去，我曾告诉萨达特和布迈丁，一定要把我的会谈情况通报给阿萨德；此外，如果日内瓦会议一旦得以举行，大家都唱同一个乐谱是非常必要的。在回答阿萨德提出的问题时，我按照同布迈丁、萨达特和费萨尔国王会谈时的方针，概述了我们的战略要素。

阿萨德毫不令人怀疑，即使日内瓦会议永远开不成，他也不会死不瞑目。他说，他并不“梦想参加日内瓦会议”。他真正希望的是享受会议的成果而又不与会议的进程沾边。但是，在他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他希望知道美国和苏联对局势是怎样看法。这是巧妙地暗示：阿萨德不会容忍超级大国共管。他这也是要暗示，他并不是苏联的傀儡；否则，他就没有必要来向我询问苏联的观点。

我决定对这个开端加以利用，说：

我们比苏联更愿意同你们达成一项协议……他们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媾和计划——我不理会它们。因为，如果确是一个可行的建议，我们可以直接向阿拉伯人提出，很多人向我们提供了意见。我们必须向以色列人作些工作，而苏联在那里是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的。他们对以色列没有什么影响。只达成了一点协议——举行一次会议，因此我们还要继续与各方面接触。没有就任何实质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如果你听到了其他什么情况，那是不真实的。我曾告诉布迈丁，我们不承认在中东存在任何势力范围。会议上的情况将取决于你们和我们。你们可以同苏联谈，我们不想影响叙利亚和苏联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不是全部真相，而是一个关于现实情况的说明。我们希望影响叙苏关系。我们宁可它们的关系不象已有的那样密切。可是，阿萨德将是为了他自己的原因，而不是为了我们的原因来削弱他同苏联的联系的。鼓励大马士革加强同美国的联系，是我们影响叙—苏关系的最好办法。

当我谈到邀请信时，情况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吃力地一一解释信的文本以及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各种各样的方案，最后，我建议把凡是明确提到巴勒斯坦人的字、句都删去。阿萨德接受了这一切改动。我告诉他说，会议的开幕日期可能要推迟三天。他对此也没有表示不快。一瞬之间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享有凶悍过人的名声的阿拉伯总统正令人惊异地变得极易驾驭了。

这全是幻觉。当我问他信中还有什么其他地方他不同意时，他回答说，事实上他有一点具体的保留：他很乐于听任我根据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来修改邀请信的草稿，可是，他不能同意信中的一句话，就是信中提到的各方——叙利亚、埃及、以色列、约旦——都已经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因为叙利亚并不打算参加！因此，不管是他十八日不去参加，还是二十一日不去参加，也不管邀请信关于

巴勒斯坦人或联合国问题说了些什么，都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回答起初使我晕头转向。可是继而一想，我认识到阿萨德对会议的召开实际上是有所帮助的。他所反对的只是有全体与会者参加的开幕会议，而不是反对谈判这一概念。他不想为会议设置障碍，因此也就是勉强提供了帮助。他不反对邀请信，而只是认为它——正确地说——与己无关。

阿萨德真正要知道的不是会议的程序，而是会议的结果。这将决定叙利亚最后是否参加，在这同时，由于他的变幻无常，他希望给自己保留选择的余地。他要求回答三个问题：美国是不是同意叙利亚的观点，即叙利亚不能放弃任何领土？我们同意没有巴勒斯坦人参加，问题就不能解决吗？我们到日内瓦去是为了谋求与前两点相一致的目标，还是“仅仅为了去思考一番和消磨时间，并不要问题的根本解决”？

这些问题的深刻程度同它们的难以回答的程度一样。任何人企图对它们作出精确回答都会使和平进程在没有开始之前就归于流产。在这个阶段，含糊其词是必要的，建设性的，也就是说，结果应该让谈判本身来决定，而不是事前确定。阿萨德对以色列要求“得到”边界一事所采取的态度，表明了这些谈判不会成为一件乐事。他争辩说，一九六七年边界距特拉维夫比距大马士革为远，因此，他要求把一九六七年边界推进到以色列境内，因为这比以色列想要保有戈兰高地的要求具有更充分的理由。

事实表明，阿萨德一旦立此存照，便不急于推进他的主张。他心里真正想的是脱离接触。埃及人为了使他在日内瓦更好地就范，曾明显向他暗示，西奈的脱离接触协议已经准备妥当，戈兰高地的脱离接触协议也不会太远了。因此，他认为唯一可取的办法是利用我来访之机谈判一个他自己的脱离接触协议。他对我说，他同意萨达特的这一看法，日内瓦会议只应当是一个框框。叙

利亚—以色列的脱离接触应当通过我来谈判，他要求事先确定谈判结果。

不幸，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我说，我们远没有就埃及的脱离接触达成协议。但是，就埃及的情况而言，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就有谈判的历史；有 101 公里处的谈判以及停火以来的其他各种意见交换。可能举行的西奈谈判的要点，我们是心里有数的。但是关于戈兰高地的谈判，则还没有这类背景材料。我不知道要提出什么建议，我也不了解以色列人的想法。（实际上，我知道以色列对叙利亚疑虑重重，我痛苦地知道，甚至是要使谈判能够开始，也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目前这个阶段，我除了能够答应继埃及脱离接触之后，再作重大努力来使叙利亚脱离接触外，不能作任何其他许诺。

阿萨德毫不气馁地拿出一幅戈兰高地的地图，以向我指明脱离接触会涉及的问题。其实际结果将是，以色列要放弃它在一九七三年战争中占领的全部领土，而且事实上也要放弃它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占领的全部领土。（阿萨德把这叫作一个让步，因为根据他的理由，脱离接触线本应该沿着一九六七年的边界来定。）这样一个计划显然是不能谈判的；连公开提出来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促使以色列根本拒绝谈判。所以我就中止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说：

我们能够作的一切就是尽力而为。做不到的事我们从来没有许过诺言。我没有能力弄出一项协议。……对我来说，现在着手划定分界线是不负责任的。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如果我这样作，你们就不会尊重我。我是一个严肃的人。

阿萨德坚定不移。他争辩说：“对我们来说，开始谈判就是一个失败，”这正指中他面临的政治问题的核心。为了出席日内瓦会议，他需要举出某些成就。叙利亚只有在缔结了脱离接触的协议

之后才会参加一次和平会议。他再一次说，另一方面，叙利亚不会反对别人去日内瓦。

这种看来不合情理的反应隐含着一个重大的突破。阿萨德以其拐弯抹角的方式表示希望和平进程和我们的战略成功。只要叙利亚不反对和平会议，并且不计较邀请信的内容，一切路障就都会消失。我们可以用如下手法处理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即在邀请信草稿中干脆把他们放在“其他与会者”中。以色列坚持释放其战俘作为同叙利亚一块参加和平会议的先决条件，这个问题这时已经成为一个学院式的问题了。

同阿萨德交换意见的结果之一，是提出了关于苏联外交的严肃的问题。苏联和我们曾经协议，为了筹备日内瓦会议，苏联将运用它在大马士革的影响，而我们则施用我们在以色列的影响。四个星期以来，莫斯科一点也没有暗示过叙利亚的参加会议成了问题，也没有提示叙利亚有反对意见，更不要说先决条件了。是它不知道吗？还是要欺骗我们？如果说是要欺骗我们，那是为什么？如果是它知道阿萨德的反对意见，而没有能够打消这些意见，那末，它在大马士革的影响就比我们所想象的为小。如果说它已欺骗了我们，那末就很难理解是出于什么动机。也许是苏联驻大马士革的大使同各方面的联系不是特别好——后来，叙利亚人常常说一些贬损他的话。苏联人的心理与阿拉伯人的想法并不怎么合拍，而且苏联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事：他们的高压手段最后常常使它的最要好的庇护对象离它而去。

叙利亚方面的挫折与莫斯科发出的其他模棱两可的信号恰好吻合。十二月十五日，维诺格拉多夫在开罗告诉艾尔茨说，我用来取代原来的邀请信的一封非常短的邀请信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到了这一天晚间，多勃雷宁在华盛顿对斯考克罗夫特说，只有在我说服了其他各方之后，莫斯科才会同意。（这时候已证明没有这种必

要了。)

事实是，叙利亚参加全体开幕会议，决不是必不可少的——说句不甚确切的话，没有叙利亚的参加，我们反倒会更好些。(也许，阿萨德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深知这一点。)然而，为了使叙利亚继续关心和平进程，我认为重要的是让阿萨德承担起拒绝与会的责任，这就要求我们使他觉得，一旦他改变心意，就会受到欢迎。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也遇到过的那样，这里有一个使观点与现实相协调的问题，使这里的会谈的结果看来好像陷于僵局，这是不可取的。它将给公众造成一个坏印象；我又不能明白说出为什么叙利亚不参加全体会议是合乎理想的。因此，为了保持表面上的势头，我对阿萨德说，在我第二天访问以色列之后，我们将派一位官员来向他通报我同果尔达会谈的情况，并且把邀请信的最后文本带给他，以便他至少知道他拒绝的是什么东西。由于阿萨德关心的是自己不要被人认为好像被排除在会议之外，所以他欣然接受了这种程序。为了减少我们之间的函电来往，我建议在各自的首都建立利益照管机构。阿萨德再次表示同意。他提出，可以用“坦率而有用的”这种字眼向报界描述我们的会谈。

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似乎比我们曾经希望的要多。叙利亚将不阻挠和平进程；而且在稍后的阶段可能参加脱离接触的谈判，这些谈判正是我们战略的核心。我们已经开始了一场艰巨的外交活动，以使强烈坚持自行其是的叙利亚在和平之剧中扮演一个更富建设性的角色。

安曼小憩

同阿萨德的会谈约在下午四时开始；按照原来计划，我要在七时半左右离开大马士革，经短程飞行到达安曼，与国王侯赛因共进

晚餐。可是，我同阿萨德的会谈一直延续到下午十时半——历时六个半小时。记者们纷纷揣测：是不是我被绑架了？我是不是成了第一百二十八名战俘？是否我在同雅赛尔·阿拉法特举行秘密会晤？最后，在晚上十一时，他们听到了我的车队的警号声。一个感到厌倦的记者这样说：“不是他终于来了，便是他们终于为我们而来了。”③

这时候，我感到我简直像一个交响乐团指挥，必须使各种不同的、甚至可能是不协调的乐器，演奏出一个和谐的声音。我们希望侯赛因在日内瓦起作用，我要向他报告我的中东之行。我的夤夜到达并没有减少他的亲善之意。他亲切地请我吃了一顿过了时间的晚餐——时间已过午夜。第二天早晨，我与他和他的兄弟哈桑亲王共进早餐，以继续我们的磋商。

那个时候，到达安曼令人得到安慰。约旦是美国的无条件的朋友。如果我们没有采纳它的建议，它也不会以可怕的后果来威胁我们，它没有石油武器可以使用。它参加一九七三年战争，是它既要尊重阿拉伯团结的需要，同时又理解到只有克制才有助于和平事业的产物。此外，必须承认，侯赛因是为此而付出了代价的，因为现在谁都不很关心促进约旦对西岸的要求了。

当我在十二月十五日到达安曼的时候，发现侯赛因是这样一个人阿拉伯统治者：他的“兄弟们”对于我的行程或谈话，没有向他吐露片言只字，因此，我必须把有关日内瓦会议和我们的总战略的某些细节，从头到尾向他介绍一番。约旦在日内瓦的目标和我们自己的目标并行不悖。侯赛因不再急切希望巴勒斯坦人参加；如果他们的出席无可避免，他要求他们只是作为约旦代表团的一部分前往。约旦的所有领导人都严重怀疑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意图。约旦首相扎伊德·里法伊曾经说：“我担心埃及将丢开约旦而缔结它自己的协议。”亲王一直怀疑叙利亚阴谋并吞约旦。由于这种种原因，

侯赛因国王宁可在日内瓦会议上有一个单一的阿拉伯代表团，以防止单独安排的出现或引进新的参加者。如果事实证明这些要求办不到——事实上也是同我们的战略相违背的，他就不反对单独的谈判，只要每一个单独谈判都构成一个“一揽子解决”的一部分的话。

我们看到，在叙利亚脱离接触之后，有可能举行以色列—约旦谈判。里法伊敦促我，在我访问以色列的时候，要建议以色列来次温和的撤退，例如把居民都是清一色阿拉伯人的地濒约旦河的杰里科交还给约旦。这一行动将象征约旦对西岸的要求，并且确定侯赛因国王是以色列就西岸进行谈判的对话者。我答应按照他的建议去作，并且的确作了。可是，以色列不能同时既参加日内瓦会议，又举行议会选举，又在西奈脱离接触，又在杰里科城采取行动。

这个主张自然不会实现。在一九七四年年中我们完成埃及和叙利亚的脱离接触时，尼克松的总统任期正在告终。在新总统能够采取另一个主动行动之前，其他阿拉伯国家，出于一时的缺乏冷静和远见，剥夺了侯赛因就西岸问题进行谈判的资格，而把它赋予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最不愿意与之谈判的组织。这样，阿拉伯人就为阻碍以色列从西岸作任何撤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一点为侯赛因后来所采取的某些行动提供了说明——他曾始而从叙利亚、继而从伊拉克寻求激烈的支持，以奉行强硬方针。他开始更加公开地同苏联眉来眼去。他设法同美国保持更大的距离，在这一过程中，他明显地疏远了他的某些老朋友和爱慕者。

黎巴嫩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天，我飞抵黎巴嫩。很久以来，黎巴嫩一

直被视为中东地区各种宗教信仰合作的楷模。从理论上说，那里有一个微弱的基督教多数派；国家的高级职位大体也是这样来分配的。黎巴嫩的总统总是由基督教徒担任，而总理则从来都是穆斯林。人口的实际构成可能正好相反，可是，正视这一问题将会打乱黎巴嫩的微妙结构。一个简单的回避办法就是三十年没有作过人口普查。

皈依两种宗教的居民和平共处；黎巴嫩是繁荣的；贝鲁特已经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大都市。如果巴勒斯坦领导一九七〇年被赶出约旦时没有决定以黎巴嫩为其主要活动基地的话，这种国泰民乐的状况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这件事导致了两个后果：它以一种不能想象会符合其民族利益的方式，把黎巴嫩拖进了阿拉伯—以色列对抗，因为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边界从来没有发生过纠纷。其次，它证明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能量。看来情况是，任何一个国家作了有组织的巴勒斯坦准军事力量的东道主，它自己的主权就要蒙受危险。巴勒斯坦人的主要目的是向以色列境内进行袭击，而利用东道国作为庇护所；这必然要招致以色列的报复，使东道国陷入一场它自己不愿进行的战争。（侯赛因曾禁止对以色列境内的这种袭击，这是他一九七〇年向巴勒斯坦人发动战斗的一个原因。而黎巴嫩却没有力量这样做。）如果允许巴勒斯坦人扎下根来，建立起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就会成为国中之国，始而在他们的控制区无视中央政府的条令，继而设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也是侯赛因一九七〇年在约旦军队中忠实的贝督印人的支持下，使用军队防止了的事情。黎巴嫩的粗制滥造的政府结构和虚弱的、分裂的军队，证明是无法阻止这种事情的。

早在一九七三年，这种危险虽是刚刚露头，但已经明晰可见了。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开始成为一种破坏性因素。其结果是，

中东最温和的政府之一的黎巴嫩政府鼓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家园最起劲：这是把巴勒斯坦人赶出黎巴嫩的一种办法！

这确实是我在离贝鲁特三十八英里的里亚克空军基地同黎巴嫩领导人进行的会谈的主题。我们所以在那里会谈，是出于安全原因。在贝鲁特机场飞机降落路线的正下方，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在我的保卫官员看来，在苏联已制造出架在肩上就可以发射的地对空导弹的时代，这种情况于我是太危险了；而且，当时还有消息说，事实上有着一个击落我的座机的计划，这就使一般的担心更有了具体的内容；同时，贝鲁特还有暴民示威。因此，空军基地的军官俱乐部以其军事性质而言就成了我同黎巴嫩领导人的会谈地点。开始是同外交部长福阿德·纳法阿和他的工作人员会谈，然后同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和总理塔基丁·萨勒赫以及他们的助手会谈。外交部长向我提出了多达一打的问题，和阿萨德提出的那些问题相类似。我基本上给予了相同的回答：讨论最后的边界时相当不成熟，巴勒斯坦人的愿望在最后解决中必须予以考虑。就像在大马士革的作法一样，我拒绝详细说明这些意见的含义。我解释了日内瓦会议的程序，分小组开会，以及第一阶段的脱离接触。我们的东道主可能是不甚了解或不大赞赏。他们欢迎美国对和平进程的关注，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他们所主要关心的是减少苏联在中东的作用，首先是希望我们帮助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在黎巴嫩以外的任何地方为他们安排一个家。

我不忍心告诉弗朗吉亚总统，根据我在中东听到的情况，他未必能从他的行色匆匆的来客那里得到什么宽慰。根据我会见的所有其他阿拉伯领导人——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可能除外——的判断，几乎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愿意回到西岸，不管是谁在那里进行统治。不仅如此，由于以色列肯定会坚持，任何重归阿拉伯人控制的西岸土地，必须实行非军事化，而且由于很难想象巴勒斯坦人会

到处自行解除武装，因此，黎巴嫩不可能很快摆脱掉武装的巴勒斯坦人的存在。

想到这些处在世界上一个动乱地区的有文化的人们，我不免有些哀伤：他们建立了一个以各种宗教真正互相尊重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可是，他们的成就没有能够延续。巧妙的宪制安排抑制不住席卷这一地区的如此强有力的民族感情。正如在约旦曾经发生的那样，巴勒斯坦运动破坏了黎巴嫩的稳定所基于的微妙平衡。和平进程还没有能够开始，黎巴嫩已经四分五裂了。当本回忆录在写作的时候，中东的各种派别和势力正在黎巴嫩软弱无力的躯体上追逐着他们永不泯灭的梦想，年复一年地从事着梦魇般的勾当。

以色列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日晚上，我终于到达了以色列，这是我一天中访问的第三个国家，也是我四天中东之行中到达的第七个国家。我来这里的目的是要说服以色列在一封对一切问题都不作出决定的平平淡淡的邀请信的基础上，到日内瓦去参加会议。但是，我不抱幻想。由于两个星期之后就要举行选举，没有哪个以色列领导人愿意以他或她的地位来冒险，去出席一次他们谁都不认为是非举行不可的会议。

但是，选举方面的政治考虑只是某种更加深切不安的表面原因。以色列进行的顽强的后卫战，并不像许多阿拉伯人所想象的，是出于它的傲慢，而是基于它预感到潜在的灾难。它采取吹毛求疵、斤斤计较的法学家般的谈判方式，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一个三百万人口的民族，处在一亿多怀有敌意的人的包围之中，不管在军备方面一时怎么样占有相对优势，从长远看必然是弱者。再说，

国外犹太人居留区的子孙们知道，他们也有自己的梦魇，他们抱怨，可是，他们又刚愎自用地助长了这个梦魇。这个梦魇就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又变成了一个犹太人居住区——它遭到邻人的排斥，茕茕孑立，依靠一个远在万里之外、有着其他许多急事要处理的国家的支持。

甚至像我提出的那种复杂的战略，也只能缓和他们的困境，而不能结束他们的困境。我为逐步解决的办法辩护，说这是防止全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以色列的一种办法。可是果尔达不相信。她说：

三月或四月，当全世界开始再次向我们施加压力时，我们将在离运河 X 公里处。我们将在极不利的情况下斗争。世界上不会有人说，“这是你们两家的灾难”；全世界都会说：“以色列大难临头了。”

果尔达已经接近了问题的要害。我们的战略并没有提出，在痛苦的后撤之后，双方必须休止，而只提出要减少后撤产生的影响。不管多么痛苦，果尔达都坚强地面对现实而毫不退缩。她在谈到脱离接触时说：“如果我们是现实的，并且对我们自己、对我们以色列人持老实态度的话，那末，它的真正含义就是我们撤回来，退出这场战争，这场名副其实的战争，这就是它的本质，如果你以它本来的名字称呼它的话。撤回来，事实就是这样。”

果尔达的解释是对的，而萨达特是唯一理解她是对的阿拉伯人。她走过的道路是衡量她的高大形象的尺度，她不过是以领土来换取人们接受以色列存在的时间和地理条件。但是，要求她愉快、或者甚至是谦和地这样做，那就太过分了。萨达特是一个伟大人物，因为他懂得不可捉摸的事物的重要性。果尔达不得不坚持她已有的东西；因为环境不容许她玩弄手法。可是，一旦把账结算清的时候，历史就会记载下，她跟埃及总统一样，都是和平进程不可缺少的人物；她以自己的勇猛精神、偶尔发作的用以反抗的咆

哮、以及始终如一的尊严履行了她的职责。

我们对以色列的历史苦难的一切同情和对果尔达的感情，很快就需要我们经受煞费口舌的令人筋疲力尽的解释工作的考验了。这一工作是在我们会见以色列谈判小组时所面临的。我们逐行地讨论了邀请信。事实上，当萨达特同意、阿萨德默许不在信中明确提到巴勒斯坦人这一点之后，我们在绝大部分战斗中已打赢了；在我们新起草的最后文本的空洞行文中只是说，“会议第一阶段将讨论中东地区其他参加者”的“问题”。（具体提到“中东”事实上是阿萨德的间接贡献，他曾经指出，如果我们不提地区，那末任何国家都可以要求参加。）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既已取胜，以色列谈判小组就想在其他问题上碰碰运气。他们对联合国深感怀疑，因而千方百计地提出了一个又一个代替方案，意在削弱联合国召开会议的权威和秘书长的作用。幸而，这只是为了写进会谈记录，而不是象通常那样坚持要求接受，从而使得我们几个小时可以睡觉。巴勒斯坦人问题的解决使我的对话者激动的心情平静了下来——虽然以色列人仍因此而洋洋得意；他们是决不会变成好说话的。

当我们就邀请信基本上达成协议以后，我们就一行一行地来讨论以色列所要求的一项谅解备忘录。我曾就其中一点生气地说：

我愿使这种讨论具有一种现实感。现在美国的情绪是这样一种情绪，如果在别人看来，以色列越来越成为谈判的障碍和造成石油压力的根源，你们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不管有没有备忘录都是一样。

“我知道，”果尔达有气无力地回答说。她有她自己的国内问题——一个好战的、团结的右翼和动向不明的公众。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外交政策而是心理，她必须向别人表明她提出过以色列的关切，而我们听取了。至于我们就这些问题采取行动则将是另一

个历史阶段的事了。

经过五个小时不停顿的谈判,最后,在星期一凌晨十二时四十二分,我们完成了所有的文件,包括一份新的邀请信草稿。*草稿把凡是提到巴勒斯坦人的话都删去了,而且把联合国的权力只限于召开会议,而不是监督会议。对以色列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别人在会议上提出巴勒斯坦人问题。不但如此,以色列在把我们搞得神经极度疲劳的同时,它自己也对谈判进程承担了义务。它知道,这种谈判是要以它的撤退为动力的。凌晨一时,内阁开会,批准了谈判结果。这时,我的疲劳不堪的随行人员必须起草给白宫、中东地区的其他参加者和苏联的电报,以便弄清楚它们是否最后接受了所提出的改变。

以色列内阁有——或者说至少当时有——一种看来好像是无穷尽的自我折磨的能力:如果它不能够改变事态发展的道路,它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保证自己不要因为疏忽大意而错失对任何发展的控制。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一)上午,两个谈判小组又一起开了四个小时的会议,这次讨论的主题是脱离接触。我们回顾了一下101公里处谈判的历史,研究了在那里提出的各种计划。我介绍了萨达特的最新的想法;扼要提出了我自己的意见;听取了以色列的初步观点。在一月份之前不会进行详细讨论。不过,我现在已经深信,埃及和以色列有合乎情理的机会来完成要么成功要么破裂的外交。我们在中东的地位就是押宝在这种外交上的。

在离开耶路撒冷之前,我去瞻仰了为纪念死于纳粹之手的六百万犹太人而修建的纪念碑雅德·瓦森。我没有让记者随行,以便借此机会独自回顾一下我自己的过去,历史的冷酷无情,以及人类在政治家的活动中所承受的风险。我这样做无异是向以色列人

* 邀请信的最后文本见本章末注④。

民保证：我理解和尊重他们在缔造和平的过程中所感到的不安，这一进程既不可逆转，又充满着希望，同时，也有令人揪心的痛苦。

我在十二月十七日下午离开以色列的时候，满怀信心地认为，我们的战略即将像我们所打算的那样付诸实行。日内瓦会议几乎可以肯定将在三天之后召开。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脱离接触协议看来已接近达成。我致电萨达特、侯赛因、阿萨德、费萨尔、布迈丁和伊朗国王，向他们通报我最近几天会谈的情况。我们的外交有赖于信任，因此，有必要使这一地区的领导人人都知道谈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由于来自美国的信息对中东的谣言机器是非常宝贵的，因此，我们一定要使这些电报的内容基本相似——但又不能完全一样。如果发出一份措词完全一样的电报，那么，当它在阿拉伯各国首都之间抄传时，便会降低这种电报的价值，因为它太像一份供传阅的通知了。）我们也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通报了情况。十二月十八日，经稍作修改，以色列、埃及、约旦和苏联接受了邀请信。根据我们的诺言，我们也向阿萨德对邀请信作了最后的核验，于十二月十八日派出我们驻贝鲁特的大使威廉·巴法姆携带邀请信的新的文本前往大马士革。可是，果然不出所料，阿萨德重申叙利亚不会出席和平会议。因此，在最后一分钟修改了给瓦尔德海姆的信，删去了具体国家的名字，而代之以“有关各方”将出席日内瓦会议。

在华盛顿发生了最后一场风波。尼克松对以色列在一周前表现的顽固态度仍然郁郁不乐，他要求把提出给予以色列的二十二亿美元战后补充援助扣除四分之一，以保证以色列的行为能检点一些。我反对这样做，认为绝望可能会使以色列更加桀骜不驯。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突出的问题使得我们有理由来采取这一步骤。在我和斯考克罗夫特进行了一些意见交换之后，打消了这一想法。十二月十九日，我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概述了日

内瓦会议及其以后的前景(报告见本章末注⑤)。

我们终于站到起跑线上。但是，我们是否善于比赛还有待以后分晓。

日内瓦会议

在前往日内瓦的途中，我在里斯本、马德里和巴黎作了停留。我去里斯本是为了表示对葡萄牙政府的支持，以感谢它在空运期间提供的帮助。我们同西班牙正在就美国基地问题进行谈判。在巴黎停留是为了同我的北越老谈判对手黎德寿举行最后一次会晤，由于美国国内的分裂给河内日益提供了新的决定性的战略机会，黎德寿的傲慢越来越叫人不能容忍。我在法国首都还要向乔治·蓬皮杜总统通报我们关于日内瓦会议的计划 and 战略。蓬皮杜正在病中，对于法国被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一事，他不得不极尽克制之能事，以保持其一贯的平静和礼貌。我理解这位高傲的人的态度。另一方面，最近几个月来，在所有有争议的中东问题上法国没有一个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在其他地区，双方观点一致的问题也有如凤毛麟角。只要法国认为它在中东的前途有赖于单方面支持激进的阿拉伯计划，它参与的后果就必然是使我们在鼓励人们提出较为温和而有限的——在我们看来是更易实现的——目标方面，陷于孤立无援的处境。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奇兹·布特弗利卡——一周前我在阿尔及尔刚同他会晤过——应邀到美国大使官邸来听我介绍我中东之行的结果。我概述了我举行过的各次会谈；我使他相信我理解叙利亚不愿意出席会议的原因。我重申我们决心在完成西奈的脱离接触之后，促成戈兰高地的脱离接触。布特弗利卡这个革命家用一般的圣洁的语言表示拥护他的激

进的朋友——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但是，这个老于世故的人物理解，是巴勒斯坦人的不团结和各阿拉伯政府的别有用心动机，妨碍了问题的解决。他坦率地向我承认，由于这个地区的每个国家支持它自己一派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结果是，阿尔及利亚并不比叙利亚更激烈地反对我们的程序或战略。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四，将近傍晚，我到达了日内瓦，从而使我历时两周的游说达到最后的高潮。尽管会议只打算取得一定的成果，我衷心希望，它将标志着一个过程的开端。使得为了导致这一过程而遭受的困苦得其所酬，几个月来的艰苦努力没有白费。我怀着轻快的心情在机场对新闻记者说：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命运在他们的整个历史上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解脱的，他们兴、衰与共。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都陷入了同样悲惨的境地——一个在全世界流离失所、备受迫害；另一个在它以前的帝国里被剥夺了自治和自由。但是，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们都处于结束他们过去的时代的边沿，他们不再是被外部势力，而是被他们双方之间的斗争所阻抑了。因此，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土地上——不管任何仇恨的现实同发源于这里的箴言，是如此悲剧性地互相抵触——必须听到和解的声音。

尼克松通过内台已经给我发来了一封热情的、陈词慷慨的电报：

在关于中东问题的历史性会议召开的前夕，我愿为你在这一件大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向你表示我个人的敬意和美国人民的感谢。没有你的外交才干、韧性和对和平事业的献身精神，这个会议是开不起来的。这虽然是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第一步，但却是极重要的一步。美国人民以他们的国务卿实现了这一点而引为自豪。无需说，在我们共同致力于这一重要事业时，我完全支持着你。

顺致热烈的问候。

要求聚首于日内瓦的诸公表现出引人注目的和解精神，未免是希望过奢了。与会参加角逐的每一方都只能对国内的强硬派真正保持着经常的警惕才有可能维持自己的和平试验。而且，所有的关键演员都懂得，会议的唯一成就就是它得以开幕了；可以预见到的进展只能在另外的讲坛上得到。

葛罗米柯最后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星期五举行全体会议之前，我在星期四与他共进晚餐。会议是由于美国的努力才得以开成的，如果说苏联起了什么作用的话，也只是起了辅助性的作用。葛罗米柯忘记了，他曾把这项工作交付给我去完成，为的是使我在一旦会议开不起来时，或至少在不愿前来与会的阿拉伯国家对邀请信的内容提出种种强烈的修改意见时，陷于骑虎难下的狼狈处境。从始到终，苏联外交官的行动不是表现无能，就是口是心非——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可是，为了安排会议——及其最后的成功——所需要作出的努力，远没有削弱美国的影响，而是强调说明，对一切阿拉伯国家，甚至是激进的阿拉伯国家来说，我们都是不可或缺的。

当葛罗米柯发牢骚说苏联不甘心被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的時候，他一定怀有更大的挫伤感，因为他知道，苏联的困境既是自招的，也是无法解决的。只要苏联同以色列没有联系，我们就是唯一能够同双方进行对话的超级大国；只要苏联只是简单地重复激进的阿拉伯计划，我们——正如我对阿萨德说的那样——总是能够更好地直接同阿拉伯国家打交道，并为任何成就而取得信任。葛罗米柯企图一箭双雕，既得到同我们的和平努力密切联系的好处，又无条件地支持阿拉伯人的每一项要求。我们拒绝玩这场游戏。但是，这注定与莫斯科越来越无干系的，是它的外交的笨拙无能，而不是我们玩弄了手法。我们一贯致力于建立某种结构，以使有关各方在会议结束之后在我们的调解下进行双边外交。苏联提不出代替

的办法，这使得甚至像叙利亚这样的它的保护对象到头来也不得不同意唯一有希望取得进展的程序。

晚宴进行到最后是玩弄一次程序化的把戏，目的在于为苏联挽救面子。前此，苏联和美国曾经协议，指派大使级的常任代表出席日内瓦会议。现在葛罗米柯建议，这些大使要呆在日内瓦，以便在会议开幕式举行过后，彼此经常保持联系，如果有关方面觉得需要的话——我的中东之行已确保这种特殊情况未必会发生，他们还应该与各小组会晤。葛罗米柯所以极力要求如此，是想以此来使会外的双边活动复杂化。我所以同意了他的要求，是因为我不认为在这一阶段，程序上的花招能够阻止我们计划的执行。我指派了美国外交界的著名人士之一埃尔斯沃兹·邦克，充分相信他不会采取同我们的计划不一致的步调来使我们为难。葛罗米柯任命了维诺格拉多夫，此公在开罗已不再受欢迎，正适于出任新职。在他身上证明了梅特涅对沙皇时代的一个俄国外交官的精辟评论：“没有什么人比一个毫无根据地自以为精明机灵的外交官更容易被击败了。只有完全诚实的人才是难以战胜的。”一月份，邦克和维诺格拉多夫间或作了些会晤。后来，邦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到巴拿马运河谈判上去了，这也是我指派给他的任务。到了六月，我们在日内瓦以外的地方完成了两项协议。维诺格拉多夫离开了日内瓦。会议也从没有再开过。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的安排是全体与会者会集于国联大厦，正式着手工作。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人们可能以为，一切能够想象到的细节都已经落实了，有些还是超乎以前想象的安排。可是，一个没有料到的争论发生了。是关于座次的安排问题。葛罗米柯向瓦尔德海姆提出了一个座次安排计划，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安排是不能接受的。他建议苏联、埃及和叙利亚*坐在秘书长的右边，美国、以色列和约旦坐在左边。把约旦同以色

列和美国排在一块，这就等于明白地把它置于阿拉伯行列之外；另一方面，把苏联表现得好象是设想中的真正阿拉伯事业——由以前依靠苏联援助的历史所确定——的捍卫者。根据我所了解的萨达特的想法，这种象征性的安排对他的吸引力不会大于对被葛罗米柯安排在我们一边的其他方面的吸引力。

由于葛罗米柯的建议没有合理的根据，而且不符合众所周知的外交惯例，瓦尔德海姆拒绝了它——这表明瓦尔德海姆知道在外交上谁占上风。他建议按联合国的作法，即按字母顺序来安排中东会议各代表团的座次。不幸，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因为它将使埃及坐于以色列和苏联之间，这个位子法赫米要竭力避免的。他提出的反建议将使约旦而不是埃及坐于以色列的下手，而约旦也不愿意接受这一象征。

正当我以为一切都已告吹的时候——确是如此，因为预定的会议开幕时间已过，一个所罗门式的解决办法在一个名叫伊弗雷姆(埃皮)·埃夫龙的人的机智的头脑中产生了。此人当时是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的副主任。他提出在一个七边形的桌子周围，美国将坐在埃及和约旦之间，苏联坐在以色列和留给叙利亚的空位之间。没有什么办法比这种座次安排更合理的了，可它不过是一个诡计。开始时显而易见是葛罗米柯在给人出难题，最后他终于表示了善意。后来又继续表示善意，同意会见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莫斯科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我同意了埃班的意见，以色列提出的举行一次会见的要求是合理的。葛罗米柯同意了，他冷冷地解释说，一次国际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对两主席之一进行一次礼节性拜访，乃是正常程序。

最后，日内瓦会议总算开起来了。一如事先计划的那样，会上

* 为叙利亚留着一个空位，以表示希望它稍后会出席会议。

有排炮般的挨次公开发言，每个与会者都想利用这种发言为自己辩护，反驳那种可能在国内给他造成最大伤害的指责。对埃及来说，要反驳叙利亚指责开罗搞单独媾和；对约旦来说，要驳斥那种说它的阿拉伯气质不如它的兄弟的指责。以色列必须两面应付，既不能让国内右翼反对派指责它软弱，又不能让欧洲人和美国人指责它在设置什么障碍。苏联人明确声称自己有权继续起一份作用；而我们则强调我们对整个进程必不可少。

葛罗米柯作了一个按苏联标准说是有节制的开幕发言。他再次对以色列“侵略”进行标准的抨击，要求恢复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但是，他也强调阿拉伯人有必要承认以色列的主权和民族生存权利。这是通常的苏联货色，提出来是不会引起争论的。它既没有深度；也没有起恶化形势的作用。

接着是我发言，主要谈了四点：维持停火的重要性；对最近期内能够取得些什么成就有必要作出某种现实的估计；作为第一步，迫切需要尽快实现部队的脱离接触；必须在势必受到谈判结果的影响的各方之间进行现实的谈判。至少要使任何人在事后都不能说我没有公开说明我们的战略。我还试图用阿拉伯语援引一则谚语，结果使出席会议的衮衮诸公高兴得笑了起来。象在中国采用类似的哗众取宠的方法时出现的情景一样。在我的话被正式译成我想要说的那种语言之前，与会者并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再下一个发言的是法赫米。他一只眼睛望着大马士革，发言中对实质问题毫不妥协。他的发言要求以色列部队全部撤到一九六七年边界线；要求给巴勒斯坦人以自决权。但是，它也主张给予每个国家——因此也包括以色列——领土不可侵犯和政治独立的权利。在牢牢确认了这些无懈可击的原则之后，埃及从而就可以转向脱离接触问题了——法赫米在发言中碰巧省略了这个问题。

约旦首相扎伊德·里法伊发表了最强硬的理论，其实，他的实

际观点却是最温和的。他对以色列的种种侵犯行为的议论比法赫米的议论要长得多，而提到和平解决的地方却少得多。不过，他对谈判一事是最举棋不定的。约旦由于保持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和愿意同以色列媾和，因而在阿拉伯世界是最受怀疑的。事后，里法伊私下对我承认，他的发言的调子反映了阿拉伯政治的需要。这是一次稀奇古怪的和平会议——虽然肯定不会是历史上唯一的。与会者在会议上所采取的公开态度，总的说来必须看做同它们实际在作的正相反。口头上的气势汹汹同政策上的和解性是成正比的。

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最后发言。他要求最后一个发言，可能是为了要对上午会议上的某些论点作出反应，也可能是考虑到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发言，他可以施展他的雄辩之才——这是不必要的细节考虑。埃班的发言充满华丽的词藻——他久已以此闻名于世，是会议上最长的、显然也是最好的发言。他的发言调子温和，立意坚定，强调和平的法律义务的重要性，反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设想，要求在必然会是一个长期的努力的过程中要有耐心。法赫米觉得有必要予以反驳；可是，这时候日内瓦会议的正式会议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我同法赫米、里法伊、埃班和葛罗米柯举行了私下会谈，再次研究程序问题。法赫米觉得采取如下作法是合宜的，即让会议在法律和程序上保持开会形式，以便为我答应在一月份进行的脱离接触谈判提供一个格局。他极不信任以色列的动机，并且非常急于向他的兄弟们证明“某种事情”正在进行，因此，要求立即向日内瓦派遣一名以色列军官，好让人们觉得在休会期间，军事谈判——101公里处谈判的继续——已经开始了。我同埃班安排了这件事情，尽管我事先已经料到这位军官会做出什么事儿来。为了使谈判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始，一个以色列军官很快出现了，结果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所有这些战术性的运筹都是某种根本变化的表面上的表现。日内瓦会议尽管有其稀奇古怪的方面，但是它本身不是一个不可观的成就。两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和约旦——第一次派出高级代表同以色列坐在同一张桌子的周围，这三个国家代表的发言一方面着眼于他们国内的听众，同时，他们也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出会关闭未来谈判大门的先决条件，或采取会导致这种结果的立场。没有哪一个国家退出会议。所有到会者都同意了美国的逐步解决方针。

叙利亚的态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的确，它并没有出席会议。但是，它的缺席主要是策略性的，大马士革默许摆上它的名牌以在会议桌上为它保留一个位子就反映了这一点。这样，叙利亚就成了会议的一个特定成员，可以在或者参加全体会议，或者参加小组会议之间作出选择。

这样，日内瓦会议就成了我们自十月战争结束以来，所坚持不懈地推行的战略向前迈进的重要的一步。在那次战争期间，使我们忧心如焚的是，苏联的武器取得了胜利。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在不断增加，以色列内部一片惊慌失措，阿拉伯国家在一个敌视美国的激进的纲领之下团结起来，欧洲和日本由于担心失掉石油供应而联合起来脱离我们并支持激进派施加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结束后就不可能进行建设性的外交活动了。

我们开始了一个和平进程，而且是在水门危机之中这样做的。美国政府的权威在日益耗竭。我对这一个得之蹊跷的成就的最好解释是，阿拉伯国家不能自我承认他们的扶难解危的神人是无能的，而以色列人也不能自我承认他们的保护者有着潜在的弱点。它帮助我们维持了美国谋事的坚定性和目的性的幻景，而这种幻景如同中东动乱的历史上出现过的许多出自信念而采取的行动一样，创造了自己的现实。

这样，一九七三年的日内瓦会议就打开了和平的大门，埃及和以色列后来穿越了这座大门，中东其他国家在时机成熟时也可望穿越这座大门。

①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阿尔及尔阿拉伯首脑会议公报全文，可查阅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纽约时报》。

② 见马尔文·卡尔布和贝纳德·卡尔布所著《基辛格》一书（波士顿：里特尔布朗出版公司，一九七四年）第五百二十页。

③ 参见本书第十一章。

④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美国和苏联外交部长致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邀请信：

亲爱的秘书长先生：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由苏联和美国联合提出的第三三八号决议，决议要求在相应当局的主持之下，由有关各方之间开始谈判，以在中东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苏联和美国已得到有关各方通知，他们愿意参加将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开始的和平会议。这一会议应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

有关各方同意，会议应由苏联和美国任两主席。他们还同意，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参加会议的问题应在会议的第一阶段予以讨论。

我们希望在会议的开始阶段你能莅临会议，在这一阶段，各有关政府可望派出它们各自的外交部长出席会议；其后，他们将任命大使级代表与会。我们也希望你能指派一位代表与会，以便使你充分了解会议的进程。最后，如果联合国能够为会议所必需的各种设施作出相应安排，我们将不胜感谢。

如果你能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出席会议，苏联和美国作为会议两主席，恳切希望你能同意向会议致开幕词，并在开幕阶段主持会议。

谨请将此信散发给安理会各理事国，以使它们一体照知。我们认为，安理会主席同各理事国进行非正式磋商，以得到安理会对会议的赞同将是合宜的。

忠实的……

⑤ 国务卿基辛格致总统的备忘录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在我们期望中东问题的会议将于星期五在日内瓦开幕的时候，我想你可能要求我们对走过的道路和将来可能的发展作某些深入的介绍。我们在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之后所制定的战略，基本上是按计划推行了。我们已经在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的莫斯科之行中制定的停火和谈判方案的基础上前进，为的是巩固以色列—埃及

前线的停火，并开辟将在日内瓦开始的谈判进程。四分之一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将第一次面对面进行谈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我们在致力于实现这一点的时候，加强了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而削弱了苏联的影响。

埃及、约旦和以色列将参加谈判。叙利亚历史上就是中东的一个大的不安定因素，它将暂时不参加会议。瓦尔德海姆将出席会议并起有限的作用，这样就可以解除东欧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对我们的某些压力，并解除以色列的不安。

对我们来说，叙利亚不参加会议的决定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这是暗中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好不容易避免了这样一种局面出现：三个阿拉伯国家将共同前往日内瓦，而处于竞选运动中的以色列，由于叙利亚坚持拒绝提供战俘名单，倒决定不参加会议。

但是，阿萨德在复兴社会党的压力下，顽固坚持必须先就叙利亚—以色列脱离接触达成协议，才能出席会议。如果他放弃了这一条件，以色列则不会参加会议，除非叙利亚先提供战俘名单，然后再同意红十字会前往视察。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以色列被认为是障碍，我们的整个努力和得之不易的在阿拉伯世界的信任的恢复就会受挫；战争重起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减缓石油禁运的机会就会消失；而且会进一步加强限制；俄国人在这一地区东山再起的可能就会增加。

在当前情况下：（一）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在埃及、约旦和以色列之间达成协议；（二）日内瓦会议的举行将有助于在六周内达成部队脱离接触的协议；（三）日内瓦会议为防止敌对行动的再起提供了某种遏制力量，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四）它为费萨尔提供了一个取消石油禁运的借口，可望在一月份某个时候取消。

由于这些原因，眼前我们应该让阿萨德去自作自受，并且在他抱着怀疑和不信任坐观日内瓦会议的发展的时候，让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去向他施加压力，让苏联去对他施加某种可能的压力。我们必须仔细静观他的变化，并向苏联指明，由于他们对叙利亚提供大量供应，他们正在促进中东爆发另一次战争，而另一次战争势将严重影响我们的关系。情报消息开始指出叙以边界战事可能再起，我们应该明确向俄国人指出，他们必须堵住他们的叙利亚盟友的一切可趁之机，以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萨达特就不会置身事外，而且侯赛因将会受到比过去更大的压力，要他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投入战争，这一来，我们将会再次面临苏美迎头相撞的魔影。

展望未来，我认为有达成埃—以脱离接触协议的实际可能。萨达特已经接受了我们的逐步解决的概念。他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他已决定不管情况如何，他都要去日内瓦。

约旦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的前景也是有希望的，因为他们在阻止激进的巴勒斯坦人进入西岸领土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看来双方都愿意来探讨能够加强侯赛因在西岸地区的权威以阻止激进分子的渗入的主张。

至于叙利亚，如果在我们帮助下，在幕后解决战俘问题上能够取得进展，并能就叙—以脱离接触的要点达成协议，它在稍后阶段参加会议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就在两个阵营中都得到了胜利。尽管他们不参加，他们不愿意单独同以色列谈判，他们对部分解决不感兴趣，我们同叙利亚的关系还是改善了。我同阿萨德总统会谈的成果之一是我们将很快在大马士革建立一个利益照管处。这就会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进行

对话，并使我们能够与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起更有效的作用。

俄国人的作用将重新受到考验。我不认为他们愿意起阻碍作用，但也不认为他们非常乐于提供帮助。我们必须满足阿拉伯直接与我们打交道的强烈愿望；他们希望主要依靠美国的努力而达成协议。同时，我们还必须使俄国人保持在画面上，并且尽可能使我们的努力同他们协调起来。

至于以色列，他们的实际处境是每况愈下。如果梅厄夫人的工党赢得足够的支持，至少大门还是敞开着。以色列觉得自己已经不起再打一场消耗战；同时也没有能力取得战果辉煌的决定性胜利。他们刚刚开始正视这一很不愉快的现实。他们极感苦恼之余，看来日益倾向于进行认真的谈判。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继续从海上源源不断地向他们供应武器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右翼的胜利将使我们的和平努力严重复杂化；我们很快就会见分晓。

第十八章

第一次穿梭外交：埃及—以色列脱离接触

穿梭外交的起源

“穿梭外交”已成为人们描述我在中东进行谈判时使用的一个时髦词儿——这就是为达到特定的目的而首创的频繁来往于一些国家首都的作法。事实上，这个词儿是我们于一九七四年一月的第二周在阿斯旺和耶路撒冷之间往返飞行的时候，由精力充沛的乔·西斯科创造出来的。安瓦尔·萨达特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要在一次不间断的奋斗中完成西奈脱离接触的谈判；他建议把我一月份的出访（人们把它看作是确定脱离接触的原则的一次努力）变成达成明确的协议的机会。

实际上，一九七四年一月“突破”的种子至少在三个月之前就播下了。这一“突破”使我们对十月战争所运用的战略达到了高峰。这个战略就是：阻止苏联的武器装备获得成功；不让阿拉伯国家蒙受屈辱，特别是在埃及战线上；召开和平会议，由工作小组在会议期间就细节进行谈判，而不搞全体会议那种夸夸其谈的辩论；通过逐步的、而不是搞一次包罗万象的谈判的方式取得成果；巩固同埃及的联系（它已经果断地表示愿意开个头）。

关键在于沿苏伊士运河把双方的军队迅速隔离开来。我确信，这会使叙利亚紧跟上来，石油禁运几乎肯定可以宣告结束，而且我们也将能少冒一些风险而把和平进程向前推进。

在我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份出访期间，我和萨达特曾经一致同意，日内瓦会议应当把脱离接触列为首项议程。自那时以来，萨达特就一直在考虑脱离接触问题。他在当时和十二月间曾提出过一般的想法，为了给以色列一点甜头，在脱离接触实现以后，他将清理并重开苏伊士运河（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后封闭）。以色列和埃及的军事官员曾经在 101 公里处讨论过脱离接触，以色列代表雅里夫将军在那里概述了以色列方面的“设想”。当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这些谈判就帮助达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目的：教育双方懂得可能的行动极限有多大。

日内瓦会议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开幕后，埃及如此渴望显示在脱离接触方面取得进展，以致力促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日内瓦举行埃及—以色列军事工作小组会议（这实质上是 101 公里处谈判的延伸），尽管大家都认识到，在以色列十二月三十一日举行大选之前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我曾单方面地获得以色列政府的承诺，它答应大选一结束就立即提出一项正式的脱离接触建议。由于以色列国内政治关系复杂，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党赢得过多数；每一届政府都是相互竞争的政党之间的联合，它们相继分化成为比政党更有凝聚力的派系。每一次大选（特别是胜负不甚分明的大选）结束，内阁的团结就越来越脆弱。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大选结果，执政的工党丧失了百分之五的实力，也就是说，在有一百二十个议席的议会中，丢掉了七个议席（即从五十六席减少为四十九席）。这一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声誉遭到了十月战争的损害。它同传统的盟友——全国宗教党——联合起来仍然可以构成多数，而后者由于致力于吞并运河西岸，其影响要大得多。要是果尔达·梅厄的党希望她留任的话，她仍然可以继续当总理；但她的声望也由于战争的结局而下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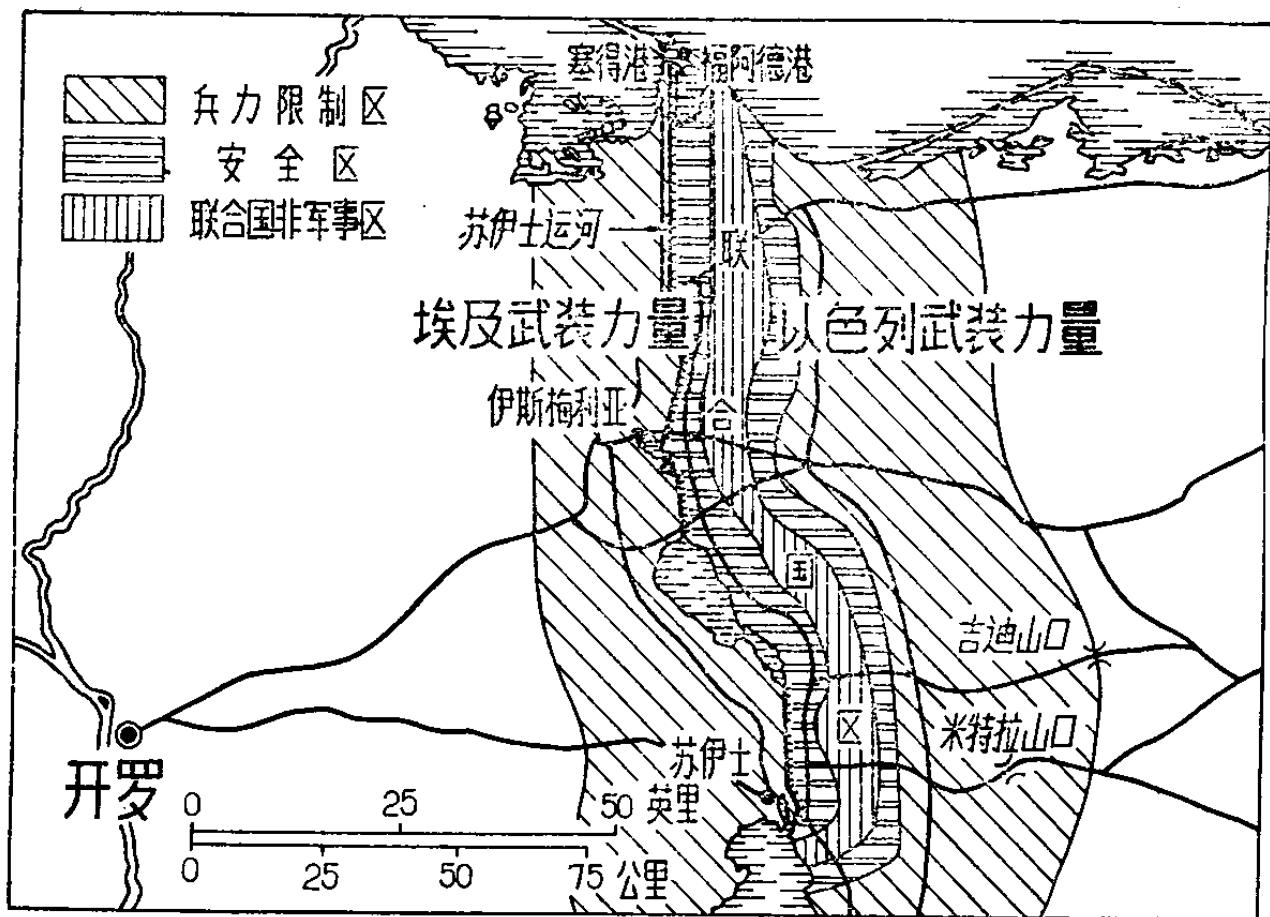
以色列历届内阁都是变化无常的，但临到大选或者在就建立联合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它们却反常地处于最稳定状态。根据宪法的古怪规定，部长们在这种时期不得辞职；看守政府的组成事实上是原封不动的。

恰恰在这个时候，即就组成联合政府开始进行谈判之际，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初在华盛顿露面。他带了经内阁批准的有关脱离接触的第一个可行的计划。达扬的新计划给雅里夫将军在101公里处会谈时提出的“设想”充实了具体内容。他以以色列进行谈判所特有的方式把这个计划说成是无可变通的计划，以色列内阁坚持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达扬表示可以让埃及保存它所赢得的领土，即至苏伊士运河以东大约六到十公里一线，而以色列军队可以撤到运河以东大约二十公里的新线。这就是说，以色列要放弃它在运河西岸的桥头堡（果尔达·梅厄称之为“非洲”），而以色列凭借这个桥头堡曾经切断埃及第三集团军南线的后路。

同时，达扬建议“削减”运河两侧的军事力量。具体说来，他提出建立绵延九十公里的五个兵力限制地区。在西奈，双方的部队将被一个宽六到十公里的联合国缓冲区分隔开来。每一方应削减兵力，建立一个宽六到十公里的“保有轻武器的安全区”；在这个安全区以外，每一方还要划出纵深三十公里的兵力限制区。以色列的主要前沿线就在西奈的两个山口以西。

达扬计划的实际后果就是要埃及撤退它在战争期间越过苏伊士运河的一切军队，而只保留两、三个营（或者一千八百人）。埃及的两个野战军，包括七万人、七百二十辆坦克和九百九十四门大炮，必须撤离西奈。达扬尤其坚持运河东岸不能保留埃及的坦克。达扬要求，在这一地带后面，在埃及的兵力限制区（运河以西三十公里）内，埃及最多只能保留三百辆坦克，它的大炮和防空武器必



埃及—以色列脱离接触：达扬计划，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

须后撤，以使它们打不到以色列前线。要是调停者提出偏袒一方的建议，他就一定首当其冲，遭到另一方的忌恨；达扬显然是利用这一点的。

达扬还向埃及提出了若干政治条件，提出了在101公里处谈判中未曾探讨过的一个新的方面：结束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交战状态，解除对曼德海峡的封锁，保证重开苏伊士运河并允许以色列船只和货物通过。以色列要求美国保证长期提供军事装备。

我对达扬说，他们脱离接触计划“用心是值得尊重的”，是个“好建议”，是“前进一大步”。我准备把它提交给埃及，但是我们不可能在要就接受、要么拉倒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必须留有余地，以考虑埃及的观点。我估计埃及方面不会同意以下几点：以色列后撤的深度；对各个地区武器装备型号的限制；以色列坚持结束交战

状态的主张；要埃及向以色列承担重开苏伊士运河的义务。有些反对是实质性的，其他则是程序性的。我不认为埃及会向以色列承诺它在自己的自主领土上将要作些什么事情。

这些明确无误的说明，没有动摇我认为我们已经可以坐下来谈判的信念。双方都在谈论同样的设想，即使它们对这些设想赋予不同的实际内容。一旦谈判进入细节的讨论，那就有成功的可能——除非谈判一方只是为了在它蓄意破坏谈判时能使自己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有意作出灵活的姿态。埃及由于它的第三集团军处于困境，不会采取这种方针；以色列害怕外交上孤立，也不会这样做。形势有利于谈判取得成功，即使双方有重大的分歧。

因此，我就同达扬讨论如何最大限度地推动谈判，我认为有三种可能：以色列可以在日内瓦的埃及—以色列工作小组提出它的新计划。美国可以指示其驻开罗大使向埃及政府（最好是向萨达特本人）提出这个计划。或者我可以出访中东，以便制订出总的原则，随后提交日内瓦工作小组讨论实施。在日内瓦，开始谈判时碰到的困难是，如果埃及试图采取灵活态度，苏联可能通过提出无法实现的建议和使埃及处境尴尬的办法来阻挠谈判取得进展。困难还在于：这个建议将不得不历经埃及官僚机构的重重关口，这种官僚机构将会谨慎小心，指出建议的种种缺点，再留给萨达特来加以否决。萨达特可能准备这样做；但是，对他说来事情就会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如果我们要我们的大使赫尔曼·艾尔兹提出以色列的计划，我们可以肯定，萨达特会最先看到它。但是，艾尔兹无权进行谈判，也不清楚以色列方面的考虑。这种突如其来的做法，不符合萨达特的脾性。

所有这些使达扬和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我应当亲自向萨达特本人提出以色列计划——由于我曾经答应萨达特，一旦以色列大选结束我就直接参与此事，因此我更加应当直接向他提出计

划。毫无疑问，这件事在我来说，也有沽名钓誉的因素，而达扬本人需要人家奉承他，他在国内搞政治也需要这样做。他赞成达成协议，但他需要别人帮忙，以便使他的想法在以色列议会获得批准。

后来被视为戏剧性的惊人行动的出访，实际上就是这样精心准备起来的。我认为，除非形势非常有利，否则，作为一般规律，国务卿不应当漂洋过海去进行严肃的谈判；既然在外交上作出决定的授权有限，心理因素就可能有巨大作用。一个人成功的名气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抱负。同样，失败也只能自食其果：国务卿出访太多而一无所获，那他就会降低自己的身价。靠个人的人品和谈判才能来打破僵局，那是危险的；这样做无法弥补一个考虑不周的战略本身的缺陷。但到一九七四年一月初，条件已准备得非常充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为解决问题一直工作了两个月。双方的立场正在彼此接近；双方都害怕失败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

当达扬和我正在考虑如何继续工作下去的时候，以色列的建议竟从另一条渠道透露出来，一时顿感仓皇失措。就象要摸清以色列政府的谈判立场是很难的一样，一旦立场确定下来，要想加以保密也是不可能的。每一位部长都想通过邀功来提高自己在公众中的身价，每一个参加谈判的人都想让人家把自己看成是打破僵局的能手。即使是严重违犯纪律，也很少受到惩办。但是，对以色列的设想必须加以保密，理由是：如果以色列的设想看来象是美国影响的结果，而不是以色列本身的要求，那么埃及便觉得比较容易接受。它将会成为公认的标杆，从而使每一方更难于在以后的讨价还价中作出让步。把设想公布于众就会使其他有关方面（包括苏联）发生兴趣，要参加到这一进程中来。

一月五日我和达扬会晤时，从日内瓦发来了一封电报，这使我的同事和我大吃一惊。据这封电报说，参加日内瓦工作小组的以色列代表莫德凯·古尔将军提出了两个设想性“方案”，其中一个

同达扬在华盛顿提出的方案有着惊人的类似。达扬承认他同样感到大吃一惊。美国的处境特别困难。我对达扬说，当他和我正在举行会晤的时候，这项建议却在日内瓦提了出来，我们简直无法说它是由以色列和美国共同制订的。埃及人将看不出“方案”和正式建议之间有什么区别，更不用说他们在接受以色列提出的某些建议（不管其怎样合理）时会有什么心理上的难处了。此外，苏联人必定要参加进来——果然，几天之后，当多勃雷宁打来电话谈到对古尔“方案”的一些意见时，他们就参与进来了。“方案”提出没有几天，古尔将军把它撤销了，这样一来困难就克服了；他在撤销“方案”时说，他把它提出来只是“举例说明问题”，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我怀疑这种文字游戏未必骗得了萨达特；而且，以色列报纸全都报道了类似的想法。萨达特之所以同意这个建议，是因为它有助于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即把脱离接触协议说成是美国主动行动的结果。在那个时候，直接同以色列打交道对萨达特来说是太危险了。因此，我们继续策划由我去开罗访问。我致电萨达特，告诉他说我准备到开罗听取他对脱离接触的相应原则的看法。同时，达扬将把我的建议转告以色列内阁。一月八日，萨达特敦促我立即动身；他将在阿斯旺等我。

这时，水门事件的压力正在产生某些令人焦虑的势头，尼克松（他延长了在圣克利门蒂逗留的时间）对我的声望不断增长感到恼怒；他对我在伦敦朝圣者协会发表的演说的反应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在他引退期间，他简直难得同我交谈；白宫总管亚·黑格是同我联系的人。他对我说，尼克松心情紧张，异常激动。总统原来指望某些惊人的成功能够证明他是不可或缺的，从而结束他的痛苦处境；而今他并未放弃这种想法。他时常梦想采取一种主动行动来结束石油禁运。例如，一月七日黑格对我说，加利福尼亚石油公司一

位经理人员刚刚向尼克松引见了一位阿拉伯密使，这位密使允诺在这方面给予帮助。我从未听说过此人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们之间讨论了什么；这不过是三周前接见多勃雷宁的旧事重演。通过个人绝技或者通过这种渠道，是不可能结束石油禁运的。但是，这种秘密行事的作法表明，水门事件的败露可能很快就会要求在总统和国务卿之间建立信赖，因为这种信赖即使是在最顺利的时候对于执行外交政策也是必要的，更不用说我们正在经历制度上的危机了。

一月八日，我告诉黑格我确信萨达特希望“抓紧解决”，但是，“随着所有这些煞费心机的奔走活动的进行，如果我们不抓紧这桩事情，一切都是空的。”黑格不知道尼克松的反应如何；他似乎仍然一心想着那个秘密使者。我们担心尼克松可能动作迟缓，但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从他的日记中了解到，他这时正在考虑如何拼死拼活开展活动来对付弹劾（一月五日：《行动要象个总统样子》）；^①他办事确实象个总统的样子，这天的晚些时候他批准了我的出访。

要办的尚未了结的事所剩无几了。在我大力推动脱离接触的同时，我尽一切可能使苏联人保持平静。我对多勃雷宁说，我此行的目的在于把以色列的“方案”变为具体的建议。美国参加日内瓦谈判的常任代表埃尔斯沃思·邦克将和我同行；因为出访的结果届时可能会促进在日内瓦进入关于细节的谈判。这正合多勃雷宁之意；他知道苏联人在推动一个脱离接触计划方面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在日内瓦能做的是就一些“原则”夸夸其谈（这并不是打算要耍什么花招，尽管它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设计出来的；直到萨达特在我到达阿斯旺以后加快解决问题的步伐之前，我们所要遵循的程序正是这样）。多勃雷宁祝我此行“取得圆满的结果”——暗示苏联人将默不作声。

我把情况向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作了同样的简单介绍。

如果谈判回到日内瓦进行的话，瓦尔德海姆可能是用得着的，他将会把他所听到的情况对那些更愿向第三者、而不是向我们打听的人(大都是不结盟国家)广为传播。

有了这些不寻常的开头，我就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一日(星期五)凌晨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开始第一次“穿梭”活动。

再谈水门事件

水门事件是一个多头的怪物。不知道什么时候一桩耸人听闻的新事件将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在怀疑和猜忌的气氛中，被揭露出来的每一桩事情(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或者与他本人无关)都成了使人着迷的丑闻，这种状况看来简直没有尽头。任何同原先的说法相左的事情都使政府当局面对“信用差距”的幽灵，也使我好象经历一场恶梦，连执行外交政策所需的最后一点点行政权威都被一扫而光。

就在我动身去中东的那一天，一九七一年的一桩惊人的事件第一次公诸于众。事情是这样的：自一九六二年十月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名代表被指定为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联络官，以便改善五角大楼和白宫之间的联系。联络处的任务是不明确的。从理论上讲，白宫有权获得它所需要或所要求的一切情报，反过来，它也关切使各个关键部门获得充分的情报。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白宫常常不知道官僚机构中有什么文件；各个部门并不经常知道需要什么材料；即使它们知道，也不愿意把内部争论摊开。如果拿不准，它们都想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压制同自己提出的最后建议相反的、对自己不利的或使自己难堪的情报或观点，而不是坦率地把情况摆出来。当然，白宫在发送自己的情报时也是这样做的。

一位干练的联络官加上一个机灵的工作班子，可以帮助白宫和各个有关部门更好地相互了解。他的职责在某些方面就同一位驻外的武官的职责一样。他奉行一种微妙的方针，即必须在下列两者之间加以区别：一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去获取因大意或疏忽而没有发送的情报，一是千方百计刺探那些有意识地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以内的情报。当某个部门或机构对白宫采取后一种做法的时候，那就近似于行政首脑的下属对行政首脑进行谍报活动了。他们可以对总统的政务活动表示不满，但是，下属机构的官员不应当偷偷摸摸地来刺探这些活动。

一九七一年末，我开始意识到参谋长联席会议驻国家安全委员会联络处的某些工作人员可能超越了联络的权限，而滥用了对他们的信任。在印一巴战争期间，美国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政府当局是不是不恰当地“偏袒”了巴基斯坦。作为激烈的官场搏斗的一部分，许多高度机密的文件被泄露给了专栏作家杰克·安德逊；有些文件涉及美国海军在孟加拉湾的部署情况。值得大加赞扬的是，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联络处的负责人罗伯特·奥·韦兰德海军少将对我当时的副手黑格说，内部材料表明，他的联络处可能是泄密的根源。黑格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并且按照我的指示，又告诉了总统助理约翰·埃利希曼；后来尼克松指派埃利希曼负责调查向安德逊泄密事件。

韦兰德工作班子中一名海军文书军士被证明是主要嫌疑犯；如果真是他把机密文件交给了安德逊（这件事仍有争论），那么，他那种有计划地汇报他的白宫上司情况的不寻常的生涯达到了顶峰。这位年轻的海军文书军士作案的有利条件是，他被人们认为如此无足轻重，以致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对他实行戒备。他常常作为一个心腹通讯员，携带重要的文件，穿过大街，奔走于我的办公室和行政大楼之间；而我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在行政大楼办公

的。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人员。黑格将军有几次临时出访东南亚，都让他随行；根据黑格的建议，一九七一年夏天他也随我作环球旅行。在这当中，他乘机干下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就象他后来供认的）：翻阅我的公事皮包；阅读或者复制能够拿到手的任何文件；有时扣下业已作废、放进“待烧袋”准备销毁的高度机密文件的复写纸。他把大量的文件送交参谋长联席会议联络处处长，后者又把它们送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在事情公布之前两天得到了我秘密访问北京的情况（这位文书军士并未跟随我去中国，我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他。但是，看来他弄到了一份呈报尼克松的有关访问北京的报告及其它机密文件的副本，这些文件都是在回国途中在飞机上起草和打印的）。

早在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之初，联络处的活动范围显然已经开始扩大了。我无从判断，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是知道文件是怎样弄到的呢，还是仅仅把这些文件视为联络官勤奋工作的结果而加以接受。我认为惠勒（后来他去世了）是极正派的人。托马斯·穆勒海军上将在一九七〇年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后，这种情况仍继续存在。穆勒坚持说，没有人告诉过他文件是怎样弄到的，他也没有特别注意这些文件，因为我已经把文件的实质内容告诉过他。我没有理由去怀疑一位同我密切共事、又是我极其尊敬的官员所说的话。

泄露事件一经透露，我就觉得不宜再宽大为怀了。我从埃利希曼获悉了我在本书里叙述的种种情况。他让我听了同韦兰德谈话的一部分磁带录音，它概括了我详细叙述的情况。据此，我想我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所知道的情况真够使我伤心的了。那时尼克松告诉我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准备处分韦兰德，并且再过六个月，一俟穆勒的任期届满，就不再任命他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说，但是我应当考虑，在越南战争正在进行、军事机关正遭到无

情攻击的情况下，要是当众清算这种丑行会对陆海空三军和国家造成什么影响。难道我们要给和平运动增加活动资本吗？我接受了尼克松的意见。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我关闭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络处，并且要求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调离全部工作人员。我没有采取其他行动。尼克松也是这样。

韦兰德到其它岗位上服役，后来就退休了；那位海军文书军士也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九七四年一月我出访中东的时候，这些事实继续泄露出来，但其矛头所向已经不是针对那些可能被认为犯有潜入罪的人，而是针对尼克松和他的政府；报界也想把矛头指向我。政府的军事人员共谋盗窃文件，可疑分子接受记者录音采访，试想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府呢？既然对海军上将的讯问是由“管子工”*戴维·扬进行的，我在一九七三年五月说我没有听说过“管子工小组”，难道我是说谎吗？我在第四章已经叙述了我所了解的“管子工”的情况。当然，我知道对泄露机密进行调查的是埃利希曼的职责。我的印象是，他所进行的调查是一种特别调查。看来实际情况是：他的助手（埃吉尔·克罗和戴维·扬）没有负担其它责任。在现在揭露出来的那些耸人听闻的事情当中，人们已看不出有什么细微差别了。我无法根据听一次谈话的录音就来推断戴维·扬没有别的责任，也不能认为人们把这种情况告诉过我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事实是，不管怎样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那次谈话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对那位海军文书军士进行调查的全部情况。埃利希曼提出了一份正式报告，但他从没有把这份报告给我看过。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也要求他的总顾问弗雷德·巴扎德提供一份调查材料；这份材料也从未给我看过。这在

* 指专门刺探隐秘的人。——译者

尼克松的白宫中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现象。情报的沟通是严格划分的，国内安全被认为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以外的。

当然，报界对问题可能持不同的态度。如果军人出于政治目的确实是把军事机密泄露给报纸的话，那么，报界一直喜欢称之为尼克松偏执狂的东西，实际上倒可能证明是有一些根据的。尽管这不能证明构成水门丑闻主体的违法行为是有道理的，但它可以部分地说明造成这些违法行为的根源，从而减轻判决。

但是在那个时候，水门事件有其自身发展的必然性。不容许挖空心思寻找种种理由来为使罪行减轻的情况辩解。从事军事谍报活动的罪责被加在受害者身上，而不是罪犯身上。有三种说法，一是尼克松作出决策的过程过分秘密，致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不得不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既然设立联络处是为了迅速把情报从五角大楼送达白宫，那么，把情报迅速及时地从白宫传回五角大楼，也是光明正大的；军方有权要求总司令也向他们沟通情况，有权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情报而不管为此目的采用什么方法。三是整个事态的发展是由泄密事件发生后白宫暴跳如雷造成的——换句话说，事件证明偏执狂才是罪源。

我在一月十四日从阿斯旺送交斯考克罗夫特的一份建议书中归纳了我对事件的看法：

我认为在寻求任何答案时都应当加以考虑的本案的事实如下：

——被报界称之为“谍报活动”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活动始于一九六九年，而不是一九七一年采取主动行动的结果。

——这些活动在我第一次采取秘密的外交主动行动期间还在继续进行，因此不能说它们是由这种主动行动引起的。

——任何一种情报从来都不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隐瞒。既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有代表参加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那么，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讨论记录”说成是进行情报活动的目标，是极其愚蠢的。

——严加控制的只有三次秘密谈判。但即使如此，它们的实质内容也都是各个部际机构研究过的，尽管它们往往不知道研究的目的何在。

设立参谋长联席会议联络处的目的，正是为了使军方能够了解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工作班子的活动。这一事实也说明目前报纸上提出的那些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要那些提出这种指责的人具体指出哪些文件曾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保密，那将是有用处的。我知道根本没有那回事。

我的分析本身胜过我本人的看法。辩论一个下属机构未经许可擅自从白宫盗取文件一事是否有道理，那是毫无意义的。对此种行为不能宽恕，不管白宫认为哪些需要保密，也不管白宫是怎样进行决策的。穆勒的渠道就是唯一的一条高度机密的渠道。他否认需要对白宫进行侦察，因为他和我关系密切；整个冒险行动都是由那些过分热心的下属干的。事实上，我在一月十日动身去中东之前几个钟头，就对参议员、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斯坦尼斯谈过类似的看法。我曾经敦促他尽快作出裁决，以免那帮不负责任的人把军方拖进水门事件的大漩涡之中。

参议员斯坦尼斯在一九七四年二月举行听证会。^②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宣布穆勒海军上将无罪，并且澄清了这个问题。我之所以在这里详述这一事件，是因为这一事件的出现和水门事件的气氛极其相似，它表明，在我进行穿梭活动的整个一周里，当我国的中东政策成败未卜的时候，报界被调查的方式方法弄得茫茫然，这种调查的实际后果只能破坏谈判者的权威。必须看到，这种损害事实上并未发生，这是应当替报界说句公道话的。但是，在这个决定命运的和狂热的一周里，这一切确实给我们增加了精神和体力上的负担。

阿斯旺：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日

我的出访行程是：先去埃及，再去以色列，然后又回到埃及。作出这样的安排是考虑到每一方的心理需要，是为了使他们有灵活变通的余地。我不想带着一项“以色列计划”到埃及去，因为这会使我看来象是以色列的代言人。古尔将军在日内瓦过早提出“方案”以及随后又撤销这个“方案”，这一举动甚至可能化弊为利，使人看来好象是由于我们的调解，（以色列）内阁的分歧已经克服了。萨达特正确地认清了以色列的形势（我毕竟曾经向他许诺过，在一月份要提出一个具体计划），但是他所以强调美国的作用，是出于他国内的需要。而且，由于谈判的实际范围看来是有限的，因此把以色列的最初计划说成是美国影响的产物，而且已经把埃及的观点考虑进去（这样就增加了它的真实可靠性），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飞机在西班牙作短暂停留，加了油，随后于一月十一日（星期五）下午八时半左右在阿斯旺附近沙漠地带的—一个实行灯火管制的军用机场着陆。这是我第一次到上埃及，尽管这时已是傍晚，但还是可以看出混凝土防空洞、防空武器、坦克、装甲运兵车和集结起来的部队。阿斯旺是埃及一个特别敏感的地区；它的大坝一旦遭到破坏，将使埃及经济长期处于崩溃的境地。我所关心的事情就是使自己少受外界的影响。我们知道北朝鲜有一个中队的战斗机驻扎在阿斯旺。我不知道埃及人用什么语言同他们的盟友交往，也不知道朝鲜空军得知美国国务卿来到这里以后，对他们是起威慑作用还是刺激作用。

法赫米外长在夜色朦胧之中来到黑暗的航空终点站迎接我。他按那时还时兴的传统方式同我拥抱和接吻。我希望早上开始会谈。每当我出国访问，我都尽量安排迟一点到达，免得还要进行

认真的讨论；我这样做是为了能在晚间好好睡一觉，以便恢复飞行时差造成的疲劳（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感到神志颠倒，但那些要同我打交道的人则可能不同）。但是法赫米告诉我说，萨达特正在等我，这使我毫无选择的余地。

阿斯旺是一个旅游城市，位于开罗以南大约四百英里，那里气候温和，萨达特在冬天有好几个星期在那里办公。尼罗河第一瀑布是法老时代上埃及的边界；在这以外就是努比亚和今日的苏丹。它是尼罗河沿岸的一片宁静的绿洲，这条河给人带来生命和希望，也给乡间带来水患和沃土。在河流两岸开辟出来的耕地只是一条狭长的地带，比下埃及，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要小得多；有时它全部淹没在水下。

从机场驱车前行，就要路经本世纪初叶由英国工程师修建的旧阿斯旺水坝。同苏联建设的高坝相比，它没有那么大的雄心，控制洪水的能力也小得多；但它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也小得多，因为它阻塞赋予万物以生命的淤泥，而苏联建设的高坝恰恰切断了淤泥的去路，它使埃及不得不进口大量的化肥，它还破坏了亚历山大港沿海的渔业。尼罗河在狭长的绿色地带中蜿蜒流过，河面上一些独桅三角帆船依稀可见。河流两岸的大沙丘一直绵延到远方。这儿的沙漠形状千篇一律，漫游者如果没有指南针很快就会迷失方向。这儿听不到音响，一个人在万籁俱寂之中孑然一身，简直不可思议，仿佛被遣送到了某个遥远的、荒芜的行星上。

萨达特的别墅是一栋用石头砌成的、不引人注目的政府休养所。它有一间小前厅，正前方是一间可以俯视尼罗河的书房；家具的摆设使人面对屋门而不是风景。萨达特和我常常坐在一张沙发的两端，沙发沿窗摆设，四周有几张安乐椅（在这次穿梭访问期间，我们常常是单独会晤；在后来举行的会谈中，当时的副总统穆巴拉克差不多都在场），书房的右边是会议室，左边是餐厅。

萨达特身穿军服，对我表示十分热烈的“欢迎”，并把我引进他的书房。就象平常那样，他单刀直入，一下子就触及问题的核心。他说，他认为现在来制定一些“原则”，以后在日内瓦再加以充实，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程序给激进的阿拉伯反对派和苏联的捣乱提供的机会太多了。制定一致同意的原则所花的力气，不会比完成具体任务所花的力气少多少。十月战争以来所进行的艰苦的外交活动必须得出某种结论；现在是把一切交换意见、原则协议和不明确的暗示总结为一项最后文件的时候了。因此，萨达特要求我一直呆在中东，直至谈判或者取得成功或者归于失败。他将尽全力合作。在他看来，达成脱离接触协议对于揭开阿拉伯—美国关系的新篇章和推动同以色列的和平进程，都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表示诚意，萨达特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最后时限。他已经预定从下周末（一月十八日）开始出访阿拉伯各国。他希望在那时以前达成协议。这样，他在周游各个阿拉伯首都的时候，就可以敦促结束禁运了。萨达特表示要促成解除石油禁运，这无论如何会明显地给尼克松带来信誉——它表明埃及并未忽视我们国内的困难。

他向我们伸出胡萝卜，事实上其意义比他给自己规定的最后时限的意义要小得多。通常说来，一个谈判者给自己定出最后时限，就削弱了自己的谈判地位，除非调解者终于认识到谈判失败给自己国家带来的危害要比谈判各方大得多——这是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况。脱离接触的谈判远不是这种情况。因此，萨达特提出的最后时限保证了他可能作出的让步的限度。我们同意在第二天午餐时研究建议的实质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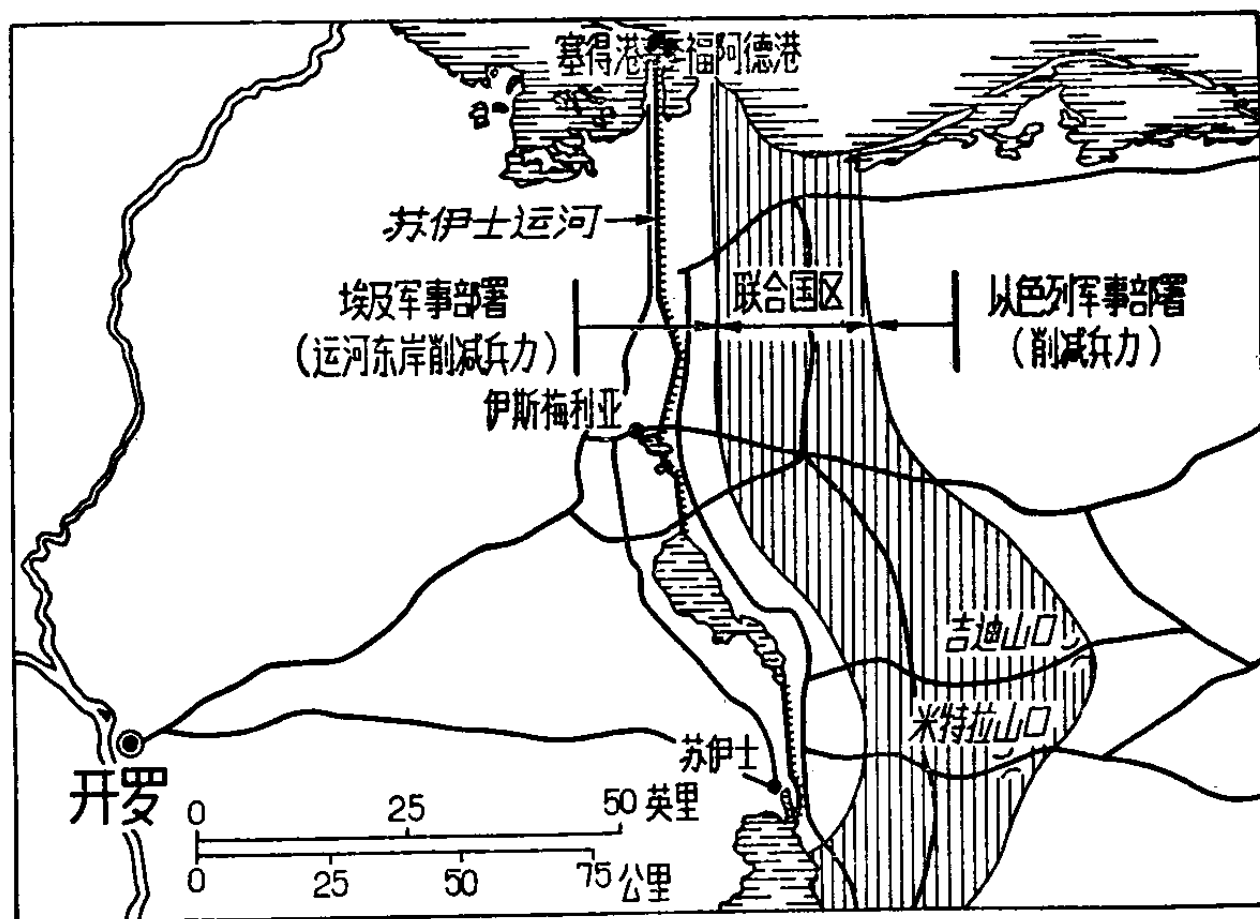
下午十一时，我终于来到了我的下榻之地——新大瀑布饭店。这是一座建筑在风景优美的尼罗河湾上的、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它相邻的是旧大瀑布饭店，那是昔日留下的一栋华丽的沙石建

筑，高大的天花板上有大型风扇在转动；百叶窗使得发出霉味的周围环境多少带有一点神秘的色彩。它看起来象是阿迦莎·克里斯蒂的一部小说所描绘的场面（有一度它确实是的），但是，现在它已经破旧不堪，连同大不列颠殖民主义的狂妄自大，连同它所反映的大不列颠统治阶级的贵族气派，都已成为陈迹了。而新大瀑布饭店则表明了一个新崛起的帝国主义——苏联所具有的价值观。这座新饭店建成后，从审美观点看它唯一可取之处就是能够越过旧饭店而一览无余地眺望尼罗河，以及河那边的阿加·汗的白色大理石陵墓。新饭店的内部陈设全是讲求实用的，粗制滥造的，好象照顾个人的舒适就是承认共产主义制度决心要战胜的那种个人主义。法赫米很想考验一下我们的耐性，他很晚才邀请我们一行在一个没有什么人的餐厅共进晚餐。

星期六上午，埃及人做出了一种富于人情味的姿态。他们在我恢复会谈之前，安排了一些观光活动。我终于看到了那座纪念碑式的阿斯旺高坝，这样做违反了我为在正式访问期间进行观光活动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一：绝不在外国参观钢铁厂、炼油厂及其他现代技术的奇迹，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的机械设备都是一片灰黑色的，而它们的建筑同样也是乏味的。但是，埃及人带我到那里参观似乎是为了达到某种微妙的政治目的——究竟是想刺激美国还是苏联，那不清楚。因此，当工程师向我解释大涡轮机运转情况的时候，我就试着装成着了迷的样子，事实上，我感兴趣的却是在灰暗色的高坝后面形成的大人工湖。

随后，我们访问了一个在我看来是有则必看的地点。我们乘船前往宏伟的菲莱寺院，人们正在抢救它，以免遭纳赛尔湖（即高坝建成后洪水淹没的地区）不断上升的湖水的淹没。我们看到了这个工程施工初期的情况。入口处的两座大塔门屹立在波涛滚滚的洪流中——任凭风吹浪打，迄今已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

们在这儿把事情办完之前”，我对一位随行的记者开玩笑说，“一定会看到工程竣工”。我这样说并没有言过其辞。一九七五年谈判期间，我又访问了菲莱寺院。一道围堰把水拦在寺院工地之外，那时围堰以内的积水已经排除掉，在夏天的炎日下这个地段是干涸的。在人们开始把寺院迁往高地之前，我们在湖底游览了这个宏伟的建筑群。五年之后，这座寺院在附近的一个岛上全部重建起来，显得富丽堂皇。



埃及—以色列脱离接触：萨达特“设想”，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近似图)

上午十一时，我回到萨达特的别墅。午餐时我们研究了谈判的现状。我们面前摆着三类问题：两军军事部署线的位置；兵力限制区的大小和限制的种类；对诸如解决以色列通过曼德海峡、蒂朗海峡以及苏伊士运河等问题的保证。此外，还有一份萨达特幸好还不知道的以色列货单，即结束交战状态、重开运河和重建运河沿

岸诸城(我把这份货单扣压下来留待以后处理;如果我们在主要争执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提出这些要求只能使得事情复杂化。如果我们取得了突破,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萨达特早就放弃了要求以色列在西奈后撤三分之二的计划。但是,他还坚持十二月份的立场,即以色列应当撤离具有战略意义的米特拉山口和吉迪山口。至于兵力限制,他现在已把他要留驻运河东岸的军队数目从三个师减到了不能再减的“最低限额”——一个半师;他拒绝了以色列提出的对武器种类严加限制的建议。

我知道埃及的主张没有一项会为以色列所接受(如果萨达特的班子把达扬计划泄漏出来以后以色列报界哗然的情况向他作个汇报,他也可能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也有破例的情况)。在这个阶段,我认为争辩是毫无意义的。在调解过程中,我总是分别向双方转达会引起彼此强烈反应的建议,从而向有关方面保证,它们的观点都会得到适当的听取。只有在僵局看来迫在眉睫时,我才提出我的想法,以便有可能达成妥协。正如第二天(一月十三日)我在以色列对伊加尔·阿隆副总理所说的:

为了维护我自己的立场,请允许我确切地阐明我必须坚持的立场。我在埃及不能充当以色列的律师。我不能在埃及先是持一种主张,尔后又对他(萨达特)说,好了,我接受另一种主张。我向他提出的主张只是我要讨论的主张。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作为你们的观点的解释者,我可以告诉他界限可能是五公里上下;或者对他说,把建议带到这里来对我来说是白白浪费时间。如果他说,“我需要再增加两个营”,那我不能说同意。但我可以说,我将把这个意见转告以色列,然后看他们怎么说。不管怎样,我决不能说别的,只能告诉他说,我将把某些意见转告以色列供你们考虑。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完全有自由拒绝我给你们带来的意见。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必须这样行事,因为我不愿意处在这样的地位;使我成为你们的全权代表,并且说我同意四个营而不是三个营。这会使我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这会使他

把我看成好象是在千方百计要为以色列争取最大的好处。这样，就会使我丧失甚至对埃及的用处。因此，作为你们的调解人，我的用处就是把你们的想法向他作解释，劝他放弃某些主张；我把别的主张带到这里，你们仍然可以拒绝接受。

当然，当我把埃及的建议带到以色列的时候，这些原则同样是适用的。谨小慎微不一定会减轻我的任务。调解会促使有关方面提出一些极端的建议，如果这些建议遭到拒绝，他们就会指责调解人没有作出充分的努力，或者会利用调解人作为他们未能提出他们也知道实现不了的主张的借口。以色列内阁在利用外部调解作为它作出决策的辅助手段方面是特别老练的。

萨达特的语调是坚定的，他坚持主张迅速解决问题的态度使人毫不怀疑：他的想法不是绝对不可改变的。他肯定地说，一旦实现脱离接触，对曼德海峡的封锁将会解除，以色列进口或出口的货物可以通过苏伊士运河，萨达特眨一眨眼，他说，他知道以色列要求准许它的船只通过运河，但是达扬的女婿多夫·西昂上校毕竟公开说过，以色列只求货物能够通过就满足了。（我不无感慨地认为，这是为了一时的宣传目的而放弃的又一个从一开始就采取的立场。）更为有利的是，萨达特允诺在脱离接触（包括叙利亚的脱离接触）阶段不提出巴勒斯坦问题。

萨达特对前景的向往是如此热情，以致他已开始考虑采用怎样的签字方式了。他担心苏联玩弄诡计，甚至因此不想在日内瓦签字。他建议在101公里处签字。他自豪地提出一个想法，这一想法难得的好处是把尼克松和苏联人逼到墙角。这个想法就是要我出席签字仪式。我们现在还远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不想用另一次戏剧性的宣扬来激怒尼克松，也不想用已经成为现实的象征性示威来使葛罗米柯蒙受屈辱，这个现实就是：被大肆宣扬的和争辩不休的“美苏共同主持”，已经变成了美国单方面的主动行

动。

这一切使叙利亚处于进程之外。萨达特相信，除非埃及单独干，哈菲兹·阿萨德总会找出某种拖延的借口或者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因此，在萨达特看来，西奈协议将有助于使叙利亚正视自己的现实。因为叙利亚不愿意去日内瓦，于是萨达特建议让叙利亚军官参加埃及军事代表团，以便为叙利亚参加脱离接触谈判提供一个讲坛。我不能肯定这两个盟国之间的关系会容许这样做，也不能肯定阿萨德会接受一种对叙利亚说来是与埃及不同的程序。但是，这些都是与关键问题无关的技术性问题。萨达特把问题的实质看作是一种在要末大家都陷入僵局、要末埃及一方取得初步进展之间的选择；而埃及所取得的进展将会为叙利亚打开大门，并且终将导致全面的和平。他在这方面的估计是正确的。

同萨达特的会谈历时三个半小时。一月十二日(星期六)下午四时，我离开阿斯旺，经两个小时飞行抵达以色列，去了解以色列计划的最后方案。

耶路撒冷：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

我在途中获悉，果尔达·梅厄不能参加会谈了。她患了带状疱疹(一种神经性疾病)，病倒了。(在以色列听说，果尔达患有许多病，多得使任何一位有幸给她治病的医科大学的学生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取得学位。)如果会谈失败的话，萨达特难道会相信她的病是真的吗？

但是，我并不真地相信谈判会失败。以色列出于自身的理由，需要达成一项协议。它要保持它在苏伊士运河西岸的飞地，就必须保持动员状态，而保持动员状态就意味着它的经济要承受艰巨的负担。它在日内瓦的其他会议上几乎肯定会陷入孤立，在我抵

达耶路撒冷不久，也就是当天下午八时左右，当我到耶路撒冷一条狭窄街道上的果尔达私宅去拜望她的时候，这一点已看得很清楚。在美国，有一间不大不小的起居室、一间小书房和一个小餐厅，只是一个下层中产阶级的家庭；而在这里，总理的住宅也不过如此。果尔达身体衰弱，病痛缠身，但言谈颇具讽刺味道。她表示她不相信萨达特，一直怀疑埃及人的一切言行和要以色列后撤的计划。但她说话是友善的，她那样说是要我注意不要过于乐观。没有当面的指责。我们显然没有进行一场恼人的、法学家式的、吹毛求疵的会谈。

不能说以色列谈判者是对人大方宽厚的。我在以色列还没有游览过。甚至在不是全力加快工作的时候，他们也会在日程上作出安排，以便向内阁表明，以色列谈判小组没有忘记考验我的耐性。我拜会果尔达之后，就在星期六傍晚同有才干的副总理伊加尔·阿隆领导的谈判小组举行了三小时的工作午餐。阿隆在五十年代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是我的学生，自那时以来他就是我的颇有交情的老朋友。随后，我又同国防部长达扬会晤了一小时，讨论以色列计划的细节。一月十三日（星期日），我同阿隆共进早餐；同外长埃班和谈判小组成员举行工作午餐；同在对叙利亚战争中被俘的以色列战俘的家属会面；又同埃班研究政治条款；最后驱车一个多小时到离特拉维夫不远的达扬宅第，出席他举行的招待会。

通过所有这些活动，谈判者表现出了一种轻松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以色列出现，就表明内部争论被暂时搁置起来了：内阁第一次作出赞同脱离接触的决定。以色列人是通过这样一种办法取得一致的：把一切有争议的问题都按照有利于他们的方式来解决——而让我去劝说萨达特予以接受。

我极力说明，我不能带着以要么接受、要么拉倒为基础的达扬计划去同萨达特会谈，因此需要有一种让步的主张。以色列内阁

对我这个论点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态度。这样，由于仅仅把达扬计划说成是让步主张，就扩大了我运用谈判手法的活动余地，使我有一种新的、甚至更为强硬的立场来进行讨价还价。我知道萨达特是不会轻易相信的；以色列新闻界把达扬计划的内容泄露得太多了。不论是在阿斯旺还是在耶路撒冷，今后的会谈显然都会很艰苦。

以色列所建议的西奈后撤线仍然是在有战略意义的山口以西，在从北到南穿越西奈的一条山脉的丘陵地带。至于埃及在西奈的防线，新的正式主张是把埃及第三集团军控制的某些地区移交给联合国（这一更为豁达大度的让步——达扬计划——使埃及在运河东岸有一条宽达六至十公里的完整的防线）。兵力的限制不变：驻扎在运河对岸的兵力不得超过二至三个营，不得部署坦克和大炮。埃及不得在苏伊士运河西岸三十公里以内（或者埃及前沿以西四十公里）的地区部署地对空导弹，也不得部署能够打到以色列阵地的大炮。（为此目的，以色列人为不同口径的大炮划出了不同的线。这好使埃及的另外一百门大炮和几个地对空导弹发射设施后撤。）即使在运河以西三十公里地区，坦克的数量也要限制在三百辆。我半开玩笑地对以色列谈判小组说，“我简直要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贾马斯。”

以色列的回答是：如果萨达特不想打仗，他就不需要前沿部队。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它忽视了一个原则问题，这就是要埃及同意在无可争议地属于它的领土以内很远的地方严格限制兵力，并且同意从这次战争之前本来就是它控制的阵地上撤退大部分部队。

此外，以色列提高了它的政治条件。它要求对以下几点有一个明确的保证：萨达特要清理运河，重建运河沿岸的城市，允许以色列在运河通行，宣布结束交战状态。我不对这些条件进行什么

讨论，而是集中力量来弄清楚以色列的立场和就一些实际问题提出询问。我指出，萨达特的反应可能是很复杂的，在我弄清他的观点之前，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想方设法修改以色列的建议：

我们正在陷入空谈口号的危险之中。根据我所看到的情况来判断，如果他拒绝这一建议的话，那是因为他国内的处境。正象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国内处境一样，他也有他的国内处境。你们要他向他的部队（这个部队终于处在他控制之下）下达许多特别不合他们口味的命令。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同他晤谈之后，我毫不怀疑他确实希望和解，而且确实希望在运河地区实现和平。他的国内处境是不是容许他去做你们出于国内情况的需要而要求他做的事情，这一点我可不知道。但在今后三十六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搞清楚。在这方面进行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个问题不象“他要和平吗”或者“他不要和平吗”那样简单。

尽管从表面上看来条件是苛刻的，但是我觉得这并非以色列的最后定论；我们看得出以色列发出威胁是出于国内需要。用外交行话来说，我们正在走向突破，总之，我们正在进行艰巨的谈判，以色列将对谈判作出重大的贡献。

同以色列谈判小组的会谈，相对说来一直进行得比较轻松；谁也没有谈到僵局。星期六晚上在特拉维夫市内达扬寓所举行的招待会上，也洋溢着这样的气氛；招待会热热闹闹，象是过节一样。这所房子很象美国的郊区住宅，但它的花园却是达扬珍藏古董的博物馆，这反映出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热衷于把他们同遥远的过去重新联系起来，或者至少说明他们的国家古已有之——好象要用历史上一脉相承的确凿证据来消除那种恼人的不安全感。达扬和参谋长戴维·伊拉扎将军把我带进一间小书房，向我展示两幅地图：一幅是不容变动的新界线，它比古尔在日内瓦向埃及人出示的那一幅要后退一些；另一幅是达扬在华盛顿提出的（同古尔所提出的是一样的）——这就是现在所说的让步主张。我们都知道，在

这条新线上我不会花多少时间；而所有的以色列人却都在为他们在“新”主张上面所表现出来的足智多谋而沾沾自喜。当我们走到门外的时候，一大批记者翘首以待。我说：“以色列人没有受到较好的对待，其原因是埃班并没有亲吻我。”

在动身去阿斯旺之前，我指示斯考克罗夫特向多勃雷宁简要地通报情况。当谈判接近高潮的时候，我们渴望避免苏联的干预。如果莫斯科认为我们注定要失败的话，它就可能摆出强硬的姿态，以图坐收渔利。如果它知道我们不只是在“原则”上、而且也在取得一个完整的协议方面有所进展的话，克里姆林宫就可能极力使进程中断，并迫使我们回到日内瓦。如果这次情况通报不说是一篇判断精确和洞察明晰的杰作的话，事实上也堪称是正确无误了。我们只是向多勃雷宁通报说，我已经同双方研究了形势，取得了一些进展（而不明确说明取得什么样的进展），今后一旦有所前进，将进一步向他通报。

星期日晚上八时十五分，我们又飞往阿斯旺。乔·西斯科（他是一位有能力的、精力特别旺盛的人，有时他提供的答案比向他提出的问题还多）向我们的记者团宣布，“欢迎你们登上在埃以之间穿梭的飞机！”穿梭外交就因此而得名。

飞行中的国务院

穿梭外交指挥部设在美国空军一架名叫“萨姆—86970”的波音—707飞机上（萨姆即陆军空运指挥部特别空运小组的缩写，86970是机尾的号码）。它有时曾被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当作“空军一号”使用。林顿·约翰逊任副总统时，把它作为“空军二号”使用。^③到了一九七四年，他在总统的机队中名列第三。犹如一户有过美好时光、一度富有的家庭，这架飞机由于拥有超等的机组人员

和崭新的内部陈设而曾显赫一时，但是在我使用的那几年里，它的内部陈设没有维修，其显赫名声下降了。机组人员对它十分爱护；他们和我率领的工作组成了好朋友。

从前面一走进飞机，最先引人注意的是一座由两名技术军士操纵的大电动控制台。它是“萨姆—86970”飞机同世界各地进行通讯联络的中心；通过密码电传和——如果需要的话——电话（但不常使用电话）几分钟就可以接通。我在机上一面通过这部机器收到国务院或白宫发来的一切必要的电报；一面通过它向国务院发出一切指示，或者向白宫情况室发出内部文电。在一些我们没有大使馆的国家首都，或者虽有大使馆、但我不想通过大使馆同华盛顿沟通情况的那些国家的首都，我们都利用这个控制台作为通讯联络的中心，甚至在陆地上也是这样。由于我想在出访期间也继续处理国务院的事务，因此大量的电报就源源传来，它们由机上熟练的通讯人员接收和我的工作人员译解后，再交给我和我的同事们加以研究，然后再经由同一个通讯联络系统发送出去。这个小小的、并没有多加遮盖的通讯联络站，实际上成了整个外交工作的心脏。没有它的话，要搞穿梭外交是不可能的。

再往后面是飞机的客舱区，被分隔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右舷一侧，同过道平行，包括两张紧挨机壁摆放的、可当床使用的沙发；沙发的对面有一张折叠桌和两张安乐椅。这就是我的专用房间、工作区和休息室。我在这里翻阅情况简报，与同事们晤谈和偶而小睡一下（在前往谈判的途中难得打个盹，这个时候我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翻阅情况简报上了）。

再下一部分是会议室，占去飞机的大部分空间。它的别致的地方是设有一张腰子形的会议桌，三边摆着沙发，并不豪华，呈淡绿色，给人以宁静之感。桌子的第四边是专门为林顿·约翰逊做的一张特大椅子。由一个电动开关控制椅子的移动，想转到什么

方向就可以转到什么方向，但我至今仍然认为它并不那么令人满意。桌子的移动则由它自身的液压设备控制；由于种类不同，它不如椅子有多方面的用途；一个粗心大意的 newcomers 会在椅子高、桌子低的情况下左右为难。会议区顾名思义应当是闲人免进的。事实上，它的座位常常被我的许多助手所占据；室内高高地堆放着文件包、公事皮包，有时还有一个大木箱。当我在小房间里把门关上以后，我的工作班子里的那些精疲力尽的人就伸手伸脚地躺在沙发上、甚至地板上。会议区还有多种用途。我在那里向随行的记者吹风，有时还同工作人员举行会议，而且常常同我的助手们在那里用餐。

另一部分是供高级官员使用的工作区，那里有两张桌子，分别摆在过道两边，总共可以安排八个座位。此外，还有一张安放电传打字机的小桌，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在另一张大桌上安装一台电传打字机。旁边还有一台小型复印机。这个地方（在中东穿梭活动期间）由西斯科主管。我的工作班子的高级官员分类整理收下的电报，有时他们塞进一份同我的某些指示相矛盾的伪造电报来考验我，并站在一边看我发脾气（当然，如果我察觉不出这份电报，他们就会大为高兴）。他们为下一站准备简要的书面材料——常常是一份把双方的立场加以对比的备忘录、我们对它们的灵活变通的估计，以及待办事项的清单。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极其紧迫的情况下，抢在到达下一站之前的非常有限的时间内进行的。我的工作人员更喜欢在阿斯旺的穿梭活动，而不喜欢后来在叙利亚的穿梭活动，因为去埃及的一个来回可以多七十五分钟的飞行时间，我们在机场上空绕一两圈（在机场上迎候我们的人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在这同时我们就把准备工作做完。人掌握进度要比机器掌握得好，复印机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点乱子。有时它只是把纸张收进去，而没有把复制品和原件

送出来；有时把纸张烧掉而冒出滚滚浓烟，真有使飞机着火的危险。有一次复印机从支架上滑脱出来，险些撞坏乔·西斯科。西斯科幸免于难，温斯顿·洛德宽慰地松了一口气。要是机器不及时停止转动，西斯科的无数份影印件就可能散布到整个中东地区——那可实在是令人不知所措的局面，不论是我们还是中东对此都是毫无准备的。

机舱的第四部分是很有趣的。坐在头等舱十排座位的是我的工作班子的其他官员、保安人员和报务员，而坐在后面的是十四、五位常常随我出访的新闻记者。*我认为，新闻记者随同国务卿出访这个惯例，是从迪安·腊斯克开始的。他们由自己所在的单位挑选，美国各大报、电视台、电台和杂志社差不多经常有代表参加；其余的名额则由其他新闻单位轮流派遣。当然，我同这帮闹哄哄的人的关系是很复杂的，而这种复杂关系是由我们各自职责的不同造成的。报界渴望接近高级官员，但又害怕被他们拉过去；因此，他们往往由于持怀疑态度，或者一味寻找所谓政府官员的言论与事实不符的情况而出差错。政府官员需要通过新闻界来说明他们的观点，总想给他们提供单方面的情况，或者对他们施加压力。虽然有这些弊端，我回想起自己在飞机后舱同这些男女记者的交

* 在我大部分出访活动中随行的记者包括：全国广播公司的理查德·瓦莱里安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尔文·卡尔布或伯纳德·卡尔布；美国广播公司的特德·科佩尔或巴里·邓斯莫尔；《时代》周刊的杰罗尔德·谢克特；《新闻周刊》的布鲁斯·范沃斯特；美联社的巴里·施韦德；W 新闻小组的吉姆·安德逊；合众国际社的理查德·格罗沃尔德或威尔伯·兰德里；路透社的拉斯-埃里克·尼尔逊；《纽约时报》的伯纳德·格韦茨曼；《华盛顿邮报》的玛丽琳·伯杰或默里·马德；《华盛顿明星报》的杰里迈亚·奥利里；《纽约每日新闻》的斯坦·卡特；赫斯特报系的约翰·沃利奇；《芝加哥论坛报》的约翰·麦克莱恩；《波士顿环球报》的达赖厄斯·贾布瓦拉；《洛杉矶时报》的奥斯瓦德·约翰斯顿；《华尔街日报》的罗伯特·基特利；《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夏洛特·赛科夫斯基或达纳·亚当斯·施密特；美国新闻处的玛丽·凯尼格或威廉·斯普拉格。④

往还是令人神往的，只是有时也生他们的气。

采访穿梭活动的新闻记者的任务是繁重的。他们必须按照我的程序表活动，他们从来不知道会议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也不知道可能出现什么坏消息。我一休息下来（常常是午夜过后），他们就必须写出新闻并把它们发出去。他们必须先我而起床；及时到达机场，以便使他们的行李通过爱克斯光安全检查，并且在我一到达后就能使飞机起飞。他们在飞机上和陆地上的食宿条件都比我差得多。他们经受了所有这些折磨，对我出访的报道是公正的而且往往是深刻的。在水门事件时期华盛顿所感到的那种敌意和痛苦，我们在飞机上都没有碰到。

我在每次穿梭时都尽力对记者们提供帮助，给他们吹吹风，向他们提供“背景”情况——这就是说我只能被说成是“高级官员”。每当我们由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后，我都立即把他们请到会议室来。我同他们见面时很少向他们详尽介绍会谈的实际情况，但我力求准确地说明所讨论的问题以及我所认为的发展前景。采访穿梭活动的这些老记者善于把我说的内容凑拢起来，然后喜欢想方设法，特别是要萨达特来证实我在一切有关方面达成协议之前极力含糊其辞谈到的那些东西。萨达特偶尔也满足他们的请求，这使我大为吃惊；但是，他可能比我设想的更深谙政治，因为他透露的内容从没有造成我所担心的损害。

如果我在这里提到我的一个判断的话，我希望新闻界的代表们不要以为我不支持他们；我的这个判断就是：当穿梭外交正在进行的时候，我的记者同伴们把他们的利益寄托在穿梭活动取得胜利的结果上，要是活动的结果有负于他们的期望，就会使我面对不堪设想的前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希望穿梭外交的劳累总该有所收获，也可能出于这样一个现实考虑，即我们的成功将会使记者更加出名和更有声望。不管这些久经锻炼的老记者

承认与否，我还是认为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之一，是希望他们的国家在水门丑闻的纷扰中能够做出一些使他们得以引为自豪的事情。尽管这不是他们本身的工作，但他们在几次关键时刻都给了我道义上的支持（不是在新闻报道上而是在他们的态度上）。

乘坐“萨姆—86970”飞机返回阿斯旺的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同时带去的有以色列的正式建议。

重返阿斯旺：一月十三日至十四日

我们在下午十时三十分到达，当时正在实行灯火管制。多亏法赫米，他要求除了由我发表声明，宣布我带来了几幅地图和一份以色列的正式计划之外，不必向记者吹风了。萨达特愿意等到第二天上午同我晤谈。

一月十四日（星期一）上午十时，总统在他的别墅外面一座大花园的阳台上欢迎我，这天阳光灿烂，气温宜人，是七十年代最好的天气。他仍然身穿庄重的军服；当我们闲谈着让记者们照相的时候，他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半小时过后，他终于把我领进室内。我叫助手们把以色列交给我的两幅地图拿来，因为我知道所谓的让步主张不过是以色列的实际据守线，我只是稍微谈了一下第一幅地图，担心萨达特会被这幅地图所激怒。我说，作为脱离接触计划的一部分，以色列不会后撤到山口西侧再远一点的地方了，如果我们从这个前提出发的话，我们就会节省许多时间。萨达特只对一项建议发表意见，这项建议是：埃及的南线部队向西撤退几公里以利于联合国部队进驻。那是一个道义上的问题；他坚持说，不能要求埃及从它自己的领土上后撤。我扼要地叙述了以色列关于兵力部署的建议，并且开始列举以色列的政治要求；这时萨达特打断我说：“我的助手们应当同我一道听”。萨达特

表示需要得到他的下属的同意，这在谈判过程中是仅有的一次。它表明这个问题是多么棘手，以致萨达特在这个时刻要利用我来帮助埃及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起初意见是不一致的。我们转移到会议室继续会谈，在会议室里我们彼此都摆出一种典型的谈判者的架势，这是我同埃及人打交道时少有的几次之一。在谈判桌的一边坐着美国代表团的成员：我，我的两边分别是乔·西斯科和埃尔斯沃思·邦克（他以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大使的身份），彼得·罗德曼（担任记录）。萨达特由贾马斯和法赫米陪同，他自始至终没有按照外交惯例办事——没有费心去找个人来作记录。

会谈是从开玩笑开始的。我说，几小时之内就将说明，我带来的东西究竟是以“基辛格计划”（意思是成功）为世人所知晓，还是以“西斯科计划”（意思是失败）为世人所知晓。法赫米妙语双关地说，如果它是“西斯科计划”的话，那么，埃及人将把他的尸体保存在王后谷中。但当我提出以色列的脱离接触计划，详细谈到计划中的军事方面内容时，开玩笑的气氛顿时就消失了。萨达特很少说话，他抽着烟斗，偶尔插一两句话，把问题澄清。当我开始列举以色列的其他条件时，气氛变得严峻起来。谈到开放苏伊士运河的义务，他脱口说道：“这些是政治问题！”当我谈到以色列的一个新想法，即所有外国军队和志愿人员都应离开埃及国土时，他怒气冲冲地说：“荒谬可笑。”

贾马斯将军不那么克制。他认为以色列的有关限制兵力的想法是不能容忍的；撤走运河东岸的坦克和削减西岸纵深三十公里地区的军队，将使埃及在那里的兵力比战争爆发之前还要弱。贾马斯断言，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增强以色列的安全和削弱埃及的安全。况且，计划中有这么多的政治成分，作为一个军人，他不是计划在计划上签字的恰当人选，101公里处也不是举行签字仪式的合

适地方，因为那里是专门讨论军事问题的场所。

简言之，贾马斯就是要使军方不同谈判发生关系。贾马斯遵守纪律，忠诚可靠，他是横渡苏伊士运河战役的策划者，他不具有他的一些同事那种热情奔放的性格，不能把他看成是感情用事。贾马斯是一位绝对可靠的人，看不出有个人野心，他显然是取得武装部队支持以达成协议的关键人物。

萨达特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听着，他的神态简直象狮身人面像。然后他问道：“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由双方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

“当然可以，”我回答说，为使他有机会同他的助手们商定出埃及的立场，我说：“你现在愿意我们离开，让你们方面单独留下来吗？”

萨达特抽了一口烟。他说，“不，因为我们，也就是你和我，首先必须就他们赖以进行工作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为此，他要求我和他进书房去。

萨达特坐在沙发的一角沉思，他问道：“他们说话当真吗？”我说，我认为以色列谈判小组不会改变以色列的军事部署线，因为它的军事部署线离战略山口西侧唯一一条南北向公路只有二百码。如果他们撤退超过了这条线，那末，除山口以内，他们就没有后勤支撑点了；我断定，以色列议会绝不会接受这一点作为脱离接触第一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各个地区的兵力限制，虽然我在耶路撒冷没有听到过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意见，但是作出某些灵活变通还是有可能的。萨达特需要决定的主要问题，就是他希望用怎样的速度向前推进。某些条件毫无疑问是可以改善的，但需要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他必须对阿拉伯世界在这段间歇期间可能发生的事情作出判断。苏联人肯定会玩弄阴谋来阻挠整个谈判。脱离接触可能在关于组成以色列新内阁的争吵中被葬送掉；这场争吵将在新议会举行历时一周的会议时开始。什么是终于可能实现

的和什么是尚待本周谈判解决的，这两者的差别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当然，萨达特知道，他不能让第三集团军再在沙漠里呆上几个月了；他也知道，涉及到我们的外交对抗将同他的改变结盟关系的想法背道而驰，而改变这种结盟关系正是他的战略的实质。

萨达特沉默了好几分钟，我们的外交活动成败未卜，看来他的沉默简直太长了。“傻瓜！”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他是不是说以色列内阁，没有马上弄清楚。“他们为什么力图羞辱贾马斯？如果我想进攻，一夜之间我就可以让成百辆坦克越过运河；如果我不想进攻，坦克再多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我回答说，以色列人提出这些条件不是想要羞辱别人，而是对良知的一种让步；那是为了证明，他们是有得有失，而所得是为了补偿所失——这就是单方面撤退到西奈（但话要说得冠冕堂皇）；那是为了平息以色列的强硬派；而首先是为了消除我早先说过的那种恼人的不安全感。

萨达特继续沉思着。随后，他令人吃惊地作出了确保谈判成功的决定。他同意以色列可以继续留在山口的西端一线。但是他不会按照以色列所要求的那样，在南部地区让出三公里给联合国进驻；以色列必须再从那里后撤一段距离。以色列不能到处随心所欲。这就是萨达特的杰作，他果敢而且深谋远虑，既可信赖但又狡猾。这个要求更多地反映了以色列国内的压力而不是军事上的分析；他反掉了对自己不利的东西，但又没有作出什么重大的让步。在这一过程中，他使美国承担了义务，要把事情搞出个结果。

关于兵力部署的限制问题，萨达特说，他不能容许别人告诉埃及，它的主要防线应当设在自己领土上的什么地方。他也不能同意以色列提出的关于军事部署区和兵力限制区的计划。对于军备的种种限制实在太复杂了。为了把事情弄得简单些，他建议只要明确划定两条线：一是以色列的军事部署线（在山口以西），一是埃

及的军事部署线(运河以东六至十公里)。在这两者之间的地区则是联合国控制区。对兵力部署的限制应当在每一方军事部署线后面用多少公里来表达。萨达特接受这样一项原则：不论是地对空导弹还是大炮，都不能部署在其射程能达到对方军事部署线的地方；作为临时安排，他决定：地对空导弹的恰当距离是在埃及军事部署线后方三十公里(或者比以色列建议的少十公里，因为以色列是从运河起量距离的)。但是，他希望贾马斯谈谈他的看法。萨达特的参谋长接受不了这一点，我应当尽力在这些距离问题上作出改进。*

关于某些特定的限制，以色列只容许埃及在运河对岸设有两三个营，这个数目太少了。萨达特倒希望有十个营；但是他表示，他愿意接受我从以色列方面求得的、同埃及的数目相差不多的最高数目。此外，他不能容忍的是，完全禁止在埃及领土上部署坦克。他的步兵是同坦克一道训练的；要是没有坦克的话，他们会感到得不到保护。他让我来确定埃及留驻运河东岸的、能为以色列所接受的坦克数量。为了埃及人的自尊心，这一点是必要的。这同样适用于大炮。在同贾马斯磋商的时候，我应当确定武器的口径和部队的数额，原则是它们的射程不得超越军事部署线。我警告说，不论是就坦克来说还是就大炮来说，以色列人都没有给我变通的余地。我怀疑他们会同意在运河对岸留驻的坦克超过五十辆。我建议，三十辆将比较有把握，要不然我可能会全部失败。萨达特回答说，只要埃及部队在埃及领土上不受排斥这个原则得到保持，他对任何数量都会表示满意。

但是，萨达特接着说，这些义务都不能直接向以色列表达。我怎么没有提出一项确定限额的美国计划呢？这样一项计划当时就

* 萨达特的设想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最后同意的脱离接触图中，见第五二九页。

可以由他和果尔达·梅厄签署的。至于政治条件，他准备写信给理查德·尼克松说明他的打算。我们想通报谁就通报谁。他不能接受一项有关清理和重开苏伊士运河的正式义务。但是他可以告诉我们的，如果他能按自己的决定去做——如果以色列不再提出要求——一旦双方的军队到达了脱离接触协议所规定的线，他将开始清理运河。正式结束交战状态是不可能的；那将会在阿拉伯世界造成爆炸性局势。但他可以承担遵守停火的庄严义务。

他问我有什么意见，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恰恰就在十一月份，萨达特做出了奇迹，他撇开一切枝节问题，而抓住重大问题加以处理。核心的部分是：萨达特同意以色列可以暂时留驻在有战略意义的山口，以及他提出的有关兵力限制的独创性设想。其余部分大都是摆摆样子的。他和果尔达都知道，以色列在近二十年中第一次自愿大举后撤，这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引起双方大动感情的那些细节部分，从根本上说是第二位的；如果和平进程能够继续下去，那么在脱离接触第一阶段结束时，双方部队的确切位置在什么地方将变得没有多大关系；如果和平进程中断，那就将出现新的紧张局势。而最重要的是，脱离接触协议将标志埃及从依赖苏联转到同美国结成伙伴关系（用萨达特的话来说）；因人们看到这种局面是由于美国的建议而出现的，它将在和平进程中给我们以重要的本钱，从而进一步推进这一进程。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一般协议具体化。在我们同助手们一道开会之前，萨达特把贾马斯叫了进来，对他说：“基辛格博士和我已经就如何继续磋商以便达成一项协议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贾马斯，将由你在协议上签字。”——这样，甚至不等贾马斯获悉这项协议，萨达特就打消了贾马斯提出反对意见的任何想法。他用这种方式履行了一项只能由领袖而不能由别人代为履行的职责：他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当我们在会议室再一次隔案对坐的时候，我问萨达特：“我不是应当把我们在会谈中达成的谅解归纳一下？”后来双方对话的情况比任何描述更能说明取得突破时的气氛：

萨达特：请吧，你是够精明的。

基辛格：但我还不象你那样明智。总统和我不但讨论了一些技术性条款，而且还探讨了究竟在日内瓦动作快一点好还是慢一点好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如果在日内瓦制订技术性条款，那可能好一些，但我们认为动作快一点是有好处的。

这就是我们的估计。

埃及的军事部署线保卫着埃及；以色列的军事部署线并没有保卫以色列。因此，要埃及人把他们在埃及领土上的防线后撤，这从政治上说是埃及人不能接受的。我必须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据。

因此，我准备把我过去从未听到过的想法带回到以色列去，这个想法就是放弃各地区之间的所有这些差别。以色列部队将退到这条线，埃及部队将退到这条线，而埃及的军事部署线在这里划定——这样就不需要埃及后撤。因此，我们不是以撤退这样的措辞来叙述我们所要求的限制，而是以埃及军事部署线、运河和以色列军事部署线之间的距离来叙述这些限制。

萨达特总统谈的第二点就是，埃及很难在一项对自己领土上的兵力加以限制的文件上签字。

萨达特：很对。

基辛格：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例如给总统们写信等等。总统有了一个应当予以探讨的想法时——我们就应给萨达特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写信，提出某些限制建议。这样，它对彼此都不是一种义务。

萨达特：这是美国的建议。

基辛格：而且这并不表明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谁。

工作小组应当准备两个文件：一个是在 101 公里处签订的协议，一个是美国向双方提出的、对某些限制问题作详细说明的建议。附带说明：我不知道以色列将有什么反应。可以在埃及—以色列文件中声明，两个地区将有限制（不详细说明），而所有其他限制可用距离埃及军事部署线多远的方式来表达。

关于限制，总统认为运河东岸的兵力应大大超过以色列建议的数量。这一点在文件中应当空出来；我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但我知道我作不了决定。他现在不准备接受不部署坦克的意见。

萨达特：很对。

基辛格：这样，总统和我都同意这样的主张：在这些从地理概念上说的地区内，都不应当部署射程可以达到对方防线的武器。埃及防线一侧三十公里和以色列防线一侧三十公里的地区内都不应当部署大炮和地对空导弹。

我提醒总统，据我所知，这个建议几乎可以肯定是会被公之于众的。

萨达特：不是由美国方面公之于众。

基辛格：我不愿使埃及处于难堪的境地。但是，以色列决不会不以某种方式在他们的议会等场合予以宣布。……接着，我把以色列人的要求告诉总统。

萨达特：政治要求。

基辛格：是政治要求。我们撇开关于外国军队和志愿人员的要求不谈。我们撇开关于以色列船只通过运河的要求不谈，也不谈关于民航飞机飞行的要求。关于曼德海峡，我们一致同意，由总统就埃及军队的行动给我写一封信。

我们从技术角度就部队部署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我还告诉萨达特，我准备把我计划中的大马士革和安曼之行推迟到谈判结束之后。这似乎使他感到很大宽慰。我们现在有足够的信心可以为完成谈判而安排进程：

基辛格：我可以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吗？

萨达特：可以。

基辛格：我的建议是：我现在就同我的同事会晤，由我们准备两个文件，然后在下午四时三十分把文件提交给你，我们计划在晚上八时三十分离开这里；我现在就通知以色列，我计划在晚上十时四十五分到以色列，明天晚上回到这里。

他们可能需要一天多的时间来考虑建议；他们需要召开一次内阁会议。因此，我可能在星期三回来。这个日期对你没有什么不方便吧？

萨达特：没有，没有什么不方便。

基辛格：我可能还得再去以色列一趟和再来这里一趟。因为坦克问题和界线问题上的争议还没有解决。

西斯科：我们向报界说些什么呢？

基辛格：我想我们现在不必说什么。但是我们都同意，到一定时候我们应当说明：“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场艰难的谈判。我有一幅现在就要拿到以色列去的埃及地图。但是，今天我们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我对将要取得的进展抱乐观的态度。”这样，那些反对达成协议的人就不会以为谈判濒于破裂了。我现在担心的是，这里参加会谈的将军没有解决同那些在此间（埃及）的北朝鲜人通话的问题，他们是会把我从飞机上打下来的。（笑声）

萨达特：他们离这里很近。（笑声）

基辛格：你们用什么语言通话？

贾马斯：用朝鲜语。（笑声）

萨达特：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让西斯科去试一试。（笑声）

四小时的会谈结束了，就象开始的时候一样，大家又和西斯科开了个玩笑；这是双方喜爱这位一向乐观的助理国务卿的一种表示。他的才能和经验大大帮助我们取得这样巨大的进展。

当天下午五时以后，埃及和美国的工作小组在新大瀑布饭店凹形餐厅用帘子隔开的一角会晤。埃及人对萨达特的决定感到不高兴。法赫米滔滔不绝地发言；贾马斯闷闷不乐，态度冷淡。但是，他们都是杰出的专业人员。既然萨达特已作出了决定，事情进展就迅速了。贾马斯发现有一种可以部署在运河东岸的大炮，它们的射程达不到以色列的防线。这就是射程为十二公里的一百二十二毫米的榴弹炮。我答应在耶路撒冷提出来加以研究。贾马斯对运河西岸的对空导弹的后撤特别恼火；他说，作为一个军人，他除了制定后撤二十五公里（或者比以色列要求的少十五公里）的计划以外，不能再做更多的事情。如果以色列继续坚持，萨达特将不得不另作决定。西斯科和我已经为埃及草拟了要求双方加以接受的关于武器限制的“美国建议”。我们还逐行地研究了这两个文件。贾马斯和法赫米在晚上六时四十分离开会场，把草案送呈萨达特。再过一会儿，当我赴机场途中在萨达特寓所停留的时候，他将把他的意见告诉我。

晚上七时十五分，我再一次在萨达特别墅的书房单独同他会晤。他已经审阅了同贾马斯和法赫米一起制定的文件草案。我应当尽力而为；我现在已经知道埃及方面的要求；他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在本周内达成协议。他已经对我提到的以色列要把条件（特别是关于拟议中的兵力限制条件）透露出去一事作了考虑。如果在

协议签字之前就把条件透露出去的话，那么他将不可能继续这一进程；如果是在他完成了对各阿拉伯国家首都的访问后才透露出去，那他愿意承担这些条件；如果是由以色列议会秘密会议透露出去，他愿意表示理解。他将尽量在心理上使以色列放心。他将允许美国每两周派飞机在脱离接触地区进行侦察，要是双方都得到侦察时拍下的照片的话。他对以色列的一项要求提出了灵活的解决办法，以色列的这项要求是，要他承诺在运河区重新安置居民（以色列把这一点看作是他表示要实现和平的一种保证）。他不能就重建运河沿岸的埃及诸城市这样一个显然属于埃及权限以内的问题向任何一个外国、甚至美国政府作出什么保证。但是，他可以绕开这个问题，办法就是要求我们（美国）从以色列方面得到保证：不袭击这个地区的居民点——这种保证只有在决定恢复运河区正常生活这一前提下才有意义。

萨达特再次急切地向我表示他渴望摆脱苏联。他反复说明，他打算把苏联的侦察机从埃及领土上赶走，并中止一九七五年同苏联签订的友好条约。他谋求同美国建立牢靠的联系；他愿意为将来的合作开始交换意见。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同诱使美国压以色列作出让步的战略相一致的。萨达特身为总统，他必须为埃及利益而行动。他懂得同美国和解和同以色列媾和是实现埃及目标的最好办法；这表明他不愧为一位有远见的人。

穿梭告终

在离开了一天多一点的时间之后，我们于一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十一时到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我们启程时，天就开始下雨，这时天雨如注，势头变得更加猛烈。这一来，我们无

法按照以色列人的建议，为加速行程而搭乘军用直升飞机前往耶路撒冷。我并不是不择场合一律都迷恋乘坐直升飞机的。在那些日子里，新的公路还没有竣工，从本—古里安机场乘汽车到耶路撒冷远不止花一个小时。这倒使埃班和我有机会回顾这场游戏的目前状况，虽然当晚我们决定把某些关键问题留到耶路撒冷讨论。迪尼茨将在那里参加我们的讨论，他不仅是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还是果尔达所信赖的心腹。

在大卫王饭店第六层我租用的那套房间里，我们三人检查了我们工作的现状。迪尼茨和埃班一反过去把任何让步都视为以色列所理应获得的基本原则，承认他们对于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巨大的进展感到惊喜。他们俩是自由自在的民主制度的产物，对于集权更甚的制度下可能产生的千姿百态，他们还没有掌握理解的要领；而作出这种姿态正是萨达特的特色，后来还一次又一次地使他们吃惊不已。当我提到驻防运河对岸的坦克是三十辆这个数字时，迪尼茨情不自禁地问：“你是说他一开头就没有要求驻防三百辆？”萨达特通常不讨价还价。他一开始就说出自己的真正立场，以后极少变动；在这一点上，同周恩来一样，此外他俩便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我在耶路撒冷没有强调萨达特策略的这一方面，否则我的谈判对手们——在他们看来，萨达特仍然象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人物——会指责我不够清醒，把萨达特在谈判开始时所持的立场看低了。随后，以色列谈判小组要通宵讨论我的报告，并在第二天早晨让我知道他们的反应。这样，我可以在第二天晚间回阿斯旺去。

我在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十五个小时的连续谈判后，向尼克松总统作了汇报。我也通过斯考克罗夫特向多勃雷宁作了通报。我告诉多勃雷宁，事情正在取得进展；然而我再次避免触及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发给英国、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长们的

通报中也未具体提及。我不愿招惹欧洲重提它在早些时候提出过的倡议，因为它会葬送掉现时尚不可及但已经可望的协议的。

星期二早晨我一醒来便看到斯考克罗夫特发来的电报。他根据前一天夜间我发给尼克松的报告，敦促我切不可不反映总统曾参与其事便缔结协议。这就是说，在斯考克罗夫特和黑格看来，我必须回华盛顿，从总统那里领受其某种广为宣扬的指示，然后再完成谈判。可是这是办不到的。要是我离开这个地区三天——至少需要三天时间——正在形成的脆弱的妥协很可能就此瓦解。以色列的新议会五天后将举行会议，它也许要迫使政府就限制军备部署问题发表声明，而萨达特说过，过早公布此事会妨碍他签字。这样一来，萨达特或是不得不推迟周游阿拉伯世界的旅行——这将被认为是自认失败；或是不得不花言巧语一番，说他保留着自己的选择，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僵局。在以色列，整个谈判将被淹没在那时就要开始的成立新内阁的煞费周章的过程中。在大众面前，我的离去可能会被说成是出现僵局的证据。总之，离开这个地区风险太大。

我把答复推迟了，等到从以色列政府方面得到反应后再说。那个星期二早晨，迪尼茨带着好消息来我这里共进早餐。他说：以色列的态度是基本赞同；我必须记住这一点，因为毫无疑问，以色列谈判小组将照例给我来一个彻底讨论。这种提醒是有益的，因为当我一小时后在总理府会议室里会见我们的以色列谈判对手时，阿斯旺那边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谁也无法得知。迪尼茨的预言果然不错，我们的以色列谈判对手们就这个问题的一切技术方面都对我们进行了无情的盘问。*萨达特要求得到的南部区区几公里地方，突然被夸大成为埃及的一个诡计，它将使埃及通过一条十分之九仍将为以色列所控制的公路，从侧面包抄米特拉山口（位于东北方六十公里左右处）的以色列军队。但是，前几次会议上的那

种紧张气氛和近乎歇斯底里的情绪分明已经消失——这也许是由于迪尼茨已经使我放心的缘故。事实上，以色列谈判者发问的用意不是为了使我难堪，而是为了从我嘴里得到某些回答来对付他们满腹狐疑的内阁同僚和满腔敌意的议会反对派。他们是在寻找使协议得以批准的托辞，而不是有意破坏协议。

上午十一时半，以色列谈判者开始自己磋商并晋见果尔达；我则到附近一座山上的以色列博物馆去参观。下午二时，我们在外交部长的宅邸重新聚首共进午餐。以色列谈判者认为，在社交礼仪上花费时间，是有负于人们对他们的重托的行为。难怪阿隆在宣布会议开始时便这样说：“先生们，既然汤很烫，我们可以开始工作了。”如此急不可耐的原因是他们急于要宣布以色列小组已经赞成来个突破：

阿隆：总的说来，我们必须说你对耶路撒冷和阿斯旺的访问取得了巨大进展。我们将向你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我们想，你会认为它们是合乎逻辑的。在我们看来，没有理由认为星期五不能在101公里处签字。我们所接受的是，我们接受地理概念。（笑声）

基辛格：这是巨大的胜利，使以色列接受它自己的建议。（笑声）

阿隆：但是在南部地区，我们的参谋长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

* 以色列谈判小组通常由果尔达·梅厄总理率领，然而这时她正在家里养病，因此由副总理伊加勒·阿隆主持。辅佐他的是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国防部长摩西·达扬、驻美大使西姆哈·迪尼茨、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将军、总理办公厅主任莫德凯·加齐特、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亚伯拉罕·基德隆、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伊弗雷姆·埃夫龙，以及达扬的助手阿伊·巴龙。在美国方面，辅弼我的有尚未上任的副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无任所大使埃尔思沃斯·邦克、国务院法律顾问卡莱尔·莫、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肯尼思·基廷、助理国务卿帮办艾尔弗雷德·艾瑟顿、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哈罗德·桑德斯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彼得·罗德曼。

们将设法采取相应的行动。

基辛格：好的。

迪尼茨：不过不是南下。（笑声）

达扬：姑且设想我们在主要战线上南移——我想我们会这样做的——不过我们撤离的地区应该由联合国而不是由他们来接管，他们则保持他们现在驻防的全部地方。

迪尼茨：他们也要移动。

基辛格：不。

达扬：他们将留在原地不动——变动的是我们的地图。要是我们不后撤的话，联合国就没有立足的地方了。

基辛格：考虑到他们的思想状况，这首先是有益的。从心理上说，哪怕你们只让给他们一公里也是有益的。

阿隆：我们的埃拉扎尔将军到总部去了，他在研究这个问题。

基辛格：好。

阿隆：关于营的数目问题我们内部也有争论，因为当初我们说两至三个营时，我们是算数的。要是你能够以五、六个营求得问题的解决，你将得到本—古里安奖金。

基辛格：六个营行不通。

阿隆：如果他们坚持十个营，而我坚持六个营，最后也许就是八个营。

基辛格：也许。不过也许是九个。

阿隆：不行。

迪尼茨：伊加尔可不会主张这个（八个营）。

基辛格：我们不能这样干，因为这件事拖得太久的话，他们的顾问们会转而反对它的。

这个问题一解决，一切都落实了。我们同意设法把限额定为

八个营和七千人。我的谈判对手们力劝我对萨达特先以更低的数目相试。但是我确信自己是深知萨达特其人的；如果我们开始时便讨价还价，结果会适得其反。在达扬的推动下协议达成了，允许开罗在运河东岸保留三十辆坦克，条件是埃及最后答应把它的地对空导弹撤离军事部署线三十公里（这意味着以色列在原来的建议上作了十公里的让步）。在其它问题上，以色列人接受了萨达特的分区要少的设想和基本协议的总梗概，这项基本协议附有关于部队限额的一项单独的“美国建议”和关于其它问题的函件。以色列放弃了结束战争状态的要求；只要使用摒弃“敌对”行动这样的措词，它就不再纠缠了。（这一个提法后来随着谈判的进展进一步冲淡了。）

有人试图把协议的圆满完成同拘留在叙利亚的以色列俘虏的释放问题联系在一起。我着重指出，这将在无意中帮助阿萨德；既然他并不真正愿意看到人家签订一项有关在埃及脱离接触的单独协议，他自然更加不愿意作出努力来释放俘虏。他将提高要价，从而可以对埃及和以色列两国都进行讹诈。而萨达特一旦在以色列（还有美国）的行动的驱使下同叙利亚拴在一起，就只能全力支持某种在叙利亚影响下可能日趋激进的方案，而无其它选择的余地。使得拘留在叙利亚的以色列俘虏得到释放的最好办法，便是迅速完成目前的谈判。可以把叙利亚急于效法的心情当作杠杆加以利用来促成俘虏的释放。于是这项建议被撤回了。

下午四时，我在果尔达的宅邸拜会了她，把协议的文本和含义给她讲了一遍。这件事我在当天已对她的同事讲过两遍。果尔达忧心忡忡，而且正在生病；这毕竟是以色列自一九五六年以来的第一次后撤。

会见一结束，艰苦的工作便开始了。以色列内阁在下午五时半开会讨论谈判小组的新立场。回到大卫王饭店，我和我的谈

判小组要根据当天的讨论重新起草协议和“美国建议”。有一项到处都适用的谅解备忘录是我们用来向以色列明确说明我们对具体条款所下的定义的。此时此刻，我们对成功已有足够的信心，于是我们着手起草将由尼克松代表各方向对方转达的保证了。虽然这些保证从技术上说只是各方自己的声明，但是它们却必须在双方首都核实，以确保合乎要求。晚上十一时，达扬、埃拉扎尔、迪尼茨，后来还有埃夫龙，都跑来核对军事条款，并且报告说，内阁持基本肯定态度，尽管协议的最后批准要等我下次访问以色列时再说。到一月十六日（星期三）凌晨二时四十五分，我们这场历时十九个小时的马拉松谈判结束了。

现在剩下的事就是打电报给华盛顿，说明现在把我叫回去可能会使整个脆弱的结构解体。有关方面一定会把它解释为美国方面遇到了不祥的障碍。假如对真正的原因加以说明，随后又被泄露出去（由有关方面的任何一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泄露出去），那么，我的回国便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了。因此，除非我接到相反的确切命令，我将继续留在这里，以便在谈判中断之前有机会进行另一轮穿梭外交活动。如果协议达成了，尼克松当然能够在白宫予以宣布。此后，华盛顿便不再有要我早日回国一说了。

星期三上午七时半，我和我的同事们不知第几次又把文件审阅了一遍。八时三十分，我们又和以色列谈判小组一起研究了一遍。十时三十分，我们离开耶路撒冷前往本-古里安机场，由于暴雨下个不停，我们再次搭乘汽车。幸亏埃班是位饶有风趣的伙伴，否则驱车去机场的长途旅行真会叫我闷得难受。上午十一时四十分，在起飞前的一刻，达扬把一份经过修订的南线地图送到我的飞机上，地图上勾出了要我奉献给萨达特的以色列人的另一处后撤地区。在飞机上，我自豪地陪同埃班和达扬参观了我的旅行办公室。我们在飞机的后舱同记者们交谈。我开玩笑说，埃班对客观一

词下的定义便是百分之百地与以色列的观点保持一致。按照这个标准,我是大为逊色的,因为我只给了百分之九十五的支持。埃班若有所思地谈到能够呆在飞机上飞往阿斯旺该有多好;他和他的夫人毕竟曾于一九四五年在旧大瀑布饭店度过他们的蜜月,而今天,埃及却似乎遥远得难以前往了。当埃班离开飞机时,我回想起跟他美丽而迷人的妻子苏西所作的一次交谈。记不得是哪一次吃饭时,她告诉我,她到过的国家多得连自己也记不清了。我问她:“那末你最喜欢哪国人?”那时正是以色列同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发生的某次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她却说:“埃及人。”这使我感到惊讶,因为那时候埃及被视为以色列的大敌。原来她是在伊斯梅利亚出生并长大的。

我们几天来、几周来所做的努力,归根结底就是看在经过二十年的战争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某种联系能不能最终得到恢复。我在我的告别声明中就表达了这个意思:

我们大家当然都希望,我们所投身的这个进程,将导致达成一项也许可以标志着中东事务已出现转机的协议。而我作为风尘仆仆于开罗和以色列之间的一方,请允许我发表一点个人的见解。这就是说,在我看来,双方都具有的那种公道的正义的精神,以及双方本着这种精神设法就军队脱离接触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达成谅解的那种富有建设性的积极态度,乃是最有希望的迹象之一。如果这一精神得以保持,这个灾难深重的地区就有希望最终得到和平。

就这样,我们不顾寒冷冒雨起飞,前往埃及举行谈判;按理说,这将是最后一轮谈判了,要是签字仪式在一月十八日(星期五)举行的话。因为现在已是星期三中午时分了。我必须在这轮谈判中把一切事情都办完,或者接近办完,只留下可以通过电报来解决的问题。

下午二时十五分,我们在阿斯旺着陆。十五分钟之后,我们

到达萨达特别墅的凉台。沙地反射着耀眼的阳光。从凉台眺望，座座沙丘横亘在尼罗河畔半透明的天空下，景色如画。萨达特和我立刻走进书房。法赫米和西斯科守候在外面的花园里，不时应召前来和我们一起磋商草案中的问题。我审阅文件时，他们伫立在侧。

我一开始便应达扬所求，提出埃及在运河对岸驻扎六个营和四千五百人的方案。但是，既然我知道以色列谈判者愿意接受八个营和七千人，我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并未花费太多的力气。我把着重点主要放在以色列真正关心的地方，也就是埃及应该把它的地对空导弹从军事部署线后撤多少公里——贾马斯最执拗的地方可能就在这一点上。贾马斯曾经要求以二十五公里为度；以色列则要求不少于三十公里（从原先的四十公里减了下来）。我对萨达特说，这是以色列的真正主张，不是仅仅用来讨价还价的。萨达特最后向我交底说，他最终将接受这个数字；不过，由于他从未见过贾马斯如此激动，我应该为缩短距离再作一次尝试；如果以色列予以拒绝，我可打电报给他；这不会妨碍协议的达成。调解人的有用之处在于，他一旦得到双方的信任，就可以把争论逐渐缩小，为事关重大的问题提供调停的途径。

审核这种保证没有多大困难，但是很花时间。萨达特不愿在他认为纯属内政的一些问题上——例如重建运河区——作出保证。但是他采纳了我在继承并发展了他四十八小时以前提出的一项建议的基础上所起草的一项倡议：由尼克松致函萨达特，说他“了解到”埃及有意清除运河中的障碍物，并且期待着这个地区“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美国方面将“竭力劝阻”以色列袭击人口密集的地区。萨达特要求把这一节改为“向您保证”以色列将不做这类事。我同意取消这个隐患。

其它保证也都符合要求，虽然法赫米总不免要吹毛求疵一番。

萨达特同意美国可以随时在联合国驻区上空进行侦察飞行，而不是按他曾经建议的那样每两周一次；不事前安排飞行时间表将使双方难于不履行协议。萨达特还同意不干扰以色列民航机南下红海的飞行；这是耶路撒冷所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是它通向非洲的唯一民航路线。至于消除苏伊士运河中的障碍物，萨达特表示，当他决定应否迅速完成这项工程时，将考虑我们的战略所好。*

会议在下午四时四十五分结束。六时，贾马斯、法赫米和埃及方面的三个助手同邦克、西斯科、莫、罗德曼和我在新大瀑布饭店的餐厅里会晤。我们再一次审阅了全部文本，设法把稿本最后定下来。这项工作贾马斯身上惹起了麻烦。有一次他走了出去，抱怨说这正在变成一纸政治性而非军事性的协议；不多时他把它想得好一点了，于是又回到了屋里。但是他继续为地对空导弹的后撤应以二十五公里为限度而苦斗了一番，这是因为他免不了要向军队解释为什么在打了胜仗之后导弹部队还要后撤的理由。正如他向我们小组哀叹的那样，他对埃及老百姓好解释，“但对我们的武装部队却不好解释”。他指出，那时候埃及在运河的那一边有五个加强师，可是“明天（那里）却只有七千名士兵了”。更糟的是，埃及在西岸地区的空防必须撤走，“这在心理上将对我们的武装部队产生恶劣的影响”。

不过贾马斯既是爱国者，也是一个正人君子。我提议给他出具书面保证，担保以色列在协议缔结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无条件地为第三集团军开放补给路线。贾马斯回答说：“我不要什么信件。你口头答应就行了。”他坚持埃及有权在东岸地区部署几个榴弹炮

* 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是否更有利于苏联（不然的话它南下印度洋便须绕道而行），在美国是有一番争论的。美国政府中的一致意见是，由于埃及转向和平并从而转向西方，苏联遭到的战略上的挫折要远远超过它的所得。

和迫击炮连。我明知以色列会接受这一点，但是在这轮谈判中我暂不让步，以换取他们对地对空导弹的限制的同意，因为就我所知，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极其强硬的。

下午八时，法赫米陪同我去见萨达特。总统把我单独请到他的书房。他已得悉贾马斯因愤愤不平而发作过，于是谈吐充满着哲理。“我的部队！”他若有所思地说，“当初说服他们去打仗有过困难，现在劝说他们缔造和平也有困难。”他是决心走下去的；各种部署计划之间的差别现在已缩小到鸡毛蒜皮的问题上了。我应该根据我对双方的敏感性的了解尽力为之。他说他已考虑过我一再提及的以色列的不安全感问题。作为亲善的表示，我可以通知果尔达·梅厄，他将不行使在运河彼岸保留三十辆坦克的权利。埃及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部署大型武器，这是一个根本原则；现在原则既已确立，他将不去使用。接着，他戏剧性地要求我捎一封个人信件给果尔达。他当场口授起来；这是二十六年来一位埃及政府首脑第一次直接给他的以色列对手写信。信中说：

请你务必认真对待我的话。当我在一九七一年提出我的倡议时，我说话是算数的。当我扬言要进行战争时，我说话是算数的。如今当我谈论和平时，我说话也是算数的。

我们之间过去从未有过接触。现在我们有基辛格博士从中协助。我们应该借助他，通过他进行对话。

写完这封信后，我们便分手了。在谈判取得成功或在最后一秒钟宣告失败之前，我将不再见到他。因为我们现在离终点不远了。埃及必须同意把它的地对空导弹再后撤五公里；以色列需要同意埃及在运河东岸部署一些榴弹炮和反坦克炮。此外再没有什么阻碍了。

我们在一月十六日（星期三）深夜冒着倾盆大雨回到以色列。

从午夜到翌晨二时，我们同埃班、迪尼茨和埃夫龙会晤，向他们通报情况。我和我的工作人员花了几小时的时间校核了全部文件。接着我们起草了一项供尼克松宣布谈判大功告成的声明。后来，星期四一早，我打电话给黑格，把尼克松也许能够在当天的最后时刻在电视中露面的好消息告诉他。

我们睡了四个小时，醒来时雪片飞扬。气温骤然下降，暴风袭来，耶路撒冷降下了数十年来的第一场大风雪。耶路撒冷的一切活动都停顿了。从大卫王饭店第六层我的那套房间朝窗外眺望，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旧城的石砌建筑和城墙，远处地平线呈现一片灰色，橄榄山掩映在苍茫的白雾中。这是一幅引人入胜的景色，一幅太平安宁的景色。

现实打破了我的幻想。我和果尔达约定的会见不得不取消，因为无法前往她的住所。我实在不愿去想象，当从未见过暴风雪的阿斯旺听说事情有所耽搁，而其理由竟是以色列政府所在地交通断绝时，它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来。达扬前来援救。他派吉普车和载人车把以色列谈判小组的人员送到我住的饭店房间，上午九时二十分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会议。正如任何谈判的最后阶段都必然会遇到的那样，以前也许花不了五分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时竟为最后斟酌而大费周章。到中午时，我们实际上已同意由我发电报给萨达特，请他接受地对空导弹后撤以三十公里为度的规定（我认为他会接受的）。与此同时，以色列谈判小组要把埃及方面在运河东岸地区留驻三十辆坦克和六个榴弹炮连的要求提交内阁最后批准。达扬针对萨达特的担心，想出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点子，这就是关于兵力的限制在协议签署之前不得泄露，事后泄露出去最好也通过以色列议会的一次秘密会议。议会没有秘密会议可言，于是大家同意把有关条款通报给防务和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这些有关条款泄露出去了。萨达特为什么要采取这一

套办法，他没有向我披露。也许他觉得举行秘密会议一事会表明以色列对埃及武装部队的敏感是有所察觉的。)中午时分我们完成了任务。“这是一项好协议，”我说。

“这项协议不坏，”阿隆说。

“在希伯来语中，不坏是‘好’的意思。”埃班这个外交家解释道。

午后十二时三十五分，我乘坐一辆以色列军车出发，在十二英寸厚的积雪中滑行着，总理需要亲自听一遍我对谈判小组讲过的话，因为据我所知，尽管她在病中，她要亲自主持批准协议的内阁会议。这是令人放心的消息。我深信这是成功的保证；她曾经坚定不移地捍卫过她的国家的利益，现在她将以同样凶猛的劲头为协议的批准而战斗。我向她宣读了萨达特的个人信件。“这是件好事，”她言简意赅地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在经历了一代人的冲突之后，人们是不会轻易相信对手的诚意的——何况这位对手还以突然袭击挑起了这个把我们全都卷入的进程。

眼下什么事都没有了，唯有等待了。有果尔达主持工作，主要的未知数就是她的同行们或许将为进入新内阁你争我夺，四天以后议会要举行会议，新内阁可望随后成立。虽然我们凭推理对许多事是心中有数，我和我的同事们仍然忐忑不安，担心会出现某种难以逆料的障碍。我给法赫米打了电话——通过华盛顿——说以色列方面需要举行另一次内阁会议，我指望在当地时间下午五时许得到他们肯定的答复。我抱着这种紧张的期待心情对以色列总统伊弗雷姆·卡齐尔——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作了一次礼节性拜访。

后来，在下午三时五十五分，埃班、迪尼茨和埃夫龙带着好消息来到我的旅馆寓所。

埃班：内阁已经批准这项协议。我们将发表一项声明。

基辛格：你们想说你们批准了迄今为止的谈判成果，技术方面的问题还待以后阐述清楚。

埃夫龙：他们已经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政府一致授权总理把决定通知国务卿，但是还有一些技术性问题尚待解决。但愿开罗的人不致神经过于紧张。

基辛格：他们的神经会十分紧张的！

不过所有这些技术性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已经解决了。迪尼茨叫人拿来了香槟酒，埃班以那种典型的永不满足的以色列方式为协议祝酒，在互致祝辞的同时要求得到保证。

埃班：我们应该为协议干杯，为缔结一项和平协定干杯。

基辛格：这至少开辟了同埃及建立新关系的可能性。

埃班：你说它有可能成为转折点。

基辛格：是的，有可能。

在同一时间，羁留在埃及的艾尔茨大使和哈尔·桑德斯在为萨达特校核最后文件。晚上七时整，我们获悉萨达特已草签了有关限制军队的“美国建议”。（“草签”是一个技术性的外交词汇，意思是协议的文本在签署之前处于冻结状态。实际上是说，“要我签署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个文本。”）我和西斯科又干了一杯香槟酒。

耶路撒冷当地时间晚上九时（华盛顿时间下午三时），尼克松总统踌躇满志地走到记者团面前，向他们作如下的事前已得到埃及和以色列赞同的宣告：

根据日内瓦会议的决定，在美国政府的协助下，埃及和以色列两国政府

已就双方军事力量的脱离接触和隔离达成了协议。协议定于一月十八日星期五埃及和以色列当地时间的中午在开罗—苏伊士公路上的101公里处由埃及和以色列的参谋长签字。双方已邀请联合国紧急部队司令西拉斯沃将军连署。

最后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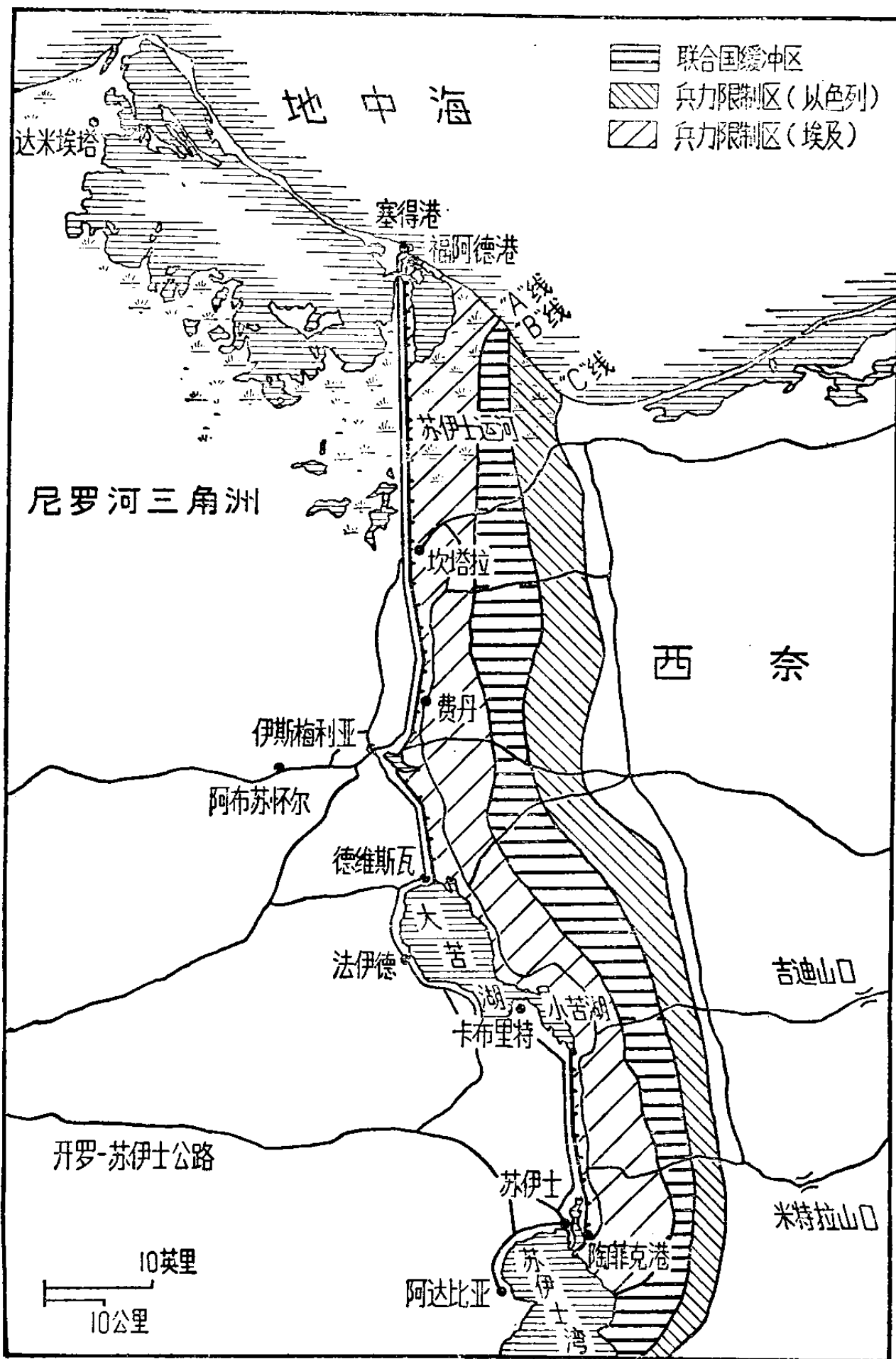
随着谈判终结而来的欢腾雀跃很快就被为了最后完成协议所从事的繁琐细屑之事压倒了。美国谈判小组承担了向签字仪式提供官方文本的责任。*文本用打字机重打了一遍以反映最后作出的更动，国务院法律顾问卡莱尔·莫被派去出席签字仪式。这位七旬高龄的纽约律师界显赫栋梁穿得严严实实，在大卫王饭店外面坐上了一辆半履带式的以色列敞篷军车，冒着暴风雪前往特拉维夫，一架以色列飞机从那里把他送到塞浦路斯。埃及将派一架飞机到那里去接他，然后由一辆参谋本部的车子在第二天上午把他送到101公里处。哈尔·桑德斯将军在那里同他会合。

规定双方战线后面兵力限制的“美国建议”，包含在尼克松致果尔达·梅厄和萨达特的信件中；在建议上签字就是接受这项计划。**此外，还有好几封总统致双方的函件，内容包括诸如水道通行和运河沿岸城市重建等方面的保证或意向声明。还起草了关于如何实施这些协议的指示，发给我们的大使——驻以色列的基廷和驻埃及的艾尔茨。

在华盛顿，凡事都必须作广泛的情况介绍才算最后告成。如果有什么好消息的话，那么政府所热衷的莫过于此了。这就迫使我那精疲力竭的工作班子起草了另一批包含有详尽指示的电报。布

* 脱离接触基本协议的文本请见章末注⑤。

** 萨达特总统和梅厄总理签署的“美国建议”请见章末注⑥。



埃及—以色列脱离接触协议，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协议文本见第五四八页)

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要在协议宣布之前向主要国会领袖通报情况；他还需把最新情况告诉多勃雷宁，并把基本协议文本交给他。他也得向我们的主要北约盟国和中国人通报情况。要草拟的文件太多，而时间又很有限。但是紧张感已经消失；这项工作是轻松愉快的。

尼克松总统——还有福特副总统，打电话来祝贺。（兴高采烈的尼克松还给萨达特和梅厄夫人打了电话。）临近半夜时分，我在一片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给随行记者吹了风。他们尽管怀有职业性的愤世嫉俗态度，但还是对自己能够参与这一事件的报道颇为满意，这在他们看来，是一个能够为他们国家增光的历史性事件。

星期五一大早，我再次穿越雪锁冰封的耶路撒冷街道去拜会病中的总理，并请她在“美国建议”上签字。我对她一直抱着亲切友善的态度。她使她的国家在严酷的危机中始终保持着团结，不惜有时得罪唯一的友邦。她从本能上强烈反对谈判，只是出于不得已才勉强参与这一进程。但是，对于应该在什么时候，以一种足以显示以色列在和平时期也能象在战时一样掌握自己命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来缔结一项协议，她是一清二楚的。果尔达在摄影机前面签署了限制兵力的文件。她私下里把她对萨达特两天前来信的友好的书面答复交给了我。此时此刻的宽慰乃至兴奋情绪，在对记者团发表的谈话中反映了出来，这些记者簇拥在果尔达小小的起居室里，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对我来说，这是那些使得疲于奔命的外交活动不致徒劳无功的事件之一。果尔达在经过长达数月、有时十分激烈的争论以后，也微微流露出了宽慰之意；她的容易动怒的仪容收敛了一会儿，显示了她的人民渴望和平——简直是醉心于和平的心情，她说：

国务卿先生，我想不仅是我们这些在场的人才认识到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我希望，这个日子是个开端，在其后的某一天，和平终将来到中东，使以

色列及其邻国都享有和平，我还希望，通向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永久和平的进程从今天起就算开始了。

如果我说您国务卿先生与此有关，这在我看来并不足以构成新闻。我们并不喜欢仅仅为使用言词而使用言词。然而我却真心实意地认为，您在本周缔造了历史。我知道您并不是在本周才着手这项使命的，这一点在我思想上并无疑问。我代表以色列人民想告诉您的是，我们是多么欣赏这一行动。

我想告诉美国总统，由于他采取了深入了解中东问题、了解以色列及其邻国问题的方针，才有了今天这个日子。我们赞赏他所做的一切、他的态度和他的努力，这将留在以色列及其人民的记忆之中。

几天之后，以色列的许许多多母亲、年轻的妻子和孩子将与他们在前线度过了许多岁月以捍卫以色列安全的亲人们见面，他们将会感到十分幸福。我们希望并真心实意地相信，有一天，军队将成为过去的事物。

我还要对您的耐心表示感谢。智慧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这是生来就决定了的，为此不值得特别赞扬。可是您的耐心、您的工作、您对双方所表现的耐心，却是值得特别加以赞扬的。我们是好说话的（笑声），但是您在另一方可能遇到过麻烦。

从以色列领导人口中公开说出的赞语是可贵的、难得的，他们不轻易说这样的话，就象难得授予国家最高奖赏一样。我致答辞说：

二十多年来，没有一国人民比以色列人民遭受过更多的苦难。没有一国人民比以色列人民更有理由期待和平了。所以，今天这个日子，这个但愿对全世界各国人民很重要的日子，对于贵国来说，无疑是格外亲切的。贵国自有史以来，还从未经历过这等在别国司空见惯的事——一个得到别人的承认、一个迎来和平的时期。

我们这些有幸和您——总理女士、和您的同事们一起共过事的人，都将设法从这里继续前进，以确保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不致成为插曲，而是作为和平来到这个世界无数伟绩的发源地的日子为大家所铭记，从而使这个地区的所有民族的才智和精力能够用于建设的征途。今天我们在这里向你们告别，

希望今后继续与你们共事，我们认为，我们仍将致力于我们的共同事业。

我现在的任务是跑到阿斯旺去请萨达特在同一个美国建议上签字。基本协议定于中午时分在 101 公里处正式签字。如果我到阿斯旺晚了，那就会象我对埃班说过的那样，造成某种“并非无趣的局面”——脱离接触的协议已签了字，因而也就生效而不能撤销了，但美国提出的载明全部有关细则的限制兵力的建议却还没有签字。

前往阿斯旺，或至少是离开耶路撒冷，实非易事。积雪封住了通往机场的道路，于是我们机灵的主人提议我们改乘火车。（老天保佑，他们没有硬要我乘坐直升飞机迎着风雪前往。）我不知道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之间还有铁路，这说明该条铁路是不太出名的。火车车厢建造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土耳其人统治时期，至少学识渊博的埃班是这样说的。虽然它们因年代久远而享有声誉，但却只不过是将就使用罢了。我们在朱迪亚山白雪覆盖的峰峦间行驶的时候，这象是恰当地为我们历时三个月的狂热的外交活动带来了一个超脱现实的结尾。

历史记叙着战斗；记叙着胜利和失败；记叙着意志的胜利——这一切都意味着，一方的欢庆就是另一方的绝望。凡是胜利的时刻很少是没有失败者的。埃班和我大声地谈着话，车轮滚滚地发出轰隆的响声，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路过的这块既领略过人们的雄心壮志又目击过人们的残酷行径的地方，准会是万籁俱寂的风景区。对于一个奋力从斗争中取得其合法存在地位的国家来说，和平对其国魂会带来什么影响呢？阿拉伯各国会真心实意接受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现实吗？双方是否都能不再耿耿于往事，并消除彼此间的畏惧心理呢？这些都是这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所关心的首要问题，在那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杂居在一起，却偏偏要从六千英里以外的地方请人来解释阿拉伯各民族的心理，因为在以色列看来，

他们原不妨远在月球的那一边居住为好。萨达特是战术迂回、目标依旧，还是意在实现历史性的转变？我认为是后者，但是谁也无法担保，更何况这位埃及总统是无法约束他的继承者的呢。以色列通过让步得到了别人的认可了呢，还是开始了自我削弱的渐变过程？等到这个问题见分晓的时候，如今登台表演的诸公也许一个也不在人间了。事实上，以色列别无他法；它不能冒不作这种尝试的风险。因为倘若犹太国要仰赖赤裸裸的武力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它在道义上的本钱一定会输得精光的。

不管怎么说，在那天上午，希望压倒了一切遐想。《耶路撒冷邮报》刊登了一幅把我比作和平天使的漫画。这与其说是表彰我的功绩，不如说是反映了这个从未过一天真正和平日子的民族的憧憬。在整个旅途中，埃班和我在火车上尽情地和快意地追忆往事，我们相信，如果有幸的话，这些事今后将作为漫长征途中最轻松的一步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一月十八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半，我们终于登上穿梭飞机最后一次前往阿斯旺。可是，我们所知道的苏联方面的行动却是蓄意对此大泼冷水。整整一个星期来，我们听说苏联人由于自己被排斥在这场外交活动之外而愤愤不平，对于开罗尤其恼火；而且他们还认为我们为了包办代替，已使日内瓦会议瘫痪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在散布空气，说什么让莫斯科参与谈判原会加强开罗的地位；他们还给脱离接触一事抹黑，说这是以色列的胜利。还有某种弦外之音，说只要莫斯科被排斥在谈判之外，它将拒绝使叙利亚的立场变得温和。

与此同时，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报告，勃列日涅夫已写信给尼克松，抱怨说：

苏联和美国代表在日内瓦同阿拉伯和以色列代表们一道积极参加解决中东问题关键事宜的讨论的谅解，实际上没有得到贯彻。特别是苏联和美

国代表共同参加武装部队脱离接触问题的计议一事发生了问题。

勃列日涅夫建议由葛罗米柯和我于二月七日至八日在日内瓦会晤，

从我们之间已经同意协调两国的努力以谋求这个地区问题的和平解决这一观点出发，分析中东地区实行停火以来所发生的一切。

苏联人对埃及的怨言以及勃列日涅夫的信件最清楚不过地使我们感到，如果我们当初竟是通过日内瓦这一渠道来从事这项工作，那会出现怎样的情况。莫斯科也许会采取我们无法加以支持的极端立场。他们会对阿拉伯各国施加压力（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维护阿拉伯利益方面又不堪显得落后于它们的苏联发言人），并且企图迫使埃及割断同我们的联系。因此，在目前埃及和以色列军队正开赴新的防线、叙利亚正在考虑是否也要参与其间之际，我无意把苏美共管的幽灵抬出来从而破坏它们脱离接触的进程。外交的技艺之一是寓拒绝于原则上接受的形式之中。这一次，我迁就了苏联的愿望，表示同意举行会晤，不过须是在政治上无法加以利用的级别上举行会晤。我指示斯考克罗夫特转告多勃雷宁：

总统要在我回国后同我直接讨论勃列日涅夫的信件。然后我再同多勃雷宁接触。

你还应该告诉他，与此同时，邦克大使将于星期一到达日内瓦，他将在那里会见维诺格拉多夫，对局势和我的中东之行作一初步回顾。

给邦克下达的指示还要他避免一本正经。这就是说他必须自然行事。他和他的苏联对手、驻日内瓦的常驻代表谢尔盖·维诺格拉多夫的会晤，应当是应付差事，泛泛而谈，这就是日内瓦会议剩下的全部内容。

我于午后十二时四十五分抵达阿斯旺，接着直驱萨达特的别墅。“欢迎，亨利，”他在花园的凉亭旁迎接我，以便摄影师照相；他直呼我的教名还是头一回。他把我让进他的书房，二话没说便

在限制兵力的“美国建议”上签了字。接着我把果尔达的个人信件交给他，信中说：

我深知以色列总理收到埃及总统来信一事的意义。

此事确实使我极为满意，我恳切希望我们之间通过基辛格博士进行的这些接触将继续下去，并最后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在我这方面，我将竭尽全力建立我们之间的信任和谅解。

我们两国人民都需要而且都理应享有和平。我最坚定地相信，和平是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的目标。

请允许我重复您在信中所说的一句话：“当我谈论我们之间的永久平时，我说话是算数的。”

我们有基辛格博士这样一位得到双方信任、决意在和平事业中发挥聪明才智的人，的确是万分幸运的。据我所知，他将继续孜孜不倦地为增进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而效劳。

接着便出现了一种生动的电影场面。萨达特看完信后，把信折起来并摘下了眼镜，这时他的助手阿什拉夫·马尔万走进屋来，在他的耳边细语了几句。萨达特站起身来，走到我的跟前，吻了我的双颊。“他们刚刚在 101 公里处签了字，”他说。接着又说：“我今天要脱下这身军装——我希望永远不再穿它，除非是出席什么仪式。请告诉她（指果尔达），这就是我对她的来信的答复。”

在这以后，我们又重新讨论开实际问题，好象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似的。他即将出发前往叙利亚去为协议作解释，并从而设法“保证”叙利亚一旦参加下一阶段脱离接触的谈判，其行为必定检点规矩。他还指望下周取消石油禁运措施。我的天！萨达特对他的阿拉伯同僚的反应的判断，并不象他对美国人的心理和对和平道路的观察那样敏锐。我们以后便知，他的这两个估计都证明是过分乐观了。

萨达特曾经保证在这次脱离接触付诸实施的时候，不向以色

列施加要其进一步后撤的压力，这时他开始履行这一诺言。为了不
给苏联以提出无法接受的计划来进行捣乱的可乘之机，他将在
下周从日内瓦会议召回埃及大使。我们可以通知以色列，他期望
在二月底前实行规模可观的复员。（以色列将很快报之以相应的
措施。）他已为我在卢克苏尔过夜作了安排，以便我在前往叙利亚
进行一次他也晓得是困难的旅行之前，能够好好休息一下。他一
边说一边护送我到我的轿车旁。在记者团面前，他把双手放在我
的肩上，用他那深沉的声音说：“国务卿先生，你不仅是我的朋友，
你还是我的弟兄。”接着埃及总统吻了我的双颊——这次是为了电
视录像。

卢克苏尔古时候叫底比斯，是上埃及的首府，也是它昔年荣耀
的永久性标志。相传法国的埃及学家让·弗朗索瓦·尚波利翁有一
次凝视着它的宏伟壮观的废墟，不禁肃然起敬地说：“底比斯是任
何语言中最伟大的字眼。”下午我们参观了尼罗河畔的卢克苏尔寺
院遗址，这是人类追求永垂不朽的一个非同一般的明证。我们到
这个寺院中的一角，从这里可以推知这座最大教堂的宏伟，中心庭
柱高高耸起，象是伸向无边无际的苍穹，象征埃及人渴望永恒
的观念。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看到欢乐的人群，战争的结束给
埃及人民带来的那种轻松心情溢于言表。这番景象跟埃及总统所
表现的勇气和辩才一样，都预示着埃及有志献身于和平事业。

夜幕降临，我们驱车经过仍然实行灯火管制的街道，在一片漆
黑中来到某处。突然间电闸合上了；萨达特在脱离接触协议签署
的当晚结束了灯火管制，履行了他再三许下的诺言。展现在我们
眼前的是一条林立着狮身羊头像的通衢大道，引向卡纳克寺院入
口处的巨大塔门。此处寺院是为“神中之王”阿蒙神修建的蔚为
壮观的城池。当年八万名祭司曾在这里敬奉古埃及的神明，直到
流逝的岁月泯没了这处历时最久的文明时为止。这时，一片真正
的、

也许稍带闹剧味儿的“声和光”展现了出来，照亮了所有这些不朽的雕像、圆柱、通路和方尖石碑，覆盖面之广使人放眼望去也不能尽收眼底；哪怕是为了得到部分的概念，也需要上下左右打量一番。想当年，每当一座方尖碑张灯结彩时，就得在跟前宣读那位近四千年前的埃及女王写在纸草纸上的手谕。这位女王曾想为自己树立一座黄金的方尖碑，以使自己名垂千古；可是她的谋士们打消了她的这个念头。她只得以立石碑而自慰。不管这个传说是真是假，这个例子深刻地说明光荣这一概念具有相对性。这位女王得以扬名万世，恰恰是由于她的追求宏伟壮观和个人突出的计划遭到了挫折；如果当初真的修起了一座黄金的方尖碑，那么它早就成为数千年来占领这一古都的许多贪婪的征服者之一的掠夺对象了。妨碍这位早已亡故的女王遂其利己主义心愿的因素，倒是保证了她的永垂不朽。我们的工作十年以后会留下些什么呢？在判断什么是永恒的东西、什么是转瞬即逝的东西方面，我们能比那位女王更高明吗？

亚喀巴、大马士革、特拉维夫

在为时一周的戏剧性努力之后，接踵而来的一切必然是低潮。但是，虽然我们已经精疲力竭，我们仍有必要在约旦停留，以便向那位温和的统治者、我们的老朋友侯赛因国王表明，他不会因为拒绝向我们施加压力而遭殃的。从短期看，更加紧迫的任务是促使叙利亚也参加进来。如果萨达特要继续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支温和力量的话，他的脱离接触协议就决不能孤立无伴从而变得有懈可击。每一个人，包括以色列在内，都有兴趣鼓励阿萨德朝前迈进；因为这会另辟前景，使前途更有希望。

侯赛因邀请我到位于约旦通向红海路上的休憩胜地亚喀巴去

会见他。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生动地体现了中东问题的作弄人的性质了。南面是沙特阿拉伯沿海的光秃秃的山岭，西面是以色列的埃拉特港和埃及的西奈，它们之间是一条至多八英里长的海岸线。在北部，沙漠绵延直到天边，其间不规则地横卧着嶙峋的山岗，令人想起典型的日本沙滩花园中的精心设计的顽石。这一段短而平坦的红海海岸为两个滨海市镇——以色列的埃拉特和约旦的亚喀巴——所共有，这两个市镇紧紧地依偎着，几乎连在一起，象是同一社会的一部分。然而它们有各自的机构；它们的公民从不交往。岸外滑水和潜泳的人稍不留心随时有误入从技术上说正与自己国家处于交战状态的另一国的领水的危险。飞机飞近各自的机场时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进入另一国的领空，因而不得不陡直降落，不是紧贴着一条沙特阿拉伯山脉，便是紧挨着一条埃及山脉，令人心神不安。

由客观环境造成的这一风险在亚喀巴更具有复杂性。这是因为侯赛因国王是一位酷爱飞行的驾驶员，他有时心血来潮，竟要亲自驾机出迎他特别尊敬的来宾。这一次，国王陛下高兴地驾驶着一架直升飞机出迎，并且在我的座机“萨姆—86970”的右侧和沙特阿拉伯山脉之间的狭窄空间作特技飞行。要是我们的座机上有一名约旦官员的话，他没准可以轻而易举地使我们签署什么文件，把我们当作确保他的君主安然回到地面的抵押品。

一月十九日（星期六）下午，我们在侯赛因一幢傍海的单层住宅里会晤，不到一百码以外，便是以带刺的铁丝网为标记的约旦—以色列边界。侯赛因、他的兄弟哈桑王储、扎伊德·里法伊首相和参谋长扎伊德·本·沙克尔将军象接待朋友那样接待了我们。约旦人热情地赞扬了脱离接触协议。“双方的参谋长对我都极为生气。”我开玩笑说。“这是巨大的成就。”侯赛因回答说。

但是协议也使我们的约旦主人感到凶多吉少。他们认识到下

一个该是叙利亚了；这很重要，因为这一来激进的叙利亚就不能干扰约旦一线的任何行动了。然而他们想明确知道在这以后是否很快就该轮到他们自己，如果那是可能的话，他们愿意全力加速这一进程。与此同时，而且越快越好，他们希望援用埃及的成例，开始举行工作会议来讨论撤离问题。约旦极其害怕它的阿拉伯兄弟剥夺它收复一九六七年沦丧给以色列的领土的权力。事实上，约旦在西岸地区问题上经常担心的是两点，那就是，这个地区不是被以色列无限期占领，便将成为一个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统治的、其首要打击目标就是哈希姆王国的国家。

我对此寄予同情。我同意侯赛因的战略估计。我说：

以色列可以有两种选择：它不是同阿拉法特打交道，便是同陛下打交道，要是我当以色列总理的话……我会迫不及待前来同陛下谈判，因为这是反对阿拉法特的最好保证。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谈论抉择无济于事，因为这两个抉择以色列实际上一个也不要。所以我们的讨论及其后果等于是重复我上次在十二月间进行的访问中所出现的情况。那时我向以色列领导人转交了里法伊提出的一项关于在约旦河谷“脱离接触”的建议，建议十分温和，主要涉及以色列从约旦河畔的杰里科撤离。这项建议被拒绝了，理由是它与阿隆计划不一致。根据阿隆计划，以色列要保持约旦河谷作为它的军事安全线。我进言说，既然阿隆在场，谁也无法阻碍他这个计划制定人来修改他的计划。这被看作笑话，但在一定程度上提出某种脱离接触的计划来时，我进入了死胡同。阿隆计划不能成为约旦战线脱离接触的基础，因为联合执政的全国宗教党根本反对放弃任何西岸土地。这样，以色列既不会接受与阿隆计划不相一致的任何建议，也不会同意就阿隆计划进行谈判，因为它得不到内阁的全盘支持。

约旦人并不气馁，在我这次访问期间，他们提出了一项脱离接

触的计划，规定约旦和以色列双方都从河流后撤八公里，撤到河谷沿边山脉的山麓处。约旦将在以色列撤离区建立民政机构，特别是在杰里科镇。约旦武装部队不得过河或进入距河流不到八公里处。将尽速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来保证约旦所要求的代表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我告诉国王我将在几周后同以色列人讨论他的主张。

侯赛因的态度是温和的，并且具有政治家风度。但是，以色列正在筹建新的联合政府，其中包括一个反对在西岸地区作任何领土变动的政党，因此这一态度也就没有用处了。事实上，目前的事态甚至把成立工作小组的可能性也给排除了。到年底时，由于阿拉伯世界教条主义狂热，这个失去的机会很快变成一场战略性的灾祸。其后果就是，直到我著述本书的今天，在西岸地区一无进展。

我在侯赛因的安静的海滨居所住了一夜后，于一月二十日（星期日）早晨飞往叙利亚。

大马士革的气氛比我十二月间初次来访时还要紧张。萨达特在此的礼节性访问看来不很顺利。叙利亚领导人拒绝让他进入市区，而是坚持在机场旅馆会见他。大马士革早先曾要求埃及把脱离接触推迟到叙利亚达成类似协议后再进行。但是萨达特不打算听任叙利亚在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方面三心二意，而使自己的第三集团军被困于沙漠之中。我也未能给阿萨德带来以色列方面的最低限度愿意讨论脱离接触事宜的保证。果尔达一直害怕把过多的令人痛心的决定加于她的内阁。可是她懂得：如果存在着叙利亚脱离接触的前景，那就有可能使阿萨德减轻他对萨达特道路的抵制。她的解决办法是所罗门式的。一九六七年时首先出来反对占领戈兰高地的达扬，授权对我讲了他对叙利亚脱离接触一事的“个人”意见。我能够把这些意见转达给阿萨德，却无法保证一旦他接受后，以色列将恪守不渝。

这件事甚至连我也觉得太迂回曲折了。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是，转达这些意见的机会从未出现过。因为在我和这位叙利亚领导人相处的五个小时中，证明他非常热衷于历数他对萨达特的不满，并力陈他自己的要求，并不急于想打听以色列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在我这方面，我也不急于把以色列的主张端出来，因为它们是非正式的、模棱两可的，提出来肯定会使叙利亚疑窦丛生。在我到达之前，我们在大马士革的利益照管处主任托马斯·斯科茨向我呈递了一份分析报告，说阿萨德虽想谈判，却必须克服那种天生的对以色列的仇恨心理，这种心理状态在叙利亚根深蒂固，如不加以逐步抑止，恐怕甚至会危及他自己在国内的地位。

叙利亚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给我以极高的礼遇，其原因部分是为了表示他们并不认为我须对埃及的行动负责；部分是因为萨达特的冒险实际上是管用的——这也许就是使他们如此愤慨的主要原因。叙利亚人渴望减少以色列对大马士革的淫威，在他们拒绝同以色列人会晤的情况下，他们需要我充当调解人。他们已不再提先决条件。他们一反四个星期以前的态度，不再坚持要把协议的提纲交给他们——声称要讨论的话也只能够讨论执行协议的技术方面的问题。现在他们分明已愿意谈判，而且简直是害怕把他们排除在外。

态度凶狠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达姆用他那典型的挑逗方式把话引到这个新的方面去。他阴阳怪气地埋怨约旦似乎以参与脱离接触的进程而自豪。但愿如此，我思量着。但我说的却是：“以色列基于它长期以来对叙利亚所怀有的好感，是优待叙利亚的。”

“感情是相互的。”哈达姆露齿一笑回答说。他象是在谋求我们再次作出保证：“公理永远是在强者这一边，”他用讥讽的口吻说，他指的是以色列，“因为他们是强者。”

我已得知哈达姆只尊敬那些同他顶撞的人。于是我说：“并不是所有弱者都必然是无辜的。”

然而哈达姆对于在哲学观点上取胜并无兴趣。他想确切知道我是否会象致力于埃及战线一样致力于叙利亚战线：“我们的全部要求就是伸张正义。我们确信你的努力将会产生积极的结果。最重要的是你已经深入这个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哈达姆这样一个以激进自豪的凶狠的民族主义者竟然承认美国的合作至关紧要，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寄信任于我们的目标，对他说来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哈达姆对美国持什么态度，从他几个月之后与美国大使理查德·墨菲所作的一次谈话便知端倪。当我的座机徐徐着陆时，墨菲带着不无矛盾的心理说：“我认为飞机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不，”哈达姆简单明了地回答说，“美国是。”）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情前往总统府，在那里，阿萨德总统用一个半小时对我谈论了萨达特的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他那可怕的冷漠、状似平静的仪态举止，其实更加表露了他内心憋着一股怒火。随后，阿萨德怂恿我就当前国际事务给他指点指点，其间他不时插入讥讽性的评语。由于我疑心他至少会把我的部分谈话转告给莫斯科，我向他作了斩钉截铁的保证：“我们的政策不是反苏的；我们承认苏联在中东有重大利益。我们并不同他们作对。”阿萨德对外部世界也许没有经验，可是他却了解现实：“你们马上要把他们从和平谈判中排挤出去，却说没有同他们作对？”这一次他不带讥刺，甚至还带着某种尊敬的味道回答说。

后来他又开了一个小玩笑。他已从他所有的兄弟那里听说我有一个原则，即不能允许苏联武器胜过美国武器，所以他倡议用美国武器来装备叙利亚军队！这次交谈是这样发生的：

基辛格：你应该感谢我们。每次我来大马士革，你就得到另一批坦克（从苏联那里）。

阿萨德：你跑的这趟差使也许会使我们没有必要再买坦克了。我们已经请我们不在对抗阵线中的阿拉伯兄弟为我们购买美国武器。

基辛格：你们对什么武器感兴趣？

阿萨德：任何类型的武器——坦克、火箭，什么都可以——只要买了之后没有人再说以美国武器对抗苏联武器之类的话就行了。应当把问题描绘成阿拉伯对抗以色列，而不是美国对抗苏联。有的阿拉伯人告诉我，你决不允许美国武器被苏联武器打败。所以我想建议开创一个美国武器对付美国武器的局面。

基辛格：总统的第二个建议该是鼓励以色列购买苏联武器了。

玩笑开过后，阿萨德原则上同意在美国的赞助下就叙利亚脱离接触问题着手谈判。他甚至已拟好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比他一个月前提议把脱离接触线划在一九六七年边界上的方案略见缩小一点。在叙利亚，“缩小”这个字眼具有相对性。现在阿萨德的起始立场是：以色列以脱离接触的名义放弃十月战争以来的全部进益，加上一九六七年到手的戈兰高地的一半。我深思起来，我在想：当果尔达听到这项建议时她会怎样发作起来。

此外，阿萨德在国内也做了准备工作。他甚至提出了一项建立兵力限制区的计划，尽管该区不大，向分界线两边各只延伸五公里之远。这不算多，然而另一方面的情况却是，戈兰高地没有西奈半岛那样的深度——整个地区还不到二十英里宽。我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辩论上；当以色列甚至还没有接受谈判这个原则的时候，讨论条件没有什么意义。我告诉阿萨德，我将在以色列停留以便把他的主张告诉那里。（我渴望制造已在大马士革取得某种进展的印象，借以减轻萨达特面临孤立的危险。）阿萨德已接近于答应提供以色列战俘的名单——这是以色列同意举行谈判的起码条件。他说：“一旦我们的努力取得一点进展，我就同意你的要求，提供恰当的人数。”接着他再次作了关系重大的担保——以色列俘虏中没

有死的。

最后，阿萨德同意我可以对报界吹风说会谈是“建设性的”——这将构成阿拉伯世界对埃及协议的另一个巨大支持。在去机场的途中，我对哈达姆概述了我将对报界发表的谈话内容：

我将对你的殷勤接待表示感谢。我将说我和阿萨德总统会谈了四个多小时。我们讨论了双边关系，而最重要的是讨论了中东和平的前景。关于中东问题，我们讨论了脱离接触问题，也讨论了持久解决办法——这必须成为我们的最终目标，美国已答应给予支持。会晤是十分有用的、十分建设性的，而且据我判断，是有助于叙利亚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中东和平的。阿萨德总统对我讲了他在脱离接触和缔造持久和平问题方面的主张，我们将在继续作出努力的同时仔细研究这些问题。

哈达姆回答说：“如果问到我，我将说我没有补充的了。意思就是支持你的谈话。”

这同时也意味着在逐步解决戈兰高地问题上我已从叙利亚得到了“干吧”的表示。

不幸的是，我从以色列方面没有得到这个“干吧”。星期日晚些时候我飞到以色列，我暗示我们准备在叙利亚问题上搞一次穿梭，以缓和萨达特所承受的压力。在本一古里安机场的一间会客室里，我把我们的想法对阿隆和以色列谈判小组的其他成员作了解释。（达扬没有来，因为他是不可能一接通知便到场的；也许更大的原因是，他因不参与叙利亚问题的谈判而在国内遭到的抨击已经够多的了。）以色列人被埃及协议最后完成阶段的极度紧张的劳动搞得精疲力尽，还没有恢复过来，他们并不热衷于开始另一场搏斗来处理难度大得多、令人更加感情冲动的戈兰高地问题。他们注意到了阿萨德的建议，可是未经内阁同意，他们连找碴子的份儿都没有，因为这一找碴就意味着谈判已经进行了。他们力求得到战俘名单，然而在这点上，我无法超越阿萨德对我说的话。最后我们

说定发表一项模棱两可的公告，既可意味着谈判正在进行，又可使我的以色列同仁避而不作任何肯定的承诺，公告中说：

我从叙利亚给以色列政府带来了一些有关脱离接触的设想。以色列政府现在将研究这些设想，并在内阁加以考虑之后把它自己的观点告诉我们，到那时，我们就知道进展如何了。

关于约旦，以色列谈判者的态度甚至更加暧昧。他们注意听了我对侯赛因的建议的介绍；问了一些深刻的问题。但是我的对话者没有一个打算把自己在新内阁中的前途抵押掉，去冒遭到全国宗教党否决的风险，因为谁只要同意讨论从西岸撤军，不管多么微不足道，也不管是从西岸哪一块地方撤出——即使是杰里科，都不免要遭到该党的这种惩罚。

最后，一月二十日（星期日）午后八时半，在中东度过了十天戏剧性日子之后，我们启程回国了。随行记者团听说我在晚上离开，急得几乎造起反来。原来他们在一天之内跑了三个国家，每到一个国家都必须发稿，现在又马上要乘飞机作十四小时的旅行，而又不能象我那样有两张床可以躺平，舒展身子轻松一下。但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总统正不耐烦地等待着我，他急于要开始向国会通报情况，并且领略这桩富有积极意义的事件的得之不易的甜头。

最后回到华盛顿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四时半，我们回到华盛顿，途中在（英国）希思罗机场作短暂停留，向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勋爵通报了情况。我在飞机上给主要的阿拉伯领导人和几个北约盟国发了电报。我离开埃及后每到一处访问，我都给每一方通报有关的情况。阿萨德和侯赛因当然对以色列对他们的建议的反应特别感兴趣。我告诉侯赛因，我已把他“有兴趣在日内瓦会议的范围

建立一个约旦—以色列工作小组”一事转达给对方了，并且“让他们知道我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同他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我在给阿萨德的电报中写道：

星期日傍晚当我于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以色列停留时，我已把你关于武装部队脱离接触的建议转达给以色列政府。以色列人告诉我他们将着手作答。我一听到什么回音，便将再次与你联系。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然而它却使我们得以保持接触，而且也缓和了萨达特所承受的压力。

我发现尼克松洋洋得意；近几周来，他几乎没有碰到过足以使他鼓舞的事。而今使他感到非常自豪的是，即使是在这场国内危机中，他的政府也设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使中东地区转向和平。他对国会领袖们作了简练的情况介绍，因为这些人癖好是打听有没有什么“秘密承诺”，好象美国的介入只能基于某种秘密文件而不是战略现实，又好象如果我们不去介入，也不会引起什么了不得的严重后果似的。在公众的一片赞扬声的推动下，国会领袖们即使最后也还未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只有威廉·富布赖特一人例外）按尼克松的心愿对他表示在我看来是功有应得的无条件拥护，这时至少也是差不多完全摒弃了他们同总统讨论水门事件时所采用的那种愠怒的腔调。

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我举行记者招待会，谈了众所周知方面的问题：协议的条款，各方之间的保证。我不得不再次解释美国“秘密”承诺问题。记者招待会的相当大一部分时间被消耗在给我们的旅行从一开始就蒙上阴影的我的办公室文书的那件案子上。我没有时间研究这件事的微妙之处，也没有来得及准备应付经过水门事件实战锻炼的报界的寻根究底的追问。我是否知道已在对安德森泄露事件进行调查？我是否察觉这次调查是由所谓的“管子工”之一、一度当过我的助手的戴维·扬主持的？提问的趋向是

越来越明显。言外之意就是，假使这些我都知道，我就不能不与“管子工”们的大部分活动有牵连了——这倒不是一个通过推理得出的结论。还有几个问题也属同一性质。这些问题用心不恶，唯其如此，危害性却颇大。它们表明，我们大家所踟躅其上的那条壁沿架是多么狭窄。权威分明正在削弱；没有什么成就能够长期扭转目前的趋势；我们应付持续的国际危机的能力很微弱。

但是这些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之交的冬日的美国，不是一片乐土。疑虑、悲愤和玩世不恭甚嚣尘上。人们开始好作耸人听闻的揭露，不幸的是，其中许多是很有理由的；有一些则几乎是为揭露而揭露。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田地，也不难理解。信心是件珍贵的商品。一旦遭劫，它必须有机地再生，仅仅依靠主观意志或以国家安全为由去行事，是恢复不起来的。

然而，要说我们不颇有建树的话，那么事态发展的过程也许可以证明，我们已经改变了中东地区一角的局面。和平的进程幸好将不顾一切障碍推向前去。人们也许会自豪地忆及这一惨淡时期的某些事情。我们可能不是缔造最终和平的领导人，但是，如果有一天人们确实可以这样说，一切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末我们定会感到满足的。

①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赛特和邓拉普公司，一九七八年），第九七一页。

② 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转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文件，听证会》，第九十三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一部分（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和第二部分（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

③ J·F·特霍斯特和拉尔夫·艾伯特齐上校合著：《飞行白宫：空军一号的经历》（纽约：科沃德、麦卡恩与盖根出版公司，一九七九年）。

④ 关于随行记者团的奇遇，见理查德·瓦莱里亚尼：《和亨利一起旅行》（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一九七九年）。

⑤ 按照日内瓦和平会议精神达成的埃及和以色列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在 101 公里处由埃及参谋长（贾马斯）和以色列参谋长（埃拉扎尔）签署，并由联合国紧急部队司令西拉斯沃连署；协议内容如下：

A. 埃及和以色列将严格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要求的在陆上、海上和空中实行的停火，并将从本文件签署时起，停止反对对方的一切军事或准军事行动。

B. 埃及和以色列的武装部队将根据以下原则实行分离：

1. 运河东岸的埃及全部军队部署在附图（见第五二九页地图）上名为 A 线的界线以西地区。全部以色列军队，包括原在苏伊士运河和大苦湖以西的军队在内，将部署在附图上名为 B 线的界线以东地区。
2. 埃及和以色列两线之间的地区将成为脱离接触区，由联合国紧急部队进驻。联合国紧急部队将由来自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国家的部队组成。
3. 在埃及界线和苏伊士运河之间的地区，军备和军队将受到限制。
4. 在以色列界线（即附图上的 B 线）和附图上名为 C 线的界线（即沿着吉迪山口和米特拉山口所在的山脉的西部山麓而划的界线）之间的地区，军备和军队将受到限制。
5. 第三条和第四条中所说的限制将受到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检查。联合国紧急部队的现行检查程序，包括埃及和以色列双方向该部队派驻联络官制度在内，将继续执行。
6. 双方的空军将被允许在各自的界线之内活动，另一方不得加以干扰。

C. 埃及和以色列双方的军事代表将拟订军队脱离接触的实施细则，他们将就这一进程的各个阶段达成协议。为此，这些代表将于本协议在联合国的关照下在 101 公里处签字之后四十八小时内进行会晤。他们将在五天之内完成这项任务。脱离接触将在双方军事代表完成其工作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开始，无论如何不得晚于本协议签字之后七天。脱离接触的进程将在该进程开始之后四十八小时内完成。

D. 埃及和以色列均不认为本协议是一项最后的和平协议。本协议是根据安理会第三三八号决议的规定，在日内瓦会议的范围达成的走向最后的、公正的和持久的和平的第一步。

埃及代表：埃及武装部队参谋长

穆哈默德·阿卜杜勒·加尼·贾马斯中将（签字）

以色列代表：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

戴维·埃拉扎尔中将（签字）

连署：

联合国紧急部队司令

恩肖·西拉斯沃中将（签字）

⑥ 由萨达特总统和果尔达·梅厄签字的有关限制军队的美国建议的内容如下：为了便于实施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并作为该协议的一部分，为了有助于始终严格遵守陆上、空中和海上的停火，美国提出如下的建议：

1. 在协议所规定的军备和军队限制区内,不得部署:(a)超过八个加强营的武装部队和三十辆以上的坦克;(b)除了反坦克炮、反坦克导弹、迫击炮和六个口径不超过一百二十二毫米(M-3)、射程不超过十二公里的榴弹炮连以外的火炮;(c)能够干扰另一方在自己军队上空飞行的武器;(d)用于发射导弹的永久性固定设施。每方的总兵力不得超过七千人。

2. 在埃及界线以西和以色列界线以东各三十公里的范围内的各个地区,都不得部署足以打到对方界线的武器。

3. 在埃及界线以西和以色列界线以东各三十公里的范围内,都不得部署地对空导弹。

4. 上述限制将自有关各方签署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脱离接触的协议时起生效,它将按照基本协议的实施计划予以实施。